傲骨

傲骨

〔罗〕布祖拉著

任远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AUGUSTIN BUZURA

ORGOLII

根据 EDITURA DACIA CLUJ-NAPOCA, 1977 年第一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傲 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illegible]印刷厂印刷

字数 [illegible],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0 1/16 插页 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8,500

书号 10208·165 定价 1.50 元

一

听值班医生报告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教授感到一阵无名的倦怠：双肩难于忍受的沉重，疲乏无力的肌肉简直不听使唤。而当他把手伸向额头，触到一股冷汗时，几乎要惊叫起来："天哪，这是怎么啦？竟会是这样？……"但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听到的却是象从深沉的远方发出的一声叹息。经过一阵寂静无声的间歇，教授靠住椅背，感觉略微镇定了一些。他真想从这令人窒息的白罩衫的海洋中逃走，于是低声说了一句，要一杯咖啡和一杯凉水，而当实验员还没作出第一个反应性的动作时，教授发现，医生和大学生们就象听到一声命令，立刻远远地让出一条一直通向门口的廊道。实验员阿纳尼亚并没急着马上离开，他不慌不忙地在白罩衫的口袋里摸索了许久，掏出一盒纸烟，匆匆取出一支，出人意料地塞进教授那半张半闭的嘴里。烁烁闪动的火柴亮光热呼呼的，在教授眼前晃了几晃，他蓦地周身一震，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走了神：刚才昏睡了一阵，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仿佛一段时间灵魂离开了躯体。但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灵魂又即刻入了窍，似乎又能分辨出周围的颜色，又能听到一阵单调的、令人厌倦的嗡嗡声。他慢腾腾地擦了擦脸，摘下被汗水弄脏了

的眼镜，一边揩拭一边用心地环视周围的面孔：值班医生不说话了，同其他人一样，都神情紧张地瞅着他。

“干吗停下了？请继续说下去呀！”克里斯蒂安含含糊糊地说道。无论如何他还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自己昏睡的这段时间比感觉到的还要长。

“这儿真热，简直热极了。”他试图找点理由，但这句话并未说出口；他深信这不过是对自己做的一点解释，因为没有一个人跳起来去打开窗户或者把门打开。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请继续说下去。”这次总算让人听明白了，值班医生接下去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教授依旧心不在焉地惊异地自问：“怎么了？怎么回事？现在吗？我不相信……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惊魂不定地按了按脉搏，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只不过稍快一些，也许由于紧张。只有两边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就象是刚刚做过什么费体力的事。几天之前他刚刚量过血压，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正常的知觉仅仅持续了一小会儿：顷刻间整个大厅又陷入一片混沌，白颜色顿时覆盖住了一切。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头部：只有后颈上的旧疤痕热辣辣的，象是唯一的活物。他试图站起来，但一下子却又更牢地坐进椅子里，对此他倒感到满意：因为无论如何，这样总不会摔倒。大厅里嗡嗡的人声，他逐渐适应了。值班医生的发言就象计时器发出的一连串单调的声响，已经分辨不出任何意义。他闭上了眼睛，朦胧间，面前出现了一片被阳光烤灼着的绿色荒原。蓦地，象是一声号令，一群蝗虫从记忆

的某个角落跳了出来……“潮涌般地不可遏止……荒原顿时变成一片白色，耀眼的白色，如同清晨的白云……一团令人生厌的活物，单调地蠕动着，吞噬着，发出刺眼的光泽，毁坏着一切，使周围变成一片荒漠……莫名其妙地窜动着，挣扎着……”他感到好象有只长脚鹭鸶在脸上、手上不停地走动着。在什么地方似曾见到过的这种景象，为什么恰好这时映入他的脑海？“一九三六年还是一九四六年？谁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里保存下来的这讨厌的记忆又重新活动起来？”无数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着，又腾起一片灰色的云团，上下翻滚着，终于覆盖住了其他所有的颜色。他身体神经质地抖动了一下，忽而发现，大厅里的人们正静静地都有些昏昏欲睡地听着值班医生的报告。他象是离开许久之后重又见到了这些人：他们沉默着，一动不动，就如同一尊尊石雕。无声的寂静几乎使他难于忍受。他想告诉值班医生赶快结束，他还不曾听过这么冗长的报告；然而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恰当，况且他甚至都无法集中起精神说出这几句话。“事实是我已经远离了他们。可能由于我的研究，这么许多年……多少次的麻烦需要我应付……况且，对有些人我已经失去了信任。我躲开了他们……或者说逃避开……就象是害怕他们。一个个从身边滑过……我没有这个耐性去了解他们……”

他又注意地观察了一下，想看看究竟是否认识他们。但人们并没有回到原先的座位上，依然保留着那条廊道，人们在等着实验员，这使他陷于困惑：“我想或许我的样

子显得悲伤，总之是有什么东西含混不清，我无法解释，应该是另外的情形……哦！阿纳尼亚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了？上了岁数，我越来越不行了，没办法。”

他决定站起来，但那令人生厌的景象，成团的蝗虫，一时间又映在眼前。蝗虫又前进了一段，被吃光叶子的树木显得格外凄惨。枯枝向着低低的紫色天空摇曳着。人们身上的白色罩衫，象是这幅悲惨图景的衬底。

这时，实验员端着咖啡来了。教授对自己竟至倦怠昏睡不能自制有些恼怒，于是接连吸了几口烟，然后说道：

“亲爱的，把咖啡给我送到实验室，我马上就去。”

说完，他又高兴起来：因为他是这样热情，他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清晰，这就可以掩盖他模糊的精神状态。“这几天我把所有的卡片又重新复核了一下。这种新的媒介质弄得我简直无法入睡……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研究到119。不知为什么，我好象觉得这种抗癌药将会被命名为120，或者至多是125。”如果他知道刚才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如果当真仅仅是一时的疲倦，他会毫不在意。但从现在的感觉里却生出一股新的、从未有过的自觉卑微的感情，他想极力摆脱掉这种感情，至少把它深深埋藏起来。

“副教授同志，我想请你代替我的课，但是你先要亲自看看昨天晚上的情况。”他的话没有人听到，或者只是心里这样想而没有说出来。总之，他发现没有任何人试图做出哪怕是最小的反应。而且，从那些呆呆的面孔里，他没有找到副教授弗洛拉，也许他根本就不在场。他又仔细地

看了看周围，许久才发现，原来一动不动的弗洛拉就坐在他的右边。

“你还没走吗?”他问道，“还是我没讲清楚?”然而，这些话毫无意义，似乎说出来只是为了平复一种无缘无故的悔恨。这种心情，在那些白白度过的年代里，在那些不平静的漫长的年代里，在那些一直向往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景致的年代里，曾经一度主宰过他。

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毫不犹豫地站起来，他自己也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大的气力。在廊道上他才记起值班医生的报告还没作完，但他决定不再回转身。使他高兴的是他还能走动，这倒给他增加了活力。他不愿做任何解释：他从未谈过自己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这样做过。而且他也不愿看到，如果他回转身，医生们会做出如何惊异的表情。他径直走向地下室，实验员跟在他的身后。这当儿，他并不想下去工作，只是因为那儿沉重的大门，把进口关得严严实实，和外界完全隔绝，他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休息。只要把电话和电铃切断电源，除了阿纳尼亚之外，其他任何人都进不来。而完全了解教授习惯的阿纳尼亚，会恰当地处理好各种意外的打扰。况且，极少有必须他亲自处理的特殊情况，因为如同有一次他说过的，门诊部至少有五位跟他一样操刀准确的外科医生，对此，他并不担心。

在埃氏烧瓶里——阿纳尼亚经常用它来煮咖啡，他发现还有两份咖啡，这使他有些惊异。“我甚至没能替他搞到

一个住处，到现在还跟三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我讲过多少话都不顶用。谁有工夫来关心一个可怜的实验员！他还以为我现在要工作呢，可是做什么呢？”他匆匆啜了一口咖啡，然后在实验室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这时他才觉出身上累极了：脊背疼痛，两眼发胀，心脏血管仿佛在剧烈地抽搐。但是，象往常一样，对此他并不十分在意。“终有一天还会来一次更大的，如此而已……五、七分钟之内……躯壳解体，一场戏剧将无声无息地就此完结，缓慢地、平静地走向道路的尽头。”想到这儿，他周身打了个寒战：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仿佛身居高处，在飘飘然地回头欣赏着原先的计划、想法，显得那样乐观，那样自信。他不禁想笑出来：“竟来得这么快！”他又记起听值班医生报告时的情景。“无非如此，向太空纵身一跃，飘飘悠悠，于是一切都完结啦……照理说，活过了这么长时间……但竟至这么快吗？”他有些害怕地自问，“现在吗？”蓦地，妻子的面孔浮上脑际：脸色那样苍白憔悴，睁大着眼睛——大得有些吓人，悲伤地望着他。顿时，他觉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试着说些什么，但只喊了声她的名字，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她那美丽的长发已经稀疏，干瘪的双臂没有一丝肌肉，经过多次打针输液已经变得发紫，看起来就象是孩子的图画里歪歪扭扭的线条。他呆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痴痴地、鼓励般地对她笑笑。而她依然异样地瞧着他。她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尽管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没有拒绝对她的宽慰，依旧显出怀有一线希望

的样子。最后的两个月她受尽了折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步也没离开医院，在这儿吃，在这儿睡，没进过城，没回过家，而且还极力显出高兴的样子。他说谎话，说笑话，东拉西扯，但看得出，他的所有努力，在她的眼睛里，在那双于憔悴的面影中格外突出的眼睛里，显得十分可笑。只有她的眼睛没有变化，还是那样温顺，忧郁。在此之前，他还不曾想象出病房里守候在病床前的那些人们，每天会承受多么大的内心痛苦。“这么许多年，竟没有注意到，”那时他想道，“每天我们不过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有时连这也做不到。而当你知道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一切已经无法延迟，那时你曾向她乞求每一个微笑，你曾觉得生命的片时片刻都是那么宝贵，纵然你完全明白，为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只不过使得肉体的痛苦多延续一些时间而已。有时候，我竟还觉得讨厌病房里的那些人们，走路、治疗都碍我的手脚……”他脑子里越来越勤地老是出现丝苔拉的面影，但同时也无法“忘掉”他亲手放在床头柜上的吗啡针。他每次都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自责自问：是人道的还是不人道的？对的还是错的？是犯罪还是救人？不管怎样，这样做了，如此而已。而她却没能支撑着走到尽头，最后在她床头上发现了一管破碎了的吗啡针：她仿佛睡着了，或者只是他觉得她在睡觉，而他，耗尽了精力，痛苦地、孤独地守在她的床头。清晨，当他锁上房门，决定回家通知安德烈的时候，似乎感到一阵轻松，一种渴望宁静，渴望从未知的那一边传来令人舒适的召唤的感情主

宰了他。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来得是那样突然，也许是几个月来烦乱、无能为力和绝望的混合物。仿佛已经到了生与死的另一边，又经过了一场恶梦，——许多曾经做过的恶梦之一。也许出现的这种感情，是为了填补科学在这一章节中的无能为力。他既不觉得平静，也不觉得恼怒，而是一种急迫感："看看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急迫。他确信他的生命已经和丝苔拉同时结束了，任何情感已同他永远别离。现在活着逃脱出的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注定要把斗争继续下去的人；只不过这个人还没有被征服。为了使一切象开始那样结束，还需要一番争斗，不存幻想，不抱乐观，只是怀着唯一的念头：把这场战斗问心无愧地进行到底。"你们的科学为什么连这也做不到……"这是最常遇到的责问。他曾听到过一个不久便死于癌症的二十九岁的工程师大声地吼叫："你们干脆去上吊吧！我知道，我得的是癌，可你们呢？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哪怕多给打点吗啡……连这点也不做，你们这群废物！"这点？而这点本身就是生命。昨天夜里，他梦见了这位工程师，清晨醒来之后，便不自觉地走向那张这位工程师曾经躺过的病床。床上躺的却是一个枯槁的、脸色苍白的老年人，正仰面睡着，张开的嘴向两边咧着，露出了黄色的牙龈，长长的胡须已好久没有修整。为了摆脱开这难以让人忍受的形象，他大声嚷道："护理员呢？为什么放下病人不管？这是谁的病人？"他完全明白，从现在起这位老人将属于谁，但他却无法解释，老人的形象为什么会给他

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丝苔拉从未直接对他说过什么，只有一次曾暗示过他，她一个人呆着觉得怕。随时可能要死的想法，越来越厉害地折磨着她。尽管不存希望，但她依然幻想着继续活下去，甚至害怕在睡梦中就会越过到世界的那一边……实际上，当开始放射性治疗，当诊断已是确定无疑，当克里斯蒂安教授感觉到她已经知道了的时候，他们曾经谈论过病房中的另外一个女病人："你瞧，"她说道，"假如生命是可能延续的，假如在我们之外真的还有一个摸不到的鬼魂世界——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不一定绝对不存在——那么我倒情愿我们都呆在一起，这是值得的。可事实上我明白，生命终究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人会长生不老。但如果这指的是别人，你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轮到自己头上，当你知道再有两个、三个月，就会一切完结，永远地完结，那么就会觉得可怕，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可我觉得你越想跟亲人呆在一起——可能这种想法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却越不该让这段时间延续，应该咬紧牙关，一切让自己承受，别再给别人增加痛苦。"她说话时的坚定口气和镇静态度，使他感到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也就是说，对她的内心他几乎一无所知。多少年来她一直诚恳地听从他，体谅他，而他，只不过向她表示，为有这样一个替他分忧解愁的贤内助而感到满意，但却从未关心过在她表面平静的背后，有无烦恼。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为了能够被雇用，她不得不宣布同他

离婚，为了抚养孩子，她替人扫地、洗衣、熨烫，什么活都干。他回来之后，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休止的研究，渐渐地，她也学会了沉默无言地耐心等待，不断给他以鼓励。而如今，她终于依旧这样默默无声地离去了……

象在眼前展现开唯一的一幅画面，克里斯蒂安重又吃惊地看到被蝗虫吞噬净尽的荒原。一颗小小的红色太阳，一动不动地缩在灰暗的、浮动的、一望无际的天空。远处传来一阵阵令人心烦的声响：蝗虫贪婪地、不停地啃嚼着，密密麻麻地滚作一团，而那颗小小的红色太阳，却始终在监视着这场疯狂的蠕动以及蝗虫身后留下的一片荒野。

一阵寒气使得克里斯蒂安教授蓦地睁大了眼睛。他转过脸去，眼前是象往常一样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实验室。前面是消毒锅，另一边靠墙的地方，一群白鼠在安静地咀嚼着什么；旁边——上百的试管和烧瓶，离心分离器，显微镜——都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可怜的阿纳尼亚，还以为我要继续工作，可我做什么呢？用什么做呢？除非把我自己搞成皮癌，让所有的人去做切片研究，然后把我自己的药物注射到癌瘤里，让大家看看肿瘤是怎样消退的。而实际上这种药物对于人是否同样有效，还没有把握，况且即使动物试验，也还没经过时间的考验，一切还都不成熟……以后没有别的路，也许值得这样试一试。我要让门诊部那些不抱什么既定成见的青年人，拿我当作白鼠来试验，看一看人体究竟能承受到什么限度。”想到这儿，他不禁要笑起来：自己的想法竟这样越来越不成体统。“其实为了研究

心理的承受限度，我也是极好的实验对象。同别人相比，也许我遭受过的痛苦并不多，但是，却很难说我自己感觉到的同样是这么多。”

实验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盖起来，怕它凉了——他知道，开始工作之前教授总要躺一大会儿，脊椎炎引起的背痛时常折磨得教授忍受不了——在这之后，他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把实验动物弄来：接下去他知道教授会逐个观察动物身上肿瘤的变化。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教授一直是这样做的。先是毫不心疼地让动物染上癌，而后等一段时间，接着便开始做各种切片，等化验员按照教授的要求配出试验液，教授就把它交给阿纳尼亚去注射。然后，又是另外的试验液，另外的肿瘤，另外的切片，接着是长时间的等待，当然，少不了又是一次次的失望。

教授感到自己的姿势很不舒服：脊背难忍地疼痛，但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由于那奇怪的困顿，那使他离开众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自身的失神而感到恼怒。在看来无法弥补的这段距离的另一边，经过这次新的不曾料到的体验给予他的完全的、永久的宁静，他想到自己已经置身于道路的尽头，心里不由一阵惊悸。“不，还不到时候！”他想要这样呼喊，但身体却依然平和地作不出任何反应，仿佛它完全不听命于意志，而在独立地召唤着宁静和休憩。

有一次他以同样惊恐的心情，感到生命，或者说对生命的关注，正在缓慢而确定无疑地，象是通过无数不可知的毛细管，一点一滴地散失在大地上，自身变得越来越枯

槁，空虚。由于难以忍受，他竟不加考虑地把这一切都照直告诉了他的女助教，薇拉·班奈德斯库。他从未想到过会这样做，甚至在丝苔拉面前也没这样做过。奇怪的是不管克里斯蒂安怎样试图回忆那天夜晚的事，但他可以断定自己并不是特意选中薇拉的，她只不过是可以信任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他并没奢求抚慰，也不希冀同情，而是恨不得受一顿鞭笞，听一听自己用怎样的话来描述这场痛苦。他不顾一切地压抑着，极力显出可笑的样子。而她并不作任何回答，只是抽抽噎噎，也许在为自己的被征服而哭泣。他是用话语来解脱自己，而她却以自己的方式，用眼泪。自从经过那愚蠢的、失去理智的一夜之后，薇拉时常跟在他身边，完成着一个介于保姆、情人和亲密合作者之间的角色。教授出于对那次堕落行为的悔恨，免不了暗暗谴责自己，而看到她在身边，却并不反对，甚至感到有这种需要。表面上他极力表现出好象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对于她任何勾起那段痛苦回忆的企图，他都会用冷漠的目光，无声的沉默给以扼制。薇拉也必须象其他医生一样地向他作值班报告，她的学生准备不好，照样会从他那儿投来严厉的目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整夜整夜地一起呆在实验室。但在这儿，除了“给我这个”，“你认为怎么样”之外，别的他一句都不说。他这种难以理解的表现，生硬而冷漠的态度，甚至连阿纳尼亚也感到看不下去：“这样看着她，简直没把她当成一个人。”而薇拉却一直耐着性子：说话倒是次要的，她要尽一切可能不让他继续衰退下去，

扶他重新站起来，冷静地等待着他回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当然，教授也在为自己的卑贱行为而深感不安，她的眼泪仿佛更增添了事情的悲剧色彩，使他越发感到羞辱难当。但所有这一切已经无法修复，能做的，无非是把那场终将发生的对话推迟，尽量远离开那让人悔恨的时刻。在她面前，他终归有解释的理由，他的实验看来正在比预想要早地出现可喜的兆头。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安还有另外的担心。倒不是害怕对他议论或者不怀好意的讥讽，而是为她的青春而忧虑："从此她将永远陷入日常琐事之中而不能自拔。她无法理解我的年龄，我的痛苦和孤独。我是属于另外的时代，另外的遭遇，另外的生存方式，我们怎么会相遇在一起的呢？我不愿意这样可笑地结束自己的晚年。"而且，还有安德烈。"天哪，我竟从来没跟这孩子好好谈过！"他时常这样自责。"他生活得怎么样？妈妈把他养大……可她，已经去了……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一段难于缩短的距离，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他跟我接近。如果薇拉……他会说些什么呢？"事实上，这是最触到痛处的问题。"他能对我谅解到什么程度呢？"好多次，安德烈在家看到她，却从没说过什么，教授也从未对他露出过示意性的笑容。"在他看来，我不正是在玷污他对妈妈的纯真怀念吗？也许现在我是他唯一的依靠。但当我不再是他可能想象的那样，那他会怎样呢？"使他同样感到担心的还有他自己：他简直无法习惯同另外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年轻得多，跟他儿子的年龄、想法更为接近的女人在一起……当只有处于父亲的地位才

是唯一最适合的举止表现时，怎么能再穿起遗忘多时的时髦衣饰，梳洗打扮，坦然地去俯就于她呢？究竟对她有多少了解呢？他几乎对自己的感觉都有些害怕，这方面他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不仅是因为曾经多次被它欺骗，还因为他已经不能，不再能冷静客观地对它加以分析判断。"既然我自己可以不象我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她不能有同样的情形呢？谁晓得在这个女助教，这个温顺的、孤僻的、跟我有关联的——我用不着否认这一点——姑娘背后，还有什么人呢？也许她也有自己未表露的隐情，她啼哭的或许是另外的苦衷，或许纯粹出于怜恤，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我已经感觉到了，她就象一个虔诚的弟子那样天真无邪。如果我问她一下呢？如果我……也许将要更糟。总之，是件无法继续下去的事。当然，做为个人，我需要重新安排生活，但是生活还能给我些什么呢？几乎让人发疯的孤独，已经渗透到每件事情、每个动作、每个想法里……做为人不会甘心于此，也许应该要求做人的权利。但是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我仅有的一点时间，只能是为了科学，为了安德烈。科学……也许会一事无成，也许相信会取得肯定的重大成果的固执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你的手段已经山穷水尽，而且甚至连荣誉、尊严也失去了最后的诱惑力，也无法填补你空虚的心灵。我应该永远地把薇拉从脑子里驱逐掉，跟她相比，我实在是太老了，太不相称了。我已经是日暮黄昏，而且是即将进入完全黑暗的黄昏……"他低头看了看苍白干瘦的双手，关节突起的长长的手指，不

由一股羞愧感涌上心头，一种近似被厌弃的自惭形秽的感觉。“这些先前的想法、烦恼，为什么又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他又看了看手掌：一条又深又长的生命线，丰富的感情，充盈的理智，他几乎笑出声。年轻时，他还曾相信过这种标记将会给他安排一种特殊的命运。而现在，当他能够抛开安德烈不去考虑的时候，曾经有过各种设想：对自己命运已不再有什么奢望，宁愿做一个普通的、不愿出头露面的——更确切一些，逃避现实的医生，一个远远躲在一座小城，不为众人所知，与过去、与故旧断绝一切关系，过着宁静的退休生活的医生。他也曾想象过被派往一个热带国家，那儿难以消受的酷暑，甚至都能使你的思想停止活动。但这些天真的想法，终归无法实现，于是实验室便成了既是被派往的国度，又是自己的家。他继续望着掌心：自己曾经在生命线上的哪一个点上呢？他的手不觉微微颤抖起来。“这倒没什么重要。”他擦了擦湿漉漉的冷汗，惊异地觉察出掌心那条横纹里竟满是汗水。

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近来教授显得越来越老了。两鬓增添了白发，而且不同寻常的是跟人们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沉默寡言了。他整天整夜呆在实验室，尽管有时也离开一会儿，但时间不长，他竟会不知去向，全城都找不到。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曾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问他在干些什么，身体怎么样，而得到的回答，不是冷冰冰的白眼，就是

一句“摘树叶喂狗!”[①] 那些偷偷往设在病房地下室的实验室里瞅过一眼的人们,会得出结论说,看起来教授并没有撒谎:“是的,他是跟狗一块儿抽烟。这些东西都学会了,现在能陪他一起抽了。”原先他不留情面的俏皮话,含义确切的反唇相讥,对同事们的特点一针见血的描述,曾为大家熟知,后来这一切却渐渐地远离了他。如今,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跟从前完全相反的人。他已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活力,变得沉默,冷漠,仿佛整日在考虑用什么来替代和填补往日的欢乐。教授、研究员或者医生们,不管愿意与否,会面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会议,讨论,各种学术活动等等,但不知不觉却失去了那个随时可以活跃气氛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丝苔拉的去世而立即开始的。那时,为了安德烈,他不愿接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极力装出没有任何变化的样子。而当对丝苔拉的回忆已逐渐淡漠,当安德烈也逐渐习惯于现状的时候,如今他却又成了人们瞩目的中心。他极力避开人们,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他的科学研究上——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会越来越喜欢呆在实验室,好象只有在那儿他才感到安心,才感到满足。

对克里斯蒂安教授各种各样的说法,引起了考德里亚努教授的关注。他冷静耐心地分析了教授的言论和行为,分析了学校流传的各种猜测。而那些觊觎克里斯蒂安教授

---

① 罗马尼亚成语,意为无所事事,无所用心。

职务的人们，则利用他的沉默，越发起劲地放出各种谣言。衰老了吗？不太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会变得保守、自私、吝啬，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表现出的桀骜，而且会喋喋不休，固执地不接受新事物，往往津津乐道地回溯自己的青年时代。但克里斯蒂安教授完全不是这种样子。抛开别的不说，单是他把自己的钱统统花费在仪器上，花费在给狗买烟上，仅这一点事实，也足以否定上述的推想。除此之外，而且他总是呆在实验室里。如果不是面临着即将成功的重大发现，面临着超乎寻常的喜悦，那么必是遇到了什么精神挫折，生活不如意或是遭到了什么不幸。各人总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作出反应。也许教授整天躲在实验室，正是为了隐藏他的哀痛，在等待着用时间来医治他的精神创伤。冒着被拒之门外的危险，考德里亚努决定到教研室直接问一问他。但正巧那时候，克里斯蒂安教授却不留踪迹地不见了。看来唯一知道他去向的人，只有他喜欢的实验员阿纳尼亚。而实验员耸耸肩膀，什么也不回答。考德里亚努又到了安德烈那儿，到了杜米特列斯库医生和约尔卡医生那儿，结果也没问出下落。就连薇拉·班奈德斯库也一无所知。只有阿纳尼亚提供的唯一细节，可能成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克里斯蒂安曾经拜访过他过去的一位出身不同寻常的女友。不管是她住的村边那间周围杂草丛生的破旧猎人小屋，还是这位怪僻的女主人——从她身上还看得出昔日的风韵，而现在却身着男装，在屋后饲养了一群野兽——都给阿纳尼亚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这些野兽她从幼仔就开始驯养，但并不怎么成功。不管怎样，同她还能够相安共处。她弄些死东西甚至猎物来喂它们，但到了寒冷的冬季夜晚，每当这群饥饿难忍的野兽窜到村里找寻牲口或者驯鹿充饥时，住户周围顿时鸡飞狗叫，嚎叫连声，这群兽类一旦野性发作，简直如同发疯一般。教授同女主人一谈就是一整夜，而外面的狼嗥声，几乎让人神经错乱。阿纳尼亚曾亲眼看到过这幅骇人的景象：成群的狼越过篱笆，互相撕咬，拚命地啃着墙壁和小窗上的毛玻璃。实验员的这些话，慢慢传开了，于是每当教授不知去向时，好事者们都猜测他一定在那个女人那儿。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癌！怎么竟会是这样？他妻子死于癌症，如今再轮到他，未免太过分了。谁知道呢？每天几十种致癌物，拚命地搞实验，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克里斯蒂安教授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没拍过一张X光片，什么也没做。不论是技术多高明的大夫，总还要听听别人的看法；但如果病轮到自己身上，一切把握、信心，就会全部失掉，宁愿甘心受欺骗。每当教授查房、讲课或者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几十双眼睛都在注意他的脸、手、皮肤，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而好事者更进一步研究他的食谱，从厨娘那儿打听他是否喜欢吃肉，是否用咖啡，是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试验据说已经发明成功了的抗癌药。阿纳尼亚无意说出的情况，给了人们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已经预感到生命的结束，因此要再看一看童年故地，感到需要会一

会旧时的朋友。一些人的去世会使他越来越感到，那个时刻对他也已临近。

另一些对私生活感兴趣的则猜测说，是因为薇拉。要么他离开了她，要么她抛弃了他：依仗同老头子的特殊关系，她在附属医院弄到了一个好职位和一个从事科研的名声。他们共同署名的论文，已经无法再否认，而当她认为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设法再接近他。尽管当着人的面他们表现得好象很自然，但事实上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儿子安德烈，也是被人们怀疑为使教授沉默的原因之一。安德烈同一个女助教有着暧昧关系。这个女人曾经结过婚，尽管后来又同不少条件并不高的人一起生活过，但看来是听了教授的劝告，她才拒绝了安德烈的求婚。当然，安德烈并没有死心，这样，教授为使儿子完全听从自己的愿望就落了空。再加上情面……另有一些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大概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愿让人发现。可到底是什么事呢？是在手术台上开刀开死了人？受了贿赂？这些都找不到确实的根据，但人们仍不肯罢休。也许他发现了什么，气候要有所变化，他预感到情况不妙……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考德里亚努曾说道，“不是不可能对他产生影响，但不会是根本性的。无忧无虑的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心情去忖度别人，总是在分析当中不自觉地加进自己的主观愿望。如果说前提不是得了不治之症，那么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是孤独感在作怪。到了他这

样的年龄，不会再交什么新朋友，有那些老朋友也就够了，当然条件是他原来就有朋友。照理，阿纳尼亚可以算是他理想的实验员，但此人不具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因此不可能进入朋友这一级。而同别的医生，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接触……”有一点看来使得考德里亚努感到惊异：为什么人们对克里斯蒂安教授突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诚然，他现在已经是知名专家，成绩卓著的外科大夫，名字也已经被列入大学教材，不管本人是否愿意，曾经一直是人们瞩目的中心。而如今却突然消失了，躲进实验室，拒绝同人们接触……教授跟人们拉开距离，正表明他已是不同于芸芸众生的人物，已经跨出了普通人的行列，他那些嘲讽的话语更巩固了这种地位。而现在，那些忌妒心盛的‘小人’，利用教授的窘境和沉默，极力想把他拉回到同自己一样的位置。”与众不同的是考德里亚努并不满足于对各种谣言的解释，他决心要寻根问底。当然还有好奇心，但仅仅这一点还不至使他如此急迫：及时的帮助是最难得的，尤其当这种帮助确实需要，而高傲和怪僻使他自己不愿主动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教授的感激绝不可等闲视之：他有一副运用自如的头脑，很有希望成为一个理想的医学院院长。这件事的意义，在学院范围内也将是无法估量的。那些依靠工龄长或者依靠多尔奈什蒂院士的漫不经心的人——院士将离开院长职位已是确定无疑的了——又将恢复本来面目，任何人也无法否认教授的权威，因为不管寄托着全部希望的抗癌药成功与否，对他来说，

都是一样，又重新回到舞台……

考德里亚努教授的理由还不止于此，但目前已经用不着继续设想下去。结论是克里斯蒂安教授的漫不经心，恰好给他提供了充分准备的可能，制定一个战斗计划。考德里亚努想找一个复杂的病例，以便能安排进一次手术讨论，与此同时，再考虑一些有根据的颂词。他深知，在这一方面，人们是格外敏感的，特别是当赞扬的话越出常规，假如说得正中人们的下怀，那么即使言过其实，也会使人们深信不疑，甚或觉得还是太平庸，评价还可以提得更高。

使考德里亚努满意的是，他所得到的甚至超过了一般同事间的交换意见，是一次轻松的、诚恳的谈心，甚至还包括某些真情的吐露。克里斯蒂安并没打算不顾一切地、戏剧般地退出或者远离人群，而是想尽量安排好已经剩得不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几次伤心的经验使他感到，友谊的味道已经变苦。他觉不出有必要作任何解释，任何分辩。道路十分清楚，只有实验室才是他唯一可信赖的地方：那儿四周满是实验动物、显微镜、仪器，这才是他所需要的环境，其余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要工作，只是一心埋头于研究抗癌药和外科治疗，一心想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如此而已。克里斯蒂安证明了这样一点：过去白白度过的年代，只有对那些懒汉和庸人才成其为理由和借口。考德里亚努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但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在赞扬这一方面，他做错了：来得太突然，而且没有做得恰如其分，让

人觉察不出。

“是啊，我的同事。”他对克里斯蒂安教授说，样子显得很激动。“我从来就反对这样，如果不按正常的用词限度来考虑，也可能是一种口味爱好。我讨厌恭维的话，就象贬值的货币一样，分文不值。与其这样言不及义，还不如骂一顿来得更好……如果说名字前面必须加上若干形容词的话……”

克里斯蒂安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有着象运动员一样讨人喜欢的身材，光滑干净的脸，太阳穴上有一条疤痕，动作里略带一点腼腆和迟疑。“他到底是在做戏还是心口不一？抑或是耍什么花招？”对他并不十分了解，而且也没听别人说起过他什么特别的事：有些缺乏真实感情，但这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倒不是因为他这样率直地讲话触怒了自己，而是因为他搅乱了自己的宁静，给这个平和的房间里招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就象是引进了另一个世界里的激烈跳动的脉搏，一种无名的危险的感情。在他面前，有一种被解除武装的感觉，甚至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当然，”考德里亚努说，“只有大人物才自己表示谦虚。我感到高兴的是，您身上的谦虚并不是一种形式，不是高傲的另一种表现。”

“口味爱好，”克里斯蒂安教授不满地下了个结论，接下去好象只是在心里说给自己听，“不知不觉滑到一种可笑的地步，我一直害怕这一点。愚蠢的客套。就好象我们两个都在踩高跷，也许他以为我的高跷腿更高一些。可什么

事情能取决于我们呢？只要脚下一绊，就会摔得头破血流，而那些恭维的话还在我们头顶上悬着。多少事，多少话，多少想法，都变了意思，简直分不出哪些可笑哪些不可笑，也就是说哪些认为是可笑的……简直乱弹琴！难道这些他不知道吗？上了年纪——恭维一番，找点好听的词赞颂一番，这些最讨老头子和傻瓜的喜欢。我们都是大人物，了不起的大人物，见鬼去吧！我只有一点值得夸耀的：一心想把选定的这条路走到底……这一点，我感觉还是能够办得到，至于你想从背后推着我，去干别的，那绝对成功不了……”

克里斯蒂安教授觉得两颊发烧，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竟会这么说：考德里亚努的单纯、天真，还有引起他关注的什么东西，迫使他无法再把眼光继续投向那些试验动物和试管；一方面觉得喜欢他，喜欢他信心十足，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被置于无法拔脚的泥塘，两个人的对话，有的地方觉得可笑，但同时又似乎包含着什么严重情况。考德里亚努仿佛想要重新燃起他对周围人的某种关心和兴趣。“也许他们并不是这样，只不过我对他们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我所以坚持这种看法，不过是为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科研上。只有上帝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是一直顺着科研的路走下去，还是恢复和人们的正常相处，生活在一种舒舒服服的气氛中？也可能我的用词太绝对了，象我这样的年龄，我这样的工作条件，人们不会相信找不到一条中间道路。”

“现在我才弄清楚我要说什么，”考德里亚努企图解释得确切一些，“如果我能有您这样的权威，我会挺身而出，我会为更合理的安排做些什么。我们每个人要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但却不是共同提出的。我们所以没这样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愿望，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是少数。谁知道呢，如果我们协调一下行动，公开地交换一下意见……”考德里亚努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教授的真实情况，而结果却能成功地切中要害，这使他觉得十分满意。

“我没有时间，”克里斯蒂安叹了口气，“即使我有，”他又吃力地补充道，“有些事对我也是不合适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退一步讲，即使我能够承担这项工作，能够满足所有的愿望，那又怎么样呢？能够使得一个集体相安无事，这得付出巨大的精力，也可能是我的全部精力。我不愿通过发号施令来维持这种平静，我不是这样的人……即使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话，这种平静也是虚假的，被迫的，略有点风吹草动，一切建立在违反个人意愿基础上的东西，也会立即垮掉。我们来分析一下情况：可能大家都满意；不论是我判他们对的，还是判他们错的。为了使每个人都得到公正的对待，为了做得合情合理，为了减掉一批人换上另一批人，这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因为，你知道，有时事实对我们并不是总是有利的。而对一个人毅力的考验，也在于看他是不是能够处逆境而自安。总之，我不想把这些都总结成理论，这毫无意义。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严峻的生活时间表：我的所有时间，都是为我自己的。当

然，不是说老是扎在白鼠堆里。但不管是懈怠，无目的的闲逛，喝咖啡还是骂人，都属于我科研的一部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必要的休息，我并不想放弃……还有，你怎么知道我是主持公道最合适的人呢？一个好的科学家——按照你们的说法，好象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一定同时也是一个公正的法官。我对自己的同事根本不了解，我很少和他们接触，我不喜欢成群搭伙。"

"问题并不是这样绝对，"考德里亚努插进来说，"您不会是一个人，再说只有这样您才能把科研更象样子地继续搞下去。作为院长，您会具有一切研究条件。"

"院长？我？这件事取决于谁你不是不知道！"克里斯蒂安惊叹道。"如果允许开这种玩笑的话，你甚至可以提议我当部长，反正都一样。"他本想不再说下去，但考德里亚努那种有把握的样子，那种坚定的目光，迫使他无法结束这场对话。

"重要的是让大家了解您的意图。至于其他几个候选的竞争者，我们来对付。"

"把他们搞臭吗？"

"不，抵消一下他们的影响。"

"最新的说法是这样的吗？但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难道不给您足够的经费是道德的吗？将来基金由您自己来支配，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加快您的科研进度……"

"当然，这倒是很有意思的提醒，"克里斯蒂安教授说

道。"这一点我并没想到。但是我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动用这笔钱呢?"

"如果它用得很得当呢?"考德里亚努带着毋庸置疑的表情笑了笑说,"如果科学研究的开支比起其他开支来更为重要呢?听说现任院长——顶多还有三个月他就要成为一个普通的咨询教授——要取消您的研究基金,如果……"

"郭日—多尔奈什蒂还活着吗?"克里斯蒂安试图说句笑话,"我敢发誓没有……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反对……"

"您瞧,是不是?"

"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计划设想上是不值得的。我按照自己的思路想了多少年,"克里斯蒂安诚恳地说道,"我收集的论据成千上万,但是要想改变自己的决定,也需要同样的数目。这一点,我对自己了解得比谁都清楚。"

"没有任何人急着让您这样做,"考德里亚努说道,"我只是想大家聚会一下,邀一些人到您那儿,或者到我那儿谈一谈。当然,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

"对同事们我不能说有什么反感,但也说不上有什么好感。"克里斯蒂安教授试图开句玩笑。"我感兴趣的只是同事们的论文,而不是他们本人。所以说究竟让谁来,随你的意思好了。我接受这一点无非是要让你相信,我并不是先验地拒绝一切,但象我这样的年纪,要改变想法也是不大容易的……"

考德里亚努教授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他得到的比预想的还要多,他原是作为一个好奇者去克里斯蒂安教

授那儿的，当然这也担着一定的风险，很可能被逐出门外，因为他担任的正是可能给教授带来坏消息的角色。他的成功，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克里斯蒂安很需要一个具有现实头脑的帮手。他同教授结成的共同体，当然不能让教授意识到这一点，将会得到好的，至少是好的结果。而克里斯蒂安却为自己如此匆促就接受了考德里亚努进行商谈的建议感到惊异，因而表现得有些神经质。这使考德里亚努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及时同他告别走开。

克里斯蒂安接到系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去开会。

"你告诉那个让你打电话来搅乱我的人，我根本不想去。"克里斯蒂安说道，"什么为什么？我不去。我的一个副教授代表我。他能够准确地把开会的情况简要地告诉我。命令？我不接受什么命令，明白吗？"他大声嚷嚷着，使劲把听筒往电话机上一摔。

"是谁？"考德里亚努问道。

"一个叫什么谢尔班，还是塞尔布的，没听清楚。现在，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人，谁能记得住。"

"是个重要人物呢，教授先生！"

"有什么著作？"

"您知道，"考德里亚努咕咕哝哝地说道，"不一定必得有什么著作。"

同考德里亚努一样，克里斯蒂安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他不好一下子收回自己的允诺，于是便试图动摇对方的信心：

“很遗憾，现在再让我习惯于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已经为时太晚了。这种规矩，那种条条，我根本学不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这一套，几乎是改变不了的。跟细胞打交道，给这些东西评判是非，不让恶性细胞增生，我的任务是干这个。当然，也不能说两样事情水火不相容，可我没有时间，不喜欢。”

“但是试一试对您又有什么妨害呢？”考德里亚努坚持说，“您尽可以随时放弃，这并不复杂……也可以说对于继续您的著作，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他转弯抹角又触到了敏感神经，但就在这时，又响起了电话铃声：谢尔班让克里斯蒂安教授顶撞了几句，但并不甘心，于是决定再次给他打电话。

“我？哪个我？”克里斯蒂安气呼呼地问。“对不起，我没听见你说自己的名字。谢尔班？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没完没了。先生，照我的经验，一个人如果不善于独立思考，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放到集体里也是一样。再说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不，这就是我的回答。要吓唬人也得学着讲究点方式。能吓唬住我的人，都是我尊敬的，看得起的，不是你这种缺乏教养的人。由傲慢而盛气凌人，是愚蠢的，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愚蠢。你说要把我叫到哪儿去？见你的鬼吧，什么，要告我一状？你有这个权利。别扯我的历史问题，只有我自己才有权说，我最清楚。工作二十个小时，觉也不能睡，你去对我那些可爱的同事们说去吧，随你怎么说：我死了，我要结婚，我进了精神病院，我在

附属医院周围挖防护壕……我听说你们最近在讨论什么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傲慢瞧不起人，随你怎么说。在我的用词术语里，这叫做皮质整形。不，亲爱的，绝对不行。我只能把你们当做患者来接待。什么，你们还要谈我的问题？随你们的便好了。”

出乎考德里亚努意外的是，说到这儿，克里斯蒂安把听筒摔到电话机上，笑了笑，就象是做了什么可乐的事，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解释似的。

“真有意思！好久没人吓唬过我了，简直没办法……”

而考德里亚努却感到完全失望了。“教授先生，”他说道，“这样我们达不到什么目的，相反还会向后倒退。必要的外交，还是少不了的……我们需要有利的舆论，而谢尔班同志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我们的目标……”

没想到克里斯蒂安却满意地笑了起来：“我认为谢尔班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在科学上，多数并没有什么意义。一半再加一，什么也成不了。”

“这我同意，”考德里亚努有些沮丧地说道，“但是他们有个原则是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任何人都不是不可代替的。”

“只有价值是个例外。”克里斯蒂安教授口气里有些抱怨，“因为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所以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早就打算把医院和教研室交给别人去管，我自己脱出身来搞科研。还有一整部的著作需要重写，再加上别的计划也需要完成。”

“当然，这完全是正常的，您建立了一套体制，而且推行了自己那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考德里亚努审慎地插进来说，他已经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但是我完全有理由这样问一句：您的后继人即使说他们现在仍然对您是忠实的，他们能够把您努力做的一切继续下去吗？”

“说老实话，著书立说，留名千古，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只要以后能够正经工作，专心研究，别无事生非地搞什么勾心斗角就好。”

“我是想说，”考德里亚努补充道，“不是所有的继承人都能把事业搞到底的。不言不语一切听你的，可是一旦升到主人的地位，就会翻脸不认人。兴邦立业的一代人过后，往往会出败家子。而遗憾的是，现在并不是由您自己选后继人……”

“哦，”克里斯蒂安脸色舒展了一些，“不要以为我把自己看得多么了不起。不，我再重复一遍，我自己知道该有多大价值，在这方面，我心里是有数的。不能不说大人物终究是少数，不然的话，我自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能肯定我自己不象别人认为的那样……”说到这儿，克里斯蒂安教授突然结束了谈话，把手伸了过去。等考德里亚努教授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已然剩他一个人呆在走廊上，只有旁边的电话机，又不住地响了起来。他本打算再问一问他们约定的事究竟怎么样，不想克里斯蒂安已经向实验室走去，接着便听到一阵扭动钥匙的声响。考德里亚努拿起听筒，接着又放了下来。随后他自己也兴致勃勃地走了。

他没料到，第一次会面竟是这样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克里斯蒂安教授却为推他作院长候选人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思忖起来：尽管这是在他认为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但这个提议却又激起了他的热情，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他并没想到细节，没认真考虑是不是能够实现，是否会引起难堪的后果。一种不能自制的满足感，渐渐把他推向既成事实的面前，他仿佛已经体验到了听到那些不久前还想把他赶出教研室的人们的鼓掌声和阿谀奉承声的满意滋味。等这股热情稍稍冷静了一下之后，他心想，尽管这种荣誉是应得的——考德里亚努的论据仍然是可取的——这种建议无非是从一个并不熟悉的什么人那儿得到的一件早就应该得到的礼物。"多少事我没经历过，难道只差这么一件！如果说只是一个星期的事，那是另外的情形……"

考德里亚努是另外一代人，比他年轻得多。不断听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有好话也有坏话，以致使他觉得没必要再进一步弄清：重要的，只是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名字，到那时为止就这些也觉得够了。通过这次谈话，还不能得出对他有什么看法。年轻的教授们，在他面前总显得有些拘谨，他知道只要有他在场，立即会形成一种礼节性的严肃气氛，不管他如何努力，同人们的接触仍然超越不了纯业务的界限。最后，克里斯蒂安教授只好求助于杜米特列斯库医生，请他率直地谈谈看法。

"这个人很难捉摸，他能把事实和谎话，恭维和咒

骂，友谊和讹诈捏在一起而不露破绽。”

“能不能跟他交朋友呢？”

“这很难讲，要看看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朋友。”

他原想期待一个诚恳的答复，却没得到预想的结果，一气之下，干脆不再询问进一步的细节，甚至怀疑杜米特列斯库和约尔卡，这两个附属医院里他最接近的人，是否也在设法使他在同事当中孤立？但最后，他还是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羞愧，不能这样不公正地错怪他们。

抛开其他一心只搞研究的想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一种自我安抚的唯一出路。象是被什么人所牵动，象是染上了什么瘟疫，他的同事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为了争夺什么而互相扑打。“我能从这场角斗里得到什么呢？我要搞我的研究，我不愿无意义地死去，如此而已！有些人好象看到仪器就害怕，想各种办法抽身，去搞别的什么……”他走过的生活道路是这样的不平静，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意志、愿望一直象拉满了的一张弓。他曾经认为，会有时间完成所有的计划，但经过守候在妻子床头那些折磨人的、无计可施的夜晚之后，忽地又重新清醒过来，重新衡量这段距离，痛苦之余，又遇到了象在青年时代那样的不可忍受的不满足：他有了著作，有了学衔，进了科学院，但这一切他感觉并不说明什么，回首过往的这许多年，整个一生仿佛是被分割成上千上万的混乱不清的琐事——就好象他打算同时缝制有许多开口的一只口袋，里边却什么都装不了——他从未感到走自己道路的喜悦，生活在受着

其他什么的支配，很少完全属于个人，而如今，前面剩下的时间是如此少了！周围环境把他推向前列，一直处在第一线，跌倒又爬起来，经过如此多的颠簸，他感觉自己的内心仿佛变成了一所空无一物的房间，里边震响的却是别人的脚步声、叹息声、吼叫声。他需要时间，需要安静，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现实的满足，他逐步躲进去的实验室，直到这个考德里亚努出现之前，仿佛给了他这一切。

“难道这种安静是虚假的吗？”考德里亚努的建议，无法使他无动于衷，对此的关心，仿佛超过了正常的反应限度。“如果超越一切障碍，我真的能够支配那笔钱吗？这是不是不道德的呢？”他没有任何把握能够达到目标，要担的风险不只是失败，而且有可能白白浪费掉所有的时间。

最近几年，他一直紧张地工作，他并不抱怨，因为已经习惯于同那些数不清的困难打交道。但由于他对自己哪怕是部分的成果也从未通报过什么消息，于是越来越多地听到一些议论：“公众废物。躲在实验室，除了打盹干不了别的事。”他是属于一个年轻教授称之为“假如”派的那一代（假如……我也有可能）。他正是要否定这一点，而且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没注意什么时候，实验室冒出一只装着几条狗的笼子，接着是阿纳尼亚。这些温顺的动物往往更能增加他的工作兴致：一看到它们，立刻就想到不该让它们等待，而难于解释的是，给这些动物注射的恰好是使它们致癌的物质。他仔细看了看这些狗，好象只能认出来两只。

“这些狗是怎么回事?”他问实验员。这时阿纳尼亚正站在屋门旁边，显得比任何时候都不安。

“您刚才说要工作,”阿纳尼亚回答道,“我带来了三只新的狗，这是最后的几只了，动物库里几乎已经空了。”

“是吗?”教授苦笑了一下。他又记起了考德里亚努的话：既然基金的情况他了解得这么清楚，其他方面也不能排除,照样会如此。“这是谁想出来的好主意?如果我需要十条狗呢?”

“噢，您要多少，我都能搞得到。我可以跟别人交换，我给他们白鼠。我们的白鼠繁殖太快，到现在生理系还欠我的账呢。”实验员说道。

“嗯，可主意是谁出的呢?”教授有些发火，又追问了一句。

“院长说养动物太浪费，又是试剂，又是吃的。”

“亏你还记得这位聪明人。我真想好好教训他一顿，这些蠢事简直让人伤透脑筋。明天他会说，要是我想作什么实验，得自己化钱买动物，得自己从家里拿饭盒往这儿带东西喂……”

“我真担心事情会跟您说的差不多，教授先生。”阿纳尼亚不安地说道。“昨天，他到上边去了,到办公室找过您。我没告诉他您在什么地方。他对副教授发火说:‘可惜这些钱和实验动物，只有你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搞出什么具体成果，系主任同志决定基金要重新分配。’”

“弗洛拉怎么说?”教授问道。

“哦，他没说话……”阿纳尼亚有些支支吾吾。

“怎么?”

“教授先生，很遗憾，这会引起背后说别人闲话，我不愿意介入这些事。我可不想让您呵斥他，然后再来找我的麻烦。可他终究是表示同意地笑了笑。当时我真想给他一拳。”

“当然，”教授有些恼怒，“都是我的错。他不过是顺从，所以不明确表示态度，无非想把自己洗刷干净，一旦我的接替人的问题提上日程，好落得没有人同他作对。”

“我给了院长几句，可惜我是个小人物，他说要把我的问题提到大会上……您知道，这种事他们说了是会做到的，特别是抓住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实验员。我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们会在这方面讲原则，讲战斗性。这次会，一定能开得成功。”

实验员停了一下，等待教授的反应。但教授并没说话，只是同情地瞧着他：只剩了这些一无所有的可怜人……他真想这样回答：“是的，这就是我申请配齐设备的结果……”

“‘您为什么不对克里斯蒂安先生去说?’我问他，‘我想也许您连他的门都找不到。’当然，看来不该这样对他说，可现在，偏偏我们就要搞出结果的时候……而且院长知道您自己在这上边花了多少钱吗?!可是，”实验员气呼呼地又回到这件事，“他说我是笨蛋，不知羞耻，因为我背过身子对一只白鼠说了一句：‘朱利，你瞧，那些从来没摸过书本，从来没碰过试管的人，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没提到我的申请吗?”最后教授问道。

“说了，他说，我们就知道提申请、提要求，可从来没拿出过什么……”

“创造发明怎么能按计划呢?我们有什么象样的设备?可还必须得拿出成果……”

“我真想给他好好讲讲道理。我们两个没日没夜地干，可忽然冒出个什么人来教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如果说弗洛拉同志没作声——这是他的事，可我们，具体搞研究的，必须为我们自己的工作辩护……”

听到如此认真地说出“我们”这个词，教授感到好笑，而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象对他负了债似的歉疚：阿纳尼亚为此曾经教训过教授设想的教研室继任负责人，那个一直不愿得罪人的副教授。当然，阿纳尼亚用词的确不恰当，这并不是第一次需要给他纠正不够讲究的表达方式。但有时礼貌、谦恭，也并不能有助于任何事情。“搞成这种可怜的局面，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教授伤心地看着实验室，自问道。“不由你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太天真、太愚蠢，竟盲目地相信你的研究，你的科学，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用在可能得不出任何结果的实验上?这是你第四次打算通过这条道路，一条可能同秘鲁或者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试验平行的路。”他选择了这条最困难的路并不感到懊悔，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它，他不是那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但心里总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滋味，一种介于激动、好奇和失望之间的感情。

在冷冷清清的实验室里，一阵阵无法遏止的疲乏，使他感到象是从自身的骨架里解脱出来，一下子飘到了屋顶。如同启动了机器按钮，一时间一幕幕的场景，即刻映现出来：眼前的什物就象一张张看过多次的照片，不再觉得新鲜，只能引起一种怜悯的感情。他准确地切除过上千的肿瘤，治愈过上千的病人，但不论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弄清细胞恶变的根源。这场同疾病的无情斗争，使他感到迷惑。有三次，出于主观意志无法决定的原因，他曾经不得不把它中断。直到丝苔拉的死，他曾认为已是斗争的终止。失败固然使他难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支长矛对付面前这无数的风车，实在是势单力薄。但有可能是另外的情形吗？

他已经没有工作的兴致，也不想休息。

"你给原来的狗儿支烟，"他说道，"来，我们也吸一支。"

实验员没有动弹，这并不是他想要得到的答复。"既然您这样吩咐……"

"哦，"教授记起了刚才的事，说道，"你放心，即使开一千次会，我也要为你辩护的。你话说得不那么文雅，这我得承认，"他开玩笑似地说，"可这次对他们该当这样。"

"也可能，"阿纳尼亚说道，"话说得好听，可试验动物就都没有了，我了解他们。有时候，不通过搞科学也能达到目的！您没瞧见吗？谁还在熬夜？什么人的几句好话，

就会让你大大受提拔，谁还愿意伤那个脑筋，象牲口那样没日没夜地卖力，把身体都搞垮了呢？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教授先生，我不该介入这些事，但是我想知道，所有这些您都考虑过吗？"

"让我们也学那些人的样子吗？阿纳尼亚？"克里斯蒂安伤感地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老化了，不大容易改变的……"

"让我怎么向他解释呢？"教授心里说。开头，他真想发火骂上几句，后来不知怎的，怒气不知不觉地消了下去，而是觉得需要逃开，需要无声无息地把自己湮没在工作中，不留下任何痕迹。"我还能解释什么呢？从哪儿开头呢？事实上，经过在这儿白白浪费掉的这么多年，我所得到的最大成绩，无非是追上了那些什么也没做的人。假如我们的研究不能继续下去……即使得不出任何结果，当然这并不能肯定，我也没什么可懊悔的。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当然不是我想要做的一切……而现在，当比任何时候更加接近成功的时候……"

"也可能您说的有道理，"实验员承认道，"您别以为我受不了了才对您说这些。我已经习惯了，我只不过想这样问一问，也许是些傻话：您了解别人在干些什么吗？您知道实验室以外发生的事情吗？您瞧，我们这些小人物，有时候能看到不少，也常发一些议论……"

教授原想问问他外边有些什么事，忽然，身子一软，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浑身又浸透了难以忍受的冷汗。

实验员担心地看到这一切，立刻扶他躺了下来。

“不要紧，阿纳尼亚，”教授看着实验员不安的目光说道，“我有点累了，没什么别的。”

“也许吃点药会好一些，”实验员坚持道，“我去把杜米特列斯库大夫或者薇拉小姐找来好吗？”

“找他们干什么？”教授苦笑了一下，“你以为我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睡上一个小时……”

“一定是刚才说的钱的事让您生气了，很抱歉……”

“我睡上一小时，然后，叫上薇拉，我们一块出去走走，吸点新鲜空气。现在，先让我自己呆一会儿……试了这么多次，原以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而现在，离目标这么近的时候偏偏……看来时间已经不再允许我再重新开始了。问题都弄明白了，马上就会感觉累得受不了了。谁知道在这之后接下去还有什么呢？现在，已经离得这么近了。”

“我想我还是留在这儿，”实验员不安地坚持说，“也许您有个什么想法，需要我记一记……我不会吵您的……”

“不，阿纳尼耶①，你给我拿本书来，睡不着我就看会儿书。你走吧，过一小时再来……”

他想转过头看看床头柜上放的是什么书，但就连这点力气也觉得没有了。他闭上了眼睛，只几秒钟功夫，忽然觉得自己好象是到了一片空旷的沙滩上，正静心地赏看激荡

---

① 阿纳尼亚的爱称。

的海浪，一片白茫茫的顶着泡沫的浪峰，呼啸着向岸边涌来。阴沉沉的大海，仿佛故意躲避开阳光的照射，激烈地咆哮着。风沙卷起的旋涡，如同两边吼叫着的海浪一样，不停地在他身边旋转，但却特意给他让出了一条狭长的地段，而后，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一排黑色的巨浪，越聚越高，气势汹汹地直向他奔来。咆哮的大海，奔腾的巨浪，顿时使他头晕目眩。他没打算动弹，而且也根本来不及：巨浪不停地奔涌着，越涌越高，一下子盖过了整个天空。他只好紧闭住眼睛，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被吞没。但奇怪的是过了许久，却迟迟不见动静。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连忙睁开了眼睛：大海依旧是那样阴暗怕人：脚下好象海浪退走了，留下了一具海豚的尸体。他有些惊异，想把死海豚抱起来，不料鱼身子却一下子碎裂了，已经腐烂的尸体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只有两只眼睛，看来还是活的，在默默无声地向他求救。使他吃惊的是这双眼睛好象在哪儿见过，简直跟他自己的眼睛一模一样。他想逃走，但脚下的沙子却偏偏跟他作对，又松又黏，根本迈不开步。他已经顾不了这些，恐惧感迫使他不得不作最后的挣扎。他肌肉一阵阵地抽搐着，随后，好象被什么掐住了脖子，再也喘不过气来。

他使尽全力，企图从地面上拔起脚，尽快从这儿逃走，但结果完全是徒劳。海豚那双圆圆的活的眼睛，可怜地乞求着，仿佛越来越近。他无法把目光从这只黑色的滚满泥沙的动物身上挪开，也无法理解那双一直紧盯着他的充满

悲哀和乞求的眼睛，怎么竟会是活的。随后是一段很长的灰蒙蒙的可怕的间歇，他感到十分需要看到天空，而在他头顶重又出现的却仍是那熏得发黑的天花板，四周朝着各个方向布满了铁丝网的圆孔。等他认得真切之后，才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恐惧感却还没有完全消失：肌肉依然象剧烈活动以后那样的抽搐，一股股冷汗流进眼睛里，觉得那样难受，甚至感到周身发冷。他不安地看了看周围，阿纳尼亚到隔壁房间去了，狗在睡觉，实验室的灯光暗了下来，四周的墙壁仿佛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蓝色，就象他梦境里看到的大海的颜色那样。他好象是通过海豚的眼睛看到这一切的。“还可能是另外的情形吗？”想到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全身感到一阵麻木。过去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已经无法修复。尽管通过和解、退让，使他没离开实验室。但现在再来考虑答案岂不可笑。只是为了搞研究的兴趣才这样做的吗？现在他已无法摆脱开这场荒诞的游戏，照理应该找一找答案。但忽然他记起一个月前向学院院长郭日一多尔奈什蒂院士提出费用申请的事，他曾事先向院长打了个电话。

“你也提申请？”院长惊讶地问道，“老是申请，申请，我都听够了。”

“怎么，我也不行吗？我的名字，起码还能作担保吧。”

“也可能，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成果。”

“我们指的是谁？”

"你钱挣得不算少，咱们还是玩场牌吧。现在不是提这种申请的时候，不应该让别人为难。"

"永远也不会是时候！"克里斯蒂安大声嚷嚷着，准备挂上电话机，但这时他又听到了对方的劝告：

"最好你还是考虑考虑我们怎样才能降低费用开支，怎样不用投资就能得到成果，怎样不用药物，在工作现场就能治好患者的病，或者发明一种能长期使用的杀菌纱布，总之，想办法补回药物花掉的钱。为什么偏偏对癌症这么感兴趣呢？"

他不明白多尔奈什蒂是怎么搞的，平生第一次说话带点风趣。是老了，听觉不灵了，还是跟以前不一样，变得高傲了？或者，简单说，什么也不在乎了呢？但不管怎样，他感到有些憋气，于是决定向多尔奈什蒂写一个继续科研所需费用的书面申请。这是为了避免弄成玩笑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事实上，院长高兴的时候曾经对教研室的其他人说过："要知道，从如何做生意，也能学到些东西。每天都有人向我要这要那，要经费，如果你不想给，就不要批准这种申请，最后，人们会自己想出办法。瞧，到时候我们不也照样能向上级报告成绩吗？"

如今他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多尔奈什蒂离开院长职位，他的申请被拒绝和考德里亚努的建议之间，好象存在着什么联系。"又是一团扯不清的乱麻，跟以前一样，让我费脑筋。无非是浪费时间，可我偏偏没有这么多……"

他从床边站起身，停了一会儿才觉出浑身疲乏极了。

他喊了一声阿纳尼亚，其实也没什么要对他说的，只是想给他要点葡萄酒。看到实验员进来了，他倒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忘了要跟你说什么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下。

“娱姆来找过您，”阿纳尼亚说道，“说是绍依曼斯库太太来了，又把她给赶出来了。”

“就是说，我该回家一趟，可我真不想回去。我岳母，这个可怜的老太太，简直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

“您指的是什么？”实验员问道。

而教授想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研究，建议。他激动地摆了摆手：

“啊，一般地说……”

“一般说，都没什么用。”阿纳尼亚开玩笑说。

教授似乎从黑黑的角落里又看到了那双乞求的眼睛，被海浪抛上岸的海豚躺在荒凉的沙滩上，一阵阵急速的旋风不停地在上空呼啸。

二

本年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众所周知，第一附属外科医院是一所有多年历史的、规模很大而且十分重要的医院，它担负着早已确定了的为

城乡劳动人民服务的任务，因为劳动人民还在受着疾病、工伤事故、癌症等的威胁。它本应当成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以至更多的医院的榜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遗憾的是错误地让克里斯蒂安·依昂教授做了医院的领导。此人是已故教授波普极力推荐的。老教授临终前，可能由于年事过高，已经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了解他所推荐的这位暴君式的人物比旧制度下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坏。今天，他来听值班报告的时候，无精打采地哭丧着脸，就象家里的牛都死光了一样。他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几乎立刻就象只南瓜似的睡着了，以致别人都以为他已经断了气。我们实在太没运气，简直无法摆脱开这个人。要说让他改一改吧，象约内斯库护士说的，可惜年纪太大了。有一次，因为走廊没擦干净，一个女病人摔了一交，约内斯库护士笑了一下，教授竟骂她是蠢货。尼古拉医生同志也是这种看法。这位医生也当众挨过教授的骂，说他没有管教好那些流里流气、思想和业务都缺乏教养的学生。其实，对待这些学生，难道还能象黑暗的旧社会一些无知的家长，整天把他们拴在床腿上那样管教吗？

然后，他睡了一觉。这段时间，足能骑自行车到弗洛列什蒂打个来回。醒了一下以后，他装作病人的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又睡着了，故意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他得了心肌梗死或者别的什么病，以致杜米特列斯库医生急得要连忙给他脱掉裤子。约尔卡医生还有另外几个跟他比较接近的同志，也想张罗着帮忙。事实上这几个人是克里斯蒂安

同志安排在他周围的帮手。当时我绝不相信他会就这么容易地死去。我搜集了一下其他医务人员的反应。照杜米特列斯库医生同志的说法，他是什么黄金一代人里最后一个了不起的教授，而萨乌医生则认为，郭日一多尔奈什蒂同志也属于这一代人。但杜米特列斯库不相信这一点，他硬说院长只不过挂着那么个职务的牌子罢了，事实上只在某个不发达国家里，人们才知道这个名字，而且在那里有十来个同样的医生跟他齐名。杜米特列斯库同志瞧不起我们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有人教会了他这样做。教授在变得沉默不语之前，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取笑：给尼古拉同志起了个象猴子一样的名字，叫贝贝，管弗洛拉同志叫小猪崽，因为给小猪做心脏手术试验的时候，弗洛拉连猪心带小猪全给吃了。拉尔卡医生同志想出来管一管这件事，给教授提出来，但被班奈德斯卡同志制止了，她说教授一天到晚发疯一样地工作，她知道教授在哪儿，教授年纪大了，最好还是别去打扰他。还必须提到的是，有一次多尔奈什蒂同志也谈到过克里斯蒂安同志，说他是疯子。我完全相信这一权威性的评论。但是，我从第二外科医院考德里亚努教授的实验员那儿得知，克里斯蒂安教授已被列入院长候选人的三人名单，这件事对大家还都是保密的。如果他自己知道了这件事，会立刻高兴得睡不着觉，再不会那样懒洋洋的了，尽管他白天黑夜一直呆在实验室里，但我可以断定，他并不是在那儿工作。因为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实验员把一公斤红葡萄酒给他带进实验室。无论如何，如果让这

种人当上我们医学院的最高领导，对大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此人专横跋扈，道德败坏，玩弄女性，而且，众所周知，历史不清不白。他出身于富农家庭，岳父曾当过民族农民党的议员，而且他的儿子还同一个离了婚的女助教乱搞两性关系。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开刀技术还不错，而这在我们医院并不稀奇，差不多所有的外科大夫都能做到。希望公众舆论通过信件、声明，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

然后，他睡醒了一觉，就到实验室去了。据说通过实验研究，他即将发现一种新的抗癌药。但我认为，除了班奈德斯卡之外，他什么也发现不了。要不然，为什么阿纳尼亚给他送酒呢？另外我还发现，他养了一些会吸烟的狗。他还教会一只母狗喝咖啡、喝烧酒，让它醉得象头猪。这些，人们都不了解。他欺骗群众，装成一个大发明家，而实际上却出于上述原因，整天躲着不敢见人。要说搞什么发明创造，如果是别人，到现在为止，至少也应该早就有点结果了。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业务水平高的、有觉悟的人，那么过去的历史绝不会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儿子都教育不好的人，怎么能教育整个学院呢？一个据说亲手害死了自己妻子的人，怎么能被任命为领导呢？一个那儿的工作人员可以胡说乱道的医院，能给我们做出什么榜样呢？譬如，约尔卡医生同志，不好好照看自己的病人，却在走廊上讲什么食人兽的故事。试问，我们跟这些野兽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是我们当前最关心的吗？

然后，教授同志一直没再出实验室，也没听见里边有

什么动静。人们应该设法弄清楚他在干什么，他究竟是什么人。如果让他当医学院的院长，那么全体医护人员，将会遭大殃。出于觉悟，我将继续自愿地尽我的义务，我将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他的一切活动。

三

绍依曼斯库太太每次的突然到来，立即会打乱克里斯蒂安教授家里的秩序，打乱那种单调的生活方式，立即会给空荡、冷清、散发着霉味的房间带来生气。每次她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辞退娱姆。这位老娱姆行动迟缓，不爱讲话，穿一身黑衣服，整天在一些陈旧的家具中间转来转去：几把笨重的扶手椅，床头粗糙的装饰，使人想起亨利二世时代的风格——奇形怪状的黑狮子，大树叶，假面具。床是从药剂师布洛什坦那儿化了同卖的时候一样很少的几个钱赎回来的。这是娱姆听说药剂师已经办好手续等着出国的时候把床弄回来的。

"只有我的奥雷尔，没办法，我连他的尸骨都没处去找。"绍依曼斯库太太哽噎着说。接着，自然是检查厨房，她对这儿从来没有满意过：

"太不象样了，亲爱的，"她对教授说，"简直象个马圈。真不知道你们怎么还能受得了！要想知道谁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只要打开一下他的冰箱就够了：肥肉、猪油、肥香肠，是你这个年龄吃的吗？你需要的是蔬菜、水果，

特别是苹果，含钾盐的食品。胡萝卜和柠檬在哪儿呢？”

其实厨房里究竟有什么，缺什么，克里斯蒂安根本不知道，他多半是在医院里吃饭。要不是为了看看安德烈，要不是觉得对孩子有应尽的义务，他甚至几个星期都不会回家。自从妻子去世以后，家里的器物仿佛也都变得那样冷漠。触景生情，凄凉和孤独感油然而生，以致觉得坐立不安，时刻被一种无止境的期待所折磨。因此，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各种专业杂志，约稿信函，参加各种会议或展览的请帖，病人的感谢信等等之外，放着一大堆刚刚开头便停了笔的答复信。克里斯蒂安觉得，无论如何努力也耐不下性子，也无法把词句集中起来串成想要表达的意思。一种无比的倦怠，攫住了他的心灵和思想，而越是把事情推迟，越是期待着静心时刻的到来，就越是积累起更多的类似的债务，由此更引起老太太一连串的唠叨：

“这样可不成，让尼①，这是个责任心的问题，人们都在等着答复。一天的工作就应该从这儿开始。我给你挑了一些需要答复的急件。至于病人那儿，我就可以回复他们。怎么，亲爱的，你想把所有的主顾都丢掉吗？要是我有副好眼镜的话……”

其实教授最怕提起眼镜这个词。绍依曼斯库太太最喜欢让教授陪她去看大夫，配眼镜。不管见到挂号员，办公室秘书，门房还是助理医生，她都要得意地从眼镜框外面

---

① 克里斯蒂安教授的昵称。

瞟他们一眼，说一句："我是克里斯蒂安院士的岳母，"然后，神气十足地挺着胸脯走过去。接着便是那一套作过多次的解释："应该告诉他们，亲爱的，你是什么人，要不然，谁也不会拿你当回事的。而你呢？却象根木头似的一声不吭。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只有这么个头衔，这可不是能用钱买得到的。既然有，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自然，每次结果总是对镜片不满意，对大夫不满意，说他们都是些外行，于是又回头来还用她的旧眼镜。事实上她这副旧眼镜什么毛病也没有，跑几趟医院，对克里斯蒂安教授来说，无非是白白浪费掉几天的时间。只打个电话跟大夫联系一下，老太太不答应，非得让教授陪她去不可。奇怪的是教授却听她的，在她面前，教授显得那样温顺听话，处处小心翼翼，从来不用他用惯了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词。"就象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对安德烈解释说，"什么事不依她，她都不答应，但实际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

教授知道，老太太一个人闷得呆不下去，因此，故意把中厅里的东西弄得叮当作响——她抱怨教授和安德烈都有事，没工夫陪她——看来她从屋里出去以后，还没找到再进来的借口。事实上，克里斯蒂安情绪还没转过来。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平平静静，而如今一天工夫却压下来这么多的新闻。还有老太太也不象从前，她显得那么急躁，惴惴不安，而且老是不断地往大街上瞧。

教授的住房相当僻静，深深的院落，周围是一道高高

的铁栅栏围墙，给人一种陈旧冷落的感觉。四周的邻居，教授都不认识，这也难怪，因为老是接连不断地换人。右边，从前的什泰尔卡别墅，很长一段时间住过一些官方人士，直到现在，仍然经常有些不知道什么人的宽敞的伏尔加牌小轿车停在门口。左边的巴尔克别墅，自从重新粉刷过以后，晚上却看不见往常那样的灯光了。好象搬来的是什么机关的办公室，忘记或者还没来得及挂出牌子。尽管教授告诉过老太太，叫她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没什么值得好奇的，可她却忍不住坐在窗口老用望远镜看个不停，总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她跟原来的房主人都熟识，现在，教授去医院的时候，她还是老想找什么人聊聊天。

要不是因为安德烈，克里斯蒂安早就拿起大衣走了。安德烈很喜欢老太太，为了他，教授才没打算立刻回医院。他没告诉儿子什么，而且他们甚至还没一块儿正正经经地谈过话，就连一般问候的话也没说过。他们两个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里，等着喝完煮好的咖啡，就仿佛准备好这样过一整夜似的。是的，不然的话会显得突如其来，太不讲礼貌。

绍依曼斯库太太突然闯了进来，和往常不同的是她使劲把门一撞，就象背后什么人推了一下似的：

“真不得了，”她几乎有些战战兢兢，“从清早就有个人一直盯着我们这所房子，准是有人监视你，要不就是想从你这儿弄到什么。他一会儿站住，顺着窗户往里边瞅瞅，一会儿往前走两步，一会儿又退回去。我出去问他有什么

事，他什么也没说，直瞪瞪地瞧了我老半天，然后走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不会记错的。我看得报告警察，我真怕。”

“那有什么用？”安德烈对父亲的沉默和心不在焉的目光感到不满意。“也可能他在等什么人，大街上的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谁管得了！”

“我认得出这个人，”老太太坚持说，“不会弄错的，这种事我经过的不少了。”

“凡是你认得的，都是有身份的。”安德烈开玩笑说，“没关系，没什么危险。”

“谁跟你一般见识，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她不服输地驳了一句。“你闯了什么祸吗，让尼？”

“我爸爸吗？象他这样年纪？他连话都一句不说。就连多少年以后公布的法律他都能遵守！”安德烈本想这样说，但见到老太太那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不安的样子，再加上父亲沉默不语，于是想安慰一下她：

“算了吧，你干吗老往坏处想呢！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用不着大惊小怪……你忘了，爸爸已经是医学界的名流，既是名人，当然会有崇拜者。”

“开头我也这么想……没当做一回事，可后来……”

“也许是个要求住院的病人，谁不想让教授给看呢！要不就是修理煤气、水电、电话、电视、收音机的，或者是送请帖、找开会，什么人不可能？”

“要是你这么有胆量，”老太太精神略微放松了一下说

道，“你去问问他，别让我这么担心。”

“我怎么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把大街上随便什么人给拦住呢？”

老太太双手颤抖着，一直想找个什么东西扶一扶，两只眼睛也顿时变得通红。

“有人高兴在我大门口消磨时间，随他去好了。”最后，克里斯蒂安说道，“我都觉得无所谓，你干吗还为这瞎担心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教授拿起一本杂志，随手翻开，象是要读的样子，而暗地里，却透过眼镜框的缝隙，偷偷打量着她：老太太个子高高的，腰板挺直，穿一条黑色的长连衣裙，领口镶着一道白色的花边。脸上依然比较平整光滑。灰白色的头发，密密实实，微微透一点蓝色，显得十分别致。“现在轮到我要经常同她打交道了。”他心里暗想。“精力这样充足，当初我岳父不知为她伤过多少脑筋。是个能干的女人，想要什么，就一定非得到什么不可。遗憾的是她想要的是这么多……”

他对家务事的冷漠，家庭里那种不自然的人为的沉默气氛，使得老太太以为，没有了丝苔拉，她简直没法跟他们相处下去。“他把钱都化到哪儿去了呢？”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老太太曾把屋子翻了个遍，心里很纳闷。“买穿的了吗？只有三套衣服，还是十年前做的。别的，除了书就是实验室用的东西，好象准备着将来有什么人要为他树碑立传似的。其实呢？等他退休以后，也许新来的教授连让尼自己化钱买的仪器都不许他用呢！”她深信破败已是不可

避免的了，只是她不愿活到看见最后结局的那一天。多少次，她都想劝他明白过来，有时甚至跟他吵："你简直落得象叫化子。这所房子需要新家具，别的就更不用提了。两只盐壶，两块地毯，不是那些破麻袋片。还要一套银餐具，你现在是科学院院士，不是卖扫把的小贩。还需要一些新窗帘，好让光线透进来，而不是那些从太平间弄来的盖尸布。然后，还有水晶玻璃杯，瞧你现在的杯子，倒上清水都象是掺了浆糊。还要一个手提收音机，能拿到厨房去的。还有，要个厨娘，年轻漂亮点的，别是那种看见她就让人嚥不下饭的。"听到这么长长的一串单子，克里斯蒂安取笑说：

"算了吧，我的岳母大人，我们要的是让精神富裕起来。对于财产，你知道今天人们是怎么说的吗？"

"不是件好事，"老太太说道，"可有它总比没有强，总不会有什么坏处。"

绍依曼斯库太太见他们对自己的警告并不在意，感到不满，悻悻地向中厅走去，连门都没关：

"哼，亏你说得出这些话！瞧瞧，自信、漫不经心把你搞到了什么地步！……这个人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的，瞧，他又在那儿了！"她一边嚷一边慌慌张张地逃，都没敢再往街上看一眼。

见她吓成这个样子，安德烈想站起身，然而却被他父亲的手势制止住了：

"这儿，谁都知道我们，可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没有

那个必要……她是又在这儿呆腻了，可能想找个理由离开。”接着他小声说道："你不陪我到医院吗？”

“当然去，”安德烈不假思索地说，“但要先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啊，当然要弄清楚之后。谁知道我们这位老外婆今天是怎么了？”

“好久以来我没感到这么好奇过了。”

“变异心理。”教授随口说道。

对父亲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安德烈十分羡慕，心里暗想："好象什么事也惊动不了他，甚至连恼人的消息，他听起来也象是已经知道，已经过去了的一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要干什么，什么时候痛苦，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抱怨。老是看着你不说话，好象除了他自己的秘密，除了他自己抓住的那只稀奇鸟，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冷冰冰，不可捉摸。”

趁着这片刻的静默，安德烈又仔细打量起他来，结果发现，父亲心里好象有一种急迫感：在冷静、泰然的表面下，还隐藏着一丝无能为力和筋疲力竭：外祖母这样不同往常的走出去，本应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好象依旧在考虑着别的什么。沉默的时间越长，教授越发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仿佛越过他们，透过一层薄雾，在失神地望着空旷的远处；坐在那只笨重的扶手椅里，全身软瘫了一般。

绍依曼斯库太太又轻轻踮着脚，犹犹豫豫地走近窗口，从而使克里斯蒂安又有可能继续自己的解释："直到现

在，还是这样心有余悸，快八十岁的人了，过去担惊受怕的事不那么容易忘掉……人老了……新陈代谢也慢了，时间越来越短促了。对她来说，过去的一切好象就发生在昨天……”克里斯蒂安的自言自语，听起来说的仿佛恰恰是他自己。但他不愿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细节，于是竭力作出一种冷静自然的样子。“而且那些烦恼、失败、痛苦，却偏偏更容易保留在记忆里。前不久，我有过一个受了外伤的急腹症病人……他以为自己是在前线，唯一能记起的只有这些……我有些激动，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曾眼看着许多人在我面前倒下去。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那痛苦抽搐的面孔，几秒钟内生与死的激烈拚搏，凄惨的喊叫，睁大的眼睛还在绝望地向往着曾经有过的生活……短促的瞬间里，就忽地跳向另一个时空，去寻求另一个世界，这绝不是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房门吱地一响，接着是一阵沉重的陌生的脚步声，这一切顿时打断了他的独白。使安德烈感到不满的是，这些话不仅仅是填补了这一段等待时间的空白，而似乎还预示着他父亲将要为自己的冷漠和沉默继续解释下去。

跟在绍依曼斯库太太后边进来的是一个瘦高个的男人。他大约有教授那样的年龄，穿着相当简朴；宽宽的前额，显得那样突出，而那张干瘪的脸，象一块鞣过的皮革。

“找你的，让尼。”老太太悄悄说了一句，接着便退到了墙边。

“什么事，同志？”教授没理会来人的致意和勉强做出的笑容，先问了一句。及至稍稍定了定神，迟疑了一下之后，克里斯蒂安的脸色忽然刷的一下变得铁青。浓重的眉毛往下一撇，几乎整个盖住了眼睛；他竭尽全力才勉强控制住惊讶和愤怒的表情：事情简直使他不敢相信。“真是冤家路窄，”他心想，“刚刚我还提到了过去，不成想竟是这个家伙！”尽管心里这样想，但在这些无情词句的背后，却又升起了一股伤感，一种暗藏着的悔恨。这个属于那缓慢地滑到阴影世界里的人，有多少次曾经想到过他。如今，当不得不回忆起自己研究的中断、间歇时，这个一直想从记忆中把他除掉的阴影，却突然出现在面前。

“我没问他有什么事。”老太太对于克里斯蒂安的表情感到迷惑不解，这样说了一句。教授没站起身，也没笑一笑，两只直瞪瞪的眼睛仿佛把来人定在了门口。

“一两句话，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来人吃力地开头道。教授的冷漠，安德烈的好奇使他感到难为情。而安德烈见外婆如此惴惴不安，真想直接问问这个人是谁，来干什么，但父亲和来的人之间那种不寻常的紧张气氛，又促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么多年为了想出这一两句话，你的时间总该是足够用的了。”克里斯蒂安毫不含糊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与此同时，绍依曼斯库太太却忽地惊叫起来：

“雷德曼先生？我的上帝，我怎么竟没认出来！”

教授做了个命令式的手势，止住了她接下去的话。

“岳母，请你靠着安德烈坐下。”

来人靠近开着的屋门站着，显得踌躇不安，不停地摆弄着手里那顶黑色的旧帽子，象是忍受不了这种冷漠和轻视的眼光。只不过安德烈却从他的脸上看出与他双手的动作极不协调的夹杂着神秘和轻蔑的笑容。

“我想，我的胆量一定会使你感到吃惊，”雷德曼犹犹豫豫地说道，“现在你是大人物了，了不起的名人。好多次我想到你的办公室找你……那时候我还没生病……有一次我上去了，可一位女秘书告诉我，你不接待。现在，没别的办法，我只好提心吊胆……我想……”

“我从来没拒绝过请求帮助的人。”教授冷冷地说道，他极力压抑着不动感情。无论如何，他也不愿当着儿子的面这样做，而事实上他是多么希望儿子在场。“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敌人，不管是谁，我从来没有两样对待，这你是很清楚的。你是想让我帮你住院吗？”

“是这样，”雷德曼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道。“我打听过，只有你……只有你答应……想到这一点，想到我这么重的病，我这才鼓起勇气。有时候走投无路，会使你不顾一切……我知道你恨我，尽管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但现在不是你惩罚我的时候。”他的话出乎意料地爆发出来。“我自己为这件事不知忏悔过多少次。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讨你喜欢，也不是为了在你儿子面前把你抬高。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已经赎回了自己的罪过，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按说不需要再加上这样的屈辱了，如果不

是因为这个病……你是上去了，我却走了下坡路……现在你应该心满意足了……可至少你自己也该承认，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克里斯蒂安避开了他的目光，觉得几乎能够完全宽恕他了：要不是儿子和岳母在场，教授出于激动，真想友好地把手伸给他，庆贺痛苦和不幸终于在他们之间画上了等号。但教授却立即清醒了过来。

“对于病人，我从来不计较什么个人恩怨，不会的。其实，我的医院里不论哪个大夫都会给你看病的。”说着，克里斯蒂安拿出钢笔和一张纸片。“你拿这张条子去找值班大夫，他当然就会收你住院。请告诉我，你的职业，年龄。”教授不假思索地问了一句。安德烈对父亲的无礼态度感到不满，他会意地朝雷德曼笑了笑，后者似乎由此而得到了勇气，就象回答一个陌生人那样，同样冷冷地答道：

“运输公司职员……五十八岁……诊断是……”

“诊断，有关的大夫会给你下，我不想干预。”克里斯蒂安打断他说。

教授写纸条的工夫，房间里笼罩着难以忍受的沉寂。

“我的上帝，已经老了这么多，”教授手里摩弄着钢笔，心里吃惊地想。“看起来只剩下一副骨架，已经是奄奄一息，哪还有原先的一点影子……就是说，我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想，就剩下他孑然一身，无人理睬，孤苦伶仃，生活潦倒。当你无依无靠精神无所寄托的时候，必是难于忍受的。当初他可不是庸碌之辈……但聪明人却并不

都勇敢，并不一定都有笔直的脊椎骨。”

他感觉事情终于理出了头绪，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而当他定了定神，停了片刻之后，又立即意识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这样做，对面前这个人是无法原谅的。

安德烈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极力想从他们的对话中悟出点意思，但结果完全是徒劳。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给安德烈这样的印象，似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石头在打架：都已经精疲力尽，满身血污，但仍然互不相让，继续厮打。然而，当他见父亲懒洋洋地拿出纸和笔，心不在焉地擦了擦眼镜，为了写出那三行字，竟耗去这么长时间时，忍不住想拿起什么打破这令人压抑的沉默，驱走这笔尖的摩擦和雷德曼的短促呼吸混合成的烦人的声响。外祖母的举止，更增加了他的迷惑不解：她脸冲着墙壁，低声地抽泣着，远远地躲在一边。两个人的对话，对她来说几乎毫无意义。只有偶尔揩拭眼睛的时候，安德烈才听见她低声的咕哝着什么，象是对只有她才看得见，藏在灰色墙壁里的人说话似的。

“只有上帝才晓得是怎么回事！”安德烈看着雷德曼暗暗想道。“据我所知，父亲对于过错，对于出尔反尔的动摇行为，是从不宽恕的。在这方面，他是无情的。但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照直讲出来，而要这样做戏呢？这个可怜的人是有事相求才来的，他已经蒙受了屈辱，已经够难过的了。”外祖母失望的脸色，父亲极力掩饰的不平静，雷德曼不知所措的窘态以及屋子里几乎要爆炸的等待气氛，所有

这一切，使安德烈感到自己是完全多余的。他后悔自己在这个陌生人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没趁机走掉。他完全有理由把父亲的表现称做粗暴无礼。但他记起，最近以来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古怪，越来越缺乏感情。他弄不懂这究竟是一种病态，一种预示生命结束的先兆，还是遭受了失败，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情况而不能自拔？他不愿继续推测下去，他觉得有些害怕。前面是一片容易滑倒的陌生地段，因此从他们仅有的话语里，从无言的沉默中能够领略到的一切，已经使他满足。

“看起来雷德曼先生象个泅水的逃犯，甘愿受屈辱。”安德烈心里想。“也许他一生都是在努力使别人高兴……但他们毕竟是老相识，都是你我相称。是不是跟父亲的案件有关？可怜的外婆……就是说这样的人大概都是这样。”他继续盯着这个陌生人的脸，极力掩饰住自己的好奇心。“无论如何，这不可能是个凶神恶煞，没有一点硬汉子气。怯懦——是的，是个怯懦但并不阴险的人。眼睛，脸面，两手的动作，表现出的只是卑微。只有怯懦的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

“谢谢你了，”雷德曼匆匆地把安德烈递过来的介绍住院的纸条塞进口袋里。“我这样跟你讲话，站在这儿，真是不好受，我感觉就象在听宣判一样……当然，不难想象，如果你不是用这种眼光看我的话……我还想跟你说点别的什么……”

“那时候我跟你讲话，不也是站着的吗？”教授反驳

道。“可慢慢我也习惯了。当然，有时候坚持不住，站不直，但这是那时候的规矩。住院单你已经有了——你可以走了。”教授一边说着，一边心里想：“当初你是那样自信，那样自得……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如此忍气吞声，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事情。一想到我们，想到我们的过去，甚至觉得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还不至于有现在的毅力……”教授伤感地迟疑了一下，然后恢复了正常的语调：“在我的医院，人们会好好给你治病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如果确有必要，我会亲自给你做手术。总之，为了排除一切疑点，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自己的名声，还是很看重的：我所关心的只是你的病。至于我个人的感情，这倒无关紧要。如果你不健忘，这样的话我早就对你说过……”这样说着，但看来克里斯蒂安更多地是说服自己，力图保持住和雷德曼之间的距离。而雷德曼尽管听到的是辛辣无情的词句，却以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如果说起初见到雷德曼的时候教授想扑过去，尽情发泄出自己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憎恶，那么慢慢地，随着对往事的回忆，又觉得雷德曼不再是欺骗和邪恶的象征，而只不过是自己已经越过的一个障碍。他感到象少年时代打过架以后的心情：把对手打倒在地之后，反倒立即对他产生了怜悯，极力想更加对他亲近，因为由此表现出了你引以为骄傲的力量。

“经过了这么多，疾病，年龄，还有这么多年来我遭受的你难于理解的痛苦，”雷德曼怯生生地、动情地说道，

“现在，你应当更通情达理，更明智……当然，请求别人宽恕，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但我却要这样做。我不想再回溯我们的友谊……也不想对你做什么解释。事实上，我也遭受了屈辱，蒙受了冤屈，当时我也是战战兢兢的。我还有一大家人，生病的妈妈被抛弃，只知道喝酒的爸爸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卖了：妈妈的裙子，家具，甚至房子。几个弟弟，这你知道，都在上学。当初一切都靠我来负担。如果没有我的话……而且，当时不管有没有我，你都会被弄到那儿。不是只有你，别人也受了苦，也遭到了不幸，其他人也希望得到谅解。”

雷德曼往前走了两步，把手伸向教授——这是一个艰难的无可奈何的动作；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刚刚能够抬起胳膊——而教授先是感到困惑，接着又是怜悯，他觉得自己也需要把手伸过去，但胳膊竟是那样的沉重、麻木，甚至无法从桌上抬起来。他把目光转向窗口，就象是外边的什么响声，一下子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

“我谅解不谅解，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呢？”教授说道。“我已经跟你说过：过去的事，我不再去考虑。你，瓦尔拉姆，还有其他人，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过付出了代价，而不是因为我。我那时是无辜的，这你很清楚……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眼下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人，不是克里斯蒂安院士，不是杂志上评论的欧洲第一流外科医生，你会到我这儿来请求原谅吗？你向别的受害人请求过原谅吗？譬如说向赫里亚努教授……我所以能

够使得你这样做，是因为我更强有力，更具有天赋的——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条件。但是别人呢？最后，当你的椅子上已经一个人也不剩的时候，你才变得明智起来。假如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的过失我可以原谅，但法律，同你那时候自称所代表的相比，终究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到底，我的原谅现在究竟对你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是那时候，在牢房里，你套我的口供，逼我承认——据说是为了我好——那些荒诞无稽的事的时候，如果在我出狱以后，由于受良心谴责而来找我的时候，如果你当时曾经帮助了我的妻子，你请求我原谅，那又另当别论……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我想知道，那时候，你是不是肯定我是无辜的呢？”教授说完，又立即后悔不该这样问。当然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他觉得雷德曼在决定到他这儿来之前，自然应该想到过这些。而这些话一经脱口说出，教授又觉得应该听听对方的回答，尽管这并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而他对待对方态度中所表现出的过错，可以由在场的人共同承担：他们本来不应该知道比现在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东西。雷德曼看到出现了把谈话继续下去的可能，想要坐下来，但教授严厉的命令式的目光，又迫使他没敢挪动脚步。

“是啊，”雷德曼长出了一口气说道，“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可选择的余地。所有的材料都对你不利，因此我十分担心。我都是照瓦尔拉姆的要求做的，当时我相信，你摆脱开的希望比我更大……最后也确实是这个结果。那时候你是无辜的，不管怎样你还有可能向别人证明这一点，而

我呢？如果不听瓦尔拉姆的……另外，当时我知道，我就要被提升，而正是从我的晋升当中，我看到了你获释的可能。因为只有我的职位升高，才能帮上你的忙。不然，我们只好同时毁掉，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试图搭救我们。当然，事实是另外的情况，后来又插进来一些只同我们两个有关的细节……”

“再提起这些事，已经毫无意义。”教授断然说道。

“对，有道理。”说着雷德曼把手缩了回去。“我简直执拗得象个傻瓜，我早知道你不会谅解我的。你的高傲，从来没被触犯过。你可以失掉一切，但绝不会承认你自己也有可能做错。我们演的是一出悲剧，但我还是心安理得，因为我终于到你这儿来了……现在，就在我可能要死的时候……到你这儿来的这段路，是我一生当中走过的最困难的一段路……”

“我做过一万例以上的手术……即使那些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过这样那样麻烦的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来找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克里斯蒂安教授把握十足地说道。

“可是，”雷德曼确实惊恐地接过去说道，“我得的是癌症！没法让我不去想……”

“要知道，过去，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得上了癌症……现在不过是到了发展期。我了解这种病。”随着他的肯定口吻，脸上挂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只需要对病人看一眼我就能断定……瓦尔拉姆还活着吗？”克里斯蒂安见他没有

走的意思，于是转换话题，这样问了一句：教授怕在安德烈面前再提到丝砦拉。

“啊呵，”雷德曼见又有可能把谈话继续下去，笑了一声接着说道，“他在卖彩票呢，现在的蛮横劲头比你知道的还厉害。最后一次，又闹得不可开交，我亲眼看见的。他的摊子就靠着迈古尔商店……我常到那儿喝杯啤酒，就在上边阳台上。有时候没事可做，连报纸也找不到，就坐在那儿看他卖彩票。那一天，来了一对上年纪的夫妇，抽了一张彩票。看起来是刚送完葬回来，穿一身黑。必是到了人穷财尽的地步，搜罗出所有的零钱，才够买这张彩票的。不成想却中奖了，两千列伊。数目虽说不算多么大，可两个人高兴坏了，顿时喜笑颜开，连身上还穿着丧服都忘记了……瓦尔拉姆把那张彩票要了回去，中奖人万万没想到，他不但把彩票立刻收了起来，而且连奖金也不给了……那人当然不干，于是吵嚷起来。在场的人，也都帮着中彩的人说话。这时候，瓦尔拉姆挪动了几步，走到中彩人面前，冷不防给了他几拳，几乎把那人打昏，接着又抡起拳头，照周围的人身上乱打。他力气有多大你是知道的。后来，救护车、警察都来了。我赶紧离开了那儿，我可不愿意介入这些事。这家伙，如果觉得你干了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或者没照他的意思干，即使过了十年，他也会找机会报复的。为了你们的事，他被判了无期徒刑，过了几年被赦免了，后来又被判过刑。他依靠的只有一样：拳头……”

“唔，”教授暗想，“要是我能忽略——或者更确切—

些——忘掉他是什么人，那么，能跟他一起谈的事该有多么多啊！特别是现在，当我感到需要安静，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干枯，越来越孤独的时候……但是，一个如此轻易就放弃一切的人，能有什么价值呢？……”

“你为什么问起瓦尔拉姆呢？”雷德曼关心地问，同时对教授最后终归会平静下来充满了信心。

“看起来真是本性难移……”克里斯蒂安说道。“在我脑子里你们两个尽管是分不开的，可对他我还是原谅了。他曾经凶暴得象一头只知道制造灾难的野兽。他来了，我给他看了病，他表现得就象我们从来就是好朋友一样。当然，你的解释听起来很精彩……如果你是在那时候，在那儿对我这样说，我也许能尽力做到理解你，甚至可能告诉你解决办法。当时你是以友谊，而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强使我作声明。我相信过你，认为你不会不讲道义。但事实恰恰是你告发了我……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作为医生，我坚持应该这样做。另外，我并不象你所说的，我并不是排斥任何一种政治，而是设法去理解它。我入党并不是为了抵消岳父的历史给我带来的污点，而是出于信念，而且是经过了认真的考虑。我恪守党的章程，自认为是值得信任的。被跟踪、被怀疑的不应该是我。而即使在这之后，这出戏你也没有演好：你说的完全是你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我对你吐露的实情。正因为你聪明过分了，所以才有可能把这样的事情搞混……”

雷德曼从来也没经历过这样的精神状态：从窘迫到失

望；开始他到这儿来是经过了痛苦的犹豫，抱着能够好好谈一谈的希望，然后，在看来他们之间的隔阂有可能消除的时候，曾经高兴过一刹那，但接着，一切又都不可调和地破灭了。原先他完全以为时间、年龄会逐渐把过去严酷的记忆冲淡；必要的解释，会使两个人都如释重负。而现在，当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甚至连他这样的病也并没使对方动心时，不由得感到更恨这个人，感到过去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值得歉疚，只不过没有这样说出来：克里斯蒂安身上那股无形的力量，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

“好，”他突然嚷道，“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这就是说，现在，即使在我处于绝境的情况下，也甘愿承认遂你心意的一切。当初你是意志坚强的英雄，而我，不过是个怯懦的小人。可惜构成世界也包括这样的人。但是也许最好你也想一想自己那种冷酷无情的自私自利。你曾经是我的朋友，特别是当初我对你言听计从。你一直洋洋自得，就好象整个医学都是你发明的似的。人们，不管怎样都有所前进，而在你眼里，除了自己的发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我能够听你的，因为我具有这样的特点：有耐性，也许除此之外，再没有一点长处。也许在其他所有方面，我都是幼稚的。也许我完全相信自己应该做的一切。这都无关紧要。也许我一直是身不由己。总之，象我这样的普通人，保守的本性，也许更胜过友情。那时候，我们那样的年龄，两个人还都意识不到。假如有朝一日你能够排除开自己的狭隘、自私，你会发现，那时候的道德价值是多么高贵

……已经到了你抛开我们的事，把眼界放宽一些的时候了。当然，我并不想以此来解脱自己……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现在是什么感觉，当初又曾经怎么感觉过……自然，那时我答应照瓦尔拉姆说的去做，是暂时地拯救了自己。而现在你为了理解这一切，竟是如此困难吗？”他的手和脸神经质地颤抖着，竟至无法把想做的解释继续下去：他感到不由自主地滑进了一个与眼前的人们毫无关联的境界。而克里斯蒂安，既不显得激动，也不显得满足，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就象是在观察一张已经看过上百次的普通切片：“今天我原谅了他，明天他还会照样这么轻易地出卖我。他是属于无法给予信任的一类人：只有他自己和彼时彼刻至关重要，其余都无所谓。我的过失，在于交错了朋友。完全是这么回事。我的自私伤害了他吗？为什么以前他没对我说过呢？就是说我们互相欺骗了对方，要不就是互相没有足够的了解。事实总归是再明显不过的。”

安德烈以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每个动作，每句话，越发加深了他这样的印象：父亲表现得竟如此粗暴，如此反常，如此不加节制，根本不管雷德曼也遭受过痛苦这一事实。这种缺乏谅解、不近人情的态度，透着一丝苦涩的味道。当然，安德烈对这些事了解极少，只不过从外婆那儿听过只言片语，她一提起此事就眼泪汪汪的，而父亲总是避开这个话题：他不想让儿子受到自己意见的左右，尽管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愿；另外，他也担心安德烈会以为他为自己的某些过失做辩

解。他不喜欢这场面对面的交锋，哪怕只是走走过场。“无非是不走运，误会，”他对儿子说，“别管我这些，还是看看别人遭了些什么事吧。”除此之外，别的他不愿意讲。

“现在我可以对你说，我理解你，”最后教授退了一步说道，“但是我没有权利说谎，说我都忘记了，说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不会装模作样，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只能做我可以做的事。我承认，刚才我犹豫了一下，差点没把手伸给你，但我现在意识到，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到底，我原谅不原谅，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过去的友谊是虚假的，互相欺骗，或者照你愿意接受的说法，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没有什么可回顾的，再从头看起吗？这毫无意义，甚至荒唐无稽。也许已经过去的这些年头，我们每个人都尝够了滋味……”说完，教授站起身，给安德烈做了个手势，让他送客人出去。“其实，搞这些形式还有什么必要呢？”克里斯蒂安看着雷德曼犹豫了一阵就要迈开脚步的时候心里暗想，“是过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觉悟了吗？只有那些有骨气的正派人或者血气方刚的少年才有可能。仔细看看他的样子，我可以毫无偏见地断言，这两种情况他哪一种都不属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我曾经注意地听他讲话，他嗓音连颤都不颤，根本没有替我想办法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说话时那种激动的样子，就象是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他向瓦尔拉姆提供了所有的证据，还嫌不够，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了一部分。当时他简直把我看成是个重要人物，一个危险

的敌人。现在我看得出他希望让我尽量粗鲁地对待他，他甚至喜欢受折磨，或者说为了自身的利益甘心情愿地忍受……事实是，他几乎把我弄得手足无措……我仿佛又跳到了那时的年月：有时，我甚至等着瓦尔拉姆或者别的什么人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应得的惩罚：经过了战争，还是这么天真。”

“那时候你就对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你永远也不会原谅我。”雷德曼一边说着，一边愤愤地走向屋门。

“我们又见面了，我还是没原谅你。”克里斯蒂安压低嗓门一字一句地说道。“这就是说，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你哪怕帮过一次丝苔拉呢，当然指的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我想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现在我们不用做任何解释。可怜她不得不办了跟我离婚的手续，为了养活孩子，只好去给人家当佣人……”

“遗憾的是你只对自己的不如意耿耿于怀。但是，无事可做的时候，最好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傲慢。难道你就从来没做过错事吗？从来没退让过吗？难道我们能够脱离开外界过活吗？”雷德曼一边说着，一边开开了屋门。

“大人物和傻瓜有一点是共同的：自私。两个阶段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可以对你说，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本质却都一样。”

“为了这张住院单，我还是要感谢你。”雷德曼说道。“我并不想改变在场的人们对我已经形成的看法，也并不指望一出场就听到满堂喝彩声。但是至少你应该理解，为

了以往的过失，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甚至可以接受你对事情的这种狭隘自私的评判。但是有些事我也想弄个明白……”

“这指的是什么？”

“你不原谅我，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在找理由，也并不能够舒心如意。我不能够评判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岳父母，特尔古一日乌城，克里斯蒂娜，丝苔拉，约瑟夫副教授，法索莱……我当初注意你不过是出于好奇：我和瓦尔拉姆都是转瞬即逝的人物。然而，其余的呢？又应该怎么解释呢？”

“那时候跟现在一样，你始终没把这台戏唱好。”教授加重了语气，他对终究继续了这场对话有些恼火，而直到现在，他才发觉谈话已使他精疲力尽。好长一段时间，他动也不能动：房间变得更加阴暗、狭小，黑洞洞的，使他感到气闷。

安德烈从厨房回来，见父亲仰卧在扶手椅里，两眼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满身汗淋淋的，罩上一层水气的眼镜丢在桌子上。两只躲在眼皮下的小眼睛，象是拚命在找寻着光线。衬衣领口敞开着，从来离不开的黑领带，也扔在了一边。他心里明白，同雷德曼的对话，并没有结束：他好象又被抛出他以为早已忘记这个人的时刻，他在竭尽努力，至少想象着自己看到的这个人不完全是当初的样子。

“你这样对待他，”安德烈不安地说道，“不怕他会自杀吗？他简直都支持不了了，你没见他走路的样子呢！我

真想立刻叫辆汽车把他送到医院。你没想想吗？这有可能是毒瘤……”

“毒瘤不会长在毒瘤上边……当然，我还没给你做过医学上的解释……但是，”教授叹了一口气，极力想摆脱掉这种软懒的状态，“真正的男子汉，绝不会是这样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一旦闯下乱子，哪怕只是一时的失误，也会拿起‘勃郎宁’，自己关在屋子里，几分钟以后，‘啪’的一声，了结一切。可惜，象他这样的人，不用指望会做出这种高贵体面的举动。”

“很抱歉，”安德烈怯生生地说道，“我并不是有意挑毛病，你确实让我感到吃惊。别的我不懂，可就我看得出的，他是把你当成医生才来找你的……”

“是啊，我也感到很遗憾，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我的历史，只有别人对它感兴趣，而我自己一点也不。只要能得出经验教训，这些也就够了。可是当我回想起来……战后，我回来了，九死一生，确实很难得的。当初，参战的时候，我是满怀着天真的热情、崇高的理想的。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跟死人堆打交道，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熟练的外科医生，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经验。可他一直躲在家里……照道理，我们不会再碰到的。死，使得我对生活又有了一个新的更深的理解。所有的事实，在我看来好象都变了颜色。我对他讲这一切，而他，你都听见了，却都当成了我的自私。在战场上不管你怎样觉得奇怪，有时候心里害怕，

总感到需要说话，没完没了地唠叨一阵，只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管是什么，有意说的，无意说的，只要说出来，就好象这关乎到生命能不能继续下去一样……不管怎样，不管道不道歉，我还是给他开了住院单。他问心有愧的沉默倒比说话更能说明问题。其实，我也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别的。他到这儿来，把我的头脑都搅乱了，我知道，我表现得不正常。”

“太厉害了吗?”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忽然问道。她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里，如果不是不停地擦眼泪，别人还以为她是睡着了。重新泛起的那时曾经有过的惧怕感，使她没敢插话。但随着他们的谈话，她自己嘴里也不时咕噜出一连串的咒骂和祈祷。只有一个问题开始时使她担心：如果这个人再爬到个什么位置，那么让尼又会怎么样呢?有一件事她是清楚的：收他住院不过是个表面现象，就象那时候他们曾经做过朋友一样。对她来说，时间在倒退，又回到了当初的情景。“厉害吗?应该一脚把他踹出门。如果让尼是个男子汉，就该二话不说，上去敲破他的脑袋。让尼真是太宽容了，太好心肠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混蛋，都能骑到他脖子上作威作福。只有我和丝苔拉才知道我们究竟遭过多大的罪……”说着，她眼睛里又涌出两行热泪。克里斯蒂安教授也感到一阵心酸，他走过去，轻轻扶住她的肩膀，企图缓和一下气氛：

“你瞧，是你把他带来的，是你一定要让我见他，最后还是你，又怪我不该跟他谈这么多。”

“谁能想到会是他呢?”她大声嚷嚷着,就象雷德曼还在跟前一样。“我眼神不济,也没那么大力气,要不,我真想拿开水往他头上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可怕牵累的!”

“好啦,好啦,”教授抚摩着她的肩膀,动作显得那样笨拙可笑,“人们总免不了你欺我骗,该你哭的时候眼泪已经流得不少了。现在,劳驾请给我们每人弄杯咖啡来吧。我很想喝点咖啡。”教授知道,这正是她最容易突破的弱点之一。她喜欢自己能够对他们有点用处,能向他们炫耀一下自己的实践经验,能给他们出点主意。教授每次都能成功地利用这一点:打断她长篇大论的唠叨,止住她的眼泪,使她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状态。

“咖啡要浓一点……”

不出教授所料,绍依曼斯库太太立即作出了反应: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别忘了自己的岁数,这样对心脏没好处。要是你再有个好歹,那可是上帝给我的最重的惩罚……”

“只要一小杯,但还是要浓一些,今天最后一杯。”他坚持要求道。老太太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但安德烈还留在屋子里。显然那几个没弄清楚的问题,不管怎样,让人感到刺痛的问题,仍然在折磨着这孩子。教授至多只能把回答推迟,因为觉得实在是太累了,没有精力了,而且也有些厌倦了:“最终人们总归会自己发现一切,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想把遮盖着的那一部分指给他们看……”

等走到厨房，老太太却把咖啡的事给忘了：她知道是要给他们做件什么事，但怎么也记不起究竟要做的是什么事了。她想等他们再喊一声，于是把带轮子的那把旧扶手椅，拖到了窗边，这把椅子是她让保姆从阁楼上拿下来的。顿时，那个检察官的形象又浮上了她的脑际。

“怎么是你？正巧是你吗？……那时候你天天到我们家来……我们家什么事都不瞒着你，我们简直把你当成了自己家里人。那时候我想，你来对让尼是有好处的，他刚刚打完仗回来，一无所有。对列鲁[1]也有好处……我丈夫认为这下可找到了知己，找到了投缘的同行，他是很喜欢跟同行交谈的……是他替你安排了工作，栽培你，让你成了他的助手，朋友。要是没有列鲁，你这只无头苍蝇，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瞎撞呢……可如今，恰恰是你……我能担保你对我故去的丈夫是问心无愧的吗？我怎么就没认出你来！在大街上呆了这么长时间，就在窗子底下，这么长时间……我瞧见你了，而且不止看了一次……可我万万没有料到会是你，不，没料到……那时候，到法庭去的时候，看见我，你赶紧把脸扭过去，千方百计躲着我。你在我们家呆过这么多年，可我到你家找你，你连门都不给我开……我还认为你早就死在哪儿了，接受了上帝的惩罚，要不就觉得没脸见人，跑到别的城市去了。照理是该这么做的……”

[1] 即绍依曼斯库太太的丈夫，奥雷尔。

老太婆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流泪地回忆着往事。教授已经熟悉了她后来才有的这个习惯，常听见她自言自语，同那些早已过世的人讲话，或者提高嗓门，叙述那些过往的事，有些甚至是些私房话，但她讲起来是那样激动，一点也不避讳，甚至不管房间里还有没有其他人。而当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会理所当然地解释："我在跟丝苔拉说话。我跟列鲁吵架了。"等等类似的话。

现在，教授听着她这样说，心里着实有些不安："如果他再回来呢？如今一切解释道歉的话等等，又有什么用处呢？从什么地方说起，又是为了什么呢？作为医生，我应该不再计较，由他去，接受他的悔罪，因为这一切其实也无助于任何事情。但我们的友情，却不曾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止玷污了我的职业，而且也玷污了我对他的信任。如果我不是那样挺过来的话，早就完了……即使这样，也就只差那么一点……"他又想为自己辩解，但他并不喜欢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记起安德烈仍然迷惑不解地呆在面前。

"安德烈，你也认为我不该那样对待雷德曼吗？"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极不自然地这样问道。不管外婆对安德烈说过些什么，也不管还有过什么别的事，看来他同儿子之间的局促状态是无法结束的，一场激烈的、从未有过的精神冲突，终究不可避免。而安德烈却没有勇气打破眼前的沉默，仍在怯生生地等待着父亲发出开战的信号。

"在好多方面，"教授继续说道，"我们两个没有共同

语言，所以有些看起来不正常的举动，很难向你解释清楚……”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刚才会这样……”安德烈嗫嚅着说道，他怕父亲进一步追问，又觉得有些不安。

“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早就完了，如果眼前我早就不存在了，那么雷德曼就不会来向我道歉，你也就看不到刚才的这一幕，看不到我的粗鲁。要是我当时不说真话，为他祝福，那样你会更满意些吗？”

安德烈没有回答，他暗暗恨自己太怯弱，竟卷进了一场自己无法进行下去的谈话。父亲的严厉在他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以致根本不能使自己的情绪活跃起来。

“有时候，遇到什么事，我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教授冷静了下来，口气也变得自然了。“因为我有过职业范围以外的痛苦遭遇，这些给了我很深的影响，自然你没地方了解这些。本来，象我这样的年纪，不应该对朋友这样严厉，应当宽厚一些，终究活过了这么长时间，有过这么多经历，再加上生就一副当医生的材料：‘好’，‘知道了’，没完没了地注意听，不住地点头，即使别人骂你，也要把这样的人归入某一种心理类型，某一级智力发展阶段，只有这样，才认为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雷德曼曾经是个聪明、有学问的人，在他身上我寄予过很大希望……当然，他后来的表现触怒了我的自尊心：我受骗了，没认清这个人，为了几个小钱就出卖了朋友等等。照理我应该原谅他：

一个囿于环境被人唆使利用的可怜虫，瓦尔拉姆的牺牲品。但是感情上……说老实话，我真没想到他会到这儿来，而且正赶上我心情也不好。”教授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承认了这一点。“你以为我不理解他吗？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是人，而变成了一群挣扎着想要活下去的野兽。我了解这一点，非常了解……”

“我应该也跟雷德曼谈谈就好了，”安德烈这样想着，然后开口说道：

“很对不起，也许我这样坚持惹得你不高兴。但是……怎么说呢？他简直把我的头脑搅乱了。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丢尽了人格，不堪信任——一切都不值一提。这几年，我连提到他的名字都觉得恶心。后来，整天这么多事，也就把他给忘了。现在，你看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小人。事实上，他早已同那些被他吸过血汁的人一起死掉了。是我自己错了，我没能尽力更深地了解他。起先，我们有过共同的志趣爱好，共同的习惯，但是，看来却不曾有过共同的思想……你还应该了解的是近来这些日子有些反常：有可能是太阳上的黑子爆炸引起的影响，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什么怪风，或者地球磁力的变化，一点也搞不清楚。总之，就好象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有些想法老是缠着你，摆脱不开，象是心理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碰到过的对手不下几十个，有的甚至见过多次。但是我们谈起来却象是老相识，不动感情，不记旧怨，这是

因为我不能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教授从椅子上站起来，理了理头发，口气显得极为亲切地说道，“你已经累了，是吧？外婆到现在还没送咖啡来，这是她今天晚上就要离开的预兆……可我还是想喝点咖啡……”

父亲的反常举动安德烈并不喜欢：显然这是为了讨他的好感，为了泯灭刚才会见客人时留下的印象。很久以来，父亲这是第一次企图超越他们之间惯常的礼貌界限和动辄教训的谈话内容。但安德烈却没有勇气走得比这更远，没请他进一步解释，也许是怕了解到的事情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父亲的举止从来都是得体的，善意的，无可挑剔的。但不知不觉别人的一些看法也渐渐在他身上发生了影响，以致他觉得对父亲生出一种又怕又敬又有点怨恨的感情。

“当然，喝杯咖啡的确不坏，我这一天够紧张的，上了这么多课。”安德烈觉察到自己的语气并不是那样犹犹豫豫，于是放大胆子又接下去说道，“爸爸，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我明白，提起这些也许会让你伤心……”

“哦，你还没忘掉那个人吗？”教授故作惊奇地说道，“值得你了解的事，我绝不会瞒你的，这你知道。”

“遗憾的是有些事我很想了解。”安德烈低声咕哝了一句。但教授并没有回答，他把一只手当做喇叭贴在嘴边，就象呼救似的高声叫道：

“外婆，你怎么把我们忘了，外婆？”这时候门口冒出来一只黑色的大皮箱。

"在这儿，我睁着眼都能梦到他。"老太婆说道。"我敢说，他肯定还会再来，真的用开水浇他的头，我还犯不上作这个孽呢！"

"说得对。"教授狡黠地笑了笑。

"你可别这么软弱，"她接下去说道，"别信他的花言巧语，也让他尝尝你的拳头，你受他的罪还没受够吗？"

"我会打他个头破血流，这你放心。"教授开了句玩笑。气氛缓和了一下，这时教授才发觉，雷德曼这次来，引起的后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又生出一种孤独感，恍恍惚惚，象是需要什么来定定神，需要一束光线来驱走阴暗。

"多么怕人的一天，"他叹了口气，"而且，这一切还都没有结束！几个月，甚至几年来，一直是这么平静，从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而忽然间……"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安德烈大着胆子说，"总不会是因为我。"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克里斯蒂安出乎意外地紧接着说，"瞧，你确乎有那么一股子热情，一股刨根问底的劲头……原先我对我的研究也曾经是这个样子……可当初事情如意的时候，周围环境却偏偏迫使你离开轨道，一切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曾经有三次我被迫放弃研究，而每次都意味着白白耗费掉几年的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几次这样的事呢？雷德曼正是从这方面帮过我忙的人……难道为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尝到的失掉机会的滋味，而

应该感谢他吗？”

四

教授预料得果然准确：雷德曼走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白天发生的一切，又唤起了他一种埋藏多时的敏感，就连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话，也觉得不同一般，必得立刻作出反应。而时间过得又是那样地慢，一种无目的的等待，没完没了地折磨着他。外面，霏霏的细雨带来一股寒意，赶走了早春的温暖。街道上空黑洞洞的，到处充斥着一股堵塞了下水道的腥臭味道，这更增加了他心绪的烦乱。

“多么坏的天气，”教授心里想，“多恼人的日子啊！”被雷德曼突然勾起的往事，一幕幕闪电般地映现在脑际。但情绪却不象那时那样平静，那样饱满，而是不可抑制，一股劲地往前，总觉得还应该有什么事继续下去。难道为了这一段时间的宁静，为了刚刚尝到的一点无名欢乐，已经到了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刻了吗？安德烈掩饰不住的失望，绍依曼斯库太太心神不定的急迫，不容他有时间细心体味这种感情，而且他自己也无法去体味：尽管脑子是清醒的，但却作不出任何反应，一桩桩事情，象滑块似的溜来溜去，渐渐地从那似乎预示着不幸的难忍的头痛中，分离了出去。

绍依曼斯库太太本来就没打算在这儿住两天以上，但却带来了三只皮箱，里边塞满了自己所有的衣服。还有那

个枕头——从来没离开过她的枕头——装在一只绿色的网袋里，这只网袋是一个有一群孩子的茨冈女人送给她的礼物。绍依曼斯库律师为了超度这个女人的丈夫，每星期五都舍给她一餐饭和一些旧衣物。绍依曼斯库太太嫌教授的枕头太硬，看起来简直象班房里的刑具，一挨上就会觉得头痛，因此，不管到哪儿，总是带着自己的枕头。出租汽车司机见这只枕头太大，请她放到车尾，跟箱子搁在一块，而老太太怕给她弄脏，又怕沾上汽油味，坚决不干，宁肯自己抱在怀里。这鼓鼓囊囊的东西，几乎挡住了汽车前面的半扇玻璃，连司机换挡都碍手碍脚，于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绍依曼斯库太太骂司机是无赖，司机气得让教授给评理。教授没法当着老太太的面说什么，只好笑着替他们劝解。司机还了一句"该死的老太婆"，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绍依曼斯库太太要求立刻停车，说她不能坐这种没教养的野蛮人开的车。要不是教授怕那儿只皮箱没法拿，一个劲地说好话，司机才乐得把老太婆扔下不管呢。幸好绍依曼斯库太太住得不太远。到了地方，教授为了安抚一下司机，想多给他点小费，不让他再找零钱，但怒气不息的绍依曼斯库太太，却伸过手去等着找钱，嘴里还咕咕哝哝，"贪心不足，不知羞耻"地骂个不停。这下更惹恼了司机，于是把手里的零钱往她脚底下一扔，接着回了一句："留着给你买棺材吧，见鬼的老太婆。"直到安德烈说要去找他们公司，老太太这才消了点气。只要是外婆的事，安德烈从来都是站在她这一边的。可巧安德烈和

老太太都没记住车号。打电话给汽车公司，那儿的一个女调度懒洋洋地说了声“我们回头调查一下”，便一下挂上了电话。教授一直在街上等着安德烈，绍依曼斯库太太知道，教授不进门跟刚才发生的争吵倒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因为教授跟埃尔维拉——他妻子丝苔拉的姐姐，关系一直不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十年，尽管两个人都觉得这样不对，甚至有些荒谬可笑，但谁都不肯主动迈出和解的第一步：他们这种关系已经不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意志，而是被一种介于羞愧、悔恨和悲伤之间的复杂感情所控制着。

当安德烈在楼上打电话的时候，埃尔维拉一直站在窗口向外望着：也许这是她的习惯。而克里斯蒂安，眼前又浮起她脸上惯有的冷冷的笑容，不由得一阵恼怒，心里说：“象我岳父一样的执拗。”随后低下头，眼睛看着地面，慢慢腾腾地向街的另一角踱去。他感到遗憾，悔恨，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到了现在的年龄，可还是象原来那时候的样子，还是放不下原来的事，而且至今两个人谁也不肯示弱，不肯承认失败。

奥雷尔·绍依曼斯库律师，同他父亲——一个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乡村神父，参与过所有的政治斗争，开始是公国统一，而后是农民解放——一样，一心想让家里多生男孩。遗憾的是律师偏偏生了两个女儿。他怕接连再生第三个、第四个女孩，于是就此止住了：“养姑娘真是件赔本的事，”他苦笑着说，“供她们上学，带她们见世面，教她

们为人处世，结果呢？一结婚生孩子，就只能整天围着厨房摇篮转了。如果长得再漂亮点，就更会招惹是非。”尽管不住嘴地这样唸叨，但事实上他却从未错过使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埃尔维拉成了药剂师，丝苔拉也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文科哲学系的学业。这样，绍依曼斯库便有可能指望一个女婿继续他的律师职业，另一个，继承山脚下村子里老神父的圣职。他们乡下那座每年夏天休假只住几个礼拜的房子，已经长年失修，只好卖掉。战争一爆发，他们到乡下去住的计划，事实上也已经无法实现。房子没了，总象是若有所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亲。老神父除了教职之外，还兼任教师、大夫和全村的教父。后来接替他父亲的是个农民暴发户，整天忙着经营财产，参与政治，而且长了一副凶相：又粗又弯的浓眉，宽宽的下颚，密密实实的胡须象是垂直地从脸上挂下来。

绍依曼斯库律师不喜欢隐讳自己的过失和弱点，同样，对周围的人也从不宽容，特别是那些系命运于己身的人。他对埃尔维拉的细心和能够察颜观色，并不赞赏。有一次当着家里人，带着尖刻的口气打趣说：

“可惜你太象我了，可一旦你有什么不规矩的事让我发现，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丢到大街上去不可。”

埃尔维拉用挑逗性的眼光盯了他一下，象男人似的伸出手来同他用力拉了拉，用英语回答了一句：“好吧，我们说定了。”从她的眼神里律师看出，他刚才的警告是毫无用处的。她从来不甘心被制服，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做出

各种姿态或笑容来减弱严厉的词语，缓和严肃的气氛；或许她不自觉使用的手段，恰恰是律师用来对付绍依曼斯库太太的。每当律师老不回家，绍依曼斯库太太就会冲他嚷嚷：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那些女人带回家来呢！至少你自己应该当心，别染上那种见不得人的病。”

“我答应只爱那些你喜欢的女人。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说着律师递给她一本当天的工作日记，里边排满了会议、辩护、商谈等等，当然这只是专门写了给她看的。“你看看这个，请给我找出两个小时的空儿，好一块研究一下该怀疑的究竟是谁。”

有一点绍依曼斯库却忽略了：埃尔维拉——她长着一头迷人的金发，身材匀称，老是带着能够立刻传染给别人的欢乐情绪，总会自然地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能够讨取众人的欢心，却从来不曾赢得哪个具体人的喜爱。那些热衷于建立安乐窝的男人，担心她的美貌和精力。“这样的女人，即使不要你老守着她，也会让你不得安生。”的确，她好象有使不完的精力，老是好奇地不知疲倦地探求一切事情的细节：在她看来，周围的世界似乎太平淡了，太狭小了，周围的人们太呆板，太死气沉沉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后她才惊异地发现：她可能喜欢的人们，都逐渐避开了她，而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却慢慢渗入到她的心灵。她开始想到也许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但却又不能够后退一步。对她来说，屈从于某种观点，简直是不可

想象的。她不愿对任何人隐瞒任何事情，她并不想偷一个或者乞求一个丈夫。

埃尔维拉的父亲仍然自信地认为，女儿还会重演他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的成就，会各方面应付自如，但却忘记自问，女儿对此是否也感兴趣，是否也有那股锲而不舍的劲头。女儿身上一道越来越深的悲哀的阴影，更加引起他的不安，于是便想从那些经常到家里来的小伙子当中，朋友们的儿子当中，为她选一个合适的人，但并没有获得成功，结果只好随她去。当初他为了选个中意人，既漂亮、聪明、能干，又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要能宽容，有涵养，也是有过多少犹豫，伤过多少脑筋的。刚刚录用的雷德曼，看来倒是能够继承他律师职业和议会事务的有出息的年轻人，只要这个年轻人也有埃尔维拉那样的精力和心气。不过这是女儿自己的事，让她自己去选择好了，他再也不愿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女儿，不愿在这方面再去当指挥了。

丝苔拉在这方面却一点也不用他操心。她和埃尔维拉恰恰相反：文静，好学，甚至有些过分严肃。“她的事比较简单，”律师这样想，“将来找个做学问的，两个人关在屋里钻书本，不受什么政治的干扰，也不管外界的事。一旦我想安静安静，就到他们那儿住些日子，管保会觉得象在保险箱里一样。”尽管暗地里这样盘算，但他却不明白，事情总归不会那么全遂人愿。律师一心想早些了结这件事，但看来二女儿并不急于找这个“做学问的”。丝苔拉高高的个儿，一双并不明亮的大眼睛，脸色出奇的苍白——象是

蜡烛里生出来的，绍依曼斯库曾经这样说过——到了二十岁还是个默默无闻并不引人注目的姑娘。由于过分腼腆，抬手投足甚至都显得那么不自然。尤其在生人面前，更是不知所措。待人接物上的无能为力，同姐姐相比之下的自愧不如——姐姐是那样的无所顾忌，那样的无拘无束——丝苔拉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对周围的人们也越来越缺乏兴趣。每当提到埃尔维拉应该作为她效法的榜样时，她总会以一种又妬恨又怜恤的口吻说："亏她受得了，整天在不值两个钱的聪明人面前表演，而自己还觉得挺得意。"事实上她并不认识这些人，除了雷德曼，她没同任何别的人谈过话。而对雷德曼她也有所保留：雷德曼同父亲一道工作，她以为雷德曼陪她散步，是因为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她没拒绝他，正是怕惹他不高兴。另外，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她也不愿意让人觉得她太孤独。

大学的最后两年，丝苔拉身上发生了父母意想不到的变化。起先父母以为她得了什么损害健康的慢性病，但后来发觉她瘦瘦的面庞，干瘪的躯体，逐渐充盈了起来，甚至穿上埃尔维拉的衣裙刚好合身。只经过短短一段时间，丝苔拉便由一个发育迟缓，看上去象患了肺结核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希腊塑像般的、成熟丰满的姑娘，致使人们的注意力逐渐由埃尔维拉转到了她身上。丝苔拉尽管觉得能跟姐姐媲美，也暗自感到高兴，但对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并不在意，她仍旧同人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仍旧只专注于自己的课外读物以及雷德曼乐于陪她去听的音乐会。家庭

对她来说几乎感到陌生，她同谁都不大合得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雷德曼能够陪她，对这种肯作出牺牲的耐性，她还是十分敬佩的。热心政治的绍依曼斯库律师，曾当过民族农民党的议员，现在也想极力培养女儿在这方面的兴趣，尽管这对她来说没有丝毫吸引力。律师高高的身材，宽宽的前额，突出的颧骨象石块雕成的一般。他穿着讲究，开朗，兴致勃勃，一刻不停地为自己接受的案件寻找辩护词。对女儿来说，他太爱讲话，听起来她都感到累得慌。他精力过人，一旦卷入事务旋涡，甚至可以完全忘记自己面前是什么人。接续不断的辩护证词，一口气讲下来，丝苔拉觉得他简直立刻会因此而爆炸，变成粉末。但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他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越来越沉默寡语，不再那样自信，偶尔讲起话来，也总要夹杂上数不清的解释，他时常悔恨自己不该卖掉父亲乡下的房子。现在他感到需要安静，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他逐渐接近丝苔拉。但这是一种越过语言的接近。他企图使丝苔拉多多开口的努力，并没有奏效，但他还是更多地呆在女儿而不是妻子身边。绍依曼斯库太太却正好相反，变得越来越爱说话，好象决心要取代丈夫的位置，不使家里的气氛沉默下来。安娜·绍依曼斯库，从前也是个漂亮女人：栗色头发，高高的身材，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只不过冷漠的眼神多少减弱了她的姿容。而那种特有的能干劲头，使人觉得她未免缺乏感情。她的生活范围，仅仅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她不喜欢散步，不喜欢抛头露面；看起来他

们的爱情目标，渐渐转到料理家务上边。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两个女儿和丈夫身上，而对丈夫在外面的行为，显得并不十分关心。只要不闹出丑事，只要不让她抚养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其余都无所谓。当丈夫的眼睛在某个女人身上多停留一会儿的时候，她会立刻板起面孔问："你跟她有过什么事吗？不是为别的，将来一旦我们认识了，我可不愿意闹出什么笑话。"正是由于她能够体谅他，并不处处管束，这更迫使他约束控制自己，不去干那些冒险事。尽管她这样宽容忍让，对有些事闭起眼睛，由着他自己去做，暗地里却也常常一个人关在洗澡间偷偷落泪。

依昂·克里斯蒂安大夫是战争一结束才开始出入他们家的，尽管奥雷尔·绍依曼斯库很早以前，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就认识了他。那时他们两个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都被带到了首都警察局。律师曾在大街上当众把一群为前线募捐的青年送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纪念章丢在地上："我还不至于到这种不知自爱的地步，"他对那群青年说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这简直是种乞讨行为，而且是为了外国人。"

在警察局，讯问警官又故意给了他一枚罗马尼亚纪念章，他也当即拒绝了："警官先生，难道离了纪念章，离了五颜六色的小旗，离了吵吵嚷嚷的宣传就没法过活了吗？愿意戴纪念章你们自己戴好了，可别给我这些玩艺儿。我用不着从外观上向人们证明我是爱国的，爱国的感情没办法别在衣领上。"

克里斯蒂安是因为在一次招待会上侮辱了一位德国高级官员而被带进警察局的。在等候讯问的时候，他和律师聊了好长时间，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却远远地分了手。克里斯蒂安又回到巴黎就学，直到宣布维也纳指令①的时候才回国，当时定居在西比乌—克鲁日大学临时迁移来的地方。从西比乌他志愿到了反法西斯前线，战争胜利的时候，他正好在邦斯卡—比斯特里卡。绍依曼斯库则定居在阿尔迪亚尔北部的克鲁日城。那时候好多人都逃往布加勒斯特，他却来到这里。这倒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双亲都在这儿，而是觉得应该对留下的人尽到自己的职责。就象卷入深海的旋涡一样，斗争是那样的吸引他。"决不放弃一寸土地！"爱国者们曾这样高喊过，随后他们便销声匿迹了，而只有当他们重又感到有把握的时候，才会再次跳出来高声喊叫。作为前议员，他一直被霍尔蒂②秘密组织跟踪，有人建议他建立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党，后来被埃米尔·哈茨卡努③拒绝了。当时出现了在议会揭露那些当权者不法行为的可能，进行公开斗争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合法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动员人们起来保卫胜利成果，因为匈牙利族庄园主一心想把那些罗马尼亚军队撤退时由政府已经支付过款项的财产再弄回自己手

①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德、意在维也纳作出"仲裁"，强使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割让给匈牙利。

② 霍尔蒂为匈牙利的反动统治者，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四年摄政。

③ 罗马尼亚民族党主要成员，当时主张罗马尼亚统一。

里。当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他的建议不置可否。他觉察到其中必有原由，就连埃米尔“兄长”也不同意，于是便偷偷越过国境，找马尼乌[1]去商议。

“什么党也不能建立，亲爱的，”这位年长的政界人士用他那双蓝蓝的深邃的眼睛望着他说，“你应该是一体中的成员，我从来也没承认过现在的边界。”

绍依曼斯库详细地讲明了情况，说明了原因。沉默了一会儿，马尼乌用他那一贯毫不犹豫的口气说道：“这是个阴谋，亲爱的，一开始你就应该先自问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只能是一个：他们想要离间你们，想让你们起内讧。”绍依曼斯库青年时代同这个人的会面，曾对他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绍依曼斯库十分敬佩他坚毅的性格和不同寻常的魅力。他没有财产，连所个人的住房也没有，一直没有结婚，只同什姆莱乌—西尔瓦尼的一个女药剂师，一个匈牙利姑娘谈过一次恋爱，而这个姑娘也是那样庄重朴实。因此，绍依曼斯库想到，自己在他面前差点儿又犯错误，连做律师的辩才也忘得一干二净，竟回答不出马尼乌的问话：“你给老绍依曼斯库主教做了个象样的十字架没有？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我在指导委员会[2]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但马尼乌的微笑，转换话题，并没能解脱

---

① 罗马尼亚民族党主要成员，当时主张罗马尼亚统一。
② 指一九一八年在阿尔巴—尤利亚召开的大国民议会所任命的指导委员会。

绍依曼斯库的窘态。“在此之前我只不过是个平庸的政界人士，”他暗自寻思道，“瞧，现在我甚至能有机会列入史册了。我必须确认自己的存在。”

鉴于绍依曼斯库所从事的活动，他曾一度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被关进布达佩斯监狱，直到匈牙利首都解放才获释。他从那儿一直步行到家。他显得老多了，疲惫不堪，这倒不只是因为走了几百公里的路，更多的是监狱和集中营的生活让他付出了比预想多得多的代价：直到解放的那一刻，多少宝贵的年华都付诸流水。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满意：他走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市里新换的领导人他都不认识。绍依曼斯库太太感到恼火的是没有一个人来给他安排职务，就连来寒暄一下的也没有。她原以为受过的这些惊怕，等待的这些时日，为左右帮忙花去的费用，总应该得到报偿。绍依曼斯库一心忙他的律师业务，而绍依曼斯库太太却为“祖国的报偿”同他争吵不休。

“这有什么可争的？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要什么报偿，而是出于自觉自愿。要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战斗在第一线！”他大声嚷道。绍依曼斯库太太也不示弱，又搬出了她的公公：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主教，胸前飘着白胡须，活象《圣经》上的圣徒。当初，一九一九年国王斐迪南和王后玛丽亚访问巴雅一马雷时，老主教曾代表全城向国王夫妇敬献过盐和面包。而且就在这次，为了表彰老主教在民族党的活动，表彰他出版小册子，表彰他自出经费开办学

校，国王给他授了勋章。老主教以惊人的记忆力，可以成段地重述国王的讲话，甚至连他的儿媳也能背出斐迪南国王对费朗契特将军[①]讲的警句："比忠诚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持个人的尊严。"

"要说困难的时候你曾经是好样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别人从你身上踩过去你都甘心，你的尊严哪儿去了？"绍依曼斯库也引用老主教的话："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奖赏，陛下，而是应该这样做。"但结果完全是徒劳。照绍依曼斯库太太看来，比市长再小的职务，简直是一种侮辱：绍依曼斯库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结果仅仅得个光荣勇敢的名声，这简直不可想象。

但后来，由于她一心为女儿的事情操劳，渐渐地就把这种不满意忘掉了。如今她最关心的是尽可能多地请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到家里做客，康斯坦丁·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但绍依曼斯库太太发觉，与其说姑娘们倒不如说律师看中了他，尽管雷德曼老是傍在丝苔拉身边。另一个她寄予希望的就是克里斯蒂安大夫。她一心想把他同埃尔维拉撮合在一起，好尽早地甩掉这个包袱。大女儿不驯服的性格酷似他的父亲，再加上她的美貌，使得绍依曼斯库太太想起来就整夜不能成眠。"就怕还没等到给她找到合适的人，就闹出蠢事！"绍依曼斯库太太这样担心地想。当然，她的这些想法一点也不敢透露给女儿，于是便时常请克里

① 一九一八年曾任巴尔干半岛协约国联合部队最高指挥官。

斯蒂安来家吃饭，有意识地让他们两个人多接近，而且张口便夸他如何如何好，直到她发觉埃尔维拉开始对他似乎也有点意思了；不幸的是克里斯蒂安大夫却并不搭话。看起来他对同绍依曼斯库和雷德曼的谈话，比对婚事显得更感兴趣。当然，事实上克里斯蒂安对于两姐妹也并不是毫不关心。埃尔维拉越是在他面前卖弄风骚，而他的兴趣却越来越被丝苔拉所吸引，只是找不到机会同丝苔拉接近。只要不是单独回到自己的房间，埃尔维拉总要完全遮住克里斯蒂安的视线，而他也只有无可奈何的顺从。他倒也喜欢目不转睛地瞧着埃尔维拉，仔细琢磨她的每一个动作。而他对她越是了解得深，就越觉得不能不胆战心惊地远离她：这个女人简直同克里斯蒂娜一模一样。

想到同克里斯蒂娜那段伤心的韵事，克里斯蒂安不由得一阵心悸。这是唯一一个象扔掉一件旧物那样毫不在乎地抛弃了他的女人。就如同平地把他卷起的一股飓风，克里斯蒂娜搞得他昏头昏脑。他曾经象个瞎子似地跟在她的身后，随着她的脚步，不分白天黑夜地在一片混乱模糊的世界里过活。最后她又是这样突然地离开了他，而他竟是这样地接受了。当然，实际上也不会有另外的结局。象是在就要滚下悬崖摔个粉身碎骨的当儿，忽地收住了脚。这次同埃尔维拉他倒并不担心可能重演过去的一幕，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根据在那漫长的战争年月，在手术的空隙，在前线流动救护车里，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幸运的，克里斯蒂娜对他并不合适，埃尔维拉也

是一样。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自我解嘲，并不是为了抚慰一下被损伤了的自尊心，而是确确实实觉察到他们对未来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情趣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不可调和的个性将使他们的结合无法持续下去。埃尔维拉具备克里斯蒂娜的所有特点，同样是那么难以驾驭。而他，经过了战争，一直同死人打交道，人变老了，同她火热的感情太不相称了。埃尔维拉看出了他的动摇犹豫，而且发现他的目光老是盯着丝苔拉，于是决定把路走到底，不管冒什么风险。恰恰是她的妹妹——一个默默无闻、不善交际、整天埋头读书的姑娘——不费一点儿力气，刚好在她准备放弃整天踏破门槛的其他人，就要做出最后抉择的时候，要抢在她的前面。这对她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她了解丝苔拉的心思，看得出这姑娘隐藏在沉默不语和心不在焉背后的骄傲。她发现丝苔拉也老是不声不响地停在克里斯蒂安身边。只要他一露面，这姑娘那黑黑的大眼睛里立刻会闪出光亮。而当埃尔维拉靠近他，或者故意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时，丝苔拉的眼睛又象是立刻蒙上一层云雾。埃尔维拉心里暗暗骂雷德曼太没点儿男子气，怎么就放不开胆量，怎么就会意识不到自己身边是个女人。要想最后赢得克里斯蒂安，必须让丝苔拉放弃他。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选个微妙的时机，通过动作或者事实，向丝苔拉暗示出，在这方面，她——丝苔拉，已经迟到了一步。埃尔维拉简直有些迷惑不解，她不敢相信，自己怎么竟会落得为征服一个男人而煞费苦心？不过有一点她心里清

楚：一旦最后赢得了他，会让他倒在自己脚下，服服帖帖，到那时再决定，是继续把他留下，还是作为报复，抛开他。“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怎么会对我的美貌，我的聪慧一点儿也不动心呢？”她愤愤地想，一边却又有些担心：克里斯蒂安大夫，这样一个聪明的、讨人喜欢的男子，有可能作出错误的、不相称的抉择，尤其不可想象的是，可能被选中的恰恰是丝苔拉。

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她又改变了策略，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模仿着爸爸、雷德曼和他之间没完没了的谈论，作为见面问候的回答，径直地发问：“还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吗？政府没有反对派能行吗？”接着便是一阵忸怩作态。但克里斯蒂安，甚至丝苔拉，对此却并不理会。最后，还是绍依曼斯库太太提出警告，埃尔维拉这才不得不放弃这一招。“怎么能这样外露呢？男人们最不喜欢个性强的女人，怕将来招惹是非。再说也显得太没教养。换了我的话，也不会中意你的。”而克里斯蒂安则抓住这个空隙，决定不放过时机：丝苔拉已经有所觉察，姐姐忘形的表演，使得她对克里斯蒂安更加关注，更加愿意无所顾忌地接近他。而克里斯蒂安对这盼望已久的时刻，当然也是求之不得。当埃尔维拉意外地发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无可挽回。

同克里斯蒂安的那次对话一直使她不能忘怀。埃尔维拉在绍依曼斯库太太的默许下，把克里斯蒂安叫到自己房间，说是要给他看几本书。但两个人到了屋子里，她却坐

在床上，羞答答地笑了笑说：“我只是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呆一会儿，不是为了别的。要是你不高兴这样，或者有别的约会——那么，就把这本书拿走，去干你自己的事。”

“我想你还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他迟疑地说。眼前她的举动，使他有些昏昏然。只需要闭上眼睛，再向前走上两步就够了，马上会重演在旅馆里克里斯蒂娜房间里发生过的一幕。同样是一股不可抑制的冲动，他毫不怀疑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只不过这时他连挪动一下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忽地发觉，竟连房间也同那时的一模一样……

她犹犹豫豫，慢慢地从床边站起身，随便抽出一本书，然后走近他：“我是想向你求婚！”她试图开句玩笑，但不容他回答，便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就这样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象互相溶化在对方的身体里，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后来，他们谁也不愿抬起头来望望对方的眼睛，因为那时候将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于是两个人任凭这种又喜又惊、盲目而无法控制的状态，无止境的继续着。两个人好象被罩在一幅黑黑的幔布之中，在一片漫无边际的空间里，颤抖着，以无法抑制的激动，互相寻找又互相推斥。当克里斯蒂安感觉到她眼泪的苦涩味道时，不由得身体一震，而她激动得几乎忘掉了一切，在他耳边轻轻地低语道：“你还等什么呢？”

“不，不能这样，”他用刚刚能压抑住的惋惜声调回答说，“我不能把整个的心都交给你，我知道对我来说你意味

着什么……这我考虑过很久……”

“我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应该冷静地、理智地考虑考虑，我真可怜。”埃尔维拉感到受了侮辱，她理了理裙子，把书扔在床上，气呼呼地把他一个人丢在房间出去了。

自打这次以后，对埃尔维拉来说，克里斯蒂安已经不存在了。她对任何人也没作过任何解释，她巧妙地装作看不见他，或者尽量躲开他，就象两个人从来就不认识一样。其实，克里斯蒂安也尽可能不到她们家去，他约丝苔拉在城里会面，回来的时候只送她到门口。丝苔拉也看出他和埃尔维拉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因此只有当她肯定知道姐姐不在家时，才请他进门。后来克里斯蒂安结婚，只有雷德曼感到意外，他原想克里斯蒂安事先会告诉他的。他也看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他知道，克里斯蒂安对他从来不隐瞒什么的。在巴黎他曾经几次帮克里斯蒂安出谋划策：起初他极力为克里斯蒂安和克里斯蒂娜撮合，等到克里斯蒂娜抛弃了克里斯蒂安之后，他又挑起克里斯蒂安对这个女人的怨恨。而这一次，克里斯蒂安感到无须别人帮忙，所有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意外的情况。他觉得内心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自得。

他们婚后不久，埃尔维拉也结了婚，也是跟一个大夫。但只过了几年，她丈夫便去了瑞士，他曾多次写信让埃尔维拉也到那儿去，但埃尔维拉根本没给他回信。一九五六年，他作为外籍公民回国时，埃尔维拉拒绝接待他，也不

想同他见面，尽管他们两个谁都没再结婚。正是在她们家最困难的时刻，他离开了她；即使不是这样，埃尔维拉也决不能容忍他竟敢独自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由于他的原因，埃尔维拉没能在大学继续她的学业，于是便专心致力于研究。时间不长，埃尔维拉便成了一个为人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名字。当克里斯蒂安作抗癌药试验，向斯皮尔曼要求一名精通业务的助手时，后者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埃尔维拉·波台兹："她是我们最好的研究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个长处：体态风度保证讨人喜欢。"

安德烈还没下楼来，还不到时候，每次解行李总是少不了他的。现在，离开了看见那个人的房间，绍依曼斯库太太应该感到安全了，雷德曼引起的这场惊怕应该消除了，特别是埃尔维拉对雷德曼是完全熟悉的。埃尔维拉仍然在窗口站着——雷德曼，即使在那时也从未使她感过兴趣，她觉得他太没主见，太烦琐，太缺乏丈夫气概，她所希望得到的男子，在雷德曼身上，除了颌下的胡须，其他什么也没有——她的眼光使教授感到十分不自在，他无法停下脚步，只好沿着街继续往前踱去。他觉得在她面前倒没有任何自责的理由，只不过羞愧与不安还象当时那样的恼人。而且自己的年龄，她周围环境给他留下的印象，又给这种无名的混乱感情增加了几道可笑的色彩。

从埃尔维拉回溯往事的方式，在一些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态度，他看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在她身上引起的反响，不由暗暗谴责自己当初不该认识她。在巴黎，在那预示着

将要爆发一次战争的混乱不安之中，他曾惊异不解地对克里斯蒂娜说："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要把我的生活颠倒成这个样子？"灾难即将降临的预感，不但没使他的头脑清醒，反而使他越加发昏。政治又不知不觉渗透到他的心底，而克里斯蒂娜在这方面仿佛更推波助澜。她就如同是战争与和平，怨恨与热恋，沉沦与惊怕的混合体。

同样，埃尔维拉还象暴风中在他头顶盘旋的一只鸟，一直使他惊惧不安。也许作一下解释会卸掉重负，但他没有勇气，也没找到恰当的机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好笑：如果她并没感到有这种必要呢？如果再触到她的痛处呢？一个念头似乎稍微减轻了一下他的不安："是不是我把事情看得太重了呢？"当然，他并不是一直放不下这些事情，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就仿佛突然被同他撞个满怀的人惊醒，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事实上他一直在躲避雷德曼，他觉得与其客观冷静地去分析这些事，倒不如不去想它。但如果终究不得不去分析的话，他的自尊心会使他小心翼翼地绕过障碍，进而得出与他极力想避开的东西相比更令人愉快的印象。

他记起了奥泰斯库教授的遭遇。这是他药物系的一个同事。他同朋友一起喝了个通宵，喝完后的第二天早晨①，简直不敢回家去了：他晓得回到家妻子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他妻子当初是个演员，多少也有点名气。后来，由于他不

① 原文系德语。

能容忍这么多男人同她接触，慢慢地，年龄也不再允许她继续这个职业，于是便留在家，做了家庭主妇。奥泰斯库越是怕回家，喝得就越凶。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便从公园里偷了一大束玫瑰花，打算拿回家去堵一堵妻子的嘴。他家宽敞的客厅里，摆着别人送的各种各样的礼品，简直象个小小的奥泰斯库博物馆。其中女主人做演员时的半身塑像，出自维也纳一位雕塑家之手。这位美术家曾给奥泰斯库太太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见到太太的半截身影，这位布朗诺维茨[1]大师的门徒急忙献上了鲜花，“太太”自然并不伸手来接，脸上不挂一丝笑容，只是冷冷地毫无表情地望着他，多少甜言蜜语求饶的话，也丝毫无济于事。奥泰斯库情愿被责骂一顿，她这样不声不响，更使他难于忍受，直到拿花的手也痛了起来。而奥泰斯库太太却一反常态，依旧直着眼睛瞧着他，这位并不出色的教授先生[2]一气之下把花扔在她面前，骂了一句“就该当这样！”[3]对于他不顾刺伤手指，冒险到公众场合偷花，对于他献花时的恭敬姿态，热情语言，她竟无动于衷。使他更加吃惊的是，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在耀眼的灯光下，这才看清出来的是真的奥泰斯库太太。她见他跪在地上，骂了一句“搞的什么蠢事！”[4]但看到塑像底座下的鲜花，却激动得立刻原谅了他，而且就象青年热恋时期那样对他温存了一番。奥

---

① 奥泰斯库学习时的德国老师。

②③④ 原文系德语。

泰斯库没有放过时机，第二天晚上按照他的同事瓦西列斯库教授教给他的那样，又酒气熏天地①回了家。

其实克里斯蒂安的情形，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心里明白，埃尔维拉是不会、也没有理由对他微笑的，尽管他希望她能这样做。也许他自己的形象，在她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了。在大门口，不管他怎样极力装作没看见，雷德曼却迎了上来，当然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会面。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他觉得自己同奥泰斯库一样可笑。“可到底我为什么要躲着她呢？”他用尽可能平静的语调自问。他清楚地感觉到，对往事的回忆，遭受过的痛苦，并没有使他伤心，而他甚至把受到损伤的自尊心，对没有认下自己朋友的悔恨，也都丢到了一边。使他不安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竟表现得这样坏，丝毫也不比雷德曼好多少。仇恨弄昏了他的头脑，他竟会这样粗暴，这样野蛮，尽管说对待这样的人该当如此。也许雷德曼已经赎回了自己的罪过，已经重新做人了。即使不是出于悔悟，那么，影响如此之大的癌症，也会促使他反复考虑，结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以另外的眼光看待自己。也不能排除一旦抛却了怕字，他还会原形毕露。“我当真原本就是这样粗俗吗？其实我对他的态度也并没什么了不起．说到底，他并不是值得我这样对待他的一个人。”他反复思忖着，自我解释着，实际上只不过暂时掩盖住了一次新的精

① 原文系法语。

神爆发。其实，他明白这一切大惊小怪都是多余的。由自己引起的事情，得出并不相称的结果，而对心灵的啃噬，比事情的结果来得更为严重。这样的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他什么事都不喜欢中途罢手，就连感情也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尽管这些并不是靠语言来表达。

“无谓的神经过敏，”他一边想着，一边脚下加快了步伐。忽然，他发觉自己走进了一群人中间，就这样不声不响跟着大家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反倒觉得怡然自得：仅只是体力在活动，这使他十分满意。周围连成片的人群，就仿佛是能把天空的雷电引到下面去的大地。但遗憾的是有个念头迫使他不得不转回身：安德烈如果发现他不在门口，一定会离开，这样他便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或者到处去找，甚至会找到埃尔维拉那儿。“然后呢？”他忽然这样自问了一句。

这一天的事情，什么都没结束，他记不起有任何一件事是做得使自己完全满意的。也许只有一件，那就是同考德里亚努谈话时比较谨慎。不管发生的这一切是如何的身不由己，但他感到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卫地位，来对付那些来自自身的无情攻击。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一天竟同他整个的一生是那样相似。“然后呢？”他感到已经没有能力作出任何决定，已经耗尽了精力，他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打发飞速流逝着的时间。“我简直精神错乱了，全身关节也都失灵了，应付不了这么许多。到最后，我的理想将不再是给人治病或者研究这倒霉的抗癌药，而是想偷到一丁点儿

安静。这么多想法里……现在只剩下需要安静这样一点儿了吗？”当他发觉这种印象并不是眼前这一困惑时刻的结果，而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得出的结论时，感觉再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到实验室去：周围的世界，对往事的回忆，统统隔在墙外，在这儿他能够重新变得冷静、自信，而且实验动物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因素：这些已经致病的生物，迫使他不容迟缓，迫使他不仅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内疚，而且也感到同这些短暂的生命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只不过实验室的事进行得也并不顺利。倒不是因为工作进展缓慢而使他沮丧，而是那些惹人烦恼的匿名信。近来发现的匿名恐吓信竟越来越多，有一些有这样的内容：“你是要找我吗？我来了。快去照个肺部X光片吧，癌细胞已经在你体内开始扩散。”“趁现在还没揭穿你的罪恶历史，你应当尽早离开教研室！”另外一些，看不懂意思，但却使他回忆起战争时期使用过的语言：“不是所有的街上都长菊花。”此外还有从色情杂志上，祈祷书上，果亚画集上剪下的照片，或者报纸上剪下的标题：“只是石油荒和纸荒吗？”教授把这些都细心地收集起来，故意拿给他的助教们看，暗地里想观察一下人们脸上吃惊的表情。但使他不解的是，这些匿名信为什么竟形成了规律？究竟他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

匿名信预示着将要发生令人不快的事，将要搅乱他有规律的生活，而且慢慢地在他和其他人中间筑起一堵无形的墙。他对周围的人逐个进行了分析：杜米特列斯库和约

尔卡大夫可以排除。但弗洛拉副教授呢？尼古拉大夫呢？尼古拉吗？有点笨，可心眼并不坏，不象是干这种事的人。尼斯塔吗？有可能。从头到脚都是那样虚伪，内心奸诈却又想表现出谦恭，善于阿谀奉承。喜欢谄媚的人，决没有好心肠，这样的人比那些一切都外露的人，心地更险恶。

“以后呢？”象每次老太太来过之后一样，再重新把娱姆请回来。然后，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呆着。特别是对安德烈已经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今天，不论对他再说什么，都会意味着为自己辩解。“真见他妈的鬼，”他愤愤地摆了摆手，“只有上帝才知道……”但从另一方面，从与儿子的现实关系中，他又感到有一股难言的苦衷：安德烈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但随着儿子的逐渐成熟，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越发加大了。他对儿子的关心，特别是丝苔拉去世之后，并没有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更融洽，单调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丝毫也无助于填平他们之间的鸿沟。克里斯蒂安更多关心的是儿子的科学发展方面：体力究竟如何？智力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能不能用心学习等等。而安德烈在这方面并不讨他喜欢：沉默，冷漠，拘谨。他既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有什么越轨行为。尽管如此，教授在儿子身上还是感觉到了某种不如意的苗头，迫使他不得不断定，他们之间的心理状态无法协调，而要减缓或者消除这种不协调，只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儿子能够理解他，能够正确地作出评价，而不需要作任何解释。这孩子太象他的妈妈，克里斯蒂安完全料得到，如果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

的事，他会作出怎样的回答。丝荅拉从不参与他自己热衷的事，或者说他得出的印象是这样。有时问起她，为什么一言不发？她会下意识地回答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我喜欢这样吗？我有我自己高兴的方式，这你是不会理解的。"

"他现在尊重我只不过作为一种义务，作为对长辈应有的态度，而不是象对真正的父亲那样。"克里斯蒂安不觉有点伤感地这样想。但情况能维持住现在的样子，他也只好满足于中午同儿子一起喝杯咖啡，问一问功课、分数，钱够不够用，有时间接问起一个叫伊丽娜·约内斯库的护士。这是一个比安德烈岁数大的离了婚的护士。据教授所知，安德烈简直有些"病态"地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克里斯蒂安同她谈过一次，不客气地暗示她，最好不要走得太远，但并没产生什么效果。只要儿子情绪是正常的，开朗的，他觉得也没必要再进一步进行干预。"要是这个女人做得太过分，我来对付她。"

事实上，教授对她的过去比儿子了解得更多，看来是儿子轻信了她的话。当她丈夫提出离婚，说她嗜酒过度，每天百十杯伏特加，晚上还要四瓶啤酒加罗姆酒时，伊丽娜曾企图自杀，后来用急救车把她送到了医院。那天正巧克里斯蒂安值班，对她进行了抢救。由于她属于本院医护人员，教授曾几次到她的病床，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走这条绝路的。她说她头痛得要命，而给她检查过的大夫都异口同声地说她这是在为自己开脱。而克里斯蒂安

却并不这样认为，耐心替她诊断，结果发现是脑膜炎。这样一来，才改变了别人对她的看法，但并不包括她的丈夫。她出院不久，她丈夫仍是最终离开了她。由于精神无所寄托，她这才到处寻求刺激。特别是她不愿呆在家，那儿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涂了绿漆——这是她原来的丈夫喜欢的颜色——甚至连灯泡也都染了颜色……

教授不知道安德烈是怎么认识她的，但他可以断定，绝不是安德烈首先采取的主动，而且这件事的结束也不会取决于他。不管怎样，这对他的身体倒不致有什么损害，但对他的心理却不敢这样断言。

而尤其使教授放心不下的是另外一件事：尽管安德烈是个好学生，得满分的学生，但却没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对任何事都缺乏热情，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当然，教授很想为他未来的科学事业铺平道路，但觉得"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看起来他有些规矩定得太过分了。"而现在，又不得不坦率地自责："事实上我有多少时间跟他呆在一起过？又对他有多少了解呢？"

教授一边责备着自己，一边低下头躲着地下的水洼，思忖着怎样才能解脱这困惑的一天。忽地，象一股和缓宜人的春风，脑子里闪出了什么，但这个脆弱的想法立即被脚步声，被希望碰到安德烈的念头驱散了。其实安德烈正在房前等他，见到他却一声没吭，随着他父亲走了。面前，一只黑色的小狗，也许刚刚从汽车轮下逃生，翘起一条腿，一瘸一蹦地，不时用惊恐的眼光回过头来看他们。教授不

觉生出一股怜悯之情："也许我们还能再见，或许哪个捉野狗的，有一天会把你送到我这儿来。"

他们慢慢地走着，各自都为同对方在一起而感到不自在。他们怀着打破沉默的念头接近，然后又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象陌生人似地分开。忽然，教授惊诧地停下了脚步："不好，他们是刚刚开完会，我可没这个兴致……"他远远瞥见波赞教授，接着是瓦西利乌和克列楚，他们身后是一些青年教师，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你为什么没去呢？"安德烈对父亲急忙向他做手势让他往回走感到有些不解。

"我忘记了，或者说不高兴参加，我也弄不清。我可没那个耐性，没那个气力去蹲椅子。见他的鬼去吧。总是什么严肃的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或者说偶然想到过没有，我眼前还剩下几年的时间？"教授忽然非常严肃地问道。

"没想过，"安德烈避免正面回答，"也许正是因为还有很长时间。"

"是吗？你这样认为吗？我可没这个信心。"

安德烈并不怀疑父亲的真诚，有时他也曾想到过父亲这样岁数的人对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他从未考虑应当怎样回答，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时常用这样一句话敷衍过去："一切听天由命，没有别的办法。"但这些毕竟并不能使自己感到满足，而事实上对这类问题他确实没有认真地探求过。想到此处，他不由轻轻打了个寒战，一股冷气钻进脊

椎，眼睛也仿佛盖上了一层难以忍受的雾气。

“有些人专门善于谈论需要啊，未来啊，但脚踏实地做些实际事，却好象没有他们的份。一百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们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对今天的现实他们却毫不关心。你想得出谢尔班开的这些会是怎么回事吗？——好，我们来谈一谈未来吧！”

“你相信会是这样的吗？”安德烈找不到恰当的词，呆呆地问了一句，幸好他父亲没有听到。

“我还解不开细胞的谜，研究不出抑制血小板活动的办法，我还要继续我的外科手术，可时间不等人……现在我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精力。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最严重的病不是癌，而是传播愚蠢、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的病……”

“那么你在这方面为什么毫无作为呢？”

“我已经变得自私，安德烈，或者成了虚无主义者。我曾经做过几十年的努力……但最后可以说毫无结果……”

在他们身后，贴着人行道，一辆奥培尔小汽车渐渐放慢了速度。一声“你好啊，教授先生！”使克里斯蒂安不觉一怔。他顺口答了一句“你好”，准备继续走路，但回头一瞧，不成想却是考德里亚努教授。

“我送你们一下好吗？”考德里亚努问道，“回家还是去医院？”

“谢谢，不用了，安德烈在训练我走路呢。”克里斯蒂

安开玩笑道。

“今天大家等您了。”

“我不在，谢尔班成了主角，不是吗？”

“有那么点儿。”

“随他去吧。的确，我是有点不合群，可要是我回答了他，他还以为我拿他当回事呢。”

“我们约定的事还是算数的吧？”

“就算那样吧。”

“那太感谢了。”考德里亚努说着，发动了汽车。安德烈很不喜欢“约定”这个词，他目送考德里亚努的汽车插进长长的车队行列。

“就该让他带我们回家。为领导干事成了他的专业：不是开车送他们去钓鱼，就是给他们弄酒，有时候还替他们买圣像……人们都叫他‘黄包车夫’。当然，他干这些事可不是白尽义务，总会有点目的……”

如果在以前，教授听到这样嘲讽的话，会立刻申斥几句。但他本身对待雷德曼的态度，迫使他不得不斟酌一下词句：“你不觉得这样不太礼貌吗？”教授说道，“考德里亚努还年轻，我们也应当通情达理一些，我们怎么知道他究竟在做些什么呢？还需要看一看。”

“问题是为什么人做，”安德烈讥讽地补充说，“他参加的各种委员会，要比他发表的论文数目多得多。”

“不是每篇论文都能推动科学的发展，要发现点新东西远不是那么容易的……谁也不可能生活在密封罐里……

当然，我承认对于他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并不感兴趣。我并不是没有人的感情。我反对那种对自己的过失、毛病遮遮掩掩的人，反对那种极力隐藏内心世界的人。我们大家都有缺陷，安德烈，就这一点来说，造物主是最大的浪费者，它不管材料，不计时间，为了造出合乎质量的东西，不知作了多大消耗……看待事物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好与坏只不过是一种习惯上的感觉，有时候二者的含义会完全相反。总之，一切都取决于你为什么而生活。”

“考德里亚努的经历，是一系列的巧合，非常走运的巧合。”安德烈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但父亲却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呢？”

“碰巧他同原来的系主任的女儿恋爱，结了婚，作为陪嫁的礼物，他岳父把论文审查组主任的职务给了他。”

“简直荒唐。系主任的女儿，就算长得丑，难道就不能出嫁了吗？”

“教父主婚人当中一个是院长，一个是市长。当市长的从来就小气，只给了他一所别墅，当然化的是国家的钱。”

“一个高等学府的干部，居住条件好一些，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可为什么他的一个教父，考副教授的时候故意跟别的参加者为难呢？”

“你知道这些话叫做诽谤吗？”

"随你怎么说！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他向我们贩卖那个绰号三只皮靴的门卫那套生意经?"

"这些你是从哪儿知道的？简直让我吃惊。"

"可惜，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如果你排除我也有发现点什么的可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传染学。当然，这些不是从你那儿得到的，你是够谨慎的，每次跟我接触以前，脑子里先得消消毒，可你知道，对某一种人的讨厌情绪，就象常到公共场合会得感冒那样，很容易传染上。"说到这儿，安德烈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但他觉得，这是对他父亲忍耐力的考验。由开始的不解，到而后的愤怒；尽管还没谈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但他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火山爆发，于是便设法使气氛和缓下来，他知道如果再火上加油，他父亲又会象原来那样板起面孔，不通人情。"你，爸爸，"安德烈接下去说道，"是以同事的身份在为他辩解，你的论点是，对于学生来讲，老师就是圣人……"

"这要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在使用某些词以前最好先给这些词下个定义。"教授感到有些恼怒，今天一整天他几乎都处在一种防卫的地位。

"你对同事，我觉得并不那么感兴趣，你关心的是你的科学，而不是人，所以你才能这样超脱。你看什么问题都是把自己放在一种局外人的地位……"

"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无所谓的小事，是不会把你整垮的！"

"我不明白！"克里斯蒂安怔了一下，极力压住没有说

出口的不得体的话。

"你把全部情况都摊开跟他讲明白，这对你又有什么妨害呢？不只是他，你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应该这样做，可你们偏偏都憋着不讲，听任这种毒菌蔓延孳生。你是个大人物，可以这样自信！"

"我感到很惭愧，"教授象是在实验室或者远离祖国的地方，面对着想象中的安德烈的形象自言自语道。"我没教会你透过表面现象，看出在人们相互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你想过没有，哪怕是偶尔地自问一下，这一切究竟应该由谁来仲裁？"

"这没什么要紧。如果说，过去你为真理遭受了不幸，那么现在还能够为它忍受下去。需要保卫的和应当发现的真理，并没有同恢复你的权利而一起告终。不然的话，过去发生的不幸，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偶然的事件……"

"象我这样的年龄，"克里斯蒂安更多是说给自己听，"更感兴趣的是科学领域的真理，因为它不需要选票。你以为我如果大声说出考德里亚努是怎样一个人，我自己就会得到什么吗？"

"会得到很多，非常多。"安德烈十分高兴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终于激起了父亲的感情。

"有些人学会了作所谓'揭露性'的记录，把那些属于个人之间的争论偷偷记下来。为此，他们到处用心打听，特别关心那些历史性的情况，编造或者臆想出许多个人感情中隐藏着的东西。一切都在事情没开始之前，就得到了

悲剧性的结局。接着，这些好心人便起来支持受害者，就仿佛自己直接受到了侮辱。学院里的关系简直太复杂了，现在你还没法理解。”

“你说得未免太过火了吧。”安德烈说道，“不会没有人出来讲真话的……”

“你是把怯懦叫做聪明吗？随你有多勇敢。”教授接着说，“要是你有这个热情，在我退休前的这几年，或者说，在我还能做点研究的这几年，我可以全力支持你。”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我自己不是独立存在的吗？”安德烈不免有些生气，但一看到父亲平和的目光，又软了下来。

“我不否认，上帝作证，别人也许会以为我是在通过你的嘴来说话。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是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思。自从你入系上大学以后，没有一个同事，哪怕不是郑重其事的跑来对我说：‘瞧，你的儿子学得真不错，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没办法不给他打满分！’当然我相信，你的分数没有一门是靠别人的好意得来的。说起来我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为情，你每考完一门功课，我就到他们那儿转来转去，想听一听这类的话。我知道这对于我会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可不少人却都向我暗示，他们帮了我的忙……本来我不想对你讲这些，可话既然说到这儿，也只好把它讲完。如果你能够理解，外表看到的同人们的内心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也可能不会怪我有所保留，允许我至少在跟我有关的一些事情上，告诉你怎么做更好一些。”

“是啊，爸爸，要我变得适应环境，或者能够适应环

境，这并不难，”安德烈口气生硬地说道，“可是，我的上帝，这种关系怎么会这么荒唐，这么没道理，就象我们两个，整天在一个盘子里吃饭的人，却一点儿也说不到一块呢？”

一股无名的悲哀涌上教授的心头：这么多年来，有过多少对美好日子的向往，对痛苦和烦恼的怨恨，直到今天才突然停在一面橱窗前，平心静气地注视着，自己头脑里想的一切是怎样在里面摆设出来的。

“造成这种关系并不是我的罪过。跟我有关的事，无非是给人们下诊断。事实上，这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得到一点自信力，或者说一点安静。因为你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他得出这个自然而天真的结论之后，确实有些激愤：“我需要这样，如果……”说到这儿他已无法继续下去。他还不相信能够同儿子进行这样的谈话，还没有这个把握：安德烈表现得不那么正常，但他不知道儿子究竟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他用的那些词究竟是什么确切含义。而且，当他以温和的眼光望着儿子的时候，安德烈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一种挑衅性的优越感，以致他不得不自问：“我竟至表现得这样委屈吗？”

“孩子，”然后他用一种近乎羞怯的声调说道，“我不知道该让你怎么理解我，这很难，可是我总觉得……怎么对你说呢？有一种可怜，一种厌烦的感觉，这你没办法体会。我简直想逃跑，想让自己分解掉……当然，这种感情显得可笑，这我不是意识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没有别

的办法……我不该对你说这些，你看，我已经超越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超越了什么……好象有时候我遗憾自己为什么会说话，为什么不象一件家具那样不言不语……或者……”

“哦，爸爸，我们去喝点什么吧。”安德烈对提出这样的建议感到有些不好意思，“麻酥酥的，挺舒服。”

“你也上酒馆？”克里斯蒂安有些吃惊。“要是我的病人看见我……”

“我们找个高级酒馆，你的病人不能去的地方。”

“我真想象不出，”教授迟疑地说，“你，亲爱的，有时候还背着我喝两杯吗？”

“我倒没给自己定下什么特别的规矩，”安德烈避开直接的回答，“我知道一个顶好的地方，服务周到，不收小费，喝杯威士忌，舒服极了。当然，跟你一起，可能影响我的名声，但是同这样一位正正经经的先生一起进去，也许人们对我的印象比我预想的要好。可你年轻的时候，在维也纳，在巴黎，就一点儿嗜好也没有吗？或者是装作忘记了？那时候你可丝毫也没有书呆子相。”

“哦，”教授笑道，“可那个时代跟现在不同。我一想到父亲的小麦，用这换来的外汇，为我操的那些心，喝了酒也会卡在嗓子眼。遗憾的是当初你祖父给我的那些信分错了地方，我没拿到，要不然你也可以受受教育……”

他们走进胡贝尔酒馆时，一个高个子、黄头发的招待员看到安德烈，用手指弹了一下口袋，显得意外地高兴。

而安德烈急忙迎了上去：

“别开口，见鬼的，我是跟老头子一块来的。要是让他看出我常到这儿来，我的名誉就全完了。烟给我留一下，冬赫尔牌是吗？现在你过来，有礼貌点儿，不然会坏我的事。”

“对不起，安蒂少爷，我哪儿知道呢？”招待员惶惑地道歉说，“怎么，是你的老头吗？看上去岁数不大嘛，对这些事应当明白。”他忽然发觉说话太随便了，立即接口说：“伊丽娜太太没到这儿来，西线没什么新消息。我会象招待阿尔弗烈德二世[1]那样招待你。给老头弄瓶酒，保你得用出租汽车把他送回家。”

安德烈转回身，走到父亲跟前，感到有必要作一番解释：

“是中学的一个同学，他没想到会在这儿看到我们。是个好小伙子，只不过有点爱唠叨。这样省得你再跟他啰嗦了。他有点爱动感情，至少在中学的时候是这样。”

“我真不敢相信，你还会跟一些招待员有来往。”教授含含糊糊地说道。“你现在也吸烟了吗？”他用平和的口吻又问了一句。

“烟嘛，只是没事干的时候偶尔吸一支，倒不是有瘾。”

克里斯蒂安毫不掩饰地集中起注意力巡视着全厅：几伙青年人，紧紧地围在一只葡萄酒瓶子周围。一对青年男

①　中世纪英格兰西撒克斯国王。

女，陷入忘乎所以的激动，紧紧拥抱着长时间的亲吻，就仿佛要创造一个接吻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总该规矩点儿，”教授替他们难为情，这样说道。“你认识他们吗？”

安德烈诡秘地笑了笑：

“不过是做他们能够做的事。让他们到哪儿去接吻呢？他住宿舍，她也住宿舍，晚上大门口还签到登记……总之，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再说，怎么叫不规矩！难道一切手续都齐备的坏事，叫做规矩吗？我们步行只要走上一公里，就会让你看到至少十对这样的情况，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

“公众场合总应该有点羞耻感，回避一下别人……”教授说道，“这样的情况我理解，可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多么文明。怎么说呢？跟我无关。其实你坐下安安静静地想一想，每一件丑事，不文明的事，不公正的事，都可以重复这句话：‘跟我无关！’可如果毕竟是跟你有关的事呢？如果你被卷入一场逃脱不了的纠葛，无论如何你会浪费掉难以计算的时间，无谓地消耗掉精神和精力。”

“这么说，”安德烈总结道，“考德里亚努也打扰了你，可你并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重要的对手。是不是因为他能给你安排一定的时间，某种程度的安静？”

“我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件事，”教授有些生气，“而且，遗憾的是跟你也没法一起认真地分析，因为手头不掌握必要的材料。”

“当然，”安德烈接口说，“好人不参与，坏人没兴趣，那么，我们就只好沉默——可他们却把我们当傻瓜，高兴了可以往我们头上撒尿，或者高兴在哪儿撒就在哪儿。考德里亚努是个骗子，野心家，如果由他这样下去，就等于对一切都丧失了信任。而你对他的态度反而这样好！”

“你还没资格对我进行评论，”教授口气生硬起来，“我实地参加过斗争，到过前线。当然，你认为我没有什么怕丢掉的，岁数已经这么大了。也可以算一种看法。可是我要求得到的安静呢？经过了这么多事——这当中的滋味你是理解不了的，我只要求一点安静，难道这也过分吗？”

教授的语调里含着一丝悲哀，就象秋末刮起的一股萧瑟凄楚的凉风。他到这儿来毕竟是作了让步的，但安德烈却并不理解他的意图：“也许父亲远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坚强！”

教授继续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青年：

“我的上帝，”他说道，“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想起来简直吓人。那时候你妈妈也象这些姑娘这样年轻，这么单纯。她是那么文静，那么安详，有超乎寻常的耐性。当然，这些你是无从知道的。她等了我这么久，天天给我清扫工作室，擦拭书籍。她把东西都卖掉了，唯独书没有卖，明白吗？一本书也没卖。那时候我那些书还是很值钱的，卖了至少可以象样地生活一段时间……可是，谁又想得到，正是我们日子好起来，正是付出的代价应该得到报偿的时候，她却离开了我们。癌症，该死的癌症……直到最后一

刻，她都是那么坚强，这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的。那时候我答应她，一定要攻下这个难关。可是，也许因为没有天分，对这么多的癌症，我竟没研究出一种办法。我感到这么孤单，有时候甚至觉得孤独，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废物……我真想忘掉她那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忘掉她那一张苍白憔悴的脸，她连跟我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向我无可奈何地、鼓励似地微笑。后来……那种疼痛没法忍受，连吗啡都无济于事。好久好久，她一句话不说，我眼睁睁看着她那咬出血印的嘴唇，心里实在受不了。我真想自己也受这么大折磨，自己狠狠地用鞭子抽自己，好让她明白，我完全理解她的痛苦。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克里斯，别再抱什么幻想了，多给我一点吗啡，我只求你做这么一件事。这完全合乎情理，为的是别让我再受这样的罪。都是我不好，可我再也不愿意这样继续下去了……''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回答说，'你应该相信，再坚持一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奇迹。'我拿去一些杂志，装作偶然忘在她那儿，上边有不少使人乐观的统计材料，一些已经投入使用的抗癌药广告。我假造了一些化验单、X光片检查结果拿给她看，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丝毫也无法减轻她的疼痛。有一次，我正给她准备吗啡，她问我：'你弄好了吗？现在吗？'可我没勇气这样做，我想要她活着，哪怕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这样一个只相信科学的人，却不得不求助于出现奇迹。可怜我把希望，整个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毫无把握、近乎荒诞的假想上。我告诉她，我还有一

种新的抗癌药，但这要等……后来我才发现，这样让她受折磨，实在太不通人性，于是我故意把针管和几针吗啡丢在她的床头柜上，就象是偶然忘在那儿的一样。但看来她连给自己打针的力气都没有了。一瓶药针放在身边，她就这样睡着了：她打碎了药针的瓶口，但能够做到的只是这么点……怎么搞的，我怎么又跟你提起了她。也许以后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聊聊。痛苦能使人变老，它会强使你接受某种观点，强加给你某种不可避免的前途。不幸的是，你妈妈的死仅仅是许多痛苦中的一个。只要稍微现实地想一想就会明白，除了最亲的亲人的死，再进一步无非是你自己的死。也许过不多久这一天就会到来的。在这之后，我相信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叫考德里亚努，还是什么别的名字的人了……”

“我们再喝一点吧。”安德烈为自己的感情激动而觉得有些局促不安：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以前他对父亲的印象到底是怎样的呢？一堵把他们隔开的无形的墙，使他难于忍受。而当有可能拆掉这堵墙的时候，他不希望再是这样捉摸不定。他以前对父亲的想象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的形象却与以前的想象完全不符：父亲不过是个可怜的、谨小慎微的、感到疲倦而且充满伤感的人。

“不，”教授仿佛被惊醒了似地说道，“也许回家以后，等你有了工夫再一起喝个够。可你知道，我可不是个好酒友。有时候喝酒是为了忘掉一些事，不是为了回忆起它。可我一喝酒，脑子反倒越发清醒。象我这样的年龄，饮酒

过量，将来你上课会学到，是有害的。”

“现在不是什么过量不过量的问题，”安德烈继续坚持。他知道象这样跟父亲深谈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只要自己感觉没什么，就不要紧。至于说到年龄，我看你未免太夸张……你还年轻得很呢……”

“可惜，”教授苦笑了一下说，“一个人的年龄不是非得按日历上的年份来计算的……挫折、劳累是一回事，要生活下去的愿望是另一回事……而且，”他用一种伤感的语调继续说，“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好象对我异乎寻常地关心……也许我自己的样子显得让人感到奇怪……”

“你干吗去管那些？”安德烈有些气不忿。“我不明白，某一个人的意见，你为什么一定拿它当回事呢？要是我换到你的位置，只要一个礼拜，就会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怎么做呢？”教授显得很感兴趣，“你相信能成吗？我对天真的年轻人一向是赞赏的，最好你能够永远保持这样。至于我，可惜没有这个权力……你要想喝，每人再喝上一杯就走吧。现在不是再从头谈起的时候，而且也没什么益处……”

“也可能，”安德烈咕哝道，“我也想好好跟你谈一谈，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教授没有立刻回答，他上下打量着儿子，不由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地自问道：“让我从什么地方谈起呢？从哪一部分开始呢？简直愚蠢。你责怪我是因为对我不了解，可

我却不能够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不愿改变你的想法，你应该自己得出结论。”

安德烈还在等着父亲的答话。“我不该这样坚持，”他心里暗暗责怪自己，“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已经疲倦了，受不了了，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了……他唯一的过错，是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可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东西。父亲已经从人们中间体面地告退，打着一个美妙的借口：没有时间！问题是，是不是真的没有时间，还是认为……当你对他还并不十分了解的时候，很难下什么断语。”

房间里烟雾腾腾，望不到边际，连四角的墙壁也分辨不清。只有散发着酒气的女人挑逗性的尖笑声，在屋子上空回荡。

“我是想让你弄明白，”沉默了好久教授终于开口了。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句，不自觉地摆弄着两只手，“我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安德烈，我不是什么大学者，不是什么大教授，只不过是个好的外科医生，好的大夫，就这些。我知道怎样隐藏自己的痛苦，掩盖自己的缺陷……你应该顺着这些方面去思考。我是一个恢复到本来面目的普通人。当然，如果把对你说的这些都公开出去，那无疑是荒唐的。我宁愿做个伪君子，我必须把这样的角色继续扮演下去，继续这样虚伪。我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并不光彩的原因：我不相信别人能够理解我。我鄙视他们，但不是从这个词的本义上讲，就是这样。我还要告诉你，要是没

有你，要么我会感到没指望，要么我会感到幸福。没指望因为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已经无所谓，剩下的只有我孤身一人。而幸福——完全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候我自己想，干吗只有我们一定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点什么呢？没有我们的想法，没有我们的努力，一切还不都是照旧！但这种努力毕竟有它的乐趣：想要打破未知的大门。而你呢？我不象有些家长那样，恨自己无能，想通过儿子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我还是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医生，能在什么地方得到个博士学位……原先我还想教你作研究，可你是那样的固执……你知道，人们总是把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要说我们互不相关，他们决不会接受，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我有个什么错误，人们也会两眼注视着你。这些你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你没走过这样的迷宫，但是……我不喜欢枉费口舌。怎么，这些话还打动不了你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还不能立刻答复你，”安德烈有些不满地说道，“我理解你，可让我接受，这很困难……”

“说真的，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克里斯蒂安教授说道，“也可能我把世界看颠倒了。不过我觉得世上唯一干净的地方是实验室。有些事情你是无从体会的，你不懂什么叫做害怕，不知道过去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不了解一直渗透到肌肉里的那种思想麻痹是什么滋味：那时候你会屏住呼吸，恨不得立刻钻到哪儿藏起来。劳累，精疲力尽……到最后，连害怕也顾不得了，就剩下软瘫的身子。过一段

时间，又照样重新全部循环一遍。这么看起来，你怎么会不怀念只有四面墙壁，只同狗和仪器打交道的实验室呢？要不，如果你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你会想象出到某个地方，到高山，到沙漠，到卡拉哈里[①]或者喜马拉雅，到弗格拉什[②]去当个牧羊人或者普普通通的看林人……”

“你知道吗，爸爸，”停了一会儿安德烈说道，“我无权进行评论……或者说给你出什么主意。但我听人说过，最大的冒险，最大的不幸，代价无非是死。如果这一点……”

“你还不明白每个词的背后暗含着什么意思……其实我已经死过好几次，说起来有些怕人。可现在用不着作什么哲学讨论。”教授说着想站起来。

“爸爸，”安德烈阻止道，“我们好久没这样诚心诚意地谈问题了，也可能从来就没有过。反正我是很高兴，也许你会觉得后悔……”

“不，安德烈，一点儿也不。不过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有些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包含的意思不同……”

“我希望这样的理由，不要只限于这次谈话。”安德烈补充道。

“也许没有这次谈话会更好些，我会觉得更平静些，我是怕影响到你，把我的不安，把我做人的一些微不足道

① 南非半沙漠地带。

② 罗马尼亚中部山区。

的小事，也传给你。也许我搅乱了你的生活，你的想法。我是极力想让你看到，我是个规规矩矩的研究人员。可惜我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我没能得到我预想的结果——只不过仍旧在耐心地坚持着……拉里亚[1]说过，美国给那些最有意思的疯子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希望能从他们的大胆行动中得出什么新的东西。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我还想要说，年纪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度引以为骄傲的青春活力，躯体健美，渐渐地也会变为丑陋不堪，衰老委靡，甚至不得不吝惜付出的每一点精力，就象是沉船的遇难者，不肯轻易用掉身边的一点淡水那样……我已经不能够一下子完成几件事了……可是作为人，怎么说呢，……我也走过一段历程。我参加过不少学术会议，取得过一些成绩，有些甚至是不小的成绩。经过多少次失败、争论、反对，最后得到一张证书或者一个什么学衔。有些人眼睛巴望的就是这种纸片，他们一心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学问和成就，而是证书、头衔。其实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想要的是证书包括不了的东西。不用指望什么人会给你帮助，也不存在善心的救世主，更没有什么神奇的默契。你必须自己找到一种生存方式，找到一种支持。如果雷德曼这只幽灵不出现，也许我一句话也不会讲。不过这一切会周期性地重现，周期性地搅扰你的思想，搞得你不得安宁……”

“你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安德烈十分自信地说道，

[1] 米·拉里亚（1896—1964）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现在你不是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攻击。”

“呵呵，”教授笑道，“越是大人物，越是想要成为大人物的人，才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一片荒原上，即使一根电线杆，也会象喜马拉雅山那样，各处都看得到……”

“象你自己常说的，已经到了这个年龄，还怕有什么可丢掉的呢？”安德烈又随口问了一句。

“不怕，”教授语调有些低沉，“的确没什么可丢掉的……”

“这么说，那又有什么呢？”

“再喝一杯，咱们走吧。”

听到这句答话，安德烈不知道父亲又怎么了，又有什么事使他重新封闭了刚要开开的大门。

“人们干吗这样摇来晃去？还是我喝醉了？是啊，象我这个岁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教授表示理解地注视着那一伙大学生。“我象他们这样年纪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唔，就是这么回事。”他闭上眼睛，把头托在两只手掌里。他仿佛从高处落下来，眼皮后面，一道道光在不停地跳动，五颜六色，接着又碎成上千上万的小星。安德烈似乎不见了，已经感觉不到他在身边。教授觉得刚才的话毫无价值，说出来只不过为了平息一下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这种痛楚，仿佛只有大哭一场才能够发泄出来。

“向前，不停地向前，只有向前……一些人有勇气排除犹豫和不安，另一些人则陷入漫无边际的幻想……等待

……而日子却一天天平淡无奇地过去，忽地，你发觉只剩下了你孤身一人，到了道路的尽头，脑子里还装着一大堆找不到明确答案的问题。如果再来一个循环呢？是不是所有的蛹，都必得变成蛾呢？”

象纱幕一样的宁静，突然被一支歌声打破：

“万物的主啊大自然，
造就了厨师为你备餐，
裁缝做衣你有穿戴，
还有陶瓦匠，
做只尿壶你夜里多方便……”

“这是什么？”教授望着安德烈被烟熏红了的眼睛问道。

“开玩笑。是你们那时候的一支大学生歌曲……”

“我不相信，要不我怎么从来没听到过。”克里斯蒂安感到头疼得厉害，说着站起了身：“安德烈，我一个人先回家你不会不高兴吧？你可以多呆一会儿……”

“好吧，爸爸。”安德烈答应了一句，他知道父亲不愿再陪他了。

教授穿过腾腾的烟雾，匆匆向前走去，他觉得烟气是这样的重，就仿佛永远也走不到门口似的。他身后又响起大学生们的歌声：

“加把劲哟压水泵，

快把那水池抽个空……”

五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克里斯蒂安教授查病房迟到了，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他见到我们，同谁也没打招呼，就好象我们在这所医院里完全无足轻重，简直象是他庄园里不配同主人讲话的一群奴隶。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根本不理会大家仍然在站着。这是他蔑视共事的同志，轻视所有教授和大夫的新表现。事实上，就凭他那人所共知的历史，就凭他那很成问题的思想表现，根本没有资格升到现在的地位，这完全是因为他要弄手法，瞒哄了大家。这时候，尼古拉医生说道：“牌都憋住了，出不来‘一条龙’。”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理解“一条龙”这个词，但是我可以肯定，教授绝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比较困难，”普洛丹大夫回答说，“象他这样的年龄，往往容易滥用精力。”就我掌握的材料看，在男女关系方面，他同薇拉·班奈德斯库同志不清不白，几乎是医院全体工作人员都熟知的。我了解了一下这位女同志昨天一天是怎么过的，但我得到的消息是昨天她值班。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她是否忠于职守，是否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然后，我又问阿纳尼亚同志，那天晚上教授干什么了，他回答我说，蹭××玩儿了……真是罪过，这种不文明的字眼，我简直没勇气写出来。当时我就提醒

他，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真见不得他这种不正确的、在教授面前表现得象个奴婢似的态度。我没再同这位实验员继续谈下去，为的是避免出现新的不愉快的场面。然后，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说道："真见鬼，还是买不到好烟。"而普洛丹大夫态度比较正确，劝他把烟戒掉。而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却回答说："这由得了我吗？我没这个志气，再说，怎么死法合适，我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同志哪儿来这么多钱，有条件专门吸高级烟？要不是接受贿赂，接收小费，那怎么可能呢？而且，为什么他对怎么死法有选择的自由呢？国家出钱供他上中学，上大学，为什么他不考虑考虑为人民的健康多做些工作呢？而且，有什么不如意，竟至想到要死呢？然后，教授听了女医生班奈德斯库的报告，但却好象连眼皮也没抬一抬，看起来事先就约定好了。这也难怪，因为头一天晚上，两个人已经互相看了个够。这样一位女同志，接受一个年老的，儿子都该结婚的男同志的不正常感情，足以证明她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位女同志承认，值班的那天夜里比较轻松。这我相信，她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统共只有三起事故受伤和一起饮酒过量。教授气呼呼地要求亲自看看受伤工人，于是大家连忙跟着他跑到急救室。那儿的一位大夫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教授告诉他，讲话要讲得明白些，因为有些蠢人，可能会把意思弄拧，说着故意回头看了看我。而我，气得装作没瞧见。他叫了我一声，让我到换药室去给他拿一只消毒锅。

我给他拿来之后，他又打发我回去，说我拿来的不是那只好的。第二次回来之后，他又叫我去找女秘书，让我告诉她，等检察员同志来了以后，叫检察员到他那儿去一趟。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儿。因为电梯坏了，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后来，我在病房找到了他们。我坐在普洛丹大夫身后，普洛丹大夫对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说，如果教授发脾气，一定会出大乱子。但是我没敢问他究竟会出什么大乱子，怕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这不能怨医院院长，"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说道，"当院长又不是他自己选上的。让一个蠢货当上院长，比一次事故还要严重。"我知道杜米特列斯库同志矛头对的是谁，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后来，克里斯蒂安同志对病人什么也没说，匆匆忙忙地溜了他们一眼，只在几张病床旁边停了一下，按了按病人的肚子，看看有没有屁。他跟一个岁数不小的女同志讲的是另外一种话，我一句也没听懂。只是最后他对她说了一句意大利话还是法国话，我没太听清楚，好象是——崇高的义务[1]。总之，这又是他利用别人不懂的语言进行秘密活动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是他藐视年轻同事的有力证据。应该了解一下，这位女同志是谁，是干什么的。后来学生们来了，他们抱怨说，因为离医院太远，路上用的时间太多，所以才迟到。而教授告诉他们，这些事他不感兴趣，他们又不是没长嘴，为什么不到系办公室去反映？由

① 原文系意大利语。

于一些工作人员的原因，使他们耽误实习，这使他本人感到遗憾。我不知道他指的究竟是谁。这且不说，怎么能随随便便把罪责强加在诚心诚意的工作人员头上呢？还应当提起注意的是，教授同志发脾气或者奚落人的时候，经常使用象“笨蛋”，“傻瓜”，“伪君子”，“先天不足”，甚至比这更难听的字眼。也许有人真的有错，但怎么能用这样的语言呢？他这种表现很值得探讨。这究竟是一种神经质，还是自以为了不起？不管他是怎么高级的教授，但我们都同样是人，他有什么权利那样不可一世呢？相反，对另外一些人，譬如对班奈德斯库女医生，他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我见他下班的时候，搂着她的脖子，请她对工伤事故的病员作一次详细的化验检查，说是要对付某某人，因为离得远，我只听清了“笨蛋”这一个词。

然后，教授去等检察员了，而我想去了解一下跟教授讲外国话的那个女同志是谁。可巧约尔卡助教跟一些大学生在那儿，我没能靠近病床。但我能听见她跟他们讲的是罗马尼亚语，从这儿完全可以看出她和教授搞的是一套什么把戏。后来，我有事到院部办公室，顺便看看是哪个检察员来了，而且打听一下秘书同志，究竟出了什么事，还要请司法部门的人。走在路上，我正巧同教授撞了个满怀。他问我为什么工作时间瞎逛，而且警告说，我的工作任务是小心地“端盆子”，要保证病人需要的一切，药针或者别的什么。如果下次再让他碰见，一定要狠狠拧我的××……看我还敢不敢再这样。我告诉他，这些规矩我都

知道，这么多年，还没有一个病人反映过对我的意见。他对我说，等到病人来反映，我的差事早就保不住了。然后，他丢下我，自己进了办公室。后来，我听见他的女秘书对系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说，教授最怕开会，一听到开会就头疼。他说即使上帝让他去，他也不去。对这种吵吵嚷嚷，他已经烦透了。一起床，就是开会，开会。越不懂什么的却偏让他干什么。系办公室的秘书说，这些她知道，但她也没办法，上级就是这样布置的，她也为这很挠头。然后，我们的这位女秘书同志说，她认为教授说得有道理，那些蠢人们就会张着嘴瞎嚷嚷，不让大夫们安生，可有了病，还是得去求大夫。看到他们那副夹着尾巴的狼狈相，真觉得有些可怜。从这儿完全可以看出克里斯蒂安同志错误思想的恶劣影响以及他对待集体工作的敌视态度。这位教授同志根本听不进任何建议和不同意见，所有的人都不在他眼里。如果任他这样发展下去，后果还要严重。现在，除了论文组主任尼古拉同志和其他少数几个同志以外，他左右的几个人，说起话来口气已经跟他一样了。对尼古拉大夫同志，教授却说他是个团团转的陀螺，而之所以留他在那儿，为的是让人们看一看，一旦那些夸夸其谈的骗子掌了医院的权，会变成什么样子。说这位大夫同志就是一个活教具，此外还说了一些别的，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后，我不得不回科里去，结果也没看到究竟是哪位检察员来。下午三点左右教授回家了，我又回到秘书那里，

问她究竟教授跟我有什么过不去。秘书同志说，教授对我丝毫不感兴趣，在教授眼里我还比不上指甲缝里的一点儿泥。她说，最近教授情绪不好，不知道实验室里什么东西没做出来。有时候给他送咖啡，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他回答说，看看周围这些不成体统的事，能让你高兴吗？可别人呢，却无动于衷。女秘书评论说，她也看到了不少，教授说得完全正确，普洛丹大夫也说得有道理。我觉得，我们医院里有许多事很不正常。女秘书一连接了好几个电话，跟我也没能好好谈下去。她对我的来意可能有些猜疑。由于我是男同志，所以她显得有些急不可耐，而我却不愿超出正常的同志关系。

还应当提起的是，“盆子”是指为不能下床去厕所的病人准备的便盆。请大家自己分析一下，克里斯蒂安同志对我使用的是什么词。

六

自打那不平常的晚上，那个唯一的、局促不安的、不胜尴尬的晚上之后，使安德烈感到大为惊异的是，过了不多久，一次在家里他恰恰见到了考德里亚努。其实，考德里亚努是最后一个，他来得最准时。第一个来的是公共卫生学教授波赞，这位教授身材矮小，头发微红，穿一套又肥又大极不合身的衣服，拎一只象公共汽车售票员那样几乎已经磨穿了的皮包，根本不理会克里斯蒂安在伸着手迎

候他，却径直走到里面，脱下那件象神父穿的黑外衣，摸摸索索地往衣架上挂，摆弄了半天，最后发现衣架上的钩是断的，这才气呼呼地顺手往那儿一丢。他见别人还一个没来，便开口道："每次都是这样，这个倒霉的城市，简直找不出两只走得完全一样的表，事情总给弄得乱糟糟。我的钟表都让人给偷走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先跟你一起清清静静地喝杯葡萄酒。我记不得我们是不是一块喝过酒了。"

在自己黑洞洞的房间，安德烈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好奇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是不是那种药成功了，他们在庆贺？他感到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感情：恼怒——为什么一点儿消息也没向他透露，哪怕是随便说说？——但无论如何，如果确是这样，这么长时间，为了这种抗癌药，总算没有白费力气，尽管开始没有一个人相信会成功。但是为什么波赞也来了呢？他同父亲并不是什么好朋友，作为教授或者研究人员，他也没什么特出的成就。他越是在课下表现得笑容可掬，就越发使学生们无法忍受。他那单调乏味的讲课，就连安德烈——公共卫生课的高才生，也感到厌烦。

安德烈正巧在家里完全出于偶然：晚上八点以前，实习作业，在这之后，通常是到伊丽娜那儿去，除非她故意找借口，说她到父母那里走了很长一段路，走累了，现在想休息休息。每当她愿意一个人呆着，或者面临着提起再结婚的问题时，她都是这样说。遇到这种情况，安德烈知

道，再去找她已毫无意义。只有当他发现她在阶梯教室门口等他，这样的会面才是自然的，就仿佛刚刚分手又到了一起。只不过这时她的声调里含着一种腼腆，清澈的双眸就象少女初恋时那样纯真。当然，对于她以前的事，一句也不提起。她不愿听到问话，即使问起父母，她也怕牵扯到她那一段往事。安德烈渐渐有些耐不住性子了，他并不想让她难堪，故意装作什么也不了解的样子。有一次，她痛苦地向他提到了一点同原来丈夫争吵的情况，而安德烈宁愿接受她挑逗性的温存，而不希望看到她再陷入不愉快的被动局面。伊丽娜并不象安德烈最初想象的那样，用一些短暂的闪电般的刺激，来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白。当她苦恼的时候，她装作谁也没看到，好象对谁都不满意：仿佛她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无形的压力，想找到什么人发泄一通。她把一只过时的旧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贪婪地听着。她脸色变得苍白、忧郁，显得那样苍老，就好象极力要让人从外表上能看到她的内心。安德烈不忍看她这样，有时试图安慰她，但往往得到相反的效果，于是连他自己也失去了耐性，决定离开她这儿：他并不感到悔恨，相反，心情十分踏实地回家去。而过了一段时间，她却又变回到原来的样子。这时，安德烈又被她的温顺和少女般的妩媚所征服，迟迟不愿离开她的身边，甚至听到她说："干吗不去做你自己的事？看不出在我面前你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吗？"安德烈还以为是出自别人之口。这样的牢骚话，并不是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说，但对于安德烈，吸

引他的并不是生理方面的要求，而是觉得她填补了自己的某种空虚，仿佛只有在她面前，他才感觉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是完全的。伊丽娜使安德烈起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有一点他心里明白：她打破了他的单调和沉闷，激起了他的一种欲望；她永无休止的感情起伏，促使他千方百计希图了解她，想要主宰她。而在她面前，他的欲望和力量却往往被溶化，仅仅变成一种好奇。出于某种担心，克里斯蒂安教授一般不介入他们之间的谈话；伊丽娜由于只有她自己明白的原因，尽量避开教授。而安德烈很怕自己样子过于尴尬：尽管教授的严厉使他感到不舒服，但当他看见教授已经走远时，却又油然生出一种怜恤。无论如何，他不愿在伊丽娜面前贬低父亲，不愿听到这样的传言：别人不干的，偏偏他的儿子去干！在这方面，他不愿表现得比过去更为软弱。

现在，父亲对他越是不予理会，他越是觉得伊丽娜是多么地不可缺少。自从母亲去世后，安德烈从未见过父亲有如此的热情：准备这，准备那，就象迎候什么贵客，他甚至过不了一会儿就要到厨房瞧一瞧，看看那里的酒、菜到底够不够。以往，他们的欢乐和痛苦，都是在幕后自己的小舞台上，在一个比较幽静的环境里表演的；没有任何观众，谁也进不到里边，就象是一束快要熄灭的火焰，尽量躲避开哪怕是十分微弱的风波。而如今，出人意料地，帷幕突然拉开了。"会不会是要结婚？"他想象着班奈德斯库小姐做新娘的样子，这就是他的继母！想到这儿，他不禁

冷笑了一声："至少也应该邀请我参加婚礼！"他气呼呼地自语道。有好几次他真想这样问她："助教同志，您不知道我爸爸在干些什么吗？他什么都不对我说。您瞧，周围环境逼得我对爸爸也关心起来了……"

克里斯蒂安教授尽管对安德烈的男女交往有极大保留，但这天晚上，他还是希望儿子走开。如果安德烈不走，至少开头不得不邀请他。而教授可以肯定，这样一来，考德里亚努电话里说的，对他来讲是至关紧要的一次谈话，就可能搞不成。这些应该让安德烈自己意识到。对他解释一下吗？脑子里却偏偏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特别是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开始缩小的时候。最后他决定一切都听其自然：无论如何，可以让他了解一些人，这倒没什么坏处。"无非是让他看到别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安德烈对他们，特别是对考德里亚努态度不好呢？做一次心理测验也是值得的。

正如教授所预料的那样，安德烈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而波赞的出现，使他更为惊异不止。

为了不侵占脑力劳动者——即大学生们的休息时间，波赞教授上课的时候带着两只怀表，是战前的两只镀金表。他郑重其事地当着学生们的面，把两只表对好，然后，便开始低声地、有些忸怩地瞧着手里一叠发黄的纸片，念了起来。那是一些如何建造水井和厕所的原则以及注意事项。这时候，听讲的学生，有的开始打瞌睡，另一些在课桌低下搞起蚂蚁比赛来。有时候，特别是冬天，则搞小白

鼠比赛。这些小动物，是他们送了几包烟，从实验员那儿临时借来的。不知是谁，对教授的做法实在气愤不过——因为他尽管有两只表，却没有一次遵守过休息时间——决定等教授出教室的时候，想办法把他的表偷走。波赞教授丢了表，整天四处打听、询问，声明要用高出几倍的价钱赎回来，甚至应许谁要是把表送回来，就给谁打最高分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波赞教授气不过，再上课的时候，便带了一只大个的漏斗计时钟。丢表这件事着实使波赞教授伤心：他嗓音也变了，动不动就发火，课堂上要求绝对的安静，谁敢稍稍动一下，就立刻被赶出教室。而且，课间干脆一分钟也不休息了，因为他一边训斥学生，一边就要把计时钟往回倒拨一下。后来他在自己报箱里找到了那两只表，这是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这次考试有两个班全都不及格：谁能背出全部卫生法和保健规则呢？以后他上课的时候，不再带那两只表：他找来一个规规矩矩的实验员，专门给他看着那只漏斗钟。

"真见鬼，爸爸怎么跟这家伙还有联系呢？"安德烈迷惑不解地自问。恰巧在这时，只听见波赞急不可耐地想要给爸爸解释什么：

"你想知道考德里亚努为什么会来晚吗？"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克里斯蒂安平静地回答。其实他心里却十分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免得有什么情况落得毫无思想准备。

"一个钟头以前他就离开了家，我给他打过电话。"波

赞说道,"肯定他是到郭日—多尔奈什蒂那儿去了，是先去摸摸底。"

"他常到院长那儿去吗?"克里斯蒂安的惊异显得十分真诚。

"就跟近亲一样。这个老头子手下有一帮子人。如今他的职位肯定是要有人来替换了，于是原来的仆从又要忙着找新的保护伞。"

"难道这件事跟我还有什么牵连吗?"

"哦喃，"波赞笑道，"现在还知道得不那么确切：如果按照声誉——新院长可能是你，如果按照别的原则——那就很难讲喽，谁都可能。"

"考德里亚努究竟想怎么样呢?"

"这还用问吗?是想让你当。其实他已经向我们表示得够明白了。"

"这话怎么讲呢?"

"要组织这件事，得费不少脑筋。竞争对手这么多，有一场好斗呢。可见他是从郭日那儿探到了点儿风声。这小伙子头脑机灵，感觉敏锐，最会看风向。各种各样的原则，各种各样的意见，他都能应付。别人对他怎么看，他丝毫也不介意，一切都是为了要取胜。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押错过一次宝。是个满理想的经纪人。至于别的方面，说不上什么。"

"我不明白。"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些惊异。

"你真能装样子，你会不知道……你们竞选公司替你

作的安排?"

"根本没这么回事……"克里斯蒂安诚恳地辩解道。"他只对我说过，最好我来当院长，就这些。我绝不会向他提出这种要求，而且也没这个需要。"

"这么说也许他有这种需要。"

"我们必得为这去浪费时间吗?"

"他已经得出结论，这是值得的。因为他只会得到好处。如果你当，那么，好极了，只有你能够战胜克列楚。如果你们两个都选不上，也好极了，这样大家机会均等，多尔奈什蒂也难讲什么话。只有克列楚得胜才意味着考德里亚努输掉，尽管他还有时间来适应这种情况。"

"这样的肮脏交易，你能接受吗?"克里斯蒂安的语调是这样严肃，竟引得波赞笑了起来。

"我到这儿来是想喝杯酒的，这是唯一能跟你在一起喝一杯的机会。我倒很高兴这样做。"

"搞这种交易，就得拼命减低对手的影响，你发现没有?"

"你以为他们一旦看到你被提议作候选人，不会照样这么做吗?尽管你象斋戒似的躲着人们，但这都没有用。一旦卷进去，就进去了，由不得自己:好话、歹话都得听。即使你不进攻，那就意味着挨打，就等于自认失败。"

"你认为是考德里亚努把我卷进这桩交易的吗?"

"只要人家高兴，完全可以这样做。也可能他发现你被某某人注意上了……你自己哪儿晓得呢?别着急，克里斯，

多尔奈什蒂全知道，你会看到的。”

郭日—多尔奈什蒂，在他证件的职务一栏里，除了教授、科学院院士之外，还可以填上医学院院长。起初，好多年以前，为了弥补自己论著少的缺陷，曾经下过一番功夫。那时他工作很卖力，各方面都组织得有起色，而当时学院恰恰有这个需要；但是，后来随着他各种头衔数目的增长，工作热情却慢慢减退下来，变得喜欢听赞扬的话，特别是丢掉了原先的那么一股劲头，对事情漠不关心，听之任之，脑子里好坏概念不分，既不让错的错到底，也不让对的对到头。他的这种变化，不管看起来有多么令人不解，但事实上却提高了他的威信。不少人认为，他的背后或者上头，是别的人在起作用，打乱他的想法，迫使他不得不经常进行调整，以便保持住平衡。一次会上，副教授约瑟夫提出，要求取消克里斯蒂安在大学讲课的资格，理由是他在教学大纲之外，私自决定讲了几堂遗传学。而郭日—多尔奈什蒂却一句话也没说。尽管他心里明白，或早或晚，将来会证明克里斯蒂安是对的，但他并没表态，为的是等待上头别的人来决定。而结果别的人什么决定也没作。慢慢地，事情自己便平息下去了。郭日—多尔奈什蒂却因此而名声更高，被认为处事审慎，能够不动声色地保护那些敢于有所作为的人。克里斯蒂安并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对多尔奈什蒂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因此当波赞提到多尔奈什蒂的时候，他还以为这位院长是不是又在用什么巧妙的手法来支持他。多尔奈什蒂倒是曾经对考德里亚

努说过："克里斯蒂安和克列楚可能有希望。"但这不过只是表示自己不偏不倚的一种说法。其实，郭日一多尔奈什蒂本心并不希望克里斯蒂安当选，理由很简单：他知道克里斯蒂安有雄心，又有股坚持劲，这就可能使他当政的这一段时期显得黯然失色。他向来没有作进一步解释的习惯，而这样考德里亚努也算得到了满足：尽管差不多所有的人考虑的都是这两个名字，但多尔奈什蒂的地位却使考德里亚努认为，他比别人早知道了这个秘密，利用它一下也未尝不可。

"我已经对爸爸讲了，怎么能陪这些人呢？"安德烈脸上刚刚露出一丝微笑，一阵电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第二个来客叫米哈依尔·T·奥泰斯库，生药学教授。谁也不曾弄清楚他名字中间的这个T代表什么：梯图斯，图道尔，还是特拉扬？如果不是他自己搞得这样神秘，人们也不会这么关心。有些人说，是从梯穆尔来的，后来因为自己觉得不大好，便只保留了第一个字母T；另外一些人说，是从塔多斯来的，而大部分人则认为是从希腊名字特兰达菲洛斯来的，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他图比，英文词里to be的连读。近来奥泰斯库越发喜欢在结束一门课的时候搞得象个样子：美丽的鲜花，热情的眼泪。这是因为这方面他曾有过不少的经历：他当过仪仗队的骑士，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维也纳的教授，最后还曾经是教研室主任。他所以失掉了这个职位，据他认为，是由于自己对科学过分热爱。他曾这样说过："你们，亲爱的同事们，简直

是些傻瓜。干吗是喝咖啡呢？真是缺乏正常人的头脑，或者简单说，缺少头脑，咖啡一点儿好作用都没有。喝酒，同样也不能使你们增长智慧。你们手里整天摸弄书本，却不是靠它来帮你们什么忙，只是白白把它给弄脏。你们的母亲，为你们付出了够多的代价，而我，看起来也在你们身上白白耗费了时间……是我想创造出什么新药吗？是的，你们的希望，就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一定会找到能使你们增长聪明才智的东西……”

事实上，谈他的发明并不那么困难。有些爱调皮的学生，干脆把一切药物的发明，都归在他身上。

“是谁，喂，发明了盘尼西林？”

“那还用问？是您发明的，教授先生。”

“不，是弗莱明，当然我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表示了一下自己的谦虚。

另外一些学生，为了得到及格的分数，走的却是另外一条捷径：求助于教授夫人。因为在家里，是她主宰一切。

“尊敬的太太，”学生这样说道，“现在我的情况糟糕透了，要不是相信只有您会理解我们，我简直干脆会去自杀……”

“奥泰斯库，”数不清的恭维话和一束束鲜花，使太太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抖，“你干吗故意跟这些孩子过不去？看他们够多可爱，多听话。对了，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是要及格分数还是奖学金？亲爱的！”她回头问那个学生道。而教授却气鼓鼓地坐在一边。

“是奖学金，尊敬的太太。我爸爸没条件供给我，他过去是骑兵上校，养老金没有多少……”

“我不能这样做，”教授生气道，“没考好说明你自己太笨。不过看在你妈妈的份上，还是给你个及格吧。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你不行。”

除了这些传奇式的故事——人们不禁要发问，他这样做是不是有意识的，就象电影明星那样，故意引起大家的注意——奥泰斯库教授已经成为有名望的第一流专家。卷檐礼帽，蝴蝶领结，烫金柄的手杖，熨烫平整的黑礼服，不离手的浆过的雪白手帕，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回忆起一个世纪以前使人敬而远之的绅士风度。

“你好啊，克里斯蒂安，”他兴致勃勃地喊道，“我提前到了两分钟，没想到公共汽车上会这么空。我的老师布朗诺维茨先生常常是提前三十秒。可这儿，先到几分钟，晚到几分钟，根本不当一回事。为什么考德里亚努偏偏把我们找到你这个老光棍儿这儿来？考德里亚努还没来吗？让人等可不太好，特别是还牵扯跟你自己有关的事。波赞呢？”他刚这样一问，恰恰波赞端着一只酒杯露面了，杯里的酒已经只剩四分之一。

“当然跟你那时候不一样，亲爱的图比，没办法，人们变得越来越不遵守时间了。”波赞笑嘻嘻地说道，“你的布朗诺维茨习惯喝什么酒？”

“不象话，波赞，”奥泰斯库有些发怒，“布朗诺维茨教授先生正是感到需要在同人们聚会的时候都要表现得平

等、文明、有礼貌，才安排了一个助教，专门对那些乡下佬或者郊区来的人们实行教化。他，譬如说，在全体客人到齐之前，自己一个人绝不会先喝起酒来的。”

“你想知道我把你的布朗诺维茨叫做什么吗?”波赞压低了嗓门，极力抑制住愤怒。

“我知道你爱搞这套名堂，这没什么稀奇，”奥泰斯库紧接着说，“可我怀疑，究竟有几分符合事实……你干吗不能表现得更礼貌些呢，亲爱的?”

“这群阔佬，”波赞怒气不消地说道，“见他们的鬼去吧！一提他们，简直能让人把肠子都吐出来。”

“先生们，”克里斯蒂安插进来道，“你们的这套暗语，到现在我还没解开。”

波赞首先让了步，他帮助站在门口的奥泰斯库脱掉外衣，然后把他轻轻地推进克里斯蒂安的房间，倒了一杯酒递过去：

“嗳，图比，一气儿喝了它。这样，当着克里斯的面，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向你承认，阔佬也创造了他们的价值，不光是下层阶级。”

“要不是你这种五十年代的思想惹恼我，我情愿原谅你的不礼貌。”奥泰斯库见波赞意想不到地让了步，显然感到很得意。“轻视文化、不懂美学、实用主义和把自己的思想硬套进现有的公式……你就是这么回事……只要你丢开这种逻辑，或者至少不当面表示出来，我将会乐于接受阔佬这个称呼。”

"什么?"波赞有些按捺不住,"你的这个德国佬究竟干过些什么?就好象你是从他肋骨里生出来的一样!无论哪种百科全书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为什么老把他抬出来呢?如果用句文明词来说,"波赞把嘴唇努了一下,"你的恩师搞出了乱伦勾当,那么你这个亦步亦趋的弟子,也学他的样子吗?是的,即使到了你祖父的年龄,你还会有精力这么做的。你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图比……"

"一个稍有涵养的人,早就该拿起帽子走了。"奥泰斯库说道,"可对我来说,你根本就不存在……"

两个人吵起来尽管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却从来又是分不开的一对;没人记得在第三者介入之前,他们两个会有谁说对方一句好话。一旦有人介入,他们两个却又会突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不慎卷入的第三者。等把这后来者战胜之后,两个人便又继续他们难分难解的争吵。就仿佛只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才使他们感到舒服,才能充分表达出他们的亲密感情。波赞浑身颤抖着,嘴唇和双手失去了控制,就象是得了疟疾一般;为了镇定一下神经,他用力捏住衣服上的一只扣子。奥泰斯库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两只手微微背到后边,就象是时刻准备扑过去,嘴里不停地叨咕着什么,也许在重复着反驳的词句,或者已经没力气把它大声说出来。克里斯蒂安感到一阵乏味和无能为力,与此同时,又觉得需要恢复秩序,需要安静,需要把他们两个统统赶出去。他知道这两个人是朋友,但

他们一进门槛就这样毫无约束地争吵起来，的确显得有些反常：他们并不乐于到这儿来，似乎是在赌气，又象是被迫才到他这儿来的。这一晚上刚刚开始，他却已经无可奈何地盼望它快些结束。他知道血压已经升高，而且一天的劳累，也已经明显地感觉出。他已经没有任何说笑的兴致，再也没耐性听他们继续吵下去。幸好，正在这时一阵电铃声解脱了他的困境。他连忙飞快地向门口冲去，竟把奥泰斯库撞得原地转了个圆圈——奥泰斯库忍受不住同浑身僵硬的波赞目光对峙，正怒气不消地站在那儿发楞。

“晚上好，先生们！”内科学医生奥利比乌·瓦西利乌神情轻松地打招呼道，“我知道，没有我你们不会开始的。你可从来没邀请我到你这儿来过，亲爱的教授。我看你这儿对那些固执地不肯改变自己习惯的老头们来说，倒是个难得的避难所。考德里亚努叫我们来干吗？你不知道吗？”

“是我想找你们随便聊聊，没什么。”克里斯蒂安有些生气，这不只是因为刚才两个人的吵嘴，而且还因为新来的这一个还没进屋就先问起了考德里亚努。“你倒挺会做戏，瓦西利乌，你是永远什么也不知道，就好象你整天腾云驾雾，让谁也猜不透似的。”

瓦西利乌意识到克里斯蒂安生气的原因，于是表面上退了一步：

“我只是来看看你的。我听到了上百的传说：说你搞出了重大的发明，说你离开了大家，说你得了病，说你要结婚。可看起来，哪一样也不是。就是你一句话不说，也

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怎么样，亲爱的，还好吗？”瓦西利乌本想说几句讨好的话，哪知道却没找到门路。克里斯蒂安并没把他的话当做随便说说的，特别是对他从来也没有过好印象。

“必须得做出点姿态，这就是唯一的解释，”克里斯蒂安开玩笑似地说道，“整年躲着，忽然间在大家当中露面了。如果说你是个有点影响的人物，人们就会考虑：为什么那时候躲了起来，为什么现在又重新露面？那时候想干什么，现在又有什么意图？这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如果大家都没注意到你不见了，即使现在再露面也没什么意义。”

“你从来都有自己的好药方，而且也能抓准时候，我真羡慕你。”瓦西利乌说着走过他的身边，向奥泰斯库伸过手去：“如果您也在这儿的话，就是说，来晚了应该向您道歉。”

“好象只有他才是准时的，”这是波赞的声音。“最好让他去当火车司机或者打钟的。”

奥泰斯库没有开口，只用手指弹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而瓦西利乌会意地冲他笑了笑：他了解他们两个的习惯。

“波赞，”瓦西利乌说道，“你已经可以给我们作介绍了：哪种葡萄酒最好？”

见他用不着主人劝让，克里斯蒂安觉得，其他客人来之前自己也不用离开窗口。他后悔当初自己不该答应请他们到这儿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倒不是因为在他们中间感到尴尬，觉得不自在，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对自己内在

的控制力，不相信最初感到的这种迷惘和揣度会即刻消失。本来他完全应该自我控制，强使意志把谈话引向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但是他做不到，极力想从他身上挣脱出来的那种感情，企图割断与现实联系的感情，使他的思想完全麻木了。房间里不可忍受的一股冷气，刺透了他的全身。这使他不得不断定，这种同凄楚的冬季一模一样的寒意，渐渐地侵袭着一切，钻入他的肌体，渗透到每一根神经：眼前的这些人已经无关紧要，他们到这儿来对自己的痛楚丝毫也不能有所减轻。而他同这些人们的隔绝，更是觉得复杂得无法解释：他离开了他们，躲进了实验室，在一个不曾被认识的新世界里游荡，为此他付出了改变生活方式的代价；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更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给这种情况下定义，事实上也感觉不到有这种必要。他很清楚，如果指望刚见面就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绝妙的奇迹，什么惊人的真理，那简直荒谬。刚才的对话，完全是正常的，只有一点，他确信，他们仍然都是原来的老样子。只不过觉得他们还是那么年轻。已经流逝的时间，似乎对每一个人并不完全一样。他自己经过的这一段，是那么急促，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令人晕眩的风暴，直到现在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愿正视这一切，不愿相信这是事实，而且感情按照自己既定的倾向，迫使他僵立在那里，禁止他做出任何自由的选择。他不禁自问道：“我究竟需要他们什么呢？”而他真正的痛楚却在于，听到他们欢乐的说笑声，毫无顾忌的咂嘴声，暗暗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他们一样，

为什么还不能从时间的可怕旋涡中摆脱出来。也许到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开关，还没选对需要的波长；不排除每个人都能找到自我安慰的方式，但他们可能从来没感到过时间引起的痛楚。奇怪的是，正是他们，以他现在见到的和以前了解的那种只关心个人、对其他都漠然置之的态度，减低着他对生活的热情，使他感到自己怎样在步步退让，力量和意志怎样在通过无形的毛细管，一滴滴地、慢慢地流失，留下的，只是一片乏味的空虚。他感到需要刺激一下，需要激起些什么变化，但他知道，靠眼前的这些人做不到这一点，就连考德里亚努的建议，也起不了这个作用。恰恰在这时，考德里亚努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他彬彬有礼地打了一下招呼，动作和声音里包含着一股兴奋的热情，一种难言的激动，就仿佛要向大家立即宣布一项重大的秘密。听到门铃声，其他人也都迎了上来，而考德里亚努不等落座，便单刀直入地触到了主题：

"据我掌握的材料，"他说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对杜米特鲁·克列楚感兴趣。几乎可以肯定，学院院长是您的。但是为了排除一切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应该关心一下克列楚，给他安排个恰当的位置。"

"你们让我在这场比赛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克里斯蒂安对考德里亚努连问也不问他一句同意不同意，感到有些恼火。

"给你安排的是中锋，"考德里亚努笑着说，"在第一次

校务委员会上，你就得破门，踢进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球。”

“那你们呢?”克里斯蒂安没好气地问道。

“哦，这还不清楚吗?边锋，后卫，看个人的喜好……”

“也就是说，要贬低克列楚和其他候选人，把我打扮得清清白白，让我出任?”

“你以为不经过斗争就能得到什么吗?”考德里亚努依旧兴致勃勃。

“你们的建议，使我感到荣幸，”克里斯蒂安说道，“这些日子我考虑过了，”他提高了声调，对其他人的沉默不语，感到有些不自在。“今天，除了有幸请各位来做客之外，我没有任何新闻要宣布。我现在更体会到安安静静不受打扰有多大价值……”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观点，”考德里亚努说道，“但我认为，安静，除了工作——当然我们谁也没有闲呆着——只有职务能够给你。与其让别人把我杀掉，当然这个比喻不那么好，倒不如我先发动一次预防性的进攻。”

“那也应该先好好研究一下细节，”克里斯蒂安表面作出了让步。他突然感到十分好奇的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要走多远。“但不是在这儿的前厅里。”克里斯蒂安无比激动和不知所措，他一刻也没想到安德烈一直在听他讲话，他已经完全把儿子忘掉了。而安德烈却感到迷惑不解。“考德里亚努，在这儿，在我家?还有，爸爸?我想象不出他还会搞

这一套！哼，我要让他们高兴高兴，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一下站到他们中间，就是用大炮轰，我也不走。”尽管心里这样想，但他却仍旧坐在椅子里，一动没动。他满足于这种等待，他没去想怎样回答他们的问话，甚至连说完“晚上好”之后的第一句话，也没考虑。他只觉得丢掉了些什么东西。他荒诞无稽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渐渐地，他把父亲划出了这个圈子，尽管他心里不住地呼唤着爸爸的名字；与此同时，孤独感，一种新的怕人的情绪，在他身上越来越厉害地增长起来。

克里斯蒂安教授最后一个走进客厅。他走得那样慢，那样小心翼翼，就象怕已经入座的其他人从睡梦中惊醒一样。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由于自己要求细节的一句话而冷下来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他停在门口，犹豫了几秒钟，这时才意识到作为主人，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许已经入座的人们还在等他把问题再重复一遍，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既没有兴致，也没有气力了。“他们怎么了？为什么都不讲话？是不是希望我立即表示拒绝，要亲耳听一听我是怎样自动退出竞争的？还是他们不喜欢‘贬低’这个词？他们到底要怎样呢？”

考德里亚努背向着桌子，专心地打量着书架上的书：第一眼他就找到了存放罕见版本的一格，那是做过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一个学生用高价买到的。“他是不是有借别人书的习惯呢？”克里斯蒂安担心地想，“要是那样的话，就更麻烦了。本来，同行间的聚会，应该在一间四周

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举行。遗憾的是这些书我没别处放，就这么大地方……谁让我直到现在还没搞到象样的住处……他拿书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奇怪吗？看不清楚还是根本没兴趣？他对这种书不会不感兴趣的……”

瓦西利乌坐在一把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家庭相册；自从丝若拉死后，还没有一个人动过这本相册，它一直放在窗下的小桌子上，那是她习惯于在那儿看书的地方；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到瓦西利乌把自己的眼镜盒放到小桌上为止，这张桌子从来没人用过。克里斯蒂安总是避开它，安德烈也是这样，就连保姆也从不到这个角落里来。只有班奈德斯库小姐，教授的助教和女朋友，有时候忐忑不安地看它几眼，总想过去翻一翻那本相册，但她始终没这样做。瓦西利乌脸色苍白，大概刮过脸涂了过多的剃须膏的缘故。他蜷缩在黑色笨重的扶手椅里，简直象个残废或者即将断气的人。

“也许他也患了不治之症？”教授吃惊地自问，“不正常的安静、犹豫、孤独，就象是一具幽灵……捉摸不定的幽灵。我怀疑他是不是吸毒，脸色白得这样吓人。怎么说呢？……总之，以沉默作为手段的人，往往过分自尊。也许每天他会对着镜子跟自己道早安，跟自己握手。能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

图比就象上第一堂课那样激动，在右边挂着的两幅油画前踱来踱去，专心地看着，揣摩着，看起来是喜欢这两幅画，却又分辨不清是哪位画家的署名。这两幅油画是克

里斯蒂安教授从法国一个展览会上买到的，这是战前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他一直没再关心这两位画家的情况，也许正因为画家的名字不是那么有影响，战后在他变卖那些有价值的收集品时，这两幅画才幸免于难。

波赞坐在餐桌旁的座位上自斟自饮，间或脸上皱成一副滑稽的笑容。看到克里斯蒂安，立刻给他满满倒了一杯：

“今天你可不能只当招待员，”他说道。“这儿没有女客，咱们可以随便点儿，谁愿意用什么就用点什么。比如说我，就想吃点什么，我看这些冷盘还是蛮馋人的。我敢说今天你把整个教研室的人都派出去排队了。”

“不，”克里斯蒂安教授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话题开始转向这一方面，“你想想吧，是我自己到处跑来的。我已经习惯了，挤在大伙中间，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象我这样整天躲在一边忙自己这一套的人，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倒是一种乐趣。在那儿，你能了解到脑子里从来没想过的事，能听到人们在别处根本没工夫讲的最新笑话。”

“你别以为我会相信这么好的火腿能随便在什么地方买到，”波赞笑着说，“我也在咱们市场上买东西，我的上帝……”

“我运气不坏，”克里斯蒂安说道，“我的一个病人，佩德列斯库将军，看见我拿着网兜，马上告诉我‘解放’商店一个钟头以后有东西卖。在前线他也是这样，能出色地侦察到敌人的行动。他胸前挂满了奖章，不过肺叶上也留下了一块弹片。在布达佩斯是我护理的他，因此，他对我一

直挺客气……自从他退休以后，我想他也能分得出来哪是玻利维亚的鲜蘑了。”

“我给我的狗带回去两片火腿，你不会生气吧？我想让它意外地高兴一下。”奥泰斯库兴致勃勃地说道。波赞听完，放声大笑起来：

“你要么是中了邪，要么是故意耍弄我们！瞧，克里斯，真该让图比先生阁下来当你的采购员！请问你家里都吃什么山珍海味，敢摆这样的阔气？”

克里斯蒂安教授倒愿意再爆发一次争吵，尽管他并没有把握，能否把图比激怒。

“这有什么关系！”克里斯蒂安教授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看到其他人惊奇而略带不满的眼光，又停了下来。图比接着辩解道：

“如果我不是在禁食，至少得吃两块。我省下来的这两块，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处理。”

“你从你的布朗诺维茨那儿学到的东西，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波赞得意地笑道。几杯酒下肚，看来他决心要把这场较量进行到底。

克里斯蒂安教授终于不想再让谈话这样继续下去了，但有一件事使他不解：为什么考德里亚努一言不发？他想干什么？是不是打算收回他刚进门时提出的建议？院长，他是这样直接说的，一点也不显得扭扭捏捏，当时没有一个人显得惊奇，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来龙去脉。而现在，应该触及问题实质的时候，却还在这样毫无意义的斗嘴。

奥泰斯库象是还在看那两幅油画：

"克里斯，"他问道，"右边的这幅画是什么标题？"

"水族即景。"克里斯蒂安立即答道。

"这还差不多。"奥泰斯库同意地点点头。"让我命名的话，我叫它'神造万物'或者'万物'。红、黑、黄这样的混杂在一起，而黄色，象是要从整个色调旋涡里脱出来，从一片杂乱无章当中分离出来，这样的安排就连波赞这种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受到感染。"

"别扯什么艺术了，图比，"波赞立即反唇相讥，"还是弄你的报春花、曼陀罗去吧。'达杜拉斯特拉穆'①，你的德国佬这样叫，不是吗？"

奥泰斯库教授这次却忍住没有发火：

"我谈的是事实，"他说，"抽象艺术我并不是多么喜欢，可是自从一些画家打算用一些牲畜、拖拉机或者别的什么农具塞满我们墙壁的时候，我倒要经常注意一下抽象艺术。"

"说得够多动听啊，先生！"波赞故作惊奇道，"这话你为什么不二十年以前说？或者，你为什么不去写篇论文？如果那样的话，也许你会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人物，甚至是大家尊敬的人物。咱们还是把这些搁到一边吧，你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艺术。哼，抽象的曼陀罗……"说完最后一句，他觉得挺得意，竟忍不住笑出声来。

① 原文是拉丁语，此处系音译。

奥泰斯库装作根本没有听见，他接下去继续说道：

"在人们谈论万有引力、反物质、电子、中子的世纪里，我们的兴趣爱好不应当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阶段。当然，波赞作为公共卫生学专家，可以允许他在这方面缺乏敏感……明白吗？不过我对他这种天真的愚昧无知，还是表示同情的……"

"啊嗬，"波赞惊叹道，"现在追求超现实主义成了时髦的东西。而我，甘愿落后，我觉得还是现实一些好。"

"我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休战讲和。"克里斯蒂安说道。他力图扭转话题，不给他们的争论再火上加油。但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时考德里亚努离开了书架，来到桌旁，拿起一只酒杯，高兴地说道：

"如果是院长同志的命令，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建议，我们为什么不听从呢？但是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暂时还没必要公开……"

"这就是说，在了解秘密指的什么内容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瓦西利乌象是刚从梦中惊醒似地说道。

"不过，教授先生，今天开会休息的时候，细节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考德里亚努毫不客气地回答道。

"呃，你又来了！"波赞说道，"我们提议他当院长，这很简单；我自己至少没有这样的奢望，也没这个权威。克里斯不错，我赞成。你们去争得头破血流吧，我还是喝我自己的酒。不管是天才还是低能儿，反正都一样，重要的

是我们能够这样马马虎虎生活下去，别抛弃这种无辜的嗜好。”

“要是按照对科学贡献大小的话，”奥泰斯库口气里充满了自我欣赏的优越感，“可惜你们对我的科学著作不理解……”

波赞故作惊奇地吹了一下口哨。克里斯蒂安想挑动一下瓦西利乌，故意问道：

“假使说，我接受下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考德里亚努不满地剥着一只橙子：他知道，话不是对他说的，他等着听瓦西利乌怎么回答，他同瓦西利乌还有另外的合作关系。瓦西利乌正仰起头，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面一条条黑色的裂纹，就象是从高空看到的一片由于干旱而龟裂的土地一样。

“这你就不用管了，克里斯，”波赞插进来说，“这方面，也象各行各业一样，有专门人材。事情要比你想象得简单。而且，就我对你的了解，你也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这么多次，你都重新得到了丢掉的地盘，这一回也会很容易地取得选民们的好感。但对克列楚或者别的什么人，我希望你不要去称赞。谁都有弱点，就象含羞草，如果触到地方……要么伸展开，要么蜷进去，不是吗？我们需要的是让克列楚教授在选上你之后再伸开。遗憾的是朗卡教授没在这儿，只有他能够替你打破僵局。”说完，他满意地望着克里斯蒂安，就象是鼓励他说：“不用怕，小伙子，也许你已经被选中了，我们还在这儿瞎操心。”

克里斯蒂安发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他不该要求谈细节：这就象副教授约瑟夫对他，或者雷德曼对前任教研室主任赫里亚努一样，应该从这里边去找答案。其实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没打算赶他们走，于是偷偷看了考德里亚努一眼：正是因为他，自己才犯犹豫。"也许，不管人们怎么说，他是相信我的。我应该对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愿意当，为什么不用再继续谈下去。也可能他们认为事情已经了结，至少从波赞的话里能听出这个意思，下面就该吃吃喝喝玩一阵了。"

考德里亚努在削一只苹果，波赞仍旧喝他的酒，奥泰斯库没有什么好做，在端详着书架上的书。只有瓦西利乌看起来象是在睁着眼睡觉。

"只怕最后怎么玩也高兴不起来了。"克里斯蒂安本想再提起点兴致，但忽地觉得一切都模糊不清，捉摸不定。他担心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向他们乞求，这越发引起了他对这些人的怀疑。"那么，作为教授，我应该研究哪些肿瘤呢？从前，"他想道，"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完骨学课，不管看到谁，都给分成躯干和四肢。今天，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越来越喜欢使用一种代号当做词汇：X，肉瘤，Y，血管瘤，Z，可能致癌的一种色素。考德里亚努先生属于哪一类呢？不管怎么说，每一种癌，都有自己病因学的解释……根据我现有的经验，难道不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吗？"这些缠人的想法，简直使他感到惊恐，他越是注意地瞧着这些人，越是觉得怕他们。

多少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一组物质，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发现其中的一种，直接注射到肿瘤上，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肿瘤消退。这个发现无疑十分重要，但让这种物质借助于什么中介，才能到达肿瘤呢?问题就卡在这儿。也许乳酸能起这个作用……但要进行这样的实验，需要大量的资金，象这样大数目的款项要获得批准，那是相当困难的。而且随着实验研究的进展，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要不要公布部分研究成果。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该提出，他从一产生这个念头就意识到了。但奇怪的是，他觉得手里这张牌这样有分量，他完全可以靠它一直打到底。如果公布了结果，当然，不少人可能利用它抢在自己前头。但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一旦他发现的这种物质找到了合适的媒介，也可能就是乳酸，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新名称，一个加在著名商标前边的响亮的名称。到那时，谁也不会想到，事实上正是他是发明这种……的人。已经开始的研究，他有权进行到底，于是他一次次地写经费申请报告。但报告每上升一级，主管的会计部门就会毫不客气地从申请数字的末尾削去一个零。“到最后，剩下的钱怕只能养活兔子和小白鼠，甚至连这都不够。我也要搞他们一下，干脆用这些钱买香烟，对，还要买几盒火柴！转账报销的火柴！”

“怎么?”人们会大吃一惊，“是他？在当今美国人和俄国人垄断一切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小城市却要变成世界中心吗？……”

慢慢的，尽管几十只白鼠身上的肿瘤都消退了，但教

授对自己的发现却开始怀疑起来。在等待上级批准经费的这段时间里，他在狗身上又作起了尼古丁效果试验。他让狗吸烟，他自己也吸，让所有的狗都吸，没规定剂量。这样过了一些时间，他对癌症竟又得出了新的认识，不再对新物质或者显微镜切片感兴趣了。“癌到底是种什么东西呢？也许我应该研究研究遗传学，或者别的什么。蠢笨、愚昧，这又是什么呢？这种形式的癌更值得研究，因为它危害更严重。”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既研究这，又研究那了，尽管丝苔拉那大得怕人的悲伤的眼睛，那憔悴苍白的面孔，绝望的呻吟，一直没有从记忆中消失。多少个漫长的夜晚，他曾对一切都失掉了兴趣。如今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一直沉睡着的痛苦和不安，又一下子跳了出来。经过这么多年，这些往事又以前所未有的形式重现，使他无法控制自己，无法再把思想集中到这件事上来，或者对这种不安做仔细的分析。他去查病房，只不过简单走一遍，担任课程也更多是出于义务。他躲进实验室，在那儿作着给狗吸烟的试验。这些动物，吸烟已形成习惯，实验员用不着再去费劲，只消在旁边看着别灭火，等着教授从他那奇怪的梦幻中醒过来。以前，还有一只狗喝咖啡喝上了瘾。每次阿纳尼亚都是准备两份咖啡。“还给您留了点。”实验员这样对教授说，一点儿也不带惊奇的样子。现在这些狗还在吸着烟，还在等待着继续吸。

“要是没有安德烈，事情会简单得多。”教授这样想，接着又立即做了纠正：“不，正是他，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某

种意义……如果他的前途问题不是这样急迫地提出来的话……我绝不能让他再重复我走过的道路，再遭受这么多的惊恐和折磨。看来他还是有科学研究的天赋条件，放弃这条路未免太可惜……”为了更有保证地、不受干扰地培养他，教授曾想把安德烈留在身边，耳濡目染地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研究方法传授给他。“将来人们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还很难预料，但必须从今天的现实出发，作一些设想，但这又超越不了我对现实的了解和认识。这种变幻不定、前途未卜的形势，迫使我认为，只有迅速的起动，卓著的成果，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只有我活着的时候这一切能够被确认，才能保住他在医学院，在科研方面的地位。可怜的安蒂①，跟他母亲一样，对周围的人们太缺乏了解，往往开始时百分之百地信任，而后来，却惊异地发现，这种相信程度的百分数，不得不越来越减小。他对一些明显的不公正，感到迷惑不解，他无法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还存在着欺骗，一个人可以具有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天才竟能够和白痴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他会觉得这不可能，尽管看到的一切竟是这样发生了。”

安德烈默默地坐在扶手椅里，继续注视着客厅里发生的一切。最后一个人已经进来，但他父亲却没有关上门。然后，父亲到中厅来过两次，开冰箱拿东西，但仍旧没想到关门，尽管扶手椅旁的壁灯把整个房间都照得通亮。“也

① 安德烈的昵称。

许他打算给我上为人处世的一课，”安德烈心里想，“他认为我对人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想要给我改正过来。瞧，我们就是这样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为了各色各样的目的，好的，坏的，而斗争，而拚死挣扎。首先关心的是我们自己，至于其他，关系人们发展的大事，或者类似的问题，只有在安排好自身事情的空余，才有工夫去考虑。为了得到什么，首先得抛弃点什么，而且只有靠这种暂时的牺牲，你才能够慢慢渗透，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目的地。有时候，你还得做坏事，为了更大的好事而不得不做的小小的坏事，或者是为了避免干更大的坏事。没有任何肮脏和丑恶，不是罩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没有任何真理，不是以伪装的手法，建立在否定另一个更确凿的真理基础之上。也许他想向我表明，跟他的这些同事们相比，他是多么纯洁，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根本就没注意到我。”

从客厅里清晰地传来考德里亚努的声音：“酒好，菜更没话说，我们的主人，真称得起完美无缺。我们大家该吃喝的也吃喝了，该说笑的也说笑了，奥泰斯库和波贊两位同事，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俩并不象看上去的那么要好。不管怎样，我们聚在一起，总还是有个目的。我愿意再次提醒大家，用不了多久，现任的院长就要离开这个职位。我考虑，克里斯蒂安院士是最合适的接替人。但是候选人名单上，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应该极力推荐克里斯蒂安，尽量抵消其他两个候选人——现任系主任，特别是克列楚教授的影响。我跟每个人都分别讨论过这

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这样统一我们的意见，其他人也都会附合我们的。克里斯蒂安教授先生最能够统观全局，有谈论未来总体问题的权威，因此，应该最后一个发言。我们的攻击目标，首先应该对准现任院长。当然，不管怎样，他是要下台的人了，可我们，应当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不错，他也给附属医院做了些好事，增添了不少设备，但这些靠的都是损人利己的办法。他还提拔、安插了一些自己的亲信，而对这一切，多尔奈什蒂却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否认不了的事实。我想我们这位未来的院长，上了台也会照样这么做，”考德里亚努开玩笑说，“不过他只是第一年这么做，为的是将来好有时间洗刷掉这些污点，给大家留下更深的印象。如果我们不积极支持克里斯蒂安教授，那些支持克列楚或者支持系主任的人，就会抓住这一点，照我们脸上狠狠给一拳头。当然，这是句玩笑话，”说到这儿他有些得意，因为只用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意思全部说明白了，“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现在不表态，将来就太困难了。这样，奥泰斯库先生全力负责现任系主任的问题，瓦西利乌教授先生负责收集我们学院科研工作落后状态的材料，什特凡·朗卡先生，可惜今天没来，他将集中全力对付克列楚，而把这一切缺点错误系统整理出来的艰巨任务，由我来承担。波赞先生，也同我们一样，将时刻准备着，对任何意想不到的进攻给以反击。”说完，考德里亚努又露出那种完全自信的笑容。在等候别人发表意见的空隙，他用波赞丢散在桌上的牙签，

开始在一张餐巾上摆起小玩艺来：先是一顶高筒绅士帽，接着是一幢小房子，把这些毁掉之后，他又摆了一架飞机，在这期间，他不时地偷眼看看大家。所有的人都沉默着，谁也不肯说哪怕一句话。瓦西利乌突然胃口大开，他把火腿切成大块，象过去在军队里那样，几乎嚼也不嚼地就吞了下去，引得大家把目光都转向了他，弄得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最后，他实在有些难为情，便鼓了鼓勇气说道：“波赞老兄说得对，这火腿确实不错。亲爱的克里斯，下次你再去买的时候，一定把我也叫上，费点工夫完全值得。”

听到瓦西利乌的话，安德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记起了他的朋友宾迪亚的一件事。那是一次考试的时候，瓦西利乌让学生们抽了题签，然后，完全心不在焉地登上了一张桌子，修理起那只布谷报时钟来。“说吧，亲爱的，我听得见。”他不时对宾迪亚重复这句话。宾迪亚把整个题目都讲完了，他回答得既清楚又简练，但瓦西利乌却一个劲地重复：“说吧，亲爱的，我听得见！”宾迪亚又从头开始，这次说得又慢、间歇又大。等再没有什么可讲的时候，还是那一句“说吧，亲爱的，我听得见！”教授全神贯注地搞他的挂钟，看来还没弄好。宾迪亚又开始重复他的答题，这时使安德烈和其他人十分开心的是，宾迪亚每说一句话，挂钟里的小鸟便钻出头来咕咕一声。瓦西利乌高兴极了，一圈圈地拨着时针，摆弄着钟摆，然后，又退到另一张桌子上，从远处左右端详着。“见你布谷鸟的鬼去吧！

老头子简直昏了头，就是你对他读《我们的天父》[①]他也不知道。看来他关心的只是这只黑乌鸦。”宾迪亚说着，不再重复他的题目，真的朗诵起《我们的天父》来。过了一会儿，瓦西利乌大约摆弄够了，从桌子上下来，把题签要了过去，以不同寻常的开朗表情对宾迪亚说：“你回答得很出色，可以得十分。不过对你辱骂师长这一点，你得到系办公室来一趟。”

“我们在讨论正经问题，干吗又扯别的？”考德里亚努显得有些激动，“刚才谈的好象不是火腿。”奥泰斯库见院长候选人三人名单上没有他，感到受了侮辱，他继续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华尔兹舞曲的拍子，一直到看见克里斯蒂安又到冰箱里去拿东西。

“这是为什么？”他说道，“我是这儿最年长的一个，国外都知道我的名字。医学院里只有我一个算得上学者，是真正凭本事，而不是靠人捧的。应当说，这样的职位是对我的科学活动进行加冕。别的人还有时间，他们都比我年轻。”奥泰斯库冲着考德里亚努说完这些话，又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讥讽地瞧着克里斯蒂安：“你统共有多少论文著作，克里斯？”

克里斯蒂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作，怔住了。他把刚刚拿来还没有开盖的酒瓶放下，强压住怒火，仍然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只当光听见了他的问话：

---

① 《圣经》上的祈祷词。

“我想你是知道的……还不到五百篇，提不到话下……”他还想说出几篇列入大学教材的文章题目，而为他朋友的表现感到羞耻的波赞，匆匆喝完两杯酒，打断了克里斯蒂安的话：

“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克里斯，咱们还是一起喝几杯，聊聊我们的青年时代……这位布朗诺维茨，已经老朽了，我可以发誓，酒他连嘴唇都没沾过。你想象得出这样的人能当院长吗？简直是乱弹琴！”波赞说完走到书架旁。克里斯蒂安用心打量着他：脸喝得红扑扑的，显得那么高兴，那么无忧无虑。他打了个蝴蝶结领带，打得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拿起一块毛巾，胡乱缠在脖子上。他学着奥泰斯库的样子，从假想的讲台上，开始大声地、抑扬顿挫地讲起话来，而且在停顿的空当儿，不时戏剧般地擦着额头和鼻子上的汗珠：

“先生们，有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一匹马跑过系办公室前边，碰到一位年轻的穿着讲究的漂亮小姐。马咬了小姐一口，不但把胳膊咬伤了，而且还把澳毛料子的漂亮衣服也撕了个大口子。还有，我记得考斯迈斯库部长得了直肠癌，动手术的时候死在了手术台上，因为打麻药针出了事故。我们的医药知识，可以使自己避免出现一些意外。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年轻的副教授……”波赞越说越带劲，他模仿着奥泰斯库的动作和表情，不时地舔舔嘴唇，以极为迅速的动作理一理眼镜，在讲话戏剧性的停顿中间，掏出一块有四分之一床单大小的绿色手帕——这是在给他

的女助教打信号，让她把冰过的凉水送来。

被激怒的奥泰斯库挥舞着餐巾，嘴里不停地吵嚷着：

“粗野，没教养。简直是还没进化的猴子。”

“好啊，真有意思，这个波赞。”克里斯蒂安教授心里想。他了解这两个人的传统节目，忽地觉得再也提不起兴致。“跟他们在这条路上还能走多远呢？到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也许只是为了不使自己感到孤独。”

波赞的表演使瓦西利乌笑得前仰后合，而考德里亚努却利用这个机会走到了克里斯蒂安身边：

“您不用管这些，都有我。应该怎么样，最后是会怎么样的。”

克里斯蒂安象是仍然在瞧着波赞，他问道：

“你说的应该怎么样，到底指的什么？要说你们在这儿没感到那么舒服，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做到了尽力而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气氛，在座的全体都有责任……”

考德里亚努显得并不在意这种间接回绝的话；只是遗憾自己没有完全把话讲清楚：

“到校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们会头脑清醒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会尽全力让您在学院范围内占据应有的位置。”

“我的位置吗？”克里斯蒂安故作惊讶道，“早就有了。那是在病人身边，在实验室……关于癌，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而且，我还需要时间来找那种媒介物质，这可能

成为现代医疗学里的一个悬案。要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

“那您的位置……”考德里亚努想继续进行说服，但克里斯蒂安立即打断了他：

“我自己完全清楚，这并不是故作谦虚，摆什么姿态。我时刻想得到的就是那种物质，如此而已。能做副系主任、系主任、院长的人才多得很，随便你选。我向往的绝不是这些。以后，我还愿意作为主人来招待他们，孤孤单单，我再也不受这种罪了。我也喜欢开开玩笑，说说笑话，甚至装模作样地闹一闹。职位会把你推到另一条路上去，而威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你带来职位，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位。这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但是，您不明白这是为了使您的科学事业进行到底吗？”

“你们可以找能够理解我的另一个人，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这样白白浪费了。”

“如果我不清楚我们处的地位有多大危险的话，”考德里亚努改变了策略，“我也不会轻易牺牲这一个晚上。假设说克列楚当选……作为竞争过的对手，他拨给您的研究经费，会比多尔奈什蒂还要少。而我，作为支持过您的人……他一旦取胜，只需要动动嘴就成了，他会把我们调到一个卫生职业学校去。当然，对于奥泰斯库的表现，您完全有权认为您受到了侮辱。但要想被人接受，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对于新班子，新上任的人，即使是那些口头上一

直赞成支持的，人们也会说三道四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心里也会打鼓：‘这家伙会对我们怎么样呢？’尔后，心里忌妬，表面上却随声附和。没有办法，对于生人，人们总是害怕的。您知道头脑人物起多大作用吗？差不多一切都取决于他。新的变化不大容易接受，可新的弱点也不大容易发现。那么，恕我直言问一句，您知道人们会是怎么样的吗？您的时间都用去搞科研了，没深入地了解过他们……最好您不要匆忙下结论……”

“不愧是个真正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暗自赞叹地这样想，“他就象对待赛马场上一匹普通的马一样，把宝全都押在我身上：万一我胜了，他会因此而得到奖金。如果不是这样，无非是个小小的失误，下一次再把赌注下在另一匹马上。当然，这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未免太庸俗，太不严肃。但不管怎样，我是属于最后一批使他得到教训的人，尽管完成这件事简直让人恶心……对这些人，我没往好处想，怀疑他们，为此我应当感到内疚。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不管让人如何惊奇，图比还是真诚的：他说的完全是他想说的话，他从来没考虑过要斟酌字句。如果朗卡来了，还会让大家笑得更厉害。无论如何，图比到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们怎么了？考德里亚努让大家到我这儿来，也许是对他们施加压力，强使他们感到自己的义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波赞是同意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如果明天让他到克列楚那儿去喝酒，他在那儿也照样会说同样的话，照样会拿图比开心。也许我应该接

受，比如说，试验性的。作为院长，连安德烈我都可以做出安排了。”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点都不喜欢，但他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瓦西利乌坐在那儿，把头仰到背后，不再去看波赞。“他一句话不说，象是完全没了力气，可嘴里还在哼着一段歌剧里的曲子。也许葡萄酒使得肖邦又复活了。这是在座的当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许沉默是他的一种手段。”克里斯蒂安想道，“刚进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谈女人，显得满高兴的。现在这个瓦西利乌却在端详我的墙壁。或许他身上的傲气也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可以当呢？也许他自己也在这样自问。而我，奇怪得很，并不羡慕多尔奈什蒂，我谁也不羡慕。”

“我的话让您不高兴了吗？”考德里亚努不安地问道，“我看您有点失神的样子……也可能累了。说真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准备散席。”

“啊，不，”克里斯蒂安假意说道，“我觉得精神蛮好。对同事们，我并没有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能让他们特别高兴，但也不至于特别失望，因此我自己也不会那么动感情。我在考虑想什么办法再让气氛活跃一下。我想建议我们玩一下捉迷藏，或者打扑克‘顶七’，也许谁输了会不高兴，甚至会吵起来。刚才我还想起上大学时的一支歌子。也许这些天真的游戏会把我们带进另外一个天地，使得这一晚上不致败兴。看一看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青年时代，我们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不会伤害谁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什么不愉快的往事。”

“我只会现在的这些新歌子:《鼓手进行曲》,滑稽模仿,非常有意思。”考德里亚努附和着说。

“现在我应该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克里斯蒂安想道。“你到底向我要求点什么?”但最后他还是采取了温和的语调:“作为主人我总得想点办法。你瞧,已经过了将近一个钟头,同事们还都没有尽兴。”

“我理解您的心情,教授先生,”考德里亚努说道,“事先并没有人对我讲过什么。我想他们都真心地敬仰您,他们不会这样头脑糊涂,不会看不出您的晋升对他们的前程有多大意义。没有您,我们的学院……”

“你干吗这样恭维我?”克里斯蒂安话里带刺地回敬了一句。看到人们毫无表情的脸色,他心里忽地涌上一股恶感;他真想冲他们好好发泄一通,结果,决定先从考德里亚努这儿开刀。“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克里斯蒂安想道,“他应该当着大家的面赞扬我。如果不是这样——他的沉默会对我解释清楚一切。我不愿意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开这里:他们在我家里把我战胜了。”

“我说的我自己完全相信,”考德里亚努说道,“我一直是在大家同声称赞您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对你的恭维,我表示感谢,”克里斯蒂安显得并不激动,“但这没有什么用。我一直没有卷入这种斗争,一直处在局外人的地位。我只希望顺着自己开辟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应当感谢我的老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他收下了我这个徒弟……”

“就是嘛，”考德里亚努接着说，“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希望自己对谁都不欠任何形式的债，要让人们感到，我是独立存在的。”

“你应该意识到，提出接替多尔奈什蒂这个问题的那会儿，我就是独立存在的。以前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他本想这样说一句，但不愿用这样生硬的口气，于是想出了一句比较顺耳的问话：

“你有自己的附属医院，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工作。我的研究，跟你的专业并没有什么联系。不错，我也做手术，而且经常做，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的地位已经够高了，你还年轻，我对于你来说，究竟有多少重要性呢？这你应该相信：一个人，不管多么了不起，难道能在学院的天空上随便捅窟窿吗？学院的事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您忘记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考德里亚努反驳道，“最后，还得领导说了算，因为他有权，多少事都得取决于他。而如果领导者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克里斯蒂安见不能把他引向一次推心置腹的讨论，不想再继续下去，于是说道：

“别丢下他们不管，我们还是应该一起高兴高兴，笑一笑，别再谈为什么要聚会了。喂，依昂奈，”他突然对波赞说道，“人们都这么愁眉苦脸的，这象什么话？”

“照理说，”波赞开口道，“我们应该都回家去，别连你的兴致也破坏了。可是，不把这些葡萄酒解决掉，我根

本不想动地方。这不怨你，不用过意不去。我们这些老朽，要活跃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图比给我们讲一讲在维也纳遇见的他那位朱丽叶的故事，也许会使大家感兴趣。一天晚上，他正在房间，突然来了一位姑娘，身上一件小小的连衣裙，是用……香蕉串成的！在那样一个古板的讲究礼仪的城市里，竟出现香蕉串成的衣服。可图比当时饿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她身上拽下香蕉就吃。”

“说得太夸张了，”奥泰斯库兴奋地插嘴说，“不错，香蕉我是吃了，用不着撒谎，可丽赛蒂在我房间里至多呆了一个钟头……”

“他终于开口了，”克里斯蒂安教授心想，“一转话题，瞧，他又来了精神！就是这么回事。”克里斯蒂安赌气一扬脖把一杯葡萄酒喝了下去，学着波赞的样子，接着又给自己斟满，而且决定跟大伙挨个碰碰杯。瓦西利乌说了声“祝你长寿，亲爱的！”然后急匆匆地喝了一口酒。结果，喝得太急，几乎全都呛了出来。看来有什么事使他不舒畅，而克里斯蒂安却到底没弄明白他为什么来。图比避开他的眼光，站起来说道：

“你应该对我的著作再熟悉熟悉，这样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接着又绘声绘色地讲起他同那位身穿约赛芬尼式香蕉服装的法国姑娘的故事来。波赞走到克里斯蒂安身边，激动地吻了他一下：

“让那些笨蛋们见鬼去吧，他们高傲得就象猫见了跳蚤。不管怎么说，没有他们，你照样是伟大的。”

安德烈离开扶手椅，躺到沙发上，把两只脚伸出去搁在小桌上。不难预料，这一晚上会这样继续下去，说笑话，还有重复过千百遍的陈旧故事。最晚十一点钟，先生们就要告退：一些人是怕太累，另一些人——怕夫人，还有的，已经腻烦。而他父亲，晚上一片安眠药，刷上半小时牙，手里拿一本侦探小说，一睡着就会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他打算出去一下，经过走廊，这样也许会看到考德里亚努。但结果却一动没动，暗暗恼恨自己终究冲不破心理状态的束缚。“这家伙这样捉弄他，爸爸却一点也觉不出，还在夸这小子。这些老头子们，就象是刚从别的星球掉下来的一样。”安德烈闭上眼睛，忽然，脑子里闪出他妈妈的面影。他时常梦见妈妈，有时一连几个晚上都梦到。只有偶尔几次才是她平时的样子：文静的动作，宽厚的笑容，略带忧郁的脸色。更多的却是从未想到过的形象：黑衣修女，大街上过路的女人，同班同学，而且，好多次见她竟穿着伊丽娜或者班奈德斯库小姐的衣服。每次梦到她以后，都感到身上特别不舒服，屋子里就象充满一种古怪的令人不安的气氛。于是他用眼睛搜索着房间里的每个角落，打开灯，走下床，吸几支香烟，等再躺下睡着之后，便又开始继续同样混乱不清的累人的梦。“也许从那时起，我们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他心里想，“爸爸和我在浪费着自己的生命，是的，浪费生命。”这时，他忽然惊恐地一怔：眼前站的恰恰是考德里亚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大概我把你吵醒了吧?"考德里亚努诚恳地道歉说,"我没想到你会在家……"

安德烈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他曾多么想进行这次会面,每根神经,每条肌肉,甚至每个细胞仿佛都要说出点什么,都要对眼前这个张着大嘴笑呵呵的人,哪怕说出一句解恨的话。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安德烈顺口答道。

"首先,你爸爸就一句也没提。"考德里亚努说。

"不,"安德烈笑道,"我同他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互不干扰。"

"很遗憾,你完全可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嘛。"他显出一副真诚的样子,"我想教授先生不至于下过禁令吧……"

"噢,没有!"安德烈说道。"可那边不是我的事。"

"你知道,在这儿呆着可没法过得高兴。"考德里亚努率直地说道,"真可惜教授先生的这点时间。可我想,那边说话这儿也可以听得到吧……"

安德烈顿时觉得好象一口气哽在了喉咙:"这么说,你是为这来的,"他心里想,"好,你就检验一下吧!"但结果说出来的,却并不是什么激烈的反驳:

"想了解这一点也不难,您自己可以试一试。听得见什么吗?"

这时,奥泰斯库正在说话:他还在讲他维也纳的那些趣事,考德里亚努并不去听他,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别的意图,急忙说道:

"你知道，有时候人们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有趣。要完全了解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你们青年人对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看法。我想，论年龄，我跟你们倒更接近些……"

"甚至对诚实的看法也不同。"安德烈话中带刺地回答道。出乎意料的是考德里亚努却热烈地表示赞同：

"每一代人都想用自己的观点给诚实、公正、真理等等下定义，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历来都是如此，重要的是如何遵守它。只有事实才是言论的物质基础。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退让妥协太多了。"安德烈急忙补充说。

"对，正是这样。"考德里亚努说道，"要说幸运，那就是让你们在这方面少一些。"

"也许一点儿也不需要……"

考德里亚努冷冷地笑道：

"你是说，都让我们占去了，一点儿也没给你们留吗？别这么天真，不会的。教授先生知道你在家吗？"考德里亚努突然问道，"也许如果你在那边，这一晚上我们会过得更快活。你都听见了，我们都不那么高兴，不是吗？"

"是这样，"安德烈承认道，"都垂头丧气。"

"我过去了，"考德里亚努说道，"别让他们以为我开了小差。我希望我们以后常见面。两代人之间，互相谈谈看法，只能是十分有好处的。"他把手伸了过来，安德烈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地也伸出手同他握了握。停了一下，

他才吃惊自己怎么竟会做出这个动作，于是一下子扑到沙发上，把头埋进了靠垫里。“我真是天下少有的胆小鬼，”他心里说，“过不一会儿，这一群都得到我这儿来，就象参观博物馆的展品那样瞅着我，他们会说，瞧，多漂亮的小伙子，多聪明。这个说长得象爸爸，那个说长得象妈妈，而我，要装得象抹了奶油的甜面包那样娇嫩。爸爸会为他培育出来的小苗而感到得意忘形。”他站起身，穿好衣服，随着瓦西利乌刺耳的笑声，只几步便穿过了中厅。

“你知道兔子怎么吃吗？”奥泰斯库问道。波赞立即用他特有的方式答道：

“用嘴吃，假如你的嘴没毛病的话！”

克里斯蒂安教授并没有笑：他坐在桌子顶头，冷冷地一句话不说，然后，倒满一杯酒，照直走到图比面前，说道：

“祝你长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支持的候选人。我提议你，全力支持你，只要你给我四只反应器和几只狗就成了：反正这些对你也没什么用处。”

“这倒是个理智的决定，”图比象是受了克里斯蒂安的感染，也一本正经地说，“你毕竟还年轻。”

“希望瓦西利乌也支持你。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的要求。年轻的时候，他帮助过我一次。一生当中，只要求帮助两次，不能算过分。”但瓦西利乌却装作没有听见，他在注意波赞，而波赞也把克里斯蒂安的话当了真。他说道：

“好，我同意，但是要在你以后的下一届。我怎么能

现在就看着他这样的人上主席团呢？”

“那我们就为他唱起来吧！”克里斯蒂安建议道。他极力忍着想把眼前的一切都打碎的念头：他感到受了侮辱，而又无法摆脱窘境。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考德里亚努。“如果他们之间互相抵消力量，”他心里想，“那么就可以启发多尔奈什蒂，选一个年轻的，有独创精神的，能跟上时代步伐的院长来接替他。”为了不使人们弄清究竟，他站起来，响应克里斯蒂安的倡议，领头唱道：

“昨晚我拿走你的耳环……”

七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今天没有什么可记的，克里斯蒂安同志没出实验室。我问阿纳尼亚同志，教授在干什么呢，他竟放肆地说，戴着拳击手套数自己多少根头发呢。我假装没生气，问他为什么不想同我做朋友。这位同志回答说，他有教授这个朋友已经足够了，因为，你的朋友越少——你活的时间越长。当时我对他说，用不着这样神气，你不过是个实验员，等教授一退休，就会有人照你屁股上踹一脚。他回答我说，克里斯蒂安同志离退休还早呢，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他自己就回到山里去当他的牧人。他说，放羊的也来搞科学，

他已经腻烦了。我问他，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他回答说，如果我不明白，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是把克里斯蒂安的观点照搬了过来。然后，他问我是否跟梵蒂冈有联系，他们给我多少津贴。我仍然没显出生气的样子，请他去喝杯啤酒。他说他刚跟教授一起喝过红葡萄酒，他不愿意把这种好味道破坏掉。从这儿不难看出，他这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教授能同实验员同志一起喝酒，那么，为什么不能同那位女同志班奈德斯库在值夜班的时候一起溜达呢？"喂，阿纳尼亚，你没跟女人一起过吗？俗话说，玩乐没女人就象葬礼没神父啊！"我对他说。"你打算同我们实验室里的搞恋爱吗？"他对我说。我想了解一下实验室里到底有什么，于是点了点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去请你，不过当心把裤裆里那玩艺儿给你咬掉。"然后，他咧着嘴傻笑着走了，就好象自以为有了大人物保护，就可以随便拿什么人取笑似的。

我没能了解到克里斯蒂安同志到底怎么了，感到非常难过。他近来为什么这样沉默，这样躲着大家？他想要干什么？正在干什么？为什么引起了人们这么大的注意？但是这儿的工作十分不好开展。我亲眼看到，大家都不敢讲话，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我并没有气馁，我提心吊胆地挨个问了每个人。索阿雷大夫同志说：是咽炎。约尔卡大夫同志对我说，不少没事可干的人舌头发痒，教授不想同这些人比赛。谁在科学和读书上搞不出名堂，就只好靠

动嘴皮子。还有些蠢人，自己不动脑筋，却只会跟着别人鹦鹉学舌。由此可以再一次看出克里斯蒂安同志的影响。他禁锢人们的头脑，把他们同为公众事业承担的任务分割开来。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回答我说，应该通过组织系统去问他本人。卢苏大夫同志告诉我，克里斯蒂安同志在斋戒，除非绝对必要是不讲话的。拉尔卡大夫同志让我写信给电视台，到“您还有问题吗？”节目里去问。女同志班奈德斯库那儿，我没敢去，我请约内斯库护士去打听。她回答约内斯库护士说，她将提醒教授，让他好好当心自己。她显得很惊奇，用手指指我，好象说我这个人有点儿奇怪。我没有办法，只好对她解释说，我对教授十分关心，见他这种心神不定的样子，担心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会不会生病了。她说对我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并且将转告克里斯蒂安同志。约内斯库护士咕咕哝哝，说自己倒霉，碰上了这只母蝎子。我没再管她，然后便走开了。因为萨乌大夫负责我的工作，而且对我很友好，所以我气呼呼地对他说，简直没法去了解什么事情，一来就问你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知道，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思想意识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心里想的是一样，说的又是另一样，就用不着藏藏躲躲。但是，他坚持的那种理论，我从克里斯蒂安同志那儿也听说过：什么法律也承认个人生活是神圣的呀，业余时间人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呀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由此可以再一次看出，这种影响的根深蒂固。教授同志在工作人员当中制造一种怀

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的气氛，以上记下的这些情况，完全说明了这一点。约内斯库护士见我很为难，便告诉我说，教授同班奈德斯库女医生已经断了关系，女医生打算抛弃他。还有，克里斯蒂安同志很生他儿子的气，因为安德烈同志和一个离了婚的行为不轨的女医士保持着暧昧关系。安德烈同志向她求婚，她为此感到骄傲，扬言她简直没法摆脱这个毛孩子，如果他再坚持，她就让教授失去这个宝贝儿子，两个人远走高飞。直到现在，他们家连个固定的女主人都没有。她还说，要不是这个干豺狼似的女人班奈德斯卡，她早就同安德烈结婚了。即便这样，如果找不到更合适的，也要同他结婚。克里斯蒂安同志去找她，声严厉色地警告她，叫她不要同安德烈再纠缠下去。她回答说，她有她的自由，愿意爱谁就爱谁，用不着别人干涉。后来教授对她进行威胁，她这才答应罢手，说她需要的是男子汉，不是流鼻涕的娃娃。这些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但还不足以充分估价教授对人们思想道德方面的反面影响。

我还没能同那些事故受伤的工人同志进行接触，因为教授亲自对他们做过手术之后，他们还没醒过来。我同一个工人同志的妻子谈了话。她是个农民，嘴很凶。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只等她丈夫恢复过来。她说她要找公路桥梁建筑公司经理，让他知道知道她的厉害。她说这位经理同志把铺公路用的沥青和修桥用的石子统统卖掉了。她说，这位同志剥削工人，但是却撤不了他的职，因为他经常往上暗通关节，而且县里还有他的后

台。这位女同志有些夸大其词，她硬说这位经理用卖沥青的钱喝酒，算起来足够修一座水电站。她还说，不但他干的事肮脏，就连长相也象头肥猪。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

明天休息，医生同志们或者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在家。这样我可以同来探视的家属详细交谈。如果可能，甚至可以和工伤事故的病人谈一谈。

到目前为止，那位同教授讲外国话的女同志手术以后还没醒过来。但我听说她有过庄园，跟教授是朋友。同我第一次听她讲话时的印象不一样的是，她并不是外国人，她可能神经有些不正常，养了一些狼。但是我必须亲自证实一下，因为好多大夫都知道克里斯蒂安同志在治疗癌症方面有重大发现，如果不是我们第一个享受到由此而得的外汇利益的话，那将是十分遗憾的。这位太太有精神病，并不等于她不可能同外界有什么可疑的联系，甚至不能排除这完全是假装的。以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一九五三年曾给我们送来过一位同志，让我们检查一下是真的聋哑人，还是装哑。最后经公安部门证实，是一名破坏分子。

八

你对你父亲的表现不满，你要了解我们之间的事实真象，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这说明你是个独立的、有主见的、不随风倒的人，尽管你可能并不相信我。发现自己家

长的一些不愉快的事，简直是十分可怕的。但是，既然他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勇气这样做，既然他对你隐瞒了一切，我认为你完全有权从这样一个人嘴里了解你感兴趣的情况：这个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一切已经无所谓，再故弄玄虚已经毫无意义。我感到生命在我身上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流逝，有一种日暮途穷的古怪感觉。我好象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看世界，在善恶完全超脱的那一边，因此，也许我并不能完全尽心尽力地把一切都讲给你听。在死亡面前，我的过去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的惊骇，我的痛楚在另外一方面。当然，我有孩子，有家庭，年纪还不算太大，应该是另外的命运，还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过错，还是生活的驱使，我竟落得一事无成，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天分比别人更低些。过去，我过分看重了某些琐事以及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各种各样的原则。而克里斯，除了自身的利益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去看。他一直忙于奔向自己的目标，不绕弯路，不动感情。他比我更为满意吗？事实上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本来我可以什么都不对你讲，但是我见你是这样地想了解，这样地诚心诚意，如果我不讲话——就象克里斯做的那样——很可能你会去找那些仇恨他的人，不理解他的人，而令人遗憾地得出一种不恰当的印象。我不否认，命运把我们分开了，这使我感到痛心。他曾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或者说，我曾经这样认为过。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挽救还有可能挽回的东西，消除各种怀疑，消除强加

在我们身上的各种流言蜚语。我要求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请他好好听我讲一讲。有多少次，我整天在你们房前徘徊。而且，更甚于此，我直接进去，到他面前去请求。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不会再去交新朋友，有老朋友，现在的朋友，你就觉得满足了。我知道他自尊心强，所以我才采取主动。我极力想把过去的一切忘掉，但他却高傲地、不可一世地拒绝了我。他那种鄙视人的态度，他的自高自大，着实伤害了我。我敢发誓，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改不掉的东西。退一步讲，就算我不对，以前都是我的过错，难道我就没有为此付出了代价吗？难道我连解释一下的权利都没有吗？或者，如果需要，赔礼道歉也行；在这之后，可以永远不再同我讲话。好象我是如此渺小，竟至使他不屑一顾。我承认我不那么坚强，而即使再坚强，最后也不会有什么作为。正当我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癌症却找到了我的头上，尽管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还否认这一点。离开刀动手术已经没有多久了……也许恰恰是克里斯，将第一个高兴地证实，我确实患的是癌症……不管怎样……这次在你们家，对待我还算过得去，你和绍依曼斯库太太都在场。尽管哪怕是顺口让一让，也没请我坐下，但总算跟他交谈了几句，同意收我住院。无论如何，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界限……对于这一切，我只能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最好的。尽管他恨我，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他还是会认真地给我做手术，这完全是出于一种狭隘自私的目的。但死亡的阴影使我胆怯，使我惊慌。

夜里，我有时会突然惊醒，满身冷汗，周围一片漆黑，不由得使我自问，是否已经到了那一边，是否还真的在活着。我害怕再睡着，不敢想别的事，这种病简直会使你神经错乱。所有没病的人，在你面前都会显出无比的优越感。我活着也干不了什么，维持全家生活，如此而已。当然，没有我他们自己也能活得下去，但我还是想逃脱开临死前的惊慌。等克里斯给我做完手术，也许能够免除这种精神折磨。早一天死或者晚一天死，我说不准确切日期，无法知道哪一天我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克里斯那双神奇的手，曾多次使他自己免遭不幸。当然，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既然他是你的父亲，那么即使你了解了事实真象，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到底你们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你们将一直生活在一起。把事实真象告诉你，我这样做好不好呢？我对你是否已经了解到可以推心置腹的程度了呢？我真是不愿这样做。我知道，如果你相信了我，很可能使自己脑子里的神话破灭，会以另外的眼光看待你唯一的亲人，这将是件令人伤心的事。但使我感到宽慰的是，并不是我挑起了你对父亲的不信任，而是你自己来请求我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我并不想做别的，只是打算向你提供几件事实，在这之后，等你逐个了解了全部事实，然后自己再作出应有的结论。当然，任何事情都已经无可挽回，他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不可能再改变什么。但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有你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对你说明事实真象，并不是因为我恨他，因而对他进行报复。即使

我有这样的想法，也会采取另外的方式，只在我和他两个人之间，而不会把你也卷入。事实上，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能力进行报复。怎么能想象我会挑唆儿子仇视父亲，挑唆亲生的骨肉分离呢？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需要一定的灵活性，需要事先考虑出下边的步数，就象下棋那样。为了挽救事情、原则、有价值的东西，甚至人，有时不得不作出某些必要的让步。克里斯太自信，太执拗，直到今天，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年龄，仍然不愿意理解我也曾遭受过痛苦，尽管同他做朋友感到的欢乐，在某种程度上曾经补偿了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带来的烦恼。

我是怎样认识克里斯的？可能你会发笑，但这个问题曾提出过多次，我也曾口头和书面地回答过多次。当然我并不想发誓，肯定每次的回答都是相同的……简而言之，我们认识了，这就是一切。当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上大学，我是法律系里比较活跃的学生之一，而他——医学系的活跃分子。当时我还选听其他课程，常到医学系去。我想我们是在那儿认识的，见面时互相打打招呼而已。有一次，在化妆舞会上，因为药学系的几个女学生跟农学系的男生打了起来，那时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我记得，当时药学系的一个学生对农学系的一个学生说："喂，我说，你这个研究草根和锄把的高等学府的高才生，不想回到自己的课桌上去吗？"从这儿就吵起来了。那时候，克里斯是个十分活跃、爱出风头的人物，干什么事都象要拚命似的，

打架、吃饭、跳舞，都劲头十足，喜欢学点新东西。不管什么环境，他都少不了要表现一下自己。那时候，我敢肯定，他还没接触过女孩子，对她们表现得很没礼貌，不感兴趣，甚至连对异性的好奇心也没有。但打起架来，他却老是冲在前头，挨拳头、打拳头，为的是一心想要表现出自己是超群的，自己应该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巴黎我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是在爱丽舍大街，德·洛克上校，“十字军”的头头，组织了一次法西斯进军：人们吵吵闹闹，这位上校象个疯子似地大叫大嚷。克里斯——我那是好久以后第一次见到他，从地面上掀下一块石头，正准备照着上校的脑袋扔过去。他当时根本没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果万一真的打中，只要警察不来，上校手下的人会立即把他砸成肉酱。我拉住他，一再劝解，直到他相信无法靠近上校这才罢手。“这象什么话?”他经常对我这样讲，好象应该被说服的是我，“人们怎么会受这些人蛊惑，让这些无赖推着走？他们唯一高兴做的就是侮辱人，折磨人……”那时他确实被激怒了，他给城里的几家报纸写了几篇通讯，他重复过几十遍的这句话，我也在报上看到了。他的信仰主张是一回事，而行动——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反法西斯英雄，竟昏头昏脑地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去扔石头…… “法国的事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曾试图这样劝解他，但他却给我上了一堂极权主义危害的课。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将被黑暗所笼罩，到处将会充斥着暴力和愚蠢。而他，不管冒多大危险，也决不接受这一切，

干出什么蠢事他都不在乎。他相信，靠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扔石头还是给报纸写点小文章，都有可能改变世界。后来，我们经常见面——在一个看起来已濒临死亡的城市里，我们感到孤单——直到他闪电般地爱上了一个叫克里斯蒂娜的姑娘。那时候，她也在那儿学习。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只知道她是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农民的女儿。我见过她好多次，长得漂亮、结实，身上就象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精力，是那种总有一群仰慕者围在身旁的女人。见到她，除了结婚，你甚至愿意为她做一切事：她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能够征服你，使你长时间忘不了她；黑黑的大眼睛，清晰的眉毛衬托出微微发暗的眼窝。那种隐藏着一股无穷活力的眼光，会惹得你彻夜不眠。克里斯蒂娜并不是那样多情善感，也不喜欢浓妆艳抹。她的农民家庭影响——但我觉得她性格里，哪怕只是一点点，总有些放荡不羁的味道——几乎渗入到她的每个毛孔。而奇怪的是，甚至她的粗野也能更增加几分诱人的魅力：她骂起人来象男子一样，能把贵得吓人的皮鞋一脚甩到阁楼上去。拍你一下肩膀，几乎让你觉得打断了脊椎骨。当然，这只是在她高兴的时候，而其余的时间她总是兴奋、狂躁不安。我感觉她象是在飞跑着奔向自我毁灭，而你又无法阻止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扳动哪个制动闸，她简直象一阵旋风那样难于捕捉。她同克里斯沉醉在难以自拔的爱情中，但正象我预料的那样，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她就感到厌倦了，再没有话可说了。更确切一点说，他根本不中她的意。

也许正是由于他驾驭不了她。他的骄傲、自尊、自信，在她面前统统被溶化掉了。他象患了夜游症似地整天跟在她身后，不管她说什么，他句句都听从。在她面前，他百依百顺，简直变成了一只乖乖的羔羊，再也看不到一点个性的影子。在这之前，他曾经设想，回国后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一个人专心进行研究。但是自从跟她在一起之后，只要她提出要求，他甚至可以去做清真寺的大阿訇。克里斯还算有幸，她很快又同当时一位有名的律师搞上了。这位律师叫弗格什乌，是个看风使舵的政客。但不久，同样也被她抛弃了。后来，不知道她又干了些什么。总之，她象梦一样，一场恶梦一样地消失了。克里斯如同经过了一场大病，过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过来。在当时的巴黎，他的确是无意识地落入情网，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感觉到了世界末日，应该尽情玩乐。各种各样的姑娘，不同肤色，不同地区、国度，不同身材、体态，可以尽你挑选。“我要找个印度支那姑娘，”他曾对我说，“我现在在研究亚洲，我是按照字母的顺序，从这儿开始的。”又有一次，我在拉丁区街上的一个酒馆里碰到了他，他拿出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旧物，对我炫耀说：“这是塞内加尔的。”他这种新的狂热表现，是出自受了损伤的自尊心。他对这第一次情场失败，直到他自愿去前线，然后又从前线回来，一直没有忘怀。他仍然要处处崭露头角！他怀着对法西斯分子的厌恶心情，离开了巴黎。“就是女人也阻止不了我讨厌这帮穿制服的木偶。他们一旦得了势，人们就会

忘记怎样思考，在他们的制度下，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只能遭到第一批基督徒那样的命运。”在国内，等待他的却是光明的前途。波普教授处处关心他，一心想让他继承教学上的事业。但克里斯却没有耐性等待时间的自然流逝。他以一种疯狂的、急不可待的心情，企图缩短时间的阶梯。任何一点的平静、安定，都会招致他的不满。他象是为了在克里斯蒂娜身上的失败，而对一切人都进行报复。仿佛他手里拿着蜡烛，到处寻找引起事端的借口，寻找引起人们注目的任何机会。在他眼里，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散乱的、灰蒙蒙的一片浮云，只有他和世界并存，只有他自己，这就是一切。

事实是他确实与众不同。许多事情他都能获得成功，就好象幸运能事先安排好一切，来满足他的欲望。克里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志和特殊的捕捉时机的敏锐感；他每次的行动都是选在最合适的时间、地点，从来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动作；那时，他绝不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动声色，从来不谈自己的打算和想法，显得寡言而坚韧。而且由于他善于用尖利讥讽的话语，善于把事实和决心隐藏在沉静的外表之下，从而能很快地在他周围建立起一个与人们保持一定距离的保护圈。这个圈子，我认为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也无法渗透进去。他从军队复员之后，克鲁日大学也从西比乌迁回原地，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见面。也许因为我们在巴黎共同生活过的缘故，由于我是他唯一一次失败的见证人，由于我不愿出头露面，甘心接受退居第二线的角色，

由于我并不掩饰内心深处对他的称羡，由于两个人相互间自然而然的同情感，我们结成了朋友。战争刚一结束，他立即陷入做外科手术的狂热，但同时，也同癌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巴黎的时候，他曾对一个实验室十分感兴趣，甚至打算用它来做一些最新成就的实验。那时波普教授深深为他的热情所打动，寄钱资助他。他象头牛似的卖力工作，倒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出于对科学的好奇心，而是认为每一次手术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实践，都是检验他的技术、方法的机会。他试图积累自己的经验，特别留心那些误诊和极为特殊的病例，把这些写成文章或者报告。总之，除了专业和业务前途，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政治已经失去兴趣，他相信战争结束后，人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在医学之下。他一心想成为波普教授的继承人，由此可以解释他对政治曾经有过的浓厚兴趣，之所以急剧减退的原因。当我问起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由何而来时，他回答我说，法西斯主义的灭亡，打开了人们对于极权主义、独裁、疯狂等的眼界，这一切如今已不会再重演。现有的政治力量，可以保证比较现实的民主。因此，他的任务只剩下钻研科学。“这么多的斗争，已经使你尝够了滋味，已经使你厌倦。”他对我说，“因为你必须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把实现业务的目标往后推迟。逐渐你应该学会放弃一些东西，或者说选择一些东西。在这儿，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无数的因素，而在科学领域情况就完全不同，成功与否完全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毅力和聪明才智。政治是一种医治不好的疾病，

但今后情况不逼到临头，我会一直选择留在手术室，我将始终不再离开医学教育工作。”他经常到工人俱乐部或者农村去作报告。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他的情况，在他从政治领域退隐的背后，却暗藏着另外的原因：他想在别的方面即刻得到迅速的成功，而且当时的政治局势还不明朗，他不想再做什么冒险，而是等着看一看天平的横架到底摆向哪一边。他很会装门面，善于做出令人信服的样子。如果不是有求于什么，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只有同丝若拉·绍依曼斯库的结婚，才又重新提起了他对政治的兴趣。丝若拉是律师、民族农民党议员奥雷尔·绍依曼斯库的女儿。她父亲做过乡长、区长、还有随便你说什么长，总之是个出名的大律师。由于农民家庭出身和已经提到过的热衷于作报告，他的岳父自动成了他为共产党人服务的合作者。但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对他岳父的信任，还是出于感到应当有个对话人的需要。克里斯的角色对他自己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为了做给人看而由克里斯一手导演的争论。不管怎样，他寻找论据，引经据典，辩论往往无缘无故地引起，有时甚至感情激动，说出一些刺耳不恭的话。如果没有太太们的介入，竟不知道会怎样收场。通过一次次的争论，克里斯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竟相信那些自相矛盾的、诡辩的、只是为了宣传的学说，他甚至能够替那些行为鲁莽武断、坚持明显错误的人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他真的相信这些吗？是他自己的暴躁迫使他去反对别人的暴躁吗？他感到别的路都走

不通了吗?他竟如此幼稚和盲目,以致非要证明那些无法证明的道理吗?对此我考虑过很久,但却很难得出明确的答案。

由于他们的争论从来都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进行的,因而不能排除他要故意拿他的岳父——尽管有许多过失,但仍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作牺牲品,以便讨好那些新的领导人。因为当时他们正在物色听话的、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好把这些人安插到领导岗位。假定说当时共产党人不能取胜,他的岳父也会很轻易地原谅他;因为他岳父毕竟是过去一个宽宏大量的政界人物,能够容忍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不敢下这样的保证:他同丝苔拉·绍依曼斯库的结合仅仅是出于纯真的爱情。可能你会认为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谴责我,但是,你曾要求我诚心诚意地谈自己的看法,因此我没必要作任何隐瞒。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事实。假如将来有朝一日他有勇气向你讲明真象,不再对你隐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说过的情况。我想你已经体会到,向你说明真象,讲明我迷惑不解的问题,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这正是因为怕由此而引起你对他的怨恨和鄙视。因此,我想再次向你提醒我作过的允诺:我们就只当谈论的是些不相干的人,丝毫不抱成见地加以评判。谈到我迷惑不解的地方,你可以向我提出以下的问题: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却不了解全部答案呢?但是,克里斯并不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即使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你也无从知道他说话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当然,

一个行动可以有数不清的解释，而克里斯绝不是生性低能，他从不选择最近的、最容易击中的靶心。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一个十分有韧性的赛手，一架毫无差错的计算器，因此，为了了解他，你必须下很深的工夫。为什么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他，到头来却仍然能够步步青云呢？为什么今天他能爬上高位，而那些才智能力并不亚于他，没有他这么多的遭遇，历史清白没有污点的人，却仍然默默无闻呢？另一方面，友谊里也有很大程度的习惯成份，再加上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命运，以及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相互信任。但是，除此之外，你年龄越增长，关心的面越宽，跟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就越少，再同他们相遇的时候，也就不愿再提起过去，而想代之以别的什么。

克里斯绝少向我提起丝苔拉。这可能因为我曾是他爱情失败的见证人，可能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她，我同她是好朋友，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心心相通的不同寻常的感情。也可能因为他们两个的匆忙结合，对他来说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绍依曼斯库律师当时是个有名气的人物，你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就是律师给女儿丝苔拉的陪嫁。当然，你不可能了解你的外祖父，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高高的个子，体格强健，两鬓过早地生出白发，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手里拿一支烫金柄的手杖，而且不时地挥舞它，看起来简直象一个感情充沛的乐队指挥。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有时，只需要他露一下面，官司便能打赢。最使人惊奇的是他的目光：包含着一股严厉和不寻常的力量，简直

射得你浑身感到灼热。尽管他收入多，却并不富裕。钱多半都用来布施善事，为穷人办慈善食堂，资助修建塑像，而绍依曼斯库太太则经常捐助教堂和战争造成的残废人。不少年轻人都是用他们资助的钱读完了学业。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为他的党做宣传的意味。他做什么事都不喜欢默默无声：他的一切慷慨行为都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也正是为此，他付出了代价。战争刚刚结束，铁卫军①的首领奥尔迪亚努上尉的两个副官斯丹察和波连古到他那儿去要求捐助资金，为的是帮助那些回到家乡的阿尔迪亚尔人和曾经遭受霍尔蒂分子迫害的人。这次奥雷尔·绍依曼斯库也丝毫没表现出吝啬，甚至还向其他人作了宣传动员。为此，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民族农民党案件中，他的这种慷慨和天真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报应：当时他并没有核实那两个人到底是谁，那些钱实际到了什么地方。幸好他没被判罪，而在这之前他时刻等待的是进一步高升。直到这次事件，这位并不曾戒绝女色的王子，曾热衷于收集古董：他购买各种艺术品，旧家具，稀有书籍，差不多所有旧阶层在委托商店寄售的东西。但大部分用的却是克里斯的钱。当时你父亲已经名声在外，当然，这其中他岳父的名望也起了很大作用。绍依曼斯库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提起维也纳或者巴黎的某个名人曾经怎样评论克里斯蒂安医生。“别看他生在马圈里，但是这个农民的儿子将来却能使一些著名的

① 德国希特勒集团和罗马尼亚反动上层支持的罗马尼亚法西斯組织.

学者大吃一惊。”绍依曼斯库曾这样说，“他身上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刚毅以及农民所能够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共产党人还没能使它充分发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使人不要剥削，不要积累私人的物质财富，殊不知贫穷能使人变得浑浑噩噩。我同克里斯蒂安在一起倒是得益不浅，可是对他自己却有所损害。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家庭当时的确需要一点新鲜血液，需要归根到共同的力量源泉上。”绍依曼斯库对我的态度很友善，他经常让我给他解释新的法律，他弄不懂当时的一些发明创造，一切的一切都跟他所了解的完全翻了个个儿。由此而引起他一系列无休止的评论。对克里斯的入党也是这样，连我对这件事也感到意外。没想到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在不慌不忙地为自己步步高升准备条件。他的岳父已不再是他利用的对象。是因为他已经老朽了吗？一点不错。他开始使用另外的发动机来继续自己的道路。事实上，老头子也拿克里斯打趣：“我们家现在已经大大向左转了，这样一个进步的女婿，甚至可以去检举我，说我对共产党人不恭，拿他们取笑。”后来，绍依曼斯库了解到自己将要被捕，便先跑去自首了。“先生们，”他对那儿的人说，“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到这不愉快的场面，所以才提前来到这儿。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对我进行公开审判，我将在我一生当中第一次为我自己辩护。”一位军官告诉他，什么时候逮捕不是由他，绍依曼斯库来决定，他们有他们的计划。绍依曼斯库递给他们一张名片。“我过去议会的一些同事都经过了这些，我干吗

要逃跑呢？夜里十二点以前，我在阿斯托里亚饭店，然后就留在那个旅馆。我每天早上八点、中午两点、晚上八点吃饭。只需要送一张您的名片或者打个电话我就会即刻赶到。我不喜欢深更半夜，搅得觉也睡不好。”等了一个星期，他又去找那个军官。“旅馆我呆腻了，我在家等您的电话，不过打电话最好选个合适的时间。”电话一直没接到，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半夜里，却突然来了六个士兵和他见过的那个军官。“我们不是讲好了吗？”绍依曼斯库质问道。军官只好解释说：“没办法，我们也有我们的安排，刚刚今天您才被列入计划。”绍依曼斯库慢腾腾地穿上衣服，一直低着头，他给士兵每人倒了一杯酒，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兵却没有一个拒绝。然后他走到绍依曼斯库太太、丝苔拉和克里斯那儿，对他们说：“这条路很长，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你们别惦记我，不管怎样，我还能活一段，老早我就预感到快要活不长了。你们应该象个做人的样子，不要屈膝低头，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为了我们各自应该做的事，让我们静默吧。”然后，他亲吻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三年以后他才死去。据说是不服从一个卫兵，受到了处罚以后死去的。这个卫兵叫法索莱，是原来图尔达的一个面包师。人这一生真不知道会跟谁无缘无故地结下仇，你不会想到一个毫无意识的行动，会给什么人的心里结下解不开的疙瘩。绍依曼斯库曾经拒绝过为法索莱的房产诉讼进行辩护。他觉得接受这样的案子简直太没价值。后来法索莱丢掉了房产，为此便一直耿耿于怀。一天

晚上，法索莱喝了点酒，或者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晚上点名的时候人数总数不对，一气之下，命令犯人们干脆都去睡觉。绍依曼斯库却没动地方："队长先生，"他说，"报告队长，人都在，一个不缺，没有死的，也没出什么事故。""谁问你啦?"法索莱怒冲冲地嚷道。"我是怕您着急。"法索莱又一次命令他就寝，他还是没动弹。那时，法索莱呵斥他，推他，但都没有用，绍依曼斯库仍然象块石头似地一动不动：据说他瞪了法索莱几眼，眼光是那样刺人，这下可惹恼了这位守卫，法索莱端起枪来，哆里哆嗦几乎都没法瞄准，但是最后一枪还是打中了腿，而绍依曼斯库并没有倒下。这时候，其他人立即跑过来，夺下了法索莱的枪。但这位可怜的老人，腿上的枪伤后来溃烂了，没过几个星期便死去了。绍依曼斯库太太过了好久，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丈夫死去的消息。她去认领衣服，但给她的却不是她丈夫的。结果她还是把衣服带了回去，因为反正也是哪个死人留下的，见着它就如同见着了自己的丈夫。绍依曼斯库的死，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丝苔拉，很快就显得苍老起来。她从来就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但用现在的话来说，却很讨人喜欢。她温文尔雅，聪慧端庄，同父母相比，喜欢沉默寡言。父亲的死对她是个极大的刺激，脸上也无形中投下了几道悲哀的阴影。只有克里斯，显得不动感情，继续搞他的工作。他家简直变成了一个临时诊室，全国各地的人都跑来找他。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从不跟我谈这件事，总是不停

地介绍他的发现，或者给我读他发表在国外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只是偶尔问起我知不知道某个医生的下落，某某人怎么样了，总之，是想向我证明，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努力工作过。只有极少的几次，也曾发过感慨："我们究竟到什么地方算个头？敌人是打垮了，但人类的文明也同时毁坏了。遗憾的是要想完全补偿它，还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但最后，他总会又找出恰当的词句来进行解释。

我当了检察官，完全了解事件的内情。但我的解释，他不感兴趣，尽量避开，而且一提起这件事，突然间，外科医学便会变成谈论的中心。他整天呆在医院，同丝苔拉很少见面。可怜的丝苔拉，不声不响，一直相信他的天才，甚至甘愿做家庭主妇，甘愿替整天满屋子的病人做护士。她对这一切是不是满意呢？这很难看得出。她只是用一种介于怜悯和称羡之间的微笑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有一次我听到她对他说："好象我总希望我们还能单独呆在一起，到什么地方散散步，一块儿说些什么，哪怕是些傻话。我害怕你别再出什么事！做女人的感觉有时候是相当灵验的……""可我们到哪儿去呢，亲爱的？去看电影吗？你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发誓，我可以坐在电影院不动地方。什么看谁刷甲板刷得干净，什么看谁收土豆收得多，净是些这玩艺儿！你别担心，等我搞完这几篇重要的论文，那时候我们会一块儿走出门的，至少我自己也感到十分需要。我不知道科学上又有了什么进步，我感觉得出，好多事已经生疏了。可有件事我不明白，难道

反动科学是可以遗传的吗？我岳父曾经说过，臭袜子总要散味的。也可能是个必须的阶段，也可能我们不理解。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象我怕出实验室。现在解救我们的唯一办法，是让大家感到我是不可缺少的，我是存在着的。”我记住了这些话，正是从这儿我发现了一个跟以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两样的人。他能成功地隐蔽本来面目，除非在极端发怒的情况下，极少流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这方面，他的岳父比他要诚实得多。他岳父从没考虑过要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我想要说的是，你父亲那时候并不勇敢，并不相信政治，尽管入了党，但他相信的还是自身利益。需要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外科大夫，只有不需要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才说真话。据我发现，直到今天，尽管他要求你还有他的学生们，处事要诚恳，而他自己却一心去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对你外祖父的命运，他从没关心过：是否进行过审讯？就连是死是活都不打听。要不然，为什么可怜的老太婆到处奔走询问而不是他呢？他究竟帮了些什么忙？一切都是听其自然。他对我这种态度还情有可原，但绍依曼斯库是你的外祖父，是他妻子的父亲。他被提升为论文组主任，他感到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代替副教授的位置，而且几个月之后，就可能获得正式职称。只不过后来又出了布迪勒的事。本来这件事通过调查也是容易解决的，而克里斯当时却表现出一种吓人的高傲。如果当时他听从我的劝告，或者至少试着熟悉一下他们，适应一下他们的情况，

了解一下这些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并不懂什么法律，在他们的天平上，感情比事实更起作用——那么，克里斯一天监狱也不会蹲。他根本没想到丝苔拉，也没想到你。那时你年纪还小，对别人就更不用提了。他自信自己是伽利略式的人物，哪怕为一点区区小事，也准备作出牺牲。他表现出的不是什么尊严，而是执拗，是极端的高傲。他是如此看重自己的天分，对此无节制的自我欣赏，竟至认为自己是高不可及的。那么这是不是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问题呢？答案很简单。他知道，对任何东西过分使用，都会付出代价，不存在无代价的滥用。于是他又投下最大的赌注。即使你遭受了痛苦，也是高尚的，因为你尽到了做医生的职责。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他冒险救了一个病人，一个特殊的应当先由当局过问的病人。他又在玩弄一宝押在两匹马上的把戏。一方面说他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假定实现了西方所谓的"自由解放"，他也有话可说。也许你会以为我在单纯指控他的动机，这要怪我先得出了结论，而不是在你了解了事实之后得出它。你先不用去管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一天晚上，他正在家，两个人用一辆马车送来了一个大出血的病人，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胳膊上的动脉血管，伤势很重。根据我第二天了解到的情况，克里斯曾匆匆问过他们一句，为什么不送到医院，那儿有急诊。但那两个护送的人说时间来不及了，因为到那儿光挂号办手续就得费好大工夫，而且他们更想让他本人给病人看。克里斯给病人取出了子弹，做了治疗，

他们答应要好好看护，不让伤口感染，他们还要来换药等等，然后就走了。克里斯说他没问他们是谁，干什么的，甚至连他们的模样也没记清。除此之外，他自己甚至没画个问号，战后已经这么多年，哪儿来的子弹？总之，他没有按照正常应该做的那样去报告公安局。难道他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吗？难道他忘记自己从前线回来已经过了七个年头了吗？为什么做手术不用麻药，病人也肯接受呢？动手术的时候，难道一句话也没同病人讲吗？问题很简单。这件事过后没多久，一天深夜，一辆黑汽车开到门前，进来几个士兵和一个军官，告诉他，根据法律，他被捕了，给他几分钟的时间穿好衣服。等克里斯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坚持要他们拿出逮捕证和搜捕证，军官当面向他宣读了，并且要求他立即交出武器，交待他同谁保持联系，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可巧那天有几个来找他看病的同乡，正睡在厨房里，军官也挨个盘问了他们。这时，你父亲发了火，骂人，赶他们出去，而他们却想看他的笑话。克里斯要打电话，找他们上级，被他们制止了。他骂他们是混蛋，他们开始搜查屋子，把柜橱、炉灶、地毯下边翻了个遍。他对他们说他同意交出武器，然后走到书架那儿，猛地拿起书本、摆设，狠命向他们砸了过去。士兵们立刻按住了他，就这样穿着睡衣把他拖进了汽车，没让他见见你和丝苔拉。在路上，克里斯象发疯似地高声吼叫，把整条大街的人都吵醒了。他不甘心这样默默忍受，于是大吵大嚷，企图把公众的谴责引到别人身上：瞧，著名外科大夫克里

斯蒂安，竟这样在大街上被侮辱，被抓走！我不想在这儿谈论政治，只是想强调一下他的性格特征。按照当时的情况，逮捕他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在帮助共产党人，但也帮助了那些手持武器反对他们的人！——克里斯的行为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开始的时候，如果那位军官能够冷静地、耐心地向他说明情况，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一项命令，他本人无权过问细节，而且跟他本人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可能不至于会出现那样的场面。克里斯的敌对态度，他的大吵大嚷，在军官看来恰好是并非无辜的明显表现。为此，军官留下了几个士兵进行搜查：就这样，他所有的专业杂志，从奥地利和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同许多外国人士的通信以及战争时期的报纸等，统统被拿走了。那些关于法西斯和铁卫军首领的剪报，最使他有口难辩。这些人的活动和讲话，当时曾引起克里斯的极大兴趣，据此他甚至搞成了一部记录人类堕落行为的档案材料。他把这些材料摊在桌上，把照片按照编年顺序摆好，向我解释说，这些家伙的形象和言论，简直象瘟疫。人们买来报纸，只看一眼广告就立刻厌恶地把它丢掉，但却不曾发现这些家伙一言一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荒谬可笑的愚蠢，不曾发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是多么类似。“以后，”他曾对我说，“等我老了，如果科学上一事无成，我将写一本书，一本只是给自己看的书：《蠢人和历史》或者叫做《世界愚昧史》，要不然就开一门独裁专制学的课程：《愚蠢的独裁者怎样做才能使人们更开心》。当然，有些人比我强，能够整理成系统的材

料，但我却要收集这些东西来代替集邮，整理出这些，同样起到集邮的作用。我收集了各个世纪的有关材料，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他们简直一模一样，甚至我乐于替他们搞一个机器人模型，搞一个各种场合的演讲词汇编。当然，还可以搞出一些规则、条文、建议、须知，供那些业余爱好者查考。”“如果这些东西万一落到别人手里，你会要倒霉的！”我曾这样提醒过他，“人们会当你保存反动宣传材料，会认为你收集这些是别有用心。”他笑我过分谨慎，他说，造成人类的某些灾难，其中便有象我这样谨小慎微者的贡献。他说，与其这样瞻前顾后，心里想什么不敢说出来，倒不如去见鬼。哪知道没过多久，事情果真发生了。其实这些话一九四三年他在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也说过一次。因为他在维也纳就过学，被邀请到大使馆参加了一次招待会。

“有空的时候你都干点什么，大夫先生？”一位参赞出于礼貌这样问他。

“我在研究独裁者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消遣，简直是永不枯竭的幽默源泉。就象故事里说的，一只青蛙想要变成一头水牛，于是一下子把肚子憋得鼓鼓的，结果啪的一声，肚皮撑破了。如果不是考虑到损失和破坏，我坚持认为，一段短时间内，这些人还是需要的。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自己变了样的形象，放大到极点的缺陷。而且其他一些梦想有

朝一日自己也能为所欲为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面旗子下，形成一条庞大的节肢动物。”

“您是指的具体什么人吗？”参赞问他，“有现成的模特吗？”

“没有。”克里斯蒂安回答道，“不幸的是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多的是。我自己，为了消遣倒想造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模特。”

“您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吗？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您瞧，比如说，一个广告画画师，在军队里不过是个下士，中士或者类似的职衔，对此他一直不满。后来忽然一下子升到了顶峰，这样一来，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①都变成他小小的同僚，杜雷②，莱奥纳尔多③不过是初学的生手。只有他是一切事物的标尺，至高无上的裁判官，公理和智慧的化身，甚至连造万物的职责落在上帝身上，都使他感到着恼。照这样的思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部门，就会按照部落的样子去组织，而思维方式也回到了图腾时期，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

“您真的打算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吗？”参赞问。

“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克里斯蒂安答道。

“我倒不是特意给您提建议，假如您真的使用刚才说过的例子，未免有点儿太冒险吧。”

---

① 马其顿国王。

② 德意志著名画家。

③ 即达·芬奇。

"噢，不，我打算为独裁者写这么一本手册，编辑一些实践性的规则，我感兴趣的是问题的幽默性。我在考虑海地的独裁者：譬如亨利·克利斯多夫，在他做下士之前，是个奴隶，后来当了共和国总统，最后，照拿破仑的样子，自己宣称为国王。"

"对这种不怀好意的借古讽今，元首是不会容忍的！"参赞说。没过几天，克里斯蒂安便在宪兵队一位军官的"关照"之下，被送到了日拉瓦，后来又转到特尔古一日乌集中营。他被送到那儿，为的是避免惹恼德国人。当时他是否相信战争的结局会有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他做什么事，从来都不是无目的的。这段对话他对人说过多次，甚至我都能把它背出来。他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绍依曼斯库律师的。当时律师也被关了进去，因为他拒绝接受一枚卐字纪念章，而且把它扔到地下用脚踩。"我从来不接受强制行为，"他自夸道，"我一贯反对暴力。卡罗尔二世①的时候，铁卫军的时候，安东尼斯库②的时候，都是这样……有机会坐监狱，我感到光荣，我不能容忍外国大兵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国土，也反对任何恐怖和暴力行为。"

过了好久才搞清找克里斯动手术的那个人的情况。他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叫布迪勒，是个农民。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他同当地负责人发生过争吵，后来夺了民警的枪，从家里逃跑了。他袭击积极分子，烧了保存农民入社申请

① 罗马尼亚国王（1930—1940）。

② 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政权首脑（1940—1944）。

书的办公地点，不管怎样，当时人们很怕他。后来他又同斯泰利安匪帮合了伙，尽管多半他还是单独活动。好多人都受过他的害，但他没杀过人，至少没发现过这种情况，尽管他同民警和军队多次交过火。

现在，我们还是再来看一看事实。克里斯给这个布迪勒做了手术。他并没向有关部门报告从这个人身上取出了子弹，甚至连句话也没问。至少他自己一直这样说，在一些材料里也一直这样写，而这件事是无法核实的。“我是医生，我关心的只是人，只是病，别的我不管。”后来不见了的这个人，在克里斯被捕好几个月之后才被抓住。布迪勒当时是被通缉的，但是政府当局怎么会知道他受了伤，恰好跑到克里斯这儿来了呢？你父亲以为，可能是慑于某种压力，我告发了他。这种强加给我的罪责完全是无稽之谈，是不公正的。他对我是那样信赖，怎么可能稍有风吹草动，我就会把自己的朋友抛掉呢？这甚至不合起码的逻辑。难道政府当局不能够排除其他疑点而找到他那儿吗？他岳父受理的案件中，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再说他，克里斯，谁来都给谁做手术，每天屋里都是满满的，各式各样的人，有真正的病人，也有可疑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来的。也许这些人当中，有谁认出了布迪勒。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我认为布迪勒来找克里斯’完全出于偶然。克里斯承认他给布迪勒治了伤，这一点瓦尔拉姆并没强迫他。

“你给一个受了枪伤的人做过手术吗？”瓦尔拉姆问他。

“是的。当然，这是我的义务，”克里斯回答他，“大出血，怎么办呢？能眼看着让他死掉吗？”

“你知道他是个危险的匪徒，是我们政府通缉的要犯吗？”

“对我来说，他只是个病人，就这些。我一看到大出血，就忘了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什么性别，还有你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是病人吗？那就帮助他。我把他救活了，自己就心安了，因为我尽到了做医生的职责。至于他是不是匪徒，这是你们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命令，只允许我给共产党人做手术。”

“别忘了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且，至少在形式上你还是共产党员！”

“我是医生。在前线我并不是根据军衔给伤员看病，而是根据病情。我帮助过并且救活过许多德国和匈牙利俘虏，我常常为此而感到骄傲。”

“为什么他单单来找你，而不去找X大夫或者Y大夫？”

“他也可能去找过X，找过Y，可惜没用摄影机拍下来。谁让我还算有点名气，志愿到过前线，得过奖章，而且还是党员呢？为什么从我的自传里你只是找对你有利的东西？你觉得每个人都怀疑别人，每个人都被怀疑，是正常的吗？对你周围的人缺乏起码的信任是无法生活的。”

“就是说，你想让反革命分子为所欲为，而我们却站在一边看热闹吗？你想让我们不尽到自己的职责，听任他们把我们搞垮吗？我们应该信任的只是那些忠诚老实的

人。”

“当前的事实证明你们对我丝毫也不信任。”

“你敢写成书面材料吗？”

“当然，连许多别的事都可以写。我不相信你的党证比我的颜色更红。你们拿我的岳父做把柄，但是，我只对我做的事负责。他有什么思想，并不关我的事。”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你从哪儿弄来的那些法西斯宣传材料？你是怎么混入党内的，怀着什么目的？”

“我怎么混进来的？”克里斯怒喝道，“我倒要问问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瓦尔拉姆对我说，听到这样意外的反驳，他感到吃惊。瓦尔拉姆给了他纸、笔，让他把一切都写下来。瓦尔拉姆拿过他写的声明，刚念了头几句，当然不是认错的，瓦尔拉姆的怒气立刻涌上了头。克里斯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哼也没哼一声，只是两眼紧盯着瓦尔拉姆的目光，讥讽地向他微笑。显然，克里斯在这儿也想让别人来适应他。他根本不懂人的感情，他的固执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为此，他尝到了瓦尔拉姆的苦头。这个人从不考虑后果，在他心目中，除了敌人就是自己加官晋爵。他可以让人写出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声明，而且做得丝毫不留痕迹。在遇到克里斯之前，他一直干得比较顺手，但从这儿却开始了恼怒和不知所措的日子。克里斯竟能压过他吗？这不可能！

这期间丝苔拉到处奔走：找院长，找系主任，找教研

室主任，找朋友和熟人，找那些请克里斯看过病的官方人士。一些人耸耸肩膀："我们能帮什么忙呢？真是爱莫能助啊！""至少你可以写份材料，证明他是好人，是无罪的，他从来都不会对任何人干什么坏事。""瞧，我们都有家小……"她也到我这儿来过。我答应她，我要尽一切努力。事实上，暗中我一直在关心他的情况，但我却什么也不能对她讲；我是怕绍依曼斯库太太，她什么话都憋不住，到处大吵大嚷，一直闹到菜市场："瞧瞧，亲爱的，我都变成什么了！为了一小捆芹菜还要讨价还价！把我丈夫弄走还不算，现在连女婿也弄走了。剩下的这点钱，只够勉强活着，刚刚饿不死。丈夫的事我不说，他搞过政治，当过区长，做过议员，可女婿呢？……他是共产党员，亲爱的……"丝苔拉很快瘦了下来，象是受过什么大的折磨，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她不再象从前那样注意自己的外表，但是却出门更勤了，总希望能碰到什么人或者发现点什么消息。后来看到一些朋友们态度冷淡，这才决计不再到家里去找谁了。她象个幽灵似地在大街上溜达，满脸愁容，一言不发，穿一身黑衣服，越发显得憔悴。她究竟怎么了？她在想些什么？她还保留着多少固有的稳重？这些我无法了解到，只知道不少男人都在替她想出路。他们给她讲笑话，答应替他打听克里斯的消息，但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却能够瞪得这些人心里发麻。只靠仅有的这点钱过日子，丝苔拉除了照顾你，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克里斯的书房里。她整天守在电话机旁，巴望着忽然间有人奇迹

般地通知她，克里斯释放了。慢慢地，绍依曼斯库先生的积蓄都用光了。老太太从来不管钱，也不知道东西的价钱，她把首饰、家俱、地毯、衣服等等都象白给似地卖掉了。只是由于丝蓓拉一再坚持，才把书架上的书和一些画保留了下来。后来，绍依曼斯库太太又记起了克里斯乡下老家的亲属，等他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接济时，老太太不知道听了谁的主意，劝丝蓓拉提出离婚。她想这样一来，就能够知道克里斯到底是死是活。另一方面她也到处张罗，给丝蓓拉找事做。通过关系，老太太给丝蓓拉在法院找到了事，这样你外祖母便常常用小车推着你，在市中心转来转去，抱着你去买东西，当然又少不了到处宣传一番："现在我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我们的成分应该改过来了。我们也是领导阶级，我已经不是议员太太了，这样你们尽可以请我到家里去。要不是小孩子拖累，我也想学习学习，我还想赶上潮流呢。"

克里斯的情况使我十分担忧。当我不能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缺少了他我是多么心神不安。丝蓓拉那儿我不能去，见到她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会更难受。那么我能干些什么呢？我去同负责审问他的瓦尔拉姆交朋友，打听他的消息，找机会施加点影响，帮他说说情，尽管我自己也在时刻准备着受审查，因为谁都知道，我跟克里斯是好朋友。我同瓦尔拉姆只是一面之交，见面打打招呼，寒暄几句，如此而已。克里斯被抓去大约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瓦尔拉姆打来的电话：

“喂，我说，你连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关心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他有意地这样问道。“你到我这儿来一趟，也许能发现点什么新消息。我想象得出，你还不可能一下子把他忘掉。或者因为你从克里斯蒂安太太那儿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慰?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从前她对你来说并不陌生……”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诽谤，但我并没有计较。第二天我到瓦尔拉姆那儿去了。

“通过这一段时间我对克里斯蒂安大夫的审问，更加证明我是对的。他比我想象得更要危险。他在这儿表现很坏，一直抱敌对态度，不想承认自己的罪行。看得出他受过西方特务机关的专门训练。他还常使用威胁手段，所有这一切，将来都会有他的好结果。凭我手里掌握的材料，完全能够彻底揭露他的真面目。”瓦尔拉姆拿出厚厚的一叠卷宗，摆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自己下结论吧。给你一小时的时间。”

我翻了一下那些材料：那是根据一些书信和剪报，推测和罗织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罪名。我能做些什么呢?怎么辩白呢?

“我非常了解他，根本谈不上什么特务，他一直是左倾进步分子。”我回答说。

“你完全受骗了。你面前摆的是几大本法西斯宣传材料，你怎么还能这样认为呢?”

我向他解释了当时搞这些剪报材料的原因，可能克里

斯也是这样对他讲的。听完，他猛地吼叫起来：

“你还配当检察官！给反革命动手术，当过议员的岳父，这一些信件、书、小册子，在这儿的表现，自相矛盾的供词，你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这足以充分揭露他的真面目。在这些证据面前，谁敢说他是无罪的？我办过这么多案子，这是最清楚最简单不过的一个。而且，他简直是只野兽，张嘴就咬我的手，恐怕连骨头都咬断了。告诉你，我有办法整治他，看他还敢不敢咬。”

“我已经向您说明我的观点了。如果您这样有把握，判他的罪好了。”说完，我站了起来。

“会判的，但现在我需要的是你的证词，而且要你向他解释，说服他认罪。自己认罪，这你清楚，坦白了，就会从宽处理。作为法官，你应该明白，起作用的是事实，而不是感情。从他这儿，我们就可以打开缺口，破获整个阴谋集团。他知道布迪勒在哪儿，布迪勒知道斯泰利安，而斯泰利安同他的匪徒集团有西方提供的武器和电台。在这些同谋当中，自然有表面看起来的好人。你写好证词，我还可以让你看看别的材料。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这样的事，我决不干。”我话音刚落，他立即接着说道：

“我并不想强迫你这样做。我给你时间，你再考虑考虑。不管怎样，我们还算是同事。要不然，根据现有的材料，我完全可以让你们两个一块写这份供词。当然，这要经过一段时间。”他从身后亲热地抱了抱我的肩膀，把我送

到了屋门口:"也许你想看看他在这儿究竟怎么样……"

他到底要干什么？除了证词，他还想从我身上捞到什么呢？一方面我很想见一见克里斯，另一方面又担心他看到我跟办案的主管在一起会有别的想法。在狭窄的光线昏暗的走廊上，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瓦尔拉姆很可能把我也留在那儿。我没告诉家里人，他们连我去哪儿也不知道。我们走进一座水泥地的大厅，靠墙的水龙头上接了一根橡皮管子。那儿有两张桌子：一张在窗子下面，另一张靠着门；一个准尉军官坐在窗下的那张桌子旁边，瓦尔拉姆走过去低声对他说道:"打个电话给检察厅，就说雷德曼同志让我们留在这儿了。"听到这话我几乎昏倒在地上。后来，尽了全身最后的努力，才勉强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但无论如何不要超过下午两点。不然谁知道女秘书怎么想呢。"

"一个女秘书怎样想对你就这么重要吗?"瓦尔拉姆哈哈大笑，接着又说道,"准尉，去把大夫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他这样戏弄我仿佛是一种乐趣。我心里有些害怕，脚下步子也走不稳了。他拉着长声，诡秘地做一下笑脸，极力想向我表明，我完全攥在他的手心里，只是由于他的善心，我才没被抓起来，还没受到惩罚。

几分钟以后，克里斯蒂安来了。他身体显得那样虚弱，面色苍白，走路一瘸一拐。准尉把他的眼镜拽了下来，

拉过去一把椅子。好长一段时间，克里斯闭着眼睛，看来对于这儿的光线一时难于适应。后来，他睁开眼，直瞪瞪地盯着瓦尔拉姆，过后又盯着我。他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肌肉也没颤一下：就象平生从来没见过我似的。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也摸不清瓦尔拉姆想要干什么。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是克里斯并没回礼。就这样沉默了好久，直到瓦尔拉姆决定坐到桌子那儿去。

“姓名。”他问道。

“医生克里斯蒂安·依昂。”他回答。

“从前你是医生，在这儿可不是。”瓦尔拉姆改正他说。“你为什么被捕？”

“不知道。”克里斯说道。

“很遗憾，本来你自己不至于把情况弄得这么糟糕。”

“是你们弄错了。”

“我们不会弄错。”

“那么说是滥用职权。”

“我从来不搞这种事。”

“那我被无缘无故弄到这儿来叫做什么呢？强迫我承认没做过的事，又叫什么呢？”

“这个调子我听够了，咱们还是继续往下谈。我们掌握全部的证据，这些足能让你服服帖帖。斯泰利安已经被抓到了，你还这样躲躲闪闪，有什么用？”

“可你说的这个聪明人，他是谁？”

“反正不是我的同伙。”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你，我是大夫先生。”

他们的对话使我感到惊奇，就象一出演了上百次的戏，演员对答台词根本不用走脑子，只不过他们的眼神里暗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情。当时我想，可能我是这出戏的第一个观众。当然，看起来他们谁都不会让步。难道瓦尔拉姆是想暗示我，等待我的是什么吗？这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使我感到胆战心惊。

“让我同他们对质，我倒要看看我是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

“到时候会这样做的。”

“坚持错误绝不是明智的表现。”

“我有足够的时间，一年不行十年，最后总会让你把知道的情况统统说出来。”

瓦尔拉姆怒冲冲地瞪着他，看来我在场倒给克里斯增添了勇气，或者至少瓦尔拉姆有这样的印象。他懒洋洋地掏出手枪，用手指拨弄着，然后放在桌子上，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回来。看到这一切，克里斯不禁笑了起来：

“用不着玩这个玩艺儿，对我来说，这并不新鲜。战争时期，从日拉瓦到特尔古一日乌集中营的路上，一个象你一样的家伙，冲我开枪，子弹打到了墙上，离我的脑袋只有几公分。那可是个老手，玩这种玩艺儿很内行。所以我劝你还是收起这一套，不然会惹我发笑。要是我笑起来，就没法正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其实，好好想一想，倒

是到了该我们笑一笑的时候了。关于阴谋集团，我们已经谈论得不少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跟这种事毫无缘分，也从来没这样想过，而且，我也不会出卖祖国，哪怕你请我这样做。”

“别扯这些了。告诉我，你不是有点失眠吗?”

“是的，”克里斯笑道，“四天不睡觉没问题。战争时期，在日拉瓦他们四天没让我睡，后来才觉出有点困。你这儿才三天，不过经验还可以继续积累。”

瓦尔拉姆一不当心，手枪掉在了地上，但他并没有立刻去捡。克里斯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几年之后，等你换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没心思再玩这玩艺儿了。”

“你来惩罚我吗?”

“那时候也可能没有我了。现在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倒不如去研究一下那些比你大的人物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

“你想威胁我吗?你以为我害怕吗?”

“我知道你不怕，很可惜。”

“你以为西方人打来，会把我钉到柱子上去吗?”

“这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他们，为什么要替他们干事呢?他们会给你什么?”

“我没替他们干事，他们什么也没给我。”

“那些书，那些信是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有祖国，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今天你的确有点太清醒了。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就想知道这个。”

“我承认我没罪，我要求立刻释放我。”

“在你朋友面前，你变成大大的勇敢分子了。其实，他可以证明，我们已经掌握全部材料和必要的证词。”

“那为什么不对我进行公开审判？”克里斯讥讽地说道。他没向我瞧一眼，对这种无稽之谈也不置一词。

“准尉，提醒他一下，他有点太不开窍了。”瓦尔拉姆向准尉做了个手势。克里斯看见了，笑了笑说道：

“是让我脱掉衣服，还是想穿着衣服也试一试？”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满不在乎的态度使我十分吃惊。一瞬间，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面前，克里斯又表现出了他的高傲，他的自私。好象他很喜欢这样，丝毫也不想一想你们，丝毫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他甚至愿意让人这样野蛮地折磨，直到或迟或早把自己葬送在监狱里。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在巴黎爱丽舍大街，打算用石头打破上校脑袋而不顾一切后果的克里斯。我闭上了眼睛，紧咬着嘴唇，一直到咬出了血。没有必要再向你描述接下去发生的事。克里斯一声不吭，使得当时的气氛越发沉重。

“把你叫来是想让你看看，”瓦尔拉姆提醒我说，“也许从这儿你能够得出有关的结论。”

我害怕自己答不出话。克里斯躺在地上，准尉用凉水

往他身上浇。他那样四肢张开地躺在水泥地上，这个形象我永远也忘不掉。

“你知道，他是个非常有名的外科大夫。”我试图提醒瓦尔拉姆，“不生病，你是不会意识到这些人的存在的。但是年纪一大，慢慢地，什么病都会来。”

瓦尔拉姆笑了笑：

“这种头脑不开化的人，没什么稀罕。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你的证词吧！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儿，这很自然，你可以回家起草，打好字给我送来。这样，我的秘书也就不会认出你的笔迹了。”

“我想还是说服他，说不定能成功。”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我正是为这个才把你找来的，”瓦尔拉姆满意地说，“象这样的顽固分子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让你觉得根本不是他的事，他跟集团毫无关系。其实他这完全是故意做出来的。我不怕，我可以等待。你应该了解这层关系：如果我昨天宣布逮捕了罪犯，而明天却从他嘴里掏不出一句话，那我怎么交待呢？简直太顽固了，让我伤透了脑筋。到头来绝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他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是匪徒的联系人，是他们的头头，或者类似的角色。如果我让他开了口，那么好了，我也算立了一大功。”

“为什么必得让我去说服他呢？”我问道。

“为了不必再让别人来说服你。朋友之间的事，总是好解决一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让你看了看我唯一的

实验室。其实只需要向你点一下，提醒一下你的职业，就已经足够了。只要你别忘了我这个实验室就好。”

“如果我办不成呢？”

“我不相信，”他笑道，“你不用这样过分谨慎。而且，作为检察官，你知道这是十分必要的。为什么别人作了恶而要你去跟着受苦呢？”

“就是再过一百年，没做过的事克里斯蒂安也不会承认。”我对他说，“您知道，我了解他，他没做，所以不承认。他宁可接受消灭肉体的惩罚。”

“那样对他就更糟糕，”瓦尔拉姆心不在焉地说道，“如果换了你，你是不会这样做的，不是吗？其实，你现在就可以跟他谈一谈。”

他的决定使我不知所措。我要在那儿呆多久呢？莫非要永久呆下去吗？很难对你说清楚当我看到克里斯浑身湿漉漉醒来时，我是什么感觉，心里够多害怕。他好容易才苏醒过来，当他的眼光碰到我时，并没显出感到多么意外。他吃力地问我道：

“你接受了任务要来说服我吗？希望你能明白，这完全是白费力气。你最好还是告诉我，家里人怎么样？他们能过得下去吗？”

我并没有故意说好听的，那样他也不会相信。我只是告诉他，你们身体还好，你们一直在惦记着他。

“我一直在担心丝苔拉精神和身体都受不了。”

“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我对他说，“只需要其中的一

项，就足以使你长期在这儿呆下去。”

“这是他们的事。作为医生，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当时不立刻做手术，人就完了。而后来应该去报告谁，到哪儿报告，这不是我的事。有专职干这种事的，也有愿尽义务的积极分子。而且当时我根本想也没想。在前线，我给那么多人做过手术，取出过那么多子弹，所以这种事干起来常常是不走脑子，根本不理会是给谁在动手术。”

“我希望你能把我的话听完，”我对他说，“不同意也不要紧。你应该考虑考虑你自己，即便你被释放了，如果身体已经垮了，还有什么用呢？你想一想，那样还怎么能够做手术呢？别忘了，你还有个孩子，还需要人抚养。你不行了，谁还能来养这个家呢？你应该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错误会被纠正，你会重新获得自由，瓦尔拉姆和他这伙人会得到报应的。因此，照我的看法，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保重自己。也许你承认了对你有好处。作为朋友，我才这样劝你。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不要指望别人会来干预这件事，而且任何干预也是徒劳的。”

“不，”他打断了我的话，“永远也不。我不能承认，我怎么知道那个人是谁呢？我能瞎编些什么呢？还有那个斯泰利安？法西斯主义？对在那种塞满了各种高贵的哲学、科学和动听言词的时代里所发生的悲剧，我曾经是那样仇恨；对法西斯的凶暴，对那种见到谁就想把谁撕碎的野蛮——一个充满愚昧、欺骗、恐怖的世界，我曾经是那样鄙视。而那些杀人的刽子手们，不需要任何文化，只消几句

话就足能使他们完成自己的罪行。让我承认不相信本来相信的东西吗？没有共同的词汇，没有共同语言，怎么能谈到一块儿呢？到头来他应当明白，这一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行得通。意志稍不坚定就会动摇妥协，但我知道，施行暴力的种类是永无止境的，而我的身体却有自己特有的保护方式：只要挨头几下，我就会立刻失去知觉。瓦尔拉姆知道，他已经犯了滥施权力的错误，因此更加紧了步伐：如果不能证明我是有罪的，不掏出我认罪的口供，就等于他彻底输掉了。而即使将来证明我根本没参与什么阴谋活动，根本和斯泰利安没什么瓜葛，只要我承认过，那么他，瓦尔拉姆，也会有理由申述，而且甚至会变成受害者：因为是我欺骗了他。不是吗？不管冒什么危险，我也不能这么做，那样的话，我会怨恨自己一辈子。”

“你做到了坚贞不屈，可最后落得个终身不幸，甚至变成残废。而当前的情况，不是为了保卫什么思想，而仅仅是牵扯到个人的错误。无论如何，你应该保全自己。你还要对整个家庭负责，对自己的才能、天分负责，要知道，毁掉的将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大家都希望看到你活着，健康地活着，而不愿看到你即使保住了尊严，却落成个残废。你的儿子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要奶吃。等他长大以后，事情早已完全变了样。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你所作出的牺牲，不会接受你所作出的一切。能够理解你的，只有跟你同等的人，而不是瓦尔拉姆，滥用职权的瓦尔拉姆。狼只会撕咬，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你再从别人的角度考

虑考虑，再想一想别的人，最后你会看到，我是对的。”

“你更害怕的倒是你自己，你考虑的只是你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我的。”他反驳我说，“瓦尔拉姆强迫你作出诬陷我的证词，而你现在打算为自己开脱，不是吗？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才明白应该怎样尊重自己。”

“从理论上说，我敬仰你，但从实践上看，你却是荒谬的。”我回答他说，“放下别的不谈，也许你该考虑到，为了将来，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继续进行斗争，那你现在也应当保重自己。你可以只承认到开庭审判，到那时，你就能够把自己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了。为了高尚的思想，崇高的目标，伟大的真理而作出牺牲是完全值得的。但如果只是为了不去投合某个人的胃口，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来说尊重事实就是一切，别的都无所谓。”

“但斗争总应当有你相称的对手，合适的场地。”

“斗争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他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你能健康地出去，那么可以肯定，会有许多人同你一起斗争，而且你还可以运用自己的武器。”

“我不是乞丐，现在我觉得比任何时候更自由。”说着，他用脚踢了一下门，意思是让人把他带回牢房去。“没有这次的经验，我会是软弱的，会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你不想一想，任何人也不能从你作出的牺牲当中学到任何东西吗？你的战场不应当在这里。你天生是为科学造就的，为外科学造就的，在那儿你才完全有用武之地。

现在纯粹是一种荒唐的偶然事故，根本不值得这样认真。哪怕在监狱的医院里做点事，也比这样无谓的牺牲来得有价值。只要你承认了，就可以保住身体，躲过这场灾难。现在能保护你的，只有你自己的良知，没有任何其他出路。谁会为你冒这个险呢？”我大声嚷道，“这个布迪勒关你什么事呢？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知道的甚至不知道的都说出来呢？”

“如果你已经俯首听命地写过一个证词，并且给了他们，那么就再写一个吧，那样你就可以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了。我有我的自由，事实和真理的自由，这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说着，他讥讽地瞅了我一眼，然后走到准尉身边。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吗？”我问他。

“你的证词，我并不认为对我有什么损害，你甚至可以写一千份。但是，如果你以为关于布迪勒，我知道的比对你说过的还要多，那么，为了这，请你永远别再来。难道连你都相信我会说假话吗？”

回到家，我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我同他的对话，简直感到有些可怕。怎么，他竟认为我供出了诬陷他的证词吗？他对我只有这么点的了解，这么点的友情，这么点的信任吗？我几乎全身都颤抖起来。一起度过的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漫漫长夜，共同的理想和计划，竟全都毫无价值。我过去对他来说，不过仅仅起了个共鸣箱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构成友谊起码的基础——信任。我考虑，

也许因为刺激太大，使他变得对谁都抱怀疑。接下来的几天，我企图更进一步接近他的内心深处，重温往日的旧好。但他只是问问你们的情况，其余依旧守口如瓶。

“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服我承认我没做过的事，而不去说服你的朋友瓦尔拉姆改正自己的错误呢？你应该告诉他，让他好好考虑考虑自己做的事。”

开始，我并没注意瓦尔拉姆为什么答应让我同你父亲单独见面。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呢？是他意识到怕自己做错了，怕将来后悔吗？后来我才发现，原因很简单：他是想利用这种办法引出话来，他在一旁偷听。特别是想知道谈话以后我同谁见面，是不是克里斯通过我向他可能有的同伙，向他家，或者谁知道还向什么人，传递消息。瓦尔拉姆恼怒了。克里斯的执拗，一切手段都不在乎，使他难于忍受。瓦尔拉姆决心要战胜他，制服他，好来证明自己没有错。克里斯恰恰激起了这样一种人的热情，他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也从来没失败过，只是一心一意在寻找较量的对手。

“当年我在巴黎向德·洛克上校打口哨的时候，”克里斯对瓦尔拉姆说，“你还在灌香肠。我犯侮辱元首罪被关起来的时候，你还在洗下水。是哪个见鬼的把你弄了来保卫社会主义？”

当我劝克里斯让他暂时承认，将来到法庭上再声明口供是逼出来的时候，他几乎暴跳起来：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你怕如果说服不了我，瓦尔拉

姆会问你的罪吗？这是你自己的事，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也许我的命都保不住，这也没什么，我是完全铁了心。尽管你认为这丝毫不值得，但我自己却相信自己。我已经向那些折磨我的人证明了，不是他们想干什么就都能办得到。我触到了他们的灵魂，以后他们对待别人应该讲礼貌，他们并不是强大无比，以后他们也会按照法律，按照规矩办事。总之一句话，我是无罪的，别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对你不利：做手术，剪报，你的固执态度，甚至你岳父……现在只有保住自己，保住皮肉不受苦。而且，你为他受折磨的那个布迪勒，或者斯泰利安，完全是一文不值的行尸走肉。瓦尔拉姆，可以说是个怪物。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跟一个怪物斗，是为了保护另一个怪物吗？为什么？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怪物而作出牺牲，有什么意义呢？毁掉一个著名医生，为的是保护下野兽般的人物，这值得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别的都无所谓，如果你怀疑我，认为我可能做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事，那我决不能原谅。”他又重复了一句。我详细地给你叙述这些对话，是为了向你说明他当时的表现，好让你自己得出结论。

后来的几天，他完全拒绝再谈这件事。一见到我，就要求把他带回牢房去。他住的地方怎么样呢？那么一点空地，假如让我呆在那儿，过不一会儿就会憋死。斯泰利安匪徒集团活动很猖獗，当局要逮捕嫌疑犯，想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因此，牢房里挤满了一大堆人。看守人员和检

查员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是“刚进来”的，正在被“研究”和“审查”。新来的，靠门口呆着，随着在那儿资格的增长，按照他们自己订的规矩，越来越向墙那边靠。克里斯已经到了靠近马桶的地方，他就睡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味中：他瘦了许多，脸色变得青紫，稍微一活动就累得支持不住。除非发起火来，甚至连说话都串不成句。不知道是由于看显微镜过度的缘故，还是因为劳累，两只眼睛几乎只剩下两道缝。但当初他的眼睛张得那样大，大得怕人，看起来简直象两面反光镜，不管你躲到那儿，都能照得出。他眼睛里仿佛射出两道奇特的光，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光，反映出他自信得有些怕人的光。

我告诉瓦尔拉姆，再让我同他谈已经毫无用处。瓦尔拉姆听了勃然大怒，对我百般威胁，我甚至以为当时就会毒打我一顿。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两只手伸给了他，“随你怎么处置吧。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一些。”

“但是，他有什么弱点呢？这个人对什么最敏感？”他高声嚷道，“不可能一点坏毛病也没有。对有些人，我只用一盘米糕或者一只鸡腿，就能解决问题。另外一些，提起家里人就害怕得发抖。还有一些人，只要给他一包烟，他甚至连亲爹娘都可以出卖。可这家伙，不是个人，简直是个怪物！”

“是的，从某种角度看，的确是这样。对什么人，什么事，他都觉得无所谓。”

"打他好象他倒挺高兴，弄得我只好罢手。为了他这种顽固劲，我一定要让他尝够滋味。"

这次谈话之后，我收拾好箱子，整天整夜准备着，把厚一点的衣服放在床头。瓦尔拉姆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又发了一次火，并且让我把自己了解的有关克里斯的情况都一一写下来。他不许我再同克里斯谈了。我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写了出来。从那以后，过了大约半年，才又见到过一次瓦尔拉姆。我尽量躲着他，尽量不让他记起还有我这么个人。瓦尔拉姆告诉我，他已经把克里斯送去劳改了。最后还是证明了他想证明的东西。我没问他详细情况。"如果不是你办了点事的话，"他对我说，"我倒高兴把你同你的朋友弄到一块去。跟他在一起有你的好日子过。有生以来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畜生。在我的手里，竟还敢这样闹腾，敢这样不服帖。我想这次准能让他得到点教训。"

这个案子始终没有审理。他同布迪勒对质的时候，布迪勒承认，当时没告诉他自己的名字。而且甚至说是用枪逼着他给自己做手术的。你的父亲否认了这一点：

"没有，手术是我自愿做的。没有任何人逼着我。你当时根本没带着武器，再说你已经是半死的人了。"

克里斯尽管顽固，但结果还算走运。瓦尔拉姆的上司忽然得了重病，当然，把当地最有名的大夫波普请了来。波普教授仔细检查了一下，告诉他说，没有别的医治办法，只有开刀。

"谁是最好的外科大夫?"普列德斯库问道，"让谁给我

动手术更保险一些呢？”

“那，”老教授回答他说，“不幸的是，现在只好我来做了。”

“这是怎么回事？”普列德斯库惊奇地问。

“因为最好的外科大夫，动手术最有把握的大夫，关在你们这里好久了，一直还没审理。”波普教授一方面这样老实地告诉他，同时也怀着一线希望，也许能发现点克里斯的消息。

“他在哪儿呢？这怎么可能呢？”司令官惊奇地说。

“他妻子在法院做点事，如果你们由于疏忽大意不知道他的下落，可能他妻子知道。要是肯定他还活着的话，那我可以担保，他动手术一定不会出问题。他在巴黎、维也纳都专门学过这方面的病例。”

普列德斯库把卷宗拿去仔细看了一下，又向瓦尔拉姆详细询问了情节，后来确信斯泰利安匪徒集团没有一个攀扯过克里斯，就把他叫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同老教授一起给普列德斯库做了手术。克里斯被释放了，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又回到了教研室。从此他变得沉默了，老望着什么出神，同谁也不谈，一直躲着人们。我找过他，但他让人给我传话，说他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直到几年之前，我做了种种努力，感到需要互相做一点解释。我想告诉他，我的过错无非是曾极力想说服瓦尔拉姆，他是无辜的，曾极力劝他好好保重自己，但他却把我赶了出来：说我竟敢怀疑他对我的友情！从那以后，他一方面靠波普

的帮助，另一方面也靠自己钻营，地位慢慢地升了上去。他有那么一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头，雄心勃勃。慢慢地给他挂满了各种头衔，周围堆满了论文著作。于是他又重新开口了，变得爱说笑话，甚至话语刻薄。而我自己的这颗星，却逐渐暗淡下来。我从来没落得象现在这步田地。我从教研室主任被贬到运输公司当职员，这期间的一段历史，也同你父亲经过的一样复杂。我对我的大儿子讲了一些过去的事。但他不相信，一点也搞不懂，以为是我编造的。

"别讲你们的过去了，"他对我说，"谁有功夫听你的?爷爷老讲他的匹雅沃①和索费里诺②，而你——讲你的瓦尔拉姆和赫里亚努。谁让你不吭气的？你为什么不斗争？"如同带危险性的职业一样，有些职位危险性大，但收益也多。如果说我没天分从事科学研究，哪怕是生物学研究，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对我做的努力、挣扎都毫不在意，一个个都从我的身旁越过去了……但我的理想仍旧是纯洁的。只有这一点能够使我自慰。对他来说，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处的社会地位，可能今天我已经分文不值，甚至已经不存在了。要不是今天我还不忘旧情，我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报复：因为他不但不拿我当朋友，甚至把我看成了敌人。但我并没这样做，别人在他身上犯的错误，并没给他权利，可以表现得象现在这样。总之，我以前也说过，即使是罪行，也有勾销的时

① 即意大利的波河。

② 意大利地名。

候。即便说我错了，当初不该劝他，不管怎样，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难道我连解释一下的权利也没有吗？命运安排我又遇到了他，病逼得我这样做。总之，又不得不再勾起这些往事。我知道他恨我，我在这儿感到很不舒服，他对我的仇恨、蔑视、冷漠，使我感到十分痛苦。特别是现在，当我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死神已在向我招手的时候。我曾想，是否他还能理解一些事情，是否还有一点做人的感情，是否还容许其他人在地球上生活？现在，当我看到他同自己的儿子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倒有些心安理得了，不觉得那样受屈辱了，尽管如此，你已经看到，我并不能够接受。不幸的是，幸运和荣誉的天平并不总是静止的。他远离了自己的朋友，实际上，他周围已经没有任何人。对他来说，只要有荣誉就够了，尽管对现在的荣誉他并不感到满足。

我对你说的这些，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我是比较客观的，尽量学着象他当初那样冷静。从那些年代里，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他学到了什么呢？这是我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曾经使他遭受痛苦的那个布迪勒，究竟能代表多少做人的价值呢？或者说，代表什么思想呢？为了……姑且说，为了自己的一种欲望，一生中竟浪费掉这么多时间。为什么？既然他曾经牺牲过你们一次，曾经把丝苔拉和你置之不顾，那么，今天，只要他高兴，为了什么怪念头，还照样可以轻易地拿你做牺牲品。难道可以这样对任何人都不管不顾地活着吗？

希望这次谈话暂时只是我们两个知道，就象你答应过我的那样。但这只是指的谈话、发生过的情况以及你父亲的过去，并不包括提出的问题……

九

本年三月三十日

今天是星期日，我利用这个时间到医院去了解那个同克里斯蒂安教授讲外国话的女同志到底是什么人。为了这件事，我没参加义务劳动，以致我们的楼长同志理会错了：

“我真想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弄到一起，让你们砸盐块儿，一直到把你们念书人的臭架子，把各种各样的借口都砸掉，让你们也明白明白美是怎么回事，也愿意让咱们的楼变成先进单位！”

首先，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我并不象杜米特列斯库大夫那样轻视劳动人民，他常这样训斥他的儿子：“好好学，跟这些不开化的人在一起简直腻透了。”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应该明白，有些可能性存在，有的就不存在。我没去参加义务劳动，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了解那个跟教授讲外国话的女同志最好的时机。

她叫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她就象是不发达国家里的——在这些国家还没参加世界民族的大合唱，特别是还没同进步世界建立联系之前——一个野蛮人。开始她不愿

同我交谈，但我见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批评了她几句，她这才勉勉强强、敷敷衍衍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我问她。她冲我傻笑了笑：

“死人。”

“都死了吗?”我又问。她故意不好好回答：

“不是一块死的，有先有后。”

“你自己是什么职业?”我又盘问了一句。她答道：

“守护猎区的。”

“你有什么私人财产?”

“七只免税的野猪。”

“别这样嬉皮笑脸的，不看看你自己多大岁数，而且还是个女的。”我这样说完，她又哧哧笑了一阵。

“私人护卫，你愿意这样说也可以。”

“是当局准许的吗?”

“怎么，我向他们申请了吗？顶多不准许，这是他们的事。”

“你一个亲人也没有吗？没结过婚吗?”我问她。

“没有，”她回答我说，“我还年轻，时间还长呢。”

“你在哪儿，而且怎么学的外国话？学了干什么用？跟狼崽子可用不着讲这个！”

“我可并不是一直跟狼呆在一起，”她回答我说，“我也是在世面上混过的。你去问让尼吧。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有能耐，他可以对你解释清楚。”

“你怎么可以称呼教授同志让尼呢?”我厉声说道。

“我可以的事比这还要多，只要你想知道。我有我自己的原因，这请你不必多费心。”

这样，我们又继续往下谈。

“你怎么成了猎区看守的？”

“就是因为让你们这样的人给搞的。”

说到这儿，她不愿再说下去，却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后来我走了，心想，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约内斯库护士对我说：

“这关你什么？有工夫自己散散步，别管这种闲事。她是教授的病人，如果老头子知道了，非把你阉割了不成！”

“可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是以前的情人，也可能是本家。你没看见吗？这女人都到这个岁数了还那么俏，看起来顶多象四十岁的。你可别管这种事，还是让上帝去安排吧。”

但是我并没有罢休，我给那个村子的一个熟人打了个电话。他说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就靠随便吃点什么过活，水果，逮着的野物，钓的鱼，弄到什么吃什么。她没有什么朋友，可差事干得倒不错，人们都挺信任她。谁也没到她的房子里去过，只有克鲁日来的一个大夫在她那儿呆过一夜。她曾经嫁给过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夫或者是工程师，可很久以前他就死了。村子边上她现在呆的那个地方，是他们以前度假的房子。她丈夫死了以后，她搬到这

儿来一直再没走。现在，树林里的野兽都认识她了，都不去伤害她。有人曾经看见她骑过一只熊。她穿一身男装，皮靴，宽边帽，看见谁都不在意。有时候她也进城，用卖蜂蜜或者水果的钱买回点煤油、香烟。她进了酒馆，同男的一起喝酒，有时候还跟男的打架，骂出来的难听话连赶车的听了都脸红。别的材料，这位同志不掌握。我给他出主意，让他从民警那儿得到去林区的准许之后，等她不在家的时候，到她屋子里去看看，看她有什么证件或者找到点书面材料。他说，他没兴趣跑到那儿去喂狼，要是我愿意，不妨自己去试试。但他劝我还是不要这样做，他说凡是去过那儿的人，差点连传宗接代的那玩艺儿都丢在那儿。

我可以说，自从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以来，见过的不少，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当地的有关部门怎么能允许一个人愿意怎样就怎样呢？怎么能允许野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呢？难道我们的社会就缺少一个这样的人吗？但教授同志却不在意这些，他百般袒护她，保守着同她之间关系的秘密。生活里会发生什么意外真是难以预测。一九五四年我在山区碰到一个神父，我想帮他一下，可他忽然掏出一支手枪，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落得我后来被同志们批评为丧失警惕，缺乏临危不惧的斗争性。

工人同志们还在恢复阶段，因此还没能同他们接触。但这却不用着急，看现在的情况，他们一时还走不了。

我发现教授在他自己的住所搞了一次阴谋活动，企图

推翻现任学院院长，把权夺到自己手里。到他那儿去的有波赞、瓦西利乌、奥泰斯库和考德里亚努等同志，考德里亚努到那儿去我感到很惊奇，因为这是一位作风、表现都完美无缺的同志。波赞去那儿，也是件奇怪事，这位同志只有一个嗜好：喜欢喝点儿含酒精的饮料，但用量并不是太大，不至于喝到当众丢丑的程度。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接受了克里斯蒂安同志居心叵测的邀请。我奇怪的是考德里亚努同志竟也被蒙骗，不，他甚至也跟着说，学院里是一片混乱。但我要问，是谁制造了这种混乱？为什么？难道不正是克里斯蒂安同志的野心和阴谋造成的吗？现在，克里斯蒂安同志为什么沉默，原因就看得更清楚了：他想把公众舆论的注意力引开。但是，难道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阴谋活动吗？难道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路线吗？同样，奥泰斯库同志也说："我是最合适的，除了我之外再没有更理想的了！"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两千万人口都在干什么呢？睡大觉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怎么样，过去如何受压迫、受剥削吗？克里斯蒂安同志说克列楚同志是个废物，不讲人道。他真的是想说不讲人道吗？对一个各方面活动都受到表扬的同志，对这样一个同志的政治态度，怎么能够随便怀疑呢？

瓦西利乌同志没发表意见，但也没对他进行批驳。他们一直玩到很晚才散，不少同志离开那儿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有些人，比如象波赞同志，因为醉得一塌糊涂，竟唱起明令禁止的淫荡小调来。我们必须看一看，为什么克里

斯蒂安同志这样反常，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还发现，教授同志没按正常途径接受了一个病人，让他住在了我们医院。这个人吹嘘说，他是克里斯蒂安同志最要好的朋友，并且要求给他特别护理。尼古拉大夫同志再一次表现出爱拍马屁的作风，竟把他安排到通常是为特殊情况的同志保留的病室。护士长说，这位同志得的是癌症。我想，这样一来他一定不会再有顾忌，会把他们一起干了哪些事，他同克里斯蒂安同志的关系以及教授同志怎么坐的牢等情况，统统说出来。我并不认为过了这样一段时间，教授同志的道德品质会发生什么变化。那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承认他在维也纳和巴黎玩过女人，同一些冒充税务官的骗子一起鬼混。而现在，公开跟女同志班奈德斯库搞不正当关系，而且从各个方面给她提供有利条件。以上种种，就足以说明问题，可以用一条线把他的整个表现全部贯穿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儿记下来：住院的那位同志名叫康斯坦丁·雷德曼，他竟落到这样的狼狈相，连睡衣都没有，还要从医院备用的部分中给他拿出一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太吝啬吗？的确，这个医院里的好多情况值得认真仔细地研究研究。绝不能允许这位克里斯蒂安同志继续往上爬。在他对我们学院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之前，就应该阻止他的一切活动。我们的学院不同寻常，它是国家下了很大投资的一所高等学府。

在结束今天的日记之前，我还要说一点。下午第二次查房的时候，我还没走，使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教授同志

露面了。在雷德曼同志那儿，他并没停留多久。他象是十分惊奇地瞧了瞧雷德曼，并没向他打招呼，却对别人说："这儿如果有需要动手术的情况，请通知我，手术我来做。"说完，就同阿纳尼亚同志一起回实验室了。

跟着，我也到了实验室。我问阿纳尼亚同志：

"我说同志，你们整夜整夜地都在干什么呢？"他象个傻瓜似的笑着说：

"我们戴上拳击手套，数数自己有多少根头发。"

听完我也笑了：

"还没数完吗？昨天你也是这样说的。"

"不，"他回答说，"现在我们三根三根地数，数得比较慢。"

"我说阿纳尼亚，为什么你不愿意同我做朋友，为什么老是这样不说正经事？"我这样问他。他对我说，他活到这么大都没交过朋友，如果我再问，他就把狗放出来咬我，还说要让教授整治我。我也不肯示弱，我说，开会的时候我要揭露他。他说：

"好啊，我正等着呢。你去告诉那些想找我茬儿的人，让他们先来亲亲我的屁股蛋。"我对他说，他也不是脱胎的神仙，也会出错，也逃避不了群众舆论的监督。而他不但不冷静下来，不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反而更加放肆地说了许多，有些话难听得都没法写出来。这位同志是工作人员当中最不知羞耻的一个。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和克里斯蒂安同志最接近。

鉴于上述情况，我打算回家去。出乎意料的是，我找到了一样证据，它足可以把克里斯蒂安同志和他的同伙整治得哑口无言。是他儿子的东西：袜子、三角裤、衬衫，这是他儿子很自然地走向堕落道路的证明。

我出医院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一个上了岁数的秃顶男人，胳膊下边夹着一个包，他向我打听教授。我对他说，教授很忙，通常什么人也不接待。

“对我，如果他发现我拿的是什么东西，他会捧着鲜花来迎接我。”他说道。

“这么说，你并不认识他。”我又进一步追问。

“不，是他不认识我，”老头加重语气说，“如果他知道了我掌握的情况，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不管你有什么，都没有用。他门口有个愣头青，说不上两句话，管保打得你七窍生烟。”

“这我不信。就凭我手里的这个小包，如果他不打算让我张扬，就得老老实实地掏腰包。”他说道。

“喏，拿着，给你二十五列伊，”我对他说，“把事情告诉我。要知道，我可能帮你的大忙。”我知道自己这样做不正确，但是应该说很值得。

“你瞧，”我又掏出同样数目的钱之后，他对我说，“教授的儿子把我孙女强奸了。我抓住他的时候，他反倒把我打了一顿。后来他害怕了，以为把我打死了，把这些东西丢在我那儿就逃跑了。后来，我在大街上找到了他，已经醉得象头猪。我发了善心，可怜他，把他弄回到我那儿。

谁知他本性不改，又钻到我孙女那儿。后来我才发现，他同我的孙女竟生了个小孩。我待他不错，他却将恩不报，做出这种醜事。你说怎么样？如果他不打算掏钱，不管他教授不教授，这一辈子都让他没好日子过。”

“我怕你落到阿纳尼亚的手里，甭想有什么好结果。不用说你的包拿不回来，恐怕连你的牙齿也得留在那儿。听我告诉你，最好还是拿上二百列伊走你的，这样还能落个囫囵身子。”

“少了一千列伊，连想也甭想。”

“这随你的便，”我对他说，“他儿子现在在家，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的话，反倒会控告你是骗子，贼，说你偷了他的衣服。好，再见吧，别忘了我说的话。”

我回头刚要走，那人又降了价。最后我用五百列伊把东西买了下来。那人叫尼克舒，他说，如果我打算整一整教授的话，他马上可以出来作证人。对他来说，钱是怎么来的，他不管，只要能来钱，这才是重要的。当然，看得出这个人确实是个骗子，是个贼。但同样清楚的是，他可能的确是这位儿子的受害者。这位儿子竟如此为所欲为，似乎医学院是他自家的领地，而不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建成的。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我有意识地用了这样一种不正当的手段。但我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还冒着那个人翻脸不认账的危险。现在，当我把自己掌握的材料公诸于众的时候，他将会明白，他根本不是什么守护教堂的圣徒，而不过是个拙劣的传教士。如果说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束不

住，怎么可能对其他人进行教育呢？还有什么脸面要当学院院长呢？现在，人们享受着克里斯蒂安同志曾梦想过多时的民主权利，公众舆论将会明白应该怎么做，将会识破这位利用各种手段一心想爬上学院领导宝座的人，究竟是什么真面目。因此，真相大白的时刻已比任何时候更加临近。恐怕过不了多久，这位不知羞耻的同志，阿纳尼亚，就真的有机会象他自己胡言乱语的那样，三根三根地数头发，也许用不着戴拳击手套。一个普普通通的实验员，竟敢这样目空一切地拒绝一种真诚的、忠实的、无私的友谊。

十

那天晚上一直弄到深夜的聚会，尽管是不成功的，十分勉强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克里斯蒂安却觉得很好，甚至对波赞产生了一种真诚羡慕的感情："不管怎样，对于如何评价葡萄酒，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但不安并没有平息。他感到一种虚无飘渺、悠忽不定的东西在内心闪烁，一种痉挛后的余波，一种不满，无法避开，无法摆脱。他们离开以后许久，他仍然毫无睡意：他见安德烈房间里的灯光已经熄灭，忽地生出一种并非自然的愿望，希望同他谈一谈，向他解释清楚，于是决定去把他叫醒。但到了那儿，见他的床铺仍然叠得好好的，没有铺开。这倒一点也没使他感到意外，只不过对于他们不能感情交融，不能摆

脱他们之间关系的尴尬状态，觉得有些遗憾。他想埋怨安德烈不该抛下他一个人走掉，但又觉得这并不公正。他在床头上发现了他们那只眯着眼的老猫，便爱怜地把它抱过来，轻轻地抚摩着它全身黑缎子似的细毛，一下子坐进扶手椅里。他呆呆地凝视着桌子上满满当当的什物，脸上还残留着刚才溅上去的酒星、芥末、菜汁点。接着，象是忽然从屋顶落下来一张张照片似的，眼前闪出刚刚离开的同事们的形象。他已无法弄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弄不懂他们的动作和话语的含义，仿佛在一块光溜溜的大冰块上，不停地向前滑着，孩子般地、担心地躲避着那隐约闪现的疑问——就象是要跳过一道道微弱的白光。就这样在那望不到边际的白茫茫的空地上，飞速地奔跑，一直跑到筋疲力竭。

屋子里的灯都亮着，他就这样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听到一声惊叫，这才蓦地醒了过来。是老保姆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我的上帝，该不是死了吧？上了岁数竟变成了这个样！"

几杯酒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混沌的、年轻时代的过去。这时，如果让他谈一下其他教授之间的关系，他会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说道："见他们的鬼！有什么新鲜的？能会怎么样？"不过有一样他是清楚的：不管他在不在场，他们要说什么，还是照旧说什么，要干什么，还是照旧干什么。他很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在他把精力主要放在科学研究上的这三年里，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瓦西利乌

变得更沉默了一点，而考德里亚努，由那时的腼腆，拘谨，以致没法跟他进行一次认真的交谈，变得很爱说话。尽管对他还有些摸不透，还无法形成什么定见，而且也觉得无兴趣这样做，但从他身上却似乎发出了一声尖利的信号：危险！现在，他觉得自然而然的是，当提到选一个新院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名字不会不被列在那些关心竞选的人们开出的名单上，而拥护者和反对者常常势均力敌：一些人会赞扬他，拼命地支持他——在那些能说会道、靠历史的误会而爬上教育部门领导岗位的人们面前，他是一个挺直腰杆毫不卑躬屈膝的教授——而另外一些人则会说，现在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有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人太死板，太不灵活，太缺乏适应能力。或者，更狡猾一点的则会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把他从科研工作当中抽出来，根据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眼看就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了，可不能让他离开实验室，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继续搞下去更有利、更合适的人了。还有些人会指摘他的高傲，说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甚至是道德品质不良的表现，而且对现任领导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多尔奈什蒂，谢尔班，克列楚，曾多次抱怨说，他从来什么会也不参加，而他自己声言这是正确的。仅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明，他从来不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他无从知道这当儿人们在搞什么交易，不愿意降低品格去打听这些事，最好还是不要去管，随它去。象是中了魔似的，每天上午他总在手术室、办公室来回转，处理一

些永远也没完没了的行政事务：其实，他是想用各种各样的琐事，把每天的时间空白填得满满的，用这些来把他同那个夜晚，那个在他记忆上投下一个深色斑点的夜晚，分隔开来，尽管他时常不自觉地、天真地用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马跑多了路，总有失前蹄的时候，这没什么！"

他忽然看到了娱姆温德尔太太，她显得有些吃惊，甚至有点害怕："大概她以为我死而复生了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把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叫来了，开玩笑说，让他到家做个最后告别，因为这几天除了实验室的事，还需要整理手术卡片；但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象是有点怕，就好象有什么人在背后推着他去这样做似的。他觉得必须放弃别的，而这个别的，正是他将对这所象多尔奈什蒂院士开会时那样昏昏欲睡的医学院进行整顿而感到的骄傲和自得。但想到这并不是"假如有可能"的唯一一件事，又立即把这种愿望抛弃了，就象严冬里一股湿热的气流，立即被冷风驱散那样。于是他告诉秘书，尽可能不让任何人来打扰他，然后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决心静静地等待着脑子里闪过一种什么想法：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但忘记了是什么事，什么时间。他有些生气，只好站起来看看台历上的记事栏。但台历已经有两天没翻了，仍然是对他来说有着某种含义的那一天：三月三十日。过了许久，他忽然高兴地发觉，他刚刚进屋的那一刻，就注意到并且脑子里留下了这个日期的印象。"是不是安德烈的生日？"他吃惊地自问。他确切知道的只是月份，而奇怪的是

日子和年份已经记不清了。丝苔拉那时候每年都按时操办，他也参加，呆呆地、好奇地在一边看着这些年轻人，怎样在充满香槟酒气味的屋子里欢乐。丝苔拉高高兴兴地准备饭菜，给儿子预备一样最意想不到的礼物，看起来比她自己的节日还高兴。但自从办完丝苔拉的丧事，便中断了这样的传统。克里斯蒂安即使想举办，也觉得无从下手，而且，没有丝苔拉，任何庆祝都将失去意义。就连安德烈的欢乐，也无法掩盖住丝苔拉苍白、悲伤的影子。于是便只满足于给儿子买一身衣服或者一些书籍，送给他的时候说上一句："这是为你生日买的。要是你愿意，也可以邀请一下别人——我会很高兴的。"而安德烈却更乐于到饭店去欢乐一番。有教授在，他的同学感到拘束，没办法玩得尽兴。而伊丽娜，根本不愿听到提起他们的家。

最后，教授记起，一年前正好是这个日子，他同薇拉·班奈德斯库，杜米特列斯库大夫，斯皮尔曼副教授，当然还有阿纳尼亚，一起纪念他的药物进行第一百次未成功的试验。他们并不难过，也不犹疑，只是觉得有些疲劳。克里斯蒂安建议到城外去，他们找了个小木屋，玩得兴致正浓，杜米特列斯库大夫拿出一只装着那种试验药物的小瓶，点着一支蜡烛，拿起一条黑色的粗羊毛毯披在肩上，开始做起送葬时的安息弥撒来。教授自动给他做帮手，在一旁唱诗。他们两个都会做这种弥撒，克里斯蒂安甚至全过程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以前假期里，他父亲一直要求他在教堂的唱诗台上唱诗，免得让人们说他不屑于同村里人在

一起。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把那只小瓶下葬了，而唱诗班里又增加了几个守林人和伐木工。当他们发现是谁在唱诗时，又拿出一些在罗姆酒里泡制的鱼，作为献给死者的祭品。这些陌生人唱诗时那股认真严肃的劲头，给“葬礼”更增加了几分隆重的气氛。尽管这是玩笑般的作乐，但事实上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埋掉的并不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东西，而是那些放弃一切而紧张度过的年华。小小玻璃瓶里装的不是别的，是他们已经成为过去的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为了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他们都曾有所失，这不单单表现为在实验室度过的时光，为了材料、器材到处奔波而消耗掉的精力，而且还表现在每人脸上刻下的条条皱纹，精神和体力无比疲劳的姿态上。但有所得的时间到底何时来呢？那将是什么滋味呢？——如果确实能尝到它的话。

从那之后，又进行过十七次试验，但他却觉得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他真想把大家再次召集起来庆祝一番，如果有人提出再去那所小木屋，他简直没有勇气拒绝，但已经没有可以支撑的体力了。实验又前进了一大步，他确信，不会发现不了抗癌药的关键，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感到有些急不可待了。而时间却象来讨一笔旧债的债主，不允许再拖延，极力对他威逼，同时又似乎高兴看到他这样无能为力、怅惘迷离的窘态。他又想到试验小组的人们：如果不是遇到他，可能他们会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他们的生活也可能顺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顺着更明朗、更心满意

足的方向发展；而现在，他却把自己长时期以来的固执传给了他们，把他们强行推上了自己这条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路，教会了他们怎样使自己的意愿超越现实的可能。他做得对吗？他们真的愿意跟他一道工作，对这项研究确有热情，还是出于客套，出于对领导的惧怕，出于其他别的原因而不得不跟他这样做呢？尽管问题提得毫无意义，但每次试验失败以后，总要这样不无内疚地重复一次。“我们在研究治好一种癌症，但却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在被另一种癌症毁掉。”

日历上的日期引起了他许多联想。如果不是阿纳尼亚带进来一个记者，这一天将会同最近几年的日子一样，伴随着无休止的夹着雪的春雨，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逝去。

“我对他解释过了，现在不是时候，”实验员见教授情绪不高，这样分辩道，“他说重要的稿子一刻也不能拖延，而我又没法找到别的人，他一定让您接见他。”

“是不是他家里有谁得了病？”克里斯蒂安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告诉他，只给十分钟时间，多一点儿也没有。”

记者长着一副孩子般的面孔，一双生动的略带不安的眼睛，背有些驼。他贴着实验员的身子溜了进来，简短地、有点腼腆地打了个招呼，不等主人请就一屁股坐在了长沙发上。对此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些不快。

“我了解到您的研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记者说道。但教授没等他继续说下去，马上打断了他：

“什么研究？”

“关于癌症的研究。现在您已经到了一项重大发现的门槛！”

“我不喜欢故弄玄虚，”教授冷冷地反驳道，“人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说的正是事实。”记者高兴地说道。这一下却着实激怒了克里斯蒂安。

“失败也是一种事实。这是谁告诉你的……他叫什么？”

“考德里亚努教授同志，”记者承认道，“他一定要让我来，说这是完全值得的。但是关于您的谦虚，他事先向我作了提醒。”

“这个考德里亚努想要干什么呢？”克里斯蒂安有些气愤地想，同时看着记者怎样以轻缓准确的动作准备好了录音机。看来他深信一旦说穿了消息来源，对消息的正确性更是不容置疑。

“我的同事还对你说了些什么？还提醒你了什么事？”

“从他那儿得到的消息，这些也就足够了，其余的我自己来采访。”

“我取得了一些结果，这我不否认。但只是在白鼠和狗身上成功了，还没作人体实验。这需要时间来作结论。”教授尽量做出有说服力的样子说道，“我希望暂时还要保守秘密。”他感到满意的是，终于找到了一句可以结束谈话的最恰当的答复。“请把你的名片留下，一旦有了什么确定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

"您决意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吗?"

"即使我愿意谈，也没这个可能。"他特意地笑了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那个神奇的字眼"秘密"上。记者并没收起他的话筒，也看不出准备要走的意思。

"看起来有点败你的兴了。"克里斯蒂安看到记者的样子，又有点心软。

"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记者承认道。"但是我为您并不只是准备了一个问题……"

"很遗憾……其余的，比如说……肿瘤，那就要看你们的了。如果你们能在这方面的采访上取得成就的话，可能我在研究上也许能前进一步。"

"您在肿瘤研究方面有这么多经验，如果您连一句话都不说，那么很难相信别的人……"记者的嗓音听起来象个正在变声的少年，尽管他早已大大超过了这个年龄。他一面说着，一面用精心选择的姿势补充自己的话：每当他极力想用小手指补充出他要说的某个词时，他那浓浓的象横写的括号一样的右眉毛，便向上一翘，以致克里斯蒂安惊异地自问，这是受哪根神经的指挥，使两方面的动作竟会如此协调一致。

"好象舍本豪尔① 说过，为活着的人树塑像就意味着害怕后人。但是，"教授想说句笑话，"我是在为后人准备。至于我自己的塑像，我一个人慢慢雕琢，还有时间。"

---

① 德国哲学家。

“我曾经听过您的几次课，我特别欣赏您作的注解。您为什么不愿意把同样的话向更多的听众讲呢？”

克里斯蒂安并不急于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也可能他已经不相信说出来的话：有些话已经贬值，已经过时，已经把原来的含义榨干。有些词句，勇士用它，胆小鬼也用它，幸好事实还能把这两种人区分开。但什么词句可以代替某些动作，代替某些微笑呢？可能因为考德里亚努派这个人时的那种过分夸大的重视程度，那种强令得出某种结果的意图，那种急不可耐的态度，使他感到不舒服；可能因为他并不愿意被认为自己是受人操纵的。但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在选学院院长这件事的幕后，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除了考德里亚努的急迫之外，他还没有任何证据。“也许经过昨天晚上，他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问问我是不是还活着？真的是马失前蹄了？”他本打算问一问他们怎么会提起他来的，但他不愿让考德里亚努知道他打听过这件事。

“如果我对一种癌研究不成，”克里斯蒂安终于又开口了，“可能我还会研究另外一种，当然是在我还有时间的前提下。”

记者看了看表，克里斯蒂安注意到了他的动作，怕他再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决定抢先开口：

“当然，”教授说道，“需要做的事很多，但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计划的最后呢？在这段过程当中，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进行斗争，必然剩下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

觉得我象是我父亲为训教我而举出例子的那样一个人：他想造房子，于是便种橡树。我忘记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必须这样做了。譬如说是因为在荒原上，或者说为了想用橡树盖一所结实房子。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过了许多年，树已经长大成材，是因为已经习惯了风吹雨打，造不造房子都无所谓，还是因为已经没力气砍树了，准确的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总之，这样说吧，这个人就这样白白地等了许多年，或者白白地活了这么多年。”

“还有三分钟，”记者插进来说道，“至少请您回答一个仅仅属于我个人好奇心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跟死神打交道，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呢？”

“是以老年人的身份还是以医生的身份来回答呢？”

“当然是以医生的身份。”记者急忙说道，他被教授的冷笑弄得不知所措。

“几十年以前，或者说，几千个心理年以前，关于生与死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理论，对我曾经有过很大的吸引力，好奇心促使我收集起这一切，而且相信每一种理论总有它部分的真理，因为这都是长时间积累起的经验。门槛的那一边呢？什么也没有。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如果说没有这持续不断的担惊受怕的话……我想可能能够发现秘密……今天我相信，生理上的死并不值得多费脑筋，这是象我这样的人们的事。更值得研究的是心理的死，精神的死，生下来就如同死的一样。换句话说，指那些思维上还没进化到人的人们。你瞧，”克里斯蒂安继续说道，“世上

还有这么多人，并没意识到他们是在活着……失掉内心的自由，按照我的看法来讲，就是真正的精神死亡……总之，太复杂，太荒诞……但这些理论，遗憾的是什么也不能改变。而另外一种死呢？对未知的害怕，等待……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但按照我的年龄和经验，应该感觉得更多一些……”

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的嗓音有些颤抖，于是站起身，避开记者迷惑不解的目光，匆匆地把手伸给他，并再次向他保证，如果研究有了什么结果，他将会第一个知道。

记者对采访这样轻易地结束，很不满意。直到出门的时候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教授是高傲、厌烦、正赶上心情不好，还是考德里亚努他们提醒过的谦虚？但既然采访没有成功，这个谜也不值得再去解它了。而克里斯蒂安，眼看着记者离去，反倒觉得有些内疚：这个人的过错，无非在于是考德里亚努派来的。而考德里亚努很可能并没抱什么恶意。“老了，跟不上潮流了。”他自言自语道，“原则，同我一道，都过时了。他，也许有另外的道德标准，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不能够接受这个职务。”他责备自己没能够做到心境坦然，由于老是遇到意外的不愉快，因而看待一切事情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事实上，近来他很难控制自己的神经，无能为力地由着各种精神状态任其变换，听凭越来越频繁地向自己发出各种各样的危险信号。

他迷惘地望着四周，在办公室里毫无意义地转来转去，仿佛被一些巨大的冰块围困在中间。这些灰白色的表面

粗糙的冰块，缓慢地，但肯定无疑地向前移动着。这儿的一切仿佛都属于遥远的、没有生气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经常不愿呆在这里；偶尔走进这里的屋门，总要不自觉地伸一伸脊背，整一整衣装。宽大的硬木办公桌，下边的柜橱闪闪发亮，桌上却用白色油漆写了一个粗笔画的室内物品登记表。衣架上黑色的挂钩，弯曲得很艺术。屋门包衬的皮子上，钉着一排金色的小钉。墙壁的四分之三，用硬木覆盖着，上边精心地做了各种装饰——所有这一切考究、庄重的摆设和布置，都是波普教授特有的喜好。克里斯蒂安感到十分需要另外的颜色——但绝不是他早已看腻了的白色——如果把这些家具换掉，又怕别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恩师，力图消除波普教授留下的痕迹。而事实上，波普教授是他对之感激不尽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波普教授的肖像镶在一只粗大的黑色镜框里——一张瘦瘦的椭圆形的脸，留着乔治第五式的胡须，眼神略带狡黠，仿佛想要讥讽谁——他不由得记起波普教授给他寄到巴黎的信："你要尽力地学，但不要想入非非。他们并不比我们懂得多，只不过比我们更有条理，比我们更懂得怎样尊重自己，不自暴自弃而已。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生活，把每一天的日子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样到处动乱不安的年代，谁又知道你还能不能再次看到巴黎？"这些，同他父亲嘱咐他的是那样相似。他父亲每次写信，在告诉他牲口、收成、节日、谁谁死了、谁家生了孩子、花以及"老太太"的病等等之后，总要告诫他："好好看看那儿的情况，记在脑子

里，告诉我们。”然后，让他了解一下小麦和奶牛的价格，打听一下那儿学校里还有没有匈牙利人和德国人的孩子，他们学习怎么样。他父亲对他写信少而且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感到很不满意。而每当赶上雨天或者集市的日子，他父亲总要到教授那儿打听一下儿子的消息，问一问是不是听教授的话。其实是怕儿子在异国他乡成了家，或者丢掉了对宗教的笃信。要求儿子“听话”，始终是老人的一件心事。克里斯蒂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形象：密密实实的白发一直贴到额头，一只黑色蝴蝶结几乎把棉麻混织的粗布衬衫领整个遮住，一双灵活的不断探询的眼睛，一只笔直而有棱角的鼻子。

“近来老是不知不觉地回溯到过去。”教授这样想着，顺手拿起一本书，又躺在了沙发上。不由自主的联想又使他回忆起在捷克前线一段比较平静的休息期间的事：他在一座城堡里找到了一本私人藏书，稀有版本的《悲惨世界》。雨果并不是他最喜爱的作家，吸引他的并不是米里哀先生——这个原本是白里虐尔本堂神父的孤独以及他神秘的生活，而是翻动纸页时的沙沙声，字母的形状以及书本的令人陶醉的气味。这一切仿佛使他斩断了一切思绪，无忧无虑地置身在一片夏季的麦田里。他感到一阵阵的喜悦，似乎又重新学会了怎样读书。

“美妙的徒劳无益，”他听到他的朋友、随军神父——他永远也不会象查理·佛朗沙·卞福汝① 那样升为主教——

① 即《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先生。

这样说道。“要是你眼光稍微看远点，就不该再恢复看书的习惯了。自从开始了战争和军国主义，今天的文化全都被那些愚蠢的政客和官员糟踏了。不管你逃到哪个角落，都只能闻到一股马靴的臭味。现在已经到了一寸土地都得由下等军官来决定一切的地步。”

在一个村子里，神父遇到一个女人：她身体就象树墩那么结实，两只大乳房高高地挺在胸前。神父跟她只能通过手势才能弄懂一点对方的意思。这个叫诺娜的女人，就如同杂技团里的大力士或者举重运动员那样，向神父展示着肌肉线条的美。在她面前，神父仿佛感到连自己也胜过了周围的人，身价也比过去更高，简直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

“生命，”神父说道，“就象任何欢乐一样，不会无休止地一直延续下去，早晚会被收走的。感谢上帝，现在还让我活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克里斯蒂安听起来觉得象是一种不假思索、无法控制的怨言，于是更加注意地听下去。“可你没想一想，”神父继续说道，“自从产生了希腊和罗马的完美艺术之后，自从哲学走出经院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让人们再用几百年去重新学跳舞，重新学怎么思考吗？而现在却又到处是决定一切的下等军官！想到他们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只等着向自由迈出的那一步。我们落入迷雾已经很久了，要是这次战争以后我们还能活着，那么应该为我们丢掉了读书习惯而庆幸。这样，我们才能把身体很快地恢复过来。”

还在巴黎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就已经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地目睹着一场人类文明的终结，目睹着一场暴力、野蛮、毁灭文化行为的发生。那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发出威胁人类的信号。由于担心，他常这样自问:“直到让这些无知的军官们也习惯于读书，需要过多长时间呢?”

克里斯蒂安只是想把书留下，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也许脱不过。但是从希留斯或者安德罗曼达[1]的角度来看……”

使他意想不到的是，由此他却发现了已经被遗忘的宁静。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才能够这样不理会周围发生的一切，才能摆脱掉下意识的反应。一种新的、不平常的脉搏跳动，一种恬静清新的微风，完全解除了他周身的麻木，使他获得了重生：他能够准确无误地意识到丢掉的将是什么，从而引起一阵惊惧；当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却有可能逃脱不掉。这个念头牢牢地扎进了他的脑海：在这之前，他知道，这种无情的、冰冷的、使人颤抖的想法也曾经在脑子里转过，而只是在这里，他才悟出了这种想法的新含义。它就象一只无形的手，一直紧紧扼住他的喉头。

“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死!”他又记起了那个记者。但他弄不清到底是记者的问题激怒了他，还是他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当这回事也轮到他头上，当这成为我们共有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奇怪，他究竟打算从我这儿

① 天狼星和仙女星座，此处喻指天意。

得到什么呢？是科学的答案吗？只有上帝才晓得。事实上，我并不能告诉他任何特别的东西，我了解的完全跟他一样多。除了一些专业术语，除了打算进行一下人死后体内带电活动的研究，除了一些具体的资料，其余的，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同……那天上午，我自己甚至感觉到，还没有轮到我，可能我是个例外。是件需要深入考虑的事吗？门槛的那一边神秘莫测，无生命的永存和其他许许多多类似的东西……是件不必难为情的事吗？可能……当我们亲眼看到许多人在我们面前消失，当死亡以军事统计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一次冲锋减员百分之多少，随后的百分数或者下降或者上升的时候……也许，是件值得乐观的事？我们这些不知畏惧为何物的人，每天从死亡的边缘拖回百分之X，百分之Y的数字，重新加给家庭，加给工作。我们竭尽全力，研究、探索，不停地重复，我们没有什么武器，靠的仅仅是自己的手和脑。我们想方设法推迟死亡，极力地推迟它。只要能看到致癌的病毒，或者究竟到底是什么，能够听到那几个加重语气的、精心选择出的句子，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当然，在有关癌症和死亡的材料方面，克里斯蒂安教授是所有人当中最在行的一个。他娓娓动听的阐述，也可能给你们带来满怀希望的遐想。不知道哪位专家发现，话说得越多的人，活得时间越长。这样，只要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生命就会自动延续。一位年轻的医生患了癌症，直到最后头脑仍然十分清醒，他尽自己所有的力气，一刻不

停地说话，但对死亡的惧怕，仍然使他惊恐不安。那时，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教授却第一次向这位年轻大夫热情地解释了这样的理论："生命并不会在这儿就此结束，那将是荒谬可笑的，极不公道的，或者随你怎么说。你不但不应该哭，不应该悲观失望，相反应该感到幸福。一些人，注定要走过一个世纪，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另外一些人，却象熊熊燃烧的火焰，不一会儿就消逝了，急急忙忙，大大缩短了整个的过程……说到底你能丢掉什么呢？差不多所有的滋味你都尝到了。你可以断定，生命的秘密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没办法解开。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将来我们也不会弄清楚。你已经缩短了生命进化的周期，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会比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又对他讲到轻生，讲到玄想，讲到苦行僧和通灵论等等。也许已经说服了他，但无论如何，却是一种哄骗，就象并不是为了有助于病人，而只是为了倾诉自己内心的空虚、怀疑或者系着恐惧的希望。

"而如果……？是的，如果……？"这个疑问，一直跟随他到了前线。在那眼前一片白的软绵绵的状态下，在那生命渗入到身体的每一个毛孔，自己也意识到是为了它而生存的时刻，那时，记忆中的一切都泯灭了，任何其他愿望都消失了，所关心的只有生命进化周期，这个向垂死的年轻医生解释过的环节，他所害怕的只剩了这一点。他相信，尽管战争临近尾声，但自己却很难逃脱。于是，他便拚命地冲向第一线，做救护员，做义务担架队员，完全不

顾他自己的岗位并不在那儿：他已经没有精力等待死亡的到来。等待，对他来说简直是受折磨。他极力向前冲，不惜一切地呼唤着死神，心甘情愿地去迎接它。但命运却偏偏同他作对，子弹好象老躲着他，就连受伤也轮不到。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瓦里那，战争最激烈的日子里，他差不多一连五个星期几乎没睡觉。他象普通士兵那样参加战斗，用湿毯子冷却打热了的炮筒。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有几颗甚至打穿了他的钢盔。他自己的短冲锋枪也打弯了枪膛，但身上却连一块弹片也没碰着。后来，他被人从一个着了火的医院里抬了出来。他的衣服烧着了，周身麻木，动弹不得。他清楚地闻到了一股皮肉烧焦了的味道，听到一阵阵脂肪烧化时的嗞嗞声，亲眼看到了将会是怎么一回事。但终究他还是幸运的，并不光彩的幸运：与其这样不可忍受地等待下去，倒不如那时候就完结。

"命运真让人不可捉摸，"他对神父说。神父头部和眼睛都被烧伤，怕从此变成瞎子，一直昏昏沉沉。"我一股劲傻呼呼地往前冲，其实这并不是我该干的事。死我并不在乎，我甚至情愿去死，而且真正做到了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迎接它。可它却讥笑我，可怜我。现在我已经不可能象那时候那样了，我甚至想要回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乏味、疲倦、失望和害怕牢牢地缠住了我。我知道，生命实质上已经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新东西。尽管我仍然想活着，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一直等到死。我可怜自己，对自己糟踏自己的这种方式感到羞愧。可我能怎么样呢？"

"我也是个不走运的人，没能耐，身上坏毛病一大堆。一切犯禁的事我都做过，什么坏事我都做过。我就象个当兵的，什么都不怕。瞧，现在就是报应！我成了个瞎子。可是大夫，这正是自我拯救的出路。过去，我的心是瞎的，脑子漆黑一团，就象牲口圈里的一条蛆，满不在乎地在罪恶的深渊爬来爬去。现在灵魂附体了，却看不见外边的东西，只能看见自己的心，用它来感觉出亮光和信仰给你的力量。我受到了惩罚，大夫，我将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寻求真正的光明和尊严。忏悔吧大夫，把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这样你的内心才会感到平静……"

"可我救活了这么多人，把自己的血给过这么多人，亲手让这些人重新获得了生命……我做的这一切，照你的说法叫做什么呢？"

"大夫，"神父率直地说道，"这是你的职业。信仰却是另外一回事。只有从信仰当中才能得到报偿。"

而他残废的身体，能给灵魂带来光明吗？"也许他想要在精神上压过我，他抓住了我的弱点，想要恐吓我。他希望我们两个处在平等的地位：他肉体残废，而我——心灵残废。或者，可能真的存在着这种眼见别人赎罪的欢乐。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忌？谁又能解开言词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用指头在寻找光明，绝望地把两只手伸向铅灰色的天空，象是能触摸到它，能感觉到云层的那一边究竟是什么样子。怎么竟会变成这样呢？"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付出代价，”神父说道，“谁也不能逃脱！”

是诉说失望的痛苦还是表达坚定的信仰？一次次的谈话，神父越来越关注自身，就仿佛找到了一块安安静静的地带，沉浸在一片怡然自得的欢乐之中；知觉超越了言词，继续向外渗透着。难道这一切是向他说明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吗？

一天早上，他看见神父把头仰在背后，刚刚解掉纱布还残留着血印的脸，痛苦地痉挛着：终于，神父也没毅力等待了，急匆匆地去迎接他的上帝。克里斯蒂安顿时觉得头脑中的一切都幻灭了。他木然地走上凉台——这儿过去曾经是一座别墅，有好长一段时间，就这样呆呆地凝视着远处一片片的火光和灰蒙蒙的捷克山脉。“也许有些人象一道刺眼的火光，转眼间就燃烧掉。”他仿佛自言自语回答着神父的警告，“而另外一些人却一点点地发热，缓慢地延迟着时间。有些人注定了特殊的命运，有些人坚持着特殊的信仰，而我对于自己却一无所知，拖着摇摇晃晃的肢体，毫无目标的东走西撞……”

他好象在哪儿又遇到了神父：就连神父不也没能顺着自己的路走到底吗？神父那血渍斑斑的脸，蒙着眼窝的绷带，不由使他心里猛地一缩，一股令人窒息的惊惧，迫使他闭上眼睛拼命向前奔跑。他想要把头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找到什么人作保护，他想要用手抓住或者用牙咬住一个人，掰开他的手掌，让他狠命地打自己，一直打到能痛痛

快快地哭出声。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和好奇产生出的疑团已变得毫无意义。生与死已成了另外的样子，肌体进入了正常的损耗过程，只有同种同类，在遥远的清冷的星光闪烁中，不停地发展进化着。而在那所别墅的凉台上，脑子被神父的形象缠绕着，顿时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我也……现在……不再拖延这段时间……如果……一切都进入永恒的沉寂，摆脱掉所有的烦恼和不幸……因为对我来说，生，死，痛苦……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熊熊的火焰，震耳的枪炮声，使他越发感到喘不过气。他似乎已经不能动弹："也许我一离开这儿……可能……就会发生……"

他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顿时，远方的火光，无名的惊恐，都一下子消失了，眼前只有透过被风吹动的窗户射进来的几束阳光。他抬起头，遇到了波普教授的视线，不由羞愧地想笑，他想问一问波普教授，是不是到了这样的年龄也曾如此频繁地想到过……是不是曾经十分轻易地摆脱一切烦恼，落得孑然一身？

"这位年轻人，记者，到这儿来是想从我这儿听到闻所未闻的事情。哪知道却恰恰触到了我早已忘掉的一根神经，又唤起了我那种下意识的冲动，又招回了我一度难于摆脱的念头。而那时，却完全是另外的情形，或者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他试图这样自我解嘲，他不愿这样再一个人呆下去，于是拿起一本书，夹在腋下，唯恐让人看见，匆匆走到实

验室，脱掉衣服，准备睡上一觉。但看到自己干瘪的双腿，半透明的粗糙皮肤下突起的一根根歪歪扭扭的青筋，又连忙穿起了裤子。“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他伤心地自语着，拿起了白罩衫，然后，摇摇晃晃地坐到了桌子边。玻璃瓶上映出了一个年老的、木呆的面孔；胡须在几个小时之内竟又长了一截，而两只眼睛，由于过度使用显微镜，几乎小得看不出，仅仅显出两道斜斜的细缝：尽管是件十分自然的事，但他却从来没注意过这个细节。他点着一支烟，后颈靠着椅背——这是很久以前他还不习惯关节疼的时候给他特别做的一把椅子——闭上了眼睛。四周萦绕的烟雾，使他感到一阵飘飘然。这时，实验室里的狗突然骚动起来，汪汪地叫着，就是说，有什么人到了门口。“可能是阿纳尼亚，”教授猜测着，心里不觉一酸。“也可能是薇拉……”他立刻下意识地收起白罩衫，把头依旧靠在椅背上，装作并没注意到狗叫的样子。但狗偏偏依旧叫个不停，于是他极力做出一个习惯的、镇静自若的姿势。看起来今天他已经无法一个人同他这些熟悉的物件呆在一起，无法享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一天开始时的那种不寻常的宁静。

他闭上眼睛，象少年时代游戏时那样，想根据脚步声猜出进门的是谁。但刚刚合上眼，却立刻忘了自己想要干什么，只好顺从着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知怎地，今天好象一切都不听大脑指挥。”他心里这样抱怨道，“爬不起，软瘫，飘忽忽，对，好象是这个词，飘忽忽。思想犹

如离了壳的灵魂，随风飘摇，身子不由自主，落入一种古怪的宁静中，肌体企图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拒绝听从主人的使唤。我觉得自己在这种不可容忍的状态中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是阿纳尼亚，根据脚步声可以听得出来，而且是有什么重要事情。“或许，他见我靠在这儿，会以为我已经到了永生的那一边……”

“本来我不想打扰您，”阿纳尼亚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接下去这位实验员立刻被医学院副院长克列楚教授拽到了一边。

“你好啊，”克列楚的男中音盖过了实验员咕咕哝哝的解释。“你这儿满不错嘛：实验室，卧室，动物展览室。”他有意地打趣道。

“博物馆，地下宫，行乐室，医院，酒馆，厕所，浴室，候客厅，”克里斯蒂安教授没好气地接下去说，却并没站起身。“可能在我家讨论的事，有人向他报告了：瓦西利乌，也可能是波赞，不管是谁吧……”他一边想着，一边力图寻找接下去的表情或动作。“或者，也许我快要完蛋了的谣言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要亲自来验证一下，看我是否还能支持到选院长。不管怎样，他想要说的一定是已经有把握的事，不然的话，不敢直接跑到我这儿来开门见山地谈这些无聊的谣言。都怨我自己，对考德里亚努让了步，瞧，现在就是后果。这场肮脏的游戏本来不关我的事，我本应该躲得远远的。他来的时候，我并没象个守规矩的小

学生那样，老老实实地趴在显微镜上看，也没在动刀解剖一只瘦骨嶙峋的狗。这样，消息马上就会传开：整天闲呆着，桌子上一无所有，狗安安稳稳，怎么会有成果呢？还搞得出什么抗癌药呢？……如果到了那一步，克列楚更会神气起来：'同志们，搞研究总应该象个样子！'"

顶了几句嘴之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就这样沉默着，不知道怎样继续下去。克列楚一副俨然不可理解的样子：一对蓝得发绿的小眼睛，就象被雨打湿了的火柴盒的颜色。粗粗的栗色眉毛，紧紧拧在一起。眼睛并不注意瞧什么，只是这样平平常常地闪着暗淡的光。从他脸上，克里斯蒂安看不出任何激动的表情。几年前当他来到医学院的时候，给克里斯蒂安的印象是个腼腆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沉稳自信、有着一种特殊坚韧精神的人，利用人员不断向外科流动的教研室，逐步巩固自己的威信。开一门课，参加一些肾脏病因学的科研活动，然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渐渐地甚至也开口说话了：他并不是附属医院的门诊大夫，但每次却都替他们辩护，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占多数。同时，他还主持组织了一些学生科研小组。多尔奈什蒂粗枝大叶的作风，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他提出的一些改革意见，院长都批准了，因此，当他被任命为副院长的消息宣布时，并没有任何人感到吃惊。

"他有时间，亲爱的，"奥泰斯库说道，"人们过一夜不会又长出什么新器官好让他去描写。在梯突斯、格拉依或

者巴比里安①之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在我研究的这方面……”

克列楚满怀雄心，毫不放松地精心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使这些人不但不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反而能从他身上发现不易看到的美德，从而出于感激，一股劲对他不停地赞扬。克列楚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而多尔奈什蒂的离位，正好是个机会。他不言不语，让别人很难摸透心思；谨慎周到，绝少会犯什么过失。就这样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前进着，力图使人们理解，只有他才是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只有他才不会忽略上级负责同志作过的指示。

那天晚上，考德里亚努关于克列楚说了那么多，今天克列楚又突然找上门，这一切使克里斯蒂安不得不联想到那个他拒绝认真考虑的建议。

阿纳尼亚觉察到克里斯蒂安情绪不大正常，因此并没有请克列楚教授坐，谁知道不经人让，他却自己坐到了床边上。为了安定一下情绪，他点着了一支烟。

“亲爱的教授，”克列楚有些不知所措，“我到你这儿来，是为了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

“微妙？”克里斯蒂安笑起来，他感到高兴的是沉默思考的阶段终于过去了。“如果是个微妙的问题，那丝毫用不着为我担心。这一段时间，我遇到的只有微妙的、紧急的、复杂的、决定性的、十分重要的、严重的、有关荣誉

① 均为著名的医学家和解剖学家。

的等等这样的问题。当然，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找我绝不会是为了普通的事……”

“看来你是摆开一副吵架的架式，”克列楚极力想平息对方的火气，“但是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

“怎么？”克里斯蒂安说道，“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就象是你来宣布我死刑似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带来好消息，坏消息，我早已经习惯了。而且，科研经费，你已经给我减到了一文不剩。这样说来，还有什么呢？不过我还是要通知你，为这件事我还要争一争。其余的，值得我关心的无非有三件事：癌，儿子和我自己。不管什么消息，什么祸事，都没什么大不了。”教授显得毫不在意。

“唔，告诉你，”克列楚教授接下去说道，“要建一个设备齐全的现代化肿瘤研究所，而且所长已经有了人选，康·瓦·约内斯库。我们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这儿，不能再这样浪费人力。”他每个词都加重了语气，但结果并没象他设想的那样，没发现任何意外惊奇的反应，不免觉得有些遗憾。

克里斯蒂安迟疑了一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人根本不懂业务。”或者“我呢？对我，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但结果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克列楚又接下去道：“我来这儿是为了另外一件事：关于你儿子的问题。你关心些什么，我心里都有数，所以一直在留心。”

“他怎么了？身体出事了吗？”克里斯蒂安教授有些担惊，他知道，第一个消息之后，第二个往往更坏。

“身体倒没什么。”克列楚答道。

“那么，别的，我再重复一遍，还是那句话，随你怎么说，没什么大不了。”

“他喝醉了酒，有人在离学生宿舍不远的一片烂泥里找到了他。”克列楚一口气说完，克里斯蒂安怔了一下，接着却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

“哼，事情很清楚，”克里斯蒂安心里想，“他知道了昨天晚上的事，现在已经开始组织进攻了，不过手法还是老一套。他见我没上他研究所的钩……哪怕再使出一百，一千，也没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大声说道：

“醉得象个样子吗？我是喜欢走极端的，要么不醉，要醉就要醉得谁过来都要踢两脚。在这方面我也不喜欢温温吞吞……”

“人们发现他躺在烂泥里，”克列楚对克里斯蒂安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感到惊奇，“这就是说，已经达到了你理想的高度。”

“岂止达到，甚至超过了。”克里斯蒂安讥讽地答道。“没想到学生安德烈·克里斯蒂安在系里竟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甚至惊动副院长亲自来通知这个消息。希望你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把这件事提到校务委员会去讨论，不，就是发表在学报上也不是不值得：学生X生平第一次玩闹过度，这件事发生在某日、某时……为了同等对待，院长同志……如果学生Y也喝醉了，他是高第特大街上一位洗衣妇的儿子，也会劳你的大驾，去通知她吗？或者

说，是瓦斯卢伊一个灌肠工的儿子……你大概也会乘第一班火车到那儿去，这是一位副院长需要亲自严肃处理的事件，不是吗？”

“不得不说，你的观点让人感到吃惊，”克列楚口气严厉地插进来说道，“对于一位家长，同时又是教育工作者来说……”

“当然，”克里斯蒂安激动地继续说道，“这很正常……我真弄不明白，你，而且不只是你，你们是喜欢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召集校务委员会，为了不知谁提出的不着边际的闲事，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可一谈到科学，谈到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威信和尊严，你们就没一个人露面了，就会完全忘了自己是什么人，完全忘了自己的职责。为什么你看到我要求经费的申请，一点也不着急呢？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没有象样的仪器，却完全无动于衷呢？我的名字在国内总还算有点担保作用吧？可事情为什么办不到，你连向我解释一下都不肯呢？”

“我以为你已经听说关于建立新研究所的消息了。”克列楚急忙答道，但克里斯蒂安感到，再就这个题目继续讨论下去，对自己简直是个侮辱。于是他又回到安德烈的问题上。

“照你的意思，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现在不喝醉，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象我们这样的年纪吗？”对于安德烈的行为，教授的确也感到意外，感到难过，感到自己有责任。但看到克列楚到这儿来完全是别有用心，于是觉得自

己有义务——如果说不是减轻儿子的罪责的话——不把问题夸大。

“我并不反对喝酒，”克列楚说道，“但现在的问题是酗酒闹事。他辱骂学生会干部，见到谁就骂谁，所以事情就不那么简单，而且他还依仗着你……未来的医学院院长的势力，威胁别人。你这样为他辩护，看来，为了他，你是准备不惜冒一切危险……”

“不是一切，”克里斯蒂安反驳道，“事实真相和尊严，譬如说，我并不准备牺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些以前我都有过例证，当然并不是没付出代价。”在这些问题上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但是我也决不容许我的儿子由于跟他毫无联系的原因，受到比同类情况更严重的处罚。”

“这要取决于你所说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和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克列楚也回敬道，“现在他还没受到处罚，而且也不是我来主持处罚。”

“那为什么你来对我讲这件事呢？为什么把这当做一件大事，而且偏偏是你亲自来告诉我呢？特别是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往……阿纳尼亚，给我们弄两杯咖啡来。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们就应该说个明白……”

其实克里斯蒂安并不想喝咖啡，他见克列楚教授并没有走的意思，怕性情粗鲁的实验员愣头愣脑地冒出几句不得体的话，便打发他去做点事情。阿纳尼亚不大高兴地出去了，克里斯蒂安又继续说下去：

“安德烈从来也没滥用过我现在或者将来的地位，相

反，这是他有可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克里斯蒂安犹豫了一下：本想告诉他事实真相，院长的事自己已经拒绝了，但却没能说出口，这时才感到需要再好好考虑考虑。“再说，”他接下去道，“我们不是在修女学堂……我最不喜欢你这种大惊小怪。难道我们就没喝醉过吗？没恋爱过吗？没象年轻人那样，有过各种各样冒险的经历吗？当然，我也反对酗酒，反对过分的行为。但是，我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情欲，就不许别人谈恋爱，不能因为自己得肝炎，就不许别人喝酒。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样呢？谈恋爱要照章程行事吗？接个吻，喝杯酒，也要请学生会请院长批准吗？你这么喜欢的这个不许，不许，不许，要么会让人根本不理，要么一切机械照搬。对安德烈可能做出的不规矩行为，我是反对的，我要训斥他，尽管我并不了解前由后果。但是我不会忘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醉酒！而且，说到底，即使他对学生会的人说了些什么，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他们不也是学生吗？”克里斯蒂安激动地说个不停，简直想把满肚子话一口气都倒出来。当克列楚刚一张嘴想要打断他的时候，他马上提高了嗓门，打着手势，用命令式的眼光迫使对方又把嘴闭上。“你当我没看到过约内斯库，瓦西利和弗洛列斯库考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就是这么回事，克列楚先生。说老实话，我觉得可怜。是的，我可怜那些满口原则，手指头却从来不动动书本的人。考试我严格要求，他们恨我了吗？好啊，我告诉了他们真实情况，他们生气了吗？妙啊，但是，为什么不公开对我提呢？对于那些开

会、商量、碰头、讨论、谈话、选举、报告、全会、委员会会议、大会等等我们谁也不敢抱怨。说我高傲、脱离群众？我同意。别人看小报的功夫，我却在写书。如果这些聪明人当中的某一个，看明白我的文章，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当然，今天我表现得不礼貌，我向你道歉。我跟你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但是，你瞧，事情不能不让人恼火。安德烈根本没办法利用我的地位威胁任何人，因为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研究人员，这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国内，尽管我可以向你发誓，为这件事我比他自己还要紧张。笔试，这你了解，我的名字丝毫帮不了他的忙。现在，他有自己的事，有自己合乎人道的要求，这完全自然。不，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绝不会利用我的。”连他自己也没注意到，他的声调已不是那样平静、有节制，也失去了略带讥讽的特点。他站起身，离开椅子踱着方步，围着房间转了一圈，最后，在狗那儿停了下来，就仿佛在等待这些动物的谅解或者赞许。刚才是怎么回事？火气已经消下去了，他觉得有些可笑而且毫无意义。“鬼才能理解我们这儿这些乱糟糟的事，实际就是这样。有时为了一支试管，你也得尽力去争，更不用说别的……”

克列楚教授困惑不解地坐在床边；他还从来没见过克里斯蒂安这种样子。爱说风凉话，不合群，原来一直是这样。但是离现在这种无缘无故地激动，发神经，还远远有一段距离。事实上，克列楚倒希望这样，他要了解克里斯

蒂安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关于他儿子的事，这很清楚，应该告诉他。“归根到底，”克列楚教授想道，“事情全都弄拧了。我对他说这个，而他，象每次一样，又扯到他的科学研究上。不管怎样，作为副院长，我应该追究他的责任，而不是倒过来。昨天晚上他弄得不痛快，这关我什么事呢？”克列楚没有料到，克里斯蒂安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他已经找不到别的话：

“总之，不是光靠我们两个来解决一切问题。”

他记起早上召开的一次科学小组会上，碰到考德里亚努的事。

“听说，”考德里亚努悄悄对他说道，“我们要有个新主人了，这人对你可没什么好印象。又把这些学者们弄到领导岗位上，让这种人搞组织领导工作，没个搞好……”

“哪个学者？”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哪个，克里斯蒂安呗！昨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了，只是顺脚去看看。他可有一大套计划。”

“没有的事，我不信你能把他弄出窝。”

“你再问问别人就知道了，是他自己要钻出来。”

考德里亚努不愿再进一步谈细节，而瓦西利乌和奥泰斯库却表现得十分大方。

“克里斯蒂安嘛，”图比扯着沙哑的嗓音说道，“人倒不错，只不过有点头脑发昏。他把我科学院的位置抢了去还嫌不够，现在又要抢在我前边做学院院长！可气的是没人出来说公道话！不过，我已经把他打垮了，亲爱的，打

垮了！”

瓦西利乌倒更实际一些：

“这是故作姿态。看来他还在等人们到他那儿再三恳请。其实即使不请，他早巴不得愿意爬到最顶上去呢。可惜跟我们要求的差距太大。他正好跟郭日一多尔奈什蒂相反：连喘口气的工夫都不会给你留。照我看，也太贪心不足了。他现在的地位还不够高吗？我知道，老早以前的事他还记着我的仇。这个人，谁也看不上。”

克列楚客观地分析了一下全部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当选的可能比克里斯蒂安来得更小。因为克里斯蒂安不但有一大串头衔，而且在年轻教师当中也颇有影响。但他还是深信自己比克里斯蒂安强，更适合于做学院的领导，于是决定探明克里斯蒂安的真意。对这两个人的意见，他并不那么相信：瓦西利乌，发泄私愤，奥泰斯库，狂妄自大。考德里亚努是这些人当中最讲实际的一个，但奇怪的是却在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而波赞是同情克里斯蒂安的，他倒有可能出来讲话。凑巧安德烈的事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借口，但无论如何他也要到这儿来一趟。

这时，实验员端着咖啡来了，克里斯蒂安教授又回到了现实中。他收起身旁的白罩衫，从一个柜子里拿出来几块餐巾，请克列楚一起喝咖啡。对自己发泄的那一通，他有些后悔。“他可能会以为由于昨天晚上的事我才这样激动，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好象我们同时都得了病，症状完全一样。大家都忘记了自身，一些人躲着另

外一些人，互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谁也不了解谁的心思。”他作出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说道：

“这么说，你是想告诉我，我的儿子违犯了纪律，是吗？你的结论是什么呢？或者，如果说这件事只是你想告诉我另外一件事的借口，那么，倒不妨好好谈一谈，我还真想听……”

克列楚简直不敢相信，克里斯蒂安怎么能只在几秒钟的工夫，便由突如其来的发火，变得这样心平气和。“切身利益，”他想道，“开始是威胁，现在又装出这副样子。谁都会来这一套，放甜了嗓音，等着最后一着棋。好啊，来吧……”但一时间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刚平下气来，别再把他惹火；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索性敞开来好好谈一谈，也好进一步把情况探察明白，“尽管他发火的时候比冷静的时候，你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

“我的来意，进门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表明了。不管我们多么讲求原则，多么尊重事实，反正一个同事的儿子，做出了违犯纪律的行为，我只不过是想来告诉你这个情况。也许学生会的这些人，按照他们的规定，他们的看法，并不想就此罢休……”

“那好极了。这是他们的事，”克里斯蒂安毫不在意地说道，“安德烈会象别人一样地得到教训。他自己应该亲自了解一下人们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光听我说。让人不高兴的事，我尽量不让他看见，或者想办法找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不愿意分散他读书的注意力。我是照摩萨① 命

书去做的，我的事，我自己的烦恼，我从来没对他讲过，他妈妈也是这样……现在，当他自己发现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会谴责我，或者认为我已经老朽无用，除了实验室，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全是假的，”克列楚心里想，“几分钟以前，他把整个世界攻击得一塌糊涂，而现在，却装出一副殉难者的面孔，好象他自身就是原则，就是道德。这么说，他还是要出山的……”

克里斯蒂安在等着克列楚答话，他瑟瑟索索地想摸支烟抽，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轻轻舒了一口气，几乎对谈话不再感兴趣。

“好极了，”克列楚说道，“但是，我不明白，刚才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也许认为我不是以同事的身份，而是以官方的身份来的，所以才象对待不称职的实验员那样，狠狠教训了我一通……”

“我已经向你道了歉，”克里斯蒂安教授立即反驳道，“今天这一天不怎么顺当……你刚进来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职务，而职务对我来说，从来就什么也不代表……”

“这倒是个新鲜观点，”克列楚也马上回敬道，“如果我不知道你一心一意想当院长，还真的会相信你的话呢……你不承认或者不尊重任何职务，那是在你还没得到它的时候，就象任何一个大喊大叫、赌咒发誓决不改变观点

---

① 古犹太大帝。

的人一样。一旦你真的当了院长,会立刻把我们变成奴隶。这种立场很成问题。你是想通过这一着，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

“即使我当了院长，或者随你怎么说，当了什么,”克里斯蒂安说道，“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你很难理解……”

“就算我理解不了,”克列楚说道，“但是，说真话，我还是一片好意。”

“喏，为了不让你抱怨自己白跑了一趟,”克里斯蒂安加重语气道,“我还是尽力给你解释一下。瞧，你认为人们对你不公平，人们狡猾，心眼坏，公理不过是一句空话，已经不存在什么尊严，什么公正，也许我是想检验一下在我们纯洁的科学界，能不能秉公顺理等等。癌症是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开始的。当然，我也了解全部的反定理：每个想飞黄腾达的人都会拿公理当做遮盖的外衣；他，……只有他自己……如果不可能，就是说，必须到别的方面寻找原因,找别的祸根……我不了解癌症的病因,但治愈的比例却很高。其他的病,知道病因,但治愈的比例数却相当低。”

“教授先生,”克列楚利用克里斯蒂安喘气的间歇说道，“我发现您倒是一位高明的演说家。大家都知道,通向地狱的路，是用漂亮的言词、美好的用意铺成的。没有任何最见不得人的愿望,不可以解释得最高尚,最纯洁……”

“完全同意。”克里斯蒂安说罢，好象又觉得不该打断对方，因而立即做出一种凝神恭听的姿态。

“事情就是这样，”克列楚继续说下去，仿佛根本没听见克里斯蒂安说过什么。“从本质上讲，您的愿望已经公开表示出来。也就是说，您不承认您的儿子有任何过错……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准备候选条件，都有这个权利。但是，要把您推上马的这伙人，想方设法，人为地制造一些有利条件，这我不能同意……”

“也可以这样说，”克里斯蒂安教授讥讽地笑了笑。“按照狗的观点来看，最高级的生物应该是狗，一切超越它能理解的东西都不存在，或者都没什么重要性。这么说吧，假如我对你说：你说得都对。那么接下去呢？”问话一下子卡住，悬在了半空。克列楚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生硬的回答。

“一种会遭到同样报应的傲慢。”克列楚心里想。“有些人认为他狡猾，难斗，我倒并不相信这一点。”

“刚才我还以为我们能够谈得通，”克里斯蒂安想道，“能够开诚布公地、坦率地谈一谈。这一切实在是太渺小，太见不得人！除了我们自己，别的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无所谓。”

“您想说什么？”克列楚问道，就象几秒钟之前被问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只不过连克里斯蒂安也忘记了刚才自己提出的问题。

“没什么。”克里斯蒂安从容地答道。“作为家长，我反对，但作为教授，我要求给他应有的处罚，不必考虑情面。还是作为教授，我也有权当候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争取当，或者一旦决定当，就一定能够当上……不过我

完全可以放弃候选人，我并不想在这方面作交易，如果你是为这个来的话。”

“在研究你儿子情况的时候，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们是同事。我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因此我想还是事先来跟你商量一下，统一一下看法，这样更好一些。我到这儿来了，并不感到后悔，”克列楚教授加重语气说，“至于昨天晚上的秘密活动——这是你们的事。我发现了，我知道了，还要看一看。但是有一件事，在我走以前还要说明白：你不要以为在我眼里，你自己的形象也跟在一些同事们眼里一样。在你表面的气派、庄重等等之下，隐藏着的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你玩弄各种各样的原则和道德标准，不过是为了向上爬。但是，不管你爬得多高，你的本质，我经过长期耐心的观察，是看透了的，改变不了的。你不清不白的历史，男女关系上的不严肃，绝不是偶然的。因此，作为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我也要问：你的威信，如果说不是靠欺骗群众，那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事实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呢？你在全力以赴地搞什么有关癌症的研究，可结果怎么样呢？弄得人人都在谈论它，而实际上，却什么也看不到。请原谅，如果不是你这样毫无理由地藐视我，我也不会对你说这些。当然，事实最有说服力。我并不想有意侮辱你，但不是我先开的头。象我这样的岁数，用不着别人来教训！”克列楚显得有些激动，当他摸索着找手帕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降低了调门，背对着克里斯蒂安，急匆匆地穿衣服：现在把自己

的想法都端了出来，时间、地点都没选对，等于白白浪费了子弹。而克里斯蒂安见他迫不及待的样子，决定再留他一会儿。这倒不是想再了解一些关于自己的新闻，而纯粹是为了考验一下对方的耐性和意志，拿他开一下心。他特别觉得，尽管这一天开始得不错，却将不可挽回地失掉。

“干吗这样着急?”他显得特别平静地说道。克列楚怔了一下，下意识地把围巾又挂到衣架钩上，就象听到一声让他脱掉衣服的命令。“你可没能把我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生气。只有那些我敬重和佩服的人才有资格侮辱我。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我们整个的误会，你的怨气或者可能还有什么愿望。我们连最难听的话都说了，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今天这一天，真是不好过。要不是我们象波洛洛部族那样，用互相啐吐沫的方式消遣取乐，我想真不知道我会出什么错。好吧，再喝杯咖啡，或者，甚至喝杯酒……”

克列楚教授发火了：“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一起谈的，你等着吧!”尽管他摆出架势，但说出的话却并没有多少威胁的味道，只不过象伸出的一只无形的手，把克里斯蒂安按住，他自己好抽身溜掉。他已经觉出，这儿不是久留之地。

“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句话?”克里斯蒂安问道，“是刚不久听到的，所以才记不起来……”

如果看到他们两个面对面，这样僵持地对视着，为说出来的难听话而感到难堪，考德里亚努一定会无比高兴：

“点一点老头子傲气的这把火，”他曾有过这样的打算。而现在，烧起来的火比他预想的还要凶。克列楚的样子，尽管象一尊雕琢粗糙的石像，但看来却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而不管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在克列楚面前，考德里亚努自认为掩盖得十分巧妙：言谈话语之中有意露出一两句。他是个好奇心强的人，到克里斯蒂安那儿去不过是想探探情况；多尔奈什蒂告诉过他，三人名单上有克里斯蒂安，但人们却都传说他快要死了。他只是想看看事实究竟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请他对了解到的情况保守秘密。克列楚作为副院长，应该看到过这个名单，或者至少听说过……再说，作为选举人，他也应该知道该投谁的票，特别这是选学院决定一切的人物。这两个人如果全力竞争，就会两败俱伤，那么，把希望押在自己身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现在，他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激怒克列楚，而在于把这只“最后的野物”——克里斯蒂安教授引出窝。

“有一种传染性的癌，”克里斯蒂安继续说道，“最危险，几千年前就知道了病因。而另外一种没有传染性，只破坏人体的某个部分，但对病因还不了解。对后一种也好，前一种也好，我们化这么大力气跟它斗，结果很可能白费劲，当然是暂时白费劲……”他更象是在说给自己听，就仿佛克列楚根本没在他跟前一样。而克列楚真想立刻走出去，却又不愿给对方留下一个败阵的印象；他感到做一种姿态还是十分必要，说明他并不是来讨价还价的。他开始时的诚恳态度，更使他觉得自己加倍受到了羞辱。

“总之，教授先生，我应该感激你，你对促使我作出某些重要决定还是很有贡献的。”克里斯蒂安这样说道，尽管实际上他什么决定也没作出。

“那我感到很高兴，”克列楚冷冷地回敬道，“我也正在考虑自己的最后决定。”

“要是你想把我儿子开除，不用有什么顾虑，尽管这样做好了。你甚至还可以利用我的历史问题，我给你开一张名单，他们准能帮你的忙。去尽你的职责吧！”

“这用不着你来求我，”克列楚说道，“司法部门会做出相应的处理。我本想通通消息，避免一下不值得的事情。我不想同谁争，同谁斗，也不贪图任何人的位置。但是，我有权有自己的愿望，有权进行竞争。每个人都有权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天才，比别人更强。再见！”

克里斯蒂安教授关上了房门，他迈着迟迟疑疑的小步走向扶手椅。“瞧，世界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他感叹了一声，“白的同时又可以显得无比地黑，就看是谁来看。”当他抓住椅子扶手，感到自身有依靠时，才发觉应该立即控制住这股危险的感情。他对听到的一切，说过的一切，感到厌恶，他仿佛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听凭感情任意驰骋，惯常诙谐幽默的语言，也弄得不知去向。他从听到建立研究所的一刹那，感情便开始控制不住了。他早就梦想在一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实验室工作；他尽自己的可能，已经弄到了一些东西，屋子里也堆放了不少仪器，邻居们有些什么他也知道，总之，能够对付得过去。他生气的并不是

别的人将要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而是将要任命一个新所长。他真不敢相信，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克列楚说的，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当了院长，他会任命谁。可当时他究竟怎么说的，已经记不真切。不管怎样，这件事没有人来问过他。多尔奈什蒂还是什么人提出的这个建议，却不来征求他的意见，简直不可理解。“为什么？在他们眼里，我连这点地位都没有了吗？”他不由自主地记起，随军神父有一次谈到俘虏的事，曾对他说过，人类堕落到最后一步，是把自己的同类看成可以吞吃的对象。这一步的前一个阶段，会是这样的情形：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把别人手里的面包夺过来。“克列楚是属于哪个阶段呢？”他心里自问。“无论如何，神父说的还是太简单，按照人的下意识表现，还可以划出许多阶段。”他脑子里一出现研究所，克列楚和多尔奈什蒂如同两只猛禽一般，就立刻在他头上盘旋。“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不用两只拳头捶自己的胸脯，就说明我不存在吗？”他没有继续想下去，因为无意中忽然喊出了安德烈的名字。“我的上帝，怎么会把他给忘了！”他深感内疚地想道，“也许自从跟薇拉……他的确难于接受……但是我也有活下去，以某种方式安排生活的权利，也要自己寻求安慰。不管多还是少，我也有自己的生理要求，精神需要。特别是为了他，我还要拚命挣扎，就象我已经几次做过的那样。”他停了一下，极力回想他们最后的几次会面：“可能考德里亚努……但同他又有什么瓜葛呢？为什么又牵扯到同我的关系呢？我不相信他会做出

这样的事，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脑子里又浮现出考德里亚努的汽车停在他们背后时，安德烈不自然的动作和冷笑。“安德烈还没学会剥去外壳看到活的内核。也可能科学使他习惯于对一切都打一个问号。我并不责怪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天真幼稚、充满幻想和幻想破灭的时期。看来要想认真严肃地理解和看待世界，每一代都注定要经过一次滑铁卢战役①。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些人会胆怯，惊慌失措，企图逃脱。因为多少次你会被劳累、疲惫、怯懦所困扰，因而不由得自问：究竟有什么用呢？即使你胜利了，又会怎么样呢？何况你明明知道有那么多东西还不了解，同类还是处在十分原始的阶段！”他觉得安德烈似乎越来越陌生，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从过去的印象中，从丝苔拉曾不断夸赞他的长进中，重新拼合起儿子的形象。但在此之后，一切又变得模糊不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示他，怎样才能摆脱开这使人困惑的早晨。

“是爱情招致的烦恼，抑或仅仅是出于好奇？”如果仅只是这两种可能，倒看不出有什么严重性。但除了“不可能只是这些”的怀疑和极力试图保护儿子的矛盾心情之外，无法使他得出任何结论。他疲倦的脑子悠悠忽忽，安德烈一会儿出现，忽地跳在眼前，一会儿又消失，被一句分辨不清的什么话赶进阴影。他万万没有再想到雷德曼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早已结束了的一章。他绝没料到安德烈去找

① 指一八一五年英普联军大败拿破仑军队的战役。

雷德曼，而且雷德曼那冗长的自白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意想不到的反响。

“我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沉吟着，思路又回到克列楚身上。“幸好发生在现在，我还能够帮得上他的忙。我要训练他搞研究，一点一滴地把一些新的成就，一切我将要发现或者将要做的东西传授给他，只要我还有时间。”无意识地压抑了这么久的决定，突然如此明确地爆发了出来。他感到满足，仿佛一下子卸掉了悔恨过失的重负，也就是说，理智不再要求他自责，尽管羞愧和恼恨的阴影仍然在缠绕着他。“是不是只是对我才表现得这个样子，那么……也可能我什么地方确实错了。但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他无法在实验室继续呆下去，这不只是因为他想看看安德烈，想同安德烈谈一谈，还因为他感到仿佛已经到了一个重大发现的前夕，正象经过了上百次的试验，终于离析出了那种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寄予希望的物质一样。

他在狭窄的大街上，长时间地踱着步子。街道刚刚铺过沥青，两旁人行道的高台几乎到了一些低矮的旧房子的窗口。他象一个不在乎天气好坏的旅游者，专心地望着那些高大的教堂。等走到他自己那条大街的尽头，他仿佛觉得不应该再继续往前走，应该停下了：可现在，安德烈处在比任何时候更容易被激怒的情况下，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这种对他真诚帮助的愿望，他不会理解。“而且根本不是关系到他的事。”他一边想着，一边竖起了大衣领，急匆匆地继续往前走，甚至没勇气抬头看看两边的房子。走到“剪

裁师箭楼”前，他觉得右腿一阵痛疼。到新教教堂的这几步路，只好身体靠着墙，慢慢往前挪动。教堂前面已经发绿的圣乔治像，孤零零地骑在马上，做着几百年来毫无变化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瞪着下面的三头凶龙。雨水顺着他手里尖尖的长矛，流到口渴难忍的凶龙嘴里。身穿铠甲的圣乔治神像，仿佛在瑟缩发抖，眼神里透出一股恻隐之意：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这样友好相处，如今，看到自己做出这种生死搏斗的架势，反而觉得好笑。

十一

本年四月二日，星期三

昨天薇拉·班奈德斯库同志到实验室来找教授，他们两个，还有那位野蛮的阿纳尼亚同志，一起开车进城去了。过了大约三个小时，他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而实验员甚至喝醉了，弄得整个楼底层都是酒味，正象一位民警同志开玩笑说的那样，喝得连酒精里都有血，而不是相反。在走廊上他见我手里拿着一只消毒锅，便没头没脑地伸出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讪讪地引用萨乌大夫同志的一句问话：“梵蒂冈电台又有什么新闻？现在你又在给谁的汤里加调料呢？”因为克里斯蒂安同志也在场，我回答他说，谁的汤什么滋味只有自己知道。而教授不但不批评他，反而说我回答得幽默，对我表示祝贺，然后笑了笑走了。这个骗子手阿纳尼亚，对我做了个手势，把大拇指别

到食指和中指中间晃了晃。这是过去贫民窟里二流子才做的动作。气得我对他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等着瞧吧，你这个放羊的。"而他气呼呼地冲着我过来了，要不是正好普洛丹大夫同志从大厅里出来，照他的性子，一定会对我要野蛮。我对这位医生解释他想干什么，医生鼓励我要表现出自己的斗争性，如果不敢揍他，那就到开会的时候给他提批评意见。薇拉·班奈德斯库同志在教授那儿呆了很长时间，显然在那儿呆得很高兴，因为老远就能听见她放声大笑，就象一匹母马在叫唤。等我靠近他们门口的时候，又撞上了这位实验员同志。他抓住我的手，把我一把拽进了他的房间。"喂，你这个专管跟踪盯梢的家伙，"他对我说，"这下可落到我的手里了。这次要不就给我唱支歌，要不就去见你妈的鬼！"贴近了他，我闻到一股泔水桶般的味道。我对他说："先去醒醒酒吧，要不然，走路也要掉进沟里去的！"他走过来，用手指捏住了我的鼻子。我推开他，问他这算什么态度，并且警告他，我非教训他一下不可，我要把他送进法院。他却一字一板地回答说："你可以让教授同志当证人，为了叫他看到点什么好去作证，我先给你脸上涂点鞋油，涂成花格。最好咱们先别说这个，趁我还没生气，你还是先唱一支咱们的民歌吧，拣最好听的。如果你的嗓子不让我喜欢，当心我把你裤裆里那玩艺儿割掉。""我说阿纳尼亚，"我回答他说，"我看倒是你要当心点。我是从来不说空话的，我靠的是材料，我有人们的书面材料作根据。我知道，你过去是富农，你父母是农民党分

子，你父亲曾经被控告帮助过山里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我知道，尽管那时候证据还不那么完全充分，但是，如果需要的话，现在仍然可以重新收集。别忘了，你还有两个孩子上大学，你也得为他们的前途考虑考虑。”我想吓唬吓唬他，好不让他再缠着我。“做过的坏事忘得了，可饶不了。你要明白现在的风是往哪边刮，现在喝汤应该用哪把勺子。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当心倒霉。你历史上干过这么多坏事，在这儿又表现得横行霸道，还想装成教授的好助手和好朋友！特别是你还有个妹夫，也在往坏里扯你的腿。”他气得脸象紫茄子似地对我嚷道：“我不象你，象只地老鼠到处钻窟窿。我没后台，也没当官的亲戚。但是，我告诉你，看见这种药水了没有？沾上它就会得癌症。我先把你狠狠揍一顿，再给你喷上点这种药水，让你凉快凉快。别怨我事先没对你讲清楚。至于我的父母和孩子，要是你还想活的话，就别再扯他们！”他扭住我的手，打算把那种药水往我头上浇。我费了好大劲才挣脱出来，跑到走廊上。无论如何，可以清楚地看出，不是教授手下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科学研究，这么危险的东西他竟交到这种人手里。象阿纳尼亚这样的，应该送进疯人院，免得给劳动人民患者或者给研究工作带来危害。

薇拉·班奈德斯库同志在教授那儿呆了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教授的儿子回来以后她才走。前边的日记里我曾经写过，教授的儿子喝醉了酒乱来，强奸了一个老头的孙女，还要把可怜的老头杀死。然后，他到了学生会，骂了

瓦西利和弗洛列斯库同志，因为这两个同志曾向他指出，他错了。他用英语说让这两个同志“别瞎汪汪”，这就是说，他不敢用罗马尼亚语讲。而这两位同志还不至于笨得连这句话都听不懂。他们把副院长克列楚同志找来，他对副院长表示，他可以道歉，但副院长并没接受，而是出乎寻常地说要把他开除。安德烈同志说，这样做他很高兴，因为他已经看腻了副院长的脸。克列楚同志去找院长，对院长说，这件事他决不轻易放手。院长同志打算平息下这件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不知道安德烈跟教授同志讲了些什么，他出来的时候，有些垂头丧气。可能他已经发觉自己闯了祸。但我并不相信会是这样，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学院一些头头们的孩子简直有些胡作非为，就象过去的那些公子哥儿，以致引起学院公众舆论的不满。

我在走廊上转了转，从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那儿听说，安德烈同志曾经到教授的朋友雷德曼同志那儿去过。我想我也该去一趟。走在路上，我听到这位大夫同志说：“我跑了整整四天，才找到一块象样的衣料。我的上帝，我们的羊都哪儿去了呢？还是象那些秃顶一样，毛都掉光了？商业局的这些头头，应该让他们去铺马路。还有四十三号的皮鞋，到处都没有，真是见鬼了！亏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鞋厂！”萨乌大夫同志用手拍了一下电话机，打断了他：“住嘴吧老兄，要是让人听见，有你的好看，小心会倒霉。”“那有什么，”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嗓门更高了，

“如果我说的是事实，有什么可怕的？我知道，有些好心人，巴不得在我身上找点岔子呢！”这样的同志抱怨买不到料子并不奇怪，因为他从病人那里接受了钱，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不然，只靠他自己的工资，商店里现有的这些东西足够他买的了。我以前就断言过，这位同志受克里斯蒂安同志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克里斯蒂安做出的榜样，足可以助长他这种破坏性的意识。请听他继续说下去的话："当个牧人倒挺美！我早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彻底休息休息。真的，要是没有这些大孩子，要是我还没到现在这个岁数，我真想租上一群羊，再也不回这倒霉的城市。羊不会打扰你，只管低着头吃自己的草。而且从此可以摆脱开那些住户委员会的楼长啊，消防负责人啊等等。闷了就拿起根风笛，吹上一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多依娜曲子。空气没有污染，生活有益健康，还有别的好多好处。过上两年，再返老还童，那就干什么也不象现在这样力不从心了。”当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杜米特列斯库大夫问我道："怎么样朋友？想女人了吧！目标是谁呀？"我笑了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然后，继续往前走。同雷德曼，没想到谈起来这么顺利。他自己呆在一个房间，有点腻烦。“我是教授的保护层？”当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有些惊奇，“就某种意义讲，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关系不同寻常。这用不着讨论，没有人会相信。让尼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什么他都不原谅，除了自己的感情别的都不顾。但是我仍然敬重他，喜欢他。他收我住院的时候，给

我的难堪和侮辱，任何人都受不了。将近二十年，我一直想给他解释，但他拒绝听。当然，已经埋了的死尸用不着再扒出来。但是，即使是一桩罪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总该赦免了吧。不得已我才求他帮忙，另外我寻思在这儿我们也许能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但是他完全拒绝谈，根本不考虑。当然，他给我治得很认真，照顾得很周到，这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许最后我们能够谈成，但是他对我这样的侮辱，能让人原谅吗？作为医生，他尽到了责任，但是作为朋友，他对我的轻蔑、侮辱，或者随你怎么说，都超出了任何限度。”“可你跟他有过什么呢？”我问道，“反正我认为他是个两面派，是个隐藏着真相的坏人。附属医院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他对谁都不留情面，只要他认为必要，甚至能从别人的尸首上踩过去。走运的只不过是他有点名气，人们都知道他，其实附属医院比他好的外科大夫还有不少。换了我，象您这种情况，我是不会饶过他的。我要写揭发材料，交给有关部门。我敢肯定，他是我们凶恶的敌人。”“他跟你有过什么事吗？”雷德曼高兴地问我。“倒不一定非得跟我有过什么。从别人的例子当中，就应该有所提防。而且正因为在我身上没有过什么，我才更能够客观地看待，客观地分析。我敢说，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够上恶贯满盈了。”“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他插嘴道。“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我对他说，“如果需要，你能够写份材料吗？只要把你怎么认为的说出来就够了！”“过两天再谈吧，”他说道，“我跟你

互相之间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我自己也要考虑考虑，看看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原则上讲，我是不会反对的。”看来，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从一个食品店给他买了一些香烟、甜食、烤肉排，一下子化了我不少钱。但我认为这完全划得来。不过我担心他会发现我不是医生，只不过是个实验员。但是我必须赢得他的信任，这样，教授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而且能够得到有利的解决。这样，才能在我们医院建立起平等一致的关系，才能把伪装巧妙的反动分子当中最高傲的代表人物消除掉。

晚上，我经过薇拉·班奈德斯库同志那儿，看看她是不是在家，结果不在。我敢肯定，她又在欺骗教授，因为跟他相比，她实在太年轻了。只不过她确实有些手腕，善于装相，所以直到现在还没能搞清，晚上她究竟在谁那里过夜，当然这倒没什么重要。只是我还拿不准，现在把裤衩、内衣这些东西摆出来，是不是时机？还是应该再等一等？我认为关于安德烈同志那件事，传言还会继续扩大。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再迅速地插进来。当然，教授不会承认，他儿子也不会。但是一旦我举出人证、物证，问题就会解决。不过，受害姑娘的这位“家长”是个骗子，他一定会趁机讹诈更多的钱，所以还得考虑另外的路。

今天教授给学生讲了四节课，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出于讨好奉迎，差不多附属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还有外系的一些学生都去了。克里斯蒂安教授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大谈特谈跟外科学毫无联系的内容，从而招引来好

多人张着大嘴听他讲。他俨然装出一副大师的样子。可惜我没能去听，因为早上他在走廊上看到我的时候对我说："喂，卡纳里斯，你到这儿来一下。"我没弄懂他为什么这样叫我，也不知道谁叫这个名字，或者是把我同另外一个人弄混了。但是就我所知，他对谁都随便起个名字。他管院长叫"卡若克"①，好象院长秃了顶是由于自己的过错。他管克列楚同志叫弗瑞·弗林斯顿②，管博姆珐护士叫"垫子"。不管怎样，他交给我一些病人，让我带他们到牙科医院。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人们都睡上午觉了。他大概对学生们是这样讲的："胃切除手术是在我的课上讲，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因此，做为人，从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觉得需要跟你们讲一讲人道，勇敢，尊严，真理。这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头脑清醒的人数有多少，我用各种科学数据材料禁锢住你们，这样做是做错了。"他说，他并不动员他们听课，那些来听胃切除手术的人，不愿听下去，完全可以离开。第一次休息之后，人不但没减少，反而来得更多了，有的甚至坐在台阶上听。不少人还做了记录，象杜米特列斯库，萨乌，普洛丹，约内斯库，拉尔卡，苏阿列，还有一些学生。这样看来还是有条件对他的话进行分析。我也听到一些反应，苏阿列大夫同志说道："上帝保佑，简直完全是一份遗嘱。他一定是有了什么事，不然我解释不通为什么这儿富有戏剧性。是不是他感

① 电视系列片主角，秃顶侦探。

② 动画系列片主角，形象滑稽。

到自己快要完了?”但我并不相信会这样。俗话说，恶人反交好运，要说死，大家谁也脱不掉。但我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所有的教授们都能说会道，在他之前，有名的人物也都出在这个系。约尔卡大夫同志说道：“我怕别真的象谣传的那样是癌。如果真的轮到他头上，可太不公平了……”普洛丹大夫同志宣称：“情况还不那么明朗。这么长时间埋着头不出来，现在，突然间又勇气十足地重新返回了舞台。看起来象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反正一切都无所谓了。”乔尔捷斯库大夫同志说：“我们学院哪怕有两个象他这样技术的也好啊!”一些人掬着笑脸围着阿纳尼亚，想打听打听是不是教授的那种抗癌药成功了。一旦发明成功，教授的地位显然更会不同，会变成象教堂里人人供奉的圣像一般。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去找班奈德斯卡，想打听一下教授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怎么了。她却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就是这个样，什么事也没出，也不是病，也不是闯了什么祸。让尼就是这样一个爱激动的人，隔一段时间，就要当众提些问题，发发议论。我已经好久没同他谈了，”班奈德斯卡显然在撒谎，“但是就我知道的，他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也可能说话的语气重了点。”她的解释并没有被接受。大家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他的确是一种病态。照我看，弗洛拉副教授同志倒是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偶然一次我听他在电话上对克列楚教授同志说：“故弄玄虚，假充圣贤。我看他倒挺会做戏。这么多年一直躲着搞研究，

临了，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他那种抗癌药，不过是骗人的招牌，已经没人相信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其实他才累不垮呢，动不动就跟实验员和班奈德斯卡一起喝两杯。现在，拨给他的研究经费绝大部分都削减了，为了继续引人注目，他又装扮成社会文明的卫道士：实际丢掉的，想再通过动动嘴找回来。他那个当过民族农民党议员的岳父，绍依曼斯库律师，总算没在他身上白费工夫，他已经学会怎么才能站住脚跟。”这次，我总算发现我们医院也有一位头脑清醒、在一些无原则、无事实根据的吹捧面前不随波逐流的同志。除了他，要算尼古拉大夫同志，这是我们这股健康力量的核心。我还听说，教授演讲的时候，又用了“笨蛋、傻瓜、没头脑、机器人”等这样一些词。我不禁要问：这指的是谁？他这样讲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到底是哪些人？就我这方面来讲，并不难断言他指的是谁，但我现在暂时还不准备说明，等以后再讲，免得人们以为我说话缺乏根据。

明天，如果真象传言说的那样，他当上学院院长，人们到他那儿去，就会象到马拉维特朝圣一般。但是我知道，那个实验员了解教授的病有多重，到底发明了什么东西，究竟想干什么。但他却象只狗似地乱咬人，什么都不懂，又没脑子，又没心肝，就会给教授舔屁股。因此，我等他一直等到回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可以原谅他，但他对我呲了呲牙说，我原谅不原谅对他来说简直分文不值。我假装并不生气的样子，问他教授是不是病了，要真是

那样，可太遗憾了。他对我说，如果我请他喝杯啤酒，他就告诉我。等我付了啤酒钱，他却问我，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床上去死，这么爱管闲事。我装作生起气来，对他说，我有个生病的亲戚，因此很想知道那种药到底研究出来没有。他听了哈哈大笑，嘴张得几乎都能看见喉咙。喝完我的啤酒，作为还礼，他给我买了一份广播节目报，并且对我说，他可以把电视台巴卡鲁同志的地址告诉我，让我写封信去问一问关于癌症研究的情况。我对他说，他简直是个没有心肝的人。后来他劝我给诺尔·伯纳第[1]写信，只要我同他拉拉手，他就给我出邮票钱，而且他可以代替我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我对他说，我可不同这些反革命分子打交道，我已经看到了报上的消息，他们是些叛逃分子。他象个傻瓜似地笑起来，并且对我说，只能用这一招才能把我甩掉。说着照我背后就是一拳，捶得我直到现在还觉得疼。我把这件事也写在日记上，为的是过后不致忘记。如果他真的在我身上洒了那种药水，让我得病，我非到法院去告他不可。

十二

"希望你在这儿呆得还不错。"教授一边不假思索地说着，一边尽量避开对方的目光。"护理人员对你特殊照顾，

[1] 当时自由欧洲电台负责对罗马尼亚广播的撰稿人。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每天都向我汇报你的病情——这样，我们明天就给你做手术。是个一般性的瘤，甚至助理医生都能做得了。”

雷德曼是教授写得满满的名单上，倒数第二个还没画勾的名字。他极力推迟这次会面，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病人必须准备做手术。抛开个人恩怨，作为自己的职责，他应该认真给病人检查，鼓励病人增强信心，特别是事实上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手术。雷德曼对这次会面显得有些震惊，有些出乎意料，他竟毫无准备。自从来到附属医院之后，对克里斯蒂安的反感——尽管教授给他提供了很多方便——无论怎样企图避开这个词，仍然应该叫做仇恨；是一种含有特殊意味的恨。在这之前，教授一来，后面总是跟着一大串人，看也不看他一眼，摸一摸他的肚子，同杜米特列斯库匆匆交谈几句，然后俨然十分严肃地、有重任在身似地继续往前走，去看别的病人了。进门之前，也照例是这句口头禅：“希望你在这儿呆得不错。”

雷德曼希望的是能有更多一些的表示，一个特别一点的动作，一句笑话，哪怕非职业性的一笑。总之，要能表示出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而不同于医生和普通患者的关系。为了让大家毫不怀疑自己的地位和受到的特殊照顾，他曾对人们说他是“教授的病人”。但奇怪的是，查房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却每次都毫不在意地从他身边径直走过。这件事又使他不得不联想到他们生命交关的时刻所发生的一切，联想到那种顽强表现的高傲。他留意克里斯蒂

安怎样讲话，怎样走路，结论仍然没有改变：对谁都无所谓，简直是一个毫无感情的肉体躯壳，只会机械动作的机器人。每个人无非是他向上爬必须踩过的一道台阶，没有同情，没有例外，任何东西也无法把他对本身的注意力吸引开。

“他还在等待什么呢?”晚上等组里最后一个学生也走了，雷德曼见教授一个人闷声不响地顺着台阶走向实验室，或者穿过大厅到病房的时候，时常这样自问。“我可以大喊一声，我错了，我可以把原因讲清楚：当时我出于无奈，我害怕，我想往上爬，我忌妒他等等。而且那时我还年轻。但跟他不同的是，我有勇气承认这一切。而他呢？难道他一点过错都没有吗？难道时间什么也没证明吗?”哪怕只来看他一次，雷德曼在教授家受到的侮辱和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也算得到了补偿。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而一个怕人的念头越来越占据了脑海:“完全跟我猜想的一样：癌。对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他也会原谅的。他笑了，好象很热情，很友好。命运对我的惩罚，比起他想要做的报复来得更残忍。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任何争论已经结束，他却态度友好地来到我面前，想让我安心地离去，因为最终我还是得到了他圣灵般的宽恕。至少他该有勇气向我说明真相!”

雷德曼在床上给他让出一块地方，以失望夹杂着愤怒的心情，松开腰带露出腹部，准备让他做惯常的诊案。

“如果事情果真象你说的这样，”雷德曼说道，“我想你

是不会来的。有什么必要鼓励一个病情并不重的病人呢？当然，我也愿意这样欺骗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了解你的。”

克里斯蒂安无限怜悯地听着：“他是想让我承认他说得对，而不是反驳他。”犹豫了好久，终于克制不住，还是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目前你只是心理作用，不是病。不管你怎样，你极力想认为自己情况不一般，病情严重，得了癌。但让人高兴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尊重那些对任何事情都提出疑问的人，而且尽可能鼓励这种思考方式。你尽可以不相信我的话，只要你喜欢这样做——我请求你。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你，至于别的，我倒并不认为你这么了解我。我是想说，我也有了一些变化。无论是你还是我，都经过了这么多事。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是这样互相说坏话，那就是说，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并不了解我。”说出最后一句话，克里斯蒂安有些后悔。他并不想解释，什么也不想，也无意再争论下去，他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对病人说一些宽慰的话。不管多么长、多么难听的分辩，他都有义务听下去。他掏出听诊器，以为这样一来也可能有助于使气氛缓和。他认真地、耐心地听了听心脏，然后滔滔不绝地详细讲起病情，告诉他怎样医治。但雷德曼充满不信任的沉默，使他由于找不到纸片，竟在白色的床头柜上一边画图一边继续解释下去。但他的努力毫无用处，病人并没有被说服，只是脸上挂着一丝讥讽的冷笑在听他讲：正是这些过多的细节和克里斯蒂安极力表现出的令人信服

的样子，值得怀疑。

“平常你在病房见到我和今天对待我的态度简直太不一样了。希望你不否认这一点。癌症又让我们互相接近了，当然仍旧是形式上的接近。”

“癌症使我们分开了。”教授纠正说。

“癌症，照你看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倒起了个决定性的作用。”雷德曼企图试着说句笑话。

“是啊，可是在病房里，你向我打招呼是以老朋友的身分，而现在你是同你的主管大夫谈话。他就象二十多年来一直做的那样，正在尽自己的义务。”克里斯蒂安说道。雷德曼感到，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一直使他忧心的这段距离。

“为了使我们的谈话看起来有点人情味，你不愿意说出肿瘤的具体名称。”

“继续说下去。”教授鼓励道。

“我本想向你道歉，”雷德曼极力抑制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可以丢掉一件思虑多日的心事，搬开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是理智而不是感情促使他这样做；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再一次受到了屈辱，想说的话哽在喉头，而后，即使突然爆发出来，对方也根本毫不介意。还有，同安德烈的谈话使他更加确信，教授来得太迟了，现在已经看不出有这个需要，自己已经失去耐性，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等下去。“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继续说道，“我更加确信，我是错了。有时候这种沉重的负担甚至会把你压垮。”

“但是你还是承受了它，在这方面你倒不必担心。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自己错了？”看到雷德曼的样子，克里斯蒂安越发感到有些伤心：他身体象是大大萎缩了，变得干枯、瘦小，毫无生气。如果不是以前就认识他的话，克里斯蒂安甚至可以发誓，这简直象一棵无根的植物，只靠几条触须攀附在什么东西上赖以生存，绝不曾有什么思想在脑子里活动过。“可怜，”教授觉得无法摆脱这种形象，“简直是个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人。也许在正常的条件下还可以慢慢恢复，而现在，内心已经干瘪到没有一丝活力。他原先也并不强壮有力，十分遗憾……不管感情多么强烈，穷困潦倒、担惊受怕也足以使它慢慢减弱，使它残缺不全，使它不能给思想留下任何余地。爱情，友谊，会一步步消失，言词话语，会失去任何意义。待等夜幕降临，一个完好的人便仅仅剩下伸长了的颈项，紧瞪着的双眼以及对于虚度了一生的回忆；于是挣扎溶化在屈辱和丧失个性之中，一切都让位于对任何事情的毫不介意。”接下去教授说道：“但有一点我可以自慰：并不是我给你背上加了这样沉重的负担，并不是因为你感到必须向我做的道歉改变了你的生活道路。不管怎样，我早就原谅了你，只不过希望你能够理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两个就彻底地分开了。并不是因为我对你不可能再信任，这种信任……怎么说呢……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朋友，而且不可能再有朋友，不然就是撒谎。对我来说还剩下的这几年——更正确一些，应该说仅有的这点时间——我都用来作研究了：

在这个有限的天地里，四周包围着你的只有一个敌人：未知的事物。”

“嗳，不，我并没指望我们再重归旧好，跟我相比，你是个太了不起的人物。”雷德曼的声音里充满了真正的恼怒；不管怎样想避开，思想仍然又回到了这样一点上：这个人怎么这样会赶潮流？为什么？他时常回忆起这个人的本领，在克里斯蒂安面前，他简直象一个全身摊开，等待着接受肢解的人。他记起了自己的一切失败：克里斯蒂安雄心勃勃，而且往往取得成功。而他自己……“我落魄到现在的地步，并不是由于你的原因。如果我分析得不错的话，是胆怯和轻信毁了我自己……”

“也许是因为你没能正确地估价自己的力量，特别是你没有耐性，再加上你把希望和要求摆错了方向：你梦想的是职位而不是知识，对权力的欲望，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想尽快地爬上去，而且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是通常无法偿付的代价：‘我要不择手段爬上去，为的是能够做更多的好事。’但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你永远不会爬得多么高。还有：做坏事的习惯——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对其他人的不管不顾——逐渐变成你的一种乐趣。但你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刻，悔恨和失望的时刻，意识到惩罚正在等待着你，或者你感到了它就在你头上飘游。你不顾一切，变本加厉地做坏事，为的是尽快达到结局，好一切再从头开始……”

雷德曼对如下事实内心重又感到一阵痛楚：在这场为时已久、心照不宣的竞赛中，尽管开始得不错，但现在面

对着对手，自己却显得微不足道，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每一着总是输掉。自从克里斯蒂安从前线回来之后，他自己没有一次——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超出过对方。对于雷德曼来说，生活就是积聚：头衔，金钱，物质，所有一切能保证地位的东西，所有一切能使自己变得强有力的东西。当然，当克里斯蒂安向他吐露了真情，公开向他说明内心的疑团，内心的愿望，甚至包括一些最秘密的细节时，他无法怀疑这种友情，无法再把自己看成从属。但随之他内心的不满也逐渐增长，以致此时此刻他不得不断言，他们之间的距离简直是不可弥合的。现在，他看到克里斯蒂安向他弯下腰，那样自信，象是主宰着他自己无法据有的东西，特别是从现在起，掌握着他生死问题的真相，不由得脑子里把他们之间历来的关系构成了一幅系统的图形。雷德曼暗想，如果为了克里斯蒂安的欲望，为了此人那种可恶的不可一世，自己还要付出代价的话，给他一点难堪，也并非不值得。可惜在动手术之前向他提起这些事，并不是合适的时机。这次唱主角的仍然是面带宽恕表情向他俯身的这个人。但已经开始的谈说还应当继续下去：他们重新相遇，就算是由于病的缘故，但对话，即使有可能出院，也不应因此而结束。“反正我已经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不愿意把我当朋友，我们总归也会再见面的……”他心里这样想。

“既然经过了道歉和原谅，希望这种原谅是真诚的，那么，还有可能继续谈下去。”雷德曼总结似地说。他顿时

感到轻松了一些，尽管承认过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经验迫使他放弃了具有信念的习惯，他一直是这样想，一旦表示出与对话人不同的一种意见，就会承受不知道怎样的后果。因此，不管什么环境，他都习惯于注意用词的含义，声调的高低，就象是时刻提防着对方的猛然一击。而怯懦正是最合乎逻辑的一种武器。那时还不同于现在，如今，他按照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规律过活，真是难于忍受。"我们的条件并不是平等的，"雷德曼郁郁地想道，"我躺在这儿受折磨，而他——自由自在、从容不迫地驾驭着自身的一切。只有当他再落得跟我同等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找到共同语言。"

"那么，"教授犹豫了半天终于说道，"怎么会单单你知道了布迪勒到我那儿去过，而且随后别人也都知道了？必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使得你去告我的密。那么，你是自愿去的还是被迫去的呢？也许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合法的。我见到过一些孩子告发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是正直的、不同流合污的表现。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法律看得无比神圣，在它面前可以割除一切个人感情，不惜抛亲弃友、妻离子散，也始终恪守信条。他们把忠信放在感情之上。我想知道，如果你还记得起来的话，当时你都想了些什么。我无法解释你的情况，那时你是怎么认为的？我，因为现在我们的谈话用不着再有什么避讳，我可以向你保证，在那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布迪勒，也没有任何人把他介绍给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需

要救护的病人。我根本没考虑到他怎么会受了枪伤。战争结束以后，到处都有枪支弹药，这你也知道。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样的情况我给别的人也治过……有些人用从前线带回来的枪非法狩猎，甚至连小孩子也玩这些东西。我还听说，有一次一个被惹恼了的人，竟往邻居的院子里丢了几颗手榴弹。他们的那些事情，我并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病人的伤。在到捷克之前，我听说的，见到的，多得很。有的人忘记交出武器，这是另有专人去管的事。但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并不是一定要你向我道歉，来讨我的高兴，同时，把一切都归咎于那时的年代，我认为也并不正确。有些人，即使正在献身于最崇高的思想，却不愿放弃自己小小的野心，不愿放弃隐藏着的仇恨和敌意，正象有些低级的小生物，寻找一切机会来发泄自己的本能一样。因此，在归罪于别人之前，应该先看一看我们自己。我要求你说明真相，是想要了解我自己的缺陷，是想要知道在别人眼里我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关于作为党员应该怎么做，我有过错误的想法。那时候，我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你上过好学校，受过精心的培养和教育。你有教养，有文化，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做到原谅你，尽管从开始的一刹那我就理解了你。”

雷德曼脸色阴沉地听他讲着。“原谅我，说起来够多容易！这就是说，他的严厉已经放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不曾考虑到我的人格，我只不过是个附属物；一个从那时候起就被他掌握了的附属物。”

“而瓦尔拉姆是个怪物，一只野兽，对他，说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的只不过是人的外表。我并没有怨恨他，因为我并没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就象你看一只咬人的狗，或者一头顶人的牛一样。还有……”

“还有什么呢?”雷德曼心里想，“现在，我只配同瓦尔拉姆相比。那时候，谁知道他曾经把我同谁相比呢？但从来绝不会把我同他自己相比！”

“还有，你跟丝荅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克里斯蒂安匆匆地问道，仿佛连他自己也不想听到说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话。问题提得含糊，似乎不应该这样问，但他觉得已经没有能力说得更确切。他感到羞愧，而且害怕由此更加重内心的疑团……他想到，丝荅拉不应该被牵扯进这次谈话，而他自己却偏偏提供了话题……而雷德曼却觉得问题提得自然，他已经预感到必然会是这样；他只好把头转向窗口，避免看到对方的脸，就象是早已准备好答话似的，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然，如果按照道德标准，或者照你的眼光，我的罪过大得不得了。但是，如果客观地评判一下，那时，你的过错至少并不比我小。你把我看成你的附属物，可以随时听从你，随时受你心血来潮的差遣，你想到什么就都原封不动地说给我，你根本不曾考虑我是不是能称得起你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听我讲一讲。你，凭着自己不寻常的精力，在我身上安营扎寨，把我的人格，个性，踏得粉

碎。为什么我没抛开你？可能是由于习惯力量，可能由于你完全把我吸住了。有时我无可奈何地觉察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你的一只卫星，想到这儿，真让人恼火。后来，你有了成就，什么事你都能获得成功……而且，你还是丝苔拉的丈夫。”

“我没怀疑你对我的友情，这样做，错了吗？”

“是的，统观全局，让你受点委屈并没什么害处，这就是当时的结论。至于布迪勒，要是你相信我的话，事情很简单，我可以一直照实讲到底：如果说，你坚持遵守职业对你的要求，那么，我也有同样的义务。你要想办法保守秘密——我，正好需要去发现它。就这一点来看，你应该祝贺我，因为我做得正确、诚实。”

“现在我就祝贺你，”克里斯蒂安说道，“今天，我也应当重新受法律追究：我在家里给你看了病——这是违法的。幸运的是，事实不可能完全包括在任何一种条文、一种法规里边。”

雷德曼真心地悔恨不该这样强制自己向他道歉；谈话触到了埋藏最深的底层，痛楚比预想的更加难于忍受。

“你当然知道我是无辜的，是吗？”

“是的，”雷德曼承认道，“我感觉到了，但是并不知道！每次碰到瓦尔拉姆，那时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他总是问起你：‘你的朋友怎么样？现在干什么呢？’我以为你们早就熟识，东拉西扯，总之，都是些琐事。没别的好谈的时候，我就把你详细向我说过的那些特别的手术讲给他听

……这样，无意中也把你取子弹的手术告诉了他。”

“对于一个同我的岳父——一个能点石成金的人物——共过事的律师来说，未免有些过分天真了吧。”教授讥讽道。尽管他并没有任何证据，但他感到雷德曼又离开了事实。他甚至觉得自己想让雷德曼原原本本地说出一切的努力，简直有些痴心妄想。但既然有了这种想法，总应该想办法解围。

“是的，但是想到友谊，往往顾及不到法规，特别是当感情，当无意识占据上风的时候。瓦尔拉姆向我伸过手来说道：‘祝贺你，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然后让我写证词。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话既然已经说错，再犹犹豫豫也无济于事，也为时已晚了。他向我保证，说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被叫到他那儿，他给我开列了一大堆罪状：为什么我没有及时检举？为什么作为检察官我自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跟你有什么联系？我是不是认识山里斯泰利安匪徒集团里的某某人，等等。‘同谋者’的名字已经写在一张单子上，为了解脱自己，需要我承认他们跟你有联系。如果不这样做，就拿我跟他们同等对待。我拒绝了，于是他带我到地下室走了一圈。‘这儿，’他对我说，‘跟将来等着你的地方比还算是天堂……你跟克里斯蒂安有联系，他同匪帮有联系，这些都有充分证据。跟最要好的朋友会不谈这件事吗？你跟绍依曼斯库共过事，这你否认不了，而他现在还押在监牢里。如果你不把一切都供出来，那只好四分

之一世纪以后再见面了。我这样好言相劝，是因为你是我的同事，过得着。但是，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案子转给别的人。就这样，我手里的案子还多得办不完呢。’我在证词上签了字，他宽慰我说，用不着难过，因为他可以肯定，你是匪徒集团的一分子。我当时并不相信，但我却没敢问你，也没敢跟你通气，尽管我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如果万一你真的是呢？丝苔拉的事，就是先有了既成事实，然后你才告诉我的。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的友情，你的忠诚。即使抛开这些不谈，如果我告诉了你，也许你会跑到山里，或者做出想不开的蠢事；但是这样委屈你几年，还可以落个健康身子……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证词的底稿。我相信你会有办法对付，你会比我预想的还要出来得早。而且，你的职业也可以帮你的忙，你可以帮监狱诊所的人干些事。而我却没有你那么多有利条件。一旦犯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简直怎么活下去都很难想象。事情本来很简单，但不幸的是同瓦尔拉姆却没能很快了结。‘丢掉了心事，现在你可以替我们干点更重要的事了。’瓦尔拉姆开玩笑说，‘你学着当个字母Z①，然后再向我们报告。’我出于害怕，这样做了。不知道是由于取得了他的信任，还是由于巧合，后来我做了全市的主任检察官。我参与了一些拘捕要犯的工作，我开始相信自己做的一切，相信自己的作用。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我们正处在革命阶段，

① 指对别人跟踪盯梢。

而革命，毫无疑问，便意味着火热的斗争。我还这样安慰自己，我用不着表现得与众不同，生存本身就是严酷的，有朝一日我晋升到部里，一定要将功折罪，我要让瓦尔拉姆也尝一尝受侮辱的滋味，因为即使你替他干事，他也不把你看成是平等的，一定要压过你一头……事实上，胜利者总要推行新的道德标准，新的世界就需要新的法规。'旧知识分子的假斯文，'瓦尔拉姆耻笑我说，'就是在修女学堂也免不了有揪住头发撕打的事，何况这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他们得胜了，会把我们的皮统统都剥掉！他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么做，你现在就应该象他们那样做。'我还想向丝苔拉证明，如果她跟我结了婚，那并不意味着走错了路。你很清楚，我跟绍依曼斯库一起工作了好几年，也就是说，在丝苔拉周围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你插进来之前，我们两个结婚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你一出现，就一下子扑到她身边。你把她带到市政府去登记结婚的时候，我敢说她还根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好象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老是落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后头……"

"简直瞎扯。我怎么不知道你向她求过爱呢？而且恰恰是你……为什么你们都没告诉过我？至少丝苔拉从来没向我提到过你。"克里斯蒂安打断了他，对刚刚听到的这件事感到惊奇。他被捕以后，还是一直想从雷德曼这儿打听丝苔拉的情形。

"她性格不怎么开朗。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们总是在一起，一块看戏，看电影，出去玩，一起在她家吃饭。我

一不在，她就打电话找我，生我的气。而你当时看起来是在追求埃尔维拉。事实上她也对你更合适……都是这么要强，好胜，想出人头地。后来，有一阵子我同丝苔拉见面少了。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知道我要同克里斯蒂安结婚了吗？''这不可能，'我争辩说，'绍依曼斯库先生提的是我们两个结婚，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是啊，可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朋友，'她毫无隐讳地对我说，'谈不上别的……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等我找绍依曼斯库谈的时候，他象往常一样装模作样，赶紧把自己洗刷干净：'这事我不能干涉，我不能强迫女儿爱谁不爱谁。我一直以为这位大夫会娶埃尔维拉。可他们一旦吵起架来，就象是一场坦克战。所以看起来还是跟这个小的更好一些。本来我是想把家里的这个惹祸精早点打发出去。'事实是你的有利条件更多一些，你的职业，至少老头喜欢。实际上，这场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我没有就此不再登你们的门，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跟你还是朋友，二是还想常去看看丝苔拉，不愿意让她感到她伤了我的心。再有，还想从绍依曼斯库那儿学点东西。后来我也结婚了，而丝苔拉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但又是伤心的回忆，大概就象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给你留下的一样。每个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挫折。让我难过的是，你向她求婚的时候根本没理会我。当然，她可以拒绝你，可以跟我结合；不是你而是她，在最后一刻叛离了我。但是，不管话怎么说，事实永远是改变不了的。你被捕以后，她来找我，对我说：'你要我干什么

都行，只要你打听出他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我知道你的情况，而且还去看过你，但是我能告诉她什么呢？知道了下落，她会不顾一切，她会一直找到那儿去，特别是从别人那里她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老太婆如果知道了，更会到处去讲，对她我更加担心。而且如果我告诉丝苔拉你是什么样子，出了什么事，我想她会立刻昏过去。我安慰她，答应帮她打听。但我尽量躲避着少同她见面，为的是让她明白，因为我跟你是朋友，我也受了连累，也给我带来了灾祸。后来，过了大约一年，传闻你已经死了。也正是那时候，她考虑到离婚。她得找事情做，老太婆把积攒的家当都折腾光了。但是象她当时的情况，想当教员根本不可能。有人劝她提出离婚，说这样一来就能证实你是不是还活着。"

"又在扯谎，"克里斯蒂安心里想，"有人，到底是谁呢？亏你是这样地鼓励她。就象你在跟一个局外人谈天似的。"但即使这样他也感到满意，他不愿再把话题扯到别处。

"这件事开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提出离婚以后我对她说：'如果你想再结婚的话，我愿意高兴地提醒你，以前你真的差一点成了我的妻子。现在我还是那样，愿意跟你一起共度艰难。'她生气地拒绝了，直到我知道她得了癌症，住了院，再没跟她谈过这些事。那时候，我一直暗暗跟着你，眼见你进了家门。我希望立刻见到她。她是你妻子，我尊重了她，但那时候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是跟我的青年

时代作最后一次会面。当时我感到，我自己最后的日子也不远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见到她。有时候，会有一种想法老是缠着你，老是在你身后推着你往前走，解释不出什么原因，不容你不顺从。我想见到她，正是因为我的思想没办法从她身上摆脱开。她告诉我，你把诊断结果瞒着她，而她却十分为你担心。没有她你恐怕很难生活下去，她死了，恐怕也会连你一块儿毁掉，然后又说了好多类似的话。所以说，我无法相信你的保证，因为你连她都欺骗……你们之间的这些名堂，简直可笑。我要知道，要计划安排，要解决自己的事。我并不想死，但是一旦我了解了确实的情况，也并不会一下子吓垮。”

“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教授立即说道，同时寻找着对方的目光，仿佛再次告诉他，他的确会继续活下去。而与此同时，雷德曼的坦率和真诚，仿佛使他心里蓦地泛起一股热烘烘的感觉：以前他只是揣测过的雷德曼对丝苔拉的爱情，仿佛使他们更加接近了。开始时他那种冷淡，那种仅仅为了尽到职责的想法，顿时减弱下来。这个人曾经告发过他，曾经对他怀有过恶意，这些事实都退居到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地位。“的确是老了，”克里斯蒂安想，“这么容易就让这个……叫它什么好呢！——给打动了。”但随后，尽管他这么高兴谈起丝苔拉，却绕过了这个话题。

“可你到我那儿干什么去了？如果你和瓦尔拉姆都对你们的材料确信无疑，为什么他还派你去说服我呢？”

“你不应该把我同他混为一谈。我知道，自从我写了

那些证词，我已经彻底缴械了，已经身不由己了。本来我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但是也希望等着瓦尔拉姆调走。而那时，无论如何我只能听他的。根据我得出的结论，他对你的顽固非常恼火，他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许你已经把他搞得晕头转向。另一方面，他恨你，理由很简单，你曾经好多次狠狠地羞辱了他。你挖苦他，当着他的下级取笑他。可能他已经断定无法跟你纠缠到底。尽管在这场究竟谁能压倒谁的比赛中，他能得到一些满足，他愿意看到你最后终于被打垮，但是他看得出你在拖延时间，而且害怕中间又会出来什么别的人进行干预。你名声很大，到处都被捧得高高的。你被拘捕会使所有那些需要你的人都考虑这件事。而且他也每天必须作出报告：多少匪徒被抓住？多少阴谋集团被破获？多少破坏分子？多少人民的敌人？等等。他想通过你钓到一条大鱼，破获阴谋集团，把匪徒一网打尽，从而得到晋升。我想，他派我去找你，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想看一看你是不是通过我搞些什么名堂。因此在这之后，一直有人盯着我。除此之外，你受的刑罚，对我也是个间接的警告。瞧吧，要是你想耍花招，不听话，这就是你的榜样！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我以前经常跟他见面，跟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他常找我商量一些事，我也常给他提供一些从法律角度出发的建议，因此，他也不敢轻易把我怎么样。他根本不懂法律，甚至瞧不起法律。他只相信自己的本事，他认为，用法律这杆秤去衡量问题的轻重简直多余。因为到他手里的事

情，就象投机贩手里的货物，一掂就能说出分量。但在众人面前，他却还要表现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正是他最理想的帮手：因为我可以替他找出谁的头适合他手里的那顶帽子。这期间我结婚了，于是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一层。我觉得应该找个保险的位置，应该有点作为。周围环境把我又向高里推了一步，这样，时间就会把一切痕迹磨掉。我幻想着能够到布加勒斯特，到部里或者教育部门工作，一切再从头开始，把不清不白的这段历史统统忘掉。事实上，如果没有'坏'，也就无所谓'好'，我心里这样想。实质上，我应该算成积极因素，是一副催化剂；我激发起人们身上潜在的精力，让他们准确地理解'好'究竟能包容多大范围。这是我发觉无法再后退的时候，自我安慰的一种说词。如果我认真地想一想，我并没有多少错儿。在建立你的荣誉方面，我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激发了你的精力，使你有可能检验自身的力量，自身的忍受力。如果不经受这次磨炼，你能够象现在这个样子吗？"

"既然从道德上讲当时你是对的，干吗还需要这样诡辩呢？按照你的职业和道德规范，是我错了，我应当付出代价！"

"你倒很会找地方，哪儿伤口深，偏向哪儿伸手术刀！遗憾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不是你的话……当我看到你怎样同瓦尔拉姆谈话，怎么能够忍受这一切，我甚至感到不是可怜你，而是羡慕你。我不会有你这样的毅

力，我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了。你的确了不起，你不但不怕受苦，而且身体也受得住。我是个胆小鬼，甚至成了个坏蛋。但这些谁都有可能做到。瓦尔拉姆是个特殊的坏蛋，连每个细胞里都满是坏水，而我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或者说接近平常的坏蛋。要做坏人，也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我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跟有教养、有能力的人一起生活过，但我身上却有一种并不完全的东西，一种动摇不定，一种不能把任何事情坚持到底的摇摆性。我不象你，我没有耐性，也不会象你下棋那样，能够看出几步以后的路数。在跟你无意开始的这场暗暗的比赛当中，我没能坚持住，跟瓦尔拉姆的比赛也是一样。我做错的地方，恰恰是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塞进了你同瓦尔拉姆的夹缝里。要做坏事，需要足够的力量。我身上不具备刽子手的无情，也没有毫不放松的坚持性。不幸的是只有我自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也想通过什么来显示一下自己，因为我在不断的晋升，但我知道，我自己却更习惯于俯首听命。我没再找另外的环境，另外一些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丝苔拉。我不能离开她。可能是因为她的温柔，她的文雅，她的好心肠，还有，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呢，她的孤弱无助，促使我保护她，设法满足她想要得到的一切。当我看到她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你的妻子，感觉简直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可你为什么从来也没提起过你爱她，或者你有什么

打算呢？”

“这样做毫无用处，只不过更让我难堪。我给她做过解释，但这并没使情况改变，而我的感情也一直没有变化。”

“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年，难道对你还不了解吗？”克里斯蒂安问道。

“好象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几个关键时刻，或者几件普普通通的事，就能决定你的命运；因为它会把你的欲望，把你下意识的要求一下子摆出来。我曾经认为，更多的是你的社会地位吸引了丝苔拉，因为，实际上她并没有时间好好地了解你。”

“你以为如果我们推迟结婚，她会发现我的什么缺陷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吗？她会抛弃我吗？处境那么困难她都一直坚持等着我，这你都看到了！”

“当然，过后我才发觉这一点。但那时候……一夜之间你竟成了英雄，那时我这样想。我又估计错了，不得不承认……”

“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太清楚。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你又不是个糊涂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从前的心计、智谋、手段都哪儿去了呢？大概是什么地方没交好运。因为，信念是一回事，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

“对人不能看得太理想化，也不应该过分信任。”

“是这样。”教授承认道，“没有得到证明的东西说明

还没有巩固的基础。以前我所以吃苦头，是因为我心里怎么想，就那样直接公开地说出来，我不习惯沉默，隐瞒，怀疑。不管怎样……我被捕以后，过了几个月到我家搜查了一次，发现了我的那些剪报，那些笑话，那些编写关于人类愚蠢史的设想。这些只有你才知道。他们直接向我妻子要这些东西。当然，都是些有关法西斯的材料，所有希特勒、墨索里尼演讲的疯话，他们制定的那些愚蠢的法令，从这些可以看得出他们是独裁者竞赛当中的创记录者。我收集这些有我自己的目的。为了这事，为了在德国使馆说过的关于希特勒的话，我曾经被关过一次。书既然还没写出来，他们就有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只有你才能给他们提供情况，因为你看到我受得住，甚至比瓦尔拉姆还要强硬……”

“对，”雷德曼羞惭地说道，“这是我在你身上做的最后一件不公正的但同时又是一件好事：为了更崇高的事业，你应该保全自己的身体。瓦尔拉姆算什么？难道他能称得起是你的对手吗？”

“他只能算倒数第二。”克里斯蒂安冷冷地说道。

“现在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说了，没有什么可再隐瞒的。我记不起还有什么……”

“你没告诉我妻子，说我死了吗？这不正是她提出离婚的真正理由吗？为了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可能是这样，”雷德曼说道，“但我不敢肯定。不管

怎样，我根本没想到你能受得住……经过这么激烈的时刻，你那样执拗，那样死不回头，我以为，你缓过来的第一天就再也爬不起来啦。"

"我不能倒下去，"教授插话说，同时做出一种抛开个人，要进行一下纯科学解释的样子，"我必须排除这一点，因为这儿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要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在外面同在里面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在这儿，必须自己偷着睡觉，偷着吃饭，总之，得保存精力，为的是说明真相。只要我还剩下一个完整的神经细胞，我就不会屈服。我这样坚持并不是荒唐。那时候，我想把问题解决彻底，就象现在对待癌症研究一样。也可能现在的这一次我不会取胜，但我可以保证，不管担什么风险，我决不会退让，决不会放弃。我是个自由的人，尽管瓦尔拉姆用尽了手段，但是我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自由。也是在那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个人：一个地下工作者，赫里亚努。他被诬陷在索迈瑟尼[①]霍尔蒂法西斯组织屠杀北阿尔第亚尔共产党人的事件中，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秘密，供出了地点和联系等情况。告发他的人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据推测，一个正常的人是忍受不了霍尔蒂法西斯组织对共产党人施加的酷刑的。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一些霍尔蒂分子怎样对待他的情况：一个霍尔蒂分子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打昏并且强奸了她。他们往他伤口上撒盐粒，

① 地名，位于罗马尼亚西北部。

拔掉他的指甲，用蜡烛烧他，把他放在冰窖里冻着……等等。再还能怎么样！但结果他什么也没说。尽管如此，竟还有人捏造罪名诬陷他……象这样可恶的人应该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教授又特意加上最后一句，他感到自己的手术刀已经更深地戳进了伤口。

“是的，”雷德曼象是承认自己失败似地答道，他感到这一击打得十分凶狠。但镇静了一下，他又清醒过来：他深信教授并不象看起来的那么了不起，那么不可缺少，是他精心准备了这次攻击。难道还能对他寄予信任吗？他还能替自己做好手术吗？“他出狱以后，”雷德曼承认道，“我的前程也完了。你问我的就是这个吗？”

“他对我谈起过你，瞧，我们也有个共同的相识……”

“你是想证明，因为我而吃过苦头的不只是你一个吗？”

“我并没想到这儿，但是我知道，”教授又在寻找他的目光，“对于你，我当然感到特别关心，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是无论如何，你的过错绝不象你企图表示的那么小。”

“是这样，”雷德曼承认道，“比这坏得多……没有任何人象赫里亚努那样给了我这么大的难堪。他出狱以后，让我写声明，说我说了谎话为的是取代他在大学的位置。然后他在全体教师面前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他并没要求我离开系里，但是我还能继续留下吗？这样我才做了小职员。赫里亚努也是那样执拗，也有那么一股劲……可这只

是表现在心理上。后来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做的事。我确信他有叛卖行为，我亲耳听他女儿讲过，直到今天我也不怀疑。你是靠普列德斯库上校和波普教授才交了好运。”

“是，也不是。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相信社会主义绝不是瓦尔拉姆搞的这一套，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呼吁、斗争，今天监狱里就不会连一个政治犯也没有。但是你并没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好象我刚才这样问过你……”

雷德曼有些支持不住了：累得不得了，不住地出汗，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些不安。

“是的。但是不管我对你说什么，按你那时的态度，却不可能听进去。而我当时确实有些怕。我软弱，怯懦，而后，又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今天，我倒有勇气承受痛苦了，但事实上又没有什么可值得这样做的，连你都原谅了我。可怜的赫里亚努还没来得及等我向他道歉，就死去了。我见到你的那时候，你已经四天没睡觉，身体已经不象样子……后来，我又看了看你睡觉的地方……如果不投瓦尔拉姆的意，将会发生的事让我害怕得要命。只要把我弄到下边，弄到瓦尔拉姆叫做‘超度所’的地方，那就足够了。但是慢慢的，我觉出自己有了一种奇怪的变化：瓦尔拉姆那样信心十足，对工作那样看重，这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认为自己也应当这样做。你知道，瓦尔拉姆抓到过很多敌人，做过不少好事，不管你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或许我并没考虑到原则、法规，而只是觉得被按进了一套无法脱身的运转系统。我逐渐习惯了另外一套语

言，慢慢摸到了这个人担心什么，希望什么，而且接受了他那种高人一等的作风和表现，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多疑，从而能够真正地听从他。如果你反抗不了他的力量，那就只能适应或者顺从事情的后果。那时候我还年轻，还没做出什么成就。我就象一个不动脑筋的翻译，给那些不容申辩的决定罩上一层法律外衣，就如同机械地从另一种语言里找到相应的词汇，而不管它的含义和解释一样。我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所有这一切都会受到应得的报应。瓦尔拉姆被判了罪，我跟你说过，现在落得在卖彩票。有一点我很想问一问：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怎么看我呢？”

克里斯蒂安苦笑了一下："我只不过知道了一件新闻：丝若拉，只是她已经不在了，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至于别的，我早就料到了。我们都走过了自己的一段路。尽管我受过不少苦，但我还是觉得我是个自由的人。为了保持这种自由，不歪曲事实真相，我作了斗争，而且我认为我是成功的。你没有这样，按照你的口味，你得到的是另外的结果。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想要的是好，而不是坏。而你，却热衷于，或者说有意无意地、不自觉地做坏事。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把事情做到底。而且，要不是看到你的话，我也不会再想到过去，因为已经不需要忏悔，也不需要安慰。我劝你也不要再想这些了。”

克里斯蒂安不想再同雷德曼继续谈下去，他本想对眼前这个人再诉诉苦，讲讲委屈，但等他稍稍定了下神，听到对方的声音时，不禁象怕冷似地打了个寒战。

"也许你说得对，不值得。你能对一些人说明事实真相，这就是说你能看重他们。但究竟有多少人值得你去这样做呢？有多少人拿你搜索枯肠说出来的几句话当做一回事呢？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有怯懦的时刻：我觉得，我是成熟得太晚了。多少年一直不出差错，勤勤恳恳。我本想结果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会更好。不管怎样，我不会安于现在的情况。但是，我缺少毅力，我身上有什么失灵的地方。一切简直太单调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摆脱。我不象你，名字上了教科书，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然，我后悔，但是你也可能同样有这么多值得悔恨的事……以前，有谁做了件错事，会感到自己有罪过，为了赎罪，于是建一座教堂，或者行一些善事。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当然，赫里亚努的事以后，我也做过不少好事，尽管是些看不出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到底还是做了……"

"为什么一定要让人看得出呢？只要做了就好。还是让我们好好保重身体吧。"克里斯蒂安勉强控制住怜悯之情说道，"好好睡一觉，明天……我给你动手术。你没癌症，以前有过。是一种传染性的癌！"教授又不由自主地按了按他的肚子，然后替他盖好。

"没想到二十年来我一直想要进行的这次谈话，会结束得这么简单。很遗憾，我觉得没把话都说完，我感到还不满意……"

"别谈这些了，"克里斯蒂安安慰他道，"将来我会请

你带我去找瓦尔拉姆。也许我还能抽着一张中彩的彩票呢。我儿子抱怨我不给他买汽车，不给他买衣服，搞得他象个穷酸。瓦尔拉姆能给我带来运气。没有他，好多事情我还明白不了，是他检验了我的意志和力量。”

“那天屋子里是你儿子吗?”雷德曼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同时故意用两只手揉着肚子：他已经没有勇气继续谈下去，把这一事实真相也告诉对方。“安德烈知道这件事吗?”他试探着问，“你的事告诉过他吗?”

“没有，”教授说着站了起来，“还不到时候。很可惜，现在的年轻人还不能理解这一切。我看你是要为自己辩护，或者说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可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要教会他一些东西……至少现在需要这样。明天我事情还很多，就这样吧。没问题，你应该信得过我。”

“外科的一面荣誉旗帜嘛，那当然，”雷德曼试图说句笑话，“毫无问题。”

“作为对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我可以告诉你，荣誉，只不过是张引诱人的牌，但这并不是我自己搞出来的。至于医生，有了它也没什么坏处，有时候这也是一种主要的治疗方法。”

雷德曼感到高兴的是，克里斯蒂安向他做了个鼓励的手势，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病房。

“没有变，”雷德曼舒了一口气这样想道，“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心里只有他自己，由他来确定轻重缓急，时间先后……他用他的方式教训了我一顿，就象是宣判我的死

刑……”一时他忽然想到，是不是不该对安德烈说那些，但又没立即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思想又回到了过去一直思虑不止的问题上：“受点委屈对他并没什么坏处，只有那时候我们才会有共同语言。”雷德曼心里很清楚：他一直恨这个人，这一点无法隐瞒，尽管这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异：正好是他恨的这个人，现在却又重新为自己做好事。

“上帝作证，”教授走向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想，“他甚至能让我的抗菌素都感染上细菌……”跟他谈话的时候，教授极力想做到这一点：不理会他悔过的话，再回溯到他们的友谊，回溯到当时的气氛，但结果却没有做到。这倒并不是由于雷德曼的原因，而是自己感到每说一句话，两个人就更加远离多少光年，而且那时的年龄，也似乎是另外的样子……他们共同走过的那段路倒并没出现过什么障碍，但他明白，他们之间缺少那种共同的心弦跳动，那种难以言喻的吸引，那种倾诉衷肠的要求，总之，那种友谊所必需的热情。他的谈话和对过去的回忆，就象陨灭的一颗星星的微光，穿过黑暗、荒凉、阴冷的空间，走过一条漫长的路，现在才到达跟前。“但是，还能找到那时的我吗？自从每夜守护丝苔拉以来，我再没走过这条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只顾一个劲地向前看，却从来没考虑，这样割断根基、抛掉过去的我，会不会迷失方向呢？我还能毫不犹豫、毫无怀疑地去听信谁呢？甚至年龄和经验积累起来的智慧，甚至习惯于有所保留的下意识，也无法把我阻拦住。一切与过去连接的线几乎都绷断了。我在一个

陌生的领域里感到自由，我可以根本不去管这里的条文、法规。已经不存在退路,已经没有昨天,没有别的可选择。”

他匆匆走进办公室，锁上了房门，就仿佛想逃避开自己的问话和缠绕不清的念头。“骗子手只有全局输光才能稍微清醒。而直到显示才能的再一次机会到来之前，又会比谁显得都圣洁。其实，我不应该这样严厉地谴责他：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他是属于那种见到别人幸福、欢乐便无法忍受的无能之辈。只有一种感情是牢固的：用美妙的言词装扮起来的仇恨。”他觉到这样未免不公平,但思路依旧越过了理智的界限。“如果认真思考一下，我的确不公平。雷德曼在我的一生当中并没起过这么大作用，也许没有一个人起过这样的作用。不然的话，那就等于说我过分相信了某一个人的力量……是个懦弱的、听命于别人的人，而事实上……”

他把椅子拉到靠墙的地方,为的是能把脚伸到桌子上。这样的姿势他感到舒服，解乏，而且能看到院子。窗下的一棵松树不停地摇摆着枝杈，象是努力要把下雪时留下的痕迹全部甩掉。他听到几下轻轻的敲门声,但并没去开门,他觉得这样呆着太自在了，他一直注视着两只小麻雀，怎样想靠近快要断掉的一根树枝上伶仃悬挂着的一颗松果；最后，小鸟终于放弃了这种企图，立刻消失在溢满松脂的枝杈中。蓦地,感到敲门声又响了一遍。他站起身走过去,一下子打开了屋门：没有人等在外边；几个穿着旧的蓝色病员服的病人透过窗户向院子这边望着。走廊尽头一伙大

学生突然停住笑声，尊敬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一位护士见屋门大开，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便犹犹豫豫地走了过来。

"您需要什么吗?"

"不，我只是看看……什么也不需要……"

"您知道，我也会煮咖啡的……"

"不是为这个，"他解释道，"好象刚才有人敲我的门……"

"要是有人有什么事的话，"她心不在焉地答道，"会一直敲个不停的。也许您听错了，要不就是十二号病房拄拐的那个病人弄出来的声音。有一点儿事他就敲门，胆小得要命，就好象他自己掉进沟里冻僵了反倒是我的过错。哼，要是我当他的家，瞧能不能治过来他这个毛病!"

教授不由自主地笑了笑，他很喜欢这个女人的这股劲头。"别的呢，你怎么样？干什么呢?"

"还能干些什么事？整天为这些人这么跑来跑去，就是长四只脚也不够使唤!"

"特护病房的那个病人呢?"他用手指了指雷德曼的房间。

"还可以，"她笑道，"有点爱挑剔。好象他不愿意死，可也不喜欢活着。"

"情况正是这样。"克里斯蒂安笑着撤回了身。他不想再坐到椅子上去，但又没决定要做什么。还有安德烈的事：早晚总归要跟他谈。前一天晚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睡觉；

不是假装的，嘴半张着，大口大口地出气；额头沁出一层汗珠，密密实实的长头发散乱地贴在枕头上。教授心想，还是不叫他的好：即使他醒了，也不能指望他已经了解了这些事，他还正等着从自己嘴里说出来事实真相呢。

教授把电话拉了过来，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拨了个家里的号码。是保姆温德尔太太。他本想问一问安德烈，但又没敢这样做，怕安德烈听出他的声音会立刻从家里走开。他原先满以为老太太行动迟缓，安德烈会跑在前边。或者她正在扶手椅里半躺着，她才懒得动弹呢。他问她有什么事没有，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但从她的答话里，却什么也猜不出：她抱怨说，只买到了小摊上的餐具刷子，阿普佐尔市场上还没有西红柿卖，她从一个农妇那儿买到一只母鸡。教授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说不定后来会提起安德烈。但象往常一样，她又扯到她生病的姐姐。这一整套故事教授早已听得烂熟，只好匆匆道了声歉，挂上了电话。他发现他不在的时候杜米特列斯库给他送来了新的空白卡片，桌子下边还放了一包书：是遗传学家和内科学家克拉尔柯、恩根、柯尼尔、拉舍特、洛德斯等人的著作，堆放得乱七八糟。书是新的，刚刚到的，但他要等下午再安安静静地读这些书，而且不是在这儿，而是在下边实验室，那儿不象这儿这么冷。他还不能决定是不是回家去。为了再争取一点时间，仿佛需要取决于别的什么人。他点着一支烟，很快就吸完了，于是拿起记事日记，希望从这儿也许能找到挽救局面的出路。在桌上靠近日记的地方，他发

现了一张纸条，上边是自己匆匆记下的几个人的名字。雷德曼：他用铅笔在下边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克列楚？不值一提，”他心里说，“让他见鬼去吧！杜米特列斯库，已经谈过了。多尔奈什蒂……”在这个名字上，他迟疑了许久。他真想打听一下研究所有什么新闻，特别是关于他的申请。但最后还是决定派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去一趟。然后再……“其实我用不着跟他浪费时间，以前他没干过些什么，而且现在他的院长职务也就要保不住了！”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冷若冰霜的派头十足的形象，这使他回忆起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一个情节：一些学者，为了让助手注意某件事，便先给他们头上每人敲起一个疙瘩。不过多尔奈什蒂倒并没受过这样的罪。“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我们——的友谊……”他的舌颤音打得这样长，就象是同刚刚起动的柴油机发生了共振似的。有一次因为约瑟夫副教授闹出的事，多尔奈什蒂把他叫到了院长办公室。这次没叫他“亲爱的克里——斯蒂安”，也没叫他“同——志”，而是用一种意想不到的、近乎同情的眼光望着他，然后悄悄说道：“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净给我找麻烦？你以为把你的那个摩尔根[1]当成反革命的那些蠢人成不了气候吗？你刚刚了结了一件倒霉的事，又要再从头开始。我是要尽我的能力来保护你，但是……”

“最后他们还是要发现我们也有染——色体，那他们

① 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

会说我们些什么呢?”克里斯蒂安看着对方的眼睛，感到有些惬意。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地也学着说话打长嘟噜，他本以为会听到一句“见你的鬼”，但结果却是一种可笑的请求：

“你别生气，总归我还是要批评你一下，让那些蠢人也知道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你不用不好意思。”克里斯蒂安鼓励道。

多尔奈什蒂又生气地加了一句：“可是，你为什么要惹这个该死的笨蛋约瑟夫？亲爱的，他会到法院去告你!”

“我让他作个遗传学研究报告，我要数一数他的染色体。”

“别插嘴，我还是要批评你的!”

名单上还有三个名字：克里斯蒂娜、薇拉和安德烈。他久久凝视着这些名字，油然生出一种伤感：象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一样，甚至连去想一想的勇气也没有。在感情和现实之间，在他和他们的年龄之间，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排斥力，担心自己露丑的想法把他束缚住了。但那些卡片，那些书，那一叠叠的白纸，使他生出一种舒适恬静的情绪，于是他决定，先从最难的开始：安德烈。不能再拖延了，已经拖了不短的时间。不只是怕这期间再出什么事，而且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就象多尔奈什蒂兴致大发或者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时那样，他真想大喝一声：“你喝醉了吗？——从我这儿走开，可你为什么要骂那些笨蛋?”

他为安德烈感到困惑、烦恼：他十分明白，这孩子内

心的大部分对他来说仍旧是陌生的，他还从来不曾掌握过；当然跟他谈起话来，儿子倒象个成人，但克里斯蒂安却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就象手心里滑来滑去的一样东西，总也抓不住。而直到现在，每当他向儿子迈出一步，而安德烈却并不衷心地迎着他，反而立即向后退一步。事实上，从那次“秘密晚餐”以及同雷德曼的谈话之后，安德烈只抱怨一件事：他同父亲的心只有在一点上是相通的：书，科学。父亲给他自由，理解他的需要，承认他的成熟，这一切都是通过完全不过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好多次安德烈只要想到父亲，就感到浑身战慄。父亲一见到他，就象一颗即刻引爆的炸弹，尽管并不曾发生过爆炸：令人窒息的沉默，严厉探询的目光，两边下垂的嘴角，这一切仿佛预告爆炸的信号。他并没想到父亲会在这时候出现，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打个招呼，而后立刻跑去看他的书，就象根本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一连好几个晚上，他一直在准备着同父亲的谈话，而现在，见父亲就在门口，听到父亲让温德尔太太准备两份咖啡——也就是说也有他的一份！——反而把细心准备的台词几乎忘了个精光，剩下的，只是感到需要逃跑，需要永远摆脱开这种窘境。倒并不是由于担心这次谈话的直接后果，也不是害怕可能让他做的那些毫无用处的解释。自从那次不寻常的发洩玩闹之后，一连经过几个焦灼不安的夜晚，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条：离开医学院，等人们都平息冷静下来之后，再去别的地方，一切从头开始。但却想不

出一样合适的工作。他一直打算做研究工作，想在科学方面搞出点成就，而这儿正是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近的地方。他还曾想到，规规矩矩、严严肃肃地呆上一年，不露面，不去管学生会或者系办公室作出什么结论。但最后，决定还是先跟父亲公开地、坦率地谈一谈，然后再作决断。而同父亲没见面之前，他早就做好了准备，知道会提出些什么问题，甚至前一天的晚上，他还在办公室等过父亲。而现在，父亲却来看他，而且眼光里的惊奇胜过了气愤。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安德烈，”经过一段难忍的沉默，教授说道，“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没有，暂时没有。”安德烈冷静地回答，连头也没抬一抬。

“很遗憾，”克里斯蒂安对安德烈不予置理的冷淡态度，感到有些不高兴。“我们有好几天没见面了，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总该有些值得谈谈的事情。”教授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显出不允许搪塞的样子。既然已经碰到一块，再推迟这次谈话已经毫无意义，特别是他回想起克列楚的声调里没有任何好的征兆。“我不喜欢再提醒你，我是你的父亲，我对你还是通情达理的，我完全把你当做一个成人看待。我还不至于荒唐到这种地步，不允许人们犯错误、有过失。但是我不愿意被迫不得不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些。”

“你认为我的过失影响了你的威信吗？”安德烈无所顾忌地问道。“只有这时候你才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当然，你

是我的父亲，我应该听你的……”

“好吧，那就听吧!”教授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如果你只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只能理解这一点，那好，你有责任告诉我。现在我感觉情绪好得很，不然的话，我不会容忍你用这样的语调讲话……先不说这些。我发觉，你是出了些什么事。我们的关系，以前还是好的，可现在变了样，我弄不懂究竟为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错，我愿意承认，但是首先得让我知道是哪儿错了。”

“那好，”安德烈接受了挑战，“我只不过重申一下几个结论，然后，随你怎么样。我曾经相信过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就是关键。作为父亲，我没什么可对你指责的。作为学者和教授——我没资格评论。但作为我曾经相信过的人——我是有话讲的。你有什么必要接受那些圣物呢？为什么必得借助于那些人得到一个职务？……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听你讲过那些话……我怎么能肯定你所有的头衔不都是这样得到的呢？你越是要求我应该诚实、坦白，就越是暴露了自己，越容易留下把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你自己清楚地证明了你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讲台上讲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其实，用不着再浪费时间！你从来不认为可以同我进行一次认真的、真正的谈话。你对我隐瞒了你的过去，妈妈的过去，我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去了解事实真相……”

“你为我感到羞耻吗?”教授嗓音低沉地说道。他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话感到毫无准备。

“我希望从你嘴里听到事实真相，不管它会多么令人不愉快。”安德烈说道。

“这么说，对于你不了解的那些情况，你要追究我的责任。”克里斯蒂安打断他说道。“也许你不应该去考虑这些……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的过去，只跟我自己有关，但我已经不再去管它，已经毫无兴趣。”

“我已经了解到，你完全有理由抛掉它。”安德烈毫不迟疑地接话道。

“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如果不是我们还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我会马上停止这次谈话，也不再高兴看到你。而现在……但是你能承受得了事实真相吗？你有这个准备吗？现在我才发觉在你身上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直想使你感到什么都不缺少，尽力不使你感到有任何烦恼，让你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书本。至于你其他方面的需要，并不取决于我，假定你还有精神的或者社会的需要的话。”

“我知道你没有原谅别人的习惯，也并不健忘。但是也许应该评价一下我是不是真诚。”安德烈爆发似地说道。“对我，你愿意怎么评判就怎么评判，我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我已经摆脱了一切羁绊。我并不想把罪责加在别人头上，但我自己总要弄明白，总得摆脱掉一直缠绕着我的这些想法。”

“你摆脱掉了吗？你脑子里的想法简直让人害怕！我是想让你自己找出要走的路，并不打算把我想的强加在你头上……”

"我恨自己为什么没办法了解你。也许我做的事有人已经告诉了你：我搅闹了学生会，我同克列楚吵了架，我打了那个拉纤的家伙等等。我为这些蠢事感到后悔，感到害臊……我并不想把罪责推给任何人，但是在教育子女方面，你却是一直闭着眼睛。对外婆，我稍稍有点不同意的表示，她就立刻堵上我的嘴：'别出声，我不要听！'妈妈——也是一样。她死了以后——同学、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一样。"

"但是不谴责我，你自己就不能睁开眼睛吗？"

"我只是想了解你。比如说，你有名望，有经验，有权威，为什么却躲开大家，沉默不语，对别人的事毫不关心呢？为什么你只管自己花园里的花，而不看一看周围可能蔓延过来的野草呢？……那些无名的小人物可能是因为害怕不被人重视，而你已经不同于一般人了。你以为只靠你自己就什么都能解决吗？这些问题，好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解释不清。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害怕和自私。当然，对这个答案我并不感到满意。有些人说你是靠周围环境才爬上去的，你辛苦钻营，甚至每一步怎么走都经过了精心盘算。如果事实并不是那样，为什么就不出来说话，出来证明呢？"

"我想问一问，"教授冷冷地看着他，就象面前站的是个陌生人，"为什么非要找出这些答案你才活得下去呢？就象我们到了法庭上一样……为什么我要辩白呢？说给谁听呢？我高傲吗？不错，为什么不允许我有缺点呢？现在我

也还有……”

“我是想了解你。”安德烈坚持说。

“我的过去跟你没有任何联系。它，还有我的缺点，希望不要成为你获得独立生活的障碍。从我这儿你能学到的是一股劲地埋头研究、工作，是应该有耐性。但是，你自己清楚，你拒绝了同我一起工作。最后的这十年——我写的书就在那儿，在书架上。我的抽屉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证书，奖状；附属医院有我做过上千次手术的资料，还有一些正在继续完成的论文。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白白得到的。我是个胆小鬼吗？这么多年，我志愿上前线，到过异国他乡。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时间全都用在癌症研究上，难道这还不够吗？但是差不多所有这一切，都同死有联系。如果你仔细算一算就会发现，相当多的时间，我是用在别人的花园里。害怕吗？可能我自己的生活告诉我的东西，你无法理解。也许我的痛苦已经变了。你知道什么都不愿看，什么都不愿听，意味着什么吗？也许我被卷入了另外一场战斗。说的多的人往往做的少。如果我给你描写一下怎样感觉到死亡已经临近，怎样看到自己越来越弱的身体上每天都在增加着接近死亡的征兆，你会大声喊叫，说这是抱怨，是想辩解，是想故意夸大。我还留下了什么呢？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些背地向我攻击的敌人。克列楚，考德里亚努，还有不知你想到的谁。这些都算不上我的对手！象他们这样的人，我打败过不知多少。这样的胜利，并不能使我满足。你这样感情用事，这样相信匆忙

收集起来的言词和印象，仍然使我认为，还不足以能够同你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你怎么知道我对考德里亚努是什么看法呢？那天晚上你听到我接受他建议的职务了吗？你以为一个人价值的大小永远同他的职务是一致的吗？如果我被任命为院长或者什么别的职务，你认为我不配吗？或者因为是考德里亚努恩赐的吗？至于雷德曼——应该分开来谈。你觉得我对他态度很坏。是的，非常坏。但是你为什么没问一问，这么多年来他是我唯一对其态度坏的人呢？为什么你只根据一件事就来下结论呢？雷德曼在我这儿住院了。如果他还有一丝一毫的真心诚意，就应该告诉你一些事实真相。我不想教你仇恨别人，也不想教你鄙视别人。你这种真诚的好奇心，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是赞成的。那些想把别人拉到跟自己同分母位置上的，是不乏其人的。他们不允许有人冒尖，不容忍什么奇迹，而是魔鬼般地喜欢毁掉一切。那些蠢人，白痴，懦夫，让我吃够了苦头。但我也想办法对付了他们，因此我就落得高傲了。那时候的某某人，医学院的大人物，有一支漂亮的金笔，可只不过用它来写电话号码。就是他，给我上的遗传学的课。对这种人怎么能够原谅呢？现在你也抓住我的历史，抓住我的缺点不放，这样做难道同他们不是一样的吗？如果说我并不抱怨过去吃的苦，并不为自己没办到的事而大喊大叫，不愿再回头看——尽管我有权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呢？”

“我想更好地了解你，理解我们周围的环境。你知道

多少人这样说：‘如果你父亲站出来说话……如果他能关心……’但是我了解你吗？”安德烈对父亲的滔滔不绝感到不满，于是这样重复道。“同在一个屋檐下，好象我想要的倒是别的房顶！”

“不，安德烈，我并不想打乱你的思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还是你自己去寻找吧。只有胆小鬼才抱怨不休。为什么他们不站出来说话呢？我的时间已经浪费得够多了……我今天做的事，并不是我的过去得出的结果，而是我此时此刻要实现的计划。克列楚通知我说，削减了我的试验经费。如果我不能设法得到这笔钱，就等于说，我研究的这种药去见鬼了，我的路走错了。我不可能同时干一千件事。我是个研究人员，而不是让·胡斯①，或者别的什么人。我有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我自己对于生活的解释方式。”

“我知道需要做的很多，而且千头万绪，也不知该从哪儿开始，该怎么自卫，但是……”

教授停住了：仿佛感到他陌生了；他在全神贯注地摆开防守的架势。教授不明白他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不但没有长大成熟，反而越来越走下坡路。“他还不明白事情的复杂性。或者是想从家长教育的角度解释一下自己做的蠢事？这究竟能占多大分量呢？”

“如果我对你说出几个名字来，你会相信我是做过调

---

① 捷克爱国者，宗教改革家，后被德意志天主教会处以火刑。

查研究的吗？”

“你讲吧。”教授说。

“瓦尔拉姆，雷德曼，普列德斯库，法索莱，莫卡努，”他一口气说了下来。

“是这样。”克里斯蒂安立即承认道。“那你还谴责我什么呢？难道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吗？真是搞不懂。”他继续说下去，仿佛更多是说给自己听。“或者你还不成熟，也就是说，在理解除了你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我已经老了，太老了，对于我自己做的事，已经无法做到有个起码的控制。”

“也许我是个白痴，但是我找不到根据来原谅你的沉默，你的冷漠，你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原谅，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安德烈深信这些话是脱口而出的，他全身的极度紧张同对父亲的怨恨一样，退居到了第二位，不知道牵动了哪一根神经，以致使他咕咕哝哝说出了这些话。他意识到发这样的牢骚又是在做蠢事。他深信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已经割断了，而且现在已无法挽回。不管发生什么，他也毫不在乎，应该给一个同样严厉的回击。他父亲高高在上地、不无蔑视地给他提出来一系列问题，这些他从来没想到过，就如同对雷德曼说的足以解释他父亲表现的话，他从来没怀疑过一样。对什么人也不要相信了吗？他甚至想高声叫喊，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原谅，对，就是这话！”——只不过这个词已失去了原来的含义，是他还能想得出来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的脑

子乱极了，什么也弄不懂了！”

他父亲并不急于回答他的话，只是有些怜悯地瞧着他。而他恰恰感到并不需要这种怜悯，因为它只能使人感到屈辱，感到被藐视。

“为什么你相信别人而不相信我呢？什么时候能够倒过来呢？”教授问道。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的请客……没有雷德曼的拜访……”

“就是说，你想让我当院长，但不是被他们弄上去！其实你是在埋怨我不是院长，不该这样过着离群的生活。而一旦我当上院长，你又会大声喊叫：瞧，这个野心家。考德里亚努或者克列楚想当——他们不好；我——不想当，也不好。你脑袋里究竟想的是什么，真让人担心。但我终究还是理解你的……”

“我不需要别人理解！”安德烈爆发似地说道。“雷德曼和瓦尔拉姆所以那样做，为的是保卫胜利的成果，他们认为那样是完全正确的。”

“对，安德烈，”教授感到全身象散了骨架一般；再说下去已经毫无意义，“我究竟到了哪儿？我能够到哪儿？我白白跟你谈了这么多，我简直是个瞎子，瞎子，瞎子！”

安德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迷惑不解地看着父亲，父亲脸色苍白，额上渗出了汗珠，嘴唇不住地轻轻颤动。

克里斯蒂安从房间里走出来，他漫不经心地穿上大衣，

连周围看也没看一眼，急匆匆地走到大街上。“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我所有的那些研究还能有什么价值！”走了几步之后，他又仿佛觉得谈话根本没有进行过。“如果……那真是太荒唐……”他茫然地往前走着，不时同别的行人擦肩碰肘。忽然，他同佩德列斯库将军撞了个满怀：将军脖子上围了两条围巾，穿着套靴，提着一只装得满满的大网兜，透过网兜孔可以看得见沾满泥土的胡萝卜，苹果，散了袋的潮呼呼的土豆。

“你好啊，教授！”他兴致勃勃地嚷道。“别再想事了，嗨，我借给你一只网兜，卖海鱼呢！你到我这儿来，咱们把鱼煎一煎，再一块聊聊亚速尔岛①。据说鱼就是从那个岛捕到的。我还可以提供你一个烹调秘方：用麦琪淋煎！”

克里斯蒂安任他拉着自己的手，而将军，为找到了同伴而感到高兴，于是更加起劲地讲起亚速尔岛……

十 三

他满面羞愧地跑到办公室，觉得掌声还一直跟在身后：两小时的讲课建立起来的东西，仿佛一下子被这突然的爆发弄垮了，这掌声就象狠狠打在他脸上的耳光。“我不是演员，”他极力想摆脱一股劲儿往耳朵里钻的这阵声音，“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如果我打算吸引他们，我可以联系到心理

① 北大西洋东部葡萄牙附近的火山群岛。

病理学，我甚至可以学着奥泰斯库的样子朗诵一段莎士比亚的诗来结束我的讲课：

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
只看作吃吃睡睡，
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
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

也可能痛苦对他们来说是另外的含义，他们的理解、感觉跟我不同。”他觉得好象自己错了，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似乎偏到了另一边：只有静悄悄的大学生们，只有他们的默不作声，才使他相信他自己是被理解了的，是被感觉到的。

当然，这样的印象并不是真实的，讲其他课的时候，也为他鼓过掌。而同安德烈的谈话，搅乱了他的头脑，使他失去了自我控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说什么话，决定做什么事，总要思忖犹豫一下，经常自问是不是又错了，仿佛觉得每件事都有隐藏着的、看不到的一面，好象总有什么无法顾及，总有什么超出自己的能力。他开始注意周围的人，就象是突然置身于一群抱有敌意的陌生人中间。他注视着他们，希图由此得出关于安德烈的结论，发现使他们合不拢的那一点，找到儿子心里被他无意识地忽略掉的那一部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作为父亲不被信任，而恰恰去信任雷德曼？这就是说，儿子暗中早已发现了他的许多过错，早就对他有了看法。不然的话，当有人第一个告

诉他，他的父亲并不象他心目中想象的那样时，为什么便这样轻易地投身到这个人的怀抱中去了呢？难道安德烈不正是在等待、寻找能够把自己积聚已久的不满甚至怨恨表现出来的时机吗？教授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够通过儿子的眼睛，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刻，看一看世界的样子。

自从那次发泄过一通之后，安德烈又变得沉默、腼腆、彬彬有礼了。但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这种平静，这种正常，这种自然，却并不能掩盖住原先的想象。他知道安德烈想的、感觉到的是另外的情形，实际上，是在等待着又一次新的痛苦的意外。因此，甚至对安德烈热情的微笑，想要道歉的意图，意想不到地跑到实验室，克里斯蒂安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而这种烦人的令人不安的感情，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展到对待其他人身上："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我只是在安德烈一个人身上搞错了呢？一旦失掉了他，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当然，他并不完全安于这种想法，但却也不急于向安德烈迈出一步。这不仅是因为怕再一次做错，而且也感觉自己在儿子面前腰杆不那么硬："从我做过的一切当中，他甚至找不出一点值得尊敬的地方吗？……"拖延了许久的同薇拉的会面，也正好表现出了这种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怕永远地失去她，落得个孤苦伶仃；另一方面，每时每刻又怕安德烈离开自己越来越远，而走向安德烈的路，要比走向薇拉的路来得更重要。多少年来，他一直努力想使安德烈明白，应该怎样做人，但安德烈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吸引住他呢？按他希望的去

做，还是继续等待？只是再迟延下去恐怕他们之间的距离会越发远了。怎样才能使安德烈喜欢呢？只好四面出击，各方面都崭露头角，而这样一来，研究的那种药就只好搁到一边，也归入"假如……那么……"一类。至于薇拉，安德烈对她还从来没有公开地表明态度，但克里斯蒂安想象得到他会怎么感觉，因此极力避开让安德烈看到自己单独同薇拉呆在一起。

昨天，薇拉根本没想到教授会邀她去旅游点的木屋，尽管在走廊上同教授碰见过几次，但教授并没跟她说什么，只是心不在焉地从她身边走过，就象每次他决定回家，然后再打电话给她时的情形一样：克里斯蒂安倒很讲究礼节，电话上只说一句"我们开车到家里去接你"，因为阿纳尼亚曾经告诉过他，总机的女电话员没事老偷听别人的电话。薇拉也知道了这个情况，所以也并不指望听到什么解释。看到实验员也跟着，薇拉高兴的情绪稍微受到了些影响。还好，到那儿之后，他并没同他们一起吃饭，只是不时地从汽车里走过来，问问要不要再拿过点葡萄酒。

克里斯蒂安的表现，薇拉觉得不太正常：他对她说起维也纳的一个教授刚刚给他寄来的论文，然后又谈到抗癌药。但从他微微颤抖的声音里，从他偷偷看她的眼神里，薇拉看得出，肯定有什么不同一般的情况。好象有什么事没勇气告诉她，又象是躲避着自己，要不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确信没必要去追问究竟，于是随便东拉西扯，想使他情绪安定下来。而事实上，他这样的心神

不定反倒使她觉得很开心。在附属医院，她显得不大合群，冷冰冰的，对学生十分严厉。看起来关心的只是收集更多的资料，以致很多人都把她看作活字典。特别是她从来不曾对谁跟谁结婚显出过兴趣。甚至在实验室只剩她同教授两个人的时候，她也不喜欢讲话，只是闷着头做教授让她做的事。只有当他们离开医院之后，才变得活跃起来，不再那样克制自己，拘束自己，就象对待一个跟她年龄相仿佛的朋友那样，什么都说。她讲别人听不懂的暗语，象学生似地带着骂人的口头禅，孩子般地撒娇，只是她这些消除他们之间距离、减弱互相之间拘谨的努力，往往得到正好相反的效果：克里斯蒂安无法同她搭上茬儿。他把这归咎为年龄的原因，不管如何努力，他总迈不过某一道无形的门槛，感觉完完全全受制于理智。不管她做什么，他甚至高兴看到她那儿童般的天真，而他自己却无论如何都觉得不自在，甚至心里想高兴一下，嘻笑的影子也会闪动几下之后立即消失。尽管他一直梦想抛开一切，挣脱理智的束缚，但却始终找不到互相交流的共同媒介。不管她怎样努力，克里斯蒂安依旧沉默不语，只不过这次的沉默，看起来隐藏着更多的内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仍旧毫无动静，薇拉考虑还是由她来先开始：

“这儿的空气真讨人喜欢，葡萄酒也喝得身上暖烘烘的。”薇拉说道。“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象科学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唔，我可不愿意老那样绷着脸……最好还是跟我讲讲你以前认识过的女人吧，我一直放不下这件事，虽然

听起来象是傻话。我还一次也没出过国……那些巴黎或者维也纳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教授感到有些意外：他不愿提起过去，特别是当着薇拉的面。回忆只能越发加大他们之间的距离。听到这句问话，他感觉薇拉恰恰是在抱怨，是在暗示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对此克里斯蒂安反而感到高兴：这正投合了他自己的愿望。

“噢，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啦，是在战前，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但是你在电影上看到过这样的女人，或者也许你的祖母讲给你听过……当然，在那种民族、肤色、穿着、口味混杂的情况下，我不想否认，我认识的并不太多，当时我在这方面有些迟钝，”这段回忆倒使克里斯蒂安活跃了起来，他想继续说下去，就象吹来一股平稳宜人的微风，使他的感情改变了方向。“那时候人们就象到了世界末日似的，这你很难想象得出。有尖声尖气拦住你的白种女人，有肌肉丰满的黑人妇女，有体态轻盈的阿拉伯女郎，有精心打扮的印度支那姑娘，她们都在等着客人光顾。这是一种收益特别快的买卖，钱能够决定一切。还有的在橱窗外招揽生意……向你暗送秋波……随后在通往地下室的大门或者屋门边上一倚，只要你稍一犹豫，立刻会对你说一声：‘来吧，我教给你！’过那么一会儿，等你精疲力尽地走向大街，便开始后悔花掉的那些钱。这都是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你总喜欢说自己老？”她闷闷不乐地问道，“我倒看不出……”

他们的谈话总是不大容易谈得起来。她始终不能忘记，他究竟是她的老师。而他的默不作声，不得不使她斟酌自己的词句。只有当她勾起他的话题时，她才试着摆脱这种拘谨。

“你是净往好处说，不过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如果说我还不显得多么老的话，那么，我这么大的儿子，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说到这儿，克里斯蒂安感到痛苦，他希望永远结束这场无法捉摸结局的戏。他很想让她首先提出来他们就此分开，因为照他看来，薇拉终究会落得失望。而他自己，尽管不时地受到内心谴责，怨恨自己缺乏勇气，但现状对他却并没什么不好。她静静地等着他抬起目光。克里斯蒂安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根本无法逃避。

“当然，”过了许久他终于说道，“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事，应该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什么事？”薇拉格格地笑起来，这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这你应该清楚。”他说着喝了一口酒，鼓了鼓勇气，“瞧，我象个迷路的小学生。但是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我是上了岁数的人，”他加重语气说，“我应当采取主动，但是我没能这样做，也没想这样做。一段时间以来，这些事我翻来覆去地考虑、比较，但是得不出结果。我头脑还算清醒，我知道，象我这样的年龄，好多问题应该想得到。”

"那么你究竟想要得出什么结果呢?"她有些生气地直接问道,"我不是小孩子,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我不习惯计较得失,这不值一提。我并不是跟你作交易。这儿需要计较什么呢?我没向你要求任何东西,什么也没要求……"

"说的正是这个,"他感到有些抱愧,"我最怕模棱两可、糊里糊涂的事。也许我这话不太恰当,你对事情有些不负责任……请相信,对我来说这很难说清楚……你的前途……"

"什么前途?让上帝作证,究竟什么前途?"薇拉失望地问道,"你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我可以向你发誓。"

"对,可我不能不考虑,我……不能允许你为我作牺牲。你作出来的,终究是一种牺牲。人们知道,或者说猜测,我们是朋友,但是这种友情如果是发生在不同性之间……当然,我们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但我们自己也无法否认,至少我是这样感觉……丝苔拉去世以后,你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强迫我,可以这么说,又振作起来,继续活下去……而我呢?曾经认为你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怜悯、同情,或者随你怎么说……而现在你已经不再有理由……"

"如果没有实验员在这儿,"她爆发似地说道,"我想,我甚至会去搂你的脖子。你简直什么都不懂。我不是出于什么怜悯,如果你想把事情搞清楚,这随你的便。如果你想让我们两个的关系到此为止,那我从现在起就可以不再见你。是不是要一还一报呢?实际上你给我的要比我给你

的多。”

“你净说傻话，”克里斯蒂安嘴里这样说着，但相信自己至少并不比对方清醒。两个人想要说的，却都找不出合适的词句，双方都感到再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们的接近来得太突然，随后，对失掉理智的那一时刻，都感到惊异、羞愧，就象是经过了一场昏厥，再试图摸索着慢慢清醒过来，试图适应新的状态，而同时却又无法摆脱触动那一时刻的刺痛。

“我吗？”她惊异道，“你要保住自己的名声，好。你担心安德烈，对。你怕我向你提出结婚，妙极了。你怕等你老了，我再欺骗你。我知道，都是你的自尊心在作怪。你怕发现我并不象你了解的那个样子，我抢去了你的时间。你以为，作为教授，就必须对我做出让步，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重要的是，你打算报答我，不是吗？那好，我打听一下价钱，我会告诉你的，你用不着担心。”

“我的上帝，真是不得了！”克里斯蒂安激动地嚷道，“难道你让我这个年龄的人还要向你求爱吗？”

“不是，”薇拉打断了他，“为了不让实验员看出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带他来，我们还是笑一笑吧，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再接下去谈。”

“我一切全清楚了，”教授嚷道，“你除了佩服我是个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外，别的我什么都不是。”

“不是这样，”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纸烟藏了起来，“阿

纳尼耶，我们不吸支烟吗？"

实验员不大高兴地走了进来。

"给您买什么烟呢？"

"你是怎么了？"她生气地嚷道，"难道你不知道我吸什么烟吗？"

到这儿，谈话算是结束了。教授坐进汽车的驾驶座位，旁边是薇拉，后排是阿纳尼亚。实验员可惜那些葡萄酒，刚刚沾了沾嘴唇就都剩到了桌子上。无可奈何地上了汽车以后，教授的后脑勺又刚好挡住了他的视线，于是决定干脆睡觉。克里斯蒂安象发疯似地开着汽车狂奔。"还能对她说点什么呢？"他偷偷瞥了一眼她那挂着一丝冷笑的脸。一瞬间，他脑子里浮现出她那时的形象：头发散在枕头上，睡衣敞开着，眼泪在同样冰冷的脸上簌簌地流。"每一句话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无名的空白。我不认为我玷辱了她，她也没有玷辱我。我们每个人都说出了真情，不管怎样，都已经过来了。不知道以后两个人还能不能见面。总之，并不是她的过错：是我想要弄明白一些事而引起的谈话，我应该预想得到，有些结果很可能并不合我的意。遗憾的是竟这样愚蠢地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吵嘴。他忽地想到，要是给她写信不是能表达得更清楚些吗？但这种荒谬的想法，至少有一千条理由可以驳倒。于是只好对脑子里闪过的这种念头报以苦笑。事实上，使克里斯蒂安不能原谅自己的，是那时他竟表现得那样软弱，甚至怯懦，他竟对薇拉说了一些连他

自己也不再想提起的东西。

现在，下课以后，他觉得已经等了她太长的时间。如果她没象往常那样来，就是说断绝关系已经成了事实，已经肯定无疑。他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的后果，而去看克里斯蒂娜，如果还有时间，甚至可以去看看雷德曼：孤独感使他在办公室已经呆不下去。好久以来这样的感觉从未象现在这样强烈。他不知道干什么好，甚至连继续工作的兴趣也没有了，鼓掌声一直在脑子里无法驱散。仿佛置身在舞台上，掌声还在耳边不停地响，而自己极力试图摆脱开它。"直到昨天，一切还都是清楚的，"他想道，"我在平平稳稳地向前进，超脱于日常琐事之上，一切都运转正常，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逝。我一直坚持不懈地、专注地搞研究，而同薇拉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也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现在也并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我还没觉察到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个静静飘浮的气球向四面八方爆开，让我又回到心神不定的迷惘之中。难道铸成的事实，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已经不存在后路了吗？"

薇拉下汽车的时候，冷冷地打了个招呼，用嘴唇尖说了声"谢谢"，匆匆进了家门。那时他却觉得就这样结束一切倒也不错，免得现在再想这些事情。"我已经老了，无法适应了，对那种勃朗宁式结束一切的举动①，理解不了了。也可能主宰人们活动，主宰人们关系的是另外一套规律。

① 指用勃朗宁式手枪自杀。

而我，象刚刚从梦中醒来，却执意要按照自己的这套道德经，按照已经过时的、混乱不清的真理去行事。”

他忽然感觉身上有些冷，于是穿上白罩衫，走出房间，匆匆关上了屋门。在走廊上，医生们都恭敬地向他打招呼，他无精打采地向人们点点头。医生们中间没有薇拉。“也许我应当叫她来，糟糕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他心神不定地这样想着，匆匆走进克里斯蒂娜的病房。考虑到种种关系，他不得不把一些朋友收住院。每个人同他都有过各种各样的联系，而这一切似乎都在迫使他做出某种行动，采取某种态度，来接待这些人。克里斯蒂娜却是另外的情形，但他只能象那时那样对待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将近四十年的空白，再也无法填补。这一结论两年前他去看她的时候已经得出。唯一剩下的只是再回忆当时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这对他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他进屋的时候，她正站在窗前忧郁地看着院子里摇曳的松枝。她身上穿着带色的丝织长衫，衬托得她更加苍白。她看上去样子已经老了，倦怠不堪，只有挺直的身板和骨节突出的两只大手，还能使他回忆起不久前在森林小屋里见到过的那个女人。由此，不禁使他对自己的年龄也惊叹不止。

“怎么样？”他声调低沉地问她道，“感觉还好吗？”

“还不错，”说着她坐到床上，随手解开了衣带。“不久就要把我的脾脏割掉吧？……”

他并不是为这来的，但又无法对她说明。

"会完全恢复的，你抵抗力很强。"他说道。

"你再让我在这儿呆下去，怕是从此就出不去了。周围这么多重病号，简直受不了。而且，我一个人也实在闷得慌……"

"这么多年，你不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吗？你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啊，"她笑道，"在那儿我可以随便活动，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人来问我，管我。我有那么多的野兽、野禽……"

"你不在怎么办呢？我一直想问你院里养的那些活物……"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都把它们放了，让它们自己去找生路。现在也许都跑散了。我得重新找一些小雏，再从头开始。只不过我担心没有我它们是不是都能活下来……它们还都没习惯，后来一段时间，给他们找吃的是这么难……一天到晚我到处去找……是我亲自把它们养大的，它们没了父母，没有我，也许早就饿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牧人那儿讨换一点奶。有些小动物，我是用奶瓶喂大的。什么野兽都有，我还养了两只野猪。我把它们驯服了，挺听话，见了我从来不咬。在它们身上下了多大工夫啊！"

"没什么人能替你干这些事吗？"

"没有，不可能。有些守林人倒常到我那儿去，一块喝杯酒，吸支烟……他们也走了，后来一直没再来过。还

有个朋友，可能你也认识，格尼伯，是中学时候的同学，他境况弄得不好，在卖《圣经》、旧书和一些别的小玩艺儿……他也靠不大住，再说也没有多大意义。我的病不会好的，那样会白白给他添麻烦……”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病没有任何危险……”

“是啊，我知道。我以前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本事，到了这儿以后才发现。我在那边生活，在另一种人们中间……猎人，守林人，生意人，牧人，各种各样的人。实际上……实际上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们在巴黎时候的经历，就好象根本没有过。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城市，特别是冬天，夜好象长得没有头。当看着自己裂开口的手，发臭味的皮肤，象野人一样的长头发，吃着桌上的李子干、苹果干的时候，常常这样自问：我曾经是那样的人吗？我并不后悔，也不抱怨，只不过确认一下现实。我这样想，象你这么高的地位，不是开玩笑，你能体会得到什么叫第二次生命吗？你是个大人物……”

“你太夸大了，克里斯塔①，”教授说道，“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不过是个好的外科大夫，而且还是比较而言，总之……”

“我明白。因此，你连顺便到我那儿去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当然，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你又说傻话了，”克里斯蒂安打断她道，“谁也不会完

① 克里斯蒂娜的昵称。

全跟过去一样。我事情太多，而且象我这样年龄，干什么事都觉得累得快，只好慢慢地干……”

“我不是抱怨你，你为我做了很多事。可这儿时间过得这么慢，这么让人心烦，整天吃药、吃药，我人都变得凶了……在你面前，我简直安静不下来，不管做什么，老是想到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简直成了个野人……”

“别说了，克里斯塔，”他真诚地安慰她道，“以后我尽量多来看你，或者，也许我到你那儿，留下来，一直呆下去……两年前我第一次到你那儿去的时候，对你那些动物挺害怕，而且你是那样地看待我，不知道怎么……后来，等晚上我跟实验员回来以后才发觉，你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

“那样象个疯子吗？”

“是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我感到也需要谈谈我们之间的一些事，但是没有时间。也不是只我们两个人没法谈，不知道怎么说……但现在……”

“你们做医生的最会说谎话，”她伤感地说，“在那儿你能干什么呢？你能整天吃蜂蜜、吃野果、吃蘑菇、吃生肉、吃野莓、吃草根吗？你能露天或者在树上过夜吗？你能用雪洗脸洗身子吗？特别是冬天，你能受得了吗？你能象那些非法狩猎的人那样打枪吗？只有我自己知道开始的时候有多么难……”

“我能够象你的狼那样叫唤，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曾经这样做过。至于别的，我吃过煮熊掌，我甚至吃过刺蝟。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吃和睡不是什么问题……我这一生并不是那么舒舒服服过来的。总之，你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

“有什么可羡慕的?”她笑道，“如今，得了癌症，什么都清楚了。但以前，有多少次我想去找你，请你雇我当你的媬姆，那时候我身体还挺结实，在酒铺喝过几杯酒以后，甚至能跟男人打架……”

“什么癌症?”克里斯蒂安不解地问道，“你，癌症？没有的话！是我给你开的诊断书：包虫囊肿!”

她沉默了一会儿，不相信地打量着他：

“那么，什么人才到你这儿来住院？……你不要以为我会害怕……我什么事都经过了，剩下的已经无所谓。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更惊人的新闻。什么时候开始疼起来，反正我有那么多野兽……只要饿它们一顿，然后……用不着特意请!”

“你真是疯了，”教授生气道，“这儿只有一个肿瘤科，其余都是外科。”

“你知道，他们都暗示给我了。”最后她承认道。

“不可能。这儿没有一个医生会医道这么差，会这么蠢……究竟是谁？或者至少说一说长的什么样?”

“没什么意思。他为我做了件好事，而你却要把他赶出去。我只不过想知道还剩多少时间，把余下的日子再安排一下。”

“好啊，这种愚蠢的想法也钻到你脑子里去了……”

“你敢肯定不是吗？”

“我可以向你发誓，克里斯塔，这是怎么啦，我的上帝！至少我得知道一下怎么对你说的。约尔卡大夫，你们病房的主治医生，技术不错的，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他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认识你多久了。他说象我现在的情况，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反正也用不着有什么顾忌了。还说了好多这样的话，一直说到我哭了起来。他还问为什么跟你讲法语。”

“我可以把医院的大夫都找来，你把他指给我看。你知道，这对别的病人影响很坏。”

“不，也可能我理解得不对。”她见教授发了脾气，想收回原来的话。“如果他再来，能让我惩罚他一下吗？”

“我甚至请你这样做。我们两个，克里斯塔，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那谁知道！”她伤感地说道。“我要编一通瞎话，让他目瞪口呆。可隐瞒的吗？也许有……”

“这些，就让它留在我们两个心里吧……”

“那好，既然你这样说……无非那几个发疯似的夜晚，一直到插进来萨宾。”

“我记得起来，”教授低沉地说道，“但我从来没问过你，你为什么喜欢上他了呢？现在，吃了这么多时候的苦果，又只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也许你还能想得出……”

克里斯蒂娜笑了笑，她那被日晒风吹变得粗糙的脸上，刹那间显露出一丝昔日美貌的痕迹。

“我给你带来了很大不幸吗？”她不安地问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失败。我也试着找出原因，但没有得出结果。我敢肯定，当时你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也是那样神魂颠倒，几天之后，甚至会认不出我来。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

“萨宾，上帝宽恕，我并没爱过他，不管你觉得多么奇怪。当然，我觉得他比你漂亮……”

“是的，作为男子，我的确长得不美，”教授说道，“甚至有些丑陋……”

“不，”克里斯蒂娜说道，“倒不是因为这个……你太没有主见。你让我决定一切，老是求我什么，但我从来不能忍受老让别人请求。就我的口味来说，你太没有男子气，这一点不让我喜欢。他却一开始就对我那样粗鲁。他并没过分注重我的外貌，他知道怎样能挑逗我，怎样来考验我的欲望。而我，当时是个要强、能干的农村姑娘。我同你一样，是抛下铁锹出来的，对一切陌生的东西是那样好奇。萨宾非常有钱，是律师又是议员，而且交游很广。他能拖着我跟他走，这一点让我喜欢，听任他怎样摆布。他给我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你——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医院里，想搞你的癌症研究。他不让我说话，不允许我有什么看法。他租了洛莱宫的一角，把我带到那里。他不满意的是，我没保持住童贞。他不许我再同你讲话，当时就是这么回事。而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他喜欢。那时候，我无法解释同你的关系，感到无比羞耻。一想到你，想到

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值得留恋、含情脉脉的夜晚，想到你在人们面前那种含羞带愧的样子，我恨不得立刻钻进地缝里去。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你没替我出过任何主意，没骗过我，瞧，就是这样……”

“难道我有时间吗？”教授辩解道，“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等我清醒过来，你已经不见了……”

“是真的，克里斯。后来我走过好多地方，每到一个新地方，就离你更远一步。最后，他让我累得支持不住，身子也给搞垮了。他身体比我强壮。你呢？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你也不会原谅我……”

“后来我也发觉，我们两个并不合适。对我来说，你长得太漂亮，我得放下自己的研究，整天守着你。你就象一阵旋风，我没办法把你抓住，把你挡住，仔细瞧一瞧你究竟是谁，究竟什么样。但至少你是否感到过幸福呢？”

“是的，直到我熟悉了自己的路，熟悉了左右的世界，只有这么一段时间。后来，我感到十分孤独。对于应酬，对于家务，对于牡蛎、贻贝、龙虾、鲱鱼、海胆，对于化妆品，整理房间，对于他关于为人处事的训教，我感到厌烦。我想回家，回到乡下，想把所有的香槟酒一口气喝下去。但对萨宾我不能够讲这些，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装饰品，直到用旧了，不喜欢了，便把我丢下，丢在旅馆，一个人孤孤单单。他身上带着别的女人的香水味，整天整天地见不到影子。我并没同他吵，我倒高兴落得一个人胡思乱想！后来，我回国以后，他把我丢在一个小别墅里，又

走了。那时候，我开始恨他，也开始欺骗他。我不是跟那些有身份的人，而是跟一些农民，后来干脆遇到什么人跟什么人，一直到战争开始。我并不是对他报复，而是对我自己向上爬的欲望进行惩罚。我感到自己颓废，就连这样的堕落行为都无法使我得到哪怕是最小的满足。我只是为你感到羞愧，希望再见到你。现在我用不着再怕承认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我是在讲我们两个人的事，而是在向你叙述一个平平常常的悲剧故事。你呢?”她问了一句，感到全身一阵阵的激动和疲倦。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我对女人并不是那么特别地感兴趣，至多不过是满足一下生理的需要。我找那些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女人，过后好能够轻易地把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样子统统忘掉。我要想办法利用一下当时系里的一些名人，我感到不会再在那儿呆多久了，因为战争的阴影已经发出了威胁信号。”

忽地，他感觉仿佛她并不在场，一幕幕的往事，接续不断地展现在眼前：场景有大有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如同在翻阅一本甚至可以背得出的旧书。使他高兴的是所有这一切还都在，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而且是这样的多。因此，在他孤独的日子里，又能有丰富的回想内容了。他将仔细地小心翼翼地按照细节和先后顺序进行分类，就象是一个组合模型的小学生，生怕手中的小棒不当心会丢掉一根。

“那时候，甚至空气里都充斥着马靴的味道。生活，

欢笑，爱情，工作，直到思想都被纳入到军队进行曲的旋律当中。这种疯狂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那时候我曾经这样自问，”克里斯蒂安深信，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他乐于再一次重复，以便不使思想再转到别的方面。“几年以后，除了军官，除了发号施令者，难道还会有别的人存在吗？在德国——希特勒到处被供奉、被神化、被绝对服从，他甚至在规划一千年的蓝图。但是，同样一个德国人，舍本豪尔[1]曾经说过：给还活着的人树碑立传就意味着害怕后人。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为数众多的人们，硬是被压进一个统一的模子，不再允许有什么个性。这种场景不能不让人胆战心惊。那种把毒药一滴滴偷偷倒进咖啡倒进饭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毒药却以一种新的形式，声波或者泛着新鲜油墨气味的纸张到处充斥着。”他觉得在她面前讲这些显得有些可笑，但他感到有必要说这些话。当他单独一个人回溯往事的时候，为了不把记忆里的材料一下子用完，往往边回忆，边评论。而现在，脑子里出现了形象，紧跟着便是一连串的词句，连他自己也无法阻止。

“这些词句把你湮没，不知不觉地腐蚀着你，一直渗入到你的灵魂，使你的感觉麻木。人们变得谨小慎微，只关心自己，象是锁住了的保险箱，却又忘掉了开箱的号码。为了发泄不满，到处乱踩乱涂，变得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期待，什么也不要求，什么也不知道。生活，精神，

---

① 德国哲学家。

秩序，已经是一片混乱。表面看到的，只是大喊大叫的语言，前线的步伐，攫取一切的狂热，任意呼喊和编造的口号和谎言。有多少人不想逃避，不想沉默，不想摆脱这种难忍的滋味和欺骗？但是只靠个人毫无办法。我一心埋头于工作，来逃避这一切，直到出现法国将被攻占的形势。于是我回到国内，那时候国家开始解体，一部分领土被瓜分。在全国掉转枪口之后，我志愿去了前线。我要用亲身的行动恢复自信心，战胜恐惧和怯懦，使自己感到我还活着。我仇恨希特勒造就的这个世界；一切好的、有个性的东西统统被磨灭、被取消了。我也想为铲除这个可恶的时代献出一点力量。一个肮脏的被病菌感染了的世界，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你呢？"他又问了一句，如果她再沉默不语，他觉得完全有理由就此走开。

"战争使我们交了朋友，"她说道，"不管你会觉得多么奇怪。萨宾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靠自己的积蓄过活。引起轰动的重大诉讼案件再也没有了。到那时为止我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的亲属，他的财产，而当时各种各样请求帮助的人却踏破门槛：兄弟、伯叔、堂表亲，从他们那儿我才了解到我们是什么人。他表现得那样慷慨，甚至在我面前说他变得太挥霍。战后，为了'铁卫军'案件，萨宾象其他人一样，被指控资助'铁卫军'而被捕。事实是，战前他同'铁卫军'的首领奥尔迪亚努上尉一起打过猎。至于说到资助，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特别是战后，不管谁来，他都照样给钱。但我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参加他

们那一伙。因为我知道：自从米哈拉盖让他搞竞选，我一直跟他在一起。第一审很容易地过来了，第二审就遇到了麻烦。两个奥尔迪亚努的副手编造了各种耸人听闻的谎言，他们自己无法证明这是事实，但萨宾也拿不出证据否定。而那时他们是两个人，而且处在原告的地位。我只剩下一个人，便去找亲戚。可那时大家见了我都象躲瘟疫似的，好象根本不认识我是谁。他们曾经冷眼看待我这个到过巴黎的农村姑娘，而现在恨不得永远不再见到我。他们心里尽管这样，但却忘不了跑来顺手牵羊，把东西都偷走。后来，我知道萨宾死了，就把东西都卖掉，躲到那个森林的木屋里。我只留下了书、金币、画和几件别的东西。而后，各种各样的客人把这些也都拿走了，最后只剩下书，我都藏到了阁楼上。你简直都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哭，哭得连话都说不出。这样孤孤单单，简直怕得要命。但我什么人也不愿意见，这才慢慢地跟野兽打上了交道。人们说我是疯子，都躲着我。我倒愿意这样，落得谁也不来打扰。有几个胆大的，想来看看究竟，我就放出狗去咬他们。萨宾的一个姊妹，过去因为我出身门第不高，一直瞧不起我，她到我那儿去的时候，狗几乎把她的衣服撕成碎片。后来我慢慢就习惯了，渐渐忘掉了过去的一切。我的体格帮了我的忙，还有那些动物。只有夜晚才能重新见到巴黎、罗马、柏林那些大城市。对到那时为止的生活，我试图找出解释，但结果一种也没找到。后来，慢慢地我了解了森林的秘密，也认识了周围一

些邻居。有时候我也出来走走。同外面的接触使我记起了不少往事。于是我喝酒，随便同什么人一起做傻事，然后又回到自己家，回到那些动物那儿。我想了些什么，我是怎么活过来的，用不着对你讲。那些同我一起干出堕落行为的人们，对我来说毫无价值，我甚至看不到他们究竟什么模样。只不过这样的时刻又使我回忆起过去的日子，使我静心地回想……真难以想象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喝酒，象野蛮人一样地生活……简直见鬼！既然变得这样，思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个护林人，送给我一个手提式收音机。好多次我听到过你的讲话。当我知道你有那么多头衔，你是那么个大人物的时候，我对从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我给你写了信，让你来看看我。当时只不过那样说说而已，我知道你是不会来的。有时候，就象又回到了过去，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认识的人们，又都一样一样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两年前，我撒谎说我病了。当时你表现得那么冷淡，毫无反应，你讨厌我，或者说瞧不起我。我最后一次叫你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就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不只是我现在对你讲的这些，不管你会怎样对待我。那时候我就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我还不愿放弃我的美貌和青春……”

“我对你什么坏意思都没有过，”克里斯蒂安连忙解释说，“你还留恋过去，而我却不愿意去想它，这正是因为对于我没做到的一切，找不到合适的解释。我把自己的锚抛向遥远的未来，而且两只手紧紧把在上面……”

“但最远的未来是死，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克里斯蒂娜说道。

“当然，但是在一直到达那儿的路上，我都按照自己的计划作了标记。时间过得是这样快，这样单调，这样容易混淆不清，只有靠我的计划才能看得出颜色。”

“比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说，我生活过来的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并不是一场梦，或者随你怎么说……但是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钟点，星期，年月，有意义的只有季节。我盼望冬天快点过去，是因为可怜那些动物。等待着夏天是因为它会带来雨水……冬天，那些狼简直让人伤透脑筋，它们一刻也不肯安静，撕闹，蹦跳，想要跑出去。那时候，我担心那些鸟，在邻居那里替它们做了窝，又怕它们在那儿不习惯。在这儿，整天是钟点，规则，弄得我简直没办法。而在那边，没有别的兴趣，只感到需要发现点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知道我一生一直在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象我这样的年龄，追求的又可能是什么呢？当我感觉这么疲倦，这么精疲力尽的时候，还能追求什么呢？你没有过这种坐立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感觉吗？”

教授用一种伤感的眼光看着她说道：

“假如你知道了我经历的事情，你就会没兴趣到这儿来了吗？”他有意识地改换了话题。

“这我没有认真考虑过，”她承认道，“过几天我再告诉你。”

教授急忙看了看表，吃惊道：

“糟糕，又晚了。老是这么爱忘事。对不起，克里斯塔，我还会来看你的。”

“非常感谢。”她激动地说道。她告别时的微笑，又使教授脑子里闪过那个美丽的但是十分遥远的面影。对于她的诚恳，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些难为情，但对她讲话时的坦率又觉得有些羡慕。

“在村子里，我去买煤油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年轻人跟在我后边喊什么吗？”她又加了一句。

“太太克里斯蒂娜，

家里猪油变味啦……”

她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教授已经走到走廊上，因为离得远了，没有听见。他不愿再听到她的话，仿佛对他自己那时的感情，对自己的恼怒和痛苦，感到羞愧。而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逐渐变得淡漠，变得可笑。“有些行动，有些事情，用不着语言，不必用话表达出来。是的，是这样。对于她的话，我没有任何补充，我同她之间一些心照不宣的细节，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不，不是合适的时机，这一切好象并不是被她过去的经历弄脏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说出来……多么辛辣的讽刺：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真实面目死去，而不得不把美的东西，用语言涂上一层污垢。”一时，一种莫名其妙的寒意攫住了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冷战，企图摆脱开羞愧夹杂着痛苦的感觉：从她现在的相貌，他看到了自己。身体渐渐地枯槁了，生

命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失去，越来越靠近另外的一个时空。“身体美失去了——但却留下了智慧，这是日历上写的警句。最好是没有……科学应该不使你碰壁碰得这样重，不使你跌进所有的、而只是那些无法避免的陷坑。科学应该让你看到自己怎样慢慢耗尽，在它面前，你应该发觉自己是如何渺小，自己的知识是如何的局限。”

他下意识地开开了办公室的门，顺手拿起一只酒瓶，贪婪地喝了起来。孤独感象一股寒气，与热流同时浸入了他的肌体。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打字员已经把他新编写的《外科学》的几个章节打好送来。他并不想去校阅，也无意动手整理已经推迟许久的关于癌症的专论。材料、插图他都已收集齐全，图片也都理好了顺序，但他却无法开始。尽管这里包括了他长期积累的经验，但他却感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想要的是药，是抗癌片，其余的一切，无非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空话。书只不过是空头许诺的代替品，就如同那些让人听腻了的应允的诺言。不过又多了一本书，仅此而已。而他写这本书，更多是为了安德烈。但化验工作却进展缓慢，化验员弄不到材料来同时进行几种组合的试验。除此之外，他也不能拿出这么多动物作试验，而且也没精力去跟别的教授讨价还价，求他们借给一些仪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斯皮尔曼是乐观的：因为看到一些动物身上的肿瘤开始消退，而另外一些则毫无变化。殊不知他忘记了最后几次试验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而比例数字并没有什么增长。

他听到有敲门声，却并不急于去开：不管是谁，来得也都太迟了。对他来说，困惑的时刻已经过去，刚刚开始感到舒心如意，飘飘然，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再能引起心理的反响。出乎意料，来的并不是他急切等待的薇拉，而是考德里亚努。衣着讲究、兴致勃勃的考德里亚努，一进门便先祝贺克里斯蒂安的讲课。而克里斯蒂安是直到课快结束的时候，在第三排椅子上，在弗洛拉副教授旁边发现他的。那时，克里斯蒂安本想向他打招呼，让他明白自己看见了他，而且照理在这之后应该把他请到办公室，但由于讲话的激动情绪，竟忘掉了这一切。现在，克里斯蒂安本打算向他道歉，但见他那情绪饱满、高高兴兴的样子，却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有什么值得好提的？”克里斯蒂安说道，“他们知道，考试的时候我不会要求这些的，是些进不了大纲的东西。除此之外，我觉得倒有必要提醒你，你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期待的是诚恳，道义，谅解，或者说对于世界的某种看法。他们需要的是奋斗，他们还在成长，他们需要真理。而我呢，是个孤独的人，有时候也需要解脱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失掉的，也并不想得到什么。”他最后无意说出的几句话，事实上是对考德里亚努那天晚上建议的回答。他知道，考德里亚努正是为这个来的。如今已是弄得满城风雨，人们都在纷纷猜测：克里斯蒂安，克列楚，还是某某人？直到那时，是肯定还是否定，一直会两边摇摆，每一种选择，都能找出足够的解释理由。而现在出乎考德里

亚努意想的却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回答。

“克列楚到处散布对你的坏话，作为回答，我认为您已经开始了反击！今天的讲课，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遗憾的是不得不让你失望。那天晚上的事我考虑了很久，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我才作了决定。我拒绝了，我觉得这样是做对了……只不过对你，感到有些抱歉。”克里斯蒂安尽量显出有礼貌的样子。事实上他并没说谎，考德里亚努给他的印象并不坏，也许正是由于不少人讨厌这个人。克里斯蒂安并不怀疑对方的诚意，但不管怎样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需要同他共同承担的义务。

“也许等到快六十岁的时候，我也有权把时间用于一种爱好。荒唐，自私，随你怎么说。但这对我来说是合适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耗费自己的精力，没有，这一章已经完全结束了。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极力在自己身上寻找无法从别处得到的东西。”

“您说得不错，不过问题并不是那么绝对。谁也没想让您放弃科学，恰恰相反，甚至在经费方面，也会尽力给您帮助。进行科学研究是要化钱的，而经验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所有当领导的，都这样做了。您得到的不过是完全应该得的那一部分。您完全有权这样做……”

“不，”克里斯蒂安打断他道，“权力和专心搞事业完全是两码事。这儿，在实验室，没有什么讨价还价。外来的干预，各种口号，在已经被证明为真理的事实面前是毫无用处的。”

"但真理需要靠钱去发现它。"考德里亚努又强调说，

"感谢你的好意，但我还是坚持，不要把我拖进去。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学者，并不会自然而然是个好的学院院长，不能下这个保证。对于做人的工作，调配安排他们，评判是非，我没这个兴趣。如果说，随便这么设想，一切完完全全都由我来决定，那倒可以再考虑考虑。"克里斯蒂安的口气并不是特别坚决。他看得出，谈话无非是重复过去的内容。问话也好，答话也好，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只不过考德里亚努显得更急迫，而且透露出一种掩饰得十分巧妙的不满。他有些急不可耐了，已经不象原先那么自信。

"很遗憾，"考德里亚努说道，"克列楚并不这样考虑，他到处说您的坏话。你们在实验室的谈话，已经尽人皆知！"

"这完全是他的事，"克里斯蒂安强忍住愤怒回答道，"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不是我们两个，也不是克列楚，我们什么也决定不了，这样白白浪费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让我感到奇怪的倒是，别人总是比我自己更清楚我该怎么做。不管怎么说，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是喝上一杯酒，那样你会觉得世界更干净些，时间也会过得更慢些……我们自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什么也不是。克列楚，我是不会找到他头上的。"

考德里亚努满心不高兴地听他说：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讲课时的那股劲头还没平息，还要在这儿继续阐

明他没有完全明确的观点。考德里亚努注视着他的两只手，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看看是否干净的样子，举杯子的姿势，活象一个机器人在取出一种放射性的物质。这与他一反常态不顾用词是否讲究的说话，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他觉得克里斯蒂安是一个不可捉摸、难以对付的人物，对他总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怎样才能触到他的过敏神经。以前，在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当中，考德里亚努曾经恭维地称呼他"院士同志"，不料他却突然发起火来："为什么你不叫我工会委员同志？这不是个更广泛、有着几百万会员的组织吗？这样我会更感到高兴，更感到光荣。"现在的这次讲课，按照计划应该讲胃部外科手术。考德里亚努来听课，是抱着一箭双鹏的目的：克里斯蒂安的课上，通常总少不了要讲一讲最新消息；另一方面，课后同他的谈话再也不容推迟了。克列楚已经赢得了地盘，而克里斯蒂安却显得丝毫也无意竞争。如果现在再不推进刺激一下，自己的希望就有可能落空。"亲——爱的考德里亚努，"多尔奈什蒂拉着长长的舌颤音对他说，"如果你不想办法坚持，这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到头来历届院长的肖像，就不会有你的了！"

助教们已经把图片挂好，幻灯机也带来了。但克里斯蒂安教授看了看教室，同杜米特列斯库大夫交换了几句，却开始谈起别的来：

"关于胃部手术，我已经讲过不下好几百次，把你们能在讲义上找到的东西再在这儿重复一遍，对我来说当然

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关于人，关于人的精神需要，医生的道德、尊严和真理，就我所能感到的这一切，近六年以来，我这将是第一次谈到。有些人去找精神分析学家，虔诚的教徒们靠向上帝忏悔，而我们呢？那就让我们把心里想的都原原本本、毫不隐讳也不转弯抹角地互相谈出来吧！我已经上了年岁，我决定从我自己开始做起，但是……”

考德里亚努无法否认，自己也喜欢听，也给他鼓了掌，而且对他能够主宰听众的能力感到羡慕。但使考德里亚努无法理解的是，在他自己的课上，他用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离题发挥，为什么却得不到预想的结果呢？为什么人们不相信他呢？他仔细研究了克里斯蒂安教授的姿势，语调，不得不承认，教授能够准确无误地控制自己，甚至一次也没提高过嗓音，比同他现在面对面坐在一起还要显得平静得多，真象谣传的那样生病了吗？还是象副教授弗洛拉说的那样：“他对什么都已经无所谓，常常忘记眼前站的是谁，或者自己是干什么。看起来他到教堂去做神父会来得更合适些。”当然，弗洛拉对教授没什么好感，但他说的这些也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

“您尽可以否定他一千次，”考德里亚努坚持说，“只有您无所谓的样子才能帮克列楚的忙。您怎么能这么轻易就退出呢？”

“如果他再这样说，我就到法院去告他，而且请你去作证人。”克里斯蒂安十分认真地说。

“我很敬佩您，”考德里亚努笑道，“您真有点罗曼蒂

克的味道，就象古代骑士那样地看待格斗、胜利和失败。”

“我真想让你看看病人。自从我妻子死了以后，癌症告诉了我许多许多事情。这些病人会说服你……一个四个孩子的妈妈，那边一位医生，再过去，三个年轻的工程师……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值得白白浪费时间吗？”

“对，一点也不错。只不过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进行不了研究，被迫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放弃科学的人来说，这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比例。昨天我碰到了塞尔布大夫，他在病毒学方面有出色的成就。他向克列楚抱怨说，他需要一些器械，克列楚对他说：‘你在这儿嚷嚷有什么用！如果你想让自己满意的话，到医院去，照看病人去吧！’克列楚根本不懂人们需要什么。相反，您却能帮助这些人，因为您热爱研究事业。”

“他们应该去找党组织，谁不让他们去讲呢？不管怎样，我的这点热情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假如我还能活一千年，我倒觉得有义务去作各种各样的探索试验，而现在……”

考德里亚努没有立刻回答，每次他都要撞在克里斯蒂安这面顽固的墙上，但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并不示弱。克列楚要容易对付得多，而对克里斯蒂安，一定得想出点新鲜花样。克里斯蒂安有自己的声望，著作，研究。跟克列楚人们已经习惯了，尽管还不能算一个糟糕的组织者，但年轻人也需要机会，时间不等人。但现在，看来坚持也是没用，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端起杯，慢慢喝着，而克里斯蒂安却在微笑：他记起劝波赞戒酒时波赞说的话：“我是研究公

共卫生学的，我可以以公共卫生学专家的身份告诉你，我们周围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受到了污染：水、花、房屋、街道、人、塑像等等。我自己也受了污染。不管什么形式的污染，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让我感到恶心，而酒却恰恰能治这种恶心。”

“我为你的退出感到遗憾。”考德里亚努准备要走。

“不，我只不过改变了射击的方向。我从来也没有真正退出过，我不得不时常把研究停下来，这就是证明。”

考德里亚努刚走，教授便一下子半躺进扶手椅里，两条腿伸到桌子上，就这样呆了好久。也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倒很心安理得。可能是因为讲课的时候他尽力想讨安德烈的喜欢，也可能因为他一边讲话一边心里断言，他的所有理想，都是这样有活力。“只不过年龄……”

阳光渐渐消失了，周围的一切似乎变得通红，而气压显得那样低，那样沉重，就象夏季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他忽然发觉考德里亚努在他身旁：“他不是刚才已经走了吗？”他这样自问着。他们仿佛在一种黄色的发黏的液体里向前走着，一边绕过不断变换颜色的古怪碉堡。开始是红色，接着成了棕色，最后竟慢慢变成黑色。他觉得脚下打滑，不断地喘着粗气。液体变得越来越黏稠，简直拔不动腿。碉堡群越长越高，竟弄得他找不到路，而且变换了的颜色，也搞得他头晕目眩。而考德里亚努却沉着地、轻松地在背后推着他，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应该有个出口，”他对考德里亚努说道，“这块地方我好象很熟。”而考德里

亚努却脱掉衣服，坐在碉堡群中间不知为什么会出现的一个泥坑里。考德里亚努笑着，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这时，克里斯蒂安教授抛开他，继续往前走，直到撞上一堵坚硬的墙。奇怪的是液体却照旧能够毫无阻碍地穿过墙去。“也许应该向后退。”他心里想道。但向后又艰难地走了一段路之后，眼前依旧是一堵相仿佛的墙。“也许还是应该向前走……”他一边想着，一边大声喊道：“上帝啊，难道你不明白这是恶性增生吗？”考德里亚努仍然毫不在意地笑着，一边用手对他指一指细胞壁。他接着说道：“你不明白吗？我是专家，是真的，这儿是癌细胞的内部，我熟悉它的颜色和结构：瞧，这是细胞核，这方面我是内行。”“不，根本不是，”考德里亚努说道，“只要我在这儿，完全不可能是这样，这种情况可以完全排除。”他感到绝望，于是企图弄破墙壁，一边大声喊道：“你不明白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吗？”那种深色的液体，慢慢涨高起来，没了脚踝，大腿，腰，直到身体一点也动弹不得。而那些奇怪的满身斑点的碉堡群，却不停地增生，跳动，紧紧抵着那堵墙壁。“也许靠它能够得救。”他鼓舞自己道。但他想到呆的地方，知道只能到下一个细胞，而后再到另外一个，一直到无穷无尽。“药，应该是试验它效用的时候了。”他这样想着，不觉睁开了眼睛。脑子里还留着最后一个影像：考德里亚努轻松地往前走，一边向他做手势让他跟上，而他自己还在高声喊叫：“难道你不明白吗？”

他听到一阵敲门声，这才如释重负，立刻跳起来，去

开门。是阿纳尼亚。

“对不起,”他道歉说,“我已经敲了好久了，没有别的办法。让您一个钟头以后去开会。我没能想出办法对付。您不舒服吗？您出汗了,连罩衫都湿了。要不要叫人来？”

“不，用不着,”教授说,“我感觉好极了。你想象不到吧，这次我要去。”

“给您煮杯咖啡吗？”

“好，煮一杯吧，今天我还没怎么喝呢。”

实验员走后，他用力挤了挤两只眼皮，突然眼前出现一队士兵，排列整齐地在尘土中向前行进，而他自己，在队伍后边，坐在一辆救护车里，心里知道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每次到了紧急时刻，生死关头，就要我出头解决。我是在后边，比较平静的地方，但有了危险还是需要我。命运真是反复无常！一二一,一二一……步伐,泥泞,尘土，积雪，白天，黑夜。只有向前，仿佛被伤痛的呻吟推动着，一直向前，无法脱开这一致的节奏。奇怪的是，当他力图忘掉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行军中一直重复的口令声，却越发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

十 四

本年四月五日，星期六

今天我在走廊上碰到了克里斯蒂安教授同志。他看见我,三步两步走到我跟前,当着许多医务人员和病人的面,

对我进行了百般呵斥。

“喂，卡纳里斯，”他对我嚷道，“如果再让我抓到你多管职责以外的闲事，你就甭想再在我的医院呆下去！”

“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很清楚，而且一直在尽心地完成，”我回答他说，“可您自己上别人的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放聪明点，不听我的没你的好处。”他这样威胁我，但我并不示弱，于是回击他说：

“您这样平白无故在这儿当众批评我，您应该对我的名誉损失负责。”

“如果我告诉你批评你的原因，那么，那就是你在这个医院最后听到的几句话。以后请你不要再对病人发表什么评论意见，而且，照规矩你应该老老实实呆在自己那儿。”

他不容我申辩，气呼呼地走了。他一直是这样蛮横行事，正象医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位女主任形容旧时军队里的长官那样：“跟我说话的时候，要闭上你的嘴。”但我心里悄悄地说：你不用这样神气，要是你知道你儿子的内衣、袜子还有别的赃证都在我这儿——这都是用现钱买来的，而且交给我这些东西的人，随时都可以对你儿子的强奸罪，对你的家教不严罪起诉——管保有你好看的！我可以肯定，这个实验员阿纳尼亚同志，这个笨蛋和奴仆，一定记住了这件事。我要想办法把他弄到个生地方，好好整他一顿。后来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正送一具尸体去作解剖。他看见我，停下车，倒先冲我开了腔：

“喂，怎么样，你这条鼹鼠？”他出言不逊道。我没有别的招数，只好吓唬了他几句。他说我简直太笨，鼹鼠不是骂人的话，是米哈依大公用的词。但我对他说，不管怎样，他是个傻瓜。他听了之后，竟要用死尸往我身上丢，可见对死去的人他也毫无尊敬可言。我不屑于同他一般见识，便结束了这场谈话。他请我去喝杯啤酒，我不能受他的贿赂，落下把柄，讲好我自己付钱，并且约定以后要把事情彻底谈清楚。看起来他是有点害怕了。这次成功又给我增加了勇气，于是我又去找弗尔卡舒同志，就是跟克里斯蒂安同志讲外国话的那个女同志。我请她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下，认识这位教授同志的。她对我态度特别好。她告诉了我这些之后，说我是个性感男人，并且说一个星期以后，等她做完脾切除手术，再请我找她，到那时，她要把一切都告诉我。

请看她说的部分内容：她说小时候就认识克里斯蒂安同志，跟他是中学同学，那时候他就企图强奸她。难怪他儿子也有这样的恶习。在柏林的时候，她跟他关系密切，那时候他学医，她在德国一个军队学校里进修法文。在这儿，克里斯蒂安同志搞上了一个希腊女人，贝娜洛芭，她在那儿有一座针织工厂。后来又跟一个意大利女人鬼混，这个女人就跟阿纳尼亚同志一样，动不动就张嘴骂人。她忌妬心强，把教授从另外那个女人那里硬夺了过来。后来另外那个女人又搞上了个希腊人，名字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个干船运的，很久以前演过的一部描写奴隶制时期

故事的美国电影的主角，好象就是这个名字。最后事情怎么结束的，她也不知道。但后来教授到了伦敦，从那儿又到美国去了，在美国他看到了人们怎样在准备战争。在这之后他就回国了，但是被医院开除了。后来他志愿去前线，在那儿也是搞特务活动，不知道替谁搞，但这并不难猜到。后来的那些匪徒集团，我曾经同他们进行过斗争，而他却帮助了他们。我们结束谈话的时候，她提了几个问题，请我好好考虑。“为什么他几次三番到国外？是谁叫他去的，什么目的？为什么能隐藏得这么巧妙？为什么在这儿同谁都不来往？为什么恰恰对于癌症，这个全世界都瞩目的问题，这么感兴趣？他同那个希腊女人生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去看儿子呢？他的这个儿子在哪儿工作？干什么工作？教授走运的是，”这位女同志说道，“上边有人支持他，不然他早就下来了。”但上边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以致使得克里斯蒂安同志如此有恃无恐，如此放肆地呵斥别人，而且把医院的工作人员，其中还包括几个行为端正坚持真理的同志，都变成了他的奴仆？

我急切地等待着下一个星期。这期间我又发现了几条新闻。克里斯蒂安同志已经好久没有同班奈德斯卡同志幽会了。这位女同志倒看不出有什么，而他却显得垂头丧气。结论有可能是班奈德斯卡决定甩掉这个老头子，或者她同另外的跟她年龄相当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于是他决定放弃她。我没能打听出有什么反应。萨乌大夫同志对我说，他没给他们举蜡烛，他们哪怕一天做爱三次，

也不关他的事，他从来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持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不会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这是从谁那儿学来的呢？约尔卡大夫同志说道："我说小伙子，我还想从教授那儿学点东西，他在外科方面那是没话说的，他的一双手简直可以起死回生。但是在女人方面，我用不着跟任何人学，我自己满能对付，所以说，这种事不关我什么。我们自己还有更需要关心的事，因此用不着替别人瞎操心。"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的意见，从来是使我感兴趣的，因为他同教授最接近。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讲笑话："市场上有个壮壮实实的农民，手里拿着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口袋，在头顶上抡来抡去。有人看见了就问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说是老鼠。那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要把它们转晕。"再往下我没听清，也没弄明白，但克里尚大夫说，讲得很成功，别的人也都张着大嘴傻笑起来。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又说道："你们听另外一个故事：城里发现了一幅不知多少年以前的圣像，一些美国人想要把它买下来。可我们的神父呢，不知道该要多少钱。卖嘛还是要卖的……"我没兴趣继续呆下去，这些人老是喜欢讲这些东西。于是我又去找尼古拉大夫。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知道他对事情是持一种批评眼光。"这些人嘛，在爱情方面都有严格的计划，不是说找到谁就是谁。"约内斯库同志对我说，要是她听到什么，就马上告诉我。但她说这是一对拆不散的鸳鸯，两个人刚好对路。情况就是这样，难道还需要让整个医院来谈论他们吗？最后，我只问了普洛丹大夫同志

的意见，他说道："我没……没什么特别的看法。教授还年轻，精力充沛，班奈德斯卡嘛，更是正爱打扮的年纪。不开会的时候，我们无非都是干这些事。"

在走廊上我又遇到了阿纳尼亚，他牵着一条狗。我以为他会放狗过来咬我，但他并没有马上这样做，相反，却友好地冲我笑了笑：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对我说道，"听了这个消息管保你会高兴得去上吊。我听说教授决定调一部分人到农村分院去，这儿的人事编制太大了。"接着他说他要在教授跟前替我说句好话，让教授把我派到瓦列地区的勒赫采依去当实验员，到那儿换换脑筋。"在那儿要是不能讨领导的喜欢，就是你是科学院院士，也要被整得忘记自己姓什么。一个月以后我去看你，给你打打气。"

我是会服从工作需要的，我还从来没拒绝过交给我的任务。但是我在这儿已经建立了小家庭，如果不是指名让谁去的话，我当然很想留下。

"你替我说去吧，不过我也有条消息告诉你，听了管保让你也站不牢。你还以为我整天在睡大觉吗？我已经收集了一些关于你的材料，你不过是别人用来擦××的一块破布。关于我们这位尊贵的可爱的领导，我手头更有材料。我可以去瓦列地区的勒赫采依，而你们两个呢？顶走运也不过是到精神病院。"

"凭你就能够毁掉一个大科学家吗？"他问道。

"他发现的那点东西，我也发现了。"我回答说。"退

一步说，过去的错误姑且可以原谅，但现在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才要把你弄走。”他大声嚷嚷着，接下去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而我提醒他关于教授儿子的事，顿时，他象只蜗牛似的不言语了。后来他说，如果我把衣服交给他，他可以原谅我。不过我只对他说了衬衣，而袜子、三角裤还有那份证词，等过了这道难关，到适当的时机再抛出来。他让我明天就把东西给他送去，因为明天教授不在。瞧，我把我的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也整治服帖了。

我还发现，今天系办公室开了会，教授也参加了。看得出，群众舆论的压力有时也会迫使他走上正路。从尼古拉同志那儿我了解到，他好象是发了言。然后我又问了奥泰斯库教授同志的实验员。他说他的领导好象是这样说的：“克里斯蒂安已经陷进坑里一只脚。他严厉地批评了所有的事。由此可见考德里亚努教授已经掌握住了他。几个月之内他就会被整垮，留下的只不过是一段回忆而已。这样一来年轻人就可以放心大胆了……可怜的克里斯，一生一直是这么天真！”对此我倒有不同看法：不是天真，而是虚伪，是象过去那些年月里有过的招摇撞骗。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看看周围就知道他是什么人：阿纳尼亚——骗子，恶棍；杜米特列斯库同志——对现实不满牢骚满腹的一个阶级敌人；约尔卡大夫同志——精神不正常；安德烈同志，他的儿子——白痴，未成年的腐化分子。教授的朋友当中唯一行为端正、头脑清醒的人，是考德里亚努教授。只有考德里亚努教授的健康思想，才能给他指出正确

的道路。我漏掉了班奈德斯卡：她的行为证明她道德败坏，恬不知耻，而且她还同一个暂时不知道姓名的同志一起欺骗他。那么，他的岳父岳母呢？据称这位同志出身农民家庭，实在是大可怀疑。最后，我给自己制定了如下的工作计划：

一、同阿纳尼亚同志交朋友。交出衬衫。

二、搜集讲课的录音带。

三、同弗尔卡舒同志谈话。证词。

四、同雷德曼同志，同上。

五、同考德里亚努同志的实验员同志谈话。

六、同克里斯蒂安同志的女秘书交朋友。

七、大夫们都在想些什么，在教授的影响下，医院的正常气氛怎样遭到了破坏。

八、了解同班奈德斯卡一起欺骗克里斯蒂安同志的是谁，为什么。

九、了解受伤工人情况，他们的经理把用来修公路的柏油卖给了一些公民和一个神父。

十、与伊丽娜同志接触，了解有关安德烈的补充材料。

十一、与本计划同时进行的日常活动，譬如，了解考德里亚努同志在有关克里斯蒂安同志问题上，有些什么计划打算。

今天，我不得不在全家面前作自我批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对家庭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有些忽略。为弥补这一点，我们读了报纸，讨论了时事新闻，并且一起听了

几张我们优美民间乐曲的唱片。在这之后，同我的岳母进行了一场争论，她坚持相信超自然力量的观点。的确，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时代遗留下来的，但对它绝不可以轻视，因为这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我给他们解释，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只有大自然。我不许老太婆再进行这样的教育和迷信宣传。作为抗议行为，她拿自己的退休金捐给了神父，请神父做祷告，求上帝惩罚我，让我遭雷劈或者被汽车轧死。雷劈我并不害怕，因为到处都有避雷针，而且有雷雨的时候我从来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但对于汽车，我确实有点怕，因为最近几年的汽车数量增加很快，比特什蒂汽车厂老是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有些开车的，往往酒后驾驶，如果万一，上帝保佑，我出了事，他们会以为祷告应了验，而我的孩子们就会把迷信当真，我以前对他们进行的种种教育，就都算白费了。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已经没了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有兄弟姊妹，唯一亲近的，只有真理和使人们精神完美，摆脱虚伪和异端邪说的影响而健康成长的兴趣。对老太婆的行为，我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她在家里咒骂、吵闹还嫌不够，竟闹到院子里，当着全楼的人，骂我是异教徒、混蛋、蠢驴和一些其他类似的话。这样一来，甚至弄得那些爱惹是生非的邻居也一齐反对我。我想说明的是，这才是我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源，而不是象那些站在老太婆一边的同志们说的那样。我当时还是比较克制的，而老太婆吃饭的时候竟走过来公然往我碗里吐了一口唾沫，而且当着全家吼叫着骂

了许多难听的话。我的隔壁邻居名叫伊里耶什的女同志对我嚷道："喂，我说你这个希特勒，干吗欺侮可怜的老太婆？"我可以断言，她也是相信迷信的。每次到我们这儿来，总要摸纸牌算命，而且大骂市里的管理工作。她还用纸牌给我算了一卦，说我将有灾祸降临，将要发配边疆。如果万一阿纳尼亚说的调我去农村的事成了事实，那将是一件极不愉快的巧合，它将给我对家庭进行科学教育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

同样，二十八号姓迈泽依的女同志冲我高喊："流氓，无赖！"我敢说，每天当她的丈夫迈泽依同志四点钟起床去上班以后，这位迈泽依娜同志，八点钟便扎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那儿是各色流氓无赖经常去的地方。我爱人掌握关于她的全部材料。我爱人告诉我说，她千方百计想要个孩子，因为她丈夫一天到晚忙工作，没功夫跟她呆在一起，而且一回家总是吵吵闹闹，摔摔打打，有一次甚至把她从楼梯上掼了下来。因为他在她手提包里找止痛片的时候，竟发现了一双连裤袜。

隔壁楼门的奇普里安同志也骂了我。我早就认识这位同志，他已经退休，每天排队去买食糖，然后再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倒卖。有一次他排队排在我前边，对我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数字，美国在欧洲的火箭、军舰有多少，你能够很快知道。可是要想从商店主任那儿打听到三个钟头以后卖什么东西，却比这要难得多。"

三门三十六号的约尔古同志骂我是野蛮人，恐怖分

子。此人想要到扎伊尔去当数学教师，天天走门子求人情。但是如果他更聪明一些的话，应该管住他姘头的那张嘴，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以及他怎样向三十七号的格隆杜，他的朋友，申述理由的。我还掌握他净说些什么样的笑话和矛头指向谁的材料。类似的笑话，我只有从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的嘴里才听到过。

无论如何，我发觉应当加强家庭教育工作。但克里斯蒂安教授同志，难道不也应该同样这样做吗？很长时间以来，他沉默不语，只关心他个人的私人利益，而且还把这种不幸的影响加到少数一伙人身上。现在，他开始对公众讲话了，骂人，到处诽谤。“我现在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自由，”开过系办公室的会之后，他对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这样说。“从来我没感到这么自由过，这样自信过。自己能够意识到、体会到这种自由，那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我也相信，我们这儿有多方面的自由，无数的人正是为此作出了牺牲，工人阶级也正是为此进行过斗争。但难道他不是又在说谎吗？一直到现在，他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现在才刚刚发现这个早已具有的现实呢？我认为他又是在欺骗公众舆论。

我差一点忘记：约尔卡大夫说，他从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看到，缺乏坚强意志的肥胖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减肥：辱骂警察。等把你送进法院，坐上几个月的牢，再出来的时候，身段就苗条了。但这位同志，最好还是别收人家的小费，这样自然就会瘦下来，也用不着去辱骂我们社

会秩序的保卫者了。

十五

过去吗？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着一种惧怕或者羞愧的心情去回顾它，尽管你，安德烈，有这样的印象。很久以前我详详细细地分析过它，因为那时候我有时间。尽管对有些行为，对某些摇摆和幼稚，我可以谴责自己，但我并不为它感到羞愧，也没有理由去隐瞒，不管舆论或者可能的意见是怎样。今天，我不喜欢再重提往事，我承认这一点，但这是因为我的性格，为了这些年里我曾经遭受的痛苦。我已经知道面前还有大约多长时间，而且，也看得到那些实现不了因而不得不放弃的计划。当时间对我来说仍然充裕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呢？于是又是恼怒，而这种恼怒不但无助于任何事情，相反，只会招致更大的痛苦和损失！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我并不想改变你，并不想影响你的心理成长。你可能会这样设想，我的目标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不管有什么障碍，我也要使你理解，你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正是准备以此作为自己未实现计划的辩解词。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但问题并不在此。我还有一个理由：眼睛只盯着过去，就有看不到现在，特别是看不到将来的危险。无休止地谴责过去的错误，就有可能忽略今天正在犯和将要犯的错误。只要人们仍然处在不同的进化发展阶段，只要还存在着蠢人，智力

不健全的人，只要还存在着贪心不止的欲望和仇恨，错误是不会消失的。也许错误不会分毫不差地重现，但它可以变成另外的形式，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可能的。那些不甘与众为伍的人，那些超过需要希图更多地进食、更多地繁殖的人，是不愿意同上述的一类人进行接触的。没有面包，没有书本，一个人，即使是自由的，也只能算作一只普通的动物，或者极为凶恶，或者极为驯顺，这取决于情况的不同。但无论如何，除了用两脚走路，除了能开口讲话，其他很少再具有人类本质的特点。心理的死亡，是不知不觉的，一经发生，有时甚至永远不会复活。

我曾经在雕凿石块：我要在一片荒野上，在几乎把人烤焦的炽热的阳光下，建造一条路。如果说过去为了一小块天空我可以献出可能献的一切，那么现在我却害怕把疲惫病弱的目光从地面上抬开。我感到身体这样的虚弱，眼前恍恍惚惚，金星乱舞，一阵阵头昏目眩。从龟裂的大地上，冒出带着呛人味道的热气——不但烧灼着我们的双脚，而且也烤热了那些不知从什么洞里钻出来的动物——简直让你难受得象死期临近。为了坚持下去，你需要食物和水。如果说水还可以勉强找得到，不管多么恶浊，那么食物，逐渐便只意味着那些还能跑动的活物。保存自身的意识，如果失去控制，会以最难于置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在战争中和在此之后积累起来的超过想象的丰富经验，使我能够甚至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动作背后感觉到它。但不幸的是有些软弱的人，没有适应能力、没有保存自身

意识的人，我只好眼见他们的身体慢慢肿大，一直肿到头部，肿到连他们自己也明白，时间只不过是按钟头，至多按天计算的境地。而我却想要活下去，经受过锻炼的意志，终于战胜了生命危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保持住了人类的优良品质，首先是尊严。通过时间的检验我发现，尊严也决定于生命自身：你越是坚强，越是不卑躬屈膝，那么连你的对手也会尊敬你。坚强的意志，应该从多方面得到证明：就连穿着装束也能够体现出自我的存在。精心地理一理那些褴褛不堪的衣服，刮一刮脸，尽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习惯，已经得到的东西决不作丝毫退让，这样甚至也会给自己增强信心。

好象是萧伯纳曾经这样说过：会做的——在做，不会做的——却在教别人。我极力使自己能够做，因为如果问一声“我自己有什么过错?”就象奥迪普①做的那样，那是毫无用处的。但这种痛苦的惶惑并不会就此消失，它象一股无情的冷风，钻进我的脊背，我尽力想不理会它，摆脱它，如果不能把它驱入记忆或者未来，那么就让自己陷入无数的琐事之中，把日常生活切割成千百个碎段，不给失望、怯懦留下任何空隙，因为这些东西时常是无孔不入的。我的周围便不乏这样的例子。

我担心自己会忘事，会荒疏业务，于是，跟其他人一

① 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因卜师卜算出其父将死于亲生儿子之手，出生后即被其父丢弃山中。奥迪普长大后，因不认识亲生父母，将其父杀死，并与其母成亲。奥迪普了解真相后，将自己双眼剜出。

起作了一些难于置信的训练。而今天，记忆确实在捉弄我：有些想法，有些事情——肯定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走在大街上，我不由自主地向什么人打招呼，但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他，是否认识他——实际上我已习惯于记住人的脾性而不是面貌，这样我觉得更舒服些——但那时，为了一个句子，一段诗，一个题目，竟会耗费掉整天整天的时间。下边这两行博德莱尔[1]的诗，就费了我和赫里亚努整整四天的时间：

这是比两极还要荒凉的国度；

没有河流，没有绿草，没有森林，也没有动物！[2]

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那儿，在一条床单上编了一本罗一意词典。一位植物学家，在一块碎玻璃片上，做了一个肥皂切片，把它凉干，然后拿一根火柴，给我们讲起课来：给我们画植物图，画结构图。奇怪的是，一直并没介意的自然界的这一部分，却给我们增添了活力，给每个人的心灵里加上了一道惬意的绿色。拉戈维恰努教授，他的专业是历史学，但却对马有特殊的爱好。直到今天我还能够记起许多细节。从阿里昂，波赛顿和代迈特拉[3]的爱情结合而产下的第一匹马，一直到突内斯，根据卢克·昂德烈的说法，这是历史记载的最后一匹马，然后是桑托斯和巴里奥斯，这是替安其勒拉战车的两匹马，是另一段极

① 法国诗人（1821—1867），现代诗歌创始人之一。

② 这两行诗原文系法文。

③ 此处及以下提及的均系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角色。

有趣的吸引人的历史。拉戈维恰努激动地一会儿扮演朱诺娜，一会儿扮演安其勒，当然还有桑托斯。他举起一只小手指，奇怪的是他只用这只小手指做手势，用他沙哑的男高音感叹道："桑托斯和巴里奥斯啊，你们的主人对屠杀已经感到厌倦，把他再带回到希腊人那儿去吧！"①然后，他四脚着地学着马的样子："是的，当然是这样，狂躁的安其勒，趁你还精力充沛，我们将要把你带回去……"②接着又轮到布切法尔，同菲力浦一样，他认为对于儿子和这匹马来讲，马其顿实在是太小了，于是便想在亚洲，非洲或者欧洲另外寻找一个王国，"当之无愧，我的儿子"③。他对自己还能保持完好的记忆力感到高兴，说话中间不断夹杂着一些法语，这倒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显露本领，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懂几种语言，而是因为他在索波那④结束了学业后，直到现在还能准确地引用一些段落，这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们一听到牢房门上的钥匙转动声，讲课便立刻中断，一个个面向墙壁，举起双手。然后便是铐手铐的响声，脚步声，牢房门的撞击声，接着又是脚步声。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带回来的，当他在我们怀里苏醒之后，也只有他能够准确地接着上一次的课讲，当然声音已经是有气无力，几乎刚刚能听到，而且句子的间歇也比原来长得多了。"'安静，音其达杜斯在安睡。'一位神父说道，'透过他的眼睛，能

①②③ 原文系法文。

④ 原为巴黎培养高级教士的学校，后并入巴黎大学。

够看到藏在地窖里的臣民们的不安心情，生怕惊醒这位不同寻常的执政官。'接着是埃尔·鲍拉克，这是大天使戈布里尔献给穆罕默德本人的圣兽。然后是维郎蒂夫，罗兰的马，还有黑骥布兰克，它曾几次救了自己的主人——一七三五年间活跃在伦敦附近森林里的美男子，绿林强盗迪克·图尔宾。还有斯迪力，梯米特，扎格朗，索力曼，阿达尔斯，欧夫拉特，一匹匹拿破仑帝国时代他本人亲自骑过的白色骏马。而最后的那匹银灰马阿卡契亚，却让主人交了恶运。”拉戈维恰努所以被关到那儿去，是因为讲了今天所有课本上都写着的历史和音其达杜斯——这个尽管有四条腿却并不比那些两条腿更差的执政官。他是想以图因比①的方式回顾一下人类走过的曲折道路。他的哲学胃口惹得我们很开心。有一次我提到亚历山德拉城的克列曼斯，他说吉特人②把克列曼斯看成是已经升天的最高明的哲学家。“你这样说也是想要升天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听了立刻跳了起来，就好象我要夺他天上的位子似的。“可我不过是个可怜的赛马爱好者，大夫。我只是在卡里古拉的执政官们那儿没弄好。”自从没有了拉戈维恰努，历史也不再显得那么有意思了，我觉得它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但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于是我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削弱这些后果。赤道般的灼热使我无法再回忆起达特里山③上厚厚

① 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各自独立的文明构成了人类历史。

② 希腊人对原居住在罗马尼亚的民族达契亚人的称呼。

③ 波兰、捷克交界处的高山。

的积雪，以及使如此多的伤病员遭受过痛苦的严冬，以及一步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的浓雾。雾慢慢渗入到心里，脑子里，使头脑昏暗，喘不过气。一时间我浑身瑟缩发抖，就仿佛千万根针刺在我的周身。而后，疼痛慢慢减弱，感到一阵古怪的欢心，就象冻僵了的人那样，在原野上睡着了。那时候，我还有时间想到你们。我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的健康，我自己的忍受力，而是你们。我眼前开始映出一幕幕复杂的、痛苦的场景。从未想到过的名字，偶尔遇到过的面孔，会突然跳上记忆的屏幕。我不得不呆呆地自问："这究竟是谁呢？在我的一生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吗？"模糊不清的记忆，搜索净尽的生疏形象，在脑子里构成一组组古怪混乱的镜头，以致我很难理出头绪。但瓦尔拉姆，我却一刻也没忘记过，尽管他早就被列上了我的赦免名单。你向我提起了几个名字，毫无疑问，瓦尔拉姆是第一个……过去的屠户和拳击爱好者。实际上他并不是亲自掌刀的屠夫，以后我才了解到，他是宰牲时的祭司。高高的个子，尽管肌肉外边贴着一层薄薄的脂肪，但看起来身体满结实。圆圆的脸，有力的下颚和颧骨，绿色的无表情的小眼睛，两只手掌出奇的大，简直象铁铲一般。声音严厉而带讥讽，显示出极端的自信。在布莱尼亚手下，他闪电般地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出于小心谨慎，也或许是懒惰，布莱尼亚却保住了干净手脚，他一直是利用别人，利用盲目执行命令的人进行工作。同布莱尼亚谈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通常是一切都已经清楚，已经由瓦尔拉姆解决了。布莱尼亚新镶

了几颗纯金的门牙，牙做得太长，以致讲话时显得有很大妨碍。惊奇或者不解，他往往用拖长了声的“嗞”来表示，同时还加上几滴嘴角流下来的口水。他脖子不时一挺一挺的，简直象一只生了气的鹅。“嗞，先生，你打算考验一下我们的忍耐力吗？嗞，你还有什么话说？”然后便是一个长长的停顿，眼睛紧盯着你，一刻也不挪开。他那干瘦面孔上的表情，不由得使人想起汶特·斯图兹的名画受难耶稣的形象。我无法使他明白，他跟我谈无非是白白浪费时间。在这场无声的战斗中，我的武器仍然是无效的，看来他不愿意了解事实真相，而他想要的，我也无法弄清楚。交叉射来的强烈光线，迫使我闭紧眼睛，透过缝隙，我紧紧地打量着他，象在给他做X光透视：我甚至能看到他正在活动的脑细胞。我不由天真地自问：“天哪，难道由于误会，由于一次象我这样的误会，不也可能使脑细胞的联系发生巧合吗？”他胡乱地问我的朋友、亲戚、熟人，我对他讲的时候，尽管他不时重复着“嗞”，却显得完全心不在焉。然后，他把一叠照片丢到我面前，让我立刻说出这些人的名字，说出他们象谁，一直到我说不出，拒绝说。“你们保卫国家不是该防范我，或者是哪个知识分子。地下活动时期我就是共产党员了，而现在你们干不了别的，却要剥夺我的这个权利吗？你们应当再考虑考虑。”他并不回答，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然后翻了一下卷宗，又不自觉地重复着那个恼人的“嗞”。实际上，当瓦尔拉姆情绪正常的时候，当他不打开酒瓶或者不用男高音嚎叫的时候，他能够一丝不差地模仿这个布莱

尼亚：走路微微躬着腰，不断重复："我很——不满意，瓦尔拉姆同——志。"然后他便毫无顾忌地当着我们说布莱尼亚的坏话："这些白痴，我讲什么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就是把他们的舌头抻出一公里长，也还是说他们想说的，而这些好象都不关他的事。对这些调皮的家伙，我已经腻烦透了！'镇定，呦，瓦尔拉姆同——志，我们需要的是结果！'哼，让他到这个研究所试试，我倒要看看用这样的材料他怎么做煎鸡蛋！"当他抱怨上司的时候，你在场绝不会感到舒服的。瓦尔拉姆有一种天生的能力，他的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向上爬的欲望，能够促使他捕捉住最有利的时机。他自己能做的，却不允许别人也这样做。他没有亲近的朋友，只有为他服务或者他为之服务的人。不管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他都劲头十足。为了让别人承认什么，他可以不择手段。事实上，有这么两种类型的人：一种象瓦尔拉姆这样，干劲十足；另一种服服帖帖，随声附合。后一种人往往升得更快，因为他们对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表面上并不构成威胁。瓦尔拉姆从不知偷懒，他的成绩就象是把他从长期的嗜睡症中弄醒的兴奋剂，他需要这些，免得再重新入睡。在一次审问当中，显然使用了过分的手段，被审查人死去了。是个相当出名的人，好象是从前的一个上校。为了这件事，需要作一个书面报告，而我也莫名其妙地被任命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是谁作的选择。一天晚上，瓦尔拉姆找到我对我说道：

“我们两个，大目标差不多是一致的。你要的是人的健康，而我——社会的。现在，遗憾的是我比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这儿还有一大堆社会败类和骗子。职业要求得太严，因此有时候我们也会出点错儿。其实你跟我也一样，你的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事故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要做的，不过是一项简单的手续。你的同事总不会坑害你吧。是啊，我也碰上了这么一件事，运气不好，人身子骨太不结实。但是我要明确一点：对于他的罪过，你用不着怀疑。我想，他主要是因为害怕才死的。他知道按自己的罪过，判决不会太轻，也不会没有其他后果。我可以提醒你，委员会的其他人，都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心脏病突发。人死不能复生，而且也差不多已经到了时候，用不着为此感到不安。我们活着的人，总还要见面，而且肯定还会见面。至于将来在什么地方见面，是带着葡萄酒一块去打猎，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完全取决于你。你住过的地方，我清楚，你自己该知道那儿有多舒服。同样，你也别忘记你在法国、在奥地利的经历，而且还有那么一个岳父，我想这就用不着再多说了！”

“当然，”我回答他说，“但我当初是因为反法西斯才被关起来的，我骂了希特勒，我想，这些都有材料的。”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那又好了。我想，你自己也清楚，有些反法西斯者，怀着另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出于信念。”

“我是党员。如果我没有真诚信念，我会加入罗马尼亚工人党吗？我从来没做过违反自己意志的事。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考虑以后作出的第一个抉择，没有任何人强迫我。那么，所有的党证，不都是同样的颜色吗？”

“当然，问题提得合乎逻辑。但是敌人也往往利用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证件隐藏下来，这方面我是有足够的经验的。”

“反正真理在你手里，这样你永远也不会错。”

“我也同意这一点，不过真理并不是不能解释清楚的。”

“我们到现场去，一切都会弄明白。”我这样结束道，他不无用意地笑了笑说：

“是的，我懂了。但是我们的谈话，我不想让你在晚些时候才记起它，而不是在应该记起的时候。”

“我要对你说清楚，在报告里边我只写事实，是的，只写这个。因为只有它才能经得起以后的任何考验，更不要说良心也要求我们只能这样做。”

三个医生，两个说心肌梗死，而我却断定是外伤和骨折。这样我就处于不利局面。瓦西利乌和克列楚医生都保住了地位，我不管怎样企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都是白费力气。瓦西利乌仍然留在大学。克列楚被任命为另一个地区的主任医生，后来也到了系里。而我……

“你是想要找我的麻烦，大夫，”结案以后瓦尔拉姆对我说，“不久我会感谢你的。人们难免犯错误，最后你会相

信这一点。”

不难预料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但我没有别的选择。退让一步，接着就会来第二步，用不多久，一切便都不由自主了。但这儿我犯了个大错误：我没有了解受害者的详情，没有把材料要来，没有同当事者详谈，特别是没有报告瓦尔拉姆的上级。我应该写几份紧急抗议书，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坚持掘坟验尸。等我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候我想，这是一场如同跟风车打仗一样毫无意义的战斗。不知怎地，我觉得很轻易地便过来了，后来也就把事情忘记了。我感到反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其余的是别人的事情。而当你忘掉一个给你带来不幸的人，也就等于你自己同样被人忘记，当然瓦尔拉姆是个例外。不管当时我是怯懦，天真，还是有先见之明，事实总归是不容抹杀的：隐瞒一个人的死因，隐瞒一桩罪行，实际上等于参与了这一切。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不安。我怎样认为的，尽管照实说了，但并没有为保卫真理而坚持斗争。我发觉了这一点，对谁都没有宽恕，自己直到今天也还感到问心有愧。不管怎样，经过了那样不平常的、难忍的一夜——就象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我一直心神不安，焦急地等待着跟你们再见面：我还有你们，却为了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任性和执拗在遭罪。我明白，必要的时候，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事业，可以作出牺牲，而现在……布迪勒的事，原本不值得一提……由于战争，实验室的被破坏，几次搬迁，到处跑来跑去，实际上我已经无法再进行研究工

作。失去的时间一直使我不安，于是我逐渐减少了同人们的接触，减少了同朋友的来往，几乎整天整夜呆在病人中间，象发了疯似地做手术。我知道，涨潮总有落潮时，只不过猜不出究竟是什么时候。而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只有工作到精疲力尽，才能摆脱这种想法的折磨，心里才觉得稍微平静一些。从前线回来之后，我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不曾想到过的变化。为躲过死神而庆幸的情绪逐渐淡漠，退居到了第二位，而代之以一种迷茫，而后又变成疲惫。紧张的时刻需要还报，感觉器官要求休息，从不知不觉的启示中我知道：我没有气力喊叫，精力已经耗尽，世界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我仿佛是第一次一切在等待着别人的答复。前线持续不断的紧张，苦不堪言的单调生活，开始使我感到厌倦，而对不能实现原有计划，不能接续进行研究的担心，更加重了这一点。但我很快取得的一点威信帮了我的忙。人们都来找我，请求我，从而引起了波普教授的赏识，他决定让我继承他在教研室的职位，因而对我表现了特别的关心。我的寡言少语，被一些人看成是高傲，实际上则是一种内心的不满：无休止的寻找、探索，使我离开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我似乎已经望见了完全失败的前景。

朋友当中，我只剩下了雷德曼。大学时代我就认识了他，一块儿参加过左翼活动。之后我们又在巴黎相遇，都是在那儿继续深造。我们在那儿一起经过了许多事，直到无话不谈。他看起来象个感觉敏锐、办事认真而且有谋略

的人：他注重仪表，行动持重，尽管按照我的感觉他显得过于脆弱，但我仍然听从他的意见，愿意跟他一起共事。我记起我几乎办出一件蠢事：我竟想用一块石头打破德·洛克上校，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头。雷德曼及时地制止了我。我从来没隐瞒过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在这方面毫无顾忌。我从来没向任何人要求过任何东西，我对自己做过的一切也都问心无愧。想干的那件蠢事，的确荒唐：实际上我根本无法接近上校，而且他的随从们也会当即把我碎尸万段。当时我以为，象这样的友谊已经无须乎再三番五次的考验，而且那时他在你外公那儿做事，我们经常见面，他也是家里的常客。如果不是我岳父被逮捕，并弄到别处——他习惯于党派斗争的那一套信口开河，却不知道怎样顺从时代——我会怀疑到岳父，甚至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睡梦中说出了什么，而绝不会怀疑到雷德曼的头上。其实那时我们也并没有谈论过什么别的。我们一起研究马克思和列宁，那时不过是想看一看他们谈过的是不是能得到验证。我们并没有取不负责的批评态度，没取反对的态度，只是想要进一步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在那些年月，在法国和奥地利那些动乱的日子里，我们逐渐同政治打上了交道，事实上也无法生活在政治之外。我以为雷德曼是用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不会屈就于时兴的这一套小人手法，借助别人之手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我们也不可能涉及到社会制度，只不过想要对事实作出解释，对未来加以猜测。我并不认为力量是上天赐给的，即使是这样，我也要自己进

行思考。但自从瓦尔拉姆来过之后，却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发生的一切，使我觉察到圆圈在我的周围越缩越小。我并没有具体的根据，但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特殊的反应能力，我预感到了一种危险信号。有时，一个没有任何病的病人来找你，同你谈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忽然间便转换成他感兴趣的话题。又有时，来的人扯开嗓门高声大骂，如果你顺着他说上几句——医生的职业往往使你不得不这样做——那么问题马上会牵扯到你身上。具体的，我说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我觉得出有些事怎样也弄不明白，我甚至愿意象我岳父那样地被带走……没有人同我真正对阵——我周围看到的只有睁大的眼睛，支着的耳朵，各种各样的幻象，数不清的古怪问题。瓦尔拉姆我碰到过几次，有一次甚至是在医院里。他对我暗示性地笑一笑，问了些各种各样的怪问题：问我是不是失眠，那些法国人怎么样，还寄给我一些什么书，我在特尔古一日乌集中营的时候吃什么，我喜欢不喜欢海边，等等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道：

"怎么瘦下来了，大夫？在做矿泉浴吗？换了我，我会猛吃猛喝，把肚子养起来，好做好准备。有了脂肪，就不怕消耗体力，不怕挨饿，也不怕受冻。"

我明白，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了，于是便准备了厚衣服，换洗的内衣，积攒了一些钱，不再象过去那样随便化在亲戚朋友身上。比较困难的是要想办法让你的母亲有个思想准备。其他方面，我仍旧照常工作，我自己也需要平息一

下忐忑不安的心情。

“时间还是对我有利，”我心里想，“这期间事情不会没有变化。”终于一天夜里来了三个人。有一个人大出血，他是被一颗子弹打伤的。一时间家里几乎变成了医院。一方面，来的人多事情更保险一些，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我还从来没赶走过病人。我没有耽误时间，立刻给他做了手术，什么也没问，不过一个病人，如此而已。我不大喜欢问东问西，在前线，我从人们身上取出来的子弹，几乎可以用吨计算。即使确实是个罪犯，他也会编造理由，或者强迫我给他做手术。而且他们到我这儿来是找大夫，而不是找法官或者神父。不管怎样，我并没感到有任何不正常，救死扶伤这是职业给我规定的义务，当然为病人保守秘密，也是我的职责。他们告诉我说，还要再来找我，但以后并没来。第二天，象往常一样，我把这件事对雷德曼讲了，是向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累顺便提起的。因此，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没有隐瞒这个情况，并不是我对这三个人已经有什么猜测，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与我无关。我并不感到好奇，因为我以为不管是英雄还是罪犯，都没有什么值得发现的新闻。没过几天，我就被捕了。他们是夜里来的，马上就给我戴上了手铐，连吻一下你也没被允许。我承认，当时我抗议，大声嚷嚷，因为第二天清早我还有几个紧急手术，我想至少应该通知教授，手术我做不了了。其实从这时起我便失去了控制：说处理完手术，我马上自己到他们那儿去。听了这话，瓦尔拉姆

竟笑得前仰后合。

“就算是我犯了法，”我对他说，“可医院里那些人有什么罪过？他们出了事，不是太冤枉吗？”

“得了吧，你以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会有人代替你的，而且管保比你更强。”他笑道。

“你以为医院也象你们那儿一样吗？”我问他，“也可以这样随随便便拿着生命当儿戏吗？医院里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干这一行没摸过书本是不行的。”

“你赎完了这次罪，会让你再从字母学起的。”他对我说。事实是，尽管我曾经预料到，也做了思想准备，但在他们面前，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我表现得不那么自然，他们通过小动作，通过不可一世的态度，极力想让我意识到，我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的一个物件，决定权在他们那儿。我打算给雷德曼打电话，他是检察官，完全可以靠他帮忙，我甚至想象出第二天他来时的样子。但是在汽车上我才发觉，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不是什么误会。但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到时候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瓦尔拉姆对我说道。那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接下来会是关于一个叫布迪勒的事。我曾猜想是不是你外公的事。对我来说，我无非是他的女婿，根本没有别的。我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我相信，如果他们使尽了办法我也毫不退让，如果我根本不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他们也将无可奈何。我还寄希望于经受过前线生活考验的身体和忍耐力。不管他们

怎么对待我，无论如何，除了事实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后来，我对当时的错误一直感到痛心：当着上校的面，我没说话，我也成了任凭让瓦尔拉姆为所欲为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想的不止是要受难赎罪，甚至是彻底根除自己的罪恶。我在外边没能有勇气这样做，却只好从里边开始……我太天真，当然，还有心肠太好。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没有完全丧失控制力。在楼梯上，他推了我一下，尽管我知道后果，却忍不住对他还了手。当然，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做了一件傻事，但我没有示弱，我继续反抗，直到人们被岳母的嚎叫声惊醒，一个个伸出头来趴在窗口。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该对他还手，但他进门时的那种样子，谈话的态度，就好象我的罪行早已确定无疑。所有这一切，我感到是对我信念的极大侮辱。我，一个共产党员，连这一点信任都不给吗？我就这样离开了家。当时我自然地想到，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尽管那时的反抗有些可笑，有些欠考虑，但我想给人们留下一个坚强不屈的形象。当然，我的行动无非是使他们大吃一惊，这另当别论。我的科研事业，已经远远地被抛在了一边。生命，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也认为已经结束，因此表现出沉默等待以外的态度，也并非不自然。我料想死已经临近——奇怪的是我不得不又想到了它——但那时的感觉并不象现在这样，不是这么全神贯注，身体也不象今天这样不住地发出信号。

当天夜里便开始了审讯。我甚至不知道延续了多长时间。我的生活节奏全被打乱了：照明灯，候审室，关于外

边的记忆已经无影无踪。我并不曾想到会是这样：我原想极力忍受住，坚持住，以便能够进行一次周密的合乎逻辑的答话。但渐渐地，说出来的话，仿佛失去了含义，连自己也弄不懂究竟说的是什么。我昏过去好多次。瓦尔拉姆经常有人替换，而我只能是一个人。每次都是同样的问话——有变化的只是声调高低——答话也是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承认的。问我是不是斯泰利安匪帮一伙的，我同谁联系，我是不是在国外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我给他做手术的那个人是谁。我能回答什么呢？只有事实。不知道，不认识，没听说过。我看到有两个人，经过第一天的问讯便“承认”了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过的事实，揭发了他们的父母，写下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供词：只有这，才是摆脱这种境遇的途径。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这本来就是我最厌恶的。事实上，一想到这儿，我全身的汗毛几乎都竖了起来，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在那样的供词上签字。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了，到那时为止，从生活当中我没学到任何经验，相反，为了不断重复的教训，却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当然，瓦尔拉姆无法摧毁我的信念。但奇怪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忍受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好多次我曾想到同你外祖父的争论，我不得不对自己感到失望：万一我遇到了他，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他注重的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事实。瓦尔拉姆使我相信，到那时为止，我并没有为自己的思想进行足够的辩护。一旦你有了政治信念——当然不只是政治的——就不允许你对事情视而不见或者缄

默不语：你无权听任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仅仅满足于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崇高的。不允许你只顾自我欣赏，而把其他人正在实施的做人的道德标准弃之不顾。事实上，我同瓦尔拉姆从来没讨论过政治。即使我想谈，跟他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因此根本谈不到一起。他认定我是有罪的，既然有罪，便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其余照此类推。当然，只有他能够确定这一切。并没对我进行正式审讯，但他对这一点并不介意。我们的会面，每次都象印版画似的重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从我进场，一直到再重新给我戴上手铐，剧情总是毫无变化。使我无法平静的是一句我听过上百次的话："从前你是医生，现在你什么都不是。"就某种意义讲，他说的是对的，的确是这样。但使我感到古怪的是第一句问话："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就好象从家里把我抓走的是另外一个人。应该承认，慢慢地我也习惯了，感情也起了变化，甚至觉得自己是去会老朋友，只不过谈话让人感到腻烦。显然，对你叙述所有细节毫无意义，也可能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发生的情况。人们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事实上，这是一场意志的竞赛，我极力想保住自己从精神上战胜对手的愿望。不管我的肉体处于什么状态，精神、心理却仍然没有改变。在这之后，一个时期我陷入绝对的孤独：听不到任何响声、辱骂声，甚至连给我送饭的人也见不到影子。我完全失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只能根据送饭的次数作个大概的估计。我发现墙上有别人画的一些横线，但过了一些时

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哪是别人画的，哪是自己画的了。我体内的生物节奏发生了变化——只有吃饭照旧——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计算。如果说我不曾有过软弱的时刻，那倒是不足为信的。我看看自己脚上化了脓的伤口，也曾经大声叫喊："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而当我回溯起过往的一切，却感到你们比我更加孤立无援。你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看不到人，特别看不到自己亲近的人，但你仍然为自己还能够呼吸，还能够回忆起往事，还能够知道些什么而感到庆幸。只有这一点还没被夺走，还在填充着自己的生命。只有当你已经没有勇气向自己召唤，已经失掉了对自身的信任，已经把一切交付出去的时候，才是彻底的失败。当然，要集中起精神不那么容易：思想就象瞎子的手，在空中抖抖瑟瑟，什么也摸不到，手指偶尔碰到了什么，却又立刻从指缝里滑掉，依旧落得两手空空。每一次尝试的失败，只会给你增加更大的迷惘、惊怕、疲惫。什么地方忽地闪出一个破碎的形象，一种颜色，一个人物，但却飘飘忽忽，若隐若现，所需要的光线，简直连一秒钟也集中不到这上边。想要抓到手的雪花，即刻便溶化了。于是你继续寻找，继续这场古怪的难以置信的运动训练，直到不知通过哪根神经，脑子里终于留下了一句话，一个名字或者别的什么。我记得我提起了锡泰腊。我根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诗人到过这座天堂般的小岛。但有一段时间博德莱尔的一首诗却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在巴黎，夜晚，我望着大街上五颜六色的橱窗，各种各样的行人，

不知不觉朗读起这首诗来：

“啊，维纳斯！在你的岛上，我找到的
只有我悬挂在无形绞架上的影像……
啊，上帝！请给我勇气和力量，
让我把自己的心灵和肉体，仔细端详！”①

我紧抓住诗人的名字，反复默念着，直到重新读出那几句诗句。别的书我也是这样做的，我甚至复述出了所有讲课的内容。在那儿我意识到，在我多灾多难坎坷不平的生活里，却也保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事实上，我也了解到了不少象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了解到的东西。那些毫不相干的名字，无关紧要的形象，忽地跳到了首要的位置，就仿佛要向我宣布什么。我记起，那是很久以前，我坐在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汽车开上了一条远离村镇的盘山道。那正是寒冷的冬季，汽车轮把不住地面，一加速，汽车哧哧地在地面滑了起来。幸好被一堆石块挡住，汽车猛地一停，车上的人都被甩了下来。只有一个人留在司机身边：一个独眼的吉卜赛人，一路上他一直不停地哼着小调。后来，我们在车轮下边垫了些石子，车轮不再打滑了，但却发动不起来。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用摇把试过运气，结果没有一个成功。这时，独眼人下了车，只摇了几下，便响起了一阵马达的嘟嘟声。但那人并没有即刻上车：他张开

① 原文系法语。

了两只臂膀，那只瞎眼皮上的血管，忽地涨红起来，就仿佛烧着了一般，而两片厚厚的紫黑的嘴唇，不住地微微掀动着。这就是一切。“为什么吉卜赛人的那只眼睛和两只张开的手臂，我记得这样牢?”我反复地自问，于是这件事占去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尽管没有什么准确的根据，这样得意的形象，甚至同样的姿势——两手不是下垂而是张开着——我好象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在法索莱身上也看到过，只不过我是从下往上看的：我倒在了地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许因为眼皮上的血管使我过于吃惊……我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血管上挪开。难道那次竟是他吗？不，当然不是……

但我知道实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时间使我确信，生活中的经验一直在不断重复，今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有一点我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究竟要向我表明什么呢？问题提得这样幼稚，这样无知，就象是匆忙之间不假思索的反应。但在意识清醒的时刻，当生和死变成天平两边托盘上的两颗砝码，当你不知道天平的指针究竟往哪边摆，因而感到惊恐不安时，你会顿足捶胸，希图寻找答案，找出一条拯救的出路。而这样的挣扎毫无意义。这种痛苦毕竟是暂时的，只有另外一种痛苦，当你不愿退让，不愿屈从于荒谬的决定时，那才是经常的，难于忍受的……我发觉，命运一心要把我制服，而我却始终不能让它得到满足。要不然，为什么有些情况会几乎一模一样地重复？又有时，我跟它对换一下角色，把它当做同伴，

甚至看成一个真诚的伙伴，它要指给你还不熟识的世界的那一部分——给你做一个完全特殊的安排——它一心想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件必须了解的事实上。我也分析了这种假设，希望找到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但我却选择了一开始便不自觉做出的反应：反抗。不是我战胜它，就是它战胜我。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执拗，我从来不知道从重复过的教训中吸取新的东西，发现拯救性的出路。

后来，我知道了什么叫死，我感觉到了它，以致今天对于它，我没有任何紧张的感情。开始是觉得发冷，慢慢地这种冷逐步扩大，直到你的周身在自己惊异的目光下全部变凉，接着，你的周围变作一片真空，随着黑暗程度的不断增长，于是便丧失了一切感觉。而心理的死却是另外的情形：一切之中仅有的只剩下生物性，一个缺少意识，不会思考，没有任何创造力的活物。问题还不在于此。埃斯齐尔①见坏人受到惩罚，便确信神灵的存在。但如果你不能有幸看到这些呢？如果神灵有更重要的使命，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屑于顾及呢？不幸的是，本质即是一般含义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品德而付出的物质。我发觉命运并不能告诉我什么，我只不过在活着，而对那些使我无法摆脱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找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那又该怎么说呢？我只不过活过来了，如此而已。接下去呢？当然，我各个方面尽了努力，作了调整，但提

① 埃斯齐尔，即埃斯库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出的问题呢？当我的面前只剩下这样一点时间，我还能再寻找什么呢？难道还能再自欺欺人吗？我为什么活到现在？我知道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两点之间这条弯弯曲曲、上下波动的线，就是现在的样子，就象我知道的样子，这我还不能接受。我的好奇心，还不仅仅限于看一看这个职位或者那个职位，这个家或者那个家，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样的。难道要把一切都归结为小孩子做的算术题，好的，坏的，一减了事吗？不说荒唐，至少未免过于简单了。也许一次新的试验会使一切明了：事实会按照逻辑顺序排列起来，从而获得应有的意义。而如果不是这样呢？喊叫，吵闹，失望，一切全都无济于事……但日子却在以另外的节奏，匆忙地、无情地、不可逆转地一天天过去。这么长饱含苦涩的时间，我却浪费在连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上。向谁抗议呢？向谁求救呢？有谁来至少安慰你一下呢？乃密斯女神①已经不复存在，没有谁再能让超过幸运线的眼眉回复原位。如此看来剩下的只是我自己的事，只是时间的问题。当奇迹出现之前，那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便成为最低限度的活动日程，便意味着一系列的计划：只有它是对自身徒劳反抗的遏制。当时间已是这样令人遗憾的屈指可数，而你还有如此多的计划需要完成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出日子是怎么过法吗？只有一味地向前，继续研究下去。我觉得，只有

① 古希腊神话中主持公道掌管惩处的女神。

这一条路才有可能接近我等候了这么许久的答案。

这些没有灵魂的肉体躯壳，能对我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原谅雷德曼。他了解我一直想着的是什么，他故意偷走了我的一部分时间，迫使我不得不在开始这条崎岖的路途时，便先被对手拉下了一截。我并不想放弃，也不愿糊里糊涂听天由命地走下去，我并不是需要陪同者领路的瞎子。

在那儿，在下边，我仿佛找到了另外的世界。正当我以为瓦尔拉姆已经把我忘掉的时候，却听到了门口的一阵钥匙声：我下意识地举起双手，转过身，脸对着墙。当我感到眼镜碰到鼻梁时才意识到，生活的另外一章已经彻底结束。走在路上我感到舒心：我力图控制住自己的步子，显出有自信心，甚至高兴的样子。我激烈地抗议、警告他不会有好下场。其实，也许你不会相信，我能看到一个人，能听到另外的声音，心里却感到无比高兴。但瓦尔拉姆什么也没对我说，他从一份卷宗里抽出一张已经写好的声明，让我签字。我拒绝了，那完全是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要求分辩，当然，结果还象往常一样。但出奇的是这次他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他显得已经厌倦，心不在焉，对我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后来让我搬到另外一个有二百人的号房，都是新来的。我在靠门口的地方。按照那儿的规矩，只有再新来人，我才能够往里挪动。我靠着马桶睡了一夜。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那儿我却可以伸直身子躺着。然后，让我跟斯泰利安集团各色各样的匪徒对质。有的说认识我，

说我同他们一起干过事，而我当然矢口否认。接下去的事用不着向你多说。我对你讲这些并不是要证明我吃了苦，这完全是不值一提的事。有时候精神的创伤比瓦尔拉姆的刑罚来得更加痛苦。但如果你不能从中得出教训，这样的痛苦也毫无价值。回忆这些事，当然不会使人感到愉快。今天我才明白，我并不是为了一种思想而受了苦。瓦尔拉姆改变不了我的信念，我也没有比原先多得了些什么。但是，有时候痛苦并不由我们自身来选择。我并不能改变事情发展的趋向，但依靠我的经验和身体的忍受力，我把他真正激怒了，从而向他证明，我比他更强大。其实，我并没打算以此来检验自己的毅力，但当时的情况，世界仿佛紧缩到只有两个决胜负的人。最后一次会面，他耐不住性子了，大发雷霆，声音里几乎都带着哭韵。这时，使我极感惊奇的是，出现了雷德曼。他瑟瑟缩缩象个好色鬼。面对所有粗暴行为，他却一言不发。我记得我问瓦尔拉姆："你是喜欢让我穿着衣服还是脱光了？"那时候我好象冷冷地对他笑了一下，他简直气疯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雷德曼和一个小队长在我身边：我知道，那天晚上我给枪伤病人做手术的事，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我无意平白加罪于他，我曾经反复回忆过，但确实没想到另外的人。开初我以为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后来通过几个月来同瓦尔拉姆的对话——我同他几乎成了朋友——才了解到实情。一次，他显然表露出相信我是无辜的，正是他说出了雷德曼。但事情却已无可挽回。他扣留了我这么长时间，根本没进行

过正式审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我身上找出罪过。那时雷德曼和瓦尔拉姆，特别是雷德曼，开始暗中散播谣言：说在我家里发现了大量黄金，说我杀死了一些负有特殊任务的病人，说我属于一个叛徒特务网里的一员，说我干出了一系列不便透露内容的肮脏勾当等等。他们想借此毁掉我在职业上的威信，进而彻底地整垮我。而雷德曼受过我岳父的亲手栽培，人们相信他，都知道他跟我是要好的朋友。在给他动手术以前，我同他的一次谈话里，我真想问起他关于谣言的事，但我觉得他既可怜又可悲：他会承认的，不管我要求什么，他都会承认。尽管他表现出一定要同我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要进行一次解释，但我看得出，他比那时更加憎恨我。他同我谈并不能解脱他自身的重负，我感到他见裂痕越来越深而更加咬牙切齿。第一次会面的时候，雷德曼象是对我十分亲近。

"我想要帮助你解脱这件事，"他对我说，"我费了好大劲才到了你这儿。"我知道他是要想赎回自己的罪过，因为同他的友谊，我是不大怀疑的。

"关于我家里人的情况，你都知道些什么？"

后来我从你妈妈那儿才知道，他根本一次也没去过，但他告诉我说，你妈妈病了，你外婆简直快到了神经不正常的地步。为了你，我应该付出任何代价，想办法活下去，也就是说应该签字。我知道他在说谎，但我还是想从话里听出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人出面帮我的忙。他

态度冷静，显得很有分寸，他不断提到他的律师身份和同我过去的友谊。

“如果你还有一点做人的同情心，”我对他说道，“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还有一点价值，那么你告诉我家里人，说我很好，我身体挺结实。让他们把那些名画、书籍和一切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不必可惜，以后我会再重新搞起来。再告诉波普教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请他帮帮忙。”我还告诉他一些请我看过病的朋友的名字。但他什么也没做，还是一味地让我承认，就好象我们从来就不认识。从他的言谈动作里，看不出一丝一毫过去友谊的影子，哪怕是一个谅解的眼神，一句安慰的话。他是害怕吗？当然是这样。可惜那时的表情和眼神没办法用机器录下来。第二天他同瓦尔拉姆一起来了。瓦尔拉姆又答应可以放我，但要我认罪，并且供出匪徒集团和外国间谍网的同伙。我跟他说了杜勒斯和另外几个名字，并且告诉他，我跟他们合作过，如果他能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他们会出高价外汇来赎我。后来布莱尼亚也来了。

“这就是那个匪徒集团的吗？”他问道，“什么也不承认，你们尽管继续下去好了，看来他是受过良好的间谍训练。”

过了几天，还是在那间熟悉的大厅里，只有雷德曼一个人。他劝我还是让步为好，到正式审讯的时候再说明当时是被迫签的字。关于你们的消息——他一句话也没有。等我问起他的时候，他说我极不负责任，他把桌上一直放

着的一只鞭子用力一摔，说我极端自私，根本不考虑因为我使他落到什么处境。我帮了那个布迪勒的忙，不管怎么说也是有罪过的。为此，我不是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却要连累别人，让他也倒了霉等等。

“不管怎样你还是有机会解脱的，就凭你的名气，别人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气候终究要变的。”

“我就在这儿等着它变……”我回答说。

他说我不相信他，瞧不起他，又提到了我们的友谊，过去在一起的那些事，那些连我自己也觉得遥远的仿佛并不曾发生过的事。我拒绝再同他谈下去，要求把我送回牢房里。这时，瓦尔拉姆吆喝着走进来：

“哈，看来你是不喜欢好模样，给我揍他！”他对雷德曼喊道。雷德曼迟疑了一下。

“没听见吗？还等什么？”

雷德曼战战兢兢地后退了一步。瓦尔拉姆变了脸，笑声变成了嚎叫：

“没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吗？”

最后，雷德曼瑟瑟缩缩地有气无力地举起了鞭子。我并没有说他什么，只是站直了身子，嘲弄地对他笑笑，紧盯着他极力企图避开的眼光。

“这好象不应该是你做律师的职责吧！”我对他说，“换了我，如果对过去的一位老朋友这样做了，接下去我会立刻去上吊。为了搞这套玩艺儿，当初你连一本书也用

不着念，也没必要到好几个国家的首都去浪费那些钱。”

在瓦尔拉姆得意的嚎叫声的催促下，雷德曼没有停手。而我，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大笑了一声，弄得这位站在一旁的助威者立刻下命令让他住了手。

“现在你也还他几下！”瓦尔拉姆对我说道，但我一动也没动。

“不，我不愿意脏了自己的手。”我说道。尽管他象发了疯一般，但始终没能让我照他的话去做。这场戏有点凄惨，我决定让它停下来：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照他们两人的脸上啐了一口。我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再这样做过，但雷德曼实在让我太厌恶了，我简直无法忍着再看他一眼。他的朋友更加狂怒了，有幸的是我并没看到接下去的表演，因为我立刻便昏倒了。小队长是个软心肠的人，他用力一下便击中了我的太阳穴，以致几秒钟之内我便失去了知觉。

后来他来得更勤了，常常是只留下我们两个人。雷德曼羞愧得哭了，慢慢地也开始为自己辩解起来。

“受点屈辱对你并没什么坏处。你会很快忘掉我们过去的理想，变得资产阶级化，失掉感情，一切都要靠计算。你对那个匪徒的帮助，也是受了西方宣传的影响：你相信英国人、美国人会到这儿来，你愿意同他们合作。你一生都是在反抗，都是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你究竟想得到什么？究竟要求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制度，能使你满意。难道你想让一个国家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行事

吗?”

“你一生都是支持派。这也算一种态度。但是我蹲安东尼斯库的集中营，是我错了吗?我参加共产党，参加错了吗?这是我第一次真心拥护一个政治性的政党。”

“那是出于担心或者是考虑到自身利益。你妻子的出身，直到你自己的出身，都使你为人小心谨慎。”

“我这么多次的冒险，也是小心谨慎吗?那时候有几个人敢于公开地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疯子呢?”

事实上我们的谈话徒劳无益。我们根本无法谈得拢，他有着抓住别人把柄的那种优越感，尽管在我面前他多少有些收敛，但我们两个就象完全陌生的人，两个由于职位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差别而无法相投的人。

那次在大使馆我是按照当时的信念讲的。我已经听腻了那些骗人的宣传。把我吊到树上或者送我去前线，已经感到都无所谓。那时，自我保护的意识仿佛完全跑掉了，屈辱使你无法忍受，不再去考虑昨天还是明天，不再去顾及亲人，头脑里想到什么，便大声地喊出来，仿佛只有这样才痛快些。你感到需要做人而不要成为那些疯狂的或者丧失理智的人们手中的工具，不甘心成为白白长着两只无用的眼睛的鼹鼠!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人除了吃、穿以外，还要求别的什么。但只是在那时我才亲身感受到这一事实，这一比代表它含义的词句深刻得多的真理。一只动物，如果及时给它吃的，好好喂养照看，它会按照主人的意思慢慢地、壮壮实实地长大起来。但是如果一些蠢人要

把动物学上的原理应用到人身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些动物学者会惊奇地发现，竟有不知感恩的生物。一旦不给他自由，不让他说出看到的一切，让他表现出作为人所应该表现出的一切的自由，他会对于你给的吃的，对于你给的一切——如果你给过他的话——不屑一顾。当然，法西斯分子也说你是自由的，但是，你只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思考的自由，为他们高唱赞歌的自由，散播那些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但却能够淹没一切的愚蠢的自由。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我忽然感到世界的命运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宁肯承担任何风险，也比忍受到处充斥的谎言更觉得好些。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于我的过错：因为我保持了沉默。我对那位德国领事说道："即便墨索里尼不是智力不全，我对他说的那种制度的永久性也表示怀疑，因为每平方公里的军人数字实在是太多了。"

"特殊的时代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

"只要这种思想存在，就一直是特殊时代。总会想办法让这种持续紧张、持续动员的状态继续下去，就象希腊人专制时期那样。但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总是要取消人们表现自由的权利。空桶响声最大。每个军人都自以为是萨伏那洛拉①，只不过他们没读过自己放火烧掉的书。他们所以要烧掉，只是因为这些是书。谁先开始烧书，紧接下来马上便轮到烧人。想要延续一千年吗？靠暴

①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领导的起义遭到失败，以"异端"罪被处以火刑。

力建立起来的东西，终将彻底垮台。”

“作家和艺术家历来就比军人数目少，”领事笑着回答道，“只有当一切平静之后，等全球都建立了秩序，那时候也可能会反过来。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都应该为这一目标尽力。”

“谁的目标？是谁提出来的？是希特勒以全体的名义吗？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有多少人类的精华正在被毁掉！”

“伟大的行动要求作出巨大的牺牲。”

“包括从娘胎里就开始的对人们的强化教育。遗憾的是这些行动过后剩下的只是牺牲，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本无人关心的结论，不管是以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

“可惜你至少连一千年当中的头几年都没机会看到。”他一语双关地对我说道。

当然，对话比这还要长，我知道我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等我回到家之后，我才发觉，我太幼稚，简直表现得象个孩子。不应该同他们谈论这些，而且一般地说，根本就不应该谈，而应该做点什么。当然，领事追究了这件事，要求惩罚我。我问普洛霍瓦努将军我应该怎么办，我跟他的女儿是同学。将军为了避免把我送上前线，便设法安排我去沃格列什蒂—康斯坦察集中营。我志愿去前线，并不是要不惜代价建立功勋，而是出于为结束血腥的独裁，自己也想作出一份贡献的愿望。我完全意识到了要冒多大危险，但为了赎回自己的清白，必须这样做。我完全可以继

续留下当助教，专攻一个专业，还象以前那样做些有用的事。但这样我不会感到安心，对于这种安适的日子，我会感到羞愧。事实上直到今天，当我吃一顿各色菜肴俱全的丰盛宴席的时候，会想到那些我没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整天梦想着一块面包的可怜的人们，从而感到难为情。再回过来说，我相信雷德曼已经得到了授意和授权。他着意地给我描述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痛快的玩乐，美妙的景致，图书馆，博物馆，企图以此来诱惑我，使我意识到所有这一切要比受屈辱有价值得多。瓦尔拉姆临时改变了策略，但痛苦和折磨却来得更加厉害，因为提出建议的正是最了解我的人。是的，为什么我要说谎呢？有好多次的确我动摇了，失望了，真的想要跑掉，逃脱掉。从天体运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些行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进行斗争，使用不同的武器。我无法自卫，一旦对事实他们已不感兴趣，我便失掉了任何手段。如果是在外边，我倒有可能应付。但是，我为自己感到难堪，我为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我不再问他关于你们的事，怕再听到不幸的消息。当然，我知道他夸大其词，我想象得出是他编造出来想要制服我的。但我却无从得知你妈妈的情况，她对于如此沉重的打击是否承受得了。在少有的较为平静的时刻，当疼痛已经均匀开来，全身的各个部分都几乎同样疼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道：如果一旦……我无法得知丝苔拉面对屈辱和穷困怎样应付局面。而你又是那样娇嫩，稍一着凉，马上便发烧，咳嗽，真让我放心

不下。我的担心是出自父亲而不是医生的角度。但渐渐地，我越来越少地想到你们，身体越来越受不了，四肢好象已经不属于自己，腰也是这样——只有心脏，我还能听到正常跳动的节奏，那样平稳，出奇的平稳。我全部的意志都集中在它那儿，难以置信的是我成了自己血液流通的调度员。尽管毫无结果，但我却力图让更多的血流向那些麻木的已经受了感染的区域。你们已经属于那些遥远的记忆范畴，另外一些事件极力想在脑子里代替你们的位置。后来，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子里缠绕着："如果我不屈从，会不会轮到你妈妈头上？"当然，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愿再继续想下去，设法从脑子里赶走这种想法。因为我害怕把它说出来，害怕无意之中让瓦尔拉姆得到启发。但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却使我一段时间之内安下心来，重又给了我已经被毁掉的勇气。小队长奥尔迪亚努——瓦尔拉姆命令的执行者，他时常象拳击时那样，只需一拳便把我打翻在地，爬不起来——带我回牢房的时候，对我说道：

"你别回头，注意听着。你妻子告诉你，他们都好，让你不要记挂他们。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不然，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会倒霉，我家里有六个孩子。别问我别的。"

进牢房门的时候，我对他说："只要你从她那儿带回点什么，不管是什么，那我才相信你。"

过了几天，他拿来一张你们的照片。我一直把它带在

身边，尽管到后来几乎成了只有几个模糊影子的一张纸。但为了保存它，我仍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一次，奥尔迪亚努的妻子做小肠手术，奥尔迪亚努向她提起我和瓦尔拉姆都那么执拗，谁也不肯相让。后来，这个可怜的女人没告诉她丈夫，就跑到你母亲那儿说，如果有需要，她可以帮助你母亲。当然，丝苔拉给我捎来了好多东西，直到小队长把这些事都办完了，他妻子才算跟他罢休。对这个人的罪过我是完全原谅的：他打我，折磨我，但也正是他给我带来了外边的消息，有时还给我带来吃的。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冒着风险的。现在我还能经常见到他，他在卖香烟。他知道我从他那儿买烟，每次都千方百计给我弄到我想要的牌子。“教授先生，”有一次他对我说道，“咱们一起休假，在一块好好聊聊不好吗？”他妻子更是常来找我，让我劝劝她丈夫，别再喝酒。她抱怨自己的病，经常给我送水果来，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总之，自从跟奥尔迪亚努谈过之后，我感到一切都不在乎了。有时见到他就仿佛见到了你们，这样我便能够忍受一切。另外，雷德曼我也彻底弄明白了。从那时起，尽管他来过多次，但我只同他谈过一次。

“你用不着这样对待我，我的牌还一张也没打出来呢。”他奸诈地笑了笑说，“我手里的牌还有的是，有一张最厉害的，足可以让你相信，你这个朋友知道的事，还没都说出来。”

直到很晚，我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牌”。这时瓦尔拉

姆拿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而我又交上了奥尔迪亚努这样一个古怪的朋友！一方面他差不多天天给我送烟，还有小块的肉，猪油，还告诉我外边的新闻，而另一方面，当瓦尔拉姆命令他要对我多关照时，他又显得十分卖力，不让看出一点破绽。因此我要为这种友谊付出极高的代价，但这仍然是值得的。

有一天，瓦尔拉姆显得特别高兴。他是第一次不管我叫“土匪”，“狗”，而是称呼我“大夫”。他请我抽烟，甚至亲自给我点着火。通常给烟我是从不拒绝的。我吸了几口，由于身子太虚弱，立刻就觉得头晕。同他谈话用不着清醒的头脑，他很少有兴致同我谈提问以外的话。他的用词使我感到一惊：他们已经断定我无罪，要释放我吗？还是有什么人过问这件事，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是斯泰利安和布迪勒被抓到了吗？猜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只觉得两脚站立不稳，高兴得几乎跌倒在地。

“大夫，”瓦尔拉姆说道；“这下你可跑不出我的手心了。你尽可以不开口，没关系，你的亲戚、朋友，你想让谁帮忙，我都可以通知他们。现在材料落到了我手里：法西斯的宣传材料。就凭这个，哪个国家的法庭会不判你罪？你承认这些材料是你的吗？”

“我知道早晚你会编造点东西出来的，”我对他说，“你闹的笑话太大了，弦绷得太紧，你应该想办法遮盖一下你非法搞的这一套，遮盖一下你的无能和滥用权力。如果你这样请求我：大夫，你瞧，我恨你，我想搞垮你，可

我没有办到，你确实比我厉害。请提供我一点有分量的材料吧，救救我吧。如果你是这样请求我的话，毫无疑问，我会帮你忙的！”

“你承认材料是你的吗？”他问我道。

“是的，”我说，“对我公开审讯吧，那时你会看到我怎么回答。可以肯定，这桩交易会要你的好看。也许官司我打不赢，但是你的上级会为你而感到吃惊。到现在为止，你办的案子碰到的都是胆小鬼，懦夫，一打二吓，可能都给你在供词上签了字。但是我却让你栽了跟头。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感到，我可能是你最后的一个牺牲品。”

我要刺他一下，看他对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对雷德曼提供的“材料”，到底相信到什么程度。看得出他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反击。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劲头一下子松了下来，迟迟疑疑地望着我，连那股高兴劲也不翼而飞。其实我也并没对他说什么不得了的。瓦尔拉姆并不象他自己竭力要表现出的那么狡猾，他依靠的是强力，更多的是他所处的地位，而不是靠才智或者知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互相习惯了，一旦我看出他的招数，我可以肯定，只要我肉体撑得住，他就没办法制服我。我寄希望于同他谈话时给他个突然袭击：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直接地、狠狠地给他一下子。我竭尽全力保持住自己的坚定和优越感，当然为此要付出代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瓦尔拉姆有些招架不住。他那藏在浓眉下深深眼窝里的一双小眼睛，使我感到有趣。开初是真诚的、孩子般的惊奇，随

后立即爆发出按捺不住的怒火。

“那么，这些材料你自己怎么说呢？”他问我道，“在这些不需要我加任何一句评论的证据面前，你还有什么话讲呢？”

“公开审讯以前，你甭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这期间如果没有比你大的人物把我放出去——这随时都有可能——也并不排除你能够让人判我的罪。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一旦你到了讨厌自己、恨自己的地步，你会感到难堪，感到悔恨，感到无地自容。象你这样的人，都会是这种结局。因为在我们之上，还存在着高于一切、不容许任何人摆布的公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拿上炸药把上校的坟墓炸开。骨头是烂得最慢的，多少年之后也能分辨得出骨头是不是被打断过。弄开一个坟墓往往能发现另外一个。你逮捕我算是完全做错了，你把我杀掉，那就是第三个不在供词上签字的人……”

我说话的样子简直象一个布道的神父：我要抓住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天生的胆怯和心虚。我感觉得出我怎样在毁坏着他的自信，特别是他对雷德曼提供的材料重要性的信任。瓦尔拉姆这次没象往常那样一阵辱骂，仿佛顿时连自己也怀疑起来：他在想办法说服自己，给自己鼓气，就好象不愿我离开，仿佛我在这儿倒能给他提供保护似的。我们两个奇怪地拴在了一起，谁也分不开谁。当我神父般地对他教化时，他不敢离开我，他在等待着那可能有的惩罚，让我们两个一起知道。他公然无耻的劲头不见了，这

使我感到惊异。也许他无法解释我何以能够如此坚持，如此坚定，因而逐渐后退了。尽管有着这些感情上的矛盾，但他的凶悍并没减弱，象他这样的人很难接受被别人战胜，依旧不甘心，不管有多大障碍，依旧顽固地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如果我存心报复的话，我完全可以让雷德曼替我分担一下义务：只有他知道书报剪贴的事。为了讨我的高兴，他给我送来了好多这方面的材料。一部分独裁者的照片，是属于他的。他是唯一知道我写书计划的人。好多个夜晚我们在一起时，常拿他作为取笑的题目。当时我真想故意问问，雷德曼是不是把我收集这些材料的意图也告诉了他。但我并没这样做，只是告诉他，审讯的时候我要找来证人和证据，我要用正常的合法手段来为自己辩护。我并没有心存幻想，正是雷德曼出卖了我，不可能指望他会为我辩护。但我要给他造成一定的印象：一旦我减弱了进攻，他就会以为我已经输掉。

“我才不管你那些证人呢。你这样不可一世，早晚会吃苦头。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有人早就完全掌握了。”

“那为什么不进行审讯呢？我一直在等着给我判罪，不管怎么判。”

“这都决定于我。总之，我还看不出为什么要对你审讯，我干吗要这样着急呢？我还要仔细地考察考察你。斯泰利安匪徒集团还没铲除干净，但是我们掌握了线索，我们并不着急，要等待时机一网打尽。在这之前，也许你还

要找你别的同伙谈。你认为这个决定怎么样？”

其实这是我坚持要审讯，他才临时想出来的主意，无非要进行一下威胁。实际上，从一开始他也想到这没有多少分量，但我考虑如果转到另外一个人那里，也许问题有希望解决。而现在，在瓦尔拉姆这儿，唯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通过小队长也可以得到关于你们的消息。另一方面，瓦尔拉姆不可能没有对头，如果转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当然我会把他的行为全盘托出。因此我不相信他会很快使我屈服。除此之外，答案只有一个：

“我觉得不错。”

“为什么？”他问我道。

“我不想说。”

“哼！不管什么，到你那儿全都是好！”他笑道。

“既然要开诚布公，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我出其不意地问道。

“怎么，我们两个对换了角色了吗？你打算干什么？”他大声嚷嚷，但内心并不是那样自信。

“不管怎么说，我还在你手里。也就是说，我的生死由你掌握着，”我的这些话使瓦尔拉姆显得很得意，“也就是说，只要你高兴，随时都可以杀掉我，可以砍掉我的四肢，随时可以找来一些从来没见过我的证人，他们可以发誓证明你偷偷告诉他们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对我怎么做，结果什么也改变不了。这倒没什么紧要，我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事：你真的以为我有罪吗？一点也不犹豫，

一点也不怀疑吗？你没这样考虑过，你也有可能搞错吗？你一点也没有发觉，站在你面前的也是个人吗？”

“是的，你是有罪过，”他以无知者那种惊人的自信说道，“我丝毫不怀疑。只不过你老是给我找麻烦，我希望你头脑总会清醒过来。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你帮助了匪徒，这你自己也承认。从你那儿找到了法西斯的宣传材料。只这两件事，对你来说就足够用了。连你最要好的朋友都不怀疑，我为什么要怀疑呢？我根本无法知道那些材料和布迪勒。你跟雷德曼一起呆了这么长时间，你能够说他是伪君子吗？这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

“如果你没强迫他，没威胁他，或者没给他什么许诺，如果说他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讲的，那我就没什么话好补充了。”

“就是这样。你们之间，巴黎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之间，还有什么说的？”他得意地反击道，“在这儿你还会遇到象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你会知道他们都能做些什么的。雷德曼是个聪明小伙子，用不着进行什么威胁。他同样也需要个职位，需要座房子，我理解他。明天，如果他找到更好的……”

我早就考虑好了合乎逻辑的论据，而且也得出了结论，但只是放在我自己意识的最深一层。我仍然坚持，除非是极端的情况，雷德曼不大可能这样做。我替他找到的理由，甚至比他自己找到的还要多，还要有力。随着雷德曼一起，好象我身体的一部分也死去了。渐渐地，不信任

感，不坚定感，徒地增长起来。以往的经历突然改变了颜色。我感到需要对每一件事，每一个想法，对我的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评价。仿佛感到需要重新降生，不得不一再推迟同我自己的对质，不得不自我欺骗。但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忽然想到要问一下自己，别的人怎么样呢？他们都是谁？难道我的情况是唯一这样悲惨的吗？到那时为止，整个的戏剧性过程都是在我身上，都是为了我自己。我一直不同别人接触，有礼貌地避开同别人的谈话。我的不公正遭遇，象是给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其他人的生命，许许多多的坦白招供，都毫无影响地从我身边滑过去。我不想再用别人的遭遇来加重自己的记忆负担。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持点。正是由于他们，才使我发现那儿还存在着其他的人。我的不幸，并不比他们有什么特殊，许多人的遭遇并不亚于我，不，甚至同其他人相比，我经过的这一切，无非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常。一些从来没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人遭了难。而另外一些，象雷德曼，连马克思主义的根源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表现得却象从来没听到过马克思的名字一般。而我，在那儿恰恰并不是雷德曼的唯一受害者！其他人的遭遇，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并不能减缓我什么，但这却帮助我，使我对自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从前线回来之后，渐渐地我开始用职业的眼光看待生活。这样两片平平常常的镜片，完全俘获了我。是的，我

比别人听到过更多的戏剧性的故事，他们向我讲述时是那样的真心实意，但我对这些并没做过认真的分析，以为他们说这些无非是想得到更好的治疗，而更多的人说这些是为了表示对医生的信任。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对医生的一种还报，人们对我表现得十分热情，甚至推心置腹，同我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为的障碍。当然，我的职业也并不能使我有什么特殊的命运，只不过满足了我天真的、脑子需要好好休息的愿望。那时，我很难接受雷德曼会有天生的坏心肠、会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的想法。他曾对我说过多次，胜利者必须强力推行自己的道德标准，而我认为这是观察世界后得出的一个发现……我面前是一个缺乏个性、能够根据环境和条件随时变化的形象，也就是说，能够和他扮演的角色混为一体的出色演员。跟我在一起时，他显得对互相了解有着极高的热情。同我岳父在一起，却能跟着这位前辈亦步亦趋，梦想着律师生涯的成就，如何击败对手而获得胜利。跟你母亲在一起，他向往着清白和纯洁。而一旦进入了瓦尔拉姆的活动图，却又梦想着升迁，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追求未来的前途。总之，他能够把别人的性格特征统统借到手。今天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点。他的力量和天分，终究与他的欲望不相称，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也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更快速见效、更时髦的手段：拉关系，攫取头衔，诽谤。不能说瓦尔拉姆抛弃了或者说忽略了他，正是由于瓦尔拉姆，他才能够在一九五一年进入教育界，到了赫里亚努教授的教研室。赫里亚努教授曾

经是北阿尔迪亚尔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为了晋升得更高，雷德曼必须越过他。而赫里亚努的历史和他强健的体格，并不能给雷德曼更多的希望。那时候他耐下心来，也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这样做，研究了赫里亚努的经历。他走访了好多人，结果并没找到任何可以利用的问题和疑点。赫里亚努在过去的地下工作者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一切经历都十分清楚。北阿尔迪亚尔解放之后，他到了教育部门，在法律系任教。正当雷德曼几乎要放弃进一步“调查研究”的时候，恰恰是比较喜欢他的教授，给他提供了机会，给他讲了一些地下工作时的情况。“霍尔蒂的保安部门，是以手段残酷而著称的。”他说道。“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几个北阿尔迪亚尔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被关进了索迈栅集中营。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只是听人讲法西斯保安部门的手段，我绝不会相信。他们捆住我的双脚吊起来用铁条打，把我关在冰窖里，砸断我的手指，还用了其他一切难以想象的刑罚。但我都顶住了，一个字也没说。只有一次我动摇过：他们折磨我的家属，把我女儿带来，当着我的面强奸了她。那时候，我差一点就屈服了，我甚至想把手指头插进眼睛里，让自己看不到这一切。”后来，教授的女儿受了精神刺激，一直没有完全恢复。雷德曼曾去问过教授的女儿，索迈栅发生的事是不是真的。她当然没承认，她说这是编造的。这样的事，在一个并不熟识的人面前，她不可能承认。他还问她，她父亲是怎样被放出来的。她说她没在那儿呆多久，很快就把她放了回来，所以不知道

她父亲后来的情况。她也许从来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因此一提到这件事就想哭。

后来，雷德曼散出风说，他掌握了材料，教授曾经叛变过，是他同教授的女儿在一次单独谈话中，她亲口承认的。一些年纪大的人也说，象当时那样的刑罚，人们根本忍受不了。于是，雷德曼解释说，如果赫里亚努不是历史上有问题的话，他的职位早就应该比现在高得多了。而其他人也有意无意地跟着传播这些话。赫里亚努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审查，这样，他教研室主任的职位被年轻的副教授雷德曼所取代了。我跟教授谈了许多。他肯定告发他的正是我的朋友。我们成了同病相怜的受害者，我们共同受审查期间，一起蹲在一个牢房里的期间，成了好朋友。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许根本挺不下来。

“书报剪贴”的事我跟你说过。我在德国大使馆真诚坦率的言论，导致我被送进了集中营，也就是说把我投入了政治活动。我从巴黎回来之后——是维也纳仲裁迫使我回来的——本来是打算完全把政治忘掉。我回来是要看一看处在被强夺去的领土上的双亲。后来，我同学校一起搬迁到西比乌。在这样悲惨的形势下，难道我能够把政治忽略掉吗？尽管，我再重复一遍，我曾发誓要把科学摆在第一位。在这儿，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表现得越发清楚了。因为照我的看法，一旦思想变得堕落、野蛮，这要比战争，比任何一种大规模流行的瘟疫，更加具有灾难性。没有任何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任何东西仍然保持原样。对

待人是这样粗暴野蛮，甚至可以抓住你的手指，代替你选择思想……生活处于怀疑和经受考验之中，处于谎言和告密之中，以一种行军步伐的节奏，处于军服和掌声之中，一种无以复加的戏剧性。这一切在一些国家看得到，在北阿尔迪亚尔找得到。这一切在那边等待着我，我知道那些宗教执政官们想了些什么，圣巴托罗缪之夜①是如此之长，场面是如此之大。而那些要保持住自己心灵独立性的人们，如果不愿想的是一样儿，做的是另一样儿呢？那些不能忍受这死人般生活的人们呢？他们冒着危险公开站出来斗争，但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坚韧精神，而为这些勇敢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胆怯的人们在等待，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此。慢慢的，生命象古代计时钟里的流沙，一点一滴地逝去，思想逐渐停息，死亡，全身变成永久性的麻痹。有不少人只满足于吃和传宗接代，如果这两项天生的要求，能够以某种形式得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满足，也就算很好了！活着只是为了延续同类，只是作为由一代到另一代的传递物质。他们不会理解自身的崇高作用，他们的眼睛不习惯于光明，而是趋向于寻找那些中性的色彩。为了彻底破坏掉他们的精神注意力，那些栗色头发的心理学家们，把他们的精力引上了一条危险的途径：激起他们的高傲感和攻击性。我们活动的世界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首脑，他

① 指一五七二年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发生于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前夜的大屠杀事件。胡格诺派重要人物聚集巴黎参加首领婚礼，遭天主教派突然袭击，死二千余人。

们被固定在一只精心编织的网上，因此每个人必须对别人不断攻击、诋毁，才能活得下去。有谁想要说出哪怕极小的一点真相，立刻会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为了不把仇恨引向正常的方向，身居高处者看着下边的人们怎样把眼睛盯住最亲近的同伴，互相攻击，互相撕打，演出一幕幕惨剧。而这些大人物则得意忘形，暗地里也学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的同僚。如果你能够脱开凡俗，保持住镇静和清醒的头脑，看一看结构中这些极其简单的关节，你会觉得十分可笑。希特勒和耶娃·布朗，墨索里尼和克拉若·贝达契，就象白痴写的一出戏剧里的丑角。你简直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呕吐！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们的言论对我来说是幽默的无穷尽的来源，但这只能引起令人失望和痛苦的笑。一九三三年在柏林，一次就烧毁了人类最优秀分子写的二十万册书。我永远不会忘掉那些材料和照片。我肯定这样的制度不可能长久。但历史是严酷无情的：有时它快得简直无法使人跟上脚步，有时单调呆板又会延续几十年，把人们抛入一种颠倒混乱之中，就仿佛想要借此警告教训他们。当出现了第一次机会，我便志愿去了前线。但在此之前，我象瞎子似的苦苦摸索，只局限在单枪匹马的反抗之中。我把那些胡言乱语的演讲，穿军服的照片，有关的消息和语无伦次的答辩，都剪贴收集起来，打算写一本关于法西斯专制的书，一部带有插图的、叙述人类暴政和愚昧的历史书。我想要说什么呢？你当上将军，当上指挥官，当上头目，并不等于说天才会自动钻进你的头脑，

你就有能力驾驭广阔的科学文化领域。我对你说过，禁书，然后是焚书，甚至焚烧那些敢于思考的人，这一切确实激怒了我。雷德曼看来曾对我的想法抱有极大的热情，他给我提供剪报、照片、书籍，我逐渐收集起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专制主义档案。我岳父参加过克鲁日反对维也纳仲裁的游行，他对我讲述了一群农民怎样在修女罗曼赠送的母狼塑像前高喊：

公爵，公爵，弄走你们的母狗……

雷德曼收集了一支意大利军歌：

墨索里尼掌了权，
我们身无分文钱；
巴多里奥[①]当了政，
我们连面包也无处弄……

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拜占庭的血腥统治，那种用诗句和黄金包裹着的愚蠢，然后也许我就能够动手编辑了。但这不过是一种镇定剂似的游戏，我并不是最能够了解专制主义悲喜剧场面的人物。但我仍然有所收获：我很好地研究了一个充满怪物的世界，得到了一种敏感性，我能感觉到它们，甚至可以把它们当做一块试纸，我可以从它们的谈话、句子、动作、姿态当中预感到一切……如果瓦尔拉姆或者别的什么人并不是心存不良的话，我并不会有什么担心：那

---

① 意大利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军队头目，政府总理（1943—1944）。

些材料当中有着重号的部分，引人发笑的段落，控诉性的引文，本身便能说明问题。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竟作了精心的删选呢？这只能是出自雷德曼之手。当瓦尔拉姆拿来让我承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起，作为朋友，雷德曼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他，我也许照样落到那种地步，但这另当别论。我并不是甘心保持缄默的人，科学教会了我进行研究，对一切提出疑问，只相信那些亲自验证过的东西，而且验证过不只一次的东西。也许不在那儿经过这么多年，我永远也理解不了自由、友谊、尊严的真正含义，永远也体会不到一根小草，一片树叶，一角天空，一股新鲜空气，究竟有多么美。放风的时候，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才能够看一看天空，看一看自由飞翔的鸟。这一切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是瓦尔拉姆重复过千百遍的提问以外的新鲜东西。当他把"档案"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对他说道：

"不把全部材料拿来，我决不签字。"

他给我看了看关于材料的报告，一切我可以用于辩护的段落，都抽掉了。

"不签字也救不了你。自从我发现了这些材料，我就断定，你已经彻底地完蛋了。"他对我说道。

"我认为，最好还是你自己承认错误。你被骗了，搞错了。当然你不是第一个。"

"很遗憾，既然我押了你这么长时间，我是不可能后退的。而另一方面，你确实有罪过，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

明，时间用不了一个月。”

“你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承认的吗?”我对他喊道。

“把手伸过来。”他命令我道。我犹犹豫豫地把手伸了过去。

“你手心上的生命线太短，可惜呀！这就是说你会企图从这儿逃跑……或者说会有什么大灾大难在等着你。要知道，这完全可能。你们做医生的都是死脑筋，摸摸索索象些瞎子。你们根本什么大病也治不了。有时候你也会觉察到自己是多么混帐，或者感到自己有罪过。那时候你会把衬衫衬裤撕成条，搓成绳子。我见过这样的人。”

“我也见过，”我回答他说，“我希望我还能见得着，我相信这一点。”

说真的，他的威胁让我有点担惊：我知道，这次瓦尔拉姆说到是会做到的。在事实和法律的范畴，他从来没有越出过我们两个人而取得成功：对他来说，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欲望和力量的竞赛。我们两个都登上了拳击台，他要战胜我，因为没成功，便决定给我致命的一击，哪怕冒着犯规的危险。对他来说，不存在后退，不存在折衷，就象任何一个无知者，不能容许道理在别人一边一样。事实和真理就在他手上，用不着费力去找。

“见他的鬼去吧，”我给赫里亚努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他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可以肯定，过不了几个月，我就又会重新回到讲台。不可能不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我根本没有背叛行为。如果我能从这儿出去，你的问题

就再简单不过了，它会是我出去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但同赫里亚努谈过之后，当天晚上就把我同他分开了，把我弄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那儿只有两张床铺，另外一个人样子长得古怪，活象复活节岛上的一尊塑像：浑身干瘦，两根突起的肩胛骨，仿佛是钳在因缺钙而变了形的胸椎上的两根荆条。“费布尔卡先生。”只这样向我介绍了一句，再多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有些人生下来好象就是为了向别人表明自己赤裸裸的粗暴无礼。费布尔卡先生长了一副恶相：他发疯似地咳嗽，不管什么地方随便乱吐痰。他搜索着象是在寻找我的面包、水和吃的。仿佛他对一切能动弹的活物，都看不顺眼。他的病，不但没能使他有所节制，反而因此更加狂暴。我想要使他驯顺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我极力向他解释，说服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干粮。我以为这样一来他就会满意了。谁知，我越是对他表现出好心肠，他却越发得意忘形，肆无忌惮。一天夜里，我假装睡着，他竟故意往我喝水的杯子里吐痰，看起来象是一心想把他的病也传染给我。他就象是我们蹲的牢房的一个象征。这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丢掉谅解和仁爱，对他也进行报复。“如果瓦尔拉姆知道我在这儿不好过，一定会让我在这儿续继跟这家伙呆下去的。”我心里暗自思忖。后来，我狠揍了他几次，但奇怪的是，挨打似乎能够给他带来乐趣，他倒非常喜欢受这种痛苦。于是我也把他的饭倒掉，他用什么手段对付我，我也同样给以还报，结果这样一来倒奏了效。费布尔卡稍微温顺了些，只是嚷

得更加厉害，而且睡着的时候，老是自言自语。也许他在琢磨对付我的新手段。因此，我惊醒着不敢睡熟，怕他随时都有可能过来掐我的脖子，抠我的眼睛。后来，因为我离开了那儿，不知道他落了个什么结果，当然这也并不难猜出。一天夜里，我被带到院子里，带到另外一些人中间。一声长长的口令之后，让人们站成四排，由卫兵严密警戒着，深更半夜穿过城里的街道，天放亮的时候，走到了火车站。队伍里我的右边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卡拉米哈依，君主制拥护者。在街上走这一趟，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他甚至都想跳起舞来。我的前边是个律师，格尔贝亚，我以前就认识他，有一次他喝醉了，组织了一个政府，当然是开玩笑，他自己宣布当总统兼运输部长，因为每天他都要载着他这个没有财政来源的"政府"，从一个酒馆到另一个酒馆。现在他也显得兴致勃勃："瞧，到底离不开交通运输，还是我会挑选职务。有朝一日告我密的家伙落到我手里，我要专门为他成立一个丧葬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部，就连海地的皇帝法斯丁·索洛克，还有那些封过爵位的大人物也都没想到过。"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甚至忘记了腿上的创口。"我们是什么呢？"他对我们开玩笑说，"一些寄生虫，一群野兽，一堆被扔掉的破烂。我们是祖国那张洁白的脸上的黑痣。我们这些麻风菌，肮脏的眼屎，说谎的巫师，行尸走肉。是我们阻住了进步的道路，我们是一群瞎子，聋子，一群坏蛋。我们还等待什么呢？宽容吗？赦免吗？给我们空气吸，有我们需要的交通工具，给

我们空间、时间，让我们反省自己的罪过，我们应该感恩不尽。只要我们还能活着，就算是交了好运。跪下，你们这些历史的蛀虫！为了你们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该受到审判和惩罚！”

我的左边是米克莱，过去民族农民党的议员，手里拎一只大木箱，累得直出汗。这是他落选后，“为防万一”而“特别定做”的。“我们要一切准备好，让他们吃一惊。”他这样对他妻子说。

我向前走着，心情并不紧张：不远的地方便住着我的亲人。通过奥尔迪亚努，我也了解到了一些他们的情况。前边——一个未知数，对吉凶未卜的担惊，一种预感到可能回不来的感情。铁路上边的拱形天桥上，几个行人停了下来，惊奇地望着我们，又匆匆忙忙地跑下桥梯。我们躺在车厢里，火车就象停住不动似的。我们谈论着刚刚看到的桥上那几个人，就这样挨过了这个长长夜晚的大部分。看到的这几个人里，有个穿长罩衫的瘦瘦的小伙子，身旁的姑娘穿一件黑色的长裙，臂上搭着一件灰色风衣。看到他们，我们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叙述了自己的过去，倾诉了自己渴望得到自由的心情。

在前线，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一对：是他们把军团的神父送了回来：神父在一次战斗中弄瞎了眼睛，他摸索着往回爬，不想却搞错了方向。两个青年人把神父送到救护站，对我笑了笑，安心地匆匆离开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们几句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这个梦一直照样重复了好几次。但自从我离开雷德曼和瓦尔拉姆——以后的事对你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当时我还年轻，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寻找一直困扰着我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我发觉想取笑我的人，又顽固地把这些恼人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而时间却不再等人……如果你能感觉到时间是怎样一点一滴的过去，那么你就会觉得出，精神创伤比肉体的更为痛苦……

十 六

本年四月八日，星期二

今天，如果不是阿纳尼亚有计划地破坏，我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这个阿纳尼亚又一次被证明，简直是个猪狗般的禽兽。他比我十分了解的合作化时期的那些土匪还要卑鄙，还要危险。但是在记录细节之前，我要说明，我曾经到女秘书同志那儿去了一趟，想验证一下关于调一部分人下乡的事，别是阿纳尼亚同志故意编造出来骗我的。“现在的事一天一个变化，这完全有可能，”她这样说道，“这是件好事。党和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十分英明的，我举双手赞成。”我没再继续听她的。我要指出的是，她完全是装作正确和有原则性的样子，因为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不，我甚至可以说，情况完全相反。我翻了一下我在家记的日记里关于她的材料，可以断定，她完全是卖身投

靠了教授。原先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助教，而克里斯蒂安同志不让她学会提高劳动人民健康水平的技术，却净教她跟纸片打交道。因为她长得漂亮，当她听教授口述，替他打字的时候，教授的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便偷偷溜向她的大腿和鼓得高高的乳房。我不敢发誓说教授的手没有趁机在她胸前摸来摸去。班奈德斯卡的两只乳房没有这么大，因为她不愿生孩子。而有些女同志不结婚也生孩子，她们喜欢养孩子，为的是身后留下点骨血。

我从约内斯库护士那儿得知，约尔卡大夫突然发疯了。人们强制着把他送进了精神科。在这个医院里有人发疯，其实并不奇怪。这样的环境气氛下，任何人都有可能离开正道。这位医生同志，很久以来就引起了我的怀疑。过去的这几个月完全证明，他对我们抱有敌意。究竟谁会对劳动人民取得的成就、成绩，不抱欢欣鼓舞的态度呢？有谁会不喜欢自由和平等呢？除非是必须捆住手脚的疯子。约尔卡大夫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远离群众。他老用一种战战兢兢的眼光看着周围，尽量躲开人们，就象他见到的所有的人都是敌人，都是特务，都想要加害他似的。这一切足以证明他思想负担沉重，整天琢磨那些解不开的事，要不然不会这样头脑整个发疯。我最后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就仿佛要一口把我吞下去似的。半晌，他对我说道:“见你的鬼去，你这条蛆虫!”我说要把他这种无礼举动反映到劳动人民委员会去，而他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又叫了我一声蛆虫。据说有一天他没来上班，

他的好友杜米特列斯库医生到他家去找，他妻子说，他从昨天就一个人锁在屋子里，说是有好多事要做。于是，两个人一起弄破了屋门。约尔卡医生正躲在床上不住地打颤，他不要同任何人讲话，两眼瞅着他们，象是根本就不认识。

我到精神科去找了斯特凡，他是那儿的化验员，是我的朋友，他领我去见约尔卡。这儿的混乱情况简直叫我吃惊，人们竟随随便便讲一些反动言论，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约尔卡医生在睡觉，但我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这些人头脑里想的东西，简直让人惊骇不止。有一个走到我面前说，为了建立一个抗旱和反新教会计政治协会，让我交出一千列伊的会费和一面旗子。另一个，见人就打，说是因为他们不愿去开会。还有一个竟自称是上帝。有一个在区委会工作的职员，拿一块纸头一股劲计算，说是要算一算战后以来我们的政府究竟欠他多少钱。还有两个记者，正往墙上写标语。他们要写些什么胡言乱语，听了简直让人害怕。一个对我解释说，这儿要成为一个独立岛，而且发布了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学会尼泊尔语，但要用唱歌的方法学，说这样学不管学什么，都比较容易……我猜想，刚才那个算算术的，可能是个搞了违法活动的会计，当然只是主观感觉是这样……还有个老头，说起话来象开动了马达似的嘟嘟不停。他说他是刚刚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叫依里耶。但我没有看到一个是由于什么正经的原因疯的。我想，有关部门应该进行干预，开个会，对所有的人逐个进行认真的分析。这儿的大夫简直太宽容，我没看

到任何一个对各种谬论进行批驳，而正常情况下，至少应该有几个大夫出来表态。有个青年人竟对我宣称他是哲学家，但我没耐性听他的：他的哲学不关别人的事。另外一个不停地哭，说他受了迫害。我不由得这样想：他们头脑里的这些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会让他们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受迫害呢？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混乱。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反映这儿的情况，教授根本不管这些，他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

回来之后，我听到了一些同志对约尔卡大夫的反映，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说："在这样一个匆促无情的世界里，他的性格也实在太脆弱。他坚持认为没有别的出路，认为我们今天已经走到了文明的尽头，他无法应付当前的情况。他的心灵受了创伤，对谁都不相信，对谁都害怕。他自以为是个没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我倒要问一问，这位同志有什么权利坚持这种思想？他留在城市工作，国家分配给了住房，而且一直受的是免费教育，那么是谁阻碍了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呢？究竟还有什么使他不满意，他还觉得缺少什么呢？萨乌大夫同志说道："他不是那种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人。"那么他是什么人呢？这位同志究竟打算暗示些什么呢？普洛丹大夫同志说道："少见的天才就这样完了，遗憾的是人们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有人说他是呆痴，但我可以肯定，是一种恐惧型的思维紊乱。我很了解他。太可惜了。"难道真是这样一个值得可惜的人物吗？这种鄙视一切、不可一世的态度，从哪儿来的呢？除了他和约

尔卡，仿佛别人全是笨蛋。怎么能这样呢？难道这样的人称得起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可以放心地把学生交给他的、有觉悟有能力的同志吗？请看克里斯蒂安教授都培养了些什么人！班奈德斯卡大夫同志说道："有时候精神上让你紧张得受不了，简直没办法自我控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跟上这种步伐，这种速度，都能满足这么多的要求。"这我倒相信！又是教授，又是尚且不知姓名的人（暂时），又要显出真心实意，又要装得讲求道德，当然很难做到应付裕如。一个安排在住处，另一个安排在上班的地方，一个出于满足需要，另一个为的是金钱和地位，到头来弄得精疲力尽，简直不知道选择哪个好。你总不能同时登上两只船。鲁苏大夫同志故意装作开玩笑的样子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离格的地方。"这位同志一直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在这所医院，你必须有尼古拉大夫同志那样的毅力，才不致被这些专门背后制造流言蜚语的人感染。

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发现，教授曾亲自去看过约尔卡大夫。约内斯库护士说，教授真是难过极了，恨不得自己发疯来代替这位同志。不管怎样，我要弄清楚约尔卡大夫究竟是怎么疯的，什么原因，他和教授是什么关系，以致教授难过得要代替他。在疯人院教授同志肯定会同病人谈得很投机，因为这儿所有的人都跟他的思考方式一样。

我知道教授同志不在，就去找阿纳尼亚同志，想看看一直拖延下来请我喝啤酒的事，是不是还算数。他一看到我，却立刻问安德烈的衬衫和三角裤是不是给他带来了。

我回答他说，得跟他好好谈一谈，把事情讲清楚。我告诉他我不是傻瓜，化了这么多钱得到的东西，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交给他。他三步两步走到门口，倒锁上屋门，拿起那种能够立刻引起癌症的东西，对我说道："我早就想给你身上倒点儿，正好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要是你没把安德烈的裤衩带来，那就把你自己的扒下来，以后咱们再交换。要不然你甭想从这儿出去。"他非说是告诉过我，不是来交裤衩，不许我到这儿来。我知道他根本没说过，他在扯谎。"一起去喝啤酒的时候，我一定交给你。"我对他说。而他手里拿着那东西，走过来逼着我扒裤子。"我家里有爱人，"我对他解释说，"她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说呢？我怎么向她解释呢？我在家里的威信和权威往哪儿摆呢？"他不怀好意地挖苦说，没有裤衩威信会更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确实是男的。到最后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照他的话办，要不，他就把那东西往我身上倒。"要是你不愿意让我把内裤寄给你老婆，或者不愿意让我亲自交给她，那你得天天到我这儿来，给我的狗和老鼠打扫卫生。除此之外，你第一次来打扫的时候，就得把安德烈的内裤给我拿来。"应该承认，这个过去的富农分子骗人手段十分阴险狡猾。他知道怎样利用我生活伴侣的高度警觉心理，企图破坏我和她之间从幸福的家庭生活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相互谅解。但重要的是我还要跟他一起呆一段时间，也许以后他会改邪归正。我还要认真查一查安排他工作时的合同材料。这个浑家伙对此还嫌不够，又拿着那东西逼着我

给动物刷洗。不幸的是一条狗见我是生人，扑过来照我胳臂上咬了一口，我不得不飞快地跑到传染病科注射了一针狂犬病疫苗。而阿纳尼亚不但不感到造了孽，反而笑得前仰后合，并且嚷道："要是再让它咬你一口，你去见你的老婆，不但没有内裤，就连裤裆里的……也没有了。"这种肮脏的字眼，要是写到我的日记上，简直羞死人。万一我出点什么事，上帝保佑，发了疯或者生了病，我一定要打个报告，连教授带这个白痴一起追究！

按照我的工作日程，我去找了教授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但使我惊奇的是她已经离开了医院。病人卢普·玛丽亚同志说了如下的话：

"克里斯蒂娜太太感觉身体挺好，她去找了教授，噙着眼泪请求教授放她走。她从教授那儿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个大包和出院单，情况就这么多。"

"包里装的什么东西？交给她出于什么目的呢？"

"不知道，我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

"但是你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形吗？你认为包里会是什么东西呢？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嘛！"

"什么都可能：吃的，衣服，药，书，玩具，谁知道呢！"

"难道就一句话也没说？"

"说了，她说她还要回来，还跟教授有件事。"

应该怎么分析呢？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教授发现了什么，要通过这个疯女人寄到西方去呢？她完全可

以同那些派出来伪装旅游的人接头，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她懂那些国家的话。

为此我去找了阿纳尼亚同志。我对他说："我说阿纳尼耶，我来帮你照顾一下动物，现在我没事，有时间。另外呢，你瞧，我都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你还老是取笑我，拿我开心。怎么说呢？我总喜欢干一些事，就是你还给我裤衩以后，也还照样帮你干……"

"裤衩我是不会还给你的。不过新规定下来之前，我暂时免除你的清扫劳役，因为教授吩咐过，任何人不准进实验室。"

"那你们就没发现什么新东西吗？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在议论你们。"

"当然发现了，说出来管保叫你眼睛瞪得咧到后脑勺。"

"发现什么了？"我问他道。

"暂时保密。所以说还是请你走开这儿。你以为我们没日没夜地呆在这儿，是为了白白浪费时间吗？"

看来问题很重要，而且这位女同志的出院同阿纳尼亚同志说的情况有着明显的联系。对教授所有的合作者都应该挨个询问。如果有机会，夜里趁这儿没人的时候，我要进去看一看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回家的时候，我顺便去看了看那些工伤事故受伤的工人同志。他们反映了如下的情况：

布尔赞·依昂同志：

“约内斯库·普·瓦西里主任同志交给波尔里亚·瓦西里工长同志一项任务，让他跟布蒂安·依昂神父谈一桩交易，卖给神父一部分沥青。神父要铺一条从公路到家门口的柏油小路，再加上铺一下房子周围的防水槽和到储藏窖的小路。神父到底主意多，钱是当着我们的面交的，防备万一有什么事好有人证。后来工长同志让我们给神父干，最后一分钱也没给我们，连口酒也没让喝。”

邦丘·瓦西列同志：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工长隆戈·瓦西列同志多次派我到主任那儿去，每星期给主任送一大包猪肉香肠和猪油，为的是保住他工长的职位，因为他只有小学七年级的学历。这些东西每次我都是开一辆大卡车去送，亲自交给主任夫人同志。

“还需要说明，每次主任到工地来的时候，从来不跟我们谈生产上的问题，而是跟工长同志们一起去下饭馆。让我们做的只不过到时候鼓掌欢迎。除此之外，每天让我们干活一直干到夜里很晚，因为他把别人都派出去干私活替他赚钱了。

“工伤事故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正在睡觉，工长波尔里亚来到工棚把我们叫了起来，让我们开卡车去给主任同志往家里送两只母鸡、一袋干蘑菇、三只野兔、十公升李子酒，还有布蒂亚努神父同志送给主任的一桶葡萄酒。这只桶太大，所以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帮着装卸。

“回来以后，我们都累得不得了。我们给他提意见，

要求给一天休息，因为当时的情况根本不能再开车干活了。而工长同志抄起一块木板子就照我们打，还说如果我们完不成工时定额，就解除我们的工作合同。如果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没法养家过活了。”

古丘勒蒂安同志：

“主任同志按照自己的设计建了一座桥，后来桥塌了。调查组来了之后，我们告诉他们，建桥的材料都卖给了私人，是我们被逼着运走的。结果主任同志竟没事，因为他县里有关系。我们却倒了霉，受到打击报复，让我们干很重很重的活。最后一次让我们用卡车运木板。卡车装得满满的，连检查也没检查就让开，结果一下子把方向盘下边的连杆弄断了。要不是上帝保佑，哪个也甭想逃活命。”

最后我要记的是，由于阿纳尼亚同志的缘故，我爱人对我没能采取正确的态度。那些喜欢偷听和对别人幸灾乐祸的邻居对我的指摘，也都同样是出于阿纳尼亚的原因，而不是听了些什么带有倾向性的消息。

十七

克里斯蒂安教授回忆起他总括式的、平铺直叙的自白，发觉恰恰没有说到本质，以致安德烈并没能明白什么。想到这儿，他竭尽努力企图把脑子集中一下，但思想却不由自主地老是围绕在固定的一点上：抗癌药。他整个都做过验证，看来斯皮尔曼的乐观并不是没道理的，他们终究还

是前进了一大步。从几十种当中选出的这种物质，能够牢固地附着在乳酸上。只是目前对癌细胞的杀伤力还比较小，而如果加大剂量，又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害。那么，是提高药物对癌细胞的杀伤力呢，还是再找一种新的媒介？他知道，答案十分复杂。但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使他无法再想到别的事。他预感到结束探索的时刻已经接近，比经验能够告诉他的更为接近。多少个夜晚，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件事，睡梦里还在作电泳试验，甚至给吃饭的时间也留下了一个思考的题目：如果……那么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一种无名的冲动促使他并不觉得难为情，一定要找出个合适的名字。诺其得——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他本想找一个更美一些、更不一般化的名字，现在的这个他并不满意。也可能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过去的旧名称E①，E117。他把每一次失败的试验，都用第多少次的数字来表示。随着过去的这些年，数字越来越大。现在正等着E118动物试验的结果。他真想把这个倒霉的E彻底抛掉。有没有可能这个E118就是诺其得呢？

安德烈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因此现在他有时间来考虑他的药了。但对刚才作的自白，却觉得有些恼怒，竟没有说出来最本质的东西。也没做到从头到尾真诚、坦白，而且时机选得也不对，因此不可能指望会有什么反应。跟他说这一切，无非是让他理解，一场友谊是怎样毁灭的，

① “失败”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如此而已。不管怎样努力，但安德烈已经失去了兴趣："是的，是有点让人伤心，"似乎安德烈想对他这样讲，"但这究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比起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故事，比起外公的波河[1]战役，并不更让人感动。已经过去的历史，没办法再倒回来。因此最好还是走出你那陈旧的战壕，看一看今天人们是怎样斗争的。"但安德烈还是耐心地听了，尽管不太理解父亲的声音为什么颤抖，为什么重复当时的话语时那么激动。至于道理在哪一边？似乎应该平分：那时候是父亲对，今天应该分给雷德曼——父亲对待雷德曼的态度并不正确，他把事情弄了个颠倒，雷德曼不过是个普通的病人，仅此而已。

克里斯蒂安教授真想把思路再回到安德烈身上。安德烈是那样羞怯地、迟迟疑疑地离开了房间。教授本想彻底平息郁积许久的心病，想对儿子进行一下详细的解释，但随后立即放弃了这种念头。"无非需要明辨一下是非，但我却没有什么可替自己申辩的。如果他还有一丁点儿智慧，那就应该懂得，有些事，有些话，用不着摆到当面，不需要伸着指头一个个明指出来……"但遗憾的是他无法忘记安德烈并没有说话。开始是以怀疑甚至有些讥讽的眼光望着他，以致教授真想给他一记耳光或者立即把他轰出去。后来，安德烈的样子尽管有些变化，但迷惑不解或者不信任的神情并没有消失。教授本想这样回答他："有朝一日

---

[1] 意大利东北部的河流。一九一五——一九一八年期间意大利和奥地利曾在此进行过多次战役。

这些事也会轮到你头上，你会看到哪些可能，哪些不可能，哪些值得作出牺牲，哪些不值得。”但这念头结果还是放弃了。他感觉最后的日子已经临近，尽管不是多么近，但比谈话之前还是近了不少。“谁知道我们还会在哪方面碰面呢，如果注定要碰面的话！”对往事的回首，又逐渐把教授带到一片滑溜溜的地面："我这一生现在到了第多少个E了呢？”他并不想寻找答案，只是思路这样跳跃不止，这样不住地自问，又使他感觉到了旧时的伤痛。“就好象有个瓦尔拉姆式的人物强迫我写自传，强迫我声明……但声明什么呢？还有什么需要明确的呢？我现在到了第多少个E？也许是最大的一个E，就是这样。”

他又想躺下，又想出去散会儿步，最后还是选择了前一种想法：到外边万一碰到安德烈呢？他不愿这样。安德烈好象出去了，要不就是温德尔太太关的门，一到晚上她习惯于锁上所有的房门。“这孩子在想什么呢？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呢？目前我们还是很难说得通。也许应该你到我这儿来，”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因为你并不了解我同时间、同自己年龄的对话。也许我们应该接受现状，我并不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你，我并不赞成把某些思想强制地塞进头脑……但我无法忍受我们两个之间保持的距离，只有两个人的这种折磨人的孤独。我终于走了出来，但两条腿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撑着我的身子在迈步。也许首先是由于你的原因我才能够感到自由，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但由此却招来各式各样的对头：不可一世的傲慢者，

谨守教条的胆小鬼，智力不全的笨蛋和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弄得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对付。我还象从前的样子，不来把水搅浑，难道不是更好吗？”克里斯蒂安这样自语着，他只剩下一种无名的不满：“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使他不由惊跳了一下。“是哪个见鬼的这么晚还来打扰我？”他这样想着，看了看表，才发现不过刚刚九点，而他觉得已经应该是深夜了。他不由自主地先想到医院：不大可能会是别的人。也许考德里亚努又有了新的建议：“你在那儿战斗，而我负责鼓舞士气，指示你应该怎么办。考德里亚努吗？一个毫无负担的人，只知道糊里糊涂地跟别人斗，但从来也没有为了作出更多贡献，为了更沉稳而跟自己斗过。也许是个单纯想走捷径的人。或许我对人们还没下功夫了解，而过于匆忙地进行评判？是一次任何人都不想负责任的干预？或者，是雷德曼！”忽然脑子里这样闪了一下。“雷德曼，我的病人！但他身体情况很不错，手术后我还去看过他，跟他谈了许多，了解到他有两个孩子，正在上中学，将来准备让他们学医。幸亏安德烈年龄比他们大得多，不然的话，变幻无常的命运很可能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他的品质如果多多少少传给下一代的话，说不定过去的历史又会重演。”

从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克里斯蒂安教授吗？是吗？”接着是一阵长长的停顿和几声叹息，最后才继续说道：“真见你的鬼！一个人锁在屋子里好清闲！在我正式提出要求调动以前，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薇拉，是你吗？”教授激动地问道。他还想说他感到意外地高兴。他一直在等着她，从来没有觉得一切已经真的结束，尽管逻辑上这样一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戏剧，最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结局，他应当为此感到庆幸。“你是怎么啦？这么多天没见面，一上来就这样口出不逊，对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就这样没礼貌吗？”

“再让你见一次鬼吧！”她嚷道，“我才不管你岁数不岁数呢。你不用老是卖弄自个儿的年龄！”

“你想让我把你调到哪儿去呢？”他开玩笑似地问道，“写申请书了吗？”

“人家这么难过，你在那儿还拿人寻开心！难怪有人说你是个冰块，缺乏感情，披着一张科学皮的猿人！”她极力想抑制住自己的声音。

“你站到反对派那一边去了吗？喏，随你，这是你的权利。我已经老朽，冷冰冰，没有人情味，感情枯竭，随你怎么说！一个阉割了感情的人，不知道爱，不知道恨，感情温度等于零，只会眯住一只眼看显微镜。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害怕社会生活当中的失败，我不敢跟人来往，与世隔绝，或者，我得了癌症。这你该满意了吧？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教授不安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薇拉坦率地回答，“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绪坏极了，好象没办法再忍受下去。一个人呆得我两只耳朵嗡嗡响，简直喘不上气来。不，不知道怎么对你解释，模模糊糊，有些害怕，又有些心神不安。我试着

喝酒，放几张唱片，最后决定看点书。我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谁值班。我想到医院去，去工作。可护士长挺客气地对我解释，说你不在实验室。直到这时候我才有勇气承认，我是在找你。如果找不到你，我想我真的会一个人到医院去，呆在那儿……你明白点儿什么了吗？”

“只能尽力而为。”教授说道。

“把你的理智丢给该管的人去管吧，不是所有的理智都是合乎逻辑的，都能够计算，都能够代进公式里。”薇拉提高了嗓门，“我厚着脸皮向你乞求这一丁点儿理解，我只不过想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包含友情的声音。你耐一耐性子，我并不想要什么诊断处方……”

“不，我并不想听这些。”教授这样解释着，一时间蓦地看到妻子长长的黑发散在枕头上。不知从记忆的哪个角落，仿佛听到了叫他的声音：声音里没有惧怕，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只是单纯地叫他的名字，更确切一些，低声的呼唤。他闭上了眼睛，以便阻止住似乎应该叫做眼泪的热物：“我离开你越来越远了，”他心里默默地念道，“甚至可以说把你赶走了。因为终究我还得继续生活下去，还有这个需要。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然后他对薇拉继续说道：“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情况跟你也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也许因为是科学院院士先生，就不肯迈这第一步！院士只是为了成绩，为了名誉，才肯向前。为了不失尊严，宁肯自己受折磨也不肯承

认什么，也不肯向前迈出这一小步。”

“要说善于想象，你还差得远……”

“那我究竟善于什么呢？你以为这是我感兴趣的吗？我只知道……喜欢找你谈谈……”

“你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呢，薇拉？”教授失望地问道，“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慢慢熄灭，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我也感觉不好受，象是六神无主，疲乏，更可能是年龄，不知道，很难说……说到我，你瞧，不管多么精确的词……”

“得啦，”她生气地反驳道，“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忘掉你这一套？我只想在你身边哭一场。哪怕你骂我，吵我，可你知道，我还是想要你的手在我头上摩弄一阵子。你就不能忘掉你的E117，E1000吗？哪怕只一次，就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到这儿来一次。丢掉你那些道德啊，名誉呀，职务哇，忘掉你自已，忘掉那个神圣的大学者，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如果不能作为一个人的话——到我这儿来一趟……”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还认为我曾经对你有过用处，如果你哪怕只有过一次这样的印象，我们曾经互相理解过，那你就试着回忆一下吧。反正我什么都没忘。我并不要你跟我睡觉，要是为了这，只要到街上去，我可以找到一大堆。我需要的是别的。我简直没法一个人呆下去，烦得受不了。我真想大声喊叫，点把火把自己烧掉。但是

从这么多办法里，我只能做到哭一场，不顾羞耻给你打电话。要是妈妈在家我用不着这样，听听她讲故事也就满足了。见鬼的，你那个章程就不能稍稍破一破吗？”

“薇拉，我，这你知道，”教授吃力地咕哝道，“你瞧，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还说什么？立刻穿上衣服到我这儿来。妈妈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呢。”

“你想好了吗？”教授又问道，“确实是需要我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倒觉得很高兴……”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行还是不行？你还想让我到什么地步呢？天哪，我是个女人！”

“是啊，我知道，我不是想说这个……”

“好，为了不给你造成道德上的影响，我发誓，明天我就要求调动工作。”

“净说傻话。”

“那我等你。”她毫不犹豫地说道。“请别来晚了。这么说你来，是吗？”

“是，当然，只不过我得换上衣服。”教授为了赢得一点时间，好从惊愕当中清醒一下，于是这样扯谎道。而她不再继续说下去，挂上了电话。

随着听筒放在电话机上的闷声一响，教授立时感到不知所措。前厅里的灯已经熄了，只有通过摇曳不定的松枝，才透过来几束街灯的微弱亮光。他向后面看了看：安德烈还没有睡，或者，至少还没有熄灯。也许在看电视，谁知

道是些什么有趣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他已经不能给儿子讲这样的故事。是的，直到今天晚上之前，他没有编造过什么来骗儿子，而是保持了沉默，或者有时候装出一副犹疑不定的样子。他又向周围环视了一下，黑暗却帮了他的忙。是的，他感到高兴，仿佛从手里掉下去摔成两半的玻璃球，又正好对上了碴儿。为了这种幸福，他并不需要什么，但他怕它就这样离去，于是又小心翼翼地坐进了扶手椅，一边低语道："多奇怪，多么奇怪！"

靠近保姆的屋门，一只大黑猫睡在毯子上。也许由于正在做什么奇怪的梦，偶尔发出一阵长长的是疲倦还是惬意的呼噜声。院里的松枝不安地沙沙作响。透过窗下干裂的缝隙，钻进来一股冷气。"也许外边在刮风，应该把围巾带上。"教授这样想着，不由感到一阵羞愧。他想象着自已干瘦的双腿，白色的汗毛在一条长长的伤疤上卷曲着，昔日强壮的毛茸茸的前胸，如今却在吃力地一起一伏。"胸气肿，"他就象一个规矩的二年级大学生似的这样说道。尔后，见她躺在床上，蓬松的头发盖住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样紧紧地咬着牙齿，长出一声叹息。她那年轻丰满的胸脯，抽搐般地上下起伏。舒展开的结实的肌肉，就象一条条钢筋，而向两边弯曲的根根突起的肋骨，不由使人联想起收紧了的翅膀。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撩起头发，懒洋洋地嫣然一笑。"一个具有标准曲线美的女人。"教授想道。随后，她用肘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臂膀，那样短暂轻微的触动，把他从呆痴般的宁静中唤醒过来。接

下去，又是满足夹杂着悔恨，孩子般地羞怯难当。每次他都感到需要说点什么，但词句却总是连不成串。他感到困惑，犹豫，想离开，想跑掉，但却立即被她那忧伤而失神的目光攫住了。于是，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低语道："你也安静一会儿。"而他，软酥酥，飘飘然，静静地陶醉在她阵阵发香之中，睡着了。他正要这样，因为他害怕说话，害怕目光互相碰到一起。就这样，过了半小时，等他醒来的时候，她却刚刚入睡。他一动也不敢动，后来，他感到一阵羞涩，于是把她的头轻轻放在枕上，自己站起身。他忽地觉得孤单，就象身处异地，这当儿他才感觉有必要自我解释。但她那均匀轻微的呼吸，不允许他说一句话。他感到有愧于良知，于是失望地自语道："我们之间到底会怎么样呢?"每次她总这样回答："你怕什么呢？难道这就是折磨你的事吗?"但这却无法减轻他的过错和隐痛，而这种过错，由于他的辩解——"我也应该以某种方式活下去。"——更显得不可饶恕。一说出这句话，连他自己也感到要呕吐。他并不想说这个，但感情却比这复杂得多，就连薇拉也无法使他把这种空虚感抛除净尽。

街上驶过一辆载重汽车，可能是一辆超载的柴油机卡车。在震耳响声的间歇里，他迅速把两条腿伸到桌面上。他感到一阵阵的关节疼。又该变天了，后颈也显得越加沉重。"天哪，该不是丝苔拉……"他吃惊地问了一句，接着，毫无理由地张开双臂，就仿佛去迎接她，又象是要阻挡她。他裤子落到了膝盖以下，觉得有些冷。忽地，瑟瑟

缩缩的手指触到了大腿直到膝盖的一条深深的伤疤。"太深了，长不平了。"疲倦和犹疑不定，使他无法动弹。周身失去了活力，只有右手手指还能顺着腿上的伤疤来回抚摩。外面的光线不知不觉间慢慢变白了。

……叫我到监狱探视处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仍旧一动不动地呆在牢房里。只要离开这儿，不管去哪儿，全身都会立刻打个寒战。是向另一个世界，但我并不相信真的就会到达那儿。瓦尔拉姆乏味的手法，对我已不陌生。我怀着惜别的心情向同伴们招了招手。路上我想，也并不排除小队长奥尔迪亚努安排的又一桩奇迹。也许瓦尔拉姆另有任务，到别处去了，因为有时一连几天都见不着他的面。象我这么顽固的或许不止一个。我忐忑不安地想问一问小队长，但他压低嗓门告诉我让我住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把家里什么人带到这儿来了。也许到那一刻我的忍耐力会被彻底摧垮。不管怎样，我极力避开朝这方面去想。但我的猜测却平生第一次应验了：我见到了丝苔拉。她穿一身黑，脸色憔悴、苍白，只有那一双眼睛还闪烁着使我毫不怀疑的精力。事实上我可以断定，我从来没能完全了解她，总是没有这样的机遇。我心想，又是一种新的折磨人的手法。是想激起我对家人的怀念，悔恨不能过外边的团聚生活，或者，她被迫承认了什么，让我们两个对质。但不管怎样，能够见到她我感到格外高兴，特别是她来自那个已经被遗忘了的遥远的世界。我用眼睛询问她怎么样，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说很好。她的背后，

门是半开着的。我把两只手向她伸过去，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紧紧地握住。看守的士兵企图分开我们，于是我只好放弃，免得连话也谈不成。

“孩子身体挺好，又长高了。生活上我们能够应付。爸爸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你不用挂心，你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做好了。”

看来情况丝毫没有转机，我却觉得比任何时候更为坚强:“把东西都卖掉，不要苦自己。打听到爸爸的消息向他求援，他会帮助你们的。可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我找了瓦尔拉姆先生，我打听到是他管你的事。我直接把他叫到大门口，我对他说，我并不求他什么，我来只是想见见他，记住他的模样，好永远也不忘掉。我想要看一看无辜加害于你的人，就这些。我直瞪瞪地瞅着他，我可以肯定，这一辈子永远再也忘不了他。后来我谢了谢他，转身要走。他感到十分意外，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脑子才清醒过来，于是同意让我见见你。”

“就这样简单吗?”

“是的。”

我真想大声喊:“你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才让你来的?”而我心里却想，她为了这次会面，一定作出了牺牲，但也并不排除是瓦尔拉姆的新花招。“学校教研室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你不用指望别人帮忙，只能靠自己。不错，波普教

授为这事抱怨过，而且说打算要求会见上一级领导。但是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什么动静。他也是胆小怕事，想先弄清楚究竟，于是见人就问，可人们谁都不说话，耸耸肩膀，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瓦尔拉姆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我敢肯定，他一直在门口偷听。“哦，神圣的家庭团聚了？您瞧，太太，一切都取决于他。只要他想得开，我并不想扣留他。谁都免不了犯错误，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只要你把匪徒集团的名字告诉我，你就自由了。”

“他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匪徒集团。”丝苔拉说道。

“看来您是不想再跟他了，太太。您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吗？我对他也非常了解，我敢肯定，没有他您会过得更自在。而你，大夫，就忍心舍下这么一个美人吗？情愿把她舍给别人吗？”他一边放肆地这样问我，一边又瞥了一眼丝苔拉。丝苔拉头脑很快清醒过来，当即给了他一记耳光。而我竟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瓦尔拉姆大概对此早有准备，因为他并没有后退，相反，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一下子把她的胳膊拧到了背后。我平生从未那样大声嚎叫过，我简直发疯了。我扑到铁丝网那儿，士兵立刻过来阻止我。我的两只眼睛憋得直冒火，我抓住铁丝网拚命摇晃，但立即又被推了过来。我简直变成了一只受伤的野兽，为了自卫而拚死挣扎。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发觉已经在牢房，赫里亚努正俯下身子替我揩擦脸上的脏物，旁边还有一个叫波依查苏的，是个扒手，两

个人又一起替我整治腿上的伤口……

在监狱的这段时间里，克里斯蒂安很少能够摆脱开瓦尔拉姆的形象。一想到他，教授便立刻感到失去控制，理智便会立即丧失。有好几次在长长的走廊上，克里斯蒂安按捺不住，心里不由暗暗思忖："我轻轻走近他，冲他一笑，然后立刻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以后的事就让上帝去安排。"这样的决定无疑是荒唐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尽管他寄希望于意志，但他深知这无非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瓦尔拉姆没有用力量把他制服，但却把他变成了一头难以驯顺的野兽。后来瓦尔拉姆再没允许他离开靠近门口的那张小桌子，自从丝苔拉来探望，他同瓦尔拉姆见过那一面之后，桌上就摆了纸和笔。

"好了，我没功夫跟你浪费时间。"

"本来，不管为了什么，我都可以原谅你，"教授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句话，但瓦尔拉姆却装作没有听见。于是教授又重复了一遍："不管为了什么，本来我都可以原谅你。对于那些没头脑的人，智力低下的人，我是从来不记恨的，因为我只当他们是生就的。但是对你，我却永远不会原谅。"

瓦尔拉姆洋洋自得地冲教授眯眯一笑，他根本没听教授讲了些什么。尽管克里斯蒂安心里还在念叨着："万一他走近我，万一我躲过其他人的眼睛……"但幸运的是终于立即改变了别的话题。瓦尔拉姆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样子很得意，一直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意味深长地看了看

四周的墙壁，然后拿出一大叠散乱的照片摆到了桌子上。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忽然记起了克里斯蒂安，于是带着厌倦的表情说道："在那儿写上：匪徒集团成员的名字，城里和邻村的几个联系地点，你同布迪勒的关系，而且承认你保存了法西斯分子的宣传材料。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教授拿起蘸水笔，就仿佛握住了一件完全陌生的东西，好象从读完小学之后就一直没用过似的。但想要写的念头，相信自己还没有把字母忘掉的念头，使他高兴得几乎头脑发昏。笔尖单调的沙沙响声，工整的字母形状，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得意："即使我获得自由以后，也不会写出比这更长的声明。"

"第一附属外科医院医生，依昂·克里斯蒂安声明：本人因拒绝掩盖瓦尔拉姆先生犯下的一桩罪行而被非法拘捕。本人从未参加过任何匪徒集团，从不认识任何一个非法组织的任何成员。从本人住所找到的所谓法西斯材料，未敢展示全部，而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挑选。本人收集法西斯首脑的文章、摘录、肖像、漫画等，旨在撰写一本揭露独裁者罪行的著作，但限于时间，尚未得以完成。其实，此类材料在任何资料图书馆均可找到。再者，在对此事件调查过程中，瓦尔拉姆先生滥用职权，对本人施行种种非人折磨，本人要求依照国家法律，对其进行惩处，要求对其审讯时，我得以出庭作证。"

瓦尔拉姆只是用心地看完了第一句——当然他也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当即把这张纸撕成了碎片，塞进一

个特大的烟灰缸——这可能是什么人送给他的礼物，然后掏出漂亮的镀金打火机，把纸片点着。他仿佛对跳动的火焰感到得意，一直等到纸片全都烧净，随着他粗声粗气的呼吸，灰烬被吹得四散在桌面上。随后，几乎是十分惊异地，就象刚刚发现了一件不知作何用途的什物，眼睛直瞪瞪地盯了教授好长时间。他的制帽放在桌子的一角，旁边搁了一只大马鞭，一块绿色的大手帕盖在上边。高处一块小小的窗帘，被开着的窗口吸得鼓鼓的，就是说，外边在刮风。士兵和小队长奥尔迪亚努笔直地立正站着，几乎气也不敢出。外边什么地方，一头猪在哼叫着找食，接着又传来几声布谷鸟长长的咕咕声。窗帘有节奏地、缓慢地一起一伏，就仿佛一个睡着了的人在匀称地呼吸。房间里没有动静，只有瓦尔拉姆的手指以一种令人费解的节拍机械地敲打着桌面，以致使人联想到一个有病的心脏，在无规则地突突乱跳。看到瓦尔拉姆的眼神，克里斯蒂安不由想起小学课本里的一幅插图：一条狗在愤怒地察看着一只蜗牛。忽然，走廊上传来一声嚎叫，使他周身神经质地突然一震。"他到底怎么了?"克里斯蒂安想道，"跟我讲话哪儿来的这种平静？这种开诚布公？难道是同丝苔拉……?"于是又开始了病态的胡思乱想，直到费了好大力气才稍稍控制住自己，极力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态。"但这种平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好吧，先生，我看我们还是谈不拢。这就是你最后的话了吗?"

"只要我能活到审讯你的那一天，我还是要这样说，当然比这要详细些。如果你以为你干的这些事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上级，区里，没人在整理你的材料，那简直荒谬。你以为所有这一切都隐瞒得住吗？"

"这用不着你替我担心！现在还没轮到你来审问我。"

"不是审问，而是断言。"

"当然，我现在头脑还没糊涂。依着你，你能把上帝都说成魔鬼。"瓦尔拉姆说着，拿起桌上的另外一张纸，以一种并不正常的坦然态度，又把它撕成碎片。"我再问你一句，这就是你最后的回答吗？"

"是的。"

"好！现在说定了将来可别后悔。我是想帮你去去心病，给你个赎罪的机会。我敢打赌，下次我们见面，你会象念'我们的天父'那样忏悔自己的罪恶。当然，这要看那时候我有没有兴致听你的，我们是不是还能见得着面。"

"你忘了是什么时候把我带到监狱来的了吗？"

"这我并不感兴趣。"瓦尔拉姆立即答道。口气尽管硬，但却掩盖不住明显的内心空虚。由此，教授心里忽地升起一团希望，也许马上就向他宣布，这出戏已经结束。是到了脱掉号服离开这儿的时候了。"我知道，"瓦尔拉姆接下去说道，"你是为了你盼望的将来才做这件事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帮助了我们的敌人。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你盼望的英国佬、美国佬，他们来不了。"

"历史的车轮恰恰是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转。要找我

麻烦的并不是历史，而是那些企图阻止它前进的绊脚石。”

“知道错了，就应该把道岔搬向另一边。”

“怎么，你是说我们要分手吗？”

“对。你不是更喜欢文化环境吗？我看得出来，你把我当成粗暴的野兽，一只不会向你鼓掌喝彩却专会用蹄子踩你的野牛。好吧，大夫，随你怎么想。但我毕竟是个人，我对我的工作问心无愧。你以为是我错了吗？不，是你，是你没尽到自己的职责。”

“那么公开审讯呢？”

“时间还有，有的是。我们干吗要这么着急呢？干吗要让你说没找到你的罪证就判你的刑呢？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瓦尔拉姆取出一支香烟，等着看他话的反应。他把香烟在手表蒙子上磕了许久，没用打火机，却掏出一盒火柴，耐心地想找出一根合适的火柴棒，找到之后又犹豫了一阵这才划着。克里斯蒂安一直惊魂不定：“接下去究竟是什么呢？”

布谷鸟又叫了一声。不远的地方，那头猪还在哼叫。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就象是从远处传来的回声。窗帘已不再鼓动，天变得更黑了。也许就要下雨了，或者，时间放开了脚步，加快了速度。“这次为什么这么平稳？”克里斯蒂安暗暗想道，“哪儿来的这股温和劲呢？值得怀疑的温和……”

“你说你根本没听说过巴扎鲁和图连努的名字吗？”瓦

尔拉姆突然问道。

“没听说过。”克里斯蒂安回答道。他迷惑不解地望望四周，仿佛要向站在他身旁看押的两个人乞求帮助似的。

“你没听说过?可不是个平常人物，”瓦尔拉姆并没说明他指的是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你会认识他的。”

“我向他转达什么呢?”

“转达我的问候。是个大学者，你会喜欢的。”

“谁知道呢。如果你很了解他，那就是说是跟你一样的专家。我想我能应付得了……”

“永别啦，大夫，”他做了个滑稽的手势，象是在模仿小孩子的动作。于是站着的两个人给教授戴上了手铐。

“只不过是暂时再见。”克里斯蒂安也力图显出并不在意的样子。他完全熟悉这条路，尽管他只留心过一次。就连需要走多少步，空气什么味道，墙壁怎样发出回声，甚至潮热的程度，他都知道。周围很干净，有人经常整理，桌子上摆着报纸和杂志，只是窗上镶的是毛玻璃，因此看不到外边的情形。

通常带他走过两个走廊，一个三百四十八步，另一个二百七十五步。如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押送人的动作上，也顾不得数步子了。任何的迟疑，晚迈出的任何一步，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跟不上押送者的脚步甚至呼吸的节奏，都会使他不由得惊跳一下。奥尔迪亚努就在旁边。怎么问他呢?只要一道命令……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疑问，不停地在脑子里转。由于紧张，他的耳朵开始嗡嗡叫起来，两

条腿好象也不再听使唤，一层冷冰冰的汗水罩满了全身。对面传来了脚步声，沉重，有力，闷声闷气：是两个人。“这就是。”他心里这样想着，腹部猛地一缩，接着，肌肉也不自然地抽搐起来。动作是这样的僵硬，以致每动一下，都需要付出超过限度的力量。他感到无望，胆战心惊地说道：“队长先生，我可以问你一句吗？”

“住嘴，”小队长严厉地回答道，“明天传讯的时候再说！”

“也就是说还有明天！”他惊魂不定地思忖道。他相信小队长不会骗他，但不知为什么，好象任何保证都觉得不充分。“也有可能……为了缓和一下？”已经走过台阶，接下去就要从两边的牢房中间穿过了。这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动静，跟原来一样。小队长的确没有扯谎，但教授仍旧紧紧地贴着他，不肯超越哪怕仅仅一厘米，甚至连呼吸也力图取得一致。回到屋里，一头便倒下了，好象全身的精力已经耗尽，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但一股无名的兴奋，却使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真有意思，有意思极了！我以为这下子活不成了，差点儿把裤子尿湿！”他笑了好长时间，引得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别人知道，他一直是沉默不语，对于任何友好的表示都报以不信任的眼光。他常常避开同人对话，但却从不吝惜对别人的及时帮助。赫里亚努教授更了解他，但这次正是赫里亚努惊叹道：

“我的上帝，他们到底要对他怎么样？”

这次没人动他一指头，教授还在一股劲地傻笑，而他脸上的惊恐表情却一直没有消失。这引起了赫里亚努的惊奇，其实他还没发现，克里斯蒂安的动作和表情已经变得极不协调，对事情已经不能作出正常的反应，幻觉跑到了事实的前头：激烈的冲突倒引不起什么心理反响，相反，一个新的未曾遇到过的动作，一句玩笑话，周围器物一个小小的变化，却能激起一场真正的暴风雨。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简直要高声喊叫，要把自己的身体分成几半。也许在我自己的眼里，我从来没象那时那样感到羞辱难忍，整个身体仿佛要立即炸开，麻木的、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的意识，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不相识，简直完全陌生。在走廊上我并没想到家，我对什么都不懊悔，甚至对生命也并不怜惜。一种难以控制的无名惧怕，使整个肌体凝聚起来，甚至能把飞来的一颗子弹挡回去。我那时想到的只有如何设法活下去，来证明自己的无辜，瞧，我终于战胜了瓦尔拉姆，但对于死我却……”

教授透过半开的屋门向外边望去，安德烈房间里的灯光，久久映在他的眼帘：没有一点声响。“如果你感到没什么，正在一个人静静思考，”教授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那我也就安心了。我并不向你要求别的，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抛开自己，我已经让你得到了满足。我最近的讲课、报告、会议发言，都可以证明我并不是懦夫，我并不在乎什么，我可以为真理而呼喊。如果你已经发现了这一切，那我将感到十分高兴。也许你的愤怒并不是没有道理。我

曾经是医学院的骄傲，是那些大学者来参观时被摆出来的一颗明珠。一段时间，我还是学生们的榜样：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象他那样。我的朋友遍及世界各个大医院，我给这儿带来了荣誉和威信。我已经习惯于充当这样的角色。是的，我这样欺骗自己，这就是我久已梦想的宁静、决心和自信给我的报偿，为此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但我并不能闭着眼睛生活，我的记忆里每天都在记录着别人的烦恼，假象，欺骗，毫无遮掩的话，只不过我不把这些喊叫出来。是的，就是这样。而癌症研究对我却有着无穷尽的重要意义。对此我不能中断，别的事自然便无暇关心。同时骑两匹马当然办不到。一条可怜的长矛，无法对付这么多风车！而且生命只能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把生命丢在鞭笞和希望之间。当我不受鞭笞的时候，我在梦想；而当我安排梦中的一切，要开始做些事情的时候，鞭子又落到了背上。当然，当我把一切都献给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不能说不幸福，但只是现在我才感到是自由的，尽管我觉得出一股莫名的威胁在头顶盘旋。不管怎样，第一步门槛已经跨过。以前我曾自问过，我能不能再诞生一次，一切再从头开始。瞧，现在我已经重新开始了。尽管我可以这样消磨掉时间，但要对付那些习惯于懒惰和为个人利益而极力钻营的人们的攻击，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获得昔日那种勇于斗争的热情……我心中的火焰已经熄灭，仿佛再也不能点燃……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这种难以描述的不安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劳累，

或者可能是……最终……任凭命运安排……飘飘悠悠地一跃，呼喊着心中的疑团，接着是永久的宁静……”

安德烈房间里的灯光逐渐暗淡下来，慢慢远去了；朦胧间教授觉得一层神秘的浓雾把他同儿子隔开。他仿佛脱开了扶手椅，两只顿时长长了的手臂，在黑暗中徒劳地摸索，极力想尽快挽住即将逝去的光线。然后，身上似乎裹了一条撕成两半的白床单，一个肥皂做成的黄色十字架，用一条结实的粗绳挂在脖子上。两条腿光着，每走一步便感到一阵难忍的刺痛。白蒙蒙的雾气里反照出他自己的形象：突起的黄色前额上，用炭笔画出了几条粗大弯曲的皱纹。下巴上令人生厌的胡须，象是在煤油里浸泡过的湿漉漉的乱麻。然后，他被抬进一个门窗已经朽烂的教堂前厅，在那儿他必须大声喊叫：“我是耶稣！我就是你们等待的上帝！跟我来吧！”亮光消失了，浓雾象是被拖长了的怪声大笑推动着，一阵阵迎面扑来。他应该继续呼喊同样的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愿这样做，牙关紧咬着，拒绝张开。这时，不知是谁点着了他的胡须，顿时一股强烈的白色火焰腾空而起，照得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

教授醒来时，浑身浸透了冷汗。一时间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下意识地抬起双手去捂住两只眼睛。失去了控制的手指，颤抖着把眼镜碰到了一边。于是，这才从将要烧到头发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才坦然地把手放下。“刚才是怎么回事？”汗水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但他觉得已经没有力气去擦拭一

下眼睛和脸颊。“各种各样的怪梦，永远也不会知道得那么准确……”心脏跳得不那么激烈了，他感觉如同摆脱了一场灾难似的那样轻松。只有那时候，在火车上，他注视着雷德曼的时候，才有过这样的感觉。“都是让雷德曼搞的。可他是谁呢？我一直认为他不可能象现在的样子。而正当我获得自由的时候，正当火车已经开动，我们两个的距离随之越来越远的时候，正当不可知的未来越发使我感到不安的时候，奇怪的而且令人不解的是，我在梦中又原样地重复了那条路。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奇迹，一种异体的遗传基因，注入到我的肌体，以致别人的经验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因此……”

我去见雷德曼的时候，他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里同瓦尔拉姆一起看一张名单。他们从名单上找出一个名字，先是瓦尔拉姆念一遍，然后是他，以另外一种样子，又慢又轻地重复一遍，就仿佛嘴里含了一口葡萄酒，在漱来漱去地仔细品味。最后，两个人相互望一眼，而当雷德曼过了许久仍旧不说话时，瓦尔拉姆斩钉截铁地大喊一声：“不！”听到这句话，雷德曼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接着便用铅笔把名字划了去。开头，这些名字对我根本毫无意义，一直到听见一声“依昂·克里斯蒂安”，我这才注意地看着铅笔怎样在那张打着整齐字母的单子上移动。我的名字被用力划掉两次，然后是比通常时间都长的停顿，就仿佛用铅笔划得太用力而需要休息一下似的。我知道又是在玩什么新花招，

反正我是在他手里。他发觉我在注意他，却狡猾地并不理睬，装作根本没看见我。他把我弄到这儿来是要显示一下他的威力，是要告诉我，我已经被判决，在他面前已经不再存在。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被惊怕包围着的理智，告诉我几种可能。就这样不为社会所知地生存下去，在那些活着的人们的名册上，根本找不到我的影子。但也并不能说我已经死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一点，没有任何确认死亡的必要手续和材料。但对于他们来说，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并没有活着。实际上，他们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我已经不存在了。理论上我还是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我能够支配的任何事情，实际上自从我被宣布为不存在的时候起，自由也跟着不复存在了，而他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在这一奇特的公式背后，当然隐藏着另外一种判决，而我却害怕想到这可能发生的悲惨结局。“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为什么他认为我鄙视他，而没有任何证明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恼人的问题是这样地明摆着，却又注定不可能立刻得出答案。过去叙利亚人常用一块结实的布，把小孩子的头紧紧地缠起来，怕长变了形。也许他受到了这样的启发，通过缠在我心灵上的“不复存在”这块布，来检验是否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但为什么偏偏是我，一个可怜的无名小辈，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地方的普通角色？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我没能再坚持下去，本来我可以了解得更多，甚至有可能得到那些折磨我的问题的答案。我已经习惯于他们

的这种做法，从那一刻起，外面的世界，甚至包括瓦尔拉姆和雷德曼，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存在。我只有孤身一人，惊恐地处在敌意的包围之中。我偷偷地溜出门去，很容易便到了下边。那儿还是那些人，在一动不动地听着看守查点人数。也许就是单子上的那些人，在等候决定。如果是这样，也应该通知我。或者，雷德曼想进一步折磨我，把我拖来拖去，好证明他在我身上有多么高的权威。看到我，看守的脸顿时舒展开来：我正是点数缺少的那一个！看守把带护耳的制帽往脑后一推，从宽阔的绿色帽檐下，露出了一只眼睛，唯一的一只在脸中间的大眼睛，同样也是绿颜色。就象听到了一声口令，人们愤怒地向我扑过来。刚才他们因为我而受到了惩罚，自然要对我进行报复。当然，我临时想不出什么解释理由，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听。于是我憋足了一口气，把人们向两边一扒，冲着门口猛跑过去。我身后立即响起了警笛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几乎把我震晕。但我并没怯懦，脚下更加快了步子。而眼前的路变得越来越窄，没有一处道口。两边高大的紧挨着的建筑，大门都紧闩着，高高的窗户上都护着一层编织漂亮的铁丝网。从两边逃走根本没有可能，只有一股劲地拚命向前。没有别的选择，唯一可以临时拯救的办法，只寄托在自己的耐力上，而这毕竟是有限的。道路的尽头，一股浅蓝色的亮光神秘地闪烁着，仿佛在监视着那块铺了石子的沉睡的地面。这时我已看不见追赶的人们，只听见一阵阵粗重无情的脚步声，汽车警笛声。他们已经落

在后面，一道道强光我也逐渐适应了，只觉得热呼呼的是那样温和。如果不是我想到雷德曼也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我真的会增加能够逃脱的信心。可以肯定，四周都早已布满了他的人，他们正藏在窗后，用目光把我从一个人传送给另一个人，拿我开心取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我的逃跑和人们的追赶究竟有什么意义。最后我不可能不被抓到，这种徒劳无益的挣扎，简直荒谬可笑。只有当一闪闪的红灯已经十分接近，我才意识到，在接下去发生的事之前，我是多么想见到丝苔拉，尽管十分清楚的是，她不过是雷德曼向我投过来的诱饵。但无论如何，在这石块般冷酷的宇宙中间，这是唯一美好的事物。奇怪的是，即使在我企图这样幼稚地拯救自己，落得陷于绝望境地的时刻，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占据了这样重要的位置。突然，脚步声变低了，只有远处汽车的警笛还在发疯般地鸣叫。于是我也停住了脚步：在我面前，在比那周围布满荆棘和蜘蛛网的黑墙还要高的三棱塔上，笔直地一动不动地矗立着鲍里费①的形象。顿时我屏住了呼吸，稍稍放松了一下之后，我捏紧拳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瓦尔拉姆要的供词有什么用呢？既然我们两个都受独眼巨人管辖，我为什么要忍受他那不可一世的态度呢？也许巨人没发现他……但如果鲍里费只不过是我惊怕与筋疲力竭时的幻觉，或者是雷德曼搞的幻术呢？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高墙，

① 古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之一。在荷马所作《奥德赛》史诗中，为吃人独眼怪物。

浑身都被荆棘刺伤，但终于跳到了墙的那一边，不由松了一口气：我眼前展现出一条宽阔的黄呼呼的大街。远处，街道的尽头，映着寂静迷人的亮光。在一个塔形的底座上，矗立着一个银白色的独眼巨人像。明亮的探照灯光柱，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射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从他那儿，一个彬彬有礼的形象，向我微笑着张开双臂。这是我曾经见到过多少次的一个人……”

克里斯蒂安记起，后来在审讯瓦尔拉姆中间休息的时候，雷德曼向他走过来，样子显得有些羞愧，然后，猛地一下子抱住他的脖子，就象不会表达感情的少年那样，极其拙笨地吻了他一下。克里斯蒂安冷静地后退了一步，把伞撑开，以防备对方再进一步的感情冲动。本来克里斯蒂安不想再见他，一直想避开他那紧盯不舍的目光，但结果还是没能逃脱。

“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雷德曼先开口道，“我感到幸福，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以说在我们国家，法律是不会被当做儿戏的！”

“这么快就把自己的朋友都忘了吗？”雷德曼对瓦尔拉姆表现出的态度，使克里斯蒂安感到十分厌恶，“或者说，这么快就把他们出卖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下一步你又打算使什么手段呢？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相反，会干得更起劲。”

“这样讲未免太过分了吧。马上你就会了解到，为了你，我是作过斗争而且也受过连累的。正是由于我，瓦尔

拉姆才落得今天的下场。我了解事实，我掌握他的罪过，是我从内部把他搞垮的。在他身上只能这样，要有耐心，要有策略。”

“对我，你也是这样干的，不是吗？”克里斯蒂安毫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雷德曼极力想使那双古怪的蓝眼睛里闪烁着的冷漠的光变得热情、温和，这使克里斯蒂安越发感到恼怒。

“我没象赫里亚努那样在牢房门口等着接你，我当然不会得到你的信任。但我仍旧是心安理得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们都老了，但还没老到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的程度。对这一点，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本想好好跟你谈谈，也许到最后能够说服你……”

“不，”克里斯蒂安坚定地回答道，“我唯一的愿望，是把你忘掉，永远也不再见你的面。我要尽一切可能，不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你不会再让我生气，因为对我来说，你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你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你言而无信，而且我们使用的也不是相同的武器。”克里斯蒂安感到奇怪的是，好象不是在同雷德曼说话，而是在责备自己的错误：怎么竟会毫无保留地完全相信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雷德曼紧紧盯着克里斯蒂安的眼睛，显然他感到受了侮辱。但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放松，就象是在警告，以后还

会有算帐的时机。这种目光使克里斯蒂安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他转过身，象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过失，摆脱开曾经表现出的幼稚和轻信，向门口走去。人们有礼貌地退向两边，闪出人墙形成的一条廊道。过去，克里斯蒂安稍有点空闲，便想到怎样对两个仇人报仇雪恨。他在想象中把瓦尔拉姆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用枪打死，甚至连身上的肉都不知道烤熟过多少次。而现在，他终于透过铁丝网心满意足地看到瓦尔拉姆的下场。实际上在他脑子里，对瓦尔拉姆的审判早已结束：各种细节，材料，数不清的证词，瓦尔拉姆戴着同样的手铐，在如此熟悉的走廊上挪动着步子，一切都是老样子。而到了真正审讯的时候，他却平淡无奇地讲述起同上校发生过的事，对于他自己遭受到的迫害，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可说，不，甚至认为判决已经早就确定。自那时起，就象对待一场已经治愈的重病一样，瓦尔拉姆已从自己的记忆中完全排除。只有冬天的夜晚，当他躺在实验室的床上，由于寒冷或是关节疼，脚掌火辣辣难受的时候，思路才有时闪电般地想到了瓦尔拉姆。人是怎么回事他很了解，他跟雷德曼一起的时候，曾经仔细研究过人的进化过程，而他的职业给他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因此他可以说，他已经经历了人的所有进化时期。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遗憾：时间丢失了。

“在瓦尔拉姆面前我没有屈服，因为我秉性刚强。但一切总有一定的限度。我不知道自己的头脑还能清醒多久，还有多大力量，还能作出多少想象。现在，我还在受着惩

罚；所有实质性的疑问都没有得到答案，而癌症，这块比什么都沉重的负担，还在背上压着……痛苦一刻也没有停止，只不过偶尔有所缓和……你瞧，薇拉……”

他不知所措地停住了，还不能决定是否离开。听到她声音时的那种疯狂般的兴奋，慢慢减弱了。相反，担心和不安却逐渐增长了起来。“为什么？”一切仿佛都是事先安排定的。在他个人的历史上，又记录下了一次失败，但这是第一个他并不想把它换成胜利的失败。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放弃她，虽然是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他又会重新想到自己的实际年龄，衣架上那件黑色夹大衣，已经过时的宽边黑礼帽，又会使他觉得合宜。只不过还需要一个象奥泰斯库那样的蝴蝶结和一根手杖。“不能丢掉科学院院士的头衔，这根支持我骨架的第三胫骨。”他已经感到他们的关系不合情理，但令人着恼的是，对薇拉的兴致所在竟找不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她想要从他这儿得到什么呢？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相差不只是四分之一世纪，而是四分之一千年，”他想道，“当然，作为男人我并不比别人感到更低下，但我看不到合乎逻辑的地方。这两只冰冷的手，经过了多少时代……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做。孤独感也许可以算作一个解释，但这只适用于这一天的晚上。也许她拿起了电话听筒，拨了几个年龄跟她相当的男人的号码，最后才轮到了我这儿。而我必须接受她，因为我要挣扎着维持自己的生存，强迫早已应该休息的肌体，勉强活动起来。我闭上双眼，对于施舍给

我的怜悯感到无比高兴。到了我现在的年龄，现在的地步，再没有什么高傲可言了。”这样的判断未免太简单化，太无法让人接受。一种羞愧感迫使他无法从扶手椅里站起身。

“我应该鼓起勇气割断这根线。”他记起有一次她的笑声使他感到倦怠，于是这样说道，其实这是在扯谎，他只不过想试一试她的反应。他后悔不该这样做，但得到的反应却使他吃惊：

“你以为我就是这样笑的吗？”她样子显得很高兴，“我是故意做给你看的，我以为你会喜欢。我笑起来是另外一种样子……”

“看起来，我是没办法了解你的真面目，没有那么长时间去了解。你跟我在一起，不会露真相的……”

“你根本什么也不懂，也不想弄懂……我内心的不安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你是朝向世界的一只眼睛，这个世界我能够在自己身上理解得到，感觉得到。你对这个世界很了解，因此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瞧，我们要找的致病因素，不只是在细胞里……”

“也就是说不只是存在一种致病因素，我们在寻找某一种，却有可能被另一种搞垮。”

“对，就是这样……”

房间里一片漆黑，安德烈关上了屋门，可能是怕影响教授的休息。街上的路灯显得特别暗淡，整个城市被一层雾气笼罩着。忽然，教授觉得心情仿佛舒展了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会喜欢雾，会在这茫茫的黑暗

当中，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一个游子的经历，在那可怕的战争年代，踏遍过四方……”

在一片低洼的平地上，晚秋时节令人窒息的浓雾在上空飘荡，覆盖住一切，穿透薄薄的皮肤，直到使肌肉抽搐得疼痛难忍。他象在期待救护天神似地等待着，偷偷拿了几个纸袋，把它撕碎，塞进衬衫里，直接贴着皮肤，然后用一根细绳拦腰系住，不让纸片掉下来。由此他想到，如果那时有谁让他脱掉衣服，他会显得象一个学徒工扎成的服装假人那样丑陋不堪。雾气就仿佛从地下钻出来的一般，有时浓得一步之内什么都看不清。这样的天气没办法干活，人们头枕着胳膊仰面躺在地上，一个挨一个地贴紧身子，等待着雾气消散。隔几步远就站一个看守，穿着厚厚的上衣和毡靴，冻得瑟瑟发抖。拴着皮带的狗，不住地挣跳着吠叫。奇怪的是这种犬叫声却能融合在平缓宁静之中。因为一阵战慄过后，当肌肉绷紧，心脏急跳不止的时候，寒冷却慢慢退去，紧张却让位于一种无名的快感。这时，整个身体，连同两只枕得发麻的胳膊，仿佛离开了地面，飘飘摇摇地飞向天空，思路也恍恍惚惚地跟着去寻找那往日的安静和光明。他经常梦到的是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大块的煎肉，烤小猪，各种海鲜。醒来之后，饿意顿时消失，只觉得浑身舒展，如同重生再造的一般。于是不但能跟上队伍的步伐，甚至还能扯起沙哑的嗓子唱上几句。“喂，我说大夫，要是我把调门再给你起高点，恐怕连你太太都听不出你的声音啦！”奇怪的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却

变得无比宽容，只不过善意地回敬了一句。雾气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世隔绝，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象一只在黑暗中挣扎着的奄奄一息的动物。“喂，别乱插杠子，大夫唱得蛮好听嘛！”另外一个对刚才那个犯杀生罪的人这样说道。

后来……暴烈的阳光把一切都晒焦了。已经枯萎的草，几乎变成了灰烬。石头般坚硬的土地，裂开一道道的缝，铁锹根本铲不进去，汗水也无法使它变软，因为汗珠不等滴到地面，就已经完全蒸发。人们的手也象大地一样，裂成深深的口子，一动便疼得钻心。伤口上落满了成群的嗡嗡作响的苍蝇，费好大力气也没法把它们轰走。肩膀和脊背上的血，凝成了一道道深红色的痂。每蹬一下铁锹，紧绷着的皮肤便“噗”的一声裂开一道口子，一直露出肌肉，就如同撕开一件穿乏了的衣服。灼热弄得人们头晕目眩，连眼前的东西都分辨不清。原野就象一片灰色的巨浪，无声地上下翻腾。两只脚无法控制地动作着，上千遍重复的只有一句话：“挖，挖，挖！”忽地，一股潮呼呼的呛人的咸味吸引住了大家：海。于是人们不顾一切，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发疯似地跑向那里。几个先到的立刻跳了下去。接着是几声凄惨的喊叫：咸水浸进了伤口。看守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象听到同声的命令，也跟着笑个不止。人们抖抖瑟瑟地在水里摸来摸去，希图从石头缝里抓到几条鱼。蚌壳把牙齿碰得咯咯作响，慢慢的，人们高兴得完全忘掉了那句话：“挖，挖，挖！”有些人连抓鱼也忘掉了，只是在水里拼命地游。不知从哪儿来的这股劲，

笑着，闹着，嬉戏着互相往身上撩水。另外一些，在岸上追赶着把那些蛇和趴在石块上的蜥蜴弄死。他记得清清楚楚：一条死鱼，肚皮朝天，在远远的地方漂着。他一直认为能够游到那儿去，但一个接一个的浪峰涌过来，不住地把他往后推。这是对他意志的一次考验：游过去还是不游。游，不管冒什么危险。当他游到那儿的时候，已经离开岸边的人声很远很远。他猛地一跳，把鱼用牙咬住，就这样嘴里叼着鱼，身体慢慢沉了下去。一直往下沉，已经没有力量再设法浮出水面。在深处，他发现海水逐渐暗了下来。一团团的海藻，一群群的小鱼，在他头顶什么地方漂游着。后来，当他已经逐渐习惯于这种黑暗的时候，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一抵，又把他托出了水面。空气弄得他头一阵发昏，接着又沉了下去。他始终不甘心，极力想向岸边游去。他感到身子不住往下坠，两只胳膊麻木了，呼吸也几乎停止，但水浪却一股劲把他往前推。刹那间，他仿佛看见了那些朝向他的人们的脸。令人费解的混乱动作，一阵阵的哧笑声和咒骂声。他艰难地前进着，依旧没有丢开那条鱼。当他身体能够稍稍松动的时候，便象疯子似的开始急匆匆地吞咬那条鱼，好象生怕别人把它抢了去。另外一个看守走了过来："真见你妈的鬼，大夫，你把我的票子也给吞下去了。我跟人打了赌，说你一定淹死。要是你不还给我一百列伊，你就永远甭想再看到打赌，也永远甭想再看到别的事。"鱼还在身边，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不管多么奇怪，鱼的故事却是一个转折点：这证明他仍然有毅力，活下去的毅力。终于有一天，他在《火花报》[1]的一个角落上发现了几行报导，他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斯特凡·赫里亚努教授对历史系学生讲述地下斗争活动情况，报告获得极大成功。"这就是说赫里亚努活着，获得了自由，而且当了教授！顿时，他的希望变成了信心。"这次可要冷静，沉着，"他想道，"不能再做出考虑不周的举动了。"一直到那时为止，主宰一切的"等待"陡地象炸弹似的炸开了。成千上万的疑团，汇成了一条望不到边际的流沙河，黑压压涌了过来。

丝苔拉和安德烈越来越频繁地在他梦中出现，但形象从来没有完整过。她的脸、轮廓是那样暗淡不清，简直没办法勾画出来。到那时为止几乎压干了的记忆，又羞涩地复活了。他连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作为一种补偿。因为多少天、多少个星期过去了，他根本没时间想到他们，一倒下，浑身就象散了骨架一样，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于是接着一连串的恶梦。

"这些我没讲给安德烈听过，"教授心里想，"他是不会理解的。人怎么会干着活、走着路就睡着？晚上怎么会倒下去就如同死了的一般？我好象对薇拉讲过，有个人到那儿之前体重是一百二十公斤，等我在那儿见着他的时候，肚皮已经松得象挂在腰上的一块遮羞布。我还从来没见过

①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这样的情形，尽管我是医生，连我也不得不自问：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话突然响起来，尖利的铃声使他全身一震。“是的，克里斯蒂安教授，”他立即答道，“出租汽车马上就来。”他扯了一句谎。

“这么长工夫，走着你都能围着全城转一圈了。”薇拉生气道。

“你看看窗户外边，在下雾。这么浓的雾真让人受不了。这样的天气怎么好在外边散步！你知道，我还有坐骨神经痛。”

“你没有什么呢？都是你有理，你关心的只有你自己！当然，这也正常，你是个重要人物，这么多人都整天想到你，那你自己也不想例外。多么讨人喜欢！说不定你还要带实验员一起来呢。”她讥讽道。

“看起来你是决心把我当批判靶子喽。”克里斯蒂安嗫嚅着说道。

“五分钟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一直这样打下去，打到你老得动不了窝。”

“干吗要这样？汽车马上就来。”

“如果你对我不感兴趣，那么我还有关于你朋友考德里亚努教授的几条新闻。”薇拉又加码道。

克里斯蒂安心里一惊：“是她扯谎还是真的又生出了什么枝节？我真是天生的跟人们不合群。”他这样想着，嘴里说道：

“我也怀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会有什么变化吗？开头他倒是真心实意的，我可以肯定。”

“怎么说呢？他看到克列楚也许要运气不佳。通过你的讲课，现在大家都相信你并不是整天蹲实验室，对什么都不闻不问的人。你是个有见解、有个性、有影响的人物……你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样已经老朽，也不会永久地沉默下去。如果说作为女人我不能吸引你，那么作为消息提供者，还应该是受欢迎的吧！”

“怎么，又来了！好，我现在就动身。”

“你可别迷了路。”薇拉又补充了一句，接着对着话筒“吧”的吻了一下。

“放心吧。”教授却没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于是接下去说道：“你老是这样强加于人，让人这么不舒服。”

“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才没提出来跟你结婚。至少在家里我还要照顾影响，不然我真没办法控制自己，就象参加你不在场的会的时候那样。”薇拉的嗓音里透着一丝悲伤，事实上是怨恨他为什么没立刻到她身旁。

教授慢慢腾腾地穿衣服，他真想避开这次使他害怕的会见，尽管他接到电话之前，薇拉不在身边也弄得他心神不定。他很理解她的心情。有多少个夜晚他也想到打电话，感到需要同谁谈一谈。每次他都想给薇拉打，但总是拨到最后一个数字又犹豫起来。自然，得到的回答是：“打错了，您拨的什么号码？”“您打错了，这儿是殡葬服务处。”或者“不对，同志，这儿是通心粉厂！”有一次他说出了自

己的名字，他想要试一试别人是不是知道他，或者对他的名字会有什么反应。不想由此却又结识了一位女病人：

“哎呀，号码错得多凑巧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得了乳腺癌，弄得我整天坐卧不安。要不是您打电话，想去求您我还怕没这个胆量呢。”

“您自己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教授觉得挺有意思，这样问道。

“我自己感觉那儿有个什么东西，不得劲，而且越长越大，现在都觉得沉甸甸的了。”她还想继续描述下去，但教授打断了她：

“明天上午九点整我等您。”

那女人大约四十岁的样子，高个儿，金发，身段苗条，还能看得出几分极力保留的风韵。他断定她根本没什么病，但还是请她脱掉衣服。那女人开始忸怩起来：

“不这样……难道不可以吗?”她那诱惑性的眼神，就象学生时代那些在大街上挑逗他的女人一样，紧盯着他不放，“您到底是男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您解释……”

“您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理解您，但是，您知道，您是男人……”她继续坚持道。

“太太，我并没提出来要跟您睡觉，是您自己要我替您检查的！”

她连忙脱掉衣服。当他的手开始在她胸脯上来回触摸时，她竟失声哭了起来：

“您简直会让我发疯，教授先生。您的手这么细嫩……”

“您一点儿病也没有，太太，”克里斯蒂安注视着她的反应，觉得有些好笑，“您可以穿上衣服了。”

“尽管难为情，可我还是感到很幸运……”

“您知道，这种怕羞应该是在十六、七岁的姑娘身上，而且不是在诊病室的大夫面前。”

“我能够象正常人那样生活吗？”她问了一句，特别加重了一下正常两个字。

“这要看您是不是乐意，有没有可能……”

“我丈夫已经死去有五年了，这样的条件要说过正常生活……”

“您还年轻，又这么漂亮，不妨试一试。我，很遗憾，对您什么忙也帮不了。”

“可您也没有妻子……当然了，对一个男人来说这要容易得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没法交流经验。”说着，教授给她打开了屋门。这位太太讨了个没趣，伤心地走了出去，一边还不住地擦着眼泪。

后来他一直没再去想这件事，而现在，不知怎地，薇拉忽然又让他记起了那个女人。他觉得当时他表现得过于粗暴，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说话更文雅一些。也许那个女人内心真的有极大痛苦，需要他的安慰，但他并没想得更多。“管它呢！”他心里说。

他拦住一辆出租汽车，向司机问了声好，便一屁股坐到了后座上。激动、不安、惊怕，使他周身微微颤抖。“虽然只是我一个人，可好象我并不想就在今天晚上。”他知道事情会怎样地重复，但他又没有勇气拒绝她。现在唯一的拯救办法，莫过于半路出一场车祸。刚才电话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也没说。而现在，他除了感觉筋疲力竭，有个想法一直在脑子里缠绕：“谁知道对我会有什么报复呢？我对考德里亚努曾经信任过，但对别人呢？在这方面我的感觉太迟钝了。”他想象着一个灯光通明的房间，人们挨肩擦背挤在一架录音机旁。当他进去的时候，人们忍不住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不是说过，一定能把这位大人物给你们搬来吗？”薇拉会这样得意地说。

汽车停下了。“您到了，教授先生！”司机说。克里斯蒂安顺着玻璃窗向外望了望，有些不满意。

“是啊，可这是医院！”

“您没告诉我到什么地方，我以为……对不起……”司机连忙向他道歉。

“噢，没什么，是我不对，”教授安慰了他一句，“劳驾，到阿波罗道尔大街。你瞧，光脑子里想还不行，还得说出来！”错了地方反倒使他情绪好了一些。“如果我不告诉他地址而能把我拉到她那儿，那才妙呢！”

薇拉站在窗口，教授老远便瞥见了她的身影。等他走进房间的时候，她还在窗口站着：头发披散着，穿一件蓝色室内便服。屋子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桌上——一盆红石

竹和一只空玻璃杯。他原以为来到这儿她已经醉醺醺的了，因此打招呼之前先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看有没有空瓶子，结果只发现床头柜上摆着一只空杯子。薇拉显得很激动，他的到来反而给她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哦，病人觉得怎么样？”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极力企图适应屋里的强烈光线，然后才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病，憋得人难受，所以才打扰了你，我知道你会骂我。”她轻轻吻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帮他脱掉外衣。她故意把大衣拿到她母亲的房间，表明那儿没有人。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吗？”他笨拙地呵斥了一声，立即被一个念头攫住了：“现在接下去会怎么样呢？”

“你瞧，说实话，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以后，我很后悔。不知道怎么啦，我那么爱挑毛病，就象个傻瓜。后来，我去听你的课，你连眼皮都没冲我抬一抬。我知道你是在医院过的夜，我还听说你跟安德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你在院长办公室说的我都听到了……反正是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么几天工夫你就变了样。我想，也许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哪怕一点一滴呢……而且我看你这样累，脸色这么难看，人也瘦了。你老是陷进这些事，可以前你并不是这样。我担心你是不是考虑成熟了，也许，没了出路……我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曾经幻想，对你来说我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是啊，真让人难为情……要是我不提考德里亚努，你会来的吗？”

教授用两手抹了抹脸。他出了那么多汗，连衬衫都觉得湿透了，两边太阳穴不住地突突跳：是疲乏还是紧张？一切都变得热呼呼的，让人舒服。身体慢慢松弛下来，他一高兴，顺势倒在长沙发上。“是的，我会来的。”说着他抬起了眼睛：只见她两根锁骨弯曲得那么美，两只忧郁的大眼睛，在担心地等待着这个肯定的回答。突起的、近似男性的前额，线条模糊未涂口红的双唇，大大减缓了她平素的严厉。“天哪，她是多么年轻！”他想道，“可她为什么不坐下呢？”

“要杯咖啡吗？还是喝点酒？”她问道，“想要什么尽管说吧，我也想喝点儿。”

“有什么算什么，没什么关系。”

她打开一瓶红葡萄酒，这还是教授送给她的陈酒。“你一定喜欢，这还是你自己弄到的。”她低声说着，靠近他坐在沙发上。“怎么会一切都变了！我真想放把火把什么都烧掉。”她笑了笑把手搭在他肩上。“你想什么呢？这么郑重其事……”

教授忧郁地望了她许久，然后说道：“我在问自己，就跟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将来我们两个会怎么样呢？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我自己会怎么样，这我知道，可你呢？……真是罪过……”

“为了上帝，就把这可恶的将来丢到一边吧，我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发现你并不理解女人，尽管我知道你以前有过不少。不要去管她们，由着她们的性子去作美妙

的幻想吧。理智，清醒，谨慎，冷静，还有什么呢？忘掉这一切，拔掉你计算机上的插销。对你来说，现实的每时每刻都叫做将来。那么，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呢？至多我能升到副教授，即使升不到，也没什么大不了，二十年后总会找到个穷困潦倒、对我的退休金感到满足的傻瓜。即使不是这样，无非做个献身科学的老姑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你对我就象整天盘算着给自己心爱的女儿安排好生活的爸爸一样。其实我对这些倒觉得无所谓。对未来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让未来去见它的鬼吧，今天活着就说今天的事，就这样。”

“原谅我，薇拉，”教授捉住她的手说道，“我简直是个呆子。这些天真是不好过。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什么倒霉的事落到我头上。我吃过了这么多苦头，最后跟自己的儿子也吵翻了，连他也不理解我，谴责我，说我是懦夫，自私，白白活了这么多年。说我本来可以秉公处事，却故意不这么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我觉得自己这么孤单……直到不久前我还以为我们可以互相理解，我不喜欢他那种腼腆样子，甚至责怪他不该怕我。他显得那么软弱，那么孤立无援，就跟他妈妈给我的那种表面印象完全一样。我跟他的关系上，是有什么地方我错了，但是别的，我不承认。我从来就是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为了这不知付出过多高的代价，但这种代价是为了换取我内心的自由。”

“他就这样当着你的面说这些的吗？”薇拉生气道。

“是的。为此我还鼓励了他，如果说他确实是这么看的！……”

“哼！他简直没长眼睛。”

“不，相反，他对现实还是十分敏感的，只是有的地方他还不了解：好多事并不是象他想象的，完全取决于我！这也难怪，他是这个岁数，这样的生活环境。”

“算了，别去管他了。”她企图岔开话题，“你来了我特别高兴。”

“是啊，”教授伤感地低声说，“家里老人是个宝，有钱也难买到。”他记得好象有这么一句成语。

“可我买到了。”薇拉回答道，“他总以为自己是个千年寿星，可这对我并不妨碍什么。他喜欢在我面前卖老，可谈起话来就象讲课那样海阔天空。所以说这种老只不过表现在穿的衣服上……不管怎样，没有他我不会懂得这么多事情。”

“也许没有他懂得会更多……”

“是啊，可我已经没法再退回去，已经没有了退路。”

“走啊，走啊，但是不知道究竟去哪儿。不管往前还是往后，只要走，只要动弹，只要活动，这就是我的结论之一。即使迈不动步，也好象有什么推着我往前。我知道，要想有什么新的发现，先得解剖透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会这样做，我并不懒惰，只不过对于解决了抗癌药以后的那一步，心里觉得有些怕。”

教授在床上躺下，薇拉把头枕在他的胸上。头发上飘

散出的香味使教授感到很舒服，丝苔拉也喜欢用这样的香水。教授想腾出一块地方，让她躺得更舒服些。忽然，腿上一阵难忍的疼痛，就象整个断掉的一般。然后，疼痛又慢慢往上移，一直到了薇拉枕着的地方。“我倒好说，”他伤心地自语道，“可你呢？安德烈呢？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疼痛还在持续着，但他不愿惊扰薇拉。

“你知道那时候我够多难过，”薇拉低语道。作为回答，教授爱怜地抚摩着她的头。“可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是啊，”克里斯蒂安心里想，“这种怕有多少层意思啊！只可惜贫乏的语言里找不到表达它的词句。”

从监狱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只是用力地把丝苔拉抱在怀里，他不敢用手去抚摩她，生怕一双粗糙的手刺痛她的脸。“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丝苔拉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问他。这许多年的痛苦和期待，仿佛都溶化在了她的泪水里，紧张情绪象拉断了的一张弓，“噗”的一下松了下来。她曾经那样坚强，至少坚持着挺了过来。而现在她却把那不屈的意志一股脑儿抛给了他。“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屋里就他们两个，那张陈旧的床，以前曾经铺过多少漂亮的罩单，四周装饰的贵重名画，如今只剩下他从蒙马特尔带回来的那一幅。他有一种奇怪的孤寂感。

“从现在起不会再有什么了，”他说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瞧，我们胜利了，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胜利。我们尝够了苦的滋味，现在我知道了我能做到什么。我会告诉那

些把我另眼看待的同事们，科学应该怎么搞。可以肯定，如果不吃这些苦，我会觉得身上缺少什么……我战胜了别人，也战胜了我自己……”

“是啊，”丝苔拉轻声说道，“可为这付出了多大牺牲啊！没有这些我也不会认为你懦弱。我看不出为什么必得这样做……”

“可你自己呢？”他说道，“也许命运有意地要考验我们两个。”

“但是完全可以没有这些……要是再有什么我可没法再经受了……”

“不，不会再有这种需要了。”尽管这样说，但他从来没象现在这样不相信自己的话。他象一个瞎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感觉没错一样，把手放在了丝苔拉身上。他心里暗想，她比以前瘦多了，再没有那样丰满了。“多少人侮辱过她，欺骗过她，或者也许在谁的怀抱里曾经产生过哪怕只有一刹那的希望？”他努力驱走了这些想法。最好什么也不要知道，这并不是需要他费脑筋的事。但不管怎样，青春已成为过去，而且那时候他感觉青春时代离得比现在还要遥远。

“考德里亚努左右不了我，”克里斯蒂安脑子里闪了一下突然这样说道，“他以前不是我的朋友，我们没有过什么交往。他心里明白，我什么也不想要。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并不想妨害任何人。尽管他向我提了成百上千的建议，可我没向他作任何保证，什么也没有。我期待的，

我需要的——他自己心里这样补充着——是另外的东西。当然，事情毕竟是这样发生了……”

“考德里亚努所以那样提议，是因为知道你会讨一些人的喜欢。现在他看准了会是克列楚，又马上站到了另一边。他是想通过别人操纵一切。克列楚高兴的是他从你手里把考德里亚努拉了过去，这下他自己的身价也觉得高了。”

克里斯蒂安苦笑了一下：“他们搞的这些名堂我不感兴趣，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在这方面我跟他们永远不会谈得拢的。跟这些混帐搞在一起，自己也就成了混人。而这样呢，我却可以按自己设计的图表往前走……”

“只管往前走，也不抬头看看周围的人，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不管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薇拉讥讽地说道。

“哦，你别光是责怪我，你也没设身处地，哪怕只一小会儿，替我想想。”克里斯蒂安说着，把那只疼得发麻的腿往前伸了伸。腿轻轻碰到了桌子，把桌上的花瓶碰掉摔碎了。

“没关系，没关系，”薇拉连忙说道，“这样正好，明天你还可以有理由再来，给我送一只新花瓶。”

“太对不起了，”他不好意思地道歉说，“幸好我还不是那么迷信。”

“别再说了，这算什么大事，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说着她随手熄了灯。

教授转过身，两手捧住她的头，想大喊一声：“将来我

们怎么办呢？”突然来临的黑暗如同护罩一样地降了下来。“这种黑夜的无形压力，我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呢？这么久以来，我的确应该重新感觉到它了……”

十八

本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

最近几天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事件，其严重程度足以引起深思。首先，我看见阿纳尼亚同志和斯皮尔曼副教授的实验员一起，在搬运一些大包、卷宗、好些瓶子还有许多实验动物。这些动物都是阿纳尼亚同志借来，或者用教授同志的钱从一些打狗队员同志那儿买来的。然后他们进了实验室，锁上房门，外边打来电话也不接。他们拒绝参加系主任同志和学生会召集的会议。我亲耳听见克里斯蒂安同志在走廊上对副教授同志这样说：“今天我没空儿，谁都不见，一切由你来处理。你去开会，以我的名义把科研经费给我要回来，不然的话我就用牙齿把他们咬碎。为了证明你在会上发了言，你回来的时候带一份复制的会议记录。”教授走了以后，副教授同志说：“可惜他没下命令让我代替他跟班奈德斯卡睡一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副教授同志对教授命令式的做法和道德作风是持有异议的。与教授相反，他这种健康良好的态度，大大有助于我们医院的未来。或许他能当上我们医院的领导，因为克里斯蒂安同志并不是板上钉钉不可更改的。关于那些包，

使我回忆起，也曾给过那位疯疯癫癫的女同志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同样的包。由此可以推断，那位女同志十分可疑地提前出院，肯定同这些包有着一定的联系。我呆在那儿想看个究竟，但阿纳尼亚同志根本没有出来。他从窗户里看见了我，用手向我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要用刀把我阉割掉。但我对他这种流氓式的挑衅并没理会。我一直等到半夜，教授同志和斯皮尔曼同志才一起出来，他们争论得很激烈。我不喜欢这位副教授同志，因为他的态度象个自由党人，对什么都不满。但对学生却故意表现得热情，借以讨好他们，赢得支持。另外，他国外还有亲戚，给过他一辆旧奔驰牌汽车，还有各种各样的书籍。

他们走了以后，我又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怕他忘了什么东西再回来取。后来我决计从窗户爬进实验室，看看文件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写了些什么，那种抗癌药到底搞成了没有。我知道有几包东西已经给了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同志，因此时间不能够再推迟。有个小窗口经常开着，为的是放一放实验动物身上的臭气。我决定从那儿爬进去。我爬到上边，用手电筒往里照了照，但却没照到窗底下教授那张床。谁知那个半疯的阿纳尼亚正睡在上边。等我把腿顺着窗户往下伸的时候，正好踩到他头上。他象野兽似地嚎叫了一声，震得四面的墙壁都直摇晃。我以为教授不在他一个人不大可能呆在里边，我还当他象往常一样顺着阶梯教室出去了呢。幸好他刚巧睡在窗底下，没睡在别的地方。要是我进到里边让他抓住，非把我打个

半死，而且还要告到教授那儿，教授也会下命令让他彻底收拾我。听到他的嚎叫声，我赶紧往回收腿。他死命拉住我一只脚，结果把我的一只鞋硬拽了下来。我顺着僻静街道一股劲往前跑，生怕碰上哪位警察同志，要不然他们会把我送进疯人院，去跟那位约尔卡大夫呆在一起。我真不喜欢见这位大夫，怕他那种反动思想传染给我。还算走运，回到家我爱人已经睡着了。幸好我有两双这样的皮鞋，第二天早上她没发现我丢了一只鞋。由于晚上天冷，我着凉了，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烧。尽管这样，我还是去上班了，别让阿纳尼亚产生怀疑。阿纳尼亚十分得意，象个英雄似的，举着那只鞋逢人便讲，说他差一点儿抓住一个贼，要不就是想偷教授抗癌药的间谍，这种药马上就要在大宗的动物身上作试验了。不幸的是我的这个举动反倒替克里斯蒂安同志提高了威信。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说，任凭人们这样传言。只有当他看准时机对他有利的时候，他才会出来作解释。有人提议，让警察把警犬带到这儿来，克里斯蒂安同志拒绝了。他说他没兴趣跟人啰嗦，不愿让别人干预他的事，而且他也不相信会发现什么。还说，现在人们已经找了他的麻烦，他不高兴让警察也再来插一手。由此可以看出，他有些心虚，好象害怕什么。至于阿纳尼亚，他也甭想再在实验室安安稳稳地睡觉了。这也算我对他报复性的惩罚。他看见我，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我什么也不少。他命令我饭后给他送一公斤李子酒，

而且不要问为什么。我对他说，他简直象个诈骗犯。但是我说，如果他把裤衩还给我，我会高高兴兴地给他送酒来。他说，他要拿我的裤衩跟安德烈同志的内裤交换，但酒还要照样送，要不他就把我的事告诉教授。他让我每隔四天就送一公斤李子酒，还让我去找安德烈同志强奸的那个姑娘的保护人，让他写个材料，证明这位儿子同志什么也没做，什么事也没发生。我郑重声明，这种事我不干。他说他要背着教授找个警察来，警察有办法证明那只鞋是我的。他说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要不然我早就关监狱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承认，即使那只鞋是我的，我也会坚持说是他用威胁手段从我这儿强行拿走的，就象用同样的手段拿走我的内裤一样，因为窗口上根本没留下任何我的痕迹。他说，公安人员来了会鉴定得出。但是在这之前他要去找我爱人，问问她这只鞋和这条内裤到底是谁的。考虑到我爱人不了解我的意图，在这类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家庭声誉、有关道德表现方面，她一贯严肃认真，而且十分敏感，我只好对他的敲诈做了让步。但这要等我病好了之后，等我找到门路想出办法之后。其实我最不喜欢这种狭隘的个体式劳动，这种事只能给社会带来阻碍和破坏作用。为了我伸错了脚踩了他的嘴，他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什么大路当间的粪堆，臭屁屁橛儿，婊子养的，蛔虫，兔子屎等等，还有许多我实在不好意思把它写出来。他揪住我的鼻子和络腮胡子，用香烟烫我，用削尖了的铅笔往我肋条骨里插。我的鼻子差一点儿让他扭断。当初我真该把

他的鼻子踩塌，因为他只配给我垫鞋底。对他这种野蛮行为和粗鲁的咒骂，真该好好教训一顿。难道出身农民阶级的人会这样表现吗？不。我托护士约内斯卡同志给他把酒送去，他让她带话给我，说如果这酒他不喜欢，劲头不够，他就要到我家去拜访拜访。可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这样做。他还说，如果天凉了，酒就要喝得多，因为夜里他在实验室会觉得冷。他说，要是不按他说的办，他就找一个穿蓝罩衫的精神病科大夫一块儿来给我"量量体温"。我给约内斯卡护士讲了一下他扒走我内裤的事，她简直气极了。我请她把酒拿给别的护士同志看看，但不要说是哪儿来的。请她向她们解释，正是因为这些李子酒，阿纳尼亚才整天喝得醉醺醺。那天晚上他醉得不省人事，回不了家，这才睡在了实验室。有什么样的贼会到实验室去偷教授那些长癌的狗呢？约内斯卡同志说，尼古拉大夫同志也是这样考虑的。我打算等我病好了之后，星期天去看看弗尔卡舒同志。我的估计不会错，教授搞的这套骗人把戏，绝不会滴水不漏！也许秋天他就让他儿子到国外去学习，为了儿子他什么都干得出。在那儿，他儿子会得到美元或者马克。这些都是用我们的狗，我们的材料，在我们的实验室搞出来的抗癌药换来的。也许他将跟班奈德斯卡一起去参加什么国际会议，他们俩整天一起溜达，我看现在他连回家的路都不记得了，就跟格列库或者布扎大夫同志一样。

我巴望着病快点好，好早点恢复起我的调查工作，在家跟我岳母简直没法呆在一起。她非要我到神父那儿去做

祷告，祈求主宽恕我，还硬要我喝加了糖的煤油，说这样可以治好我的咳嗽。快让这种迷信落后的残余统统消灭吧，真是受不了！

约内斯卡护士同志告诉我说，恐怕教授离死期不远了。他象个疯子似地拚命工作，整夜整夜呆在医院，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简直象个死尸。除了同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以外，他跟别人很少讲话。他准备提拔杜米特列斯库做副教授。同班奈德斯卡只看见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他们之间肯定出了什么事，人们传言教授把她甩了。我是不相信他会这样的。愿意跟儿子都到了结婚年龄的糟老头子保持这种关系的，还能到哪儿去找呢？这样的事我见过，夫妻吵架过一夜都会和好，何况他们。护士同志给我送来一封那个混帐实验员写给我的信，下面就是信的全部内容："今写信告诉你，你送来的酒已经收到，味道不错，而且没有搀水。我同斯特凡——斯皮尔曼教授的实验员，一起喝了一杯，我告诉了他酒是怎么来的。他说他要去报告公安局，我没让他去。我以你的名义答应给他一公斤同一桶里的李子酒。如果你不把酒马上送来，我就让你到监狱诊所去看你的病。对于象你这样的贼，那儿是会有你的位子的。如果你不给，在我告诉你老婆你是怎样的一个坏蛋之前，我要亲自到你那儿去一趟，把你的睾丸割掉，让你再也不能生养象你这样的混蛋。所以说如果你想得好儿，就牢牢记住我的话，不然到时候别怨我不讲交情。后会有期！"对于这样一个畜类，叫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关于在院长办公室召开的那次会——克里斯蒂安同志也参加了，并且作了三十分钟的发言，我得知了如下情况：教授发完言，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了祝贺。据说他要被选作院长，这次三个院长候选人的单子上有他的名字，通过选举最后确定。如果这成为事实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一个难于挽回的错误。他在发言当中，对总结报告的绝大部分观点都不同意，他呲牙咧嘴，简直象皮带拴着的一条狗。他还说，有些青年人，少数的青年学生，不是专心致志地搞研究，整天东游西逛，专门靠耍嘴皮过活。在他想象的世界里，只有一群跟在狗屁股后边的聋子和哑巴，岂不知人们是需要消遣和娱乐的，当然这要在正确的道德原则指导之下。然后，他不好好考虑考虑自己说了些什么，却抱怨领导没能即刻安排接替教研室工作的负责人。这倒使我感到高兴，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医院会立即落入杜米特列斯库或者约尔卡之流的手中。他们是些什么人，整天想些什么，这是人所共知的。杜米特列斯库医生同志整天讲些不三不四的笑话，而且骂起人来就象地主资产阶级时代赶马车的那么粗鲁。落在他手下我们就要遭殃，就会经常听到我上学时听过的那句话："跟我说话的时候，要闭上你的嘴！"他出身贫农家庭，可奇怪的是他身上丝毫也没表现出应有的进步性，他父母的正确立场竟没给他留下任何正面的影响。看到哪儿人多排队，他立刻就钻过去问卖什么。据说有一次他就这样跟着排队，结果看了一场足球。克里斯蒂安同志不但不对他批评教育，相反却百

般怂恿，他们经常喊喊喳喳咬耳朵，不让别人听见说的是什么。只有萨乌大夫态度还比较正确，他说：“我喜欢人多，因为只要看见好多人，准知道在卖什么东西，这会给我极大的鼓舞和乐观情绪；相反，哪儿没有人，这说明你去那儿准会白跑一趟。”而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听了却象个傻瓜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我到底也没弄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

接着，教授说学生会和一些负责干部对学生态度不好，一天到晚对他们下命令。不是同他们建立起正常关系，而是老冲他们大喊大叫。谢尔班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便取笑这位同志，硬说这位同志只知道开会，别的什么也不懂，比那些犹太教的神父——还是土耳其教的神父，我记不太清了——还要教条。

我简直弄不明白，奥泰斯库教授同志的实验员曾对我说过，他们已经做了准备，管保够克里斯蒂安教授瞧的，而结果呢，连他也为教授鼓起掌来。是不是他们知道了克里斯蒂安同志要高升因而害怕了？他们沉默不语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克里斯蒂安教授这个人残酷无情，如果他的阴谋得逞，我们医院存在的恐怖主义现象，将会被他带进医学院。但到底是谁支持他呢？他的后台是谁呢？我想从瓦西利乌教授的实验员那儿打听一点消息。他说，瓦西利乌教授对人们给克里斯蒂安教授鼓掌感到恼火，说这简直丢尽了人格，他们只知道听完了讲话要鼓掌，一边鼓着一边脑子里却不知道想的什么鬼；然后我又给考德里亚努同志的

实验员打电话，他说，他了解到克列楚同志曾亲自这样表示：“现在最后胜利已经落到我们手里，他的子弹全都用光了。那时候他将无话可说，如果再重复，他会感到羞耻。”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结论在于最重要的这件事：雷德曼同志交给我一份材料，证明教授让他拿出五千列伊现金才肯给他动手术，而且在他离开医院之前还要让他再拿出五千。这份材料我已经拿去复制，也许他出院以后会用得着。这件事再加上他儿子的事，可以说明教授同志的道德作风。同样，还在我手里的内裤，希望能成为对他的致命一击。

附言：

我正在记录上述情况时，从约内斯库护士同志那儿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克里斯蒂安同志跟一些外国医生一起呆了三个小时，而且还让他们看了我们的医院和仪器设备。这些美国的医生同志建议他到他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去作关于癌症研究的学术报告。我早就看出了这位同志的一些马脚，瞧，现在情况得到了证实。他是不是把班奈德斯卡也带走呢？阿纳尼亚呢？安德烈同志怎么办？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那些会算命的卜师不是搞得那么神秘，不是属于叫做宗教的反动科学，我敢说，我就是能预言未来的卜师。

写到这儿，我只好结束我的日记。由于那个该死的阿纳尼亚，家里我爱人跟我岳母吵了起来，而且随后也会问到我头上。我爱人是个精心操持家务勤俭持家的贤妻良

母，她责问我岳母为什么把李子酒喝了，或者是送给了什么人。她说她最讨厌醉鬼和偷偷摸摸的行为。老太婆听了火冒三丈，大骂了一通，最后又找到我这儿。要不是我认为应该尊重老年人的话，我真想把她推倒在地上。但无论如何在尽短的时间内，我要在我爱人面前做自我批评，以避免搞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继续保持模范家庭的荣誉，在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中，我们要成为表率，不能象楼上的那些同志，动不动就吵吵闹闹，整天骂个不休。

十九

安德烈同意参加大学生科学小组全国大会的闭幕式，完全是为了讨他的导师——布列坦大夫的喜欢。在路上，他真希望出点什么事，或者有什么人来找他，总之最好别走到开会的会场。

“只要人们稍稍客观一点，就不会不让你得奖。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你的贡献，”他的导师这样对他说道，“有关材料，差不多我都看过了……”

“当然，对论文的价值我也并不怀疑，”安德烈说道，“但是得奖恐怕不可能，因为他们要照顾多方面的原则。您知道，最近以来多少人都在说我的闲话！克列楚，考德里亚努，学生会的弗洛列斯库……甚至还包括学院院长……”

“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说你瞧不起他们，”布列坦大

夫继续坚持道，“你想想看，喊到你名字的时候，你却不在……”

“就凭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我敢说没有一个人会叫我的名字。至于说到瞧不起他们，我甚至想当面喊给他们听。我不管什么后果不后果……”安德烈显得很激动，就如同授奖仪式已经结束，对瓦西利，弗洛列斯库，特别是克列楚没能有机会表示出自己的鄙视感情而惋惜似的。

“这有什么用呢？能说服谁呢？大家会说仗着你父亲你才敢这样。”

“让他们说去！这些人的模样我看够了！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这套道德，原则，可不照照自己究竟是些什么人……谁能不犯错误呢？我承认，我有错儿，可他们却不放过一切机会大嚷大吵，就好象我放火把整个学院都点着了。”

“怎么，找过你的麻烦吗？”

“暂时还没有……”

“是啊，我也不相信……别忘了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镁带烧完了也不会留下痕迹。有些人就是这样，你越注意他，他就越起劲。你想想，如果不去，结果会怎么样呢？又会给他们制造借口，把你和你的老头联系起来。”

“一件起码的事实他们都不懂，我又不是小孩子，我跟父亲，各人的事各人承担！”

“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会让他们习惯的。”

"但是在这之前你还是要耐住性子。人们不会象我们想的那样，改变得那么快。"

事实上，安德烈既不是恼火，也不是冷漠，而是感到伤心。他预感到将有什么不公平的事落到他头上，但却不知道如何对付。自从跟父亲那次谈话以后，他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连准备考试也没当一回事，只是呆在实验室，作实验，作研究，想以此来逃脱折磨着自己的最后裁决：他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当老头子已经彻底暴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想法？而在巴努教授的实验室，他感觉找到了庇护所。当然，他已经准备好了报复行动：他也曾忽然想到过逃跑，断绝同一切人的关系，摆脱开一切烦恼，但又没勇气这样做，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向所有的人表示，一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安德烈似乎已经回忆不起对他父亲的完整印象：情况是那样的模糊不清，甚至恍恍惚惚。他觉得父亲并没说出来什么，痛苦只在于表情上，而不在说出的话里，好象极力要绕开什么。他毫无道理地不喜欢父亲作出的让步，不喜欢父亲的辩解，尽管在这之前他一直对父亲的沉默和与他疏远表示不满。"教会了我字母，是为了让我自己读出来禁止这个词。"以前他曾这样抱怨过。而渐渐地，这种感情却慢慢发生了变化。父亲在他的眼里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堂堂教授，是个跟教研室、教育学混为一体的名字。但随着了解到的一系列事件的进展，随着面对这一切父亲表现出的态度，父亲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不知不觉缩小了，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父亲曾经表现出的勇敢和坚韧不拔，只能作另外的解释："用拳头表示的语言好象他更理解，他反对的不过是暴力。只有当他被粗暴对待的时候才表现出反抗。而现在，当需要有另外的话要说的时候，却不声不响了，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难道他不再相信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些思想了吗？年纪太大了吗？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过去，他遭受的苦难，便都变得毫无价值。也许他只是随波逐流，不过是某些事件无意义的牺牲品，而不是一个斗士，或者更准确一些，不是为理想而甘愿献身的英雄。"因此，当父亲结束了大段独白之后，安德烈一句话也没讲。他感觉到了父亲的不安，但却并没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属于遥远的过去，"他心里这样重复道，"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变化，他应该看得出。他说的那些，我丝毫也体会不到，完全是一种无法解脱的误会……"

正是他毫无精神准备的时候，父亲经过的往事却桩桩件件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现在，不管他如何努力想挽留住最初的印象，而所有了解到的一切，向他说明的却是另外的、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他依旧顽固地做着努力，犹豫着不肯接受。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安德烈极力去捕捉父亲谈话时的形象：汗水挡住了眼镜片上的光亮，声音，特别是说话的声音，简直辨别不出，有时是那样的颤抖，低沉，有时由于愤怒又是那样严厉。最后，当安德烈看到这一系列事件中泛出的阴影，当雷德曼的话逐渐淡漠下来

的时候，他伤心地自语道："是的，的确他曾经很坚强，他战胜了。但是为什么在那儿停下了？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拴在那棵旧桩子上？"而当这个论据也失去了立脚点时，父亲最后的讲课又使他陷入迷惘。他不得不公开承认一直压在心头的痛楚："所有这些事件当中，妈妈在哪儿呢？为什么把她忘掉了？为什么经常忘掉她？"这种责怪比能够直接提出的问题还要严厉。但尽管有天大的不满，甚至怨恨，而理智却强使他不得不自己作出回答："我期待着什么呢？让他也在妈妈的坟头死去吗？生命有要求继续存在的权利……"但无论如何他感觉这个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而且认为是不可治愈的。而静心沉思，却又为他的主观臆断感到羞愧。父亲的力量显得这样巨大，他自己简直就象靠近磁石的一粒铁末。为了自己这种可耻的、不公正的想法去赔礼道歉吗？这仍然不会使内心平静，雷德曼巧妙地在他身上播下的怀疑和不信任，依旧在顽固地起作用。他母亲仍是模糊不清的一个章节。是的，父亲从没把母亲放在心上，他自己似乎亲身感受到了这段距离，体察到两个人仅仅受礼貌制约的冷漠关系。尽管父亲时常关心他，从娱姆那儿打听他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尽管每天早上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喝咖啡，甚至有时扯几句闲话，但安德烈总感觉对父亲有一种近似怨恨的想法，并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父亲对取得这样的胜利并没付出应有的努力。"但是否他确实出了什么事呢？究竟是什么事呢？失去自我控制了吗？从前是没有时间躲着不见人，现在忽

然讲了那样的课……简直是无法解释的变化。是不是抗癌药失败了呢?还是健康状况的缘故?……”好多次他看见父亲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有一次谈话当中，他完全有可能简单地问一句，即使父亲避开直接明确的回答，他也完全可以引出一种解释，一种观点，至少父亲会暗示出自己沉默的原因。因为不管怎样，父亲的态度是在受一些从别人那里无法发现的因素支配。也许只能从班奈德斯卡小姐那儿得到点什么，但她总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简直无法一起谈话，他总是尽量躲开她，因为他想跟她好好谈一次的任何企图，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两个人都感到局促，支支吾吾，只能说出一连串最简单的选择式回答：是，不，嗯，呃。双方都力图表现出善意，表现出想讨对方欢心的努力，互相都作出退让，但结果总是陷入僵局，最后只好红着脸，流着难为情的汗水分开。他觉得这个女人长得不丑，而且十分聪颖，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理解她对父亲何以有如此强烈的感情，而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又是这样的大。她并不象那些别有企图、一心想往上爬的人，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男子，又是那样的沉默寡言，那样冷冰冰，那样不容易让人亲近。其实这也没什么可解释的，热烈的感情现实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从跟伊丽娜关系的经验中，他能够理解这一点：他完全有理由恨她，从伊丽娜的心灵中他找不到任何完整的美的东西，但事实上却无法同她分开，不得不多次顺应着她，不管她发火也好，无缘无故地哭泣也好，冷嘲热讽也好，他都得承受。至于说到解释，

他自己能够找到的要比伊丽娜可能对他作出的还要有说服力。后来只有一件事他做到了：不再象往常那样老去找她，这是由于他一旦进了实验室便忘掉了一切，一旦穿上白罩衫，就象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因此，单就这一点他能够理解班奈德斯卡小姐的热情，尽管他也觉得这未免有些可笑。但他不能原谅的是爸爸过多地同她在一起，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损害了对妈妈的记忆和怀念。

"是不是直接问问薇拉，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如果向她解释不清问题的由来，她理解成别的意思，把这种真诚的关心当做对她私事的干涉呢？特别是她有充分的理由恨他，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原因他们才没有结婚，而只好过着一种难于忍受的偷偷摸摸的生活？"早早晚晚我们还是要谈一次。"安德烈心里这样想，但这个想法却越加引起了他的不安。"爸爸，你可以再结婚！"看起来是个充满苦涩味道的回答，但从他们也可能是真实的幸福当中，他仿佛窥见了自己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回答的原因之一。"但是对爸爸这种放心不下的关注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他这样自问道。"最近几个星期的日子简直象一场恶梦。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呢？是对这许多年的安静、沉默、怠惰作出的报复性的惩罚吗？"不管怎样，他感觉永远离开了一个洁白明亮的宁静世界，过于突然地转入到一场阴暗、混乱、使人晕眩的游戏中。

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跟布列坦医生一起走进了阶梯大厅。由于他一再坚持，他们坐在了最后一排。他以为这

样不但可以避开人们无情的疑问目光，而且这儿离出口最近，仪式进行当中，如果需要，他完全可以偷偷溜走而不被发觉。所有的座位几乎都坐满了。利用会议没能按时开始的这段空隙，学生会的负责人在通知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议、义务劳动、文艺晚会、体育比赛等等，但这些全被大厅里嗡嗡的人声盖了下去。安德烈惴惴不安地望着这些学生会干部对布列坦大夫说："您没见那些家伙是怎么整我的！"他一方面想对自己的犹豫作一下解释，另一方面也在为万一失败准备退路。"他们咬牙切齿地围攻我，为了不值一提的小事，你一句我一句吵个没完，就好象只有他们才会念这本道德经！他们还抡起拳头狠命打我，好象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布列坦大夫避免作出回答：他对"那些家伙"并不了解，只是对厅里过暗的光线感到有些恼火。

"怎么样？"布列坦大夫换了一副眼镜说道，"有信心吧？"安德烈不喜欢这句问话。他已经习惯于高分数，奖励，称赞，直到不久前他还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现在他竟想把那些即将颁发的奖状撕个粉碎。他想向父亲表明，他自己也行，他已经成熟，同那些千方百计要算计他的人也不相上下。

"这得看评奖委员会，"安德烈回答道，"我看不一定……除了我自己的事，我发现有些教授想找我父亲的碴儿，这些人都是挑拨是非的专家。一旦我做了什么蠢事，他们会立刻联系到我父亲身上。假定说他也做了一件，那么他们又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把罪责扣到我头上。而

我跟他，怎么对您说呢，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块大陆，美洲和欧洲。”

“还得相信客观，恐怕结论不能下得太早吧！”布列坦大夫一边说一边暗想：安德烈一向文静规矩，可以为人楷模，而今天却表现得有点傲慢，一进门便是这样不满意地喋喋不休，就好象即使他的论文数第一也不愿获奖似的。接下去布列坦大夫说道：“有件事我还是弄不懂：你还有什么工夫去干这么多蠢事呢？我们一直在一起，你根本没怎么出实验室嘛！”

“问题是一件也不许做，一切都得照他们的意思，不许你有任何自己的观点，任何解释。”

“照你的情况不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嘛，一个大学生想要得到的一切，你都有了。”布列坦说道。他还想加上几句嘲弄一下那些一切坐等现成，或者一切都要求报偿的年轻人，但看到安德烈那温和无辜的目光，又止住了。

“如果您指的只限于住房、吃饭、分数，那么是这样。”安德烈对于布列坦大夫不能理解他，感到有些失望。“幸好所有这些有利条件能帮我看得更远一些，让我能分清哪些才是真正的需要。这取决于自己有多高的要求。”

“这指的是什么？”

“也许每天有两只苹果我就能满足，只要不叫我再听考德里亚努教授、学生会的瓦西利或者我们年级里那些自称警惕性觉悟性高的学生们的欺骗宣传。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而他们却骄傲地对我吹起口哨。怎么对您说呢？

我情愿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只要让我能够相信那天晚上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巴第亚和宾迪亚没有出卖我。”

“考德里亚努教授还没批评你不敢跟你叫做欺骗宣传的现象进行斗争，现在你反倒先谴责起他来了，你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我吗？哼，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当面说他是野心家，而且还加了一些别的形容词，我不会拍马奉迎那一套。他大喊大叫，说全是爸爸的错儿，要不是爸爸教，我从别人那儿学不到。让我相信他们根本理解不了我跟爸爸是两回事，理解不了我可以有另外的想法，这绝办不到！我甚至可以发誓，爸爸连今天是几号都不知道……让爸爸对我的事负责，我对爸爸的事负责，爷爷对我们两个的事负责，这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家长是什么职业，就必得按照传下来的方式去思考吗？那么恩格斯的情况又该作何解释呢？不错，我和爸爸一直是同桌吃饭，可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许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吗？”

“很遗憾，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所以对这样的结论很难表示什么意见。”布列坦大夫有些生气，他一边说着一边心里暗想：“反正是前途有了保证，那位大人物不会让你离开家的，你放心好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革命者能自觉自愿地下农村吗？我的上帝，真是不识好歹！”

安德烈留心地环视了一下大厅：宾迪亚和巴第亚坐在第二排椅子上在悄悄地耳语。看到他们，安德烈觉得好象嘴里含的苦果顿时咬开了一样。“他们两个当中是谁叛卖了

呢？即使他们两个都没错，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友谊也算完结了。可我怎么向他解释呢?”他看了一眼正在等待他回答的布列坦大夫，心里想：“的确，他很重视业务成绩，但出于教育的理由他不会支持我的。也许他不理解，或者除了上级领导的话别人的都不信。但是，我为什么要向他解释呢?”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安德烈觉得有些按捺不住，他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无休止地说下去。

“事情很简单，”安德烈开口道，“就是从这篇倒霉的论文开始的。那天下午我写完了论文，碰到了他们，请他们去喝杯咖啡。宾迪亚说这件事值得好好庆贺一下。下饭馆我钱不够，他们也正等着发助学金，我跟老头儿关系又不是那么好。我请他们到我那儿去，好歹也能凑合点东西。但他们害怕爸爸，不肯去，说见着他喝了白兰地也会卡在嗓子眼儿。不管是考试还是别的什么事，爸爸从来不软心肠，从来不留情面，从来不通融。有一次考试，我正赶上他主考，他对我说：‘这次得委屈你一下，可没有别的办法。我要让你最后一个回答，当着所有的人，答出所有的课程。’爸爸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怕他我能理解。但爸爸是不会管我们的，我的房间就象不受外界干涉的大使馆。说实话，爸爸从来不干预我的事。就连那些家伙揪住我的头发打我的时候他也一声没吭。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只要我身体不出什么事就好。后来我决定带点酒到学生宿舍，他们俩正巧住在一个房间。一块喝酒当中，我听说了一件稀奇事：隔壁房主养了一只公鸡，每天夜里不早不晚，一

到三点半就扯开嗓子打鸣。鸡窝恰恰就在他们窗户下边。鸡一叫开了头，接着就不停地一直叫下去，吵得巴第亚几乎发疯。别的人有时候气不过，就往房主院子里扔玻璃瓶，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巴第亚实在没办法，只好吃安眠药，但是这也没用，鸡叫过以后就再也甭想睡着。后来他凑了比这只鸡贵好几倍的钱给房主，但是房主不肯卖。他答应以后每月从助学金里再拿出一部分钱给房主，房主还是不干。原来学生宿舍占的这块地方早先也是房主的，对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看到他的鸡搅得这些新邻居日夜不安，觉得多少出了口气。'要是让他这只鸡活下去，我可活不下去了。'巴第亚对我诉苦说，'别人都不想换地方，在城里赁房子，我又付不起房租。看来跟房主正正经经地谈是没有什么用了，我又提出来说再给他另外买一只他也不干，说他现在的这只公鸡跟他的母鸡很合得来。要是把他这只鸡弄死，他会直接找到我头上大闹一场，那样学生宿舍就会把我撵走。宾迪亚不想这么干，因为对他并没有什么妨碍，相反，往房主院子里扔装满水的玻璃瓶，他倒觉得挺有趣。'后来我决定冒一下险。巴第亚对我详细说明了鸡窝的样子，他也知道房主在哪间屋子里睡，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出来上厕所。他整夜睡不着觉，所以房主的习惯他都摸透了……其实我一点儿都没喝醉，只不过胆量胜过了理智。他们两个到阅览室去了，为的是让人们看到他们在那儿学习，没去干别的。我小心翼翼地翻过篱笆墙，按照一个病人教给我的办法——为这事以前他坐过牢

——用一根草棍把鸡引到鸡窝门口，然后抓住鸡脖子，把头按到翅膀底下，把鸡从窝里拽了出来。宾迪亚事先替我磨好了一把手术刀，我用刀把鸡头割了下来，连鸡带头放到鸡窝上边，然后就回家去了。据说第二天早上好闹了一场。邻居房主发现鸡死了，拿起石块就照这边玻璃窗乱打，嘴里还骂个不停。学生们都起来了，抄起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一通回击，简直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有几个人为这件事还误了火车，他们一直是靠公鸡打鸣起床的，从来不告诉门房到点喊他们，而那天内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五点钟了。后来，十点钟的时候，学生会、系主任办公室都找我，各种各样的闲话一股脑落到我头上：'正好是我？又是我？我到学生宿舍去干什么？凭什么这样干？为什么？跟谁一起干的？为什么不考虑后果？'等等。当时房间里一共三个人，只有我们三个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出去了。学生宿舍很大，靠房主这一面的都卷了进去。如果从头挨个问，十点钟无论如何也结束不了。这么说，是他们两个当中的一个。可究竟是谁呢？当然，我的确没考虑后果，我没法估计房主会有什么反应，也没想到结果会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我没考虑得这么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巴第亚，而宾迪亚是他要好的朋友，而且刀子也是宾迪亚磨的，玻璃罐也是他准备的。是巴第亚吗？我真不想乱加怀疑……早上我们三个在教室里还曾经坐在一起，就是说其中的一个一大早就去了，或者起床以后立刻报告了管理员。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他们两个还到阅

览室去呢？还有什么必要遮人耳目呢？至少应该看一看我宰鸡的那个场面。如果当时不管谁看见喊一声，那我也就不会再继续干下去了。事实上，尽管都发过誓，两个当中的一个还是说出去了。但是他们两个为什么没被叫去呢？哪怕只是做做样子！是不是有人利用我的朋友故意这样安排的呢？是爸爸的竞选对手这样安排的吗？我不知道，而且对这也不感兴趣。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这使我很伤心。对他们来说，我仅仅这么点儿价值吗？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当然，我干了一件蠢事，这我承认。但是应该把友谊放在什么位置呢？至少应该对我说一声，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我都会接受的。他们倒好，一开始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从那时候起，一切我才看透。我提出给他们两只、三只或者想要几只公鸡都成，可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这个，闹出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安德烈的感情已经平静下来，只不过对布列坦大夫不能理解他有些恼怒。一时间他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种冷漠的感情又扩大了：“在他的印象里，好象我是无比幸福，好得不能再好了……”

布列坦大夫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说下去了。学院院长、副院长、系主任、上边部里的代表、学生会代表、其他医学院的代表都来了，多半是头发花白，一个个表情严肃，在擦洗干净的黑板前清晰地显示出一排头部轮廓。多尔奈什蒂院士并不注意听众的掌声，他一边不住地舔着嘴唇，手一边颤颤巍巍地在一叠纸上来回摩挲。他找不到了演说词，但谁也不会怀疑开头的第一句是“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而接下去的第二句肯定会是"由于诸位光临……"。多尔奈什蒂把口袋掏遍了，他对克列楚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克列楚正聚精会神地呆在那儿，听到院长对他低语，整个身子都俯了过去，就好象脊椎支撑不住软瘫了一般。多尔奈什蒂右边是部里的代表布多依大夫，他正对大厅里的熟人微笑着打招呼……挨着他的是塞尔布大夫，一个身材矮小、眼神活泼的放射科医生。塞尔布大夫的嘴唇是那样薄，看上去简直象窄窄的一条疤痕。克列楚旁边是考德里亚努教授，穿一身刚刚熨烫过的运动服装，系一条刺眼的红领带，就象是刚从网球场上来。他安然坐在那里，随便翻着奖状，脸上那种神秘的笑容仿佛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坐在主席台上纯粹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巴努教授坐在桌子的一头，靠着学生会代表弗洛列斯库。他显得有些不安，不时用手理着那过早变白的卷曲的长发，远远看上去，真象戴着一个女人假发套。"连去理发馆的时间都没有啊，亲爱的，"他常常这样解释，"我简直不敢出门，要让这个多尔奈什蒂看见，准会抓我的官差。"这是个老光棍儿，一个人住在直接通向学院图书馆的一间小屋里。尽管看上去嘻嘻哈哈，实际上却是个冷静有谋略的人，在人们面前很善于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教授们都坐在第一排椅子上，最后，克里斯蒂安和杜米特列斯库也一起露面了。当克里斯蒂安教授走进大厅的时候，一群学生鼓起掌来，随后掌声逐步扩大到全场，连主席台上的人们也都惊愕地站起身，弄不清到底是哪位没有列入计划的特殊人物突然来到这

里。安德烈感到很激动，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鼓掌一直鼓到老头儿坐下。教授面孔冷冰冰的一声不响，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增多了，脸上的皱纹也显得特别深，安德烈甚至觉得好久没见到过他似的，看上去他的样子简直象一尊石像。一副灰色的大号眼镜遮住了眼睛，而通常他总是用眼神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杜米特列斯库医生四处张望着在找安德烈，当他发现了安德烈时，对克里斯蒂安教授耳语了几句，教授高兴地向安德烈转过身，好多学生也随着把目光投向了安德烈，直看得安德烈有些难为情，于是他立刻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两眼直盯着主席台。主席团里的病理生理学教授巴努，神秘地向安德烈做了个鼓励性的手势，但这却使安德烈感到愕然：巴努教授的教研室里有他一篇论文。是不是……？得奖的想法刚刚重现了一刹那，安德烈又立即把它抛掉了，而布列坦大夫却冷静地、近乎嘲讽地对他作出了保证：

“老板露笑脸，说明你已经被雇成啦。”布列坦大夫偷偷抓了一下他的胳膊。其实安德烈并不喜欢他这样，为了不值一提的一点小事，他往往就等着人家报答。安德烈显出并不在意的样子接下去说道：

“这个人从来不做毫无意义的动作。”

安德烈顿时想到父亲同巴努教授的关系：他们根本没什么交往，只不过见面点头致意而已。巴努对专业倒十分专心，创造了几十种仪器，他经常是埋头于某项研究，而在社交场合却显得那样无主见，表达思想是那样笨拙，甚

至离题千里。安德烈想象不出父亲会对他施加什么影响，而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冒出个“万一……？”作为教授，巴努对学生严得有些过分。他时常随着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考试就连最好的学生也难以跟上这种变化，害得助教们考试之前总要偷偷提醒学生们一句：“当心，在某章内容上教授又改变了观点。”除此之外，助教们倒并无兴趣去关心学生别的什么。巴努教授认为，只有他的课是最重要的。考试时如果听到学生这样回答：“这您没讲过”或者“我回答的是您上个星期刚刚这样讲过的”，他会立即高声喊叫起来：“这我不管。如果对新事物缺乏敏感性，干吗还来学医学？去学神学好了，那儿没什么新鲜东西。”安德烈考试抽的题目恰恰包括一些新内容，而助教还没来得及向他详细解释“教授的观点”。安德烈有些失望，只好胡乱地试着解答。他先说了说“不久前人们是怎么认为的”，这是教授课上讲的内容，然后，根据助教匆忙中讲的只言片语，试图拼凑出新的说法。出乎意料，巴努教授却精神专注地听了起来：“这是你从什么地方读到的？”“我想也许这是可能的。”安德烈惶惑不安地答道。而教授却兴致越来越高，又顺着这个假设继续扩展下去。这样一来考试简直变成了一场愉快的学术讨论，完全超出了开始时的命题。最后巴努教授对布列坦大夫说道：“你把试验仪器和试验动物都交给他，看看最后这个想法能得出什么结果。”又回头对安德烈说：“我给你打十分，因为你能独立思考，有科学探索精神。在刚才讲的三点上我等你的结

果，这样我课上讲的内容又会有新的发展。”安德烈又化了好几天工夫重新回忆那天的谈话，幸好他父亲对他做了解释，“如果是我的话，我该怎么做……”而现在，他正是为了这毫无把握的结果而忐忑不安。

院长郭日一多尔奈什蒂院士正在讲话的时候，布列坦大夫偷偷掏出一根领带从下边递了过去：“拿着，做好准备，你戴着正合适。”

“现在还有什么用，连奖状都已经写好了。我不相信，这不可能，尽管，老实说，我想得，我并不否认。”

“也许，可我有我的原则。我做了一件好事，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有时候如果你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别人不会替你想着。这方面可不能过分谦让。”布列坦试图给安德烈解释清楚。安德烈默默地接过领带，微微弯下身子，把领带系在脖子上。

“现在我竟成了随机应变的能手，凑巧我的裤子也刚刚烫过。”

“我在书上读到过一种特殊的罢工方式，它不象通常那样放下工作，相反，却完全按照规定的去做：邮政员一封一封地仔细检查信件，称重量，核对邮票数量和日期；铁路工作人员挨个检查火车头，检查旅客的车票。他们一切都是按照有关规定一字不差地去做，结果却把事情搅得比完全不做还要乱。有时候如果你照某个规定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去执行，结果反倒会整个违反规定。通常有些人让你去干这个，干那个，而如果你照他们说的去做了，他

们却又会大惊小怪，立刻出来阻止。至于说到朋友，”布列坦大夫转了话题，“这我不了解情况。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有一个人说出去的可能，这以后还可以讨论。世界上出乎意料的事多得很：吃肉的植物，会飞的鱼，还有……以后你会了解到的……”

这期间，院长已经结束了讲话。他从“由于……”开始，还是到“由于……”结束。讲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头往后一仰，心不在焉地听起布多依大夫的发言来。在布多依大夫旁边，安德烈惊奇地发现了考德里亚努。“他在那儿干什么呢？评奖委员会的主席该不会正好是他吧？”安德烈真想解下领带立刻走出去。而考德里亚努也并没有认真听讲话，他正在专注地翻着那一叠纸，看样子他从那一叠奖状里发现了什么，恐怕接下去他要发言。

“到底谁是评奖委员会的主席呢？”安德烈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和遗憾这样问道。

“考德里亚努教授。”布列坦大夫说道，“你没见他手里那一大叠奖状吗？”

“嗯，这么说我是彻底输掉了。”安德烈毫不怀疑地说道。

“魔鬼不见得全是黑的，几分钟之内事情就会搞明白。看起来你还是想要得奖。其实，一开始你就想到了这件事，”布列坦大夫加重语气说道，“你真正感到难过的是如果……”

“我可不是为了奖金。”安德烈冷冷地答道。布列坦大

夫还是想继续缓解：

“从前我跟米尚教授也有过这样一件事。他非常注意衣着穿戴，要是他主考，你不是穿的黑礼服，皮鞋不是擦得锃亮，就根本甭想进考场。他的实验员站在门口，准备了鞋油、鞋刷、衣刷、梳子……应有尽有。那天我的皮鞋擦得不那么亮，实验员过来对我说：‘让教授看见你这个样子，准不给及格。’‘去他妈的鬼吧，’我答道，‘又不是我的皮鞋考。’倒霉的是这话让教授听见了，直到回答完问题我才发现这一点。‘这位同学，’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回答得满好，给你十分。可你辱骂师长，应该让你去……见你妈的鬼。为这件事要么考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吃我一耳光，要么就把你送到上级有关部门。’怎么办呢？鬼才想去上级部门。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问我对说过的话是不是感到后悔。‘您不是也照那样骂了我吗？干吗要后悔呢？’他笑了笑，用两个指头把我的鼻子夹了一下，就让我出来了。瞧，结果也可能是这样。考德里亚努教授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干什么冒失事，就象个经验丰富的老棋手，而且他的战场也并不在这里……”

安德烈偷偷看了他父亲一眼，克里斯蒂安教授也象多尔奈什蒂一样，把头仰到背后，心不在焉地瞧着天花板。安德烈无从知道父亲正在考虑什么，但布列坦大夫的想法却让他不高兴：“就是说他没想到我该得奖，名副其实地该得，而是先考虑他同父亲的关系。如果父亲的身价在某些人物的眼里提高了，也许他的前途就会受到威胁性的影响，

而考德里亚努则会立即出来帮他的忙，或者至少宣称自己不偏不倚。假如爸爸遭到冷眼，或者给过他什么难堪——即使应该这样做，那么他就会找机会进行报复。多么令人作呕！我从来没能弄明白，为什么从这儿出发考虑问题？真是庸俗不堪！”他两手抱住额头，郁郁不乐地把两肘支在了桌子上。“通过这几个礼拜的事可以看出，我简直什么都不懂，不过是个愚笨幼稚的混合物。没有任何事象我想象的那样，象我在学校学到的那样，象我爸爸说过的那样……我弄不懂，这么多事爸爸都瞒着我……为什么他老是以为离开了他的暖箱，我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呢？也许正是这种毫无道理的关心，才激起了我对他的不信任……”安德烈顿时觉得脑子里一片混浊，简直理不出半点头绪，直到他觉出布列坦大夫用拳头杵了他一下，说了一句“喂，不用再遭罪了，就要完了。”原来考德里亚努教授正在讲话：

“今年的一等奖被我们学院的一个学生夺得。我们衷心祝贺病理生理教研室组织了一个这样有生气的科学活动小组，祝贺克里斯蒂安·安德烈同学，祝贺他在一开始进行的科研活动中，就作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此重要的贡献。我个人祝愿他沿着杰出的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依昂·克里斯蒂安教授迈出的脚步继续前进……”

考德里亚努还说了些什么，但安德烈只觉得眼前一阵漆黑，多少人企求的得奖，并没给他带来任何欢快。“为什么偏偏是考德里亚努给我授奖呢？是不是他见搬不倒爸爸，想通过我跟爸爸和解呢？是不是他又在准备一次新的攻击，

而想要向人们表明他并不怀偏见呢？又一次无缘无故把我跟爸爸扯在一起。爸爸出了力吗？简直让人恶心！假如我不是爸爸的儿子，假如他并没有出力，那我……考德里亚努要强调的正是我同爸爸的联系。其他学生也都是某某人的儿子……可他们去领奖状的时候却没有家长陪着……”

克里斯蒂安教授不再仰着头，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他摘下眼镜，带着一副讥讽的笑容瞧着考德里亚努，后者手里正拿着已经展开的奖状。

“还等什么？还不快去！”布列坦用肘碰了一下安德烈。但安德烈却感觉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别耍性子，什么也别想了！”

“克里斯蒂安·安德烈同志没在场吗？”考德里亚努教授得意地问了一句。几十双眼睛立刻投向安德烈坐着的角落。安德烈慢腾腾地站起身，在掌声中阴沉着脸走向讲台。“我唯一真正的成绩就这样给糟蹋了。”到了讲台前，他停了一下，两只手一动不动地垂着。“奖状我不接，”他这样想着，一边回过头朝他父亲看了看，这是他第一次向父亲征求意见。“从这个人手里我决不接，”他心里又默默重复了一遍。克里斯蒂安教授高兴地注视着安德烈，仿佛对他说：“是啊，真象是我的儿子。”然后对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还等什么？快接吧。”安德烈又犹豫了一下，随后猛地拿过奖状，连眼睛也没抬，勉强触了一下对方的手，接着便急急忙忙退了回来。考德里亚努教授觉察到了他的情绪，打趣地说了一句：“平常你不是这么爱激动的

嘛！”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想这种激动情绪会慢慢消下去的。”安德烈一边回答着，一边应接不暇地挨个握一下伸过来的手。巴努教授也伸过手同他握了一下，并且悄悄地说道：“你可以休息两天，然后再到我这儿来继续你的工作。你这个选题很有搞头。”

安德烈怕让脚下的台阶绊倒，低着头照直向自己的座位走过去。但到了那儿，却只简短地向布列坦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便走出了阶梯大厅。怨恨情绪象一股冷风一样包围着他：“完全是一堆破烂，连瞧一眼都不值得。除了巴努教授的提醒……还有那个考德里亚努，如果让我抓到证据，会前他曾经表示过反对，哼……爸爸知道些什么？为什么打手势让我接奖状呢？如果根本不值得，那他是不会让我去接的。”安德烈犹豫了一阵，坐在了台阶上。他打算看看奖状上写的是什么。“今授予……”但刚刚读了开头的三个字便停了下来。“授予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由打了个冷战。他脑子里考德里亚努的形象恰好盖住了弗洛列斯库。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弗洛列斯库曾经把他说得一钱不值，一件件历数他做过的坏事，却只字不提他还曾做过些别的什么。有时候对你关心爱护得这么厉害，甚至让你都喘不过气。早在襁褓里——捆住你的双脚，怕你身体长不直。捆住双手，省得抓伤眼睛。捂住嘴巴，因为有时你会伸出舌头破坏了仪表美，或者会从嘴里钻进细菌，吸进冷气，因而得上喉炎，那样你就既不会喊“好”也不会喊“我不干”。缠住你的脑袋，以免左顾右

盼把脖子弄弯。捂住你的耳朵，免得震破耳膜。一些人亲你，抱你，为的是不让别人来亲来抱，象只皮球似地把你抛上抛下，为的是让你有活动的感觉。除此之外，还要"授予"经过科学计算的食物，有关科学的书籍，科学的生活，科学的爱情，科学的散步，科学的神话，科学的想象！他又用心看了看奖状。"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巴努需要我……"

在附属医院门前的人行道上，伊丽娜正等着他。她穿得很漂亮。"谁知道这身衣服是为了让谁高兴呢！"他不敢肯定伊丽娜是否看见了他，于是决定走过去，假装继续在看那张奖状。这些日子伊丽娜的确等过他，但从来没穿过这样漂亮的衣服。他忽地闪出个念头：也许这当儿出现的不该是他。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孤独，感到需要同谁讲话，因此不管她临时编造出多么笨拙的解释，他觉得都能原谅。自从他出于报复，向伊丽娜讲了那天晚上喝醉了酒同一个叫做露拉的女人的事以后，伊丽娜的态度有了些变化。她不喜欢他的放荡行为，她要求他详细谈出那个女人的细节，有一天晚上甚至一定让他把那个女人的住处指给她看。安德烈随便指给她一座楼房，事实上他也真的连什么大街都记不起来了。第二天，伊丽娜说她有事，意思是告诉安德烈不要去找她，而安德烈也并没作出象往常那样的反应，他说他要在实验室工作，哪儿也去不了。伊丽娜偷偷到实验室找了他一趟，结果白跑，他早跟一伙人踢球去了。从那时候起，往往在最不寻常的钟点，他发现她

在等他。“这么有经验的女人，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安德烈心里有些纳闷。“如果她不再缠着我，今天我还会象开始的时候那样……她干吗这样离不开我，对我这样关心呢？是为了保住不落个被抛弃的名声吗？……”安德烈听任事情自然发展，一直到她来找他已经感到完全习惯。他们的关系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伊丽娜不再象往常那样冷静，有时竟无缘无故地哭个不停，根本不理会他的问话，不管是大声还是小声，回答都是同样一句：“别管我，我没什么。”有时候两个人软懒地躺在床上，象往常一样看着那盏绿色的壁灯，她会突然扑过去，一下子压到他身上，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不知是由于痛苦还是怨恨，无缘无故地问他以后会不会关心她，体贴她；而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赶紧答应是，是。即使这样，也并不能减缓她的不安。有时候晚上，她站在镜子前几十分钟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整整头发，理理衣服，摩弄摩弄脸颊，特别是额头，然后把灯关掉，望着黑洞洞空无一人的大街，就仿佛在等待着另外一个人。“跟你在一块儿我好象变得特别单薄，”有一次她这样解释道，“尽管你比别人好得多，但是我总觉得你身上缺少点什么。也许是缺少支配我的力量。我不喜欢我们两个当中我反倒胜过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我觉得离不开你，特别是在你面前我总感觉自己象是有什么罪过，不那么自然……”这些尽管多少给他带来烦恼，但安德烈却并不十分介意。安德烈感激她，因为当他认为他们可以立即结婚的时候，正是她帮助他度过了危机。过

后他才断定，尽管他无法否认她的诱惑力，但除了纯粹的爱情，她并不能够奉献给他别的什么。正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迫使他去思念她，因此，不管多么不合逻辑，不管她受到多少谴责，但她毕竟是那样纯洁，那样美丽，那样不可缺少。

如今，安德烈走得离伊丽娜越远，就越感觉缺少加快步伐的愿望。他知道，巴第亚或者宾迪亚随后会找他，他极力设想解释的理由，但是他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跟另一个联系起来的词。当然，如果说一定要庆贺一下的话，还不如同伊丽娜在一起，至少她能够承认过失——不是具体有所指，而是一般地说——，跟她在一起至少可以忘掉或者推迟欠下的债，可以填补难于忍受的时间空白，可以暂时平息不安的等待。他抬起手，抹了一下脖子上湿漉漉的汗水，无意中却触到了布列坦大夫的领带。这不正好是回去找伊丽娜的借口吗？岂不知伊丽娜早已跟在他的背后，正伸开两手准备去捂他的眼睛。

“你假装没看见我，”她说道，“我知道你走不远的。”

“我想我应该知趣点儿，谁知道你又有什么约会。我们相处这么久，彼此的脾气总还摸到了一些。”

“我在最后一排整整呆了一个小时，我要看看人们怎样为你鼓掌，这就是我的约会。”她嗔怪道。安德烈清楚，换个地方伊丽娜的反应会比这强烈得多。“能让我看看你领的是什么吗？”

安德烈漫不经心地把奖状塞进口袋里：“没什么特别

的，”他扯谎道，“这段时间除了奖状、奖章、祝贺，就是口头和书面的斥责，都差不了多少。”

“可我真的为你高兴，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会对你有用。”她对安德烈的冷淡态度感到有些不快。

“也可能……”他退让了一步。从她特大号的眼镜镜片里，安德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顿时有些心烦，于是问她道：“你干吗要等我？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在安德烈问话的紧逼下，她显得比以往更加苍白，更加缺乏表情：她的皮肤已开始干缩，变得有些粗糙。她依旧是美的，但却经不起近处细看。事实上这个印象更加搅乱了安德烈的心绪。伊丽娜呆呆地立在那儿说道：

“怎么，你不高兴？要是这样，那以后我也不再找你了。也许你觉得跟我在一起丢面子……当然，我不过是个助教，是个……”她还想继续说下去，但安德烈却立即伸出巴掌堵住了她的嘴：

“天哪，看你够多神经过敏！我还以为你碰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谁知道呢，也许太累的缘故，动不动我就往坏处想。”

“那就改变一下吧，”她迟疑着说道，“我想，忙了这么久，这是你第一个休息日，咱们也该换换花样。我知道你最富于想象。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回家，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干点儿以前没干过的事。”

“没看到你以前，我还刚刚想到了你，”他承认道，“可是我倒没想出干什么好。再想想看吧……”接着，安德烈

向她叙述了布列坦大夫给他领带的事，还加上了他爸爸给他递的眼色。他知道伊丽娜对他父亲一向既尊敬又害怕。“一会儿完了事我马上就到家去找你。我是觉得有点头晕才出来的……”伊丽娜顺从地接受了，吻了吻他，默默地转过身。“你可要老老实实等我。”安德烈伸出一个指头，意思想吓唬她一下。但他知道这一晚上又将白白过去：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不是兴奋得无法控制，就是哭哭啼啼。“你答应我吗？”安德烈又追问了一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并不想伤她的心，但不知怎地话却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试试看吧，”伊丽娜说着并没有回头，“只要你别耽搁那么久。”

“怎么，又哭啦？我想你应该明白。”

“不是为这个……我也不知道。跟你在一起我算个什么？可我……”

“你真古怪……”

“我知道。谁让我爱上了你，可现在你又不……”

“别说这些没味的话了……至多再过一小时，让你说个痛快。而且过后还有你乐的……”

“你瞧，以前你象个孩子，象个抱着好奇心的毛小伙子，现在却成了已经讨厌家务负担的男人。你知道，我既不愿意你那样，也不愿意你这样，而我又说不上该让你怎么做。”

“让我对你说什么好呢？说我知道的、感觉到的、需

要的吗？丝毫没值得可说的……问题不在这儿。”伊丽娜终于扭回脸，双颊湿漉漉的。“我说得不错吧，瞧，你又哭了！”安德烈故意嗔怪道。“我需要的不过是你的话，这又不费你什么劲儿。”

“是啊，这最容易不过！”

安德烈吻了吻她，头也没回地窜上台阶。走到阶梯大厅门口，究竟进不进去，他又犹豫起来。仪式还在继续，正颁发纪念奖状，掌声已是变得稀落无力。他又想到伊丽娜：她那苍白的脸，软懒无生气的形象，占据了他整个脑海。跟她在一起，他感到冷清、孤独，而一旦短暂地触到她凉丝丝的嘴唇，心里又立即涌出一阵不安和怜悯。“她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到底是怎么啦，我的伊丽娜？就好象尽全力往一条自我毁灭的路上跑。”他曾多次想象过失去她以后的情形：那是一个遥远的夜晚，被激起的男性自尊，迫使他象个野蛮人似地高叫着“伊丽娜”的名字，而她却故意不给他开门。他知道她不过是他整个生活当中必需的一道阶梯，他曾希冀一次新的奇遇，以便能够最终离开她。但同她联系在一起的那根无形的线，却从来一些儿也没有松弛。他发觉，不管伊丽娜做了什么，他都能原谅，也许这正是伊丽娜的本领，能够这样容易地取得他的同情和怜恤。有一次他甚至向伊丽娜诉说了这种不能够离开她的感情：“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他问她道，“你觉得象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不想什么，也不要做什么，只是希望这样不好不坏安安静静地呆着？”她显得异常镇定，仿佛集中起全

部目光，透过能够看得见的一切在注视着另外一边的什么东西，然后说道："是啊，这样的时候有过，有过很多很多，只怕你理解不了。我失去过很多男朋友，而留下的却不过是一堆并不需要的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放纵的嬉闹，而是无言的沉默。我最喜欢我们两个呆在一起谁都不说话，真是美极了。当然，你还有充沛的精力，还需要火一样的爱情……"

奖状已经发完，考德里亚努在热烈祝贺得奖者，祝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遗憾的是成绩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安德烈心里暗自回答，"真不愧是个夸夸其谈的宣传家，专门拿这些时髦的空话抽打我们。他这样说无非是让人看到，他对这些问题是多么严肃认真。当着这么多官方人士的面，他根本谈不出细节，只能现买现卖。也许，就在同一个时刻，在表彰清洁工的大会上，另外一个考德里亚努也在说着完全相同的话。明天我一定要把领带给他送去。"他这样想着，匆匆走下台阶，决定回家去。他觉得肚子有些饿，而且暗暗希望爸爸也还没吃饭，但他并不想让爸爸等他。他知道爸爸一定非常高兴，但同时他也清楚，爸爸不会祝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习惯。他担心的倒是怕在家里再碰到考德里亚努。只要一有这个人，什么样的兴致都会一扫而空。而冷静客观地把考德里亚努的话逐句分析一下，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只不过想起他就觉得讨厌。至于伊丽娜，尽管安德烈肯定这一天仍然要在她那儿结束，但他还是怕做出什么明确的决定。雨过天

晴的春天是那么美，透着黄色的古老城市，不时向它周围射出一束束柔和的、令人舒适的亮光。

刚刚回到家，电话铃响了，是班奈德斯卡小姐。"是安德烈吗？很高兴是你接电话。我已经打过两次电话了，你家的娱姆就象个聋子。"

"不，她不愿意听电话铃声，跟我一样，当然各有各的理由。您找爸爸吗?"他问道。等听到电话里那种犹豫不安的声音，这才发觉自己的问话够多蠢。"他在马利内斯库大教室，要告诉他什么事吗?"

"对，让他到医院来一下，约尔卡大夫要自杀，用的好象是麻醉剂，情况很严重。要不我往那儿给他打电话也行。"

"那样最好。他情绪也不怎么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不好去安慰他。"又是一句傻话！无论如何薇拉对爸爸更了解。他也不知怎地，竟说出这些话，而且后来竟结结巴巴说不成句。"要我去找他一趟吗?"

"不,"她显得同样尴尬,"我从这儿给他打电话吧。"

"小姐,"安德烈清醒了一下，说出来一句感到这样别扭的称呼,"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布迪勒，这您没想到过吧?"

"是跟教授有瓜葛的那个人吗?"薇拉不解地问道,"没什么意思，我见过他了。如果你愿意……"

"那就算了……"

"只怕他不会讲的。怎么，你想起什么来啦?"

"我吗?"安德烈想拖延一点时间,"想认识认识他。"

“怎么，又有什么新的疑点吗？……”

“噢，不。”安德烈立即否定了一句。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挂上了听筒。“真见鬼，干吗接她的电话？还不如让老太婆去接。看来这阵子老是不交好运。家里没人吗？苏萨娜大婶到哪儿去了呢？”她那件从不离身一直穿到夏天的黑夹大衣，没在衣架上挂着。

“苏萨娜太太！”安德烈喊了一句，脑子里又闪出那个旧想法：也许有一天会发现她死在洗澡间，她老喜欢呆在那儿磨磨蹭蹭不出来。要不就死在厨房炉灶旁边的躺椅里，两顿饭的空当儿，她总要半躺在那儿，脚上围一条毯子，读她那本《妇女名人集》，而且还不住嘴地评论：“教授先生，我看这个玛丽亚·斯图尔特也够不正经的，让上帝惩罚她……自己丈夫不象样，就该跟别的有老婆的男人搞在一起吗？世界就是让这些没廉耻的弄得没了体统，真是罪过。难道做了皇帝就什么事都能干？真见鬼！一切都会有报应的。让那些作了孽的统统下地狱吧。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出嫁呢？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乱来了吗？”克里斯蒂安教授只是冲她笑一笑，任凭她把英格兰和苏格兰混为一谈，而安德烈却想刨根问底地弄清楚，老太太偏偏不许他讲话：“我的小少爷，你还年轻，你懂得什么！连我到了二十六岁还不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呢。”

“苏萨娜太太！”安德烈又喊了一声，从厨房里却走出他的外婆绍依曼斯库太太。

“我把她打发走了。”绍依曼斯库太太一边吻着外孙

一边说道。"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要留住这么个瘸老太婆？你们需要的是个正经会料理家务的女人。我一见她给你们做的那些个饭菜，就都一股脑扔到窗户外边去了。我给让尼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怎么样保护好身体。可他倒好，我刚一离开就又把那个死尸弄了回来。我看了看衣柜，你们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添置，还是那些叫化子穿的破烂！明天我非亲自拽着你们去找裁缝不可。这怎么能行呢？你们的钱都怎么糟蹋了？我拿出自己攒的那点钱给你们买，你们这个样子我可受不了。"

安德烈费力地从绍依曼斯库太太的怀抱里挣脱出来，然后坐进一把扶手椅，高兴地瞧着外婆。他知道，几天之内家里又要整个翻个个儿，爸爸放在办公桌上的东西又会找不到，于是便又到很晚很晚才从医院回来。这次外婆来倒使安德烈觉得高兴，因为将会打破家里难忍的沉闷。绍依曼斯库太太并没坐下，依旧唠唠叨叨不满意地到处察看："这算是烫过的裤子吗？为什么不让她给你把衬衫浆一浆？你们跟我到斯泰奈尔太太那儿看看，那才是干这种事的，化点钱，可是值得。可惜我没功夫照管你们！为了买一块靠着丝苔拉的墓地，我跑了整整一个月。要是自己不管这些事，靠你们，就是死了也没人埋！我的上帝，哪儿也得靠托人情。还算运气，碰到了以前的市长斯托依卡·温钦楚，他把自己留的一块地方卖给了我。他让我问问让尼，能不能象从前那样，把尸首献出来作解剖。无非是想得点酒钱。当初是个多么聪明漂亮的小伙子！现在可

好，看起来比我都老。我说安德烈，你又到你妈妈坟上去看过吗？你不知道那时候她够多疼你！小时候你那么爱得病，动不动就着凉，真没想到你会出息成现在的样子。你妈妈有一条舞会穿的连衣裙，是奥雷尔从巴黎给她带来的。那时候为了卖这条裙子，她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没人要，不时兴穿了，老辈的传统全丢了。最后只好把它剪了，给你做了一身衣服。现在可倒好，人们进教堂、进剧场，连帽子都不摘，有的还穿着工作服。幸好进门还知道搓搓鞋底上的泥，吐痰嘛也不是每次都往地上吐，这么多人……天哪，那时候我们还笑话丝苔拉，她连一个故事也不会讲。我给她安排了钢琴课，外语课，可就没安排故事课。你知道，她可会编呢，想象力丰富着呢。”

“她什么样子？”安德烈象每次提到他妈妈时一样，激动地问道。“夜里我梦见过她好多次，可每次模样都那么模模糊糊，从来没挨近过。”他扯了一句谎。

“长得可漂亮了，就象你外公。要是你下巴和嘴不象让尼，你就跟她一模一样。你的嘴唇稍稍有点厚，这点她不喜欢。你爸爸为这可不高兴了，我想他会永远记着这件事。你爸爸常常后悔，说老呆在医院一直没怎么关心她，医生当得也未免太认真了。可有什么办法呢？就因为他出名，所以对头也多，而且人又太老实，不会说瞎话，可怜巴巴的谁都相信，把谁都当成好人，帮助他们，到头来自己受了骗，都让人给卖了，结果还是改不了。他从来不诉苦，蹲了这么长时间监狱，一次也没对我讲过他受了哪些

苦，被弄进去以后在那儿怎么样……直到后来他出了名，谁也不敢再把他怎么样了，还是没说什么，他说那些事不值得提。有时候我从丝苔拉那儿听来一句半句的，可她也……就好象她不是我亲生的一样。在这方面她可不象奥雷尔，你外公可不这样不言不语，有什么都大声嚷嚷出来，什么也藏不住，不象有些人，说句笑话也东张西望，唯恐别人听见。可惜没法扒开他的坟……我从来没劝过他让他少说话。象个地老鼠似的活着还不如不生呢。我就整天嘴闲不住，只不过没人听我的。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我什么事都不瞒着，不跟自己过不去。上帝给了一张嘴，就为的是让说话！你妈妈倒好，不言不语，什么都憋在心里。我看出来她心里难过，让她有话说给我听，可她就那么冷冷一笑，嘴上就象贴了封条。她在法院干活的那阵，从来不哼哟咳哟地叹气，什么事都受着，就连雷德曼让她去买烟她都去，就为当初没嫁给他，这个畜生就这样耍弄人。后来，让尼回来了，她一直催着他让他多干点工作，对自己的身子可一点也不在意。让尼过了几年好日子。哟，光顾说话了，怕是肉都烤糊了。”

安德烈早就闻到一股糊味，可不好打断她。每次来都是这些话，要是不让她一口气讲完，她就不高兴。安德烈没敢扔下她进厨房去，在屋里踱来踱去，随手把衣服丢在了床上。他不知道做点什么好。不管怎样，到伊丽娜那儿去以前，他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如果他恰恰是今天吃饭时不在，爸爸会生气的。只是如果薇拉找到了爸爸，他

可能要去医院，这样得等好长时间。忽然，他无缘无故地想到："不知道抗癌药研究得怎么样了？"

出于好奇，他走进了父亲的房间。他想，哪怕只瞧一眼——以前还从来没这样做过——，看看爸爸办公桌上放的什么书，什么文章，也许由此可以知道爸爸在想些什么。跟薇拉在电话里说的那几句话，心里老是放不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说，因此估计不出薇拉会怎么想。也不排除去问一问爸爸，而结果只能是挂上电话得不到任何解释……"如果布迪勒否认那天晚上之前就认识爸爸呢？……"他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他提心吊胆地走进父亲的房间，并没考虑到万一被发现找点什么理由来解释。书房……对，这儿有些什么书呢？贝斯特①和泰勒②的论著。很明显，爸爸也在关心他科学小组的活动。不过这本书已经放在这儿很久了，也许书架上没找到地方放。还应该有血液研究方面的材料。他匆匆打开那本书，翻到有关章节，想先看一看贝斯特和泰勒列的参考书目。如果爸爸也听到了巴努教授说的话，就是说事情做得丝毫不露声色：两天以后研究继续进行。事实上当他领完奖跟人们握手的时候，父亲不可能不自始至终地注视着他。

就象偷了东西似的，安德烈夹着一大摞论文集，战战兢兢地穿过廊道，肯定爸爸还没回来，他走进爸爸的工作

① 加拿大生理学家。

② 美国工程师，生产劳动科学管理理论创始人之一。

室，目光立刻落到一本书皮的题目上：《白血病》，心里不由一阵惊喜。他拿过来随手翻了一下，然后靠着贝斯特的著作把它放在地毯上。接着又看到一本《血液病学》，把它也放在了地上。当拿起第三本书的时候，才鼓起勇气往他爸爸办公桌上瞥了一眼。桌上整整齐齐：要么爸爸很久没在家工作了，要么外婆自作主张，把桌上的东西都收了起来。左边放着一大叠外科学杂志，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些材料和报告，《恶性肿瘤死亡率》①和《癌症免疫疗法》②，等等。壁灯下边有一份复制材料和一封拆开的信。他胆子越来越大，看了看东西是怎么摆的，怕万一父亲会记得每张纸在桌子上的位置，然后把那封信塞进有关白血病的材料里，又随手拿起一份复制件，匆匆读了起来。这是雷德曼的一份声明，随着上面的每个字，他只觉得不可遏止的怒火呼呼冒了上来。“不，完全不可能，简直胡说八道，”他不由惊叫起来，“这样的事爸爸绝不会干。别的什么罪过都可以加给他，可要别人的钱……”他又重读了一遍。“我还跟这个人一起谴责过爸爸。这个雷德曼真有办法，他能做得立刻让人相信。是不是我怨恨爸爸搞得自己昏了头脑，不管什么人加罪于他都能接受？”他羞愧地自责道，“我真糊涂……雷德曼一见瓦尔拉姆就立刻跪倒在他面前，我呢？不也是这样吗？”他透过门缝又看了看大门和大街，然后抽出那封夹在书里的信读了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如果称呼你亲爱的克里斯，

①② 原文系英语。

那是在扯谎，因为你并不值得亲爱，尽管抛开发生过的一切，初时那种真诚的友谊，曾经给过我选择这个称呼的权利。尊敬的吗？当然，对于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我是尊敬的。但现在我并不是写给医生，而是写给这样一个人：他侮辱了我，覆盖住了我生活当中的大部分阳光和光明，尽管有可能这是无意识的。作为医生，你已经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使命。通过最后一次谈话，我完全相信你会给我做好手术，因为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一只可怜的试验动物。而你——我再重复一次——要保住自己的名声，决不是真心实意要消冤解仇。那时候，不管我对你说了什么，你都毫不犹豫地立刻接受了。也就是说我并没引起你的关心和兴趣，我只不过是随便一个什么人。在你眼里，我那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你心里是明白的。其实，你只不过能够准确地把握手术刀而已。在大人物里你并不出色，也可以说只是平庸的外科医生当中的佼佼者。这就是你全部的骄傲资本，因为在其他方面，只要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失败比起我的只能是更多，更惨。而你那助人为乐的'著名'美德，不过是一副为了沽名钓誉而精心装扮的面具，完全不是出于你的本性。在我向你证明，我对你的了解超过了你对自己的了解之前，你会问，我到底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为什么这样没完没了，这样不肯罢休？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希望你能从以下看到的一切当中得到启发。但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对你我永远不会放手，我要变成你的影子，只要我活一天，就

寸步不离地盯着你，让你永远摆脱不掉我，摆脱不掉对你应有的惩罚。我让你一刻也得不到安生，即使在梦里你也会发现我的存在，即使在你同班奈德斯卡女大夫寻欢作乐的时刻，也会感觉到我，也会让你因为背叛了丝苔拉而感到内疚。假如有一种能够全部记录出你内心活动的仪器——因为你只相信仪表、仪器这些玩艺儿——看到的也不过是一股傲气，一股盲目追求成功的欲望，其他则一无所有。

“在医院我见到了克里斯蒂娜。你怎么跟她谈话，怎么整天跟她呆在一起，我都看见了，都知道。你完全不顾她已经记不起从前的事，变得象个野人，疯子，变得完全象另外一个人。她样子很悲伤，从前的美貌、自信、聪明、活泼，已经找不到一点影子。她的内心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了一副摇摇晃晃毫无生气的空骨架。我经常看见她站在窗口，象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伸出鼻子闻一闻窗外的树枝。那个为了出入大城市的豪华大厅，为了跳舞玩乐，为了睡在用丝绸装饰的床上而造就的她，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那件不知道怎么保留下来的大红室内便服，还能让人回忆起她的过去，回忆起你曾经怎样发疯般地追求过她。那时，当她抛弃了你之后，当她把你象一只不合脚的鞋子甩掉之后，是我曾经跟你在一起，是我设法平复你的痛苦，承受了你同那些不值几个钱的黑种、白种、黄种女人发泄一通之后的倾诉。实际上这些女人并没能减缓你失败的痛苦，你仍然忘不掉她。只有我天天在你身边，想办法哄骗你，让你感到自己并没受污辱，她不过是个不值一

提的女人。那时候我就考虑，你伤心的并不是失掉了爱情，你跟克里斯蒂娜之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的联系，倒是你的失败，一个并不那么出色的女人竟能够把你抛弃，这着实刺痛了你的自尊心。我曾经为此感到惊奇。如今，命运又把我们三个聚到一起。你到我这儿——你的实际救命恩人这儿——几乎是捏着鼻子来的，而到她那儿去的趟数却数不清。特别是你并没向我提到她，并没告诉我她离我只不过几步远。如果你对自己的失败真的并不那么介意的话，你一定会告诉我她的情况。即使从前那个时候，你也并没爱过她。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应该怎样解释呢？现在她能够给你的只不过是你对失败的回忆。你所以呆在她那儿，完全是为了报复，无非是想向她证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达到了什么样的地位，以此来羞辱她。如果不是这样，那她为什么提前离开了医院呢？为什么病还没好就出院了呢？你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其实这也并不难想到，她离开你以后，我从窗户里见她在走廊上一边看着远处的松树一边落泪。可见你对她谈的无所顾忌到什么程度。由此我可以断言，我从来没有看错，我对你了解得十分透彻。后来你到前线去也是想捞取点资本，而根本不是出于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你志愿到前线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在眼看要散市的当口，赶紧去捞几块奖牌。在这之前，同样是出于出风头的目的，你污辱过德国人，那恰恰是你看到他们将要失败的时候。另一方面，为了预防万一，你却收集了大量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材料。你

根本不是要写什么书来揭露他们，而是为了万一变换风向好向当局证明当初你错了，现在已经改变了观点。但是从所有这一切当中你得到了什么呢？你从前线挣来了勋章，却并没有因此而高升，你仍旧回到了原来的医院。至于你收集的那些宣传材料，却让你吃了应得的苦头。正是由于你一心想往上爬，所以才找上了这样一位理想的岳父：有钱，有财产，有议员地位，还有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儿。几经失败之后，你想到该是得到一次胜利的时刻了，于是你从我身上踩了过去，对我的存在根本不屑一顾，完全不管丝苔拉本来该是我的，一点儿也没考虑我给过你的帮助，而是不顾一切地直奔自己的目标。除此之外，你还仰仗自己的出身，靠着自己曾经差一点儿打破一个法国法西斯分子的头，而被刊登在一张小报上的‘英雄’行为——殊不知你当时的愚蠢完全可以招致被乱棍打死——而混进了党内。可你对我，你的救命恩人，给了什么呢？就是我上边说过的报答！是丝苔拉自己的选择吗？不，是绍依曼斯库这个老骗子，他把我当成了他的贴身护卫，是他下的命令！为什么他没命令女儿嫁给我呢？理由很简单：你有一个能赚钱的好职业，长得标致，又能说会道，实际上你追求的是老头子而不是她。而且你是左派，这个老政客正想找个护身符来保住自己的地位。说到底你们两个正好是合适的一对：一个右派，一个左派。右派倒台了，左派又立刻上来了。按照你们的逻辑，这叫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并不是为了丝苔拉，而是为了老头子和那座别墅。

有人说你亲手给她打了过量的吗啡。是的，这你完全干得出来。为了摆脱负担好再去作新的追求，你已经完全不需要这样一个垂死的女人。她等了你这么多年，忍辱负重替你抚养儿子，结果你却给了她这样的报答。你帮助布迪勒也是出于十分明显的原因，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曾亲口对我说过，历史是变化多端的！你知道布迪勒是什么人，你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是为了将来好有个证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历史将站在谁那一边。’这就是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来到你的医院，我不得不在你面前认了错儿，完全照你的意思回答了是的。但任何人都会看得出，我是在什么环境下说了你想要我说的话。你想要避开的恰恰是事实。那时，对你进行审查的时候，我又一次向你伸出了手。我本打算解救你，或者至少使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你看到我，眼睛立刻露出两道凶光，看样子甚至可以立刻扑过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完全有理由起来自卫，但是人们曾经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这样的习惯力量让我能够原谅你的一切，我仍然没有失去对友谊的信任。我十分了解你的脾性，你的欲望，我无从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属于哪个匪徒集团。因此我只好照实讲，而按照法律，那时候你是有罪的。在那儿我见你是那样不怕刑罚，那样满腔仇恨，那样不识好歹，我真替你担心。即使退一步讲，是由于我的原因而使你受了苦，那你至少也应该为了在巴黎救过你的命而感激我。自从你出狱以后，就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只不过占据过

你生活当中的一道阶梯。现在你需要的是另外一些朋友，为了得到权力，你需要开辟新的道路。而我，等待了你这么长时间，受尽了你想象不到的痛苦，现在能够奉献给你的，只有对旧时友谊的回想。因此，对你来说我已经完全失掉了任何价值。职业又一次帮了你的忙，靠着它你又爬了上去。而我，由于曾经跟你是朋友而受到了连累，而且，后来同瓦尔拉姆一起，越来越走下坡路。如果说从你那儿得不到支持，得不到帮助，那么，一丁点儿鼓励和谅解，哪怕只有我给过你的四分之一，应该说还是需要的。直到我进了医院，尽管我完全可以原谅你，但你仍然感到内心有愧而不敢见我。而现在却为时太晚了。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我已经把一份声明交给了你的忠顺奴仆。还有，人们都恨你，反对你，因此收集了不少关于你的材料。从前你一直凭仗自己的高傲作为护身符，不久你将看到，人们没有你会进步得多么快。在你将要顽固地左右招架的时刻，我却感到无比自由。我没有任何欲望和野心，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让人们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你已经落得失掉了朋友，失掉了感情，失掉了家庭，连亲生儿子都反对你，谴责你。你对此有何感想呢？难道这不意味着些什么吗？而且，连出于某种利益而同你搞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也在欺骗你。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你已经是众叛亲离。现在你还在幻想着施展你的权力，但过不了多久连这你也会失掉。到那时情形会怎么样呢？那个曾经使你念念不忘的瓦尔拉姆，也是这样没人理睬，现在竟落得在迈古尔商店附

近卖彩票。你们两个称得起是难兄难弟，都曾经是那样地要强好胜，抱着同样的生活目的。大概你是唯一使瓦尔拉姆失败的一个。他本想制服你，使你屈膝，毁掉你的个性，但他没有成功。一听到你的名字，一看到你，他甚至会发疯。你有一种特殊的激怒人的方式。也许你现在变得更明智了些，那么就再试一次吧。或者就在克里斯蒂娜身上试。她正在发疯般地追求那逝去的荣耀，特别是她也已经没有任何可亲近的人。

“不管怎样，我可怜你，是的，克里斯，我可怜你。你怀着恐惧和失望准备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滋味我是不愿受的。即使从你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荣誉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呢？你比其他人究竟多了些什么呢？你还有哪怕是唯一的朋友吗？你有什么任何值得满意的事吗？你能有心安理得的感觉吗？能够死而瞑目吗？为了这点儿可憎恶的满足，你付出的代价不觉得太高吗？当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旦发现有关你的一切，一旦了解到你对他的妈妈都做了些什么，一旦看到由于你的原因而引起人们对他的敌视，那么，他会轻易地原谅你吗？一边是你留给他的别墅，但同时也伴着人们对他的敌意和仇视；另一边是抛开你招致的恶果，而去往自由的境界。毫无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你，克里斯，孤立无援，象一只可怜的虱子，蠕动着去寻找最终被捻死的归宿。什么都救不了你，因为已经为时太晚，确实太晚了。

“我对你说的，无非是你自己的良知应当唤起的回忆。

你对我是这样的蔑视，哪怕只是走走过场，也从没来看过我。

“就此止笔，再见……”

安德烈把信放回桌上，匆匆地走了出来。“这个人心地够多阴暗，简直象漫长的黑夜。”停了一下——这是一段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痛苦间歇——他自语道。“他是个可怜的病人，但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到了这步田地呢?是谁?”安德烈感到一阵迷惘，而且伴随着某种惊怕。“一旦细菌感觉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便会立即展开攻势。是谁在制造疾病和仇恨？……实际上这并不值得奇怪，有时候不是连我自己也……”砰的一声，他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一阵疼痛使他惊醒了一下。但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却招来了绍依曼斯库太太。

“什么东西掉地下了？你想要什么吗？准是饿了。我看让尼不会回来了，他对医院比对谁都亲！”

“不，我要等他。要不我去迎迎他。”

“那也好。”老太太说道。“我给你们做的煎胡萝卜，好吃着呢。你们都需要维生素A，眼睛都不好。肉烤糊了，真可惜。要是你们还把那个瘸老太婆留下……最后恐怕连炉灶也得让她给弄塌！”

“也许爸爸会请我们去饭馆呢。”安德烈怯声怯气地说道。外婆听了立即高兴起来。

“可我没带衣服来。是不是现在穿什么衣服都能进饭店了？奥雷尔可从不许我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失掉身份。

可是你以为你爸爸会有钱吗？要不还得我自己掏腰包……”

“我想钱他是有的。可今天他肯定不会请我们去，我想起来了，有一起自杀的事，而且他挺喜欢那个人……”

“他谁不喜欢？”绍依曼斯库太太不满地低声咕哝道，“我就不明白那些寻短见的。象我，有多少条理由都够得上自杀，可我偏偏没那么做。”

安德烈知道，再同她继续谈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但约尔卡医生的形象却一直怕人地缠着他。“今天爸爸也死过去过……”他停在窗下，渐渐的，怒气象一股难忍的热流忽地冒了上来：

“该死的，见他妈的鬼去吧！这些臭东西，就知道破坏，毁坏，不让人们安生！”

“你这是在骂谁呢，安蒂，骂得这么难听？”老太太端着一杯咖啡轻轻地走进教授的房间，不解地问道，“别忘了，你面前是位体面的太太。”

“哎呀，对不起，”安德烈突然惊醒似地道歉说。“有些家伙想把这段路给弄坏。”他扯谎道，一边用力拉上了窗帘。

一群乌鸦哇哇叫着落在窗下的松树上。

二十

无比尊敬的书记同志：

暂时我还不准备对科学院院士，医学博士依昂·克里

斯蒂安教授作出任何评价，因为还为时过早，因而可能是错误的。有关他的业务活动，以前我已经谈过。克里斯蒂安院士业务成熟而且全面，他有着一系列的职称头衔，不少都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一段时期当中，他曾是个卓越的研究人员，很受称道的教学干部，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他的确可以作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却是他业务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切都需要及时加以注意，并给以认真详尽的分析。但无论如何，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彻底搞清楚。他的不少违反常规的出格行为，竟被有意容忍。难道就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并且很早以前就允诺说他能发明一种抗癌药吗？一个对青年学生能起巨大影响作用的教育工作者，竟然道德败坏，而且有着至少是值得怀疑的社会表现，这一事实难道可以轻易忽略吗？

这些问题之所以必须认真负责地加以考虑，正是由于如果继续延迟对他采取应有的措施，对于学生，对于整个附属医院，都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比如今天，他高兴得不得了，简直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一会儿说笑话——他那些旨在贬责社会一语双关的笑话早已尽人皆知——一会儿装作听众，一本正经地听有些学生的胡言乱语。而当莫里尚系主任通知他去开会时，他却说道："承蒙邀请，不胜荣幸。我是一向逃避会议的，现在却变得喜欢开会了。这是为什么呢？条件是这样：等我到会之前，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我需要的研究经费。反正我自己拿

不出这么多钱，而且这也不是我个人的事。如果不是谈这个问题——对不起，那我们用不着一块浪费时间。不过还要看看参加会的是哪些人，要是我去了讨论起别的问题来，你们可别后悔。"就这样，他把自己的讲课变成了会议的预演。关于胰腺外科手术，他几乎没讲什么，主要谈的却是另外的题目："信心——精神力量的来源"。这就是他如何完成业务职责的例证。我手头有他讲课的速记记录，这份材料用不着加任何评注。实际上这完全不是什么讲课，而且同第二个题目也并不沾边。有些学生向他提问题，反驳他，而他却表现得象个宗教预言家。他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个头脑清楚心地善良的教授，而是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由此我不禁要问：哪怕以年龄为理由，难道不应该减少他在手术台和实验室的活动吗？人们请他做的不嫌太多了吗？我们对老年人的关心，不也应该在他身上有所体现吗？医院需要的是年轻有为的领导，学生需要的是身体力行的师长，而不是夸夸其谈的空头演说家！而且，他在教授当中也是引起团结涣散、使教学干部偏离自己伟大任务的根源。象考德里亚努、瓦西利乌、奥泰斯库、波赞等这些有能力的教授，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他不满的意见，且不说他还毁掉了一个有才干的女青年薇洛尼卡·班奈德斯库医生的前途。他凭借自己的职权，迫使她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使她陷入可怜的悲惨境地。很难使人相信仅仅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两个人整夜呆在实验室，而且还安排了一个叫做阿纳尼亚的守门，充当一种类似私

人保镖的角色。同样，他把一个本来善于独立思考的杜米特列斯库·伊凡舒医生，变成了他退休后打算继续用以操纵我们医院的工具。

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在于：应当尽快对克里斯蒂安大夫进行分析研究，不然情况会越来越糟。我和副教授依·弗洛拉大夫同志已被列入另册，杜米特列斯库·依瓦舒大夫剥夺了我们的工作任务，而在我们行政单位或者党组织里，我们无法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人们在克里斯蒂安院士面前都不敢说话，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受到的打击报复是什么滋味。

推动教育的发展并使之现代化，加强这一领域的实践环节，绝不能靠那些跟不上时代步伐、观点陈腐的人们去实现，不管这些人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请对上述人物的历史情况再作一次审查核对。我相信，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健康负责的精神，我们学院的未来一定会顺应时代潮流，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一群教学干部的代表

（署名不清）

二十一

本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尽管我们有过这么多经历，见到过这么多情况，但生活当中仍然免不了发生某些意外。既然过去的一切并非偶

然，那么眼前的一切也应该作同样的解释。由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日记停了相当一段时间。假如不是教授的行为引起我极大愤慨的话，直到今天我还不会动笔。今天早上他查房的时候凶得象头狮子，把病房记录卡撕得粉碎，说写得不合格。而在尼古[illegible]夫同志负责的病房，他硬说清洁卫生搞得不好，吵吵嚷嚷，弄得清洁女工和助教们直哭。然后，他走到电视机那儿，听副教授同志给学生们作示范讲解。他一边看着手术怎样进行，一边听讲，而越看火气越大。他说弗洛拉同志嘴里象塞了块棉花团，连他都没听懂解释，何况那些学生！接着他气得跑到外科换药室，找到我，让我替他准备白罩衫和别的东西，他要亲自做手术，让那些只顾瞅姑娘大腿而不去看电视上动作的人们，弄明白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见我没有迅速动作，也没听清他的话，便拿起一只消毒锅在桌上用力一蹾，我还当他在摆弄着玩，没当作一回事，他立刻火冒三丈，抄起那只锅冲我摔了过来，吓得我立时踉踉跄跄往后退。接着他又骂我，说我推大粪桶也不合格，就会象二流子赶集似的游来逛去等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已经自认为是学院院长了。实际上考德里亚努同志的实验员告诉我，他根本当不上。因为现任院长不支持他，谢尔班同志也不支持。还说克列楚同志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小推车，不愁他没大粪可推。现在学院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有些人以为他会当上，而考德里亚努教授的实验员说，考德里亚努同志曾经给县里一位有影响的同志的妻子动过手术，考

德里亚努同志同意那里同志们的意见。这样看来，结果可能还是对我们有利。我了解、 ;泰斯库同志拿了克里斯蒂安同志的一些著作，让他的助教写出内容提要，看看怎么样。助教们作完都说著作非常好，而奥泰斯库却很生气，说他们简直太笨，于是交给另外一些人去作。这些人作完说很坏，奥泰斯库还是怒气冲冲，又让第三批人作。这些人不知道究竟该说什么，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据说他想搞成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以后在会议上好根据需要派不同的用场。实际奥泰斯库是想脚踩两只船，他的名字没上院长候选人名单，为此他大为不满。这些老头子和他们的仆从真是难对付。

克里斯蒂安同志余怒未息，连课也不去上了，让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同志去替他。人们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不派副教授去。这只有我心里明白，因为我知道这两个人几乎是形影不离。他们在策划什么，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想用杜米特列斯库把副教授同志和尼古拉大夫同志搞下去呢？假如，上帝保佑，让他来接替克里斯蒂安，那将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此人甚至比克里斯蒂安还要坏。他整天在走廊上说些不三不四的笑话，见着什么都不满意，都要批评一通。比如，今天他就批评了市长同志，说市长敛了人们的钱净干些蠢事。他说这位市长有朝一日会认为人们在街上闲溜达要把柏油路踩坏，因此完全有可能发给人们一种"逛街票"，也就是说，除了从家里到上班的地方必须走的这段路以外，要去别的路都得拿钱。杜米特列斯库大夫上课就

象耶稣在西奈山上讲经一般，为此换取了学生们的掌声。我还没了解到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但是学生们鼓掌鼓什么一般我们都知道。克里斯蒂安同志需要俯首听命的仆从，因此对他加意栽培。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前途，因为这位杜米特列斯库同志缺乏头脑，看不准方向，而且做的蠢事太多。

克里斯蒂安同志在办公室呆了好长时间，以致尼古拉大夫说道："也许是在写他的遗嘱吧。如果他还有点羞耻心，为自己做的事感到惭愧而写辞职书，那倒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惜他不会这样做。"快到傍晚的时候，斯皮尔曼大夫到他这儿来了，然后他们一块去了实验室。而我没能跟到那儿，因为那个阿纳尼亚同志钉上了我。在拐角那儿，他一把抓住我，又拧我的鼻子，又拽我的鬓角头发，还说要毒死我，要把我打得眼睛从后脑勺冒出来。他问我为什么把安德烈同志强奸的那个姑娘家长的声明复制件到处散发。我没敢再往前去，怕他把那种致癌的药水倒到我头上。后来他又警告我说，要是他拿着我的那只皮鞋去找教授，拿着那条裤衩去找我爱人，管叫我不但换个地方干活，而且就连家里的老婆也保不住。他说要是每天给他送一公斤李子酒，还可以让我在这个医院呆到"六一"儿童节。我没有立时就给他送。随后我见他提着一只网兜，里边装着一只皮鞋和一条内裤，在我家窗户底下踱来踱去，登时吓得我魂都飞了。我立刻跑出去拦住了他。他傻笑了一阵然后对我说，同我根本没什么关系，他是拿着自己的皮鞋去

修的。他还问我，是不是请他到家喝杯咖啡，顺便也认识一下我的家属。我赶紧答应立刻就给他送酒，结果我又可耻地犯了一次错误，回家把冰箱里那瓶酒偷出来给了他。作为还报，他使劲踩了一下我的脚面，然后揪住我鬓角上的头发死命往下拽，弄得我就象进了刑讯室一般。我费了好大劲好容易才挣脱出来。他这一来不要紧，我家里却闹出了乱子：我爱人说那瓶酒让我岳母喝了，我倒没有被怀疑，因为没有爱人的批准我是不敢喝酒的。我爱人闻了闻我岳母的嘴，又闻了闻我的，结果老太太嘴里果然有酒味。

遗憾的是事情越来越糟，这家伙老是敲我的竹杠。我不得不住到医院里去，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和好。最后一次，我亲自把酒给他送到实验室，而他却拿我取笑，弄得我哭笑不得。他说，即使我趴下给他舔脚后跟他也不会饶我。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托人想调到另外的医院。可惜考德里亚努教授同志那里也没有空位置，但他答应帮我的忙，说可以给克里斯蒂安同志另外调个人来。如果那样的话，以后我就只能从约内斯库护士同志那儿了解情况了。但这样可以好好教训一下阿纳尼亚，我也不会再听任他摆布了。我要把他的档案袋子装得满满的。关于他的一切材料，我日记上都有，哪一条都够他呛。现在我要侦察一下他把我的鞋和内裤究竟放在了什么地方。我想给他酒里放点药，让他昏睡过去，然后偷偷把东西拿回来。但这毕竟不是个好办法，因为这家伙简直象头野兽，不会那么容易

就睡着，而且也有可能他拿了我的酒去送人。假如我能肯定他拿我的酒去巴结教授的话，那我乐不得给酒里加上双份的药。

关于抗癌药研究的情况，我没得到什么消息。只有约内斯库护士反映，说她听斯皮尔曼大夫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样看起来，星期日我得去找一趟那位有疯病的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同志。

还有两件必须提到的事，特别是都发生在同一天。

一、克里斯蒂安教授的儿子得了奖，这简直是评奖委员会的耻辱。当然，这当中有不少不是我们学院的人，他们无从了解详细情况。但我们这儿的人为什么对教授同志的行为也默不作声呢?开会的时候教授就会板起面孔训人，搞得大家都怕他，因此，保持沉默即便会遭到良心谴责，人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如今别人就更不在他眼下了。我真不明白，难道评奖委员会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出身好、表现好的青年了吗？为什么不可以把奖授给副系主任万恰的儿子呢？难道副系主任的儿子比克里斯蒂安同志的儿子更差吗？我不相信！这样一来，将会给我们这所高等学校的历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污点。

二、约尔卡大夫企图自杀，服了麻醉药。情况相当严重，但看来还不是已经没救了。克里斯蒂安教授开着会就被叫走了，一直守在他身边，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我从来没看见教授这么伤心过，简直软瘫了一般，而且立刻显得更老、个头儿更小了。我在想，所有教授组成的整

体，这么多同他势不两立的人都没能做到的，唯独他最要好的朋友做到了！事实上，约尔卡大夫所在的那所医院里，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胡说乱道，不少人还装疯卖傻，甚至警察局都给他们留了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企图自杀，我并不感到惊奇。如果教授讲点人道的话，本应该让他住进自己的医院。

班奈德斯卡同志又去找克里斯蒂安同志了，由此可见她还是闲在的。两个人呆在一起，有时候出来散散步，就象两只无忧无虑的鸽子。很清楚，只要她高兴拿裙子套他的头，他会立刻乖乖地往里钻。他们两个甚至在约尔卡大夫那里呆了一整夜，而让那个楞头青阿纳尼亚看守实验室。这样我就没办法靠近病房，没法知道约尔卡大夫死了没有，也听不到有关他自杀的一些猜测。

而同雷德曼同志的谈话，却使我惊得目瞪口呆。他到我家里，找到了我。昨天，我径直告诉了他教授是怎样一个人，他这才答应对我谈一谈关于教授的情况。“我了解他，”雷德曼同志说道，“即使用大炮轰，你也整不垮他。唯一能刺痛他的是他儿子出点什么事，而他儿子跟父亲年青时一样，是个暴躁性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让他儿子成熟起来，越来越象爸爸，那样事情就更难办了。克里斯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他要千方百计保住儿子，给儿子的出路、前途铺平道路。因此应该在他儿子身上下工夫。”我表示不太相信，他说我太单纯，太幼稚，根本没能力了解克里斯蒂安同志。我倒没什么，即使骂我是头牲口我也不

在乎，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情况。后来我们又一起去找另外一位同志，瓦尔拉姆。这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好的同志，他现在在卖彩票，他对教授也十分了解。这位同志说，他不愿再介入这些事。后来，我们一起喝了几杯李子酒，他竟哭了起来。见他那副可怜样子，惹得我也几乎掉下了眼泪。只有雷德曼同志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不把教授整垮决不罢休。但愿上帝在天之灵能够听到这人民的呼声，作出主持正义的裁决，不然我就会被调出这个医院。不知道约内斯卡护士或者其他同志能不能付出这么多心血，会不会这样尽全力来揭露教授的真面目。能够跟我完全谈得来的只有列穆纳鲁，这是一个可以信得过的态度友好的同志。但他显得太单纯，太缺乏经验。而对约内斯卡护士我还有些不放心。我让她到阿纳尼亚那儿看看他在干些什么，了解一下教授同志那儿的气氛，因为我去不了，另外也想对她进行一下考验。下面就是她写给我的：

“我去找了阿纳尼亚同志，我对他说了好多好听的，向他借个火点烟。他很高兴地给了我，冲我笑了笑，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就是借火，没有别的。他对我说，我缺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缺。他照我屁股上狠劲拍了一巴掌，就象拍一匹母马，然后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缺少他心里想的、不必细说的那东西。我笑了笑，说他真不知道害臊。他让我以后再到他那儿去，看看他是不是学得知道害臊了。然后他又对我动手动脚，我差一点儿喊起来。但我没这样做，怕让教授听见。他看出了这一

点，于是把我拽到一个角落里，说我长得很漂亮。我问他正在搞什么，老头子在干什么事。他说教授的事很多，而他，以后主要的事就是关心我。他说直到现在他才有工夫仔细看看我这个美人，说着他把手伸过来摸我的胸脯，我把他的手拨开，骂了几句，说他家里有老婆，孩子也都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正经。他说用不着我替他老婆操心，她什么都不缺。他又把手伸过来，这次我没管他，任凭他摸来摸去，我是想借机看看试管上写的是什么。但他觉着这样还不够满意，就从背后连推带拥，把我弄到那间养狗的屋子里。这样，试管上贴着的我只看到R118几个字，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在有狗的这间屋子里，他又搂又抱地摸我的前胸，我挣了几下跑了出来。他在后边还直喊，让我以后再到他那儿去。我才不去呢，鬼才去，下回再让他逮住，还不定会干出什么事。至于别的方面，他倒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就是有点儿太爱追女人，直到现在，我们医院还没有一个男人敢象他这样放肆。我是决不再到他那儿去了，要是让教授看见那可不得了。后来，我到走廊头上那间屋子，找女秘书去借火，她不抽烟，没火，于是打了个电话，结果又是阿纳尼亚。看见他，我几乎立时气都喘不上来。而他却说，亲爱的，怎么烟又灭火了？接着问我为什么不再回到他那儿去，女秘书象个母马似的笑了一阵。我说我自己知道为什么不回去。女秘书对阿纳尼亚说，不许他胡来，而他却说，我是个挺可爱的姑娘，他身上的一团火全能给我。女秘书又笑了起来，我立刻走出屋子，阿

纳尼亚紧跟了出来，又对我说了好多难听的话。我气极了，骂他是牲口，该死的，他笑嘻嘻地说，不是该死，是喜欢我喜欢得要死，还说了许多。没办法，我只好跑掉了。我真不愿意详细写那些，我都是结了婚的人了。连我丈夫我都没给他写过信，我最不喜欢动笔写字。”

这样一来，我只好再去找弗尔卡舒同志。我还要想点办法，看能不能不调工作，我在这儿已经呆习惯了。要是让克里斯蒂安同志当上院长，学院的每个单位都会变成地狱，我最怕的就是这件事。

二十二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进来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教授正在听斯皮尔曼讲什么。斯皮尔曼高兴地拿着一只玻璃管在眼前晃来晃去，里边装的是刚刚配出来的E118。“几天以内我们就会作出多少管来，可那是正经东西，不是那种没把握的、让人半信半疑的药水。”教授本想顺便提醒他，这是第六十八次看见他这个样子了——从他被邀请到这个研究小组算起——但教授并没这样做。教授觉得有趣的是，斯皮尔曼刚刚才知道院长候选人名单。这次也跟以前一样，好多谣传等到了他耳朵里早已过时，而那些合乎他意思的消息，并不只是随便一听，而是完全当真，深为实现了一个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预言而感到高兴。他甚至以为已经进了一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实验室。为了对直到现在为

止这种凑凑合合缺东少西的状况出口气，他请求“院长”准许他把那个让他伤透脑筋的维克多·巴贝什找来，两个人一起把这些旧仪器打个粉碎。“换个人又会怎么样呢？”克里斯蒂安这样想道。但教授并不打算打掉他的兴头，于是毫不吝惜地把东西递给了他。教授看了看杜米特列斯库，他显得情绪不高：要是在以前，看见斯皮尔曼手里拿着试验结果，会立刻跑过去把东西要来仔细反复地瞧，就好象能够看出个究竟似的。而这次却不然，表现得完全不感兴趣。

“这家伙真该挨揍！”杜米特列斯库嚷道，“别的话跟他说没有一点儿用，我也根本不想对他说。算他走运，昨天晚上我睡着了，休息得好，火气没那么大，可就这样我的拳头还攥得嘎巴嘎巴响呢！”

克里斯蒂安还以为说的是斯皮尔曼，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而斯皮尔曼知道杜米特列斯库的脾气，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但还是退到了靠墙的地方，一边下意识地护住那只玻璃管，直到听见教授具有权威性的声音：

“你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些吗？”

杜米特列斯库见斯皮尔曼那种害怕的样子，知道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于是说道：“我跟你有什么，亲爱的亨利？我说的是弗洛拉。真见他妈的鬼！”

他这样一解释，克里斯蒂安忍不住笑了起来：“跟那个笨蛋吗？你怎么也犯得上跟他生气！”

“他竟敢无缘无故找我的碴儿！现在倒开口讲话了：

说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懂，一点儿也没有斗争性，说我只会瞎说八道，脑子糊里糊涂，说我不尊重他，等等类似的混帐话。我问他为什么不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这些，他却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说他简直不知羞耻，劝他还是好好学学怎么切肿瘤。他是个草包，喊起口号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听了让人恶心，没别的能耐，只会动嘴说漂亮话。最后我问他对您有没有什么'忠告'，他说别着急，到时候自然会讲……”

“你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克里斯蒂安问道。

“没有。”

“在科里或者因为学生，跟他闹过别扭？”

“没有。”

“这个人不爱讲话，轻易不开口的。”

“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本来我也不想对您讲这些的。以前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个没头脑的家伙不是那么难对付。可现在我感觉象是有别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情况：我听说今天会上要给您个出其不意。”

“给我？”克里斯蒂安诧异地问道，“你从哪儿知道的？”

“有些人打算不投您的票。”杜米特列斯库感到有些窘。

“这是他们的事，可我早就放弃了。我对考德里亚努，甚至多尔奈什蒂都说过。我没时间。”

“搞浴疗学的那个斯博达鲁告诉我说，克列楚去找过他，跟他讲了您的过去，安德烈做了什么坏事，您在课堂

上都讲了些什么。”

“安德烈又干什么蠢事了?”

“我想不会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说您没把他教育好。”

“我知道他们这一套。”克里斯蒂安厌恶地耸了耸肩膀。

“不管怎样，我看您还是提防点儿好……”

“为什么?让他们搞去。我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

“如果您不反击，他们还以为您害怕呢!”

“波普教授有句名言:‘不睬他，不理他，塞回娘胎让他去见妈!’”

“问题不这么简单。”杜米特列斯库坚持说。

“可我干不了,”克里斯蒂安气呼呼地说道,“让我整天去说某人有什么缺点，某人干过什么坏事吗?这样理解我们的工作简直太低级。让我们整天琢磨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情况下充英雄，什么情况下假装看不见偷偷溜掉……不，决不能这样。现在我感到自由，除了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别的什么都没有。别人选不选我，我并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满足，我只需要安静……对着四面墙壁的安静。我看还是为了斯皮尔曼的试验结果大家喝一杯吧，至于别的事，以后再说。”

克里斯蒂安叫实验员拿点葡萄酒来，两个人熟悉他的习惯，知道在他没提到别的问题之前，再多说一点用都没

有。教授也觉出情况的确有些不一般，连弗洛拉都开口说话了。他真想把弗洛拉叫来问问，可又觉得没这个兴致。只有约尔卡的健康状况使他担忧，就连眼前看到抗癌药的试验结果，也觉得高兴不起来。要在以前，他一定立刻跑去给动物打针作试验，抱着万一出现最终结果的希望耐心等待，如果真象预想的那样，他就又可以集中力量实现下一步的计划。而现在，他对试验结果还不如对阿纳尼亚装在埃氏烧瓶里送来的葡萄酒更感兴趣些。

昨天，他又到精神病科去了。一般他都是下午去，免得碰上奈格鲁教授。约尔卡大夫住院前，他来找过奈格鲁教授想做个脑电图，不凑巧仪器坏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头一点儿也不疼了。克里斯蒂安完全忘记了同奈格鲁的争吵，即使他撩起长长的白头发，摸到那块伤疤，也启发不起什么，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后来再碰到奈格鲁，克里斯蒂安只是感谢他的关心，但却尽量避开不再去找他。“还不是时候。如果……”教授好象害怕想到试验结果，还不愿意知道它。奈格鲁下午一般不到医院来，除非有课。而病房里，除了上午的查房，他是不来转的。

上坡的时候，克里斯蒂安顿时觉得两脚站立不稳，如同腾云驾雾的一般，接着是一阵难忍的疼痛：头上就象箍了一根铁链，每走一步，链条便深深地向骨头里勒进去一截。走到约尔卡大夫的病房，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坐到床沿上。他真想再要一个枕头，一条毯子，就在病人身边躺一躺。实验员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着教授说什么，或

者让他做什么。而克里斯蒂安累得浑身冒汗，几乎忘记了为什么来的，只是用手指轻轻揉着两边的太阳穴。

“不会马上醒的，”过了许久，实验员见教授始终不开口，于是这样说道，“刚给他注射了胰岛素，还要睡好大一会儿呢。”

克里斯蒂安定了定神，用请求的眼光望着实验员说道：“我想在这儿多呆一会儿，我一个人留下，我想他不至于闹得太厉害。”

“这要看情况，”实验员迟疑了一下答道，“这样我得把门锁上，门是不允许开着的。我隔壁还有事，您没听见？他们又在大喊大叫了。”

“没听见。”克里斯蒂安含混地答道，“你锁上吧，走的时候我再敲一下门招呼你。”

“我不会听见的，”实验员解释道，“都是这样乱敲乱打……大概要下雨了，又都这样乱闹。我可以想办法再给您弄把钥匙，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在教授办公室休息一下好。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有办法打开那儿的门……”

“我还是呆在这儿吧，你给我弄把钥匙来……”

“您觉得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送点什么来？”实验员不安地问道。

“过一会儿再说，先让我自己呆一会儿……”克里斯蒂安说着把头转了过去。“我不想让人听到我在这儿，你不用担心，是累了，这个坡真难爬……”

渐渐地，他不觉得那么紧张了，周围的环境强使他去

考虑另外的问题，而疼痛也在安静中慢慢地消失了。

钥匙在门锁上的转动声使教授惊跳了一下。这声音他十分熟悉，听得十分习惯，每当听到它，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孤独、不能自持的感情。他定了定神，象是为了寻求某种支持似地环视着四周。这是个陈设简单的房间：一个衣架，上边挂着一件紫色的已经穿得很旧的长罩衫，上面尽是碘酒染脏了的斑点，袖口上还有几处烧穿的洞。旁边——一只起初曾经是白色的小橱柜，上边放了些水果、还没打开包的食品、约尔卡大夫的眼镜和一些书。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窗子上护了一层粗粗的铁丝网，墙上挂着一幅画家格里高列斯库的复制品和一幅肖像，大概是一位出名的精神病学家。有一样东西却使教授感到意外：硬木地板擦得异常亮。约尔卡大夫正沉睡着：这是他第一次看清约尔卡大夫突起的头盖骨上高高的前额。他费了好大劲才挪动着身子坐到靠近桌子的那把椅子上：他感觉肌肉一阵阵火辣辣地发烫。“你那紧锁着的宽广的内心里还留下了些什么呢?”克里斯蒂安怜恤地望着约尔卡自问。“从外部联结着我们的纽带，是那样经不起风吹雨打。鬼魂随时随地都会来纠缠你，把黑夜和恶梦塞进你的头脑，驱赶掉我们之间那些美好的回忆。这是比理智、比良知更强大的东西，不管你如何想摆脱开它：鬼魂、怪物不停地繁殖，越来越无法抵挡，理智失去了根基，身体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鬼怪，只有无休止的恐怖。胰岛素只能暂时地起作用，让人瑟瑟缩缩地暂且获得重生，而斗争又从头开始

……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支持？为了最终取得胜利，那些心灵和肉体的盟友又到哪儿去找寻呢？”走廊上一个病人在嚎哭，泣不成声地在向实验员诉说他家里是怎样被盗的；另外一个，在病房里扯着嘶哑的嗓子喊：“警察！开枪！警察，快开枪！”教授觉得脊背痛得厉害，而那把椅子，怎么坐都不舒服，只要一动便吱吱作响，每响一下，疼痛就更加重一分。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决心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姿势。他从衣架上取下罩衫，把它卷起来塞到脑袋底下：这样脖子能够舒展开，头顶着墙，觉得略微舒服了一些。约尔卡大夫动了一下，仿佛为了从身上驱赶走一个阴影。但教授并没回过头，继续仰面瞧着天花板：在一只昼夜不熄的灯光下，上边显示出无数黄色的斑点。他一动不动，肌肉也都松弛下来，觉得这样最舒服：“可我到底为什么来的呢？我的阴影也并不比别人的温和，相反……只不过暂时……也许对约尔卡大夫来说我还有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了解病人的痛苦，诊断出他们的疾病，找出我无能为力的致病原因，这究竟有什么用呢？我的知识能帮我些什么忙呢？我曾经试图拯救一下自己，应该检验一下这种可能。但是……结果仍然是我预料到的东西：想要拯救自己，绝不可能被救，你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平衡呢？怎样才能打破障碍，打破包围在四面的墙壁呢？许多人没有勇气冒险，不愿落得一切又从头开始，于是仍然满足于越来越保持不住的现状。”

他发觉放弃说话的乐趣，未免有些可笑。这样不但不

能使自己的想法更明确，相反，却使他离自己越来越远。他敢肯定，现在他正在重复已成为过去的一段历程。有些动作、话语、笑容，是那样似曾相识，就连感情也不由自主地熟练地支配着这一切。他仿佛又置身于曾经经过的一片土地，但却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想要说明什么？第一次有些什么东西没学会？现在重复的又是他一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呢？

约尔卡大夫掀掉了身上的毯子；他猛地伸出两只手，刹那间，那一对发红的近视的小眼睛，怯生生地盯着教授，然后两只胳膊又无能为力地放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坦然的被征服的微笑，随后又恢复了安静。克里斯蒂安站起身，小心地重新给他盖好，就象当初给冻僵了身子的丝苔拉盖上几层毯子时那样。“谁知道他那个世界温度是多少呢？”

教授已不再感到头疼，但眼睛却不能再继续盯着约尔卡。他羞愧地把头转向窗户，仿佛想要逃出这个房间似的，两只手用力抓住了窗上的铁丝网。夕阳射出的光线照得他睁不开眼。“天又开始长了。”他象发现了什么似地低头看了看表。窗外野栗树下的排椅上，一个年轻妇女坐在那儿失神地望着远处。他感到身上发冷，再在这儿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但有一件事他感到奇怪：好象有个什么想法从身旁闪过，一个完整的想法，就如同一股宜人的暖风，但却只是一掠而过。他不知道怎样才好，这仿佛是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寻找的。这个想法究竟要引出什么结果呢？

铁丝网显得越来越凉，手指被勒得一阵刺痛。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印象。几个星期的工夫同所有的人都见了面：克里斯蒂娜，雷德曼，瓦尔拉姆。他极力想尽快摆脱开这些形象，摆脱开通过不用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可能告诉给他的东西，于是立刻想到考德里亚努和其他人。但抑制不住的愤怒又使他抛开了这些人，最终思想转到了安德烈身上。他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着什么，而现在又似乎有什么找到了他的头上。就象这些混乱不清的思绪一样，他们的话也慢慢泯灭了，或者不愿再去分辨它的含义。不知不觉间，从所有这一切当中，最终留下的仍然只有等待。“接下去呢？”他打了个寒战，觉得浑身发冷，于是离开了窗户：已经是该走的时候了。事实上他是想逃脱开这令人难解的等待和疑问。“你将会慢慢地熄灭，”他想道，“而这些疑问依旧是这样清晰，愿望——也是这样，还有整个的计划，设想。而只有你……”他不自觉地向门口走去，但却找不到门把手。他又感到一阵不安，一股寒气浸入骨髓，于是下意识地敲起门来，越敲越紧。就仿佛回答他似的，隔壁病房里又传来同样的喊叫声：“小偷！警察！救命！”不远的地方传来实验员的声音：“喂，是谁又想挨揍啦？真见你们的鬼，连支烟都不让安安生生地抽。”但喊叫声仍旧不停。过了一会儿，克里斯蒂安听见隔壁房间门上响起钥匙转动的声音：“再不老实给你舌头上拴块石头！怎么着，我就是警察，你想干什么？”“如果你是警察，”病人说道，那我就是小偷，你来抓我好了！”

为了让人听见，教授又使劲敲了几下门，但仍旧没有回音。于是他又回到椅子这儿，靠着窗口，就象小孩子那样，扶着椅背骑在了椅子上。血红色的天空反照在窗外的铁丝网上，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眼前的葡萄酒似乎也发出了同样的颜色，充满了整个空间，使人感到倦怠。这层红色仿佛把教授和其他人隔了开来。杜米特列斯库匆匆喝干了烧瓶里的酒，对自己引起的局面感到有些不安，于是走近斯皮尔曼，想把试验结果要过来仔细看看：

“我简直够了，这该死的抗癌药！我真想让它去见鬼……”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斯皮尔曼天真地问道。

“你以为我真的能那样做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泄大家的气呢？干吗还要往仅有的这点乐观情绪上泼冷水呢？”

“我自己也纳闷，”杜米特列斯库极力学着斯尔皮曼开玩笑的口气说道，“这几滴玩艺儿搞得我们整夜整夜地不睡觉，谁知道这次是不是还象以前那样的废物？”

“这些是最后的结果了，我敢发誓。”

“干吗不让我把话说完呢？退一步讲，即使这次搞出了名堂，我不会死在癌症上，但还会死在别的上边。那么究竟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你打算成心测验我的思考力吗？”斯皮尔曼说道，“你的想法简直太抽象。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搞实验的人，我并

没打算改造世界，只不过想给它打打补丁，无非打个比较漂亮的补丁，如此而已。明白吗？不是整个世界，不过是肿瘤。”

“我赶不上你想得那么开阔……”

“实际上没有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只是这样想：给人们做件好事吧，哪怕不那么情愿呢。所有的大学者们都是这么做的。”

“你就想用这么简单几句话，摆脱自己沉重的责任，就象我们的乳酸那样！”

“我一直弄不明白，”杜米特列斯库说着斟满了一杯酒，“铜器时代的发明家们，他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据我所知，奴隶社会倒还留下了一些资料……可他们究竟是怎么推动社会前进的呢？他们用了些什么方法呢？”

“一个时代终究是很长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可谁来检验他们呢？因为在这之后，比如，所有托伦①的神父都比哥白尼聪明，他们能未卜先知，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事先都知道，明白吗？而铜器时代……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大脑功能跟现在差不多完全一样……”

“也许那时候大脑的磷质就被当做天然肥料用了，他们从经验当中了解到了这一点。譬如说，什么地方脑子放得多一点，那儿的草就长得特别壮，树就长得特别高……可什么地方放上骨头——就不是这样……”

---

① 波兰城市，哥白尼诞生地。

“美的东西本来就存在……只不过没有被发现……这是等待聪明人来开发的一片土地……就跟我们今天一样：肿瘤多得很，只是需要有人去整治它。”

“为了不让别人——后人，也就是我们——知道，因此他们没发明字母。铜器时代的人们知道，刻在石头上的那些话，引起了多少紧张混乱，多少激动不安。今天，你好象认为那是一个安居乐业的时代，是一伙幸福的猿人平平安安群居的时代。”

克里斯蒂安教授深信，这场荒诞不经的对话背后，是药物试验更使之加重了的不安和疲乏感：究竟是终结还是又一次新历程的开始？每个人都想绕开这个话题，但谈话中眼睛却始终盯着斯皮尔曼不肯放手的那只小瓶。克里斯蒂安不希望这场对话结束，他甚至自己也想参加进去，好忘掉这一切。他也感到需要摆脱一下，哪怕只一小会儿，暂时离开这毫无意义的等待，离开约尔卡大夫那张苍白的、汗津津的脸，但这却不可能。而且杜米特列斯库的话还在耳边回荡，于是激起一股惊怕和犹疑，对比之下，即使抗癌药一旦成功，由此将引起的欢乐也不过如同在灰暗中摇曳不定的光束那样留不下任何痕迹。他自己倒无所谓，而他关心的却是安德烈。他又干了什么蠢事吗？他想给安德烈打个电话，但走了几步又回到桌子边，回到他们两个这儿：他不知道要问安德烈什么，不管怎样，这一天晚上他想让安德烈好好睡一觉，以后总归会有谈的机会。“选举的事快点结束吧。”他心里暗想。他感觉已经没有了耐性，他

需要的是安静，他不愿再等待着各式各样的竞争者已经向他预告过的攻击，他想要摆脱开这一切。他无心同不支持他或者极力想把他压低到跟他们同分母的那些人，在幕后或者在会议上明争暗斗，时间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只是感到需要尽快地摆脱开这些人。

斯皮尔曼手里拿着小瓶，在等待着克里斯蒂安的一句话，一声决定。但教授并没告诉他什么时候再继续干，却匆匆地对杜米特列斯库说道："我走了……现在我什么也干不了，"他坦率而诚恳地承认道，"我还想再考虑考虑癌症形成的方式，我仍然不放弃病毒同细胞内遗传因子相结合的想法。"以前他确实想过这件事，而现在他却暗自抱怨，不该一时心软接受了三位教授的来访。他们把他拖出了实验室，强使他看一看四周墙壁以外的东西，这样一来自然会发现还有许多其他要做的事情，而他强加给自己的这种安静，又成了一种天真的幻想。

"可是通过什么手段来结合呢，教授先生？"斯皮尔曼问道，"可惜我们不得不经常在十分接近真理的地方停下来！多尔奈什蒂和克列楚甚至连试验用的狗都舍不得给我们。他们情愿拿钱去组织文艺队却不肯给我们，因为我们哪怕是弄虚作假的成绩也从来没报告过：

'诊室、病房中哟，
只有伤和痛。

命运为我们注定呀，
同死亡作斗争。'”

教授的合作者唱的这段歌词，直到后来在会议室里还一直在教授脑子里萦回。会议室的气氛比往常更冷清，没有人说笑，一个个呆板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杂志。为了不白白浪费掉时间，互相专心地议论着杂志上的问题。考德里亚努没给他留座位，这使教授有点儿不高兴。但这时他感觉心情特别好，不管是谁，哪怕是雷德曼，只要现在见到，他都能原谅，是彻底的原谅，不是象以前那样，出于形式，出于怜悯而原谅。在来这儿的路上他想，不管怎样，抗癌药不至于一点儿效力都没有。他感到高兴的不只是从此可以摆脱开这件事，脑子可以不必再被这件事缠绕，而且他终于成功了，证明他还是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况且他还有这些时间……离他不远的考德里亚努冷冷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两个人视线碰在一起，这使他又记起杜米特列斯库大夫的警告。“真没意思！”克里斯蒂安心里想道，“自从我到了教研室，除了最近这几年以外，一直是这一套。幸好他们没办法打倒我，因为从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里，我并不想得到什么，一点儿也不想得到。”考德里亚努偷偷注视着他的动作，等碰到他的目光时，立刻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如果我对行政职务感兴趣的话，我早就得到它了。”

等克里斯蒂安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屋里不太强的光线

时，他发现考德里亚努坐在靠近瓦西利乌的地方。在日光灯冷冷的光线照射下，瓦西利乌的脸显得如同僵尸一般。“剃须膏又涂多了，”克里斯蒂安觉得有些可乐，“就象抹了石灰的一尊半身泥塑。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指摘的呢？其实在论文审查委员会里，你唱的调子同瓦尔拉姆一个样，所以说我不会感到什么意外。怎么说呢？那时候你害怕了。现在你会有什么可损失的呢？我能赢吗？我还看不出……”在他妻子死之前，他说话从不吞吞吐吐，有什么就照直讲，并不过分考虑用词。尽管如此，只有瓦西利乌是唯一使他有保留的一个，他不得不对瓦西利乌怀有更大的尊敬。“不管怎样，他要比别人强。”这倒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奇怪的是连瓦西利乌的相貌，孱弱的体质，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默，直至那黑色的大眼睛，都促使他做出这种反应。波赞坐在他们的后边，脸色涨得通红。瓦西利乌的沉思使得他也默不做声。“今天，也许考德里亚努让他吸了点毒，如果……”有时在教研室，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常常掏出一个小本，记下学生们或者老师们的名言，或者计算一下如果在会上发一次言会失掉多少卡路里热量，会付出相当于多少的精力等等，腻烦的时候或者都沉默不语的时候，他就会利用这些表演起来。波赞有点让教授发怵，他的嗓音往往叫人联想起被关在屋子里的一只马蜂的嗡叫声。“水井不要靠近厕所，水要保证相应的质量，柜台上不应该有苍蝇。”除此之外，不归他管的精神卫生学，他却不管什么污染不污染。克里斯蒂安心想，他骂过我以后，会跑来用他特有的方式向我

道歉："他们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不管怎样，你是不在乎这些的，可我就不一样。身上毛病太多了。在你这儿喝杯酒，我们一讲和，事情就过去了。"直到现在，象这样的讲和已经有过几十次，因为不管什么他都能接受，只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回到老样子，因此克里斯蒂安每次都是事先原谅他。"这是我独到的地方。"一杯酒下了肚，波赞教授会这样自夸，"我是为各种各样的事业而斗争。也许最后其中的一个将会是有用的。"

领口打了个特大蝴蝶结的图比郑重其事地靠窗坐在维克多尔·巴贝什①半身塑像的下边。"他只跟名人在一块儿，"克里斯蒂安一边看着他那噘起的嘴唇，一边想道。"布朗诺维茨会说什么呢？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自命圣贤，就会对着自己的像顶礼膜拜！看他笔直坐着的那种样子，大概已经同他大师的灵魂接上了头。"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学他学得象极了："什么叫生活，我说，你们这些带脑壳的？什么叫命运？什么叫智慧？你们曾经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吗？没有。因为你们的妈妈，给了你们生命的妈妈在干活，而你们却在喝咖啡。你们都是些笨蛋，只知道同女人睡觉，却并不懂得爱情，只会死记硬背，可并不明白药物的效能。你们可怜的脑子连帮你们模仿你们的猿人祖先都做不到。我在十个欧洲国家，两个亚洲国家，六个由于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而不发达的国家讲课的时候阐述过这些问

① 罗马尼亚著名医学家，细菌学家。

题。我要告诉你们书本上找不到的：你们应该怎样做人。你们需要有人培养你们的条件反射，所以说学生会对你们来说还是做了好事的。”除了这些僵化的开场白，奥泰斯库仍不失是最好的教员之一，尽管看起来他会未老先衰。“你必须把对于自己的一些看法灌输给人们，”有一次他装腔作势地解释说，“这样人们才会了解你。如果我自己确实不错，干吗要过分谦虚呢？只有那些傻子才这样做，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值得自夸的理由：他们所以活着，无非是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安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副面具贴得越来越紧，甚至都没法离开，简直会戴着它进棺材。

克里斯蒂安挨个看了看每个人，就仿佛都是第一次见面似的。他发觉有什么地方还不那么清楚，但又觉得这儿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只不过那些前不久拜访过他的人们的神秘眼光，却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他简直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反复无常，怎么竟会这样轻易地变来变去。“安德烈得奖的时候考德里亚努曾经那样滔滔不绝地称赞，从那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种冷淡从何而起呢？是不是我的股票行情又看跌了？”他后悔自己不该来参加会。

在主席团坐席的角落上，穿得笔挺的迈达鲁一本正经地在同谢尔班热烈地交谈。“如果说杜米特列斯库听得不错的话，并不排除他忘记了以前讲过我一些什么话。假如我到他们那儿，显出一股亲热劲，同考德里亚努讲上几句笑话，让他们整我觉得难为情，那又会怎么样呢？搞得他们狼狈不堪才有意思呢！他们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

么。尽管有些过分，但毕竟还值得。这样，他们又要再召集一次会，但是没有用，结果还会是这样。反正时间有的是。”三个人在偷偷嘀咕，不时地看看他。克里斯蒂安明白，他们并不想推迟这场冲突。“可他们到底要整我什么呢？简直滑稽。”他想道，“难道我就这样忍受吗？可笑！”他真想出去，而结果好奇心终于迫使他留了下来。

克里斯蒂安无从知道，在为这个职位而进行的争夺中，他在许多人眼里是得胜者。而考德里亚努经过细心侦察，发现两个竞争者的距离在逐渐扩大：克列楚官气十足，而且太自信，他利用多尔奈什蒂的漫不经心，凡能做的都做到了。人们知道他搞不出什么名堂，不会有什么作为。而克里斯蒂安的名字却十分响亮，人们期待着，也许通过他能使医科学校的老传统恢复起来。而且他不是那种听人驱使的人。那些没有这种分析眼光的人也会说：“他遭了这么多罪，好事也该轮到他了。”他的讲课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更深刻地感到了他的存在，他绝不是个怯懦的、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正是由于这一点，也招来了一些指摘：“到时候了，对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而考德里亚努，除了多尔奈什蒂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考虑到他。眼看更换院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只好亲自出马，想方设法降低另外两个候选人的竞争热情。多尔奈什蒂曾经答应，这一段时期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要保持完全客观的态度。现在考德里亚努是居第三位，而四年或者八年以后谁知道别人会不会占领这块地盘？他想照直向克里斯蒂安这样建

议：“如果您不想做候选人，不好支持我吗？您的表态是最有分量的。”可惜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开会之前他想这样请求克里斯蒂安：“您别向我开炮，而应该对准克列楚，然后我会给您需要的一切。”但他又不敢肯定克里斯蒂安内心深处是不是完全没有觊觎这个职位的意思。那他该怎么办呢？因为不管怎样机会是不可失掉的。当然，他也进行了一些周旋，多尔奈什蒂也曾暗示过要他当接班人，但就靠这点支持是不是够呢？这一天越临近，他越是坐立不安，越是装不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紧张气氛弄得他抬手动足都显得反常，越来越频繁地发表讲话，简直象个劝善的演说家。

会议室已经坐满，人们都挤在靠墙的地方，都不愿坐在主席团的眼下。于是院长坐席的对面就只剩下了克里斯蒂安教授一个人。院长今天是策略性的生病。学生代表靠着克里斯蒂安教授怯生生地坐了下来。“这个学生我让他勉强通过了外科学的考试，”教授记起了他。最后教授决定问他一句。“七分，”学生一边回答一边做出一副热情的笑脸，“我想您不至于只根据在您课上的成绩来评价一个人。”“当然不会，”克里斯蒂安说道，“我的课七分就算高分了。”“好歹您替我解决了奖学金。别的学校给分都高，所以我们毕业分配都是最差的地方。”“我知道。这样才不至于有更多的人受你们的害。你什么课没考好？”“实践课。”教授礼貌地冲他一笑：“这么说理论课还是好的！”

教授又环视了一下会议厅，的确有些不太正常的地

方：这么多人就象受了什么传染，都在偷偷瞅他。“这么多年轻同事，我以前的学生，有些人会不好意思攻击我，另外一些——会为我辩护。他们想要利用这些人谴责我，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多么微妙的心理分裂！一方面是严肃认真的专业工作者，另一方面——幼稚可笑的蠢人！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真是弄不明白！”他站起身，出了会议厅到了走廊上。“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他想道，“如果把消防队叫来会怎么样呢？”这样的玩笑并不怎么成功，有人干过。“消息一传开少不得一场混乱。”走廊上黑洞洞的有些阴冷，两边墙壁上挂满了医科院校创办人的肖像。教授来回踱了几次，终于发现了一架电话机。他立即拿起听筒，拨了一个他办公室的号码，告诉正在那儿工作的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说：“你让阿纳尼亚到这儿来一趟，带几只箱子，把我的全部论文、书、上课的讲稿都装到里边，让他在校务委员会办公室门口等我。不用问别的，以后你会知道的。”

他点着一支烟，迈着碎步慢慢走到阳台上。有几个妇女正在打扫院子，药房办公室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正在安安静静地喝咖啡，远处山坡上苹果树开满了花。“根本不应该打什么电话，毫无意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看，我完全是白费力……”

他恋恋不舍地离开阳台，又向会议厅走去。奇怪的是他越走近会议厅，情绪反倒变得越好起来。“小事，不值一提的小事。究竟有什么要紧？星星不会离开自己的轨道，

苹果花照旧是那么美，太阳还是八点差一刻落山，病毒在手指上游来逛去，却不知道皮肤表皮的存在和它的作用，某某国家的石油资源到二〇五〇年就会枯竭，如此等等……”

会议已经开始，几十双眼睛一齐投向教授。他对所有的人笑了笑，不慌不忙掏出一个小本子，不是作记录，而是在上边画起长方形、十字交叉线和奇形怪状的细胞图形来。他旁边的那个学生正在读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份报告。在列举反面例子的时候，教授突然听到“克里斯蒂安同志”的名字。“哦呵，”教授心里暗想，“就要从这儿开刀！”

“这是极其严重的一起事件，它玷污了我们全体学生的名誉。我们并不否认他在业务上的成绩，但克里斯蒂安同志在接受思想教育方面却十分令人失望，特别是……”

“是说的我吗？”教授讥讽地问道。

“不，是指您的儿子。”那位学生立即明确地答道。

“‘克里斯蒂安同志’指的是我，所以最好还是称呼全名。安德烈干了什么事？”

那个学生把安德烈如何弄死那只鸡的事详详细细叙述了一遍，结果引起了全场哄堂大笑。

“年轻人，一只鸡在自由市场上能值几个钱？我弄不明白，为这么一只鸡就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吗？他让好几个人没有为这只鸡搞成神经错乱，难道这无关紧要吗？”

“这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波赞出人意外地插进来，

“而是个关系到原则的问题。”

“是吗?”克里斯蒂安惊奇地问道,“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没一起把什坦采酒馆的瓶子全砸碎吗?结果我们不还是当了大学教授?”

“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同,我的同事,应该另当别论!无论如何在现在进步的社会制度里,你儿子并不是进步分子。”

克里斯蒂安笑了笑:“你是头脑发昏还是在说笑话?”

“这么说您是鼓励不守纪律的行为喽?”克列楚愤怒地嚷道。

“不,一点儿也没这个意思。但也用不着这样小题大作。事情本来怎么样就该当怎么样。也许为了打抱不平没考虑后果,也可能感情上受到了什么挫折,心里烦闷。我们总不该要求他们只能是一帆风顺,不是这样吗?怎么,你心里过意不去还想为这只鸡募捐吗?”克里斯蒂安这样一问惹得全场大笑起来。平时不爱出头露面性情温和的系主任莫里尚教授没能平息住笑声,最后还是谢尔班费了好大劲才使人们安静下来。

“据我所知,同志们,这个青年人并不是初犯,还有许多违反纪律、搅闹学生会以及其他一些事。到了适当的时机,我要把这一切统统列举出来。”克列楚怒冲冲地补充道。

“发言的这位先生,你怎么称呼他来着?”克里斯蒂安指指主席团,问旁边的那个学生代表。这句话大家都听到

了，于是全场又爆发出一阵笑声，而教授却仍旧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认为有许多事比起我儿子的事来要重要得多。当然，你们可以处罚他，我并不反对，甚至要求这样做。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谈点正经事。如果需要，你们甚至可以把他送到青年工地去劳动改造。但是要知道，我们也并不是生下来就是现在的岁数，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

厅里立刻安静下来。克里斯蒂安知道，如果展开一场争论，有可能他得胜。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本子：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仍然在隐约可见的方格上乖乖地呆着。又有谁在发言。也许是在家就写好的发言稿，或者在别的什么会上读过，而克里斯蒂安甚至不愿抬起头来看一眼，他的思绪又开始在发言者的字句中游来荡去。不，他不喜欢这儿，人们暗暗投来的目光使他感到皮肤一阵阵火烧般的灼热。

克列楚教授已表示过要求发言，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是激动还是害怕？”克里斯蒂安得意地暗想，“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说话也许更容易得到些。这样地不顾一切，效果只会更糟……我跟他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那又为什么……？”克列楚从口袋里摸索着掏出讲稿，却没找到眼镜。随后，用一块白色的大手帕，仔细地擦了半天额头。“这些人们一会儿分开一会儿聚在一起地闹个不休，有时候就象海浪那样一刻也不平静。只不过他们的海水发出一股烂泥般的臭味。整个世纪就在这样可笑的喧闹中悄悄从

我们身旁过去。难道我竟是这样一个古怪老头子，因为无法理解他们而对他们进行谴责吗？有时候我觉得好象有什么人把这么多的伪造钱币投入到流通当中，弄得那些真的越来越少，最后甚至无影无踪了……至少现在，如同杜米特列斯库说的那样，我就象一只可怜的离了群的野兽，越来越感到孤独、惊怕、不相信自己。漫长的、无休止的寻觅……”

克列楚开始发言了。他声音很轻，匆匆忙忙，极力想尽快越过开场白。克里斯蒂安根本听不清他讲的什么，只同他的眼光对了一下。克里斯蒂安感到他的眼睛出奇地大，而且越来越大。而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话也象眼睛颜色那样，慢慢地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片白和一阵深沉的宁静。“我甚至情愿挨几巴掌，”克里斯蒂安心里想，“莫不是我倒显得滑稽可笑吗？让我相信什么呢？是不是我错了？”这样的问题，当他刚刚出狱碰到赫里亚努教授的时候曾经提出过。

“希望你鼓起勇气，一切从头开始。”赫里亚努说道。

“不知道会怎么样。当我发现马上就要自由了的时候反倒问自己：让我相信什么呢？相信谁呢？”

“看来提出这类问题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赫里亚努说道，“你应该抛开我们，眼界放得远一些，只能这样，不然的话……这不是思想的过错，大夫。”

“这我也知道，”克里斯蒂安为他们不会再这样相聚而有些动感情，“共同的思想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而我们又

一起去毁坏它，这样的思想还有什么价值？幸好，人们是根据事实才作出判断。”

“我也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决不放弃自己曾经为之斗争而且还在继续斗争的事业。遭受过的痛苦乃至整个生命都算不了什么……大夫，你想让革命是这样的单纯、没有暴力、不流鲜血、平平坦坦、安安静静的吗？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婴儿的诞生都不会不伴随着阵痛的。”

“但是疼痛毕竟可以减缓，”克里斯蒂安说道，“遗憾的是胜利者不总都是那些曾经进行过斗争的人。一些人专门学会了怎样挨打，而另外一些人却学会了怎样夺取别人的胜利果实。”

“评判是非没有这样容易，事情也并不这样简单。”赫里亚努尽管这样说，但他能够理解克里斯蒂安，甚至从克里斯蒂安的声音里听到了自己被指控为背叛时的迷惑不解。“思想只有人才有，而人终究是人。”他时常这样宽慰自己。

“不错，”克里斯蒂安退了一步，“但这是你曾经梦想过的吗？你就是为这而进行斗争的吗？你想到过恰恰是你的同志对你的忠诚发生怀疑而把你送到那儿的吗？”

“尽管你觉得奇怪，但是我是有准备的，或者更准确一点，我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自己心里明白……只要自己的信念没有改变……”

“你没想到过别的吗？还是已经没力量这样做了？”

"不，我想到过很多，我的梦想并没有只停止在这儿。现在我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

"你并没让我弄明白……"

"只有我们真正获得了自由才有权利谴责某些思想，寻求另外的思想。革命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处于开始阶段。"

"好，那我就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如果到那时候也还是这样呢？"

"我不相信。当然，我并不是预言家……"

"那么眼前的生活怎么办呢？"

"一切重新开始。"

"还有这样的力量吗？"

"当然现在你是精疲力尽了。但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会有这种力量的。"

"可是号衣上的号码你能够忘掉吗？听到叫你的名字，你能够不挺胸并腿立刻站直吗？"

"但是结果还是你胜了，事实证明真理在你这一边！这绝不是无足轻重！"

"得到的是我们并不需要的胜利，"克里斯蒂安声调低沉地伸出一双皮肤爆裂的手，"让我们从哪儿开始呢？"

"这你知道，你自己会得出结论。这些年并没有白过，相反，头脑锻炼得更清醒了，更冷静了，不再那样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这一切要比丢掉的有价值得多。"

"不，教授，得到的东西我并不能用它来干什么，我

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搞科学的，我只相信事实，相信自己和别人作出的事实。”

“相信事实，这我也同意，”赫里亚努说道，“因为那些空谈家，那些投机革命的分子还没有绝种。而我们的革命需要的是忠诚、正直的人，他们时刻警惕着不许那些投机家，那些吮吸劳动人民膏血的分子再来代替已经被消灭了的阶级。”

克列楚教授对总结报告评价了几句之后，极力称赞广大学生的活动，特别赞扬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具有的高度觉悟。随后，他逐渐地小心翼翼地转到了他感兴趣的主题上。克里斯蒂安从幻觉中惊醒，开始注意主席团对发言者的反应。谢尔班和迈达鲁在低头修改着什么；系主任在一字一句地作记录，生怕有什么意外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勃尔乌教授头靠住椅背，仰着脸不住向空中吐着烟圈。

“难道不让人奇怪吗？”克列楚说道，“为什么儿子和父亲做着实质上相同的事情？为什么两个人都有这样大的破坏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样大的瓦解组织的能量？儿子喝得醉醺醺地跑到学生会去辱骂那儿的负责人，这无非是凭借他父亲的招牌，仰仗他父亲的庇护。儿子无缘无故跑到学生宿舍，把邻居房主人的鸡给掐死。还是这个儿子，当着开会的全体同志大喊大叫，说考德里亚努同志是野心家，根本不配为人师表。这就是这位了不起的儿子。”

“可他各门功课都是十分，而且全国科学小组竞赛得了一等奖。”坐在后排什么地方的一个学生高声喊道，克列楚竟没能看清他的面孔。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思想教育的问题，”克列楚生气地说道，“谁也不能否认，儿子同父亲完全一样。父亲依仗自己是科学院院士，一直在纵容儿子反对学生会。但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当上院士的！实际他做了些什么呢？这么多年毫不吝惜地浪费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钱，而没有得出任何结果。研究癌症吗？同志们，难道恰恰是他才能发现这种病的病因吗？当然，他有权进行试验，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决不允许拿人民的钱随便糟蹋。有哪个头脑健全的人会相信他成功的希望呢？我不否认，以前他曾经作出过一些努力，但最近以来，他自以为有各种头衔和证书作护身符，根本没搞出任何成果。”

大厅里顿时完全安静下来，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投向了地面。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攻击，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否定他的权威。克里斯蒂安教授一向被认为是个严厉的、不讲情面的人，因此大家都在等待着他爆发般的回击。有些共事久的同事心里暗暗同情“可怜的克里斯”，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在等待着投票表决。而克里斯蒂安却一动不动，完全满足于把目光从一个人投向另一个人，脸上浮出一副僵硬的、讥讽的笑容。克列楚已经坐下，仔仔细细地擦了半天脸之后，拿起一支铅笔，在手里不停地摆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他讲完话竟没有一个人鼓掌。

谢尔班在座位上向副院长耳语了几句，然后就象要摒弃一种痛苦思想似地大声嚷道：

“我以前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些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不要过于匆忙，克里斯蒂安同志毕竟是位老教授，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我们应当慎重，应当讲求原则，同志们……”

系主任从谢尔班的嗓音中感到一种犹豫，于是第一个惊醒过来：“还有人要发言吗？”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克里斯蒂安，而他却冷冷地、令人捉摸不透地一动不动。顿时，他对自己有过的想法感到厌恶：“为什么我要等人家谅解、等人家怜悯呢？难道我非需要他们的好话不可吗？这些话能帮我什么忙呢？能让我年轻哪怕一个钟头吗？”但一个痛楚难忍的伤口，终究在他心里裂开了……

“同志们，”系主任对大家的冷漠感到惊异，“希望大家不要离题。”

瓦西利乌教授站了起来。“象个夜游症患者。”克里斯蒂安心里暗暗说道，“照他站起来的样子，简直要伸出双手从桌子上越过去直奔窗台……但总归还算得上个不错的内科大夫。可他究竟怎么了？怎么竟这样不顾一切准备站出来表演？该不至于是昏了头脑！瓦西利乌，”他心里暗暗叫着这个名字，“很久以前为了你否定我的一个诊断，我已经原谅了你。你应该还记得这件事……”

“同志们，”瓦西利乌开始说道，“我现在只是在科学

活动的范围才跟他有联系。我们的这位同事已经有好几年不跟人们来往了，实际上对我来说他简直是个陌生人。据说他不通人情，闭门不出，傲气十足，在他眼里我们都不过是一群废物。我并没想去核对事实，但我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不然的话就等于我不相信大多数同事们说的话。不错，最近两年他写了两本书，我曾经想过要读一读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学习学习。可我发现了什么呢？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剽窃——不管这个词分量有多重也只能这样说——抄袭别人的东西。来源呢？说出来实在让人吃惊。作者当中除了连一年级学生也都知道的几个名人之外，其余都是些无名之辈，有的名字甚至是编造的。所以能出版完全是靠了书的题目，除此之外根本不值一看，简直是浪费纸张。”

克里斯蒂安注意地听他讲：瓦西利乌显得很激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匆匆扫了几眼，然后又轻轻啜了几口水。当他们的目光相遇过几次之后，瓦西利乌的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响亮。现在他心里已经明白谁是这幕戏的导演。考德里亚努正心不在焉地用铅笔画着什么。奥泰斯库在椅子上摇来晃去，他的目光不知怎地同克里斯蒂安的碰在了一起。教授给他做了个手势，叫他站起来，一边悄悄低声道：“还等什么？该轮到你了。别忘了说我怎样害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要联系到我的历史问题！”克里斯蒂安有些按捺不住了：编造作者的事着实激怒了他，但却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压抑着不让他爆发。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厅，

发现了约瑟夫副教授，他记得两个人有好几年没说过话，于是挪到了副教授身边。“你的意见呢？”教授问。

“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羞耻的。”约瑟夫副教授坦然地答道。这句答话倒使教授意外地感到满意。克里斯蒂安本想对他说句好话，让他高兴一下，但这时却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科学院院士，医学博士，依昂·克里斯蒂安教授同志讲几句。”系主任莫里尚对于教授完全不为自己辩护感到有些恼怒，他想尽快结束这一幕。但出乎全场意料的是，克里斯蒂安却平静地答道：

“可我并没有要求发言。”

“怎么？谈了这么多关于你的严重问题，你都承认吗？”

“严重吗？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这样……而对我——并不是。至少我自己这样感觉。”

“那么，”莫里尚坚持道，“是不是还是把你写到要求发言的名单上？”

“不，我没什么好讲的。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约瑟夫举起了手，克里斯蒂安无心听他如何为自己辩护，站起身，把椅子放回原处，然后不慌不忙把散在桌子上画了各种图形的纸片收起来叠好，塞进口袋，接着又点起一支烟，对谁都没看一眼，把伞柄挂在胳膊上，拿起帽子，向门口走去。他刚要伸手去拉门把手，发觉谢尔班从背后追了过来，递给他两张照像复制件：一张是雷德曼揭

发他向病人勒索钱财，另一张是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声称安德烈强奸了这个人的孙女。瓦西利乌讲话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两张纸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现在才弄明白为什么传到谁手里谁就偷偷抬起头看他一眼。

“这种东西我那儿也有！”克里斯蒂安说着把两张纸片冲谢尔班脸上扔了过去。见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克里斯蒂安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其实我是唯一的傻瓜。”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和阿纳尼亚正抱着用床单裹起来的一大包书在走廊上等他。他们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但却不明白克里斯蒂安为什么会笑。

“我没找到箱子。”阿纳尼亚解释说，但教授却并不介意地对他笑了笑：

“拿回去吧，用不着了。我本打算把这些书丢到他们头上，可这管什么呢？还不如回实验室去干我们自己的事。这么多时间都白白浪费了。”

“真让人不敢相信，”杜米特列斯库嚷道，“不敢相信！克列楚和考德里亚努眼睛瞎到这种程度，竟想什么都越过去吗？”

“但不是什么都能越得过。”

“我要留下，应当有人站出来替您讲话。”杜米特列斯库愤怒地说道。克里斯蒂安又笑了起来：

“这很自然，跟往常一样，还是一半对一半。辩护人总是最后才讲话。但是为什么要替我辩护呢？”

“当然……”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留下。”杜米特列斯库坚持说。

“不要耽搁太久……时间太宝贵了……”

“我知道。”

“换了我准憋不住，教授先生。”阿纳尼亚气呼呼地插进来说。

“没有本事游泳只能在泥塘里逞英雄……我们还是去干自己的事吧。”尽管这样说，但连他自己竟也无法离开门口。他感到异常疲乏，就如同刚刚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为了撑住身子，不得不把力气均匀地分到两条腿上。再重新上路，他感觉仿佛将要离开什么，既不是高兴也不是悲伤，而他身体的一部分却将永远留在那儿。只须迈出开头的几步，他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前不久刚刚离开的十分熟悉的旧角色。“我早就担心，别让自己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情况下结束一切！”他感到一股不知是高兴还是愤怒的情绪在心中忽上忽下地起伏，不由自主地翻腾激荡，以致使他越来越对自己的动作感到悔恨，或者至少是越来越怀疑这些动作的正确性。

“每次都是这样，当你觉得好一点儿了，安静一点儿了，马上凭空跳出来一只野兽，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路线，或者至少搅得你这一天不得安生。”他对杜米特列斯库这样说道，接着又莫名其妙地加上一句：“把你的文章、材料收集一下，我让你当教授。至少这一点我现在还做得

到。”说完，不管对方如何摸不着头脑，抓住杜米特列斯库的一条胳膊，把他一把拉到门口，指着瓦西利乌说道：“你瞧，脸上是不是擦粉了？我看是这样。”

“如果指引申的意义，当然是这样……”

“这说来话长。至于说到本义……”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点了点头，他知道教授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回答他也是毫无用处。

“最近我一直想从自己的事实当中看到我自己，我需要这样一面镜子，好知道自己是谁……瞧，编造的作者！比瓦尔拉姆的招数还要厉害。”教授眼睛一直盯着瓦西利乌。“怎么？恰恰跟我？”他觉得好象需要进去，但还没等完全决定，却听到奈格鲁教授的声音：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有些人想用忌妬、恶意把理想和可能之间的鸿沟掩盖起来，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克里斯蒂安教授那些价值不容置疑的科学著作，竟遭到另一位教授的粗暴否定。但是大家不会没看到吧？克里斯蒂安并没有踩过任何人的脊背，是他自己自愿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因此，如果不当众向他道歉，我……我这儿……请原谅……”他显得十分激动，就连声调也变得古里古怪，选择了半天的词句，说起来是那样吃力，间隔是那样长，那样不平均，就仿佛刚刚从出事故的地点跑出来那样地结结巴巴。

看到杜米特列斯库大夫脸上泛出一种胜利的喜悦表

情，克里斯蒂安决定离开这儿。奈格鲁教授的话让他感到不舒服，他好象已经完全不习惯于赞扬，哪怕说的是事实，而且此时此刻也特别需要。他有些发窘，就好象在强迫别人接受他并未作出过丝毫贡献的虚假的胜利。一切都感到乏味，不值得浪费这么多时间。“多么怪，”他心里想，“对安德烈有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情：我们就象被裹进一场滑稽可笑的华尔兹舞，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重新挽起手，转圈、跳跃为的是回到原来的姿势。就这样大家不停地互相寻找，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幼稚的还是老练的，都跳不出这个空荡荡的、陌生的、围着四面坚固高墙的屋子。没有别的选择，跟着同一个旋律……一场耐力和坚持性的比赛……”他顿时觉得全身似乎松弛了一下。“约尔卡大夫怎么样了呢？”爬上山坡到那儿去看看，这样的想法却并不使他感到突如其来。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站在门口，他决心继续听下去，一直听到底，尽管他更愿意陪着教授。教授的样子他不大喜欢，过于镇定，过于自信，就象刚刚看过一场平庸无奇的演出。而据他所知，这种反常的平静并不是教授的性格特点。一定是心里有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决定性的变化。而除开这些表面现象，教授的眼神却显得游移不定，飘飘忽忽，仿佛一直在寻找支撑点，这倒使他迷惑不解。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清楚，考德里亚努教授精心炮制的关于克里斯蒂安“道德败坏”的谣言，终于公开抛了出来。奇怪的是考德里亚努平素对教授是十分尊敬的，对教授的贡献丝毫

也没产生过怀疑，他甚至可以发誓来证明这一点。也许现在教授成了考德里亚努的障碍：一个有名声有权威的克里斯蒂安，可能会彻底堵死他晋升的道路。也许他认为要实现掌握命运、掌握权力的愿望，只有现在的环境条件才有现实的可能。其实他曾经这样许诺过多尔奈什蒂："只要我取胜，我甚至可以给他搞塑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而现在我必须阻止住他，不管怎样，没有别的路可选。"多尔奈什蒂对通过各种渠道到达他这儿的乞求、请求已经厌倦，不介意地耸耸肩膀："这些人真没办法，什么事都犹犹豫豫。往克里斯蒂安身上抽上两鞭子有什么呢？这样他只会走得更好，而且更加明白生活当中不是想干什么就都那么一帆风顺。"尽管如此，开会的那天他却宣称患了感冒，没出家门。

杜米特列斯库大夫从多尔奈什蒂的女秘书那儿听到过策划的这一切。这个女秘书曾经是克里斯蒂安的一个病人，由于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设法告诉克里斯蒂安，让他有所提防。杜米特列斯库暗暗责怪自己对这件事没引起重视，当时他相信教授会轻而易举地搞垮他们的阴谋，会议如果是"学生教育"这个十分敏感的题目，那么这恰好会给教授提供一个针对克列楚和谢尔班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考德里亚努把宝押在了克里斯蒂安的反驳上：他怂恿克列楚不失时机地打出决定性的一击，特别是现在手里掌握着有力的证据：安德烈闹出的乱子以及干部科迈达鲁提供的复制件材料。当然，考德里亚努也不相信克列

楚会获胜，但他感兴趣的并不在此。两个人互相争斗，那么三人名单上能够通向最后目标的“清白者”就只剩了他自己。克里斯蒂安离开会场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他的计划，但无论如何“材料”还掌握着，而且还要加上“藐视一切的态度”这颗随时都可以打出的炮弹。而结果很多人却都出来替克里斯蒂安辩护。当杜米特列斯库要向教授叙述发言的情况时，教授并不想听。

“见他们的鬼去吧，”教授说道，“大脑萎缩，本能全控制不住了。”其实，对这些可以预料得到的话，教授仍然感到一阵痛楚：能够感觉到的感情，仿佛在沉重的木底皮靴下被碾得粉碎，听到一阵阵捣碎玻璃似的刺耳声。这样的感觉甚至在实验室都久久不能够消失。原本他十分注意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这倒不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而且也因为担心损伤别人，愿意看到别人心安理得地离去而能确认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而现在，他越是想重新回忆起那些未曾理会的时刻，悔恨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却越发陷入迷惑不解：“他们究竟可能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这些小人面前好人却纷纷后退呢？”他抚摩着那些试验癌症免疫力用的地鼠，心里暗暗想道：“只有这些小东西不会自相毁灭，它们不具有这样的智慧，不过是些供实验用的可怜的动物。”当他工作得精疲力尽合上双眼时，两只脚仿佛被那双穿着它走了好长路的木底鞋夹得疼痛难忍，他力图驱赶掉这种感觉。

“我为自己辩护还是没辩护，这有什么要紧呢？”当安

德烈抱怨他那次开会为什么没发言时，他这样回答道。“光凭说话并不能保护你，这不值分文。事实，只有事实……对于你没有做的，没想做的或者没能做的事，有什么原谅不原谅可言呢？”他知道，某种年龄、某种时代、某种时刻，仿佛又在重复，他正是为脑子里那些现成准备好的话而感到恼怒。如果没有难以忍受的头疼，也许会觉得现在比任何时候更舒畅、更自由。为了那些天真的幻想，他已经以某种方式付出了代价……

二十三

本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一

由于我秘密地进行了一些工作，从而招致了一场灾难。

星期六晚上，我跟全家一起极其认真地看完电视新闻，在等着看下边的《曼尼斯》①。当我刚刚拿起报纸要读的时候，忽然听见门铃响，于是我立刻跑去开门。在家这从来是我的差事，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不喜欢劳动的人，专靠乞讨或者用纸牌算命这样的不正当手段过生活，一般都是我出去把他们赶走，同时向他们指出，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而这次出门一看，原来是阿纳尼亚同志。说老实话，当时我吓得几乎一屁股坐到地下。正当我们家庭

① 美国电视系列侦探片。

刚刚建立起一种平静、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气氛的时候，却有可能又闹出一场乱子。这样一闹，我爱人为了看不成系列片，会永远也不原谅我。

我赶紧迎出门，而他却想照直进来。只见他气得脸色铁青，简直跟肚里的肝一个颜色。我不让他进，他照我肚子上就是一拳，而且比比划划，说这就是我的末日。他说，如果教授由于我的缘故而出了什么事，那么我就甭想再活下去了。他指责我散布谣言，说弗尔卡舒同志死了。他说我是个混蛋，接着又狠狠打了我几拳。我真想还他几下子，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样就会真的打起来。每一次有人按我的门铃，我对面邻居就会立刻趴在大门的小圆洞上往外看。要是让邻居看见我跟人打架，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于是我只好装出笑嘻嘻的样子，好让他们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我爱人见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便大声喊我，让我把客人请到家里坐。我对她说是工作上的事，她喊道，那更应该把人请进来。而阿纳尼亚真的要进门，我拚命拦住他，最后只好央求他，请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我打算这一天能过去，就立刻答应调到另外一所医院，他说我的性命能否保得住，就决定于教授回来不回来。尽管我对去教授的医院上班曾经有些发怵，但让我调走我还是不愿意。同事们告诉我说，那个新地方严得让人喘不过气，而且那儿的人说过好多考德里亚努同志的坏话，我听了都觉得吃惊。

后来我问约内斯库护士同志教授出了什么事，她说没

什么，还跟以前一样，去讲课，去做手术，而且她看见教授显得很高兴，在走廊上直吹口哨。他倒清闲自在，而我却让这个凶煞神搞得非离开这儿不可。这个恶棍牵着几条狗在院子里溜达，看见我对我说道：

“你到底想明白了，要不然早让你进公墓了，我会活活剥了你的皮。”

“别以为我走了有你什么好事，教授能耐再大也管不了这么宽。瞧着吧，有让你乐的时候！”

“你听着，教授们都和好了，”他扯谎道，“这样你会被弄到乡下去，让你体验一下那儿劳动人民的生活，我想不用说你心里也明白。所以明天一早你还是乖乖给我送一公斤李子酒来，要知道，你的鞋和裤衩还在我这儿，要是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新领导，他知道该怎么欢迎你。我想他还不至于喜欢你的混蛋行为。”

瞧瞧我成了什么人，“混蛋”！

我跟同事们握手告别的时候，阿纳尼亚又钻了出来。他手里拿了一束鲜花，这头野驴竟对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说我走使他感到十分恋恋不舍，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巨大损失。他说他要去看我，帮助我尽快熟悉环境，还说了一大堆类似的废话，最后他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许诺。这个过去的富农，教堂唱诗的，逃避农村、逃避农业劳动的懒汉，这个专门敲竹杠的骗子手，道德败坏的教授手中的工具，竟能够把我赶出医院。据说是因为我走得太远了。如果说尽自己的义务就叫走得太远，那实在让人遗憾……

但谁又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呢？

一、教授交给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同志的那几个包后来究竟怎么样了？

二、究竟是象民警同志告诉我的那样，她被树林里的野兽吃掉了，还是那些从她那儿得到那种药的人因为已经用不着她而把她除掉了呢？

三、为什么正好在那个时候那些医生邀请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正好这些医生在城里的时候弗尔卡舒同志失踪了，这是为什么？

四、教授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当阿纳尼亚同志到我这儿来并且威胁我说如果教授出了什么事我就要倒霉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只到弗尔卡舒同志那儿去过吗？

五、他同她的死有什么联系？

六、克里斯蒂安同志、班奈德斯库同志以及安德烈同志的道德作风问题应该如何处置呢？

七、他在会上当着大家骂娘，为什么没有人追究责任呢？

八、约尔卡大夫为什么要寻死？他并不象是个疯子，但跟教授是朋友这一点则完全可以肯定。

九、坏人老是得逞，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十、为了安德烈的内裤和那些揭发材料等等我化掉的钱，怎样才能得到补偿呢？我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我没剥削过人，也不象有些人那样收人家的小费，我们象大家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我的工资收入怎么能跟有钱有势可

以任意欺侮别人的教授相比呢？

为了不调离，看来我也该学阿纳尼亚的样子去拍教授同志的马屁。至少在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之前，暂时只能这样。问题是刻不容缓的，有时候为了过悬崖不得不同魔鬼拉手。还要看一看情况如何发展……

二十四

他把汽车停在一片橡树林的边缘，拿出一条农村式的旧毯子。寒冷的冬季，在实验室他经常用这条毯子裹腿，但从来也没感到暖和过。现在，在一片远离人家的空地上，他仰起脸望着天空，决定就在这儿一直呆到天亮。在无边的静谧中，疼痛感逐渐消失了，就如同远处的回声消融在空旷的原野上一样。而整个身躯失去了重量，从一切活动、一切力量当中摆脱出来，似乎忘却了自身，就仿佛同热情好客的大地融合在一起一般。只有那自由自在的目光和思路，在黑洞洞的上空游荡。那儿，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星星瑟缩地闪烁着，那散发着寒气的微光，不知不觉间在他身上慢慢融化，不断填补着昔日为一连串的疑团所占据着的空白。旁边的老橡树被吹得沙沙作响，风就如同从高高的天空降落下来的一般。偶尔几声凄楚的鸟鸣，仿佛顿时止住了所有的活动。远处，就象有一股咆哮的水流要冲垮堤岸，一种无法辨别的响声，企图破坏这天空的宁静。被惊起的快速奔跑的野兽，带起一股股冷飕飕的风。随后，

儿声震人心肺的吼鸣，又使人记起寂静天空下的可怜生物。从未见过的野兽，夜间活动的大鸟，就如同陨落的星辰那样，又进入了另外的一段周期。不可更改的生与死，在无情的天空下不断循环继续。上千颗瑟缩抖动的星星，仿佛慢慢把他托了起来，让他能够自由地在空中飘浮。如今他明白了：过去，就象由于神秘莫测的爆炸而毁掉的星辰光线那样，逐渐离他远去了，生命越来越落在后边，而那条界限——已经近在咫尺，那幻想着奇迹般地延缓接近这条界限的并不是他。上天毕竟是宽宏的，竟让他有可能清醒地品尝到滋味，感觉到那即将来临的永久沉寂。“我还等什么呢？这种和解还要持续多久呢？”他心里这样默念着。忽地，一声鸟鸣又使他惊跳了一下。“因为安静舒展的每一刻，我都感觉到休憩在向我召唤，我需要它。在一个可能需要别的什么的世界，我的兴味，我的想法，看起来已经赶不上潮流，我觉得出，自己已经过时了……”每个阶段，斜坡，坑洼，他都无比熟悉，他了解自己的限度，自己的力量，就如同从容不迫地走过一条事先计算好了的道路。只有过一次错觉，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一阵晕眩，一阵失神，伴随着一阵心脏异乎寻常的激烈跳动，以致他断定那可怕的界限就在眼前，已经触到了它的边缘。他恼怒了，神经绷得紧紧的，他想高声喊叫：“是的，但不是现在！”但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感觉不到那如此熟悉的足可信任的颤动，于是头脑陷入一片混沌。无名的恐惧绝望地在体内呼喊，将要停止活动所造成的惊恐，来回在体

内窜动，而意识，理智，却第一次顺从地接受了下来："也许我计算得不准确，或者就该是这样。"痛苦和恐惧终于启动了记忆，一连串的日常往事顿时涌进脑海。"是判决?是惩罚？是新的开始？从过去的经验里我没学到什么呢？忘掉了什么呢?"那些他极力想摆脱开的展现在眼前的无情场景他并不害怕，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已经越过了这一切。他甚至能鼓起勇气看一看脚下顿时裂开的无底深渊。尽管他感到了那股从下边来的吸力，尽管在他眼前已经开始了星辰天体般的沉寂，但他还是高呼了一声"还不到时候!"而随后，这场悸动又渐渐平静下来，只剩下了未曾解开的疑团。也许他竭尽全力喊出的那一声"还不到时候"产生了效果，那留在视网膜上庄严挺立的树林，盐矿石雕成的白色塑像般的人们，镶嵌在冰冻般天空中的飞鸟，即刻又活动起来。影片装上了转盘，一场场戏剧又重映上银幕。"也许学会的东西什么也不该忘。思想不会变老，只有人才会。是我们弄坏了思想，磨损了它，遗忘了它。"教授仿佛重又获得了新生，依旧那样安详，那样开朗。课上讲的完全不同于从前的笑话，足以使人们从昏睡状态中振奋起精神。他的无拘束的态度，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响。但隔一段时间，却又变为无可奈何的顺从。"瞧吧，早晚要碰得头破血流。"那些等待教授终将被追究责任的人们，心里这样期望着。"说了这么多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加上这样的表现……不会就这样算完，不可能的……"弗洛拉曾这样说过，但始终却并没有什么事落到教授头上。

自从那次不平常的会议之后，这样的传闻越来越凶：上边会追究他的责任，会让他受到惩罚。瓦西利乌教授甚至要求对他作一次精神病病理分析："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可能开着会就破口大骂，而且当众把纸片丢到别人鼻子上。"克里斯蒂安教授听到这些，有一次在大街上拦住了他：

"你认为你们做的一切都是正常的，是吗？"

"我们是按照民主原则发表自己的意见，"瓦西利乌答道，"我们的行为完全合法，完全正确。"

"我是选择了你们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我并不在意那些蠢人和笨蛋，他们只会乱蹦乱跳，只能接受他们能够懂的东西，破坏是他们的本性。但是如果聪明人也从他们那儿捡来只言片语，学着他们的样子对人攻击，那当然我不能置之不理。你为什么不想一想那些年轻人呢？这是在把他们拖回到另一个世纪，向他们灌输蒙昧思想，不让他们去关心知识和研究，简直是在造就计算机和登月时代的猛犸兽。我不知道这叫做可笑还是可悲。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出乎意料，瓦西利乌却忽而变得诚心诚意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真诚："我也曾经相信终有一天会出现道德复活，我们学校的所有弊病、缺陷、不光彩，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就连促使发生这一切的催化剂，也会感到结束这一切的需要……可是我已经忍耐不住，不得不起来保护自己，我已经没精力了。我一直不走运，没什么作为，不象你有那么大毅力，一口气能写几千页。我没什么远见卓识，而

且连科学院也没进……”

“可你完全有条件进。我进来纯粹出于偶然，你没进来也是同样的原因。”

“我已经习惯了，已经感到无所谓……不管怎样，时间总是朝着对我不利的方向走。我想当完教授领一份足够的退休金，也无非如此。”

“是啊，”克里斯蒂安郁郁地说道，“老是自己一个人免不了会觉得疲乏，特别当你还不习惯的时候更是这样。当然，如果不只是一个人，做的会比现在多。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条件，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什么人。”

“对，”瓦西利乌承认道，“这我知道。可是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已经感觉到老人们说的‘生命的恩赐’是怎么回事。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既不跟他们在一起，也不跟你在一起，而是跟自己在一起。我关心的不是我们的而是病人的痛苦。我见到过不少医生，他们自己有病却还能清醒地替别人看病。是的，克里斯，体力和思想都疲劳了……跟永生的物质相比，我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原子融合在别的机体上，也许会为其他神奇的或者荒谬的也可能是天才的思想服务，我们只不过以这样的形式继续下去。看起来我已经是被宣判的人，用不着再留什么了。”

“到这儿为止我是同意的，”克里斯蒂安颤抖了一下说道，“只不过直到最后一刻你也不应该放弃。没有这些幻想你打算怎样生活呢？另一方面，理由总是存在的，在解释和评判方面我们是内行，一切都可以自圆其说。不管是谁，

不管命运把他带到什么地位，讲起自己没成功的事总不会是趾高气扬。因此，在我还活着的这一刻，我只做我希望做的事。也许正是由于物质不灭的前景，才促使我有兴致做我想做的事。但是我并不是为了未完成的事业而甘愿受屈辱、受折磨，而这样顽固……”

“尽管你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活力……但是你身上终归有些天真幼稚的东西，你认为特殊的人们就该有特殊的季节。”

“解释的理由，我再重复一遍，什么时候都会有。我不是那种小爬虫，我不懂怎样趴在地上爬，也不容忍让人随便侮辱。”

“因为你要确认自己存在着。可你直立的脊柱帮过你什么忙呢？你以为你跟别人能够完全分得开吗？你追求的安静呢？而且，事实上你的脊柱究竟有多么直呢？你简直是个可笑的瞎子，克里斯，你就不想回头看看别人吗？”

“如果解释的理由能够让你摆脱开你一个人时候的胡思乱想，那么不断地去找这些理由还是值得的……可这样……”他始终没向瓦西利乌解释清楚，因为瓦西利乌本来就是清楚的。而他自己始终也没被谁找去追究责任，尽管他一直等着这一天。即便不能说服什么人，倒一倒自己的心里话也会觉得舒服一些，因为自从安德烈得奖之后，他的安静又有了一种新的更深刻的含义。“也就是说承认他存在着，”当教授在阶梯大厅听到叫儿子名字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会活下去的！”他真想象刚刚救活一个病人那样大喊

一声。"那时候，当他有勇气公开顶撞我的时候，我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只是那时候我怕说出来。现在我终究可以安心了。"他感到一阵轻松，就仿佛从一直注视着安德烈的活动，一直注视着事情进展情况的紧张气氛中解脱出来。"也许最后他会把没用到正道上的精力全部倾注到科学上面。"

"爸爸，"那时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词他简直感到陌生，"爸爸，"安德烈又用一种比较自然的口吻说道，"我真为你担心。而我，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不能一句话不说，这儿不是修女学堂。我干了什么事总要加在你头上，这我受不了……"

"你放心，"教授说道，"你只管干你的好了，但是一切都要先考虑好！如果你喊叫的不是时候，到头来要么再也喊不出声，要么就再也止不住。我来帮你安排，你不用担心。"而正当对安德烈越来越赞赏的时候，教授却又不得不从自己精心描绘的美梦中惊醒过来。

"爸爸，我到布迪勒那儿去过了，他赌咒发誓说以前你们两个根本不认识。"安德烈本想让爸爸高兴一下。

"这么说当初我告诉你的时候你并不相信，是吗？"

"不能说当时我不相信您，但是……"

"为什么偏偏对我的话你感觉需要怀疑一下呢？……"

"如果说我对什么都不完全相信，都要亲自验证，当然对你也不例外。"

"只不过看起来你并没能从我这儿通过……"照道理应该认为安德烈说得对，但实际上他却感觉自己受到了损

伤，安德烈这样一来仿佛又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和不信任。

“你们之间的事简直可笑。”

“只有死人才不可笑。”克里斯蒂安回答道。

现在他觉得很舒适，心情很平静，而这种平静使他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轻松，畅快，就象少年时代刚刚做过剧烈活动那样舒展。唯一使他感到稍有不安的是薇拉，同她还什么都没解决。他没有勇气重新给她自由，或者说，强使她离开自己，按照逻辑本应该这样做。但有个问题却一直在缠着他：“在这之后她会怎样呢？……”在医院他们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她是那样端庄持重，有意地隐没在穿白色罩衫的人群中。她时常教导学生对教授要尊敬。下班之后却象变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天真，那么活泼，几乎让人认不出。“你怎么平时老是这么板着面孔，对我也冷冰冰的不肯偷偷瞧一眼呢？”有一次她这样说道。教授喜欢她这样突如其来，喜欢顺从她温柔的撒娇，不，有时甚至两个人象小孩子似的争抢着吵闹着一起看那些试验结果。

“薇拉，”有一次他这样喊道，“快来看，一种英国红，妙极了！”就这样，一连好几十分钟不转眼地瞅着那些病体细胞里的古怪颜色。“跟你在一块工作真是好极了，”最后他终于这样向她承认，对他来说这简直超过公开地求爱，“我非把你拴在我桌子腿上不可。”

“好吧，把我列进你的设备单里吧！古代是克尔特[1]

①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西欧和中欧的部落。

还是斯契特[1]的头领——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是什么部族——死了以后都是让他们的妻子陪葬，至少你也该宽限我等到那时候。放下你的工作，哪怕一秒钟呢，好好看看我有多迷人。你知道，人不会老是那么美的，整天就知道忙你的治病还有别的那些蠢事，再过二十年你会抱怨我从来就没有漂亮过。你要明白，克里斯，我不会总是这样，总有一天也是要人老珠黄的。”

教授停下工作，忧郁地甚至有些悲伤地望着她。“你知道什么，我可怜的小宝贝，”他心里暗暗对她说，“你不会全明白的！……我们的年龄，不管我怎样想忘掉，实在是太悬殊了。而且不幸的是这种距离不是年历上的多少年，而是心理上的多少光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而后，他提高了嗓门打趣道：“造物主说了，还欠我几天的青春美景。我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它。”

“是啊，”她有些生气，“你对所有的癌症病人都欠了债，可对我就什么也不欠吗？……”

“也许我计算得不对，可我总觉得自己象是一棵深秋才开花的苹果树，可惜报不了春，也结不了果。我是苹果树里的叛逆，不肯向周围的冷漠和就要到来的严寒屈服，有意对抗远在天边的太阳。所以花很快谢了，谢得非常快，冬天来了，不幸的是冬天来了……而你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我曾经从这样的冬天经过过，而且也曾经战胜过它……两条腿不再能动弹，大脑也几乎停止了活动，全身就

① 公元前八世纪居住在黑海北岸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象一个没有封死的伤口，别的都是那样虚无缥缈，偶尔跳出一个念头，一种颜色，一个奇怪的愿望，然后又落下来，跟身体搏斗，挣扎着想再留下点什么。然后是困乏，疲倦，需要睡觉，等着进入梦境……”薇拉早就明白教授的话里暗含着什么意思，就跟他讲课时不知道第多少次地重复着一个平平常常的科学定理一样，因此她极力不改变声调，极力要显出轻松愉快的样子：

“瞧，先生，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语调明确而又含蓄，超脱于善恶之外的不偏不倚，一切都是这样恰到好处。如果说允许报偿的话，那么造物主欠下了你好多年的债：特尔古一日乌、战争、瓦尔拉姆、你妻子，都让你失去了那么多时间，即使在维也纳、巴黎和以后度过的年代按双倍计算，那你也还应该有好多好多年……”

“不，”他插进来说，就仿佛这个计算他已经验证过上百次，“不，这些已经偿还了我。我也有过几年的好光景，那时候我感到那么心安。一个要工作的人，想要搞点事业的人，能够有个安安静静不受打扰的环境，那是最求之不得的。那时候，对于过去我已经完全不在意，相反，我把它看成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命运给我作出的有利安排。我并不害怕回顾往事，并不怕想到雷德曼和瓦尔拉姆，甚至感觉这是一种消遣……以后的许多年，我并没想到要小心谨慎。如果丝苔拉不死的话……还有许多如果……但是你知道，我的青春时代也并不象一般认为的那样是幸福的，也可能因为几次失败使我受到刺激，也许由于对政治的癖

好。铁卫军的为所欲为，卡罗尔二世的登基，使我感到难以容忍。利用书报检查，一些无耻小人遵照命令对这位陛下百般称颂，而登峰造极的是陛下竟深信这些颂词他当之无愧，甚至千方百计去追求。直到他逃往国外，他一直是一切的主宰，工业、艺术、手工业、甚至空气、水、天空和土地，一切的一切都属他所有。无止境的欲望使他对民主感到厌烦，于是把国家拿在手里，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摆布。而在我的眼里，跟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只不过是用各种最高级的形容词堆砌成的一幅肖像，甚至会怀疑上帝怎么偏偏把这样一个天才加到了我们头上？不幸的是卡罗尔二世还造就了一代宝贝：各种各样的猴子、八哥、蹩脚的模仿者，于是滥施权力、贪污腐化、尔虞我诈就跟荒地上的野草一样孳生了出来。国家变成了个人的领地，而人不过是必要的时候能够喊叫的应用工具。陛下，全体臣民祝愿您健康长寿。一些人觉得好笑：母牛爬上了树，不要管，让它去折断脖子；另一些人跟着国王舔屁股；还有一些，整天麻烦事缠身，根本没功夫去管国王的事。头脑清醒的人知道，专制将要引起堕落，人们会丧失个性，失去那种从为实现理想的活动中体验出的应有乐趣。一个小小的色素斑可以恶变成癌。实际上在德国癌已经扩散，专制已经达到了顶点，人们不知不觉被淹没在一片军服的海洋中，军队进行曲成了最流行的音乐，焚巫祛邪[1]达到了

① 犹太教认为巫师把灵魂给了魔鬼，所以才能施展巫术，要使巫师正身必须用火焚。此处指法西斯排犹运动。

顶峰。而最可悲的我觉得是毁掉人们的时间，把生活分割成各种各样的荒唐行动，不让人们有任何思想的余地。扼杀了最低限度的民主，人们也就无法起来反抗。好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发号施令、恐吓、侮辱，结果只能导致消灭个性，丧失人性。相比之下野兽反而表现得有节制，因为它只有饿的时候才进行攻击，不是有什么喜好破坏的天性。人到底比野兽优越，因为头脑发达，所以才能做那些野兽都不做的事：折磨同类不仅能用工具，而且能用声音，因此人的攻击性更强，更微妙。恰恰是只有人才懂得什么叫侮辱，怎样进行侮辱，怎样使这种灾难性的效果延续更久的时间。我的上帝，看到那些齐步走的进军，胁迫下的千篇一律，有多少次我们不想逃脱，不想找块干净地方，没着过毒的地方，感情没沾染上恐惧的地方？在一片军服的海洋里，还有人在生存吗？是不是连空气也都染上了毒菌？只有皮靴，嗒嗒的皮靴声，迈着军步的皮靴。”

教授停住了，一种难忍的疼痛企图裹住他的每一句话。翻滚的云雾慢慢聚拢起来，从不知名的峭壁背后升起的黑夜，渐渐吞没了光明，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我是颗晦气星，”这个断语连他自己也感到出其不意，“这么多年我耗尽了精力，只不过为了站直身子。可终归应该让我做出点什么！问题是你自己要挺直脊背，要直立地站起来，可命运却偏偏注定让我们必须象蚯蚓那样。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想要证明什么！不管脊背是直的还是弯的，不管是安安静静还是吵吵嚷嚷，最后都会是一片黑暗。黑夜不管这

些，它象一幅黑洞洞的帷幕，铺天盖地慢慢降下来……”

如今，就在树林的边缘，他躺在羊毛毯上，头下枕着自己的猎枪，丝毫不差地回忆起了那一幕：薇拉一声不响，眼睛眨也不眨地打量着他，就仿佛要从他身上找出什么。那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看得他周身发热。渐渐的，教授也发现自己是那么喜欢看着她，她那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的两只手，仿佛在抱怨他，仿佛企图分别表达出眼睛和心灵的不安。他知道，只需一眨眼工夫的疏忽，只需迈错一步，说错一句，一切便会不可收拾。他仿佛又被带上那条不堪回首的无形小路。她不该再受这样的折磨，于他自己也毫无益处。她那微微歪向一边的头，丰满的、白皙的、具有曲线美的颈项，自然飘洒着的头发，重又开始的两只手不可理解的动作，无意识地摩弄垂到膝下的衣裙，头轻轻一摆把散乱的头发甩到后边，那张开的两只胳膊，热烈期待着的双唇，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告诉他，对往事的回首应该立即煞住。那时，他忽地从扶手椅里站起，走过去抓住她的双手捂在自己眼睛上，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按住内心不由自主的感情：“薇拉，你知道，这些夜里我做过多少恶梦啊！”他想这样对她讲，但嘴唇却并不听使唤。她好象理解了，轻轻吻了他一下。

“我老是要为别人活下去，老是被迫重整旗鼓。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老头子还神气什么？已经没用了。他以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操在他手里，各个地方的病人都在等着他这个现代耶和华的复活，其实完全是瞎操心。我们

真该敲敲他的脑袋让他清醒清醒，不然他老是想出风头。'也许正是因为这，那时候我才躲开了大家……可惜现在已经到了深秋，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剩下了几天……"

薇拉尽管觉得他有道理，却仍然并不正经回答："看你郑重其事的样子，就好象我们就要永远分手似的。亏你战前在欧洲跟那么多女人睡过觉，可你根本不懂得女人，连点装模作样都不会。你把生活当作按自己意愿雕刻成的一块大理石，而对我来说，生活无非是荒诞无稽随意组成的许多片刻，是一些长得让人痛苦的日日夜夜。我听任命运自己去雕刻那些大理石，这样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如果打碎了呢？那也没什么，反正只有这么点力气，再多了也不可能。"说完她又挑逗性地对他笑了笑。教授本打算这样回答："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我已经把情欲割掉了大半，让生活只附属于一个唯一的目标。瞧，如今落得象个可怜巴巴的阉物。有时候感情也会冒出来，可接着立刻又羞答答地缩了回去，仍旧象个冰块，仍旧受着那个唯一想法的折磨。我不许自己高兴，禁绝本能可以给我的快感，甚至到了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愧的地步。不管怎么做，我也没办法越过已经变成的现在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却说了如下的话：

"好吧，别再谈了，说话有什么用呢？已经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既不能包住感情，也没法盖住事实，有时候反而只能把什么都搞坏。"

"连我们之间也是这样吗？"薇拉显得有点惊奇。

“我甚至希望是这样，尽管我们之间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多少增添了点新的东西。”

“这么说，”她强笑道，“我们该丢掉这种生活，让它去见鬼……”

尽管如此，他秋天的日子还是延续了好久，直到医院里传出谣言，说他过去的一个女病人克里斯蒂娜·弗尔卡舒出院以后马上就死了，死得蹊跷，被她自己驯养的野兽吃掉了。有人到她那儿去过，问遍了左邻右舍，谁都不知道谣言从何而起，一些人甚至记不起她了。后来克里斯蒂安打了个电话，乡长向他证实了这一点，但并没谈细节，只不过提到她有些疯疯癫癫，至于对公众来说——倒没有一点损失。她什么也不干，爱喝酒，有时候在镇上跟男人们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段时间曾经跟一个看林人搞在一起，但这个人什么也不讲，根本否认同她有任何关系。这消息使教授感到震惊。现在，当克里斯蒂娜已经不在了的时候他才发觉，三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努力企图忘掉她。而后来见到的她，尽管几乎完全变了样，变得象害过惊吓症，变得象男人一样粗野，但身上多少还看得出旧日的风韵。当然并不是这吸引了他，而是由此又让他重新记起了那难以控制的冲动，抽抽噎噎的哭声，总之一切他今天感到缺少的东西。同丝苔拉的爱情曾经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饱满，那样的顺畅，不论从哪一方面她都胜过克里斯蒂娜，只不过后者的野性和突然消失时常搅扰得他不得安生，就如同有个妩媚诱人的精灵不时在向他暗送秋波，以

致使他无法摆脱。被这样的精灵缠身，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想挽回青春的心怀，而闭眼不看自己那枯槁的躯体，布满一道道勾纹的干缩白皙的皮肤。而一旦当她死去的消息得到证实，他立刻决定到那儿去，就仿佛这样一来还会有什么用处似的。这件事他只告诉了一个人——阿纳尼亚，为的是防止万一出什么意外。其实，实验员早已知道了她死的消息，所以没说，正是因为他预料到教授会作这样的决定。

"你知道吗，阿纳尼耶，听说我们一块去找过的那个女朋友死了。"克里斯蒂安说道，"我想去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跟她从小就在一起过，不管怎么说……可这件事我不想让人知道。"要求阿纳尼亚下保证尽管有些多余，但现在他觉得似乎需要听一听实验员的许诺和誓词。

"我要是说出去让我遭雷劈，教授先生。"

克里斯蒂安又沉默不语了，好象体内的活力耗尽了，又回复到往常脸色阴沉时的那种样子。他离开房间前把散乱在桌上的纸都整理好，检查了一下斯皮尔曼大夫作的切片。一只狗身上的肿瘤出现明显的平复现象，这使斯皮尔曼大夫感到鼓舞和惊奇。斯皮尔曼大夫提出："为什么唯独这一只呢？这怎么可能呢？"教授显得对此并不十分关心，只简短地打发了一句："再等等看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教授的回答却引起了实验员的不安："要在以前他准会向我要吃的，要咖啡，而且绝不会离开实验室的。可现在……哎哟，我的上帝，该轮到这些狗吃了，都等不及

了。”实验员心里叨咕了几句，后来办完这一切，陪教授回到家，帮着他准备好了汽车、睡袋和帐篷。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打打猎。”教授一边说着一边擦着猎枪，这支枪已经好久没摸过了。阿纳尼亚心里暗暗吃了一惊：

“可如果……”他害怕说出来最后一句话。这时实验员脑子里忽然浮起他所知道的教授的一切不幸：妻子的去世，约瑟夫要把他赶走，最近同考德里亚努和其他人之间发生的一些麻烦。他估计教授不会这样做，但是……“什么都有个极限，他终究也是个人，不是块铁，说不定有时候会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有些人好象生下来就专门是为别人赎罪的。”如果说不该往那方面去想，一些问题总该有个答案：“为什么不带我跟他一起去呢？或者至少带上班奈德斯卡。上几次都是我陪他去的，现在为什么回避我呢？支帐篷、弄吃的，他一个人无论如何搞不了！……而且，要是汽车出了毛病呢？……最后总还得有人帮他把猎物弄回来，剥皮……如果真的是打猎，那我还是应该陪他去。”还有，教授对什么人也没讲他要出去。“为什么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呢？”实验员还是放心不下。后来，等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又改变了策略：他不声不响地也上了汽车，就象他跟着一起去完全是理所当然似的。教授一下便看出了他的意图，于是走过去打开了车门。

“噢，我晚上才走，你还得照看实验室。我回来以后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干呢。”

阿纳尼亚红着脸慢吞吞地下了汽车："我并不想碍您的事，我可以离开您远远的，就呆在汽车里。我也一样，一想到那些不痛快的事，也不喜欢有人呆在身边。可我们犯得上跟这些人致气吗？您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到那儿去值得吗？无论如何她已经是过去的人了，再也不能复活了。如果您一定要这样，那只好随您的便……"克里斯蒂安没有回答他，只对他亲热地笑了笑，同他握了握手。

当教授坐在树林边自己铺下的那块毯子上的时候，确实曾决定要到克里斯蒂娜那儿去。后来，渐渐的，疼痛似乎慢慢消融在周围神奇的寂静中，星星那奇妙的光，使他觉得象是脱离了物质世界，身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轻轻飘摇。于是一切愁思仿佛都顿时消散了，力量、意识也都无影无踪了，只不过感觉自己还在活着，存在着。那忽隐忽现的亮光，那布满星辰的神奇天空，仿佛都是属于他的，只有他才理解所有的天体为什么必须严格准确地按照既定轨道不停地运行。"如果那时候也是这样……寂静象一块无缝的帷幕落在你身上，夜晚也是这样晴朗……一阵短暂的飘忽，解脱开一切的飘忽，而后便是永久的黑夜。如果那时候……至少也是这样……"

然后，不知不觉间寒冷袭来了，老橡树不安地摇动起来。他已经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夜空依然是那样的静，他慢腾腾地收起毯子回到汽车里。而当他扭了一下启动钥匙之后，才不由得自问：究竟要去哪儿呢？到克里斯蒂娜那儿去的念头已经打消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怎样，

她已经不在了……木屋破得不成样子，窗子给人偷走了……再说也不是什么窗子，不过是几只吓人的窟窿。也许还有她血迹斑斑的破烂衣服。也许……还有书……经过虫蛀、风吹、雨打的书。还有插到地里的木棍做成的篱笆，也许都被人拔去烧了火……也许连木屋也没有了……再让我想象出她最后的形象，那些血迹、脏物，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吗？……那又怎么样呢？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知道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我知道她是属于另外的年代，属于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过去的我。然后呢？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解释不出为什么这样开头，而且既然这样开了头为什么又不一直坚持到最后？也许那儿还有野兽，如果这些野兽还没饿死也许还呆在栏杆里，也许还没离开那儿，还在等着她。她住院的时候把这些野兽都放了，而在这之前她驯养它们，改变它们的野性，要它们变得象自己的奴仆。后来这些野兽终于顺从了使它们变换了习性的女主人……是不是我跟她见面之后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现状了呢？是不是我又让她重新跟她的过去，而不是我们的过去挂上了钩，使她重新张开了那双我们曾经用以无情地看待现实的眼睛呢？不管怎样，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不是我有意去找了她……可怜的女人……所有的锚都已经断裂，再从哪儿去寻找意志和力量呢？……只能从你自己身上找到源泉，经常可以找到的源泉……从哪儿再重新开始呢？”

汽车在空荡荡的公路上轻巧地奔跑，车灯照出的光柱

里，成群的蚊虫上下乱舞。尽管实际听不见，但他却似乎完全领略得到那微细的嗡嗡声。“这些可恶的小东西那时候咬我，叮我，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了。跟这些让人发疯的叮咬比起来，挨打简直是件愉快的事。只有用烟薰，可那时候我们没办法点火，没东西可烧，连干牛粪也没有。即使找到点干牛粪，也要用它来敷皮肤，先尿点尿在地上，再用牛粪和成泥糊到身上。但这是不允许的事，而且也解除不了痛苦。还有那种嗡嗡的叫声，比什么都难忍受……于是便把缠在脚上的破布撕下来烧火。有时候气得没办法，甚至从裤子上一块一块往下撕布，只要烟一冒起来，这些小东西便被迫绕着圈子往上飞，直到最后飞走。特别是当排好了队‘唱歌齐步走’的时候，当你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当困乏完全战胜了你的时候，更是招架不住。唱歌齐步走，去尽‘神圣职责’。我们大家都最后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只不过一些人消失了，另外一些留下了被太阳灼焦、被蚊虫弄脏的裂开的伤口。人们都尽了天职，生活又前进了一步。‘死人找死人，活的拿起锹’，就象法索莱说的那样。”路旁的白杨树，象是在拼命地向后奔跑。右边——山坡上呈现出一片蓝青色。他一边哼着《我们是祖国的骄傲》的曲子，一边把油门加到最大，汽车如同一头受惊的野兽一样吼叫着。《我们是祖国的骄傲》这支旧的、动听的、引起深沉共鸣的曲子，如今又自动响了起来，声音一股劲不停地在空中回荡，从突突的马达声中，从穿过窗缝的风引起的嗡叫声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它。“要是我先去找布迪

勒呢?”忽地冒上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再去克里斯蒂娜那儿……今天总归是星期日……该死的蚊虫，”这些摆脱不掉的小东西不禁使他发怒，“我倒要看看因为他而让我受了苦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既然开到了这个速度，应该先从瓦尔拉姆那儿开始，从他那儿买一张彩票。”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不止是理智，而且还有感情，一种冷酷的排斥一切的感情，就连黑洞洞的山坡上空那股刺人的寒气，也都不让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到达那近在咫尺的地方。他还不打算回家，想把路一直走到底的愿望，跟这种明显感觉到的排斥这种愿望的感情，暂时形成一种平衡，只是由于惯性才身不由己地继续无目的地向前奔跑。黑洞洞的公路上空无一物，在冷风中摇摆着的密密的高大杨树守护在两旁。他独自一人，摆脱开了一切，闪闪烁烁的星光和深沉的寂静，使他内心感到一阵轻松，仿佛这时才清清楚楚感到了自身的存在。他把车速加到了最大，一时间，他觉得好象自己的身体被吸着在空间，从广阔无垠的高处，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这颗小星，尽管它被穿凿得处处伤痕累累，四周缭绕着烟雾毒气，但看上去依旧是那样的美。时间在他身边缓缓地流逝着，就如同一条宽阔的流沙河，他甚至感觉得到它微细的簌簌的流动声。如今他已不再感到害怕，在这不可能延续多久的恬静之中，他耐心地等待着自身也溶化在无边的寂静里。“在我们邻近的距离几千光年的某个地方，神奇的自然造就的另外一个生物，正在欣赏着粉尘般的星体，正在想，也许正

是在这令人神往的爆裂之中，凝聚着某个生命，有趣的生命。”他深信，自己的过去、痛苦、失望，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他睁开了眼睛，为的是更好地认识自己，为的是转入到另外一个周期，去继续那神奇的自然给他注定的道路。“四点以后是五点，白天以后——黑夜，星期日以后——星期一，在我之后，另外的一个，同样的黑夜，天空，等等，等等。”他感到平静，自如，舒展，就如同倏忽间他面对着的那片凄冷广阔的空间。这种感觉他并不陌生，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那是在宣布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离开了那所做过多次手术每次都做到精疲力尽的医院，站在那座名字古怪的别墅的阳台上，经过这许多年，第一次看到晴朗洁净的天空，没有喀秋莎、没有火箭、没有炮弹的天空。就在这样的夜晚，在远离家乡的捷克山脉的某个地方，闪烁的星光隐约照出自己的身影，他忍不住想大喊一声：“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愿望，有谁会来关心？”但这一声未出口的喊叫，却没产生任何反响，深沉的寂静浸入肌肤，使他牢牢地贴在那令人惬意的冰冷的水泥地上。渐渐的，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思想不再活动，曾经极度紧张的肌肉松弛了下来，不再听他指挥，经过这许多年的奔跑，经过使人筋疲力竭的守护，经过令人麻木、面对死亡威胁的恐惧，最终也该轮到他提出要求休息的权利。后来他完全明白了：他曾经害怕过的死，生物性的死亡，肉体的消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一次解脱，无非是那感觉得到的拍打

着宜人翅膀的永久寂静的到来。但对心灵死亡的惧怕却完全是另外的情形。那是这样一种恐惧：也许从此作为人的一切特征会全部消失，自身仅有的特性已经被泯灭，受奚落和被戏弄编织成一只黏性的口袋，自己终将在里面闷死。四周熊熊的火焰在燃烧，城市的街巷充满了尸体，间或迸发出绝望挣扎的响动，而后又听到一阵阵欢庆胜利的呼叫，接着对那种令人惊悸的心灵死亡的恐惧感，又咄咄逼人地压了过来。言词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承受过极大痛苦的身躯，已是遍体鳞伤，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语，而且也根本不希望说出。惊恐和疲惫已弄得他精力衰竭，只不过由于某些细胞顽固地不肯让步，才得以继续维持着生命。第二次，那是又过了许多年之后，趁在波兰参加一个大会的机会，他到了黑耳半岛。这是深入到波罗的海里的一块舌状的长条地带。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和女向导——一位风韵犹存的伯爵夫人。激荡的大海惹得伯爵夫人有些发怒，而俄国姑娘玛莎却高兴得脱掉鞋子，不顾十月份的寒冷，在沙滩上蹦跳，发疯般地追逐着盖满泡沫的巨浪。这时，他也脱掉了鞋子，朝着那在不远的地方就同天空连接在一起的大海走去。天空也是白色，挂满了一朵朵乳白的云，如同海浪泡沫一样的颜色。他闭上眼睛慢慢向前走着，上下翻腾的海浪搅得他头晕目眩。等他再睁开眼睛时，令人完全莫名其妙的是，天、海、他自己，竟变成不停起伏摆动的浑然一体。一切响声都消失了，他仿佛变成了强力搏动的一只奇异心脏的一部分，不再是自身，失

去了原先的一切感觉，只是专注地要跟上这神奇的节奏。他知道这样会着凉，但已经无关紧要，忘记一切的那些时刻与缓缓涌来的浪波完全合为一体，这比接续下去的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当周围的一切又有了另外的毋庸置疑的含义时，他感到仿佛自己的生命恰恰是为了到达这全然寂静的时刻而造就的。伯爵夫人的放声大笑忽地把他惊醒：俄国姑娘滑倒了，弄了一身泡沫和水藻。伯爵夫人仍旧笑个不停，而他梦幻般的奇迹却就此告终。“玛莎，”伯爵夫人说道，“该不是酒喝多了？弄不好明天就会进格但斯克医院。”她们说出的话已经远远离开了海天交融的地方，而海浪在他身上引起的神奇节奏，依旧象灰暗的吐着泡沫的浪花那样不停地跳动着。

从他经过的一生中，现在还能追溯起多少个类似的时刻呢？不是指曾经有过多次的欣喜时刻，也不是指得到胜利后心情舒畅的时刻，而是那些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跟宇宙同时呼吸的时刻，躯体已经失去重量、思想已经没有物质寄托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都象用功的小学生脱口背出的句子那样平平常常。但是有多少次他有这样的感觉呢？有多少次他曾无能为力地咕哝着可笑的话语呢？几乎不值得为回忆这一切而费力。但这一切却成功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自身，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他仿佛为听到狠狠的责骂声而感到难言的羞愧。“让我怎么理解呢？我为人类尽了努力，人类也为我提供了方便，给了我深入到未知领域的乐趣。我的痛苦并不来自为此而付出的艰辛，而

是来自那些超出了正常进化阶段的同类。他们迫使我感到生与死在自己体内同时并存，结合成一种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强力收缩的胃，仿佛要按照同类们的容量挤出多余的部分，惊惧不安的内心跟随着他们，仿佛要挣扎着脱开躯体。我一直在极力平息本能的冲动！是的……命运之神怀着偏爱对我特殊照顾，及时对我当头棒喝，唯恐我看得太多眼睛里落进污秽。头顶'啪'的一响，这是在检验它的形状和强度。一声嗥叫，面前出现一条深沟，一堵墙，一座山，一头犀牛或是一群直立的猿人。但我还有唯一的安慰：直到现在并没有分出最后的胜负。你，克里斯蒂安，一直向前，就象占星术士那样地跟着星星，一刻不停地跟着。星星总是在前边，总是那样的远，而你双脚满是燎泡，就连脑汁都渗出了血色。星星在飞奔，你得胜了，但只是试验性的胜利。经过了这么多奔跑，耗费了这么多力气，结果却既没找到马槽也没找到婴儿[1]，只有那些一心想用它们的臭味使你感到温暖的牛。是的，我是幸福的，星星在奔跑，我也在奔跑，但我不知道究竟跑向何方，只知道要不停地运动，不停地喊叫，这就是一切。有些人头脑永远混沌一片，这是因为命运之神不愿看到他们受苦，怜悯他们。而我可以激动地断言，聪慧之车完全倾倒在了我的身上。尽管这完全可能是偶然事故，但我决计不放弃它。我感到兴奋的是我自知是聪颖的，因而伸展开所有的触角，

① 传说耶稣在马槽里降生。

让它日夜不停地转动，极力寻找可能具有某种含义的特别信号。战胜那些蠢人说明不了什么，只有战胜你自己，从那些包裹着的秘密当中掏出些什么……对，这才是了不起的事！但自然界的变幻无常往往使你感到不安：各种各样的灵长类动物还要繁衍多久？健康的肌体固然可以排除异物进行自卫，但如果它已经耗尽气力了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管怎样，重要的是要抱有希望和幻想，毫不退让，相信自己而不要相信那些可能按照你的意愿而随时出现的奇迹。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又不得不暂时相信奇迹。”

他毫无理由地把汽车停在了路边，下了车。“事实上我还是强者。小小的感冒便能使人结束一切！但我并没让命运感到失望：没有我谁还跟它搏斗呢？靠对手弃权而获胜吗？既然感冒战胜不了我，那么鼻伤风甚至心肌梗死也无能为力。而且还有另一出悲剧：谁来同癌症交战呢？其实我连指的是哪种癌都不清楚。我知道的各种形式的癌，不管起因如何都有致命的危险。癌症，不是别的。谁能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坚持到底呢？谁会在那些以追求舒适作为唯一生活目的的人们中间自寻毁灭呢？但无论如何我已是无可选择：只知道这些，只能够做到这些，年纪老了，没办法改变了。是的，回去，回到试验室：E117，118，119，只要我还有时间。E考德里亚努，E波赞，E迈达鲁，E……E……一直到完全安静……一直到妈妈的鬼！”顿时，难以按捺的无名怒火在每个毛孔里上下蹿动，周身就象一张拉满了弦的弓。

他下了汽车，不知不觉间身体象负了伤似的慢慢软瘫在马路上。抬头看看天空——透过一块块均匀的乳白色的云，映照出一束束微弱的光线。“我为什么不大声骂呢？”他惊异道，“是什么阻止我这样做？”一股痛苦夹杂着怨恨和愤怒的感情不肯听命，哽在咽喉的那种无能为力，无情地迅速上下跳动，这倒使他感到欢欣。没有恰当的话，从他所知道的全部词汇当中找不到这样一个……然后，同样是这样出乎意外的，疼痛和愤怒又都顿时消散了。他站起身，迈着犹豫不定的步子跨进了车。汽车发动不起，这却使他感到如意：到底有了一件确定可做的事情。“笑话……我不会有什么特殊命运，也许只是特殊的幻想……而这却什么也改变不了……”尽管他对发动机一窍不通，却立即下车打开了前车盖，拧拧螺丝，弄弄管子，但汽车仍旧毫无声响。后来拧得有些厌烦，于是盖上车盖，开着车门，干脆用手推了起来，直到听见身后一阵笑声和加油声：是两个体格强壮的高个儿，头上戴着猎手帽，身上背着背囊。

“小牛拉上坡，有点儿费劲呢。”一个说道，“喂，加油，我们也帮一把！”

教授并没抬头，他们推着车跑了约莫二百米，都累了，于是停了下来。

“我说先生，把它弄到镇上去换头驴吧。不往前跑至少还能往后拽，骑上总能到个什么地方。”

“也许是笨人干傻事，”另外一个插言道，“灌汽油了没有？不会就别充行家，干吗没事白费力气？妈的！”

看上去两个人简直是父子，长得太相象了。他们的问话教授感到有趣，但却并没有立即回答，为的是让他们继续下去。

“喂，到后边来，三个人一块推到坡顶上。从那儿——上帝赐福。”

“我只在多布罗加① 这样推过一次推土机。”岁数大的一个说道，“你打算到哪儿去？”

“去打猎。”教授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好极了，”年轻的高兴起来，“我们成全你。这儿有一窝野猪还有几只野山羊。瞧，我们现在就付给你钱。没人知道，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别的事都有我们安排。”

“好啊，”教授想道，“有人要成全我，这个机会不该失掉。”

“怎么，不愿意吗？干吗不说话？”

“让我再想想。”

“别跟他罗嗦了，”年长的说道，“也许他连子弹都没带呢。可你带水来了吗？”

“我挺喜欢你们这样爱说笑话。”克里斯蒂安一边用力推着一边说。汽车费力地往前挪动，到坡顶已经没有多少路。他右边那个年长的吁吁地喘着气，看样子随时都有可能放手，但结果他们并没这样做。到了顶上他们停住了，

---

① 罗马尼亚东南部靠近黑海地区的旧称。

跳过一道沟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来，坐下，咱们再谈谈交易。”年轻的说道，“用不着害怕，反正那个疯女人也死了，没人盯着我们。护林人吗？更没问题。要是他爸爸是个长角的，也连带着用枪一块打！”

克里斯蒂安在他们两个中间躺了下来，伸开两只胳膊，跟身体成十字形。两个人不再笑了，在等着他回答。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疯女人？”过了许久他忽然问道。

“噢，你不认识，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个女财主，象只母老虎，老在树林里盯着，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找你的倒霉。”

“你们打算上哪儿去呢？”

“我们吗？办我们的事！喂，这桩交易怎么说？”

“我只是开开玩笑，我不是打猎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年轻的有些发火，“让我白费了这么多口舌。”

“我吗？是个不走运的人，笨人办了傻事。”

“我看你怪面熟，”年长的说道，“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也可能，也许那时候帮你推过推土机。”他说道。

“犯了什么案？偷东西？政治问题？还是沾了朋友的光？”

“是的，是让朋友搞的……”

“后来你没扒了他的皮？”

"没有，不值得。——你呢?……"年长的没有回答，仰起脸看了看清早鱼白色的天空。

"我还以为要下雨呢。"

"刚才你说要去哪儿?"年轻的又问道。

"我也有一间四面墙的屋，还有一些讨人喜欢的狗。有时候我跟它们一起抽烟，可有意思呢，烟雾腾腾的眼睛看不了多远。在那儿跟那些狗一起，时间慢慢地过去，星期一以后接着星期二，脑子很清楚……我不想通过弃权输掉。"

"有精神病干吗还发给他驾驶执照?"年轻的有些生气。

"谁知道呢，"另一个答道，"什么怪事都有……"

教授抬起胳膊把两只在他额头上交配的苍蝇轰走，然后又把双臂伸直，跟身体成十字形：这样的姿势他感到很舒服。

克里斯蒂安感到该走了，但却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恍惚间两只白白的细嫩的小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然后，毫不费力地，象刚刚触到似地把他扶了起来。就这样，被那两只美丽的小手搀扶着，浑身的重量和痛楚顿时一扫而光，只觉得悠悠忽忽腾空飘了起来。他不想回头看一下，他知道是谁，不会错的，尽管他体内的警报器不停地呼喊："不可能的，简直荒唐，不可能。"但他不愿转过脸，想就这样呆着慢慢习惯起来。"哪怕就这样，永远这样，一直

原
书
缺
页

642--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傲骨
作者＝（罗）布祖拉著　　任远译
页数＝６４２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６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